1921–2011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旗帜闪耀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21-2011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旗帜闪耀

1921-2011

中国共产党
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旗帜闪耀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 张静如，张树军，柳建辉主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5

ISBN 978-7-206-07816-3

Ⅰ.①中… Ⅱ.①张… ②张… ③柳… Ⅲ.①中国共产党-党史-1921~2011 Ⅳ.①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0997 号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1—10卷)

总 编 审:张静如
总 策 划:胡维革　孙建军
主　　编:张树军　柳建辉
责任编辑:孙建军　封面设计:孙浩瀚
责任校对:骆欣欣　李艳越　王宁宁　侯树光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910mm×970mm　1/16
印　张:500　　字数:850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816-3
版　次: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 000 册　　定　价:1480.00 元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编纂委员会

总 编 审： 张静如

总 主 编： 张树军　柳建辉

执行主编： 刘　敏　孙建军

副 主 编： 周敬青　周知民　郑　毅　朱志敏　于凤政

编　　委： 丁永惠　万松年　李　帆　赵永春　朱兴义
孙建军　朱志敏　张志中　陈东林　张　皓
蒋凤国　黄少群　刘少军　田居俭　刘　敏
刘会军　于凤政　郑　毅　田克勤　刘国新
柳建辉　杜　军　谢志远　齐鹏飞　李向前
张静如　张占斌　周知民　周敬青

编 辑 部： 赵宾宾　亢海记　张晶晶　于　岩　于　欣
于立新　蔡海静　高爱丽　田小雄　程　艳
张艾华　黄仲红　金薇薇　郑玉涛　刘皓月
陈学忠　杨　华　刘　莎　闫志弘　董文娜
曲　菁　杨　朔　马振宇　管路燕　董　研
张珊珊　杨建辉　李福秀　罗欣欣　张国华
黄忠红　王彦东　谢春林　樊丹丹　李　艳
李　慧　陈雪梅　付立文　魏良平　王岩岩
张贺男　徐云龙　李　风　任仲博　李莎莎
李　冬　王佳菁　蔡　泽　隋　勇　陈建志

总 策 划： 胡维革　孙建军

前　言

2011 年 7 月 1 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生日，自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至今已经走过了 90 年不平凡的光辉历程。

翻开党的 90 年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90 年间党走过了艰苦卓绝、起起伏伏曲折的历程。从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诞生日起，为了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为独立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历经艰难险阻，创造了使世界为之尊重的的伟大成果，创造了令世界为之震惊的人间奇迹。党的 90 年的历史，也面对过许许多多棘手的难题，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但不管什么困难和挫折，都未能改变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信念，未能阻挡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执着进取的前进步伐。

回顾党的 90 年历程，在这 90 年里，我们党紧紧依靠和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做了三件大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带领亿万民众，开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基本实现了 13 亿人口的小康生活，取得了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的第二位，在科技、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一系列领域均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回顾党的90年历程，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是为实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懈奋斗的历史。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就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这90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90年；是我们伟大的祖国结束近代饱受屈辱的历史和长年战乱的局面、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顽强奋进的90年；是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意气风发地建设新生活的90年；是我们党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的90年。

回顾党的90年历程，90年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指导的结果。事实有力证明，只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各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就能万古长青。

我们党一成立，就把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但是，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而不是教条，必须结合不同国家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它。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逐步找到了一条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条件下民主革命和党的建设的道路，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建国后，又创造性地提出了有别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现实情况，围绕“当今世界的主题是什么”、“中国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重大问题进行探索，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的重要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从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制定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在这些理论思想观点的指导下，我国找到了强国富民的道路。

总起来说，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就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这90年，是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90年；是我们伟大的祖国结束近代饱受屈辱的历史和长年战乱的局面、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顽强奋进的90年；是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意气风发地建设新生活的90年；是我们党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的90年。

90年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长期以来，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广大共产党员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在和平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甘于奉献，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巨大功绩。此时此刻，我们怀着崇高的敬意，深切缅怀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建立了丰功伟绩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已故的老一辈革命家，深切缅怀英勇牺牲的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

总结我们党90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这就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之所以能够承担起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历史重托，之所以能够在剧烈变动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根本原因是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高度重视并不断保持和发展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90年来我们党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的创造性实践，为我们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回望过去，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90年里写下了光辉篇章。展望未来，在未来的征程上，我们党也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谱写更加壮丽的篇章。我们有理由相信，全党同志会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负人民重托，不辱历史使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第一卷　旗帜闪耀

主　编：李　帆　赵永春

副主编：左玉河　朱兴义

编辑部：赵宾宾　亢海计　张晶晶　于　岩　于　欣　于立新

编　者：赵宾宾　亢海计　张晶晶　王晓明　王英予　王金华　王　瑶　高广旭　杨　晓　莫　雷　林德洪　张　旗　徐东海　王景丹　李秦阳　李月清　高立民　李金荣　李　燚　李琦光　李璐玮　丁玉忱　王月前　李小乐　洪　石　魏　晨　马新宇　李梦溪　于　岩　于　欣　于立新　柳青萍　姜雪梅　郑立城　郑福春　郑福春　郑　毅　周齐力　周宝瑞　周华东　钟　月　赵　志　赵方洪　赵建波　赵翠竹　侯　勇　胡　晓　胡云霞　胡冬青　姚方明　贺雨声　李大林　张学杰　岳　亮

统　稿：万松年　刘　敏



目　录

第一章　辛亥革命前的中国

第二章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

第三章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第四章　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人阶级发展壮大

第五章　五四前夜的中国



第六章 五四运动

第七章 五四运动的发展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第九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工人运动

第十章　党的一大标志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第十一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

第十二章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中国时局

第十三章 党的二大和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

第十四章 党领导的早期农民运动



虎门销烟与禁烟运动

鸦片战争前，中国处于清王朝的统治之下，是一个独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但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开始走上了衰败的道路。政治黑暗，吏治日益腐败，官吏营私舞弊，贪污成风。自乾嘉以来，清朝统治集团内部骄奢淫逸，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贪污受贿、勒索私费已经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道光年间，弊政丛生，贪污成灾，“九卿无一人陈时事之得失，司道无一折之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已成风气。最能反映清朝吏治贪赃亡法的事例当属和珅贪污案。嘉庆初年，权臣大学士和珅被抄家时，据说家产折合白银约11亿多两，相当于清廷国库15年的总收入，所以才有了“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在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下，百姓的生活十分悲惨。

清朝的军备松弛，军队腐化相当严重。清王朝虽然拥有22万旗兵和66万绿营兵，但早已腐败不堪。军官不理营务，整日花天酒地，却都是克粮冒饷、贪污肥私的能手。士兵不勤操练，部分士兵吸食鸦片，聚开赌场。甚至出现了骑兵没有马，水兵不习水，武器生锈，炮台失修的颓废局面。这样的军队，根本没有任何战斗力可言。

在经济上，清朝的大贵族、大官僚利用他们的政治、经济特权，大肆兼并土地。随着土地的大量兼并，农民生活日渐恶化。因此，农民的反抗斗争的情绪不断高涨。北方的白莲教，南方的天地会，都陆续发动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中，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转战于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等省，绵持续10年之久。这些农民起义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

与清王朝的日趋衰落相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在迅速发展。18世纪后期，英国开展了工业革命，19世纪初，各主要工业部门相继采用机器生产，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使英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在法国，18世纪末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产业革命的进展。法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二号资本主义工业强国。建国较晚的美

国，为了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也步英、法的后尘，积极向海外扩张。位于中国北部的俄国当时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国家，但从 19 世纪末开始，棉纺织业中也出现了机器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所发展。“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生存的原则”随着各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发展开始寻找新的商品生产和销售市场，开拓更为广阔的殖民地。地大物博的中国，自然成了它寻求的最主要的目标。

作为资本主义头号工业强国，英国是最早与清朝有贸易往来的国家之一。在早期的中英贸易中，英国商人主要向中国输出毛织品和印度棉花，而从中国输入茶、丝等物。至 18 世纪中叶，英国已在西方各国的对华贸易中居首位。但是，由于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使得西方的工业品很难找到市场，连年亏损。同时，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也具有天然的抵制作用。英国商人曾努力向中国推销棉纺织品，但销路很小，改变不了贸易逆差的局面。相反，中国的茶叶、生丝、中药、土布等土特产却是西方市场上的抢手货。在 1760 ~ 1833 年的中英贸易中，中国几乎年年出超；仅从 1820 年至 1824 年间，中国的出超就达到 329 万两白银。这种贸易逆差状况，是英国资产阶级最不愿看到的，也是他们不能容忍的。于是，英国便开始利用鸦片这种特殊商品，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重要手段。

鸦片，学名罂粟，俗称大烟，由被子植物罂粟的汁液提炼而成，具有强烈的麻醉功能，是一种吸食后可使人上瘾的毒品。原产于南欧及小亚细亚，后传到阿拉伯、印度及东南亚等地。鸦片输入中国虽然很早，但以往是当做治病的药物，且输入量很少。直到 18 世纪初，才开始被当做嗜好毒品输入中国。1708 年，英国商人向中国输入鸦片，每年约 200 箱左右。1757 年，英国战胜法国，控制了鸦片生产地孟加拉。10 年后，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增加到每年 1 000 箱（每箱鸦片重 50 公斤或 100 公斤）。1773 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对华的鸦片贸易，由印度加工制造的鸦片逐年增加。到 19 世纪初，每年平均输入鸦片 4 000 箱。

对于不断增加的鸦片贸易，清朝政府曾三令五申，禁绝鸦片，但效果不佳。其原因正如英国侵略者自己供称：“这笔出口生意，对于我们印度殖民地利益太优厚了，不能轻易放弃。”因此，他们用各种手段破坏清朝的禁烟命令，大肆进行非法的鸦片走私贸易。特别从 1821 年起，英国鸦片贩子为了便于走私，把鸦片趸船自黄埔移到伶仃洋面，逐渐在内地编织了一张鸦片走私网。走私范围也从珠江口向外扩展到东南沿海，甚至北及直隶和奉天

海岸。

英国鸦片贩子通过走私网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日益增多。根据马士(H. B. Morse)的估计：1820年~1824年，每年平均输入7 889箱；1825年~1829年，每年平均输入12 576箱；1830年~1834年，每年平均输入20 331箱；1835年~1834年，平均每年输入35 445箱，1838年为最多的一年，输入鸦片达40 200箱。鸦片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了梦寐以求的丰厚利润。它一方面给英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利益，改变了英国在贸易中的被动地位；另一方面通过鸦片贸易，英国成功地打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然而，鸦片的大量输入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其一，鸦片极大地损伤了吸食者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吸食鸦片之风，上至朝廷百官下至市井百姓，甚至军队官兵，无不涉及。据估计，1838年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约在200万以上，占到人口总数的7‰。鸦片极大地毒害了中国人的肌体和心灵，对此魏源曾感叹说："今则蔓延中国，横被海内，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①]马克思也曾引用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的话，痛斥鸦片贸易的残酷，因为"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伤害了他们的肉体"。

其二，鸦片贸易导致了白银外流，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经济。18世纪，外国商船来华，常常载有90%以上的金银来购买中国的茶、丝等货物。但是鸦片贸易发生后，白银由大量输入转为大量流出。至鸦片战争前，中国白银外流至少在一亿以上，平均每年流出50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每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白银外流造成了银贵钱贱，直接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18世纪末，一两白银换铜钱一千文左右，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上涨到一千六七百文。按照清政府当时的规定，缴粮纳税须用纹银，因而劳动人民在无形中增加了赋税压力。

其三，鸦片贸易加深了清朝的统治危机。大量的白银外流，造成了清朝国库空虚，财政逐渐陷入困境。鸦片吸食者又多为官僚地主阶级及其依附者。衙门中的各级官吏，"嗜鸦片者十之八九"。同时，在军队内部，官兵吸食鸦片也很普遍。这就使得清政府的吏治更加腐败，军队更加丧失战斗力，从而出现了"既无可用之兵，又却充饷之银"的统治困境。在这种局面下，严禁鸦片一时成为全国上下的共同呼声。

鸦片泛滥全国，使得清朝统治集团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要不要禁止鸦

片贸易是清政府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为此，30 年代后期，在清政府内部就鸦片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辩中，一部分官绅如：何太清、许乃济等提出弛禁主张。1936 年 6 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朝廷，认为鸦片烟的禁令越是严厉，其弊病也就越大，应该变通办理。他提出取消鸦片输入的禁令，“仍用旧历，准令夷商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此外，他还建议准许国内自由种植鸦片。这一“弛禁”主张立即得到广州的一些大员（两广总督邓廷桢等）的响应，但也遭到了另一些官员的反对。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兵科给事中许球、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先后上奏批驳弛禁论，指出鸦片“削弱中原”、“毒害中华”，必须严禁。

弛禁主张被否定后，朝廷内外再没有公开鼓吹弛禁。但是怎样才能有效地禁止鸦片，应该从何下手呢？道光十八年（1838 年）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道光皇帝，痛陈鸦片的种种祸害，分析过去禁烟未获实效的原因，是由于官吏的贪赃枉法，建议采取“重治吸食”的办法，以抵制鸦片输入。道光皇帝将黄爵滋的奏折发给全国将军督抚，要求他们“各抒己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各地将军督抚纷纷复奏，两江总督陶澍、四川总督苏廷玉等在复奏中对黄爵滋的禁烟主张表示赞许。其中最坚定的支持者是湖广总督林则徐。

林则徐（1785 ~ 1850 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出生于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嘉庆进士。曾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提倡经世之学。先后担任过道员、按察使、布政使、河东河道总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等职。1838 年 7 月，他遵旨筹议《严禁鸦片章程》六条，极力赞成黄爵滋的主张。他提出了禁止吸食鸦片的六条具体办法，并在两湖地区切实执行，取得了良好效果，获得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和拥护。同年 9 月，他再陈道光皇帝，痛切指出：鸦片“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②]林则徐的言行，使他成为主张禁烟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

通过这场禁烟讨论，促使各地官员更加意识到鸦片问题的严重性。而此时，道光皇帝也下定了决心要禁止鸦片，他想从禁止鸦片进口来解决统治危机问题。10 月，他下令各省严禁鸦片，“务期净尽根株”，“毋以虚饰图功，毋以苟且贻患”

同时，道光帝又接连发布谕令，驱逐趸船，缉拿鸦片私贩，惩罚吸食鸦



片烟的王公贵族。11 月，命令林则徐进京陛见，商计禁烟方略。12 月 31 日，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于 1839 年 3 月 10 日奉命抵达广州。当时，广州群众反对鸦片走私的情绪和禁烟的呼声十分高昂。林则徐到达广州后，日夜传询行商、散商，又借“观风试”为名，向当地知识分子了解鸦片贸易的情况。他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人合作，积极整顿海防，防御外国入侵；严拿烟贩，惩办不法官吏；严禁国人贩卖、吸食鸦片，凡吸食者要立即呈缴烟土烟具，限期戒除，并于 3 月 18 日谕告各国商人，限期 3 日之内，将趸船上的鸦片全数缴官，不许丝毫藏匿，并出具甘结（保证书），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他毅然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林则徐的这些举措，得到了广州各界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城乡各地纷纷呈缴烟膏烟具，揭发鸦片贩子，禁烟运动在广州迅速高涨。

但是，这场正义的禁烟运动并不顺利，遭到了英国资产阶级的顽强抵抗。当时英国商务监督义律得知禁烟令后，立即从澳门赶到广州，教唆英商拒交鸦片和保证书，并指使大鸦片贩子颠地逃跑。林则徐经过周密布署，迅速粉碎了义律的诡计。由于林则徐所采取的坚决措施，4 月下旬至 5 月中旬，英、美烟贩被迫缴出鸦片 19 187 箱（其中美国烟贩 1 540 箱），又 2 119 麻袋，共计重 237 万余斤。

1839 年 6 月 3 日，林则徐在广州虎门海滩主持销毁收缴来的鸦片。为销毁鸦片，搭建了两个销烟池，每个 15 丈见方，池底用石条铺平，四边栏桩钉板，前面设一涵洞，后面通一水沟。两旁的绿营兵丁先是从后面水沟里把水引入销烟池内，撒入食盐，使池水成为盐卤，然后把一箱箱的鸦片运到池边，打开箱盖，将鸦片切开捣碎，投入池中，浸泡了一段时间后，再撒下石灰。顷刻间，盐卤沸腾起来，浓烟滚滚，升入天际。兵丁们站在跳板上，手拿铁锄、木耙来回翻搅，使鸦片完全销溶，等到海水退潮时，打开销烟池前面的涵洞，使销溶后的鸦片随着浪花冲入大海。在涵洞上还装着网筛，防止未销溶的大块鸦片流出。看到这一扬眉吐气的情景，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为了让外国人“共见共闻”，6 月 13 日，林则徐发出告示，准许外国人到销烟现场参观。一些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参观后，惊叹销烟工作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乎他们的“臆想”。从 6 月 3 日～25 日，除留

下 8 箱作为样品送往京城外，200 多万斤鸦片全部销毁。

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禁烟斗争的伟大胜利。它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也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坚强决心。领导这场斗争取得胜利的林则徐，不愧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鸦片战争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从1840年开始，中国开始进入近代社会，其标志就是英国侵略者发动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是英国资产阶级发动的侵略中国的战争，正如马克思所说，这场战争是英国资产阶级“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对华战争”。英国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从根本上说，是要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满足资产阶级势力扩张的需求，而直接原因就是为了保护罪恶的鸦片走私活动。

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他们的利益，破坏了他们的发财梦。当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英国后，立刻引起了英国鸦片贸易集团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极大愤怒，他们纷纷叫嚣要对中国发动战争。他们认为中国的禁烟运动为他们提供了战争的直接借口，并要求政府立即发动侵华战争，用武力强迫清政府接受他们的条件，以此打开广阔的中国市场。

1938年10月1日，在鸦片利益集团的鼓动下，英国政府召开了内阁会议，讨论武装侵略中国的问题。1939年10月，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了《决定对华发动战争》的议案。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和义律作为同清政府交涉的正、副全权代表，并任命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巴麦尊发给他们侵华训令和《对华条约草案》，对具体侵略步骤做了指示，并提出赔款、割地、开放通商口岸领事裁判权等侵略要求。

1840年6月，乔治·懿律率领一支由兵船16艘、武装汽船4艘、运输船28艘、士兵4 000余人（后曾至15 000人）、大炮540门组成的“东方远征军”，相继从印度、开普敦等地到达中国广东海面，正式开始了他们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英国侵略军到达广东海面后，对广州进行封锁。由于广东军民早有戒备，侵略者无隙可乘，于是他们根据原定计划向北进犯。7月，英军进攻福建厦门，被已经调任闽浙总督的邓廷真督师击退。接着，又北犯浙江，于7月初攻陷防御薄弱的定海。侵略者在定海大肆洗劫后，继续北犯。8月，英

国军舰到达天津白河口，向清政府投递巴麦尊给清政府的照会，提出赔款、割地、通商等无理要求。

对英国发动的这场战争，清政府在事前毫无思想准备。当时沿海各省的督抚除林则徐（已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已任闽浙总督）等少数人以外，在军事上都没有作任何部署。作为京师重要门户的天津，竟然只有守军八百。山海关一带，连一尊可用的大炮都没有。在这样的防御工事下，英军很快就占领了定海，一路北上，直逼京师。定海失陷，津京告急，引起清廷很大震动。清朝文武官员惊慌失措，一部分人主张向英国妥协。他们乘机向道光帝大进谗言，攻击林则徐、邓廷桢，把英军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归罪于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活动。道光皇帝本来就没有抗战决心，再加上妥协派在耳旁的鼓动，很快动摇了当初的禁烟和抵抗的决心，转向妥协的立场。8 月 20 日，在接到英军照会的第二天，他指责林则徐禁烟“措施不当”，必当“重治其罪”，并派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天津海口与英军谈判。在谈判中，琦善责怪林则徐禁烟“操持过急”，并向英国侵略者表示，只要英军退回广东，“定能代申冤抑”，使一切问题在广州谈判中获得满意的解决。懿律得此答复，认为实现了以武力要挟清政府谈判的目标，又因北方天气即将转冷，舰船不宜久留，于是同意了琦善的要求，于 9 月中旬率军南下。

道光皇帝认为琦善“退敌有功”，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同时，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1840 年 11 月 29 日，琦善到达广州。一到广州，他就下令撤除珠江口附近的防御设施，裁减水师，解散乡勇，排挤坚持抵抗的地方官员，以此向英军表示谈判诚意。11 月，懿律因病回国，义律接任全权代表。在谈判过程中，义律坚持要求清政府接受英国提出的全部条件，特别是坚持赔偿烟价、割让岛屿和增开口岸的无理要求。琦善答应赔款烟价 600 万元，除广州外另增设一处口岸，但拒绝给予岛屿。为了迫使琦善屈服，义律决定先战而后商。1841 年 1 月 7 日，英军突袭大角沙角、炮台。守将陈连升父子率军英勇抵抗，伤亡 600 余人，炮台当天失守。

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后，义律于 1 月 20 日在澳门单方面发表了一份公告，内容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 600 万元、恢复广州通商等。与此同时，义律提出包括割让香港在内的所谓《穿鼻条约》，并与琦善谈判。琦善深知自身难保，并未在条约在签字，谈判停止。1 月 25 日，英国侵略者强占了中国领土香港。



1841 年 1 月 27 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十分恼怒。他原以为惩办林、邓，开放贸易，英国就会交还定海，罢兵休战。不料，英军言而无信，定海尚未交还，又向广东发动进攻。于是，道光帝立即下诏对英宣战，并任命御前大臣、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 17 000 人开往广东。

英军获悉清政府调兵遣将的消息后，便立即先发制人。2 月下旬，英军向虎门炮台发起猛攻。年已花甲的老将关天培率军英勇抵抗，多次击退英军。但仍因为广东主事的琪善拒绝派兵增援，关天培与 400 余名将士寡不敌众，壮烈殉国。英军占领虎门炮台后，乘势驶入内河，进逼广州。

3 月，参赞大臣杨芳率军先期到达广州。义律从商业利益出发，向杨芳提出休战谈判，双方达成停战协定，广州恢复贸易。奕山日夜饮酒作乐，直到 4 月才到达广州。奕山到达广州后，提出了“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寇”的方针。他根本不作战前准备，却企图侥幸取胜，邀功请赏。5 月 21 日，在没有切实准备的情况下，奕山贸然发动了一次夜袭，清军大败，英军乘势反扑，占领了城郊重要据点，包围并炮轰广州城。26 日，英军准备攻城，奕山等慌乱一团，在城上高悬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乞和。27 日，奕山与义律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规定清军六天内撤至离广州 60 英里以外的地方；一周内缴纳 600 万元所谓“赎城费”；赔偿英国商馆损失 30 万元。

1841 年 4 月，英国政府收到义律提出的《穿鼻条约》的内容后，极为不满，认为从中所获的侵略权益太少，决定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8 月，璞鼎查到达香港，随即英军再次北犯。8 月 27 日，英军进攻厦门，总兵江继芸率清军英勇抗击，力战阵亡，厦门陷落。9 月 26 日，英军进攻浙江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守军 5 000 余人誓死抵抗六昼夜，全军将士壮烈殉国，定海于 10 月 1 日再度失陷。10 日，英军攻打镇海，浙江提督余步云临阵逃亡，裕谦亲自登城指挥抗战。总兵谢朝恩战死，镇海失守，裕谦悲愤投水自尽。13 日英军攻宁波，余步云先一日弃城逃往上虞，宁波不战而陷。

与此同时，英军还多次侵扰台湾。台湾道姚莹和总兵达洪阿，在台湾各族人民支持下奋起抵抗，两次击沉英军舰船，俘虏敌人 180 余人，保卫了台湾的安全。

半月之内连失浙东三城，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为了挽回败局，道光皇

帝下令重新迎战，以示“天朝兵威”。10月18日，道光皇帝下令任命协办大学士、宗室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和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往浙江办理军务，并从各省调集军队近2万余人，赶赴浙江前线。奕经带领大批亲信故旧，一路游山玩水，勒索地方，竟然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才从北京赶到浙江绍兴。与奕山在广州一样，他到浙江前线后，依然不认真筹划抗敌措施，希望能侥幸取胜，邀功请赏。1842年3月10日，在不了解敌情和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奕经命令清军从绍兴分三路出师，冒雨夜袭宁波、镇海、定海，企图一举收复三城。但因事前走漏了消息，英军早有准备，当清军进入宁波城后，遭到英军夹击，清军全军溃散。英军乘机反扑，慈溪失陷。奕经逃往杭州，从此不敢再战，却谎报军情，掩败为胜，力主对英求和。

清政府在广东和浙江的两次出师接连遭到失败，使得妥协气氛又一次笼罩着清廷。部分朝臣上奏道光帝，大肆宣称英军船坚炮利，无法抵挡，且战争劳民伤财，耗资巨大，如果继续开战，国内将会出现各地人民揭竿而起的危局。军事上的连续失利和妥协派的喧嚣，促使道光皇帝从忽战忽和转而一味求和。4月，他任命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并重新起用已被革职的伊里布，令他们前往浙江，谋求与英国进行谈判。英国侵略者认为，此时和谈还不足以让清政府接受他们提出的全部要求，因此决定仍照原计划，沿长江进攻南京。

1842年5月，英军退出宁波和镇海，集中兵力进犯江浙两省的海防重镇乍浦，遭到守军的顽强抵抗。17日，乍浦陷落。6月，英军侵入长江，攻打吴淞炮台。两江总督牛鉴闻风而逃，年近七旬的老将陈化成率5 000余官兵坚守吴淞西炮台，先后三次拒绝牛鉴的退兵命令，身负重伤，英勇战死。英军先后占领吴淞、宝山、上海，继续沿长江西上。7月21日，进攻镇江，副都统海龄（满族）率军殊死奋战，终因力量悬殊，守军全部战死，镇江失守。英军于8月初侵入南京下关江面。耆英、伊里布等赶到南京议和，接受了璞鼎查提出的全部条款。

历时两年的鸦片战争，最终以中国的失败告终。中国所进行的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自卫战争。这场战争为什么会以“天朝大国”的失败而终结？清朝的将军督抚们把战败的原因归结为敌人强大的武器装备，事实并非如此。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武器装备固然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从作战双方的力量对比来看，英军在武器装备和训练方面是比

清军先进，但也存在不利的因素，其兵力严重不足。当时英国能够投入对华作战的兵力，最初只有4 000余人，最多时也只有15 000人。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从英国本土航行到中国，至少要四个月，从印度到至少要一个整月。英军远离本土作战，补给线过长。因此，他们不敢分散兵力，不敢过于深入，只能突袭取胜，进行讹诈。清政府原本可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发动民众进行本土作战，英勇抵抗。但清朝的统治者始终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与本国人民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在抵抗侵略的战争中仍然继续纵兵扰民，当然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封建统治者在整个战争中一贯地没有坚定的抗敌方针。从皇帝到将军、督抚，是和是战举棋不定。说战，没有切合实际的作战方法，稍受挫折，立刻求和；和议不成，又空喊作战。在他们看来，对外战争一战取胜当然最好，但当速战论不通时，马上就转到了投降主义，腐败的清朝统治集团已经被敌人的海盗行为吓倒。由此可见，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不在武器装备，而在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腐朽和经济、科技的落后，在于清政府的昏庸愚昧。

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主要内容有：一、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二、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人及所属家眷在上述五地寄居，同时准许英国派驻领事等官。三、中国赔款总数为2 100万元，其中军费1 200万元，鸦片费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分四年付清。四、英国商人缴纳的进出口货税，由中英双方“秉公议定”。五、废除“公行”制度，英国商人在通商口岸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

《南京条约》签订后，由于需要议定关税税率及其他有关问题，中英在广东继续谈判。1843年7月22日，英国强迫清政府补订了《五口通商章程》，并在香港公布。10月8日，双方又在虎门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英国通过这个条约取得了如下特权：一、领事裁判权。即英国人在中国犯罪后，由英国领事按照英国法律处理。二、片面最惠国待遇。即将来中国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利时，英国人可以“一体均沾”。三、土地房屋租赁权。即英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永久居住。《虎门条约》还附有《海关税则》，规定了“值百抽五”的低税率。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美、法、俄等国接踵而至，纷纷效仿英国的做法，在用武力威胁的同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

1844 年 7 月 3 日，清政府被迫派耆英与顾盛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望厦条约》。在这个条约中，美国享有除割地、赔款以外的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所取得的各项特权，同时还新增了几项重要权益：一、扩大领事裁判的范围。规定美国人在华与中国人或其他国人发生的一切诉讼，均由美国领事审理。二、进一步加强协定关税权。条约规定“中国日后欲将税例变更，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三、美国兵船可以在中国各港口“巡查贸易”。

1844 年 10 月 24 日，清政府派耆英在广州附近的黄埔与法国代表签订了《黄埔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法国也取得了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在这个条约中法国还强迫清政府增加了一条：“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这实际上是它迫使清政府放弃对天主教禁令的开始。至 1846 年，法国获得了在各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权利。从此，传教成为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渗透的一个重要手段。

1851 年 8 月 6 日，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又称《伊宁条约》）签订。主要内容是：一、开放伊犁和塔城对俄通商，允许俄国商人修筑房屋、货栈，免税贸易。二、俄国享有领事裁判权。

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政治上，中国的独立主权受到严重侵犯，领土完整遭到破坏，司法、关税等主权开始丧失，中国开始受制于西方列强；在经济上，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中国逐步沦为资本主义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的供应地。从此以后，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渐地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此，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开始。

第二次鸦片战争再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1856 年～1860 年，正当中国农民起义进入高潮的时候，英、法两国在美、俄的支持下联合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这次战争的目的是进一步扩大侵华权益，其实质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发展，所以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也称英法联军之役。

鸦片战争后的十年间，英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商品倾销，企图用商品的重炮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英国代表璞鼎查，回到伦敦后曾在议会得意地宣布：倾兰开复全部纺织厂的产品，也不能满足中国一个省日常需要的布料。可是，英国资产阶级的美梦并没有成为现实。实际上，英国工业品在中国的增长势头仅保持了 2 年～3 年，1846 年以后，英国对华商品输出开始下降，到 1856 年为止，一直徘徊在 100 万至 250 万英镑之间。而中国的丝茶及其他土特产品的出口却逐年增加。

英国商品在华出现滞销的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的输入有着顽强的抵抗力；另一方面，鸦片的大量输入，使中国出口的丝、茶收入大半被其抵消，中国人无力再更多地购买其他商品。而在外国商人看来，西方商品在华滞销的原因是中国的门户开放程度不够。因此，他们以修改条约为借口，迫使清政府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获取更多的侵略特权。

1853 年，英国首先向中国提出“修约”的要求。第二年，《南京条约》届满 12 年。英国政府以《望厦条约》有 12 年后在贸易及海面条款上稍作变通的规定为借口，联合法、美两国向清政府进行“修约”交涉。清政府表示拒绝，交涉没有结果。1856 年，《望厦条约》签订满 12 年，美国再次提出全面“修约”的要求。美国驻华公使伯驾先后在广州和上海积极活动，英、法两国在外交上给予支持，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但再次为清政府所拒

绝。这时，英、法与俄国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已经结束，英、法两国便寻找借口，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

1856 年 10 月，英国利用“亚罗号事件”制造战争借口。“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走私船，为中国人苏亚成所有，曾在香港注册，但已经过期。10 月 8 号，广东水师上船搜查海盗，逮捕了 12 名有嫌疑的中国水手。这本来纯属中国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但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遵照英国政府的指示，竟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还捏造说中国兵勇上船捕人时扯下了英国国旗，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送还被捕者，赔礼道歉。当时该船并未悬挂英国国旗，叶名琛据实复函驳斥，但不久即妥协退让，将获犯送到英国领事馆。巴夏礼百般挑剔，既不接收水手，又拒绝叶名琛的复照，蓄意扩大事态。10 月 23 日，英国军舰冲入珠江，进攻沿江炮台，首先点燃了战争的序幕。

广州地方“百姓强悍不服”,[①]奋起反抗。城郊人民在陆地上几战几守，上百只小船从海上不断骚扰敌舰，严重英国侵略军的安全。而此时，英军在华兵力不过 2 000 余人。10 月 29 日，英军曾一度攻入广州城，因兵力不足，随即撤出广州，退据虎门，等待援军。

1857 年春，“亚罗”号事件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首相巴麦尊主张对华开战，但遭到部分议员反对。巴麦尊下令解散下议院。议院重新改选，巴麦尊获得多数议席，通过了扩大侵华战争的提案。对此，马克思愤怒批驳了巴麦尊等政客的战争喧嚣，指出：“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机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荒唐的借口下发生的!”。然而，这却阻止不了他们的暴行。3 月，英国政府任命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海陆军前来中国。与此同时，英国还建议法国政府共同行动。

在此之前，法国正因“马神甫”（又称“西林教案”）向中国交涉，进行诈索。1854 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县传教，因包庇作恶教徒，引起了公愤。1856 年 2 月被西林当局逮捕，在站笼中死去，这就是“马神甫事件”。法国为了换取英国支持它在越南“自由行动”，并取得天主教在中国传教不受干涉的保证，便接受英国建议，派葛罗为全权转使，以“马神甫事件”为借口，率军来华。美、俄则同意配合行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1857 年 10 月，额尔金和葛罗先后率舰到达香港。英、法以武力侵华，得到了美、俄两国的支持。美国在“修约”问题上，与英、法步调一致。

俄国在1857年初曾向清政府提出重新划定中俄边界的无理要求，企图侵占中国黑龙江以北的大片领土，遭到拒绝。于是，美国全权公使列卫廉、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便在香港与英、法公使合谋。12月，英法联军5 600余人在珠江口集结待命。12日，英法代表分别向叶名琛送出照会，提出谈判修约、赔偿“损失”等无理要求，同时开始了武力进犯。28日，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叶名琛忠实执行清政府“息兵为要”的方针，不做任何战斗准备，次日广州被攻陷。随后，叶名琛被俘，解往印度的加尔各答，1859年病死于囚所。广州将军穆克德讷与广东巡抚柏贵投降，柏贵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三人委员会的监视下，当上傀儡政权的头目。面对列强入侵，广东人民自发组织起来，拿起武器，经常武装攻城，使城中敌军心惊胆战。香港、澳门同胞也罢工罢市，以示抗议。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为迫使清政府屈服，决定沿海北犯天津。1858年4月，英、法、美、俄共25艘军舰到达大沽口。四国的公使也各乘军舰抵达白河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提出侵略条款，要求指派全权大臣进行谈判。美、俄的照会还假惺惺地表示，愿意充当中间的“调停人”。清政府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到大河口交涉。英、法竟蛮横地限令6天内答复其要求，否则即诉诸武力。5月20日，英、法军舰闯入白河口，炮轰大沽炮台。守台将士誓死还击，打死打伤敌军100多人。然而谭廷襄等人毫无斗志，争相西逃，大沽陷落。大沽失陷后，英法联军2 000余人沿白河，抵达天津城外，扬言攻占北京。

清政府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议和。桂良、花沙纳惧怕谈判“决裂”，极力主战对外妥协，集中力量镇压太平军。咸丰帝迫于内外压力，束手无策，只得支持桂良等人的主张。6月13和18日，美俄公使以欺骗手段，诱使桂良等人分别签订中俄、中美《天津条约》，两国从中攫取了许多特权。

英、法公使则以威胁的办法，逼迫桂良等在6月26日、27日签订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主要内容有：一、公使常驻北京；二、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三、英、法等国可往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四、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五、对英赔款白银400万两，对法赔款白银200万两。

同年11月，桂良等在上海又同英、法、美三国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

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鸦片改名为“洋药”，每箱收税银三十两；中国海关由英国人“帮办税务”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免征一切内地税；各口税收划一办理，“邀请”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从此，海关管理大权落入了外人之手。

《天津条约》签订后不久，马克思就断言：“从政治观点看来，这个条约不仅不能巩固和平，反而将使战争必然重起”[②]。事实正如他所预料，英、法侵略者远不满足已有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重新挑起战争。1859 年 6 月，英、法、美三国公使各带军舰前来交换条约，6 月中旬抵达大沽口外。6 月 25 日，英国军舰突然袭击大沽炮台，并强行登陆。守卫炮台的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等，在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指挥下，开炮还击，击沉击伤敌舰多艘，打死打伤敌兵近 500 人。史荣椿、龙汝元等将士阵亡。在 3 艘美舰的掩护下，英法舰队退出大沽口。

大沽战役完全是英法侵略军挑起的，中国军队为保卫祖国痛击侵略者，是正义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也想与英、法列强言和，派两江总督何桂清等人，与英法公使谈判，还下令北塘口岸不加设防，以示谈判的诚意。然而，英国军队在大沽战败的消息传到伦敦后，引起英国资产阶级的一片喧嚣，狂叫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

1860 年 2 月，英法组织了新的侵华联军，出动舰船 200 余艘，英军 18 000 余名，法军 7 000 余人，分别由额尔金和葛罗率领开往中国。英法联军于 4 月占领舟山，5、6 月间占领大连和烟台，7 月抵达大沽口。清军虽在大沽严密布防，却未在北塘设防。8 月 1 日，英法联军乘虚占据北塘，然后连陷塘沽、军粮城。21 日，联军水陆协同，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台清军在直隶提督乐善的指挥下，英勇抵抗，直至全部壮烈牺牲，炮台失守。驻守南岸炮台的僧格林沁不战而走，大沽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24 日占领天津。清政府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议和，因英、法侵略者漫天要价，谈判未获结果。9 月，联军向通州进犯。清政府一面令僧格林沁率部堵防，一面派怡亲王载垣等人到通州议和。双方的谈判因争执不下而中止。21 日，联军攻占通州八里桥，逼近北京。22 日，咸丰皇帝逃亡热河，留下其弟恭亲王奕䜣负责议和。

10 月 6 日，联军攻占了圆明园。圆明园前后经营 150 多年，综合中西建筑艺术，聚集了古今艺术珍品和历代图书典籍，就连侵略者也无不惊叹这是“世界最宏伟最美丽的宫殿”。英法联军入侵后，在圆明园大肆抢掠达 12



天。他们掠走了所有能搬动的贵重物品。一名《泰晤士报》的随军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掠夺场景："在场的每一个军人，都掠夺很多"，"被劫掠和被破坏的财产，总值超过六百万磅"。而对那些搬不动的文物，则野蛮破坏，然后又纵火焚毁，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成了一片废墟。13日，英法联军侵入安定门，控制了北京。

英法联军扬言要炮轰北京城，捣毁皇宫。奕䜣请求俄国公使从中调解。俄国公使以解决中俄边界问题为先决条件，并敦促奕䜣同意联军的一切要求。奕䜣在英、法武力逼迫和俄公使恫吓下，被迫屈服，于10月24日、25日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条约规定：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增开天津为商埠；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割让九龙司，"归英属香港界内"；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堂财产。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约本上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天地，建造自便"。《天津条约》中所规定的对英、法的赔偿，都增加至800万两，另增恤金英国50万两，法国20万两。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11月，英法联军退出北京。

沙皇俄国在这场战争中，趁火打劫，侵占我国大量领土。1858年5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穆拉维约夫乘机率军直驱瑷珲，逼迫黑龙江将军奕山与之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条约主要内容是：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原属中国内河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此后只准中、俄两国船只来往，别国不得航行。实际上，清政府并未批准该条约，还对奕山等人予以处分。但沙俄无视条约的非法性，公然把瑷珲北岸的海兰堡改名为"报喜城"（布拉戈维申斯克）。沙皇还晋封穆拉维约夫为阿穆尔（黑龙江）斯基伯爵。受封后，他率军闯入乌苏里江，强行占领了我国多块领土。1860年，俄国强占了我国东北重要港口海参崴，并改名为拉迪沃斯托克（意为"统治东方"）。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俄国公使自称"调停有功"，并以帮助镇压太平军为诱饵，以武力威胁清当局批准《瑷珲条约》。同年，又诱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其中规定：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只留少数居民点和渔猎区仍由中国人居住、渔猎；取得在库伦（今乌兰巴托）、张家口、喀什葛尔（今喀什）等地免税贸易、设立领事并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特权；开放喀什葛尔为商埠。《北京条约》还规定："西

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哨所）等处为界。这样，沙俄不仅强占了中国东北大片领土，且为其扩大对华商品输出和进一步侵略新疆、蒙古地区创造了条件。

1864 年 10 月，清政府被迫与俄国签订了《勘分西北界约记》。通过这个条约，俄国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 44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俄国通过各种条约总共霸占了中国 144 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成为此次战争的最大获利者。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终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又获取了更多的权益。中国领土被割让，领海和内河主权、海关和外贸主权、司法权进一步丧失，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加强了对中国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扩张。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继续加深，中国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了。

注释：

①《总督叶名琛复巴夏礼照会》，《第二次鸦片战争》（丛刊），第一册，第 175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 86 页。

辛丑政变发生　清朝政府格局调整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英、法等国侵略军进入京城横行无阻，使得“天朝大国”颜面尽失，特别是《北京条约》承认了《天津条约》的全部内容，各国公使已有合法进驻北京的权利，清朝中央政府与各国的直接外事交涉已经无法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恭亲王奕䜣、桂良、文祥等大臣便向清廷提出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适应新的对外交涉的需要。

在总理衙门设立之前，清政府的外交事务由礼部、理藩院、鸿胪寺等机构办理，地方上由两广或两江总督负责。鸦片战争后，中外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清政府的外交体制也被迫进行相应的调整。1860 年冬，清政府一度在北京设抚夷局，处理对外交涉，后来，这个名称已不合时宜。1861 年 1 月，咸丰皇帝批准了恭亲王奕䜣等人的建议，正式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译署）。首任总理衙门大臣，除奕䜣外，还有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总理衙门的职权除了办理外交外，还涉及通商、关税、传教、海防教育、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等，总揽了全部洋务事宜。其权势与地位，凌驾于六部之上。

在设立总理衙门作为中央外交机构之后，清政府还设置了南、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南洋通商大臣主管东南沿海及长江流域通商事务，最初为五口通商大臣，原是两广总督兼职，1858 年改由两江总督兼任。1868 年，因通商口岸已扩展至长江各地，故改五口通商大臣为南洋通商大臣。北洋通商大臣初为三口（牛庄、天津、登州）通商大臣，设置于 1861 年。1870 年，因通商事务扩大，改三口通商大臣为北洋大臣，管理直隶、山东、奉天三省通商，交涉事务，由直隶总督兼任。总理衙门对南、北洋大臣，只是备顾问和代传达而已，不能直接指挥，在制度上没有隶属关系。

与总理衙门有关的机构还有总税务司和同文馆。1861 年全国性的总税务司署成立，设正、副总税务司各一人，由洋人担任，管理全部海关税务。第二年，在京师又设立了同文馆，它是专门培养外国语言文字、科学技术人

才的学校。为培养外国语言文字方人才，学校先后分设了英、法、俄、德、日五馆；为培养科技人才，自 1866 年起，相继添设算学馆、化学馆、格致馆（力学、水学、火学、光学、电学）和医学馆。总税务司和同文馆虽然是独立机构，但与总理衙门关系密切，在组织上也有直接关系。

总理衙门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在体制、职权等方面都有别于一般的政府机构，几乎成了清政府的“内阁”。但总理衙门无权指挥各省督抚，各省督抚也不向总理衙门直接负责。由于外国公使自 1861 年以后开始进驻北京，建立使馆，与奕䜣等人的联系不断加强，他们经常粗暴地干涉中国的内政与外交，对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这样，总理衙门的对外交涉，实际上是一种半殖民地性质的外交。

奕䜣的媚外态度正好迎合了外国侵略者的需要，成了洋人极力培植的对象。但此时，清政府的实权并不在奕䜣等洋务派手中，而是掌控在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顽固派手中。以肃顺为代表的顽固派，对外国侵略者疑惧很深，他们的政治态度对咸丰帝有着很大的影响。由于在对待洋人问题上的分歧，在当时的条件下，出现了热河行宫和北京留守两个活动中心。奕䜣等一再奏请皇帝回京，企图削弱对手的影响；而肃顺竭力劝诫皇帝暂留行宫，一边继续掌握实权。两派之间为争夺统治实权矛盾不断，不久发生的宫廷政变就是两派矛盾的集中爆发。

1861 年 11 月，总理衙门成立不久，北京发生了一次宫廷政变。咸丰皇帝逃到热河行宫后，于 1861 年 8 月病死，遗诏以年仅 6 岁的儿子载淳继位，年号定为“祺祥”。同时，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大学士肃顺、驸马景寿，还有原来的五个军机大臣中的四个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 8 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辅佐年幼的载淳，总摄朝政。咸丰临终前，又将自己刻有“御赏”和“同道堂”的两枚御印，分别赐给了皇后和懿贵妃，并颁诏说，此后新皇帝所颁的一切诏书，都要印有这两枚御印才能有效。

他的生母叶赫那拉氏（1825 年 ~ 1908 年），由贵妃而尊为皇太后，随即加“慈禧”徽号。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皇太后加“慈安”徽号。慈禧太后是个阴险、贪权、又野心勃勃的女人，她刚刚坐上圣母皇太后的宝座，就迫不及待地揽权。慈禧先让人建议，因为皇帝年幼，无法处理朝政，所以要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是要掌握实权。她明目张胆的要权行为，自然而然遭到了辅政八大臣的坚决抵制，载垣等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帘”的理由加以反对。虽然两宫太后掌握着咸丰所赐的两枚印章，在政

治上与八大臣势均力敌，但由于当时的热河行宫全部都是辅政八大臣的势力，慈禧费尽心思也未能得逞，只好虚与委蛇，暂时向八大臣妥协，但她始终也没放弃垂帘听政的想法。正好慈安太后对肃顺等人的所作所为也是极不赞成，慈禧于是串通了慈安，并且使用苦肉计，将自己的心腹发回北京，与恭亲王奕䜣串通。

奕䜣是咸丰的亲弟弟，为人机智、练达，很有才干，相比之下，身为皇帝的咸丰却显得平庸无能，这就招来了咸丰帝的猜忌。因此，咸丰在政治上疏远奕䜣，重用肃顺等人。奕䜣虽贵为亲王，但却没有什么实权，处处受到肃顺等人的排挤。咸丰逃亡热河，命令奕䜣留在北京与侵略者议和，一同留下的还有军机大臣文祥。文祥因为与奕䜣关系较好，也受到肃顺等人的排挤，不准他随同前往热河。后来的八个辅政大臣中，有四个是军机大臣，只有文祥除外。所以，奕䜣和文祥对肃顺等人恨之入骨，不除不快。正是基于这些，在接到两宫太后的求援信号后，奕䜣和文祥决定要帮助两宫太后除掉辅政八大臣。

10 月，奕䜣经多次申请，才得以以“奔丧”的名义赶到热河。在大行皇帝的灵前一番哭祭之后，他谒见了两宫太后，和两宫太后密谋了许久，最后决议在北京发动政变。奕䜣回到北京后，笼络驻扎在京、津一带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作好了发动政变的一切准备。

在从承德回北京时，慈禧以皇帝年幼，不能全程护送先帝梓宫为由，随灵柩走了一天，就决定和载垣、端华等 7 大臣由小路提前回北京。让肃顺护送咸丰的梓宫走大路。

11 月 1 日刚到北京，慈禧就迫不及待的接见了恭亲王奕䜣，军机大臣文祥等。第二天一早，奕䜣手捧盖有玉玺和先帝两枚印章的圣旨，宣布解除了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又命令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撤职查办，严加看管。并派醇郡王奕　在京郊密云逮捕了护送梓宫回京的肃顺。不久（8 日），慈禧发布上谕，否认咸丰遗诏，下令将肃顺斩首，让载垣、端华自尽；另外五大臣则被革职或充军。八大臣的第一个重要罪状就是“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也等于向侵略者表示，她是“尽心和议”的卖国贼。接着，宣布废除八大臣原拟的祺祥年号，改明年（1862 年）为同治元年，东、西二太后垂帘听政。加封恭亲王奕䜣为议政王大臣，军机大臣领班，奕　、文祥、胜保等人也得以加官晋爵。虽“同治”是指由两宫太后共同治理朝政，慈禧之号也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

这一年是农历辛酉年，故又称“辛酉政变”。而发生此事的地点又在北京，故又称“北京政变”。

辛丑政变后，慈禧太后的统治地位并未稳固，还需要奕䜣等人的继续支持，于是给予奕䜣许多破格的待遇加以拉拢，比如将他的长女留在皇宫，并晋封为固伦公主；赏赐他在紫禁城内乘用四人轿等。从此，奕䜣总揽了朝中大权，积极培养自己的势力，逐渐成为清政府的决策人物。

在镇压国内农民起义的问题上，奕䜣和肃顺等人的立场一致，但在对待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上却有所不同。奕䜣对外国侵略者是“待以优礼”、“以信义笼络”，而肃顺等人则要维持“天国”的威风，对外国侵略者心存疑惧，不大驯顺。因此，外国侵略者担心肃顺等人一旦返回北京，外交上可能会遇到麻烦，不希望他们继续掌握实权，转而支持对他们能“尽心和议”的奕䜣。慈禧和奕䜣的上台，让外国侵略者感到十分满意，认为这是他们“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也是奕䜣等人“对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使然”。

慈禧通过发动政变获取了清政府的最高统治权力。从那时起，她统治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清政府这一权利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辛丑政变后，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西方侵略者为了实现他们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所取得的各种特权，很快就撕下在清政府和太平天国之间保持“中立”的伪装，以政府的名义，公开支持清朝统治者。英国首相巴麦尊表示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使“中国内部全局得入正规”，法国公使也表示要在“海口助中国剿贼，所有该国停泊各口之船只兵丁，悉听调遣”；俄国政府还决定送给清政府一批枪炮，以便用来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

辛丑政变以前，清朝统治者已经开始借助外国力量，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但当时掌握实权的肃顺、端华等人不敢公开与外国侵略者勾结。慈禧太后上台后，认为中外合作镇压太平天国的条件已经成熟，公然宣布“借师助剿”。从此，中外势力公开勾结起来，成为导致太平天国最终失败的重要因素。

慈禧、奕䜣等清朝最高统治者，在对外依靠外国侵略者力量的同时，对内则注意调整同曾国藩集团的关系，以取得他们的支持。清政府原来依赖的八旗兵、绿营兵等武装力量基本上已经被太平军摧毁，这使清朝最高统治者

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地位，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就必须进一步依靠汉族地方集团，给他们以更大的权利。早在1860年6月，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陷后，咸丰皇帝因湘军出力、江南江北大营收功的计划破产，接受了肃顺的主张，给曾国藩以地方实权，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均归节制。慈禧上台后，进一步加强了曾国藩等人的权利，放手使用曾国藩等人。慈禧上台当月，就任命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都归他节制。两个月后，又加曾国藩太子少保衔，授为协办大学士。不仅用兵方略听从于他，甚至朝廷任命重要大员也听从他的意见。

为了调整满族贵族同曾国藩湘军集团的关系，慈禧改变了过去对湘军集团等地方实力派既使用又限制的方针，转而予以重用。到1864年湘军攻陷天京为止，湘军集团先后有21个头目被任命出任督抚职务。如两广总督毛鸿宾，直隶总督刘长佑，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载福等，另外各地巡抚中也大都出自湘军集团。从此，曾国藩湘军集团不仅拥有军事大权，而且还掌握了地方政权和财权。这样，以曾国藩集团为主的汉族地方势力逐渐发展起来，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举足轻重的力量。

辛丑政变后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一方面，清政府与外国侵略势力勾结起来，大大加强了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力量，并最终在外力的帮助下将它们镇压下去，逐渐稳定了清朝统治秩序；另一方面，清朝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技术的官员逐渐掌握了中央和地方的部分权利，为洋务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太平天国运动成为中国农民起义的顶峰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昏庸无能，同时也加深了封建统治者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清朝统治陷入了空前社会危机。

鸦片战争期间，清朝耗费了大量的军费；战败后，又进行了数额巨大的战争赔款，这使得清政府的财政出现了严重亏空。为了偿还战争赔款，增加财政收入，清朝统治者只能通过增税、增捐等各种途径转嫁到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头上，从而使国内阶级矛盾尤其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商品大量输入中国，严重冲击了传统的手工业和商业，造成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工人破产。传统的以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在外国经济的打击下逐渐解体。清朝政府本应保护民族手工业和商业不受外来经济势力冲击，但它自身已经极其腐败，不仅没有起到保护的作用，反而加剧了这一过程。如此一来，破产的手工业者、商人和农民必然把愤恨的矛头指向不能保国为民的清政府。

1846 年～1850 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连年遭受严重的水旱灾害，珠江流域也连年发生水灾、旱灾和蝗灾。人祸天灾，使广大劳动群众陷入失业、破产饥饿，甚至死亡的境地。农民群众被迫奋起抗争，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斗争。鸦片战争后 10 年间，民变四起，汉、壮、苗、回等各族人民的起义和暴动达 100 余次。北方的白莲教、捻党，南方的天地相当活跃。在各地反抗斗争中，以广西、广东、湖南三省声势最盛，尤其是广西，“拜台结党旗帜各编堂名……几乎无地无之”。清朝吏治的腐败使得阶级矛盾十分紧张，连年的天灾更激化了这一矛盾。这说明清政府所代表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一场巨大的农民起义风暴即将到来。这场风暴，就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洪秀全（1814 年～1864 年），广东花县人，农民家庭出身。七岁入村塾读书，五六年间，即能熟诵四书、五经等。16 岁时因家贫辍学，在家务农，18 岁起受聘在本村和附近乡村任塾师。洪秀全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农民群众的痛苦和要求有着深切的感受。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洪秀全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道路，但几次考试都名落孙山。多次科考的失利，使他抛弃了科举功名的幻想，并对现实产生了不满。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阅读了基督教布道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书中宣传拜上帝，反对崇拜偶像邪神，鼓吹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教义。洪秀全深受启发，于是他自行施礼，以示“去旧从新”，并开始进行传教活动。

洪秀全劝人敬拜上帝，不敬邪神，不行恶事。他的同学、塾师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等首先皈依他的新教，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冯云山在广西紫金山区创立了一个被称为“拜上帝会”的组织。1847 年 8 月，洪秀全抵达紫金山区。为了巩固和发展拜上帝会组织，他和冯云山四处活动，发展会员，积聚力量。在洪秀全等人的领导和组织下，拜上帝会力量迅速发展起来，影响力日益扩大。随着拜上帝会的发展，它同当地封建势力的冲突日趋激化，并且开始发展为政治性的斗争。拜上帝会在发展和斗争中，形成了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核心，成员有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和石达开。

1850 年，广西遭遇大饥荒，各地农民斗争不断。洪秀全召集各地会众前往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团营”，准备起义。1851 年 1 月 11 日是洪秀全 38 岁生日，他率众在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举起了反清大旗。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挥师东进。1851 年 3 月，洪秀全在武宣东乡正式称“天王”。9 月下旬攻克永安州（今蒙山县），在此休整军队，严明军纪，制定各种制度，并颁行天历。12 月，洪秀全颁布封王诏令：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西王以下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此外，起义军还确立了从军师、丞相、检点到两司马的 12 级官制。这样，就初步建立起来太平天国的中央政权组织，史称“永安建制”。

太平军历时两年多，先后转战广西、湖南、湖北、江苏等六省，于 1853 年 3 月 20 日占领南京，之后改南京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的首都，正式建立起与清政府对峙的政权。随后，太平军在军事上主动出击，开始了大规模的北伐和西征。北伐军以直捣北京为目标，在两年时间里，太平军转战数省，直逼天津城下，威胁着清王朝中心。虽然北伐最终失败，但却有力地推动了北方的反清斗争。西征军在两年的时间里，沉重打击了曾国藩的湘

军，有效地控制了皖、赣、鄂大片地区。经过三年的英勇作战，到 1856 年夏天，太平天国控制了从武汉到镇江长江沿岸的战略要地。此后，太平天国达到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在此期间，太平天国还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法令法规，以建立和稳固天国政权。1853 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项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把每亩土地按每年产量的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级九等，然后好田坏田各一半，按人口平均分配。它希望通过这一制度，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理想社会，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美好的未来社会蓝图。但这种小农平均主义理想，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不得不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

在这一制度颁布不久，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根据天京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向洪秀全建议在安徽、江西等地“照旧交粮纳税”，结果被采纳。这就表明，太平天国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并允许地主收租。封建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虽然受到冲击，但并没有改变。

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全盛的同时，其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农民政权的弱点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定都天京后，领导人的封建特权和等级思想日益膨胀。他们在生活上贪图安逸，政治上争权夺利。天王洪秀全自认为是上帝派到凡间的最高主宰，用封建的“三纲五常”维护其绝对权威。掌握军政大权的杨秀清，居功自傲，生活腐化，飞扬跋扈。其他各王对杨秀清多有不满，1856 年 9 月，北王韦昌辉与燕王秦日刚屠杀了杨秀清及其全家、部署共 2 万多人。随后，翼王石达开又迫使洪秀全下令处死韦、秦二人。血腥屠杀过后，洪秀全处处刁难主持朝政的石达开。石达开在万般无奈之下，率领 10 万精锐部队负气出走（后在大渡河边全军覆没）。经过这场血腥的内斗，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受到了重大损失。

就在太平军内讧的同时，清军乘机加强了攻势。1856 年底，清军占领了武昌、汉阳和江西大部分地区，重建了江南、江北大营，并派兵围困了天京。在万分危局下，洪秀全启用了陈玉成、李秀成等青年将领。他们果断勇敢，奋勇杀敌，先后击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建立了苏福省，获得了新的根据地。但是这些局部胜利，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危局。1860 年，清军勾

结英、法、美侵略者，利用洋人来镇压农民起义。他们分别组成了常安军、常捷军、常胜军分别向太平军进攻。1861 年 9 月，安庆失守，天京从此失去屏障。1862 年 4 月，陈玉成兵败，在庐州被俘就义。1864 年 4 月 ~5 月，江、浙、皖根据地全部告失，7 月，湘军攻陷天京，太平革命运动宣告失败。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大规模农民战争。成百上千万的农民群众被动员起来，共同参加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战斗。他们以严明的纪律、英勇的抗争精神，沉重打击了腐朽的清朝军队。他们组织起强大武装力量，建立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与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对峙了 14 年之久。太平军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先后攻克城市 600 多个。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是以往封建社会中任何一次农民起义都比不上的。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最后悲壮地失败了。为什么这一场规模号大的革命运动没能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暴露出来的弱点有哪些？这些都是很值得人们探讨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所以失败，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没有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指导。太平天国是靠宗教来发动和组织群众起义的，但到了后期宗教的消极作用就暴露出来了。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吸收了基督教的原始平等思想，“天下男子都是兄弟，天下女子都是姐妹”,[①]还有许多纪律性的教规。在运动初期曾产生过积极的作用，但宗教毕竟只是现实世界的歪曲反映，它不可能准确、及时地反映出现实的斗争，因此，它不可能满足指导革命实践的需要。相反，革命局面迅猛向前发展，宗教教义却停滞不前，成为僵化凝滞的宗教教条，妨碍了群众的创造性和主动精神，从而导致了太平天国后期政治方向上的模糊混乱和摇摆不定。

第二，太平天国没有一套系统、有效的纲领、制度和社会改革方案。太平天国虽然拟定了不少政治、经济方案，如《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等，但这些方案或是从农民落后眼光出发所描绘的平均主义图案，或者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的幻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无法实行的。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些方案都落空了。由此可见，缺乏科学有效的纲领制度和社会改革方案，就不可能把革命斗争引向胜利。

第三，太平天国领导者思想蜕化，相互争权夺利，最后导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分裂。太平天国建都后，诸王都追求封建特权和享乐生活。在天京大

兴土木，建造各种规格的如“天王府”、“东王府”等豪华宅邸，排场阵势超过封建帝王。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之间不能长期保持团结，最后由争权夺利发展到自相残杀，“天京事变”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这一事件严重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瓦解了领导集体，大批中坚领导和老将士被杀，元气大伤，成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第四，太平天国领导者不能总结战争经验，创造出适合斗争需要的战略原则，以保持革命战争的主动和有利地位。在革命进攻阶段，太平天国将领们过分急躁地企图取胜，把兵力分散到多个战场，结果不能集中精力给敌人以有效打击。在相持阶段，他们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死守安庆，盲目决战，结果不但安庆失守，而且消耗了革命的精锐力量。防御阶段，他们又固执地守着天京，不肯及早突围，因此招致了大批军队被围歼的命运。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一场由农民阶级领导的革命。农民阶级虽然人数众多，但仅仅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的，因为农民阶级自身有着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农民阶级代表的是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散漫性、狭隘性、保守性以及私有观念、政治浅见等缺陷。他们需要更集中、更有知识、更先进的阶级来引导他们斗争，这个阶级就是工人阶级。没有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引导，他们是不可能克服这些缺点的。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他们却得不到这种领导。因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近代，当时中国还刚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工人阶级还没有产生。太平天国运动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归根到底，仍然是农民群众自身的阶级局限性造成的。

太平天国的失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它说明在近代中国，农民在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中是十分英勇、坚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争取独立和民主的主要力量，但是农民群众存在着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假使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单单依靠农民的力量，就不可能消灭封建剥削和打退外国侵略，不可能把革命引向胜利。它还说明在近代中国，要完成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建设这两大历史任务，需要先进的工人阶级的领导。

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中农民战争发展的最高峰，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它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加速了封建统治的灭亡。它不仅打击了中国的封建势力，同时还

抗击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打破了西方侵略者迅速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的企图，拉开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不仅如此，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还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它唤醒了世界各国人民，为各国反压迫、反侵略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为新的斗争开辟了道路。

注释：

①《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页。

“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

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封建知识分子开始觉醒，认为清王朝再也不能按照旧的方式统治下去了，必须实行变革，为此他们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展近代工业，形成了所谓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一方面指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要求改革；一方面主张“师夷长技”，学习西方。但是，当时改革者的势力过于弱小，不足以影响全局，因而他们的建议往往束之高阁，并未见诸行动。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巨大冲击，清朝统治集团面临着“千古奇变”的危局，要继续维持其统治，必须探求新的出路。清朝政府中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掌权者，在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和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涉的过程中，对洋枪洋炮的作用有了切身体会，真实感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认为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计”，才能有效地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应付列强侵略的新局面，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日益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迫使清朝统治阶级内部逐渐发生了分化。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洋务派和顽固派两个立场对立的政治派别。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洋务派官员们看到了外国的“船坚炮利”，而中国在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要想在对抗外国侵略战争中取胜，唯一的途径就是要效仿西方，学习外国的现代化技术。他们继承了鸦片战争时期“师夷长技”思想，并极力把这一思想付诸实践。为此，他们开始向外国购买大量枪炮船舰，陆续兴办各式军事工业，创办新式海陆军。此后，又兴办了采矿、铁路、电报等民用企业，还创办新式学堂，翻译西学书籍，派遣留学生等。由于这些活动主要取法于外洋，所以历史上称之为洋务运动。而倡导和支持这些活动的官僚，则被称为洋务派。在洋务派官员中，清朝中央有恭亲王奕䜣和军机大臣文祥、桂良等人，地方督抚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洋务派的人数迅速增多，形成了一个势力强大的政治派别。



在清朝统治集团中，除洋务派之外，还有一部分官僚，他们或以理学权威自命，或以孔孟之徒自居，或以“帝师”为尊，恪守“祖宗成法”、“圣人古训”，拒绝和排斥新思想、新事物。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尽善尽美，不需要任何变革。对于洋务派提倡的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引进近代的科学技术、采用机器生产、训练新式军队等措施，深恶痛绝，认为这是违背祖制，“用夷变夏”。这部分人被称为封建顽固派，其成员多是一些在中央和地方没有掌握军政实权的文人学士，主要代表人物有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等。

从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争论日趋激化。洋务派官员们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积极引入西方先进技术，以使中国达到富强的目的，但顽固派墨守成规，反对向西方学习。1862年，奕䜣奏设京师同文馆，附属于总理衙门，主要培养翻译和外语人才，开设英、法、俄三个外语班。1866年末，奕䜣等人认为西方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无一不从天文和算术中来，为适应洋务事业的发展，他奏请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翰林、进士、举人等科甲正途出身者，规定只要有同乡京官具保，即可投考入学。但奕䜣的建议却遭到了以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的激烈反对。他们声称“奉夷为师”之风一开，就会“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奕䜣据理力争，对倭仁等人的论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经过激烈的争论，倭仁最后被迫撤销原议，但由于顽固派在北京“聚堂私议，约法阻拦”，结果报考天文馆者寥寥无几。

在此之后，洋务派每推行一项重大的洋务活动，都会遭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19世纪80年代，双方围绕铁路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论争，致使中国铁路建设步履维艰。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并不涉及是否要维护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的问题。实际上，无论是洋务派还是顽固派，他们都是要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的，而其主要分歧在于是否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举办近代工业，以求自强。显然，洋务派主张在中国武器装备都落后于人的国情下，只有学习别国的先进科技，才能富国强兵，克敌制胜。而顽固派则认为，学习西方就是“用夷变夏”，违背“祖宗成法”和“立国之道”，因而坚决抵制。和顽固派相比，洋务派的主张顺应了世界潮流，符合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时代要求，具有先进性。

自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至90年代中后期的洋务运动，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洋务派对西方国家认识的逐步加深，洋务运动前

后期的内容也有所不同。19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初，洋务派在“求强”的口号下，以兴办军事工业为主；70 年代以后，洋务派在继续“求强”的同时，又提出了“求富”口号，开始兴办近代民用工业。除此之外，洋务派还筹建新式海陆军、设立学堂、派遣留学生和发展新式教育等。于是，一场“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从 60 年代初到 70 年代，洋务运动的重心是引进军事装备和军工生产，投入巨额经费创办军事工业。1861 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了内军械所。第二年，李鸿章又在上海设立了三所洋炮局。但是这些军事工业均属草创，不仅规模很小，而且技术设备也十分简陋。真正的近代军事工业是从 1865 年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开始的。自 1865 年到 1890 年，洋务派在全国各地共创办了 21 个军工局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除了这些比较著名的大型军事企业外，洋务派官员们还设立了其他一些制造军火的企业，以满足各地清军需要。如左宗棠率军进入陕甘时，设西安制造局，后又随军迁往兰州，改称兰州制造局；山东巡抚丁宝桢曾在济南创办山东机器局，升任四川总督后，又在成都创办四川机器局；还有云南、湖南、广东、吉林、浙江、台湾等地也都分别筹办过称为机器局的兵工厂，但规模都较小，成效不大。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属于清政府的官办企业。因此，他们生来就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对外国的资金、技术有较强的依赖性。这些官办局厂不是独立经营的企业，而是地方政府的一个组成机构。不但要受总督、巡抚的控制和监督，还受总理衙门的节制。其创办经费主要由清政府拨给，企业本身没有从利润转化而来的内部资金积累。它们生产的产品不参加市场交换，而是由清政府直接调拨给军队使用。企业的盛衰，不是取决于市场需求或企业本身的经营管理，而取决于政府拨款的多少。因此，这种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模式，导致了企业经营管理混乱，腐败现象丛生，生产效率低下。同时，这些企业从设计施工、机器安装、生产技术等各个方面，都严重依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发展本民族的近代工业，引入外国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是必要的。可是，洋务派企业管理者缺少独立自主的思想，所办的军事工业长期被外国控制，实质上成了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的附庸。

然而，这些军工企业毕竟不同于封建时代官府手工业，他们已经能够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生产方式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这对于中国传统的手工



业生产来说，无疑是一场重大突破。此外，这些军事工业还普遍实行了雇佣劳动制度。各局厂的工人大都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其工资大体上按照各自的技术熟练程度来决定。这表明，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尽管具有很浓厚的封建性，但实际上已经具有若干资本主义性质。

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在沉睡的中国开了近代工业的先河，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

洋务派在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而最主要的就是财政困难。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赔款，再加上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巨额军费开支，使得清政府的财政十分紧张，无力为新式军事工业筹措更多经费。同时，举办军事工业迫切需要获得原料、燃料供应以及交通运输、电信等事业的配合。不解决好这些问题，新的防务体系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洋务派官员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富强除了因为他们拥有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之外，还在于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出于这种认识，从70年代开始，洋务派提出了“寓强于富”的口号，把“求强”和“求富”结合起来，着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

自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共创办了20多个民用企业，涉及到轮船运输、纺织、原料、燃料、铁路、电报等行业。这些企业中，少数几个为官办，个别的（如湖北织布局）一度为官商合办，其余都采取了官督商办的方式。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是当时最重要的几个官督商办民用企业。所谓官督商办，是清政府用私人资金举办新式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它由官方出面举办企业，并先垫付一部分官款，主要是通过招商股筹集资金。这种企业的经营原则是“官为监督，商为承办”。企业的实权掌握在官府委派的总办、会办手里，商股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力。

洋务派是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办者和保护者。在他们的倡导和支持下，这类企业不仅得到清政府了的批准，还吸引了大量来自官僚、地主和商人的资金。他们给官督商办企业提供垫款和贷款，给予各种特殊权力。对官督商办企业予以庇护，防止封建顽固势力的干扰和破坏。当然，“官为扶持”并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些企业要接受官方委派的人员担任企业的督办、总办、会办等重要职务，它们必须向清政府提供各种形式的报效，必须为清政府的特殊需要服务。这样，企业的负担增加了，企业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在外国经济势力和封建官僚势力的双重制约下，官督商办企业很难按照市场经济法则，获得自由发展和竞争的能力。因此，洋务派举办的民用企业，经营了

20 多年，声势不小但收效不大。尽管这类企业经营不善，不足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但通过创办民用企业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利用了部分私人资本主义生产产品，这对近代中国商办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洋务派在举办民用企业的同时，还开始筹建海军和海防。1875 年，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建议设立北洋、东洋和南洋三支海军各军设提督一人。总理衙门同意了丁日昌的奏请，计划在 10 年内建成 3 支海军。经过洋务派的筹划，至 1894 年，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共有船舰六七十艘，已具有相当规模。但由于船舰质量差、吨位小，航速慢，又各成派系，互不统属，其战斗力并不强大。1885 年 10 月，清政府正式成立海军衙门，统领海军和海防事宜，醇亲王奕　为总理大臣，但实权掌握在会办李鸿章手中。他乘机扩大北洋海军规模，花巨资购置外国舰船。1888 年，经过几次增购铁甲舰船，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共有大小舰只 20 多艘，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舰队。

设立外文学馆，派遣留学生，培养新型专业人才，是洋务运动的又一项重要内容。1861 年初，奕䜣等人提出要培养外语和谙熟洋务方面的人才，清政府于次年设立了京师同文馆，后又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72 年，中国首批留学生赴美留学，至 1875 年留学生总数达到 120 人。与此同时，清政府还批准从福州船政学堂选拔学生赴英法学习海军，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对发展中国海军事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留学生的派遣揭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加速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这些留学生学成后，将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引入中国，对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统治阶级为了谋求封建国家的“富强”而进行改革运动，目的是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严重危机，挽救风雨飘摇的封建统治。作为地主阶级发动的一场以“求强”、“求富”为目标的自救运动，它更多地体现了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应对时局变迁的一种抉择。

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洋务运动历时 30 余年。洋务派在这 30 年间，相继开办了几十个工矿企业，兴办了一批交通运输企业，建立了近代化的陆海军，开设了新式学堂，培养了一大批新式人才，在中国走向近代的道路上迈上了新的台阶。洋务运动开展的这段时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其历史功绩不容置疑。但是洋务运动并没

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导致这场运动失败的原因很多，但究其根源则是因为腐朽的封建制度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而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企图在不触动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他们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移植在清政府腐败政治的肌体上。尽管洋务派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和实践，但因为他们未能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从而使先进的生产力无法找到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最终导致了苦心经营的洋务运动走向失败。

同时，洋务运动的失败与外国侵略者的阻挠和控制也不无关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绝不愿意也不可能允许中国通过兴办洋务富强起来。因此，他们表面上支持洋务运动的同时，又不断采取各种手段进行侵略和控制。而洋务派的首领们，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又多是采取妥协退让的办法。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要想富强，没有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不能保障民族经济的发展，“求强”、“求富”的愿望就永远不可能实现。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由洋务派发动的一次变革实验，历史不会忘记这场变革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但也记下了它的失败。这说明，洋务运动不能救中国，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

第一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出现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伴随着外国侵略势力从中国的沿海地区不断深入到广大内地，各种外国工业品不断涌入中国市场，促使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在外国商品的猛烈冲击下，中国几千年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大批农民和城镇手工业者破产、失业，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这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同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在中国大量掠购农副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的加深，进一步加强了农民和城市的联系，从而对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19 世纪 70 年代前后，城乡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推动了商品市场及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商办企业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与此同时，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通过种种剥削手段，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财富，也开始投资于新式商办企业，从而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这样，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已基本具备，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应运而生。

从 1869 年到 1894 年，这 20 余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的时期，这一期间创办的具有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办企业共有 50 多家，总资本达 500 余万元。民族资本企业涉及到的产业包括船舶修配业、缫丝工业、面粉业、印刷业、火柴业、纺织业、采矿业等。尽管数量很少，实力甚微，但它却是一种新生的社会经济力量，标志着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端。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船舶修配业。1869 年，上海的一家铁匠作坊主方举赞开始采用车床，成立了发昌机器厂。它的主要生产业务是为外商船厂打制修配船用零件，由于沿海和长江航运的兴起，它的业务发展也比较迅速，到 1877 年，已能生产轮船机器和车床、汽锤等机器产品。80 年代后，它还兼营进口五金，成为我国最早的近代民族产业。

缫丝工业。1872 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年在广东南海县创办继昌隆机器



丝厂，这是中国最早使用机器的缫丝企业。该厂以蒸汽机为动力，雇佣工人六七百人，产丝精美，售价比手工丝高 1/3，获利十分丰厚。在他的影响下，南海、顺德、广州等地的机器缫丝业发展迅速，先后开办了 10 余家缫丝厂。广州因此成为近代民族资本机器缫丝业的中心。继广东之后，1881 年，商人黄佐卿在上海成立了公和永机器缫丝厂。该厂注册资本 10 万两白银，有丝车 100 部，后激增至 900 部。此后上海缫丝业逐渐兴起，到 1894 年时已有坤记、裕慎、延昌、正和、纶华 5 家丝厂，其中最大的坤记丝厂资本达 24 万两。

面粉业。1878 年，轮船招商局会办朱其昂，在天津创办贻来牟机器磨坊。雇佣工人仅十余人，用机器生产面粉，加工出来的面粉色泽纯白，“与牛磨者迥不相同”，每年能获利六七千两白银。这就打破了传统手工业磨面的旧式生产方式。随后，上海裕泰火轮面局与福州机器面粉厂相继开业。1891 年，武举人李福明在北京建立了北京机器磨坊，但四年后被迫停业。

印刷业。1882 年，广州商人合股设立宏远堂机器公司，资本 10 万两，用机器造纸。同年，徐润和徐鸿复在上海创办了同文书局。该书局购置石印机 20 架，雇佣职工 500 名，专事翻印古代善本书，先后印出《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等重要书籍。1893 年，不幸失火，损失较重，由于事前先投了火灾保险，得到了应有赔偿。后来因为积压资金过多，于 1898 年停办。1887 年，李盛铎在上海创设蜚英馆石印局，专印供科场士子携带方便的图书，并在北京、重庆、广州等地设分店，生意兴隆。除此之外，武昌、苏州、宁波、杭州等地，也相继创办了石印书局。

火柴业。1886 年，官绅杨宗濂、买办吴懋鼎、淮军将领周盛波等在天津合资设立“自来火”（火柴厂），资本 1.8 万两白银，1891 年投产。该公司后来公开招股，资金增至 4.5 万两白银，由买办吴懋鼎任总办，聘请俄、美商人购买机器及帮同管理账目，但洋商并不入股。生意十分兴隆，其生产的火柴多行销河南等地。

轧花、纺织业。1887 年，买办商人严信厚在宁波设立通久源轧花厂，资本 5 万两，购置日本生产的蒸汽发动机和锅炉，另有 40 台新式轧花机，雇佣工人三四百人。1891 年，该厂出售轧成棉 3 万担。后向英、日添购设备，到 1893 年已年产皮棉 6 万多担。1896 年，他的纺纱车间投产，厂名也随之改为通久源纱厂。1894 年，朱鸿度在上海创设裕源纱厂，有纱锭 2.5 万枚，一切机器设备均从英国购得。

为了适应航运业的需要，这一时期，民族资本在上海、广州、汉口等地也经营了几家船舶修造厂。其中上海均昌船厂的规模最大，能制造小型汽船。其余各船厂由于规模较小，只能从事简单的船舶装配和修理。

80年代前后，还出现了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采矿业，如湖北的荆门煤矿、山东峰县煤矿、安徽贵池煤矿、广西富川贺县煤矿、江苏徐州利国驿煤矿等，但大都仍是土法开采，只是在个别工序中使用机器。

自6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中国出现的这些商办企业是近代中国最早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这些企业是在外国经济入侵的情况下，在引进外国机器和技术的基础上创办起来的。它们大多是投资少、规模小的企业，技术落后，设备简陋，产品也主要是日用轻工业商品，无法与外资企业和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相比。而且这批企业多集中在轻工业和小型采矿业，机器制造类的企业为数极少。大部分企业设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布局范围偏窄。但不管怎么说，它毕竟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其成长和发展是十分不易的。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产生的，不仅承受着先天不足带来的种种限制，如资金缺乏、技术落后等，同时又缺乏成长所必需的政治经济环境。它们身处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经济的汪洋大海，面临着外资的打压和排挤，在本国封建主义与外国经济势力之间求生存，遭受双重压迫和摧残，发展极其进程缓慢。当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通过不平等条约和自身的政治经济优势，企图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对刚刚兴起的民族资本进行排挤，甚至降价倾销，使民族资本企业在产品销售和原料收购都处于不利的地位。在外国资本的打压下，它们很难得到正常发展。

不仅如此，商办企业还受到国内封建势力的压制。在甲午战争之前，商办企业始终没有取得清政府的正式承认，时刻面临着关闭歇业、被迫远迁的命运。许多封建官吏还对商办企业横征暴敛、敲诈勒索，大大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在如此复杂多变的环境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成长举步维艰。许多企业为了生存，免遭破产的危险，不得不向外国资本主义妥协，不得不向本国封建势力寻求保护。这就决定了民族资本工业作为一种新生力量有其历史进步性，但从另外角度来说，它又依附于封建势力和外资势力，有其先天的软弱性。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使得中国社会阶级构成和阶级关系发生了

新的变化。虽然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十分困难，但它还是催生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是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两个新的阶级力量，它一经产生，就必然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新变化。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个来源，一部分是由那些投资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及商办企业的官僚、地主、买办和商人转化而来；另一部分则是由那些采用机器生产的手工工场转变而来。这两部分人，形成了中国早期的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层，即上层和中下层。一般来说，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代表人物，大都拥有规模较大的企业，经济力量比较雄厚，他们与外国资本和国内封建势力的联系比较密切。在这些上层人物中，很多都在清政府的一些机构中任有官职，或者是在农村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可以说，他们既是官员，又是商人，或者两者兼有。如，1887 年创办宁波通久源纱厂等企业的严信厚、在上海创办华新纺织新局的唐松岩、在天津创办自来火公司的杨宗濂等等，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性人物。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所办的企业一般规模较小，资金较少，经营状况不如资产阶级上层所办的企业，与外国资本和封建势力联系较少，矛盾较大，经常遭受破产的威胁，因此它的革命性较强。早期民族资产阶级虽有上层和下层之分，但就整体而言，它仍然是一种新的经济力量，必然要成为新的政治力量。

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时的特点相适应，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带有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它要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有反对外来侵略和封建压迫的要求，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它又同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缺乏彻底反侵略反封建压迫的坚决性，带有先天的软弱性、动摇性和妥协性。

中国的无产阶级不是与资产阶级同时产生的，而是比民族资产阶级出现的稍早些。这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这是中国无产阶级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一个显著特点。

中国近代无产阶级的产生，可大体分为下面几个时期。19 世纪 40 年代 ~50 年代，由于外国资本的渗透，在沿海通商口岸出现了一批码头工人和在外国轮船上做工的中国海员，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产业工人。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相继在中国开设工厂，中国产业工人队伍也随之扩大。60 年代

以后，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民族资本家也投资建厂，中国又产生了一批近代产业工人。19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工人人数有较大增长。据统计，70 年代产业工人仅 1 万人左右，而到了 80 年代迅速增加到 4.5 万人。到 1894 年甲午战争时，除了码头工人缺乏统计数字外，产业工人共有 10 万人左右，其中在外资工厂做工的中国工人约占 35%，在洋务派经营的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中的工人约占 37%，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企业中的工人约占 28%。这些工人组成了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队伍。

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不多，但它们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除了具有世界无产阶级的一般特点外，它还具有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自己的特点。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深受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其残酷性为世界其他国家所少见。中国的工人工资极低，一个熟练工人一天的工资只有 2 角 6 分，只有外国同类工人工资的 1/4 ~ 1/5。不仅劳动工资低得可怜，而且他们工作的时间特别长，劳动条件相当恶劣。一般工厂工作时间在 12 个小时左右，多的达到 14 个小时。由于缺乏安全、卫生设备等起码的工作设施，工伤事故频繁发生，工人的人身安全没有任何保证。残酷的压迫使得中国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有彻底的革命精神。

第二，中国工人阶级分布较集中。中国的产业工人大部分集中在上海、汉口、广州、天津等通商口岸，仅上海市就集中了近半数的工人。从在企业的集中程度看，大多数集中在500 人以上的大工厂。1894 年，约5 万到6 万左右的工人集中在 42 家大型企业中。中国工人阶级的高度集中，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团结，有助于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力量的增长。

第三，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大都出身于农民，与农民有着这天然的联系，便于他们和农民结成紧密的联盟。

中国无产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其所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他们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进行着反抗斗争。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一些外资工厂中的产业工人，就曾和手工业工人一起掀起了数次罢工。例如，1879 年，上海耶松船厂工人为反对工头克扣工资举行的罢工。还有，1882 年开平煤矿工人为争取平等工资举行的罢工等等。这些都充分表明了中国无产阶级是一支能战斗的队伍。

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它代表着中国新的生产力，代表

着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它们遭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三重残酷的压迫，革命性最强。尽管它们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还没有登上中国政治的舞台，但它却是中国最有希望、最有前途的革命势力。新的阶级即将展现新的力量，开辟新的道路。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7页。

中法战争见证了清政府的软弱衰败

越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山水相连的亲密邻邦，两国人民休戚与共。法国对越南和中国的侵略蓄谋已久，先侵占越南，并以越南为跳板，进而侵略中国，这是近代历史上法国资产阶级政府的一贯政策。19世纪50年代，法国出兵占领了越南。1862年6月，强迫越南阮氏王朝签订了赔款割地的《西贡条约》，把南圻变为殖民地。1873年，法军进而侵犯河内地区。越南政府邀请刘永福率领活跃在中越边境的黑旗军援越抗法。黑旗军在红河两岸屡创法军，击毙其统兵官安邺。越南政府封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据守红河两岸地区。

1880年，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茹费理出任法国内阁总理，开始变本加厉地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增兵越南。1882年4月，法军攻陷河内，企图打通红河，直窥云南。越南政府再次请求刘永福的黑旗军入境抗法。刘永福的黑旗军与法军针锋相对，将其围困在河内周围一年多，并在城西纸桥一战中击毙其继任统兵官李维业，打乱了法国的北侵计划。刘永福因战功被越南国王晋升为三宣提督。清政府为了阻止法军继续侵略越南曾先后请求英美德等国出面调解，但都遭到拒绝。法国抓住这一有利的国际形势，蓄意扩大侵越战争，加快了侵略步伐。

1883年，茹费理再度出任法国总理，进一步扩大侵越战争。8月，法军攻陷越南首都顺化，逼签《顺化条约》。该条约否定了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法国成为了越南的保护国。随后，法国殖民者便把侵略矛头指向了中国，不仅要求清政府承认其对越南的占领，还要求清政府撤出在越南北部的军队，召回刘永福，开放云南边界。与此同时，法军封锁了东京湾，继续向北圻增兵。中法之间的战争已成不可避免之势。

面对法国的武力进逼，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主站和主和的两种意见。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强调中越两国"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越南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密切相关。法国夺取越南北部，必将威胁



到中国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的安全。他们认为中国如能水路配合，扬长避短，持久作战，法国就会知难而退，因而力促清政府援越抗法。但掌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奕䜣等人，惧怕与法国开战，一意求和，认为中国“兵单饷匮”，即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应力保和局，“断不可轻易言战”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最高当局，在和与战之间举棋不定。他们既害怕法国得寸进尺，难以满足其侵略要求，又不敢公然抵抗，得罪法国。因此，清政府在军事和外交上，采取了自相矛盾的做法。一方面，在越南强烈要求中国出兵援救的情况下，最终还是调兵出关援越，作出迎战的姿态；另一方面，又命令清军不可主动出击，同时授权李鸿章与法国代表在天津进行谈判，向法国妥协。

清政府的妥协退让，助长了法国的侵略野心。1883 年 12 月，法军 6 000 人在远征军司令孤拔的率领下，悍然向驻扎在越南北部的清军发动进攻，中法战争正式开始。法军发动进攻后，清军统帅、云南巡抚唐炯弃军先逃，奔回云南。黑旗军坚守抗敌，在血战数日后，因寡不敌众被迫撤退，山西失守。1884 年 6 月，法军改派米乐为侵略军司令，再次发起攻势，接连拿下战略重镇北宁、太原、兴化，逼近中越边界。清政府闻讯后，极为恐慌。即刻将作战失利的前线将领唐炯和徐延旭革职问罪。慈禧太后为掩盖清军在越南战场的败迹，对军机处进行大改组，罢黜了奕䜣的首席军机大臣之职，任命醇亲王奕　主持军机要政，任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侍郎孙毓汶等五人为军机大臣，组成新的军机处。慈溪太后罢黜奕䜣后，立即谕令军机处遇到紧急事件，会同奕　商办。从此以后，军机处的权利实际上掌握在奕　和他的心腹孙毓汶手中。同时，将一些主战的清流派张佩纶等官员派往前线，摆出了一副全力抗法的架势。

在中法战争紧张的时刻，清政府做了如此大的人事变动，貌似要与法军大战一场，但实际上清政府并没有抵坚决抗的决心。新的军机处没有积极组织戒备，仍旧执行妥协退让的政策。奕　掌权后力排众议，授权李鸿章设法向法国寻求妥协。李鸿章先是请求英国出面调停，调停未果后又转向德国求助。在德国人德璀琳的撮合下，李鸿章与法国海军军官福禄诺进行谈判，并于 1884 年 5 月 11 日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主要内容有：清政府同意对于法国与越南“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不加过问；中国军队自北越撤回边界；中越边境开埠通商。条约的签订，表明了清政府对法国侵略的

妥协屈服。

条约签订后，法军急于接收领地，不等清军撤退的最后期限，竟公然向中国驻军挑衅，要求中国军队交出阵地，遭到拒绝后，双方再次开战。清军被迫还击，在北黎将法军打退。法国以中国破坏《中法简明条约》为由，继续向中国进行外交讹诈。清政府为保和局，派两江总督曾国荃在上海与法国代表巴德诺进一步商谈。谈判时断时续，不时陷入僵局。奕　完全寄希望于和谈，不顾法军猖狂挑衅的严重局势，严令沿海各省“静以待之”，“不可先发开衅”。

慈溪、奕　等掌权者的这种态度，使前敌将领们对外交和谈产生了幻想，直接影响了沿江沿海的战守准备。1884 年 7 月 15 日，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一支拥有 8 艘军舰的舰队驶抵闽江口，向何如璋、张佩纶提出要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停泊。何、张害怕拒绝生衅，影响和谈，竟同意了这一无理要求，希望借此缓和局势。但法舰进入马尾港后，却日夜监视福建水师，恃强相逼。广大官兵多次要求起锚整训，以求自卫，但何、张唯恐影响和谈，下令不准自行起锚。

清朝统治者的软弱无力，使法国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1884 年，法海军少将利士比率领三舰进犯基隆，妄图以此逼迫清政府接受赔款，占领基隆煤矿和台湾北部。他们向基隆炮台投递劝降书，被清军断然拒绝。次日清晨，法军发起进攻。督办台湾军务大臣刘铭传带领将士奋力抵抗，经过激战，法军被逐回。

法军入侵范围的日益扩大，引起了清朝内部主和派和主战派的再次争论。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大臣中，严敬铭、张荫桓等人主张和议，左宗棠等人则极力主战，他们指出，中国不能永远都服从于洋人，与其战败赔款，不如拿这些赔款作为战争费用。慈禧和奕　在争论中，不知所措，和战不定，最终选择了避战求和的外交方针。由于清政府的避战求和，使东南沿海一带的战备没有因为基隆战役而受到足够的重视。

法国军队并没有因基隆受挫而放弃侵略计划，反而以此为借口扩大了侵华战争。8 月 16 日，法国议会通过了 3 800 万法郎的侵华军费，叫嚣要进行“本世纪最大的一次征伐”。法军总结了基隆失利的教训，把进攻的目标转向防备空虚的福建马尾军港。22 日，孤拔接到了法国政府进攻的命令。第二天，孤拔向何如璋和张佩纶投递了最后通牒，限福建水师于当天下午撤出马尾。何、张因昨日得到李鸿章电报知议和已有进展，因此将既不将法军挑

战的实情告诉官兵，又不准备应战，仍继续听任各舰载江心抛锚。当看到法舰升火待发后，惊慌万分，派人去法舰要求改变开战日期。孤拔断然拒绝了清军的请求，命令法舰提前发炮。福建水师还未来得及起锚就仓促应战，结果不是被击沉，就是被大火焚烧。何如璋和张佩纶弃师不顾，仓皇逃跑。在这种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尽管有部分官兵临危不惧，奋起抵抗，也没能挽救全军覆灭的命运。福建水师的军舰、运兵船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全部被击沉、击毁，官兵伤亡达700余人。

马尾海战的失败打破了清政府企图以外交谈判换取和平的幻想。迫于国内舆论压力，8月26日，清政府向法国宣战，命令滇、桂各军迅速向越南进兵，沿海各地加强战备。同时，任命张之洞为两广总督，把坚持议和的张荫恒等6位总理衙门大臣革职查办。

9月中旬，孤拔率主力舰队再次进犯台湾，先后攻占了基隆和淡水两地。台湾军民在刘铭传的带领下，誓死抵抗，奋勇杀敌。台湾军民的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军民同心，最终击退了来犯的法军。1885年1月，法军又进攻浙江镇海，遭到了清军的英勇还击，司令孤拔也身受重伤，不久后病死于澎湖。

在西南边疆，法国不断向中越边界增兵。前线清军统帅广西巡抚藩鼎新，忠实执行李鸿章“败固不佳，胜亦从此多事”的指示，不敢再战，采取了战胜不追、战败则退的消极方针。清军士气低落，很快失去谅山和镇南关等关隘，致使两广动摇，战局危急。

镇南关失守后，潘鼎新被革职。在张之洞的推荐下，70岁的老将冯子材就任前敌主帅，奔赴广西前沿阵地，担起了抗法的重任。他大力整顿溃军，团结各军将士，准备收复镇南关。法军看到中国军民的高昂斗志，便炸毁了镇南关，退驻关外30里外的文渊州，等待时机。冯子材随即移师关内10里处的关前隘，抢筑了一条横跨东西两岭的长墙，并在两旁的峻岭上赶修炮台。严密布防后，冯子材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出击文渊城，打乱了法军的侵略部署，提高了将士的战斗情绪。

3月23日，盘踞谅山的法军分三路直奔隘口，其中两路进攻东岭炮台，另外一路猛扑长墙。法军很快占领了东岭的3座炮台。冯子材率部下死力阻敌，号令全军：有进无退，誓与长墙共存亡。各军合力夹击，与法军激战到24日，炮火愈来愈猛，“药烟弥漫，至不辨旗帜，弹积阵前逾寸，墙后且被毁”此时，法军已经攻到长墙下，在这万分危急时刻，冯子材身先士卒，

手执长矛跃出强外，奋力杀进敌阵。全军将士受其感奋，一齐涌出，争先效死，将法军逼离长墙，压下山谷。经过“七上七下”的生死搏杀，夺回了3座炮台。当地各组百姓和1 000多名越南义军也赶来相助，把法军重重包围。25日，冯子材下令总攻，各路将士勇猛冲杀，毙敌1 000余人。法军全线崩溃，向谅山方向逃窜。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镇南关大捷。

26日，冯子材挥师南下，乘胜追击法军，接连收复了文渊、谅山、谷松、威坡、长庆、船头等地，接着又攻取郎甲、北宁，沉重打击了侵越法军。同时，刘永福的黑旗军也在越南军民的配合下，在临洮大败法军，接连光复多座失地。镇南关大捷是中法战争中一次极为重要的战役，它沉重打击了入侵的法国军队，使战场形势向着有利于清军的方向发展。法军在镇南关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后，引起了法国统治阶层的极大恐慌。3月30日，对茹费理不满的法国人民成千上百地涌上街头，抗议游行，包围议会，高呼打倒茹费理的口号。在一片指责声中，茹费理内阁当天晚上倒台。

中国军队最终战胜了法国侵略军。但战场上的胜利，并没有促使清政府有足够的勇气将抗法战争进行到底。软弱的清政府则见好就收，竟转而向战败的法国求和，将前线的胜利作为和谈的筹码。1885年4月，清政府下令前线各路军队停战撤兵，冯子材被迫挥泪班师，刘永福的黑旗军也被召入关。在前线作战的战士们闻讯，“拔剑斫地，恨恨连声”不肯退兵。全国人民义愤填膺，不少地方通电谴责和议。清政府严令如期停战撤兵，在越南的清军被迫奉令撤回。

清政府之所以乘胜求和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决定的。首先，清政府尽管被迫对法宣战，并取得了一定胜利，但他们始终不愿跟法军作战，随时准备结束战争。他们担心战争长期下去会激起“兵变”或“民变”，危及到清朝统治。所以即使在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还是派人继续与法国接触，寻求和谈的可能，而且这种努力一直伴随着整个战争。其次，各国列强害怕战争扩大会影响自己在华的利益，更不愿意看到中国获胜，“欧洲诸雄，俱愿弱中国而不愿强中国也”。他们为了自身利益，这时也都争相“调停”，先后压迫中国向法国妥协。第三，受李鸿章主和思想的影响。李鸿章在整个中法战争中间，“求和”思想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这种思想直接成为清政府的对法政策。他曾多次向慈禧太后建议让战争适可而止，在慈禧的授意下或明或暗地一直与法国方面接触，寻求和谈机会。镇南关大捷后，李鸿章认为这是求和的最佳时机，可以“乘胜即收”，体面议和。这一建议被清朝最高层

采纳，因此错失了歼敌的良机。

1885年5月13日，清政府不顾中国军民的反对，授权李鸿章与法国代表巴德诺在天津进行和谈。6月9日，双方签订了《中法新约》，又称《中法越南条款》、《会议越南条约》。其主要内容有：一、中国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二、在中越边境指定两处通商，法商可在此居住，也可设立领事馆；三、法货进出云南、广西边境时，应减轻税率；四、以后中国建造铁路时，应由法国人商办；五、法国撤走在基隆和澎湖的军队。从此，法国侵略势力不但夺取了越南，打开了中国西南的门户，大大加深了我国西南边疆的危机。

中法战争是一场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进行民族自卫的正义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中、越两国领土上，以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为先导，接着是中国军民援越抗法和抵抗法国对中国本土的侵略。由于中国军民的英勇斗争，抵抗了法国军队的入侵，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但因为清朝封建统治者政治上的腐朽，缺乏坚定的抗战信心，一味妥协退让，最后与法国签订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造成了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政府对外妥协投降的本性及腐败的本质。它说明：在腐朽、反动的清朝统治下，任何新式的洋枪洋炮和厂矿企业都不足以抵御外辱，也不能使中国由弱变强。因此，中法战争初步宣告了历时二十多年的“自强新政”的失败。先进的中国人预感到了亡国的危机，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

甲午战争失败　民族危机日重

19 世纪 90 年代，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向垄断阶段的过渡。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各帝国主义国家逐渐把侵略的目光转到了还没有被完全分割的少数地区。这样，中国和它的邻邦朝鲜，成为它们在远东地区争夺的焦点。

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可以说蓄谋已久。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就确立了旨在征服中国和世界的“大陆政策”，宣称要用武力“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从 70 年代开始，日本开始进犯资源丰富的朝鲜，企图以朝鲜为跳板，向中国本土扩张。1876 年，在美国支持下，日本以武力胁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获得了通商租地、领事裁判权和在朝鲜沿海自由航行等侵略特权，加速了朝鲜的半殖民化。从此，日本全面向朝鲜渗透，并与清政府激烈争夺对朝鲜的宗主权。

日本的不断扩张激化了朝鲜官民的反日情绪，加剧了朝鲜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斗争。1882 年 7 月 23 日，朝鲜发生了军事政变——“壬午兵变”。一些军民袭击了日本公使馆，杀死了日本军事教官。日本政府以此为借口，大举进兵朝鲜。清政府担心日本乘机控制朝鲜政府，派兵进入朝鲜，迅速平定了内乱。日本见无机可乘，转而借机敲诈，胁迫朝鲜政府签订了《仁川条约》，获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为日后入侵中国奠定了基础。

中法战争爆发后，日本策划朝鲜亲日派官员发动“甲申政变”。朝鲜国王在清军的帮助下，镇压了政变。日本政府因此对清政府进行要挟，派宫内大臣伊藤博文来华，与清政府签订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取得了与中国同等的向朝鲜派兵的特权。这样，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在朝鲜的地位，从而为日后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埋下伏笔。

1885 年 6 月，日本政府采纳了伊藤博文等人的建议，继续向朝鲜进行势力扩张，同时提出了一个以十年为期的扩军计划，作为发动对华战争的准备。1887 年，日本又制定了侵略中国的《征讨清国策》，计划攻占北京和长



江下游的战略要地，吞并从辽东半岛到台湾的沿海地区，并肢解中国，建立若干个日本的附属国。为了实现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目标，日本精心部署，进行了长期的备战准备。

扩充军队是其发动侵略战争的先决条件和重要步骤。1890 年，日本拿出 60% 的国家财政收入，来建立和发展近代化的海陆军。当时中国北洋海军 2 000 吨以上的战舰有 7 艘，而日本同样吨位的战舰仅有 5 艘。为了在战舰配置上超过北洋海军，日本把增设速射炮和购买最新的巡洋舰，作为发展海军的重点。1892 年，日本提前完成了十年扩军计划。第二年，明治天皇又决定以 6 年为期，每年从宫廷经费拨出 30 万日元，再从百官薪金中抽出 1/10，补充造船费用。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已拥有 7 个师团，常备军有近 6 万人，后备兵有 25.6 万人，海军拥有各类军舰，总吨位有 6 万吨。日本还派遣大量特务进入中国窃取军事情报，并制定了入侵中国的作战计划。至此，日本已经做好了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准备，只等机会的到来。

日本期待的发动战争的机会很快来临了。1894 年 1 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声势浩大，多次击败朝鲜政府军。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日本表面上支持清政府出兵朝鲜，暗地里却加紧了战争的准备。清政府对日本虚伪的“保证”深信不疑，6 月 5 日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陆军 1 500 人去朝鲜，并按《天津会议专条》的规定通知了日本。但日本在当日就已经成立了战时大本营，决定出兵朝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日本先后派出 1 万余人入侵朝鲜，占领了从仁川到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并逐渐包围驻守牙山的清军，不时乘机挑衅。清政府为避免中日两国发生冲突，建议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然而，日本为了挑起战争，不仅拒绝撤兵，反而提出由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内政“改革”的无理要求。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形势异常危急。

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挑衅行为，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发出了主战与主和两种不同的声音。光绪皇帝及其老师翁同龢为首的部分官僚主张对日作战，逐渐形成了“帝党”集团。光绪帝曾多次电谕李鸿章“预筹战备”，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制止日军的侵略。而主和派代表李鸿章，为了保全北洋海陆军，主张“避战自保”，妥协退让，并散布若战必败的论调，把阻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在英、俄等国出面调停上。此时的慈禧太后正忙于自己的 60 寿辰庆典，害怕日本的武力威胁，也一心保和局。她支持李鸿章的求和主张，让他奔走于俄、英等国公使之间，请求他们的调停。

实际上，日本发动战争有着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英、俄两国在相互争斗的过程中，都想将日本拉到自己的一边，以战胜对手，它们对日本侵华持纵容的态度。德国则希望利用日本侵华之机趁火打劫以夺取新的权益，竭力支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法国这时正在我国西南各省扩展势力，也希望利用日本发动侵华的机会，把列强的视线引向朝鲜和中国的东北。美国一贯是支持日本侵华的，等着坐收渔翁之利。因此，李鸿章请求他们出面“调停“，不仅毫无可能，而且接连受骗，以致后来把驻朝清军推向了被动和危险的境地。

日本政府利用清政府的求和方针与列强的调停，充分做好了军事作战部署。7 月 23 日，日本军队包围朝鲜王宫，劫持国王，成立了以大院君李昰傀儡政权，断绝了与中国关系，并由他授权日军驱逐驻牙山的清军。在这种紧急形势下，国内各阶层都要求清政府增援备战，以实力阻止日军的侵略。李鸿章被迫提出增兵朝鲜的计划，分别由陆路和海路开赴朝鲜。7 月 25 日晨，日本率先向运兵返航的济运、广乙两船发动进攻，，继而对运兵来朝鲜的“高升”和“操江”号进行袭击。“操江”号被劫走，“广乙”号中炮重伤，“济远”发炮还击，“高升”号被日舰击沉，船上中国官兵大部分壮烈殉国。日本侵略者不宣而战，正式挑起了侵华战争。因 1894 年是农历甲午年，所以这场战争称为中日甲午战争。

7 月 29 日，日本陆军队驻守牙山的清军发起进攻。清军失守，退至平壤。8 月 1 日，光绪帝发布对日宣战上谕，令“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同日，日本也向中国正式宣战。李鸿章在对日宣战后，不但完全无视光绪帝的抗敌谕令，而且害怕在对日作战中自己的实力受到严重削弱。他几经权衡后，在慈禧支持下，采取消极抵抗的战略方针，命令陆军可守则守，不可则退，要求海军退守“北洋各口”、“保船制敌”、“不得出大洋浪战”[①]其结果导致了清军接连败北，损失惨重。

日本利用清军驻守平壤按兵不动的时机，加紧向朝鲜战场增兵。9 月 15 日，日军兵分几路向平壤发起猛攻。左宝贵率部坚守北城玄武门，亲自登城指挥将士拚死杀敌，给予日军重大打击，但自己不幸中炮阵亡。玄武门失守后，身为全军主帅的叶志超放弃职守，在当天夜里下令大军后撤，以致军心大乱，各军迅速溃散。平壤很快失守。随后，日本侵略者开始将战火烧到中国境内。

平壤战役结束不久，9 月 17 日，日本联合舰队又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

海面袭击北洋舰队，挑起黄海大战。参战的日本战舰有12艘，以“松岛”号为旗舰。北洋舰队参战的有“定远”、“镇远”、“致远”、“来远”等10艘战船，以“定远”号为旗舰。双方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激战，日本联合舰队首先退出战斗，北洋舰队尾追十余海里，然后整队返回旅顺。在这场海战中，中日参战军舰数目相等，战争各有损失。日本舰队有五艘身受重创，北洋舰队的“致远”、“经远”等5船沉没。北洋海军的损失大于日方，但它还拥有“定远”、“镇远”、“来远”等战舰，仍有一定战斗力。在这场海战中，北洋舰队处于劣势，但广大官兵不屈不挠，奋勇杀敌，重创敌舰。“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在激战中表现出顽强的战斗精神，为保护旗舰，在船只多处中弹的情况下，鼓轮猛冲敌舰“吉野”号，欲与敌人同归于尽，不幸被鱼雷击中沉没，全舰250余名官兵，只有7人遇救。正是船舰将士的英勇斗争，才打破了日本一举消灭北洋舰队的企图，使清朝海军还保留一定实力。李鸿章却故意夸大损失，压制广大将士巡海迎敌的要求，以“保船制敌”为借口，命令北洋舰队全部藏到威海卫军港，把黄海制海权拱手让给日本海军，造成了坐守待毙的被动局面。

黄海战役后，日本决定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1894年10月下旬，日军分陆、海两路入侵中国。陆路以山县有朋为司令官，从朝鲜义州渡过鸭绿江，入侵辽宁，以牵制正面清军，掩护另一路日军从辽东半岛登陆作战。防守沿江的4万清军除聂士成部抵抗外，其余守将闻风而逃，不战自溃。日军不到3天就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今丹东），随后侵占了凤凰城、长甸、海城等战略要地，直逼辽阳。海路以日本陆军大臣大山岩为司令，在金州东北的花园口登陆，从背后袭击旅顺和大连。日军登陆14天，竟未遇到清军的任何抵抗。11月6日，金州陷落，徐邦道因孤立无援，退守旅顺。第二天，日军进攻大连湾炮台，守将赵怀益已先一日逃走，日军不费一枪一炮就占领了大连湾。

日军攻陷金州，夺取大连湾，目的在于攻占旅顺口。因此，日军在大连湾休整十天后，便向旅顺发起了进攻。18日，日军集中兵力从后路进犯旅顺。旅顺口设有海岸和陆路炮台20多座，配有各种火炮百余门，驻有清军13 000多人，但多数清军将领无心抗战。除徐邦道率部抵抗日军入侵外，其他清军纷纷溃逃，军心涣散。徐邦道孤军奋战4天，终因寡不敌众而战败。22日，日军占领旅顺，进行了4天骇人听闻的大屠杀，2万多群众遇害，幸免于难者仅有36人。

日军为了迫使清政府屈服，于1895年1月向北洋舰队的基地威海卫发动总攻。日军分成两路，一路佯攻登州，另一路从荣成县成山头登陆。日本海军也于30日，占领威海卫南、北两岸炮台，然后与陆军一起炮轰刘公岛和港内的北洋舰队。北洋舰队的广大士兵奋力抵抗，打退了日本舰队的多次进攻。但日军炮火越来越猛，使北洋舰队陷入绝境。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海军提督丁汝昌仍积极组织反攻，与日军炮战数十天。此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写信给丁汝昌，劝其率舰投降。舰队中的外国顾问和教官，也开始与部分贪生怕死的将领勾结起来，共同胁迫丁汝昌投降。他宁死不从，下令各舰冒死突围，但一些将领拒绝执行，只有"定远"管带刘步蟾炸沉了"定远"舰后自杀。11日晚，日军炮火更加猛烈，丁汝昌见陆援和突围已毫无可能，在绝望中自杀。外国教习浩威假托丁汝昌的名义起草投降书。威海卫被日军占领，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3月初，日军继续在辽东发动进攻。光绪皇帝于1895年1月令湘军6万人出战，驻扎山海关，准备与日军最后一搏。但北上增援的湘军与淮军一样不堪一击，几天时间内就全线溃败，日军占领了辽东半岛。3月29日，日军出动海军占领了澎湖列岛。至此，清军在战场上陷于全面的失败。清政府决意向日军求和。

事实上，在中日开战后，清政府从未放弃过求和活动。随着清军的连续溃败，清政府统治者的求和意向愈发迫切。1895年1月，清政府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并聘请前美国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赴日求和。但是日本此时正集中力量进攻威海卫，借口二人"全权不足"，拒绝谈判，指明要求恭亲王奕䜣或李鸿章赴日和谈。3月14日，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率其子李经方和美国顾问科士达前往日本。3月19日，抵达日本下关。第二天开始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进行谈判。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订立了中日《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有：一、中国承认日本队朝鲜的控制；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及所属诸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三、赔偿日本军费平银2万万两；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上述各口；五、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设立工厂，产品运销内地只按进口货税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此外，条约还规定，为保证中国履行条款，日军暂时占据威海卫。

清政府将台湾割给日本，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台湾人民自发组织起来，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反割台斗争。在刘永福和徐骧等领导下，台湾坚持抵抗达5个多月，打了100多仗，打死打伤日军多人。虽然台湾最终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但台湾军民的反割台斗争，在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马关条约》是《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它给中国人民套上了新的沉重枷锁，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灾难，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条约规定的巨额战争赔款，相当于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倍，大大超过了中国财政的承受能力。清政府除了加重搜刮百姓下，被迫以利权抵押大借外债，进一步受制于人。条约允许日本在华直接投资设厂，适应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其他西方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特权，同样享有这项权利，他们争先恐后地来中国开设工矿企业或修筑铁路，沉重打击了尚未成长起来的中国民族工商业，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条约的割地规定不仅使中国失去了中国宝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而且刺激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领土的野心，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

注释：

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8，第53页；《李文忠全书·电稿》卷19，第1页。

早期维新思潮的涌现

19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列强侵略势力的日益加强，以及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传播，中国出现了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近代维新思想。

一批积极参与各项洋务活动的清朝官员和士大夫，在兴办洋务活动的过程中，增加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技术乃至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了解，对洋务运动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弊病也有切身的体会。他们主张更多地向西方国家学习，不但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同时也要求实行某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希望中国能够变成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这些开明爱国的士大夫们，逐渐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被称为早期维新派或早期维新思想家，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代表性著作分别有《弢园文录外编》、《筹洋奏议》、《适可斋纪言纪行》、《盛世危言》。其中以《盛世危言》最有代表性，集中反映了甲午战前维新思潮的全貌和特点，影响力较大。

早期维新思想家出生于鸦片战争前后，成长在江浙及广东等地，早年接受封建传统教育，涉足科场与官场。如冯桂芬以榜眼入仕，曾任广西乡试主考官；陈炽是举人出身，当过官户部郎中、刑部章京；王韬在青年时代，本想攀附封建阶级，爬上士大夫的阶梯，但因屡次科考不中，才转而流徙上海、香港等地，鼓吹变法自强，并与洋务派官员交往密切；薛福成，他曾经在曾国藩的军队里入幕八年，后来随从李鸿章办理外交，晚年先后出任驻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使节，深受洋务思想的影响，广泛了解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再如郑观应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因不满朝政腐败，而弃仕经商，在外国资本企业公司做洋行买办，并参加过洋务派的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正是由于这些相同或近似的出身、教养和经历，使他们曾有过相似的认识，都一度投身于洋务运动。同时也因其洞悉洋务内幕而较易于看清洋务思想的局限，进而怀疑、批判，以至于抛弃洋务

思想，提出了早期维新思想。他们比先前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更多地看到了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

对中国社会及洋务运动的弊端也有深刻的体会，也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前人的狭窄视野。他们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等人抵抗外国侵略、维护中国独立和主权以及学习西方的进步主张，更重视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实用知识与资产阶级政治学说，要求一切近代工矿运输业允许商人自由兴办，明确提出“君民共治”的主张，即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在探索救国道路上向前迈了一大步。

早期维新思想家们是在同封建顽固派守旧思想的斗争中逐步成长发展起来的。他们根据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和思考，深刻地指出天下的时势和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批驳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旧观念，认为“天道”也是发展变化的。他们看到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认识到中外关系格局已经由“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大声疾呼，在万国竞争、弱肉强食的时代，只有进行变革，努力自强，才能适应新的世界潮流。王韬斥责顽固派说“至此时而犹作深闭固拒之计，是直妄人也矣，误天下苍生者必若辈也！”[①]郑观应也谴责顽固派是“一事不为，而无恶不作”、“甘守固漏以受制于人”[②]的误国误民之举。他们深刻揭露了当时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存在的问题，强调通过变革不合理的封建制度使国家走向富强的道路。在洋务运动后期，掀起了一场新的社会思潮。

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关系密切，他们大都是洋务运动的支持者或者直接参与者。在起初的一段时期内，维新派是作为洋务思想理论家的姿态出现的。在“求强”、“求富”的指导思想和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等问题上，都同洋务派的主张一致。虽然洋务派在实际运动中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陈旧思想，只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而不对封建制度作任何变革。这与维新派缓和渐进改革的愿望是相背的。但即便如此，中法战争前，改革派对洋务派还是支持的，他们的思想与洋务派的思想没有显著的区别。中法战争后，随着社会经济和客观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中法战争中清政府“不败而败”，使维新派对洋务派日益感到失望，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他们再不能满足于洋务运动能容纳的范围了，于是逐渐从洋务派中蜕化出来，并且对洋务运动的某些做法进行了批判。他们谴责洋务派对近代工商业的垄断、控制，反对清政府对民族资本的压制，批判洋务派只知道引进西方的船炮技术，而不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忘记了西方富强的根本，结果内治外交都没

有取得良好效果，中国依然任人凌辱。他们深切感到守旧不行，办洋务也走不通，必须另寻中国富强的道路。他们抛弃了洋务思想，提出了早期维新思想，选择了维新改良的道路。

到 19 世纪 80 年代下半期到 90 年代上半期，改良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从此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思想登上了历史舞台。早期维新思想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要求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反对外国侵略。早期维新思想家们都具有反对外国侵略、希望中国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他们敏锐地认识到，西方列强"恃其长"、"张其炫耀"[③]，疯狂地践踏中国之主权，掠夺中国的财富与资源。对此他们极为愤慨，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凡有血气，孰不欲结发厉戈，求与彼决一战哉?"[④]于是，他们向清政府发出呼吁，指出中国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奋起反抗外来侵略，否则就会落得"虎视并狼吞，海疆终决裂"的悲惨下场。

他们看到了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的重要性，强烈反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要求修改那些危害中国主权和阻扰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条款，如片面的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在他们看来，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掠夺，是造成中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同时，他们还揭露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境内横行霸道的事实，谴责赫得长期把持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认为这些都干涉了我国内政外交，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主权，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祸害，要求清政府取消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所享有的特权。

第二，要求实行"商战"，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随着民族资本的发展和外国侵略势力的日益扩大，早期维新派逐渐认识到"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借于商"，[⑤]西方国家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的商业发达。中国长期以来"重农抑商"，不知振兴工商业，不知与外商竞争，所以中国日趋贫困，国势日趋衰败。因此，要使国家富强，不仅要加强国防，以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兵战"，而且必须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郑观应在《商战》一文中提出了"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以商战固国本的主张。他呼吁要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对外贸易，还提出了要设立商部、办邮政和银行，开商会等具体措施。

为了替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开辟道路，早期维新派在批评清政府不能护商的同时，也期望清政府能改变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传统方针，确立以商为本、重商主义的国策。请求政府取消限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允许新兴的资



产阶级自由兴办企业，中央地方各级政府设置专门机构，保护民族工商业，把工商业者组织起来，自行纠集股东，组成大公司，避免华商之间的相互竞争。早期维新派把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外国进行经济竞争，看成是中国由贫弱变为富强的出路。

第三，要求改变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早期维新思想家们在反对外国侵略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程度上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他们目睹了资本主义国家物质技术的发展以及他们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与中国贫弱落后和各种苦难现状形成了鲜明对比，逐渐意识到不改变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中国就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都论述了西方国家的各种政治制度，极为赞赏君主立宪政体。王韬介绍了西方国家“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治制度，认为“君民共主”制度（即君主立宪政体）最好；薛福成介绍了英国资产阶级议会中的“两党制”；马建忠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郑观应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提出在中国实行议会制的主张。他们认为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并对设立议院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把它看成是治国的本源与立国的根本。虽然那时他们对议会、民主等还不能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来意义上去理解，但是他们的主张，发出了微弱的改革封建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的最早呼声，表达了正在发展中的中国资产阶级争取社会地位和参加政权的要求。

第四，严厉批判了封建顽固守旧思想。他们认为在万国竞争、弱肉强食的时代，“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必然导致国家衰落，只有发愤图强，革旧出新，才能适应新的世界潮流。针对顽固派腐朽的守旧思想，王韬斥责道：“至此时而犹作深闭固拒之计，是直妄人也已，误天下苍生者必若辈也!”。郑观应也指出，这些顽固派是“一事不为，而无恶不作”、“泥古不化”、“甘守固漏以受制于人”[⑥]的误国之举。

早期维新派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提出很多主张，还在教育、军事和外交等多个方面提出了不少的变革意见。他们提出的维护国家独立，发展民族工商业，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废科举、兴学校、开报关等一系列主张，充分反映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也说明了遭受侵略的一部分先进中国人想摆脱外国屈辱历史命运的愿望，具有一定的反侵略、反封建的作用。

然而，他们毕竟刚刚从封建营垒中转化而来，还难以完全摆脱封建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他们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但不敢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他们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但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本性又认识不足，对他们抱有某些幻想，企图加以利用；他们对清朝封建统治者深表不满，却主张维护传统的封建道德和伦理观念，不敢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他们反对不平等条约，反对在外国侵略面前妥协退让，但又不敢同外国侵略势力作坚决的斗争，把取消列强在华种种特权的希望寄托在外交谈判上。早期维新派虽然提出了许多主张、建议和方案，但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或思想学说。尽管他们进行了著书立说，推动封建王朝的变革维新，但没有认真研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政治学说，也不可能深入批判中国封建思想文化，更不可能组织社会团体和社会阶级进行政治斗争。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

不管早期维新派存在怎样的缺点，他们毕竟突破了洋务思想的局限，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方向。早期维新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他们掀起的新的社会政治思潮，曾对中国社会发生了广泛的思想影响，并且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起到了思想先导作用，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注释：

①⑥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1，《睦邻》。

②郑观应：《盛世危言》卷1，《吏治上》、《学校》。

③王韬：《变法上》，《弢园文录外编》，第12页。

④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戊戌变法》，第1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83页。

⑤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第17页。

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成长

当中日甲午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恩格斯就预言说：“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她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①

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事实，证实了恩格斯的预见。甲午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华的资本和商品输出，争先恐后地来中国建工厂、开矿山、修铁路、开银行，外国商品充斥着国内市场，使战前原本已逐渐解体的自然经济，在许多地区已经面临崩溃瓦解的境地。但是，帝国主义强盗不曾想到通过侵略手段扩大商品销售市场，在给他们带来巨大利润的同时，也会走向他们愿望的反面：既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浪潮，也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设了某些客观条件。一方面，由于外资工厂纷纷建立和洋货大量倾销，中国农村以纺纱织布为主的家庭手工业急剧破产，中国对机织纱布和其他商品的需要量迅速上升，使得商品市场不断扩大，这就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另一方面，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倾家荡产，逼得他们或辗转死于沟壑，或背井离乡，纷纷流向城市，寻找出卖劳动力的场所，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如上海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人口为 293 000 人，24 年激增到 586 000 人，3 年间增加了一倍。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充斥于城市之中，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战后清王朝的社会环境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马关条约》的签订和民族危机的日重，刺激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当时许多爱国人士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打败中国，是因为它采用了西方的先进生产

技术，发展了资本主义，中国要想富强，就要学习西方。他们把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当作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大声疾呼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工厂，提出了自办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工厂以“抵制洋商洋厂”的主张。民族企业的投资者及其政治代表们谴责官府对企业的垄断，要求自由发展工业的呼声越来越高了。他们主张：“民间之事，宜听民办，操刀代斲，必至伤手”[②]。“商人能集资自办者，多多益善，尤当力为保护，毋得以官权侵之”[③]。因此，他们要求打破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枷锁。

当时，洋务派已经无法垄断近代企业，清政府由于财政困难，再也没有能力投资兴办新式企业了。因此，对于这种要求打破官府垄断，自由发展新式工业，挽救民族危机的历史潮流，封建统治势力是无法抗拒到底的。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终于不得不表示“提挈工商”，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规》，这就为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除此之外，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中既然已允许外国人在华投资设厂开矿，如果再对本国民间投资新式企业限制过严的话，于情于理都无法交代。因此只好放松限制，允许民间自由设厂开矿。

清政府工商政策的转变，进一步刺激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在甲午战后数年间，中国出现了兴办工业的浪潮，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据1895年至1898年的不完全统计，这期间新创办的商办厂矿企业有62家，资本总额达1 240多万元，远远超过了中日战前20多年间民间投资资本的总和，相当于同时期官办、官商合办企业投资总额的3倍。

拿纺织工业为例，从1895年~1989年，在上海、宁波、无锡、福州、苏州等地，就先后创办了7家商办企业，资本都在20万元以上，其中投资额最大的苏州苏纶纱厂，资本达83.9万多元。再以煤矿为例，这一时期共创办商办煤矿4家，其中规模最大的广东北海煤矿，资本也达83.9万元；1897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谈到当时各地民办工业的情况时说：“数年以来，江、浙、湖北等省陆续添设纺纱、缫丝、烘茧各厂约三十家；此外机造之货，沪、苏、江宁等处有购机制造洋酒、洋蜡、火柴、碾米、自来水者；江西亦有用西法养蚕、缫丝之请；陕西现已集股开设机器纺织局，已遣人来鄂考求工作之法；四川已购机创设煤油并议立洋蜡公司。山西亦集股兴办煤铁、开设商务公司；至于广东海邦，十年以前即有土丝、洋纸等机器制造之货，近年新增必更不少；天津、烟台更可类推。湖南、湖北两省已均有购机制造火柴及榨棉油者。……似此各省气象日新，必且愈推

愈广。"②

在这些商办企业中，比较著名的企业有：1895年，商人楼景晖在浙江萧山县创办的合义和丝厂，华侨商人张振勋在山东烟台创办的张裕酿酒厂；1896年，严信厚在宁波创办的通久源纱厂；1897年，长芦盐运使杨宗濂等人在无锡创办的业勤纱厂，四品京堂庞元济在杭州创办的通益公纱厂，夏粹芳等在上海创办的商务印书馆；1898年，朱幼鸿在上海创办的裕通纱厂，祝大椿在上海创办的源昌碾米厂，吴懋鼎在天津创办的天津硝皮厂等等。到1899年，这些纱厂都先后开工生产。甲午战后出现的民间设厂"高潮"一直持续到义和团失败前，并始终保持着较快的发展势头。

棉纺织业和缫丝业是较早发展起来的近代工业部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在1894年以前，棉纺织业是在清朝控制下的，共有3家工厂，没有一家是民办的。1891年创办的上海华新纱厂是官商合办，1892年创办的湖北织布局是官办，上海织布局遭火焚以后，1894年重建，改名为华盛纺织总厂，仍是官督商办。而从1894年朱鸿度创办上海裕源纱厂起，到1911年，共新设20个纱厂，全部商办，实力超过了政府控制的纱厂，即便政府控制的纱厂也在向民营转化。中国的生丝，自外国生丝兴起后，在七八十年代出口比重虽然日渐下降，但出口的绝对值在增加。1894年以后，出口价值已超过茶叶，在出口贸易中占第一位。因为机器缫丝的质量优于土丝，出口量持续增加。1895年以后，缫丝厂增加很快，缫丝工业成为民族工业资本最多的部门，并且从上海、广东扩展到四川、湖北、辽宁各地。

除了棉纺织业和缫丝业外，这一时期轮船运输、面粉、酿酒、造纸、印刷、火柴、制革、碾米、织麻和采矿业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甲午战后虽然有了初步发展，但力量仍然相当微弱，不但数量很少、规模小，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又遇到重重困难和阻碍。甲午战后，列强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在华特权，掌握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厂矿企业，一般规模较大、资本雄厚、设备先进，给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他们通过凭借侵略得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进一步扩大并控制了中国的商品市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起步晚、实力弱，根本没有力量与西方在华资本和廉价的商品进行竞争，常常出现亏损甚至破产，抑或被外商兼并。其中，以棉纺织业受到外商的冲击最为严重。如，在甲午战后的3年~4年间，先后开设的10家纱厂，资本额共490余万元，一时形成了兴办纺织工业的"高潮"。与此同时，日本棉纱在华中、华北一带大量倾销；英、美、德等国纱厂也在上海相继设

立，资本额达580余万元。在这些外资纱厂的竞争下，从1898年开始，上海及苏、杭一带的纱厂就发生亏损，到1899年其他各地纱厂也都难以支持，此后再无人办新厂。其他民族工业也同样受到洋货倾销的打击，没有抵抗的能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外国商品和资本的刺激下产生的，随后又在外国商品和资本的竞争中寸步难行。

中国民族资本工业不仅要受到外国资本经济势力的压迫，还要承受国内封建势力的摧残。民族工业虽然得到了清政府的承认，但并没有可靠的法律保护。苛捐杂税、官吏勒索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日益增加。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民族工业，很难与跟外国商品竞争。尽管受到外国资本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道路曲折坎坷，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是缓慢地前进了，甲午以后几年与战前相比，有了比较明显的发展。

随着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渐成长起来，特别是上层力量的发展更加明显。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是与民办近代企业一起产生和成长的。但是在1894年中日战争前，它的发展是十分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禁止民间自行办厂。因此，战前民族资本家的数量是极少的。据估计，从1872到1894年，大约有100多个商办近代企业，这些企业的规模都不大，由此估计有200个~300个企业创办人，即民族资本家。

甲午战后，清王朝改变了对民办工商业的限制政策，允许民间设厂，民族资产阶级获得了难得发展机会。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1898年新创办的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企业大约有60多个，1万元以下的企业尚无统计数字，因此无法估算当时有多少民族资本家，但可以肯定的是民族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中，而且代表这个阶级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此时已在政治舞台上活跃起来了，并促成了1898年的戊戌维新变法。

民族资产阶级在20世纪初年有了明显的发展。据估计，到1911年，民族资产阶级的人数有5万人。[③]这个数字虽然不算多，但他们的能量却很大，社会影响广泛，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民族资产阶级就在这一时期形成了。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大多是由官僚、地主、买办、商人转化形成的。他们中的一部分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保持着较多的联系，拥有规模较大、资金较多的厂矿，这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上层在其发展过程中，无论原来是什么出身，都需要在清王朝寻找自己的靠山，否则就得不到发展。例如，著名实业家张謇，曾中过状元，与清王朝上层人物来

往密切，正是靠着这些关系，他才几经挫折，最终建起以纺织为主的多种近代企业，成为当时社会上很有影响的实业家。孙家鼎家族也是得到了封建势力的支持而逐渐兴盛起来的。孙家鼎中过状元，曾做过尚书、大学士，在家乡安徽寿州拥有大量房地产，号称“孙半城”。他的胞侄孙传樾曾娶时任两江总督的李翰章（李鸿章兄）的次女为妻，孙传樾借助孙李两家的势力，进洋药局、火药局等任职，积累了万贯家产。他的两个儿子放弃仕途，投身实业，创办了上海阜丰面粉厂，家族中其他人也附股支持。孙氏家族在封建势力的庇护下，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个新兴的家族资本集团。可见资产阶级上层和封建统治阶级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

相对来说，那些资产阶级中下层与封建势力的联系要少些，因为资产阶级中下层多是由资产较少、在官场缺少有力的靠山的官绅、商人、买办以及小生产者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由于经济力量相对较弱，社会政治地位比较低下，不仅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挤压，而且还要受到买办资产阶级以致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排挤和吞并，他们的革命要求比较强烈，正在艰苦地蓄积力量，准备用暴力革命的手段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道路。

但无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还是中下层，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都强烈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要求建立独立统一的民族市场，因此它们都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从 19 世纪末起，这个阶级就开始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扮演重要的角色，为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在这个大方向上，民族自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是没有分歧的。然而，它们毕竟与本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在经济上有着程度不同的关联，所以它们的政治态度也有明显的差异，它们中的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主张革命，实行民主共和，其政治代表即为革命派。而上层资产阶级由于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则主张改良，主张通过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以求变法救亡，其政治代表即为改良派。1898 年出现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主要是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和要求。

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既有合作，也有斗争，他们共同引导了 20 世纪初中国政治生活的潮流。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9 卷，第 288 页、第 297 页。

②《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 45，第 18 页。

③黄逸峰：《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第 88 页。

改良主义维新运动在中国失败

在帝国主义瓜分危机的刺激下，刚诞生不久的中国资产阶级就开始投身并领导了救亡运动。这些由早期维新思想家发展而来的新式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和中西文化的碰撞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股改良主义的思潮，他们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甲午战后，他们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新的政治力量的代表，开始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导演了近代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戊戌维新运动。

19 世纪 90 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推动了维新思潮的发展。早期维新思想家提出的“变法”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速传播，并很快形成了一股新的社会思潮，出现了一批宣传维新思想和进行政治变革的维新派人士。他们以新的姿态在时代潮流的前面，向着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守旧的思想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在反对封建顽固派的同时，也看到了洋务运动的种种弊端。他们深感封建专制政体的腐朽，认为要把中国从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厄运中拯救出来，使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唯有实行维新变法，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为此，他们开始大力宣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宣传进化论思想，对恪守“祖宗成法”的封建顽固派和“中体西用”论调，展开了猛烈的批判。维新变法思想很快得到广泛传播，经过几年的酝酿和组织准备，在 1898 年发展成为有理论、有纲领的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所以这个政治运动称为戊戌变法或戊戌维新。这次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者是康有为。

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亲眼目睹了清王朝的极端腐败，痛感民族危机日重，志在救国救民的他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奋发图强。1895 年 4 月，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试期间，传来了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对于这个严重丧权辱国的条约，全国各阶层人士无不为之痛心疾首。在京应试的举人们群情激奋，积极活动，以省籍组织起来到督察院上书请愿，掀起

了反对签约的巨大声浪。在全国上下一片愤怒声中，康有为更是万分愤慨，积极奔走呼号，发动了1 300多民举人于5月2日联名上书清廷。他在书中痛陈签订《马关条约》将造成的严重后果，指出割弃台湾将使民心离散，促使其他列强接踵而至，从而陷入亡国的危险境地。康有为要求皇帝当机立断，“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即由皇帝下诏严厉处分丧权辱国的大臣；迁都西安，整军再战；将对日赔款移作军费，加紧练兵；实行变法，采取“富国”、“养民”、“教民”的各种有效措施。此外，他还提出以府县为单位，每约十万户公举一位“议郎”，供皇帝咨询和讨论重要政令，实现“君民共主”。这是康有为继1888年第一次上书皇帝之后的第二次上书。与前次上书相比，本次上书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和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要求，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但是，这封充满爱国热情的上书由于顽固派孙毓汶等的阻挠，未能递到光绪皇帝的手上。

“公车上书”未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大批举人的这次上书请愿，却标志着酝酿多年的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开始与爱国救亡运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公车上书”被传抄印刷，不胫而走，流传甚广。社会上要求变法的呼声也随之高涨，康有为从此确立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地位。

“公车上书”后，康有为考中进士，被授予工部主事。同年5月~6月，他先后给光绪帝上了第三书和第四书，反复强调必须变法维新的重要性。看到康有为的第三次上书之后，光绪帝感到所言痛切中肯，有利于挽救时局，非常重视，下令誊抄分送慈禧、军机处和各省督抚。虽然第四次上书，仍被顽固派拒绝代呈，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已被光绪帝所赞同，维新派已开始取得了光绪皇帝的支持。

光绪帝对变法主张的支持，给维新派带来了很大的希望。然而，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派系分立，矛盾重重。光绪帝和支持他的官僚，虽然倾向变法，但并不掌握实权，中央军政大权仍由慈禧太后及一批反对改革、因循守旧的保守派官僚和一部分洋务派官僚把持。光绪帝企图通过变法，从慈禧手中夺取统治大权，推行新政，改变国弱民穷的局面。虽然光绪帝及其亲信官僚并不完全赞同维新派的主张，但为夺取统治大权，挽救清朝统治危机，纷纷支持维新派变法。于是维新派开始把光绪帝及其亲信官僚视为靠山，加深了依靠他们实现变法维新的幻想，但从此变法完全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

为了打开局面，康有为等人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天津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维新思想，大造变法图强的舆论。1895 年 8 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双日刊，由梁启超等人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不久后，《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专门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作为维新变法的宣传媒介，在北京的部分官员和士大夫中流传，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同年 11 月，在康、梁的积极倡导下，由文廷式出面组织了北京强国会，推陈炽为提调，梁启超为书记员。强学会是传播变法思想，积蓄维新力量的重要政治团体。康有为还亲自写了《强学会叙》，指出中国形势危急犹如“寝于火薪之上”，“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①]呼吁封建官僚和士大夫们起来挽救民族危亡。1896 年 8 月，汪康年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主笔。他先后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说群》等文章，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维新变法思想。一时间，《时务报》风行海内，成为影响全国的维新派的喉舌。为了推动维新运动能深入开展，康有为等人积极奔走号呼，使维新运动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和相当的规模。据不完全统计，1895 年～1897 年，维新派和开明人士在全国共创办学会 23 个、学堂 17 所、报馆 9 家、书局 2 家，总计 51 个。到 1898 年增加到了 300 多个。

维新派的变法活动引起了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恐慌和憎恨，他们全面攻击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引起了激烈的论战。这场论证主要围绕“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要不要兴新学”三个问题展开，核心是“要不要兴民权”。

顽固派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古老信条，反对一切新事物、新思想。在他们看来，中国之所以贫弱，不是因为制度不好，而是因为“人心不古”。他们死守祖宗之法，指出：“当今之世，非无治法之患，实无人心之患”，补救的办法，“总以正人心，培国脉为本”。[②]维新派则主张进行根本性变革。他们依据西方进化论和中国古代变易的思想指出，“变者，天下之公理”[③]祖宗之法也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改变的。而这种变化不是循环往复的过程，而是不断更新的过程。既然进化史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那么面临“四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就不能不变法改制。

关于在中国兴民权、设立议院的问题，顽固派对此深恶痛绝，他们认为君主专制制度是完美的政治制度，反对提倡平等、民权，“使民权之说一

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大乱四起”，[4]所以“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5]维新派则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至弱的根源在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6]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兴民权，设议院。他们还指出，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贫弱落后的根源。在他们心目中，西方国家（包括日本）是中国的榜样，其富强的根本正是在于各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因此，他们反复强调只有实行君主立宪，开设议会，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学说，才能使“国家无难决之疑，言路无壅蔽之患，内政既清，外侮不作”。[7]也唯有如此，中国才能走向富强的道路。

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不仅涉及到政治、经济，还包括文化教育等许多领域，并特别强调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他们认为要变法维新，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顽固派则攻击维新派兴办学校的主张是“名为培才，实则丧才”，会败坏人心风俗，认为尊孔读经、八股取士的教育制度不可改变。维新派批驳指出，旧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是统治者“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为中国痼弊文明之一大根源”。他们甚至说“覆中国，亡中国，必自科举愚民不学始也”。[8]

这场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思想争论对于变法运动具有重要意义，它推动着变法运动走向高潮。这次论战，是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与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在思想上的交锋，也是中国有史以来作为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代表的资产阶级第一次向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提出挑战。经过这场论战，进一步解放了知识分子的眼界，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广泛传播，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思潮。

正在维新运动日趋高涨之时，1897 年 11 月，德国强占了胶州湾。这一强盗行为，激起了全国上下的愤慨。康有为敏锐地觉察到这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开始。他立刻从上海赶到北京，鼓动变法。他在给皇帝的又一次上书中，用长篇幅分析“外衅危迫，分割渐至”的危险局势。他指出，中国现在的形势“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德国强占胶州就是瓜分的“嚆矢”，各国也会尾随而来吞噬中国，清朝的国际环境已经险恶到了极点，如不立即变法图强，“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9]

康有为的上书感动了京城。在康有为和他的同志的努力下，光绪皇帝终于接受了变法的建议。1898 年春夏之交，支持变法的帝党与反对变法的后党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日趋激烈。光绪皇帝为了加快变法，推行新政，于

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反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在这期间，光绪帝发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诏旨，涉及到经济、文化、军事和政治领域的改革，新政改革的方向是使中国走上西方资本主义那样的发展道路。经济方面：保护农工商业，提倡开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设立铁路、矿产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文教方面有：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等。军事方面：训练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裁减旧军，以及力行保甲等。7月下旬以后，新政由经济、文教、军事方面扩展到政治方面。主要改革有：删改则例，裁汰冗员，取消闲散重叠的机构；准许百姓向朝廷上书等。

戊戌变法触及了守旧派的利益，因此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严厉镇压。就在“明定国是”诏下达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胁迫光绪帝先后下了三道命令。撤除了积极支持变法的大学士翁同龢的军机大臣和其他一切职务，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宠臣荣禄为直隶总督，不久后实授，并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统带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和宋庆的毅军，控制了京畿地区。又下令所有新授二品以上文武大臣，须到慈禧太后面前谢恩，以此控制了用人大权，限制维新派的权利。这三项措施为顽固派发动政变做好了准备。面对慈禧太后的打击，光绪帝也试图进行一定的反击，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这引起了慈禧太后的极大愤怒，她决定要扑灭新政。于是加紧策划政变，不断派人去天津与荣禄密谋。对于慈禧太后的反扑和新政面临的危机，光绪帝和维新派万分惊恐，一筹莫展，只能冒险拉拢新建陆军袁世凯来对付慈禧和荣禄的武力威胁。9月16日，光绪帝召见了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除了拉拢袁世凯之外，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还幻想取得英、日帝国主义的支持，挽救败局，但毫无结果。18日深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世凯寓所，劝说袁世凯拥护光绪皇帝，诛杀荣禄。袁世凯当面表示对光绪帝“忠诚”，同时又借口事机紧迫，须立即回天津部署。20日，袁世凯向光绪帝再次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的“衷心”。当晚，他急忙赶回天津，到总督衙门向荣禄告密，同时策划镇压维新派。

21日凌晨，慈禧太后经过周密布置，先将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重新“训政”，这就是“戊戌政变”。政变后，慈禧下令大肆逮捕维新

派。康有为已于政变前日离京赴沪，后逃亡香港。梁启超则在日本人的掩护下，由天津逃亡日本。谭嗣同拒绝了出走日本的劝告，决定为变法而死。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六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时人称之为"六君子"。其他维新派人士和参与新政及倾向变法的官员，有的被囚禁，有的被罢黜，有的被放逐。维新时期实施的各项政策，除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下来外，其余各种均被取消。"戊戌变法"宣布失败。

戊戌变法是封建顽固势力的打压下最终失败了，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过于薄弱，还不是封建旧势力的对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势力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大权，形成了一股力量强大的守旧势力，他们极力反对变法。而发起变法运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刚刚形成，处境艰难，力量微弱。他们在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仓促上阵，参与者又多限于知识分子阶层，从而使得维新派的力量十分单薄。除了在力量上与顽固派悬殊外，他们在思想上也有缺陷和错误。维新派把中国遭受侵略的原因归结为中国自己不争气，太衰弱，只有通过变法走上富强道路，才能免受侵略。因此，他们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没有反帝的思想，而且还天真地幻想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不能不说这是戊戌变法的一大遗憾。同时，他们在实行改革时，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和少数封建官僚，没有找到能够真正打破封建旧势力的力量。这就使得自己失掉了群众基础，所以不管改革家多么精心地设计改革方案，在顽固派的反扑面前都不堪一击。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无法克服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注定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领导运动走向胜利的，变革的重任必然会历史的落到了更为先进的阶级身上。

戊戌变法运动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绝不能就此否定的巨大历史进步意义。它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维新派领导的爱国救亡运动。维新派从挽救民族危亡的愿望出发，提出改革封建的社会制度，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他们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顺应历史潮流。此外，它还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和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在这一时期，维新派着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观念，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沉重冲击了腐朽的旧文化。它和随后发生的义和团形成了近代史上第一次救亡运动的高潮，对于中国近代民族觉醒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义和团运动和近代的反帝斗争

戊戌变法失败后，1900 年在中国北方又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个运动是在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灾难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发生的，是长期以来群众反教会斗争的总汇合，它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巨大勇气，具有反帝反侵略的民族正义性。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了西方传教士在华自由传教的特权。到 19 世纪末，欧美的天主教、耶稣教和沙俄的东正教，先后向中国派遣的传教士达 3 300 多人，吸收教徒近 80 万人。他们中有些是为了信仰而来传教，少部分传教士在传播西方和兴办文教慈善事业方面做过贡献，但总体而言，这些外国传教士以传教为名，利用不平等条约，从事各种侵略活动。他们在各地直接搜集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的情报，从事间谍和特务的勾当。同时他们还粗暴地干涉中国的内政，为非作歹，欺压百姓，起到了侵略者的大炮所不能起的作用。这种恶劣行为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

中国人民的反教会斗争，最早出现在 19 世纪 60 年代。在中法战争以前，反洋教斗争主要是一般的骚动、暴动，没有发展成为有组织、有纲领的反侵略斗争。后来，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加强，反洋教斗争的范围更加广泛，次数更加频繁，而且还出现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武装起义。

甲午战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进一步刺激了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发展，人民群众自发地把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反列强瓜分融为一体，从而将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在山东曹县，大刀会首领刘士端自 1894 年开始反对教会侵略，影响到了鲁西南和江苏的沛县、萧县、砀山、考城等地。1896 年遭到当地政府镇压，刘士端被杀，大刀会实力大减。1897 年 11 月，山东巨野县群众杀死德国传教士 2 人。周围各地大刀会纷纷响应，斗争此起彼伏。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占领胶州湾，并逼迫清政府承办凶手，将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赔偿教堂损失。1898 年，在郯城



神山和沂州、日照、兰山等地爆发了数十次的武装起义，统称沂水教案。德国从青岛派兵去沂州，勾结当地官吏，共同镇压了这些斗争。除了山东各地反洋教斗争外，其他各地也都相继爆发了类似的反抗斗争，如1898年广西爆发了天地会起义；同年6月，四川人余栋臣率众起义；湖北数千民众在当地哥老会的领导下，也树起了“顺清灭洋”的旗号举行起义等等。从6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反教会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巨大的反抗力量，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直接推动和促成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全面爆发。

在教会势力猖狂的山东地区，当地群众在义和拳的基础上，将反教会斗争发展成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正是由义和拳转化而来的。义和拳最初是乾嘉时期属于白莲教系统一个秘密民间的反清组织，被清朝统治者视为“邪教”严加禁止。但义和拳的反清斗争并未因此而停止。随着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它也从最初的反清组织发展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反教会团体，与大刀会、神拳等其他组织一起进行反教会活动。在白莲教、大刀会的影响下，义和拳沿袭杂拜各家鬼神偶像的传统，也借助气功，逐渐形成了一套“画符吞朱”、“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神秘主义活动方式。同时还设立神坛拳厂，通过传授拳棒、练习武功、散步传单的形势，进行宣传和扩大组织。

义和团正是由义和拳一步步发展而来的。义和拳改称义和团，最早见于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①]1899年夏，继任山东巡抚毓贤出告示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同年10月后，清政府的公文中也开始称它为义和团。[②]义和团这一名称，从此逐渐代替了义和拳，或者两者通用。各地义和团成分较为复杂，成员中农民居多，在其高潮时期，大量无业游民和散兵游勇也参加进来，还有一些清军士兵也加入了义和团。义和团没有统一的组织。一般以八卦名目自立团号，如乾字团、坎字团。各地义和团以坛或厂为基层单位，往往是一村一镇、一街一巷设一坛口或几个坛口。平时各坛独自活动，有事则互相联络。其信仰和服饰也各不相同。各团坛无统一固定的信仰，只有“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的迷信思想基本相同。他们信奉的神灵多是小说或戏曲中的人物，甚至如孙悟空、赵云也成为他们“附体”的神灵。在服饰上也有区别，如坎字团尚红，红面包头、红腰带，而乾字团则尚黄，黄布包头、黄腰带。

1898年10月，山东冠县义和拳首举义旗，解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此前在冠县的梨园屯，法国传教士指使当地天主教民，与村民争夺玉皇庙，

激起了众怒。当地村民率众驱逐教民，并邀请梅花拳首领赵三多前来护庙。赵三多率众在梨园屯亮拳设厂。传教士要挟清政府镇压拳民，山东巡抚张汝梅愤恨教士恃强相压，于是对义和拳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1898 年 11 月，赵三多、严书勤等人在冠县竖起“助清灭洋”的旗帜起义，并改称义和团。随后，队伍分为两路，一路由严书勤率领在直鲁交接地区活动；另一路由赵三多率领沿着运河北上，进入直隶中部和南部。

在赵三多起义的同时，鲁西北地区的义和拳在朱红灯和心诚和尚的带领下进行反洋教斗争，并逐渐发展成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影响巨大。面对义和团的浩大声势，山东巡抚毓贤因不满列强和教会势力的横行，基本沿袭了张汝梅的政策，采取安抚的手法。毓贤对义和团的招抚态度惹怒了西方列强，他们向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要求撤换毓贤。毓贤得知后，派兵前往鲁西北保护教堂，并逮捕了朱红灯和心诚和尚，离任前两天将其杀害。但清政府在列强的逼迫下还是将其撤换，改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

袁世凯到达山东后，本来是要严厉镇压义和团。但就在他任命不久，慈禧太后立端王载漪子溥儁为大阿哥，企图取代光绪皇帝。各国公使拒绝入宫庆贺，表示不予承认。慈禧太后的这一计划受到挫败后，逐渐产生了利用义和团反对西方列强的想法，不希望袁世凯改变前任政策。1900 年 1 月，清政府发布上谕说：“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它要求地方官吏今后“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3]也就是承认义和团是合法团体。但袁世凯在山东并没有执行清廷的这一政策，而是残酷地镇压义和团。从此，义和团的活动重心转向直隶。

直隶是清朝封建统治的中心，是教会势力较为集中的地方。天主教和耶稣教遍布全省城镇，共有大小教堂 2 000 余所。赵三多、严书勤起义后，直东交界地区和直隶南部也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各地义和团相继竖起“助清灭洋”的旗帜，很快出现了“习拳者益众，焚香设坛，人心若狂，官亦不敢过问”的局面。直隶总督荣禄派兵前往镇压，并要求袁世凯派兵会剿。这些地区义和团斗争被镇压下去，但义和团继续向直隶西南各州和中部地区发展，从保定向北发展到新城、定兴、涿州一带，进入北京；向东发展到雄县、霸县、静海等地，进入天津；从而京、津、保之间形成了一个新的斗争中心。



1900年4、5月以后，义和团逐步控制了保定城，焚毁了城内的教堂。在天津附近的静海地区，形成了两支声势浩大的义和团。其中一支义和团以曹福田为首领，团众多达数千人；另一支以张德成为首领，在独流镇建立“议和神坛天下第一坛”，会众也达数千人。后来，张德成到附近的杨柳青铺设坛，团众发展到两万多人。在各地团民的支持下，他们焚毁了当地教堂，并杀死了传教士。直隶总督荣禄派副将杨福率兵镇压，结果被义和团打死，全军覆没。5月底，经过与清军的激战，义和团完全控制了保定城。从此，义和团在直隶境内迅速发展成燎原之势，开始逼近并陆续进入北京城。

早在义和团大规模进入北京之前，北京城里就有少量义和团民活动。他们张贴揭帖，号召人们练习义和神拳，赶走洋人，保护中原。3、4月间，在东单附近的于谦祠堂，出现了北京义和团第一个坛口。到了5月，从附近州县来到北京城的零星团民不断增加，北京居民参加义和团也日渐踊跃起来。5月30日，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赵舒翘等人提出：“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这些意见代表了当时一部分顽固大臣的主张，他们要求利用义和团对付外国侵略者。但帝国主义看到义和团发展迅猛，极为恐慌，不断警告清政府要尽快“剿灭”义和团。慈禧太后既没有信心镇压义和团，又因为外国公使曾庇护康、梁出逃，而且还阻挠了废光绪、立溥仪的计划，因而逐渐倾向于对义和团“抚而用之”的策略。6月5日，慈禧派赵舒翘前往涿州等地劝说义和团解散，并严令清军“毋得轻伤民命，启衅邀功”。第二天，她又加派协办大学士刚毅前往涿州劝其解散。他到涿州后表面上出告示要义和团“各散归农”，实际上是听之任之，以利用义和团对付洋人。他命令清军停止镇压，并撤走了正在与之作战的清军。慈禧太后策略上的转变和刚毅禁止镇压义和团的举动，使得地方官员不得不停止军事行动，聚集在京郊附近的各地义和团趁势进入北京。6月中旬以后，清政府招抚义和团的态度更加明朗，于是团民成群结队地大批进入北京。到6月下旬，全城坛口已有1 000左右，人数多达10万。

和北京义和团相比，天津义和团的发展似乎要曲折一些。在义和团进入北京前后，天津城内也贴遍了义和团的匿名揭帖，城郊坛口的数量迅速增加。但主持天津军务的荣禄、聂士成主张镇压义和团，因而天津义和团所遇阻力较大。帝国主义列强开始武装进犯北京以后，大批义和团民才开始进入天津。此时，聂士成在天津附近停止了对义和团的镇压，并率部在京津地区

抵抗侵略军。静海和新城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和王德成等乘机率领队伍先后到天津设坛，城内一时神坛林立。他们在天津砸毁海关道署和电报局，抢空军械所，没收教堂所藏武器，抗击侵略军挑衅。随着义和团运动的日益高涨，天津越来越成为义和团反帝的主要战场之一。

义和团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卷入这场运动的群众多达四五十万人。他们的组织成分异常复杂，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信仰各异，各地义和团始终处于分散作战的状态，这使得义和团具有明显的分散性和浓厚的迷信色彩。义和团兴起后，先后提出了“助清灭洋”、“兴清灭洋”的口号。到1899年底，又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帜。后来，“扶清灭洋”这个口号被各地义和团普遍采用，成为义和团的行动纲领。

“扶清灭洋”是一个具有反帝爱国性质的口号。这一口号集中鲜明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的愿望。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而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暂时降到了次要和服从的地位。通过这一口号，义和团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同时又争取到了部分爱国官员、地主士绅和清军将士的支持，从而扩大了义和团的群众基础。但这一口号的提出，也从侧面反映出，大多数中国人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本质还缺乏科学的认识，他们不可能用科学的思想武器去分析和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同清朝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而只能从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爱国志愿出发提出反帝口号。这就表明，没有新的经济基础的广大小生产者无法冲破皇权思想的束缚，不可能在救亡运动中提出超越旧皇权的救国方案，只能用洋人欺大清来激发民族义愤。可以说，这一口号是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又是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外反动派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的产物。

义和团提出“扶清”显示了义和团对清政府在认识上是模糊的，也表明了他们当时在主观上并不反对清政府和封建制度。“灭洋”口号的提出虽然触及了时代的救亡主题，起到了广泛吸引群众参加反帝斗争的作用，但它对洋人、洋教和外来思想统统排斥，显示了他们盲目排外的落后性。他们提出“灭洋”的口号，不仅有打击外国侵略者的含义，而且把一切与外国有关的东西，甚至把铁路、电线、机器、学堂、报馆等外来事物也列为打击范围之内，表现出了他们的闭塞和落后。此外，这个口号也使义和团放松了对清政府施展阴谋手段的警觉，不能识破清政府的诱骗，最后被清政府所出卖和镇压。

义和团运动发展到高潮后，卷入运动的群众多达四五十万人。在义和团席卷京、津的消息传出后，东北、山西、内蒙、河南等地的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壮大。到1900年下半年，南方的广东、广西、云南、四川、贵州以及西北的甘肃、陕西等地，也都爆发了以反对洋教为中心的群众斗争。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急速走向高潮，帝国主义最终选择了武装干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即将拉开序幕。

注释：

①③⑤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页，第56页，第110页，第116页。

②《清史稿》第42册，第12757页。

④《景县志》第14卷，第20页。

八国联军侵华　加深中国的半殖民化

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严重威胁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权益。1900年4月，帝国主义列强以出兵“平乱”相胁迫，要清政府限期严厉镇压义和团，否则将派军进入山东、直隶，代为剿平。

5月间，义和团在京、津地区发展很快，越来越多的清军开始同情并参加义和团，以端王载漪为首的顽固排外势力在清朝内部已占上风。各国公使看到清政府无法控制形势，便策划直接出兵干涉。5月30日到6月2日，英美俄等八国侵略军450多人，以保护使馆为名，陆续由天津乘坐火车开向北京，进驻使馆区。随后，列强不断向中国增兵，集结在大沽口外的俄、英、美、日、法、意等国的军舰有24艘，聚集在天津租界的侵略军也有2 000多人，随时准备发动战争。

6月6日前后，驻华公使们议定的联合侵华政策相继得到各国政府的批准。10日，俄、英、美、日、法、意、奥等八国拼凑2 000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的率领下，乘火车由天津向北京进犯。在京津铁路沿线的义和团及清军董福祥部沿拆铁轨，在落垡、廊坊等地不断进行拦截，杀伤敌军多人。18日，西摩撤到杨村车站，当晚聂士成率领武卫前军和当地团民进行围攻，死伤近40人。22日，在天津租界援军的护送下，西摩尔带领他的残兵败将回到天津租界。在这场狙击战里，八国侵略军被中国军民打死60人，伤228人，粉碎了西摩尔联军进犯北京的计划。

就在西摩尔联军在廊坊遭到阻击时，大沽口外的各国海军将领就密谋侵占大沽炮台。6月16日下午，联军向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要其交出炮台，否则开炮进攻。遭到罗荣光严词拒绝后，联军于17日凌晨发动猛攻，大沽炮台守军奋战迎敌。双方激战6个小时，因守军弹尽援绝，炮台失陷。敌军纷纷从大沽登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此时，进驻北京东交民巷的侵略军，也在北京四处挑衅，开枪射杀团民、清军。一些国家的外交官也亲自参加屠杀活动。

面对八国联军的武装入侵，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对战和问题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光绪帝、军机大臣王文韶、太常寺卿袁昶及地方督抚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认为无力与八国同时开战，主张全力镇压义和团，使八国联军失去进攻的借口。一些见风使舵的官吏，则在“和”、“战”之间依违两可，不表示明确态度。把持朝政大权的载漪、刚毅、那桐等顽固大臣，由于在“废立”问题上与帝国主义有矛盾，则主张利用义和团抗击列强。慈禧太后一时举棋不定，时而派兵武力阻止洋兵进京，时而派兵打压义和团，时而又电诏李鸿章进京商讨对策。在6月16日的御前会议上，她再次宣布暂时停止镇压义和团，声称如果外国人继续进兵，就不惜开战。会后她又按各国公使的要求，派清军严密保护使馆，幻想以此换取外国停止进兵。17日，慈禧太后得到列强“勒令太后归政”的谎报，极为愤怒。随后连续四次御前会议，不顾光绪帝等人的反对，强行决定对外宣战。21日，清政府颁布“向各国宣战谕旨”，声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①]

慈禧太后之所以对列强宣战，完全是从个人权位得失考虑的，只想侥幸冒险一试。当她看到八国联军大量增兵来华后，很快就发生了动摇，于6月29日电令驻外使臣，向所在国政府解释说宣战是出于被迫，“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表示一定“设法相机自行惩办”义和团。[②]这表明，统治者非但没有抵抗侵略的决心，同时也为对外投降做好了准备。

清廷的这种态度，使得地方督抚根本无心抵抗八国联军的入侵。所以，“宣战上谕”发布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拒绝执行。与此同时，督办芦汉铁路大臣盛宣怀代表张之洞、刘坤一，与上海各国领事共同炮制了《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③]这一协定得到了李鸿章、袁世凯、刘树棠等地方督抚的支持，“互保”的范围扩大到两广、两湖、山东、浙江、江苏等省。朝廷“宣战”与地方“互保”看似十分矛盾，但实质上，无论朝廷或地方都是要对内镇压对外妥协。因此，“东南互保”协议制度后，得到了清廷的下诏称许。这就破坏了当地人民的反帝斗争，阻碍了义和团运动向东南各省发展，使帝国主义能够集中兵力镇压北方军民的反抗。

宣战后，清政府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2万石、银10万两，并任命载勋、刚毅等人统帅义和团，成立所谓“总团”，制定所谓《团规》。其中规

定，各地义和团一律受“总团”领导，缴获武器和抓到俘虏必须交给官府，团众应与官军联成一家，不得自行反抗官军的欺压，遇事必须禀告清军统领处理。还规定，凡是不遵守这些“团规”的，就是“假团”，格杀勿论等。清政府企图利用宣战，对义和团加以控制。

八国联军占领大沽后，大举进犯天津。天津地区的清军和义和团拆毁了通往北京和塘沽的铁路，切断对外的电报通讯，阻止侵略军前进，并团团围困了敌军的大本营紫竹林租界。租界内联军凭借优势火力进行顽抗，至26日，又陆续得到大批侵略军的增援，共达12 000余人。得到援助后，侵略军开始反守为攻，27日起攻打租界东面清政府在华北最大的兵工厂东局子。新城团民首领王德成率部赶来增援，守军与团民首先重创前来攻局的2 000余名俄军，随后又打退800余名救援的英军、美军和日军。在激烈的战斗中，局内的弹药库被敌军击中，爆炸起火，守军伤亡惨重，被迫撤出了东局子。

在老龙头火车站一带，曹福田率数千人向盘守在车站的俄军发起猛烈攻击，以大刀、长矛之类的冷兵器与俄军的优势火炮相拼，激战了10个多小时，一度夺回车站和以北沿线全部据点。侵略军得到重兵增援后发起了反攻，车站几次易手。29日，曹福田联合附近清军，以及从独流镇赶来的张德成所部团民共同作战，几度占领了火车站。7月初，直隶总督荣禄召集曹福田、张德成、聂士成、马玉崑计议，决定由曹福田部和马玉崑继续攻打火车站，聂士成和张德成部进攻紫竹林租界。7月6日，聂士成军从天津城南迂回到租界西南方发起进攻，猛烈炮轰侵略军，打得敌人十分惊慌。然而，八国联军不断增兵，到7月上旬已经达到18 000余人。在这危急时刻，清政府任命宋庆为帮办北洋军务大臣前来主持天津战事。宋庆刚到天津城郊，就指使清军对义和团展开杀戮，导致使义和团腹背受敌，进退失据，死伤惨重。9日，联军分兵三路冲出租界，从背后袭击聂士成部。聂士成率部誓死抵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其余部众和团民也大多为国捐躯。第二天，宋庆进入天津城，相继捣毁城内各坛口，使城内的防御力量大为削弱。13日，联军乘势向天津的南门和东门发起猛攻，裕禄、宋庆、马玉崑等率部逃往杨村。14日，1.4万多名侵略军占领了天津城，天津陷落。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设立“天津临时政府”（即天津都统衙门），由俄、英、日三国军官组成“临时政府委员会”，对天津及周边地区进行了殖民统治。

正当天津义和团和清军与八国联军激战之际，北京义和团和清军对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发起的围攻。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和清军对使馆区

侵略者的憎恶，鼓动他们去攻打使馆，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对各国公使干涉她的“废立”计划进行报复，并非真的有了坚决抗击列强的决心。但这一举动给清政府造成了政治上的被动，也给列强增加了扩大侵略的借口。当看到列强步步扩大战争时，慈禧太后很快从“主战”中摆脱出来，转战为和。特别是天津陷落后，慈禧求和心意更加迫切。她命荣禄荣禄对使馆明攻暗保，派人给各国送去粮食和水果蔬菜，进而派人求和。结果，数万军民围攻使馆56天，教堂围攻了63天，竟一直未能攻下。慈禧后来供认，自己“处处都留着余地”，还说：“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④

8月4日，侵略军集结2万多人，沿运河两岸向北京推进。惊慌失措的慈禧太后加紧向侵略者求和。她正式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代表，并禁止京郊义和团继续进城，同时把城内外一部分义和团调往前线，让团民和侵略军相互削弱。前线的部分清军出于爱国义愤，坚持与义和团合力阻击八国联军，北仓一战就歼灭敌人数百人。但因裕禄、宋庆、马玉崑等部相继溃退，北仓、杨村先后落入敌手。8月6日，帮办武卫军事务大臣李秉衡寿命出京抗敌，节制从湖广、两江、山西等地调来的“勤王师”。9日，他率领各军在河西务与联军交战，但这些临时应命之师不听调度，很快就不战自溃。李秉衡退至张家湾，自杀身亡。8月14日，联军贡献了北京城。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和一些王公大臣，已于当天早晨仓皇西逃。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和北京后，陆续向中国增兵达到10万余人，任命德国的瓦德西为联军统帅。9月25日，瓦德西到达中国后，以北京基地，派兵四处扩大侵略，东占山海关，南犯保定，北侵张家口，西扰娘子关。联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从大沽到北京，“沿途房屋未经被毁者极为罕见，大都早已变成瓦砾之场”⑤天津城陷落后，联军肆意屠杀百姓，抢劫财物更是极为普遍。最可恶的是，联军在占领北京后，竟特许士兵公开抢劫三天。事实上，直到联军撤退之日，抢劫活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从将军到士兵，甚至公使和传教士都参与了这一无耻暴行。日军仅从清政府的国库（户部）中，就抢走263万两银子；北堂的法国大主教樊国梁，一次就从户部尚书立山家里掠走了价值100万两的财物。此外颐和园里的大量物品，也惨遭毁坏和抢劫。八国联军犯下的滔天罪行，连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⑥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发生以后，整个北部中国的反帝斗争日趋高涨，山

东、山西、河南、内蒙古的反教会斗争迅猛发展。其中声势最大的是当属东北义和团，他们怀着沉重的民族仇恨，英勇地抗击着俄国侵略军，最终粉碎沙俄在东北建立"黄俄罗斯"的美梦。但是，慈禧太后在逃亡途中公开向帝国主义悔过讨好，下令对义和团"严行查办，务净根株"。从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联合起来，共同镇压各地义和团。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就这样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失败了。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产物。义和团运动从兴起到失败，一直受到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打压，其最终失败的结局充分地说明了，在腐朽的清朝封建制度下，任何"正义者是不可能战胜非正义者的"，[7]这是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所使然。这也从另一角度表明，时代需要更先进的阶级来引导中国人民来完成反帝反封的历史重任。

义和团运动尽管失败了，但它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打击了列强的嚣张气焰。与此同时，它还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客观上加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可以说，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50年后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铺垫，其伟大的历史功绩是不容置疑的。

在北京陷落之前，清政府已经任命李鸿章为谈判全权大臣。8月27日，又增派奕劻为全权代表，名列李鸿章之前，急切地期待着与列强议和。25日，慈禧太后宣布放任义和团的载漪、载勋、刚毅、赵舒翘等亲贵大臣，加派刘坤一、张之洞参加谈判。

1900年12月24日，俄、英、美、德、法、意、奥、日等侵华八国以及西班牙、比利时、荷兰3国以同文照会的形式，向清政府提出了"议和大纲"十二条，这个大纲基本上包括了后来正式条约的主要内容。李鸿章等把它电告逃往西安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见条款上没有将她作为祸首加以惩办，喜出望外，立即电谕奕劻和李鸿章"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8]1901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王朝，与俄、英、美、日等11个国家的公使，在北京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共有12款，19个附件，主要内容如下：

（1）清政府向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9.8亿两。加上各省地方赔款2 000多万两，总数超过了10亿两，赔款以海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赔款，史称"庚子赔款"。从此，清政府的重要税收，除了田赋以外，几乎全被帝

国主义控制了。

（2）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规定中国人不准在此居住，帝国主义可以在此驻兵。使馆区事实上成了“国中之国”，成为帝国主义策划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各国公使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

（3）拆毁大沽炮台及北京道大沽沿路的所有炮台，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12个战略要地，由各国派兵驻守，天津周围20里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等。这样就解除了京畿的警备，使北京的大门洞开，侵略者可以随时对清政府进行军事控制，直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

（4）惩办“首祸诸臣”，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各种组织，“违者皆斩”。地方官吏如果对反帝事件弹压不力，“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这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助长了帝国主义、外国传教士的嚣张气焰。从此，清政府更加成为帝国主义的驯服的工具。

（5）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专门办理对外事务。外务部地位的提高，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

《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深沉的不平等条约，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对于这样一个空前屈辱的条约，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却全盘接受，还向列强表示今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⑨]这表明，清朝统治者已经腐朽到了极点，甘愿做帝国主义国家的衷心奴才，清政府实际上成了“洋人的朝廷”。从此，中国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完全勾结起来，共同奴役中国人民，中国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深渊。当然，它也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清政府的腐朽与软弱，也促使着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逐渐觉醒。

注释：

①②《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3页，第203页。

③《愚斋存稿》第36卷，电报13，第5页。

④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义和团》第3册，第438页。

⑤《瓦德西卷乱毛记》，《义和团》第3册，第29页。

⑥《义和团》第3册，第18页、第34页。

⑦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第205页。

⑧《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经945页。

⑨《清德宗实录》，第477卷，第15页。

孙中山的早期思想与活动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是从孙中山开始的。

孙中山（1866年~1925年），原名孙文，留居日本期间曾化名中山樵，后来以中山为号，人们称他为孙中山。他是广东香山人（今中山）人，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青少年时代的孙中山，曾参加过农业生产活动，这使得他对中国农民的苦难有着较深的体会，并逐渐对农民悲惨的遭遇产生了同情。1879年，孙中山和母亲远赴檀香山投奔他的哥哥孙眉。在华侨资本家孙眉的资助下，进入了在当地的教会学校读书。在檀香山的读书经历，开阔了孙中山的视野，使他接触到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1883年，孙中山回国。回到祖国后，他先后在香港的中央书院、西医书院就读，189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西医书院。

在接受西式教育的过程中，孙中山产生了以西方国家为榜样改良祖国和拯救同胞的愿望。后来，他在回忆少年时代的求学经历时说："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熟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学，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回国同学数人互谈衷曲，而改良祖国同胞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比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1]

中法战争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他产生了反清思想。他经常和同学们讨论时局，抨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称赞农民领袖洪秀全为"反清第一英雄"，常以"洪秀全第二"自居。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还没有找到改良祖国、拯救同胞的灵丹妙药。1892年，他在澳门行医，受到澳门葡籍医生的排挤，第二年他赶赴广州。在广州行医期间，孙中山曾与陆皓东、郑士良等人集会，酝酿创立兴中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但还没有具体的组织形式和活动计划。1894年6月，他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治国大计。但李鸿章将孙中山的投书束之高阁，且拒绝接见他。上书的失败，促使孙中



山毅然抛弃了和平改革的幻想，走上革命的道路。

同年秋冬间，孙中山由上海赴檀香山，联合华侨20余人，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895年春，孙中山回到香港，与当地进步社团辅仁文社合作，成立兴中会总部。兴中会在章程中，揭露了清朝统治的腐朽无能，指出中国正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危机。在会员入会的秘密誓词中，孙中山还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决心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兴中会的成立，是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活动的正式开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端。

香港兴中会总部成立后，正值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时期，举国悲愤。孙中山和他的同志深受这一形势的鼓舞，认为起义的时机已成熟，于是立即联络广东各地会党、绿林和防营，准备发动广州起义。经过半年的酝酿，预定在10月26日重阳节举事，夺取广州为根据地。起义前夕，因内部步调参差，消息泄露，参加起义的群众70多人被捕，陆皓东等人被捕殉难，孙中山被迫流亡。

当时兴中会的革命活动，仅仅局限在海外和广东等地，没有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因此并没有产生多大的社会影响。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逃往日本，在华侨较为集中的横滨建立了兴中会分会。1896年10月，孙中山经檀香山到达英国伦敦。抵达英国后不久，就被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人员绑架，困在了公使馆内，后在其老师康德黎的营救下才得以脱险。这次囚禁事件，使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逐渐为人所注目。在欧美的这段时期，孙中山接触了当时流行的各种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了解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受到了工人运动的深刻影响，他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897年，孙中山由英国赴加拿大转赴日本，在东京、横滨等地宣传革命，结交同志，但成效不大。当时，国内正值维新运动发展高潮。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先后逃亡日本，成为清廷缉捕的国事犯。孙中山此时也在日本，他认为康、梁经此事变，一定会改弦更张，从保皇立宪转为反清革命，于是主动联系，希望能够与两人合作。康有为声称自己带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不愿与革命党人联系，拒绝联合，并前往加拿大等地建立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鼓吹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梁启超则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大力抨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介绍西方的政治学说和思想文化。从1899年~1903年，他先后发表了

《爱国论》、《少年中国说》、《积弱溯源论》、《过渡时代论》、《新民说》等几十篇思想新颖的文章，提出“国民与奴隶”、“朝廷与国家”、“国民与国家”、“权利与义务”等新概念，强调人民的主权，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还说中国几千年来只有奴隶；没有国民，只有朝廷，没有国家。这些新鲜的观点大受知识分子欢迎，他也被誉为思想舆论界的“骄子”。与康有为坚决拒绝革命的态度不同，梁启超一度表现出对革命的热情，因此与孙中山来往密切，曾有过联合立会的计划，拟以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因为康有为的强烈反对，计划没有实现。

1900年8月，以唐才常为代表的原维新派中比较激进的一些人准备在长江流域起事，得到了孙中山、梁启超两派的一致支持。唐才常到达上海后，发起了“正气会”，后改名为“中国国会”，选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主张推翻清朝政府，“请光绪帝复辟”，建立君主立宪的“新自立国”。唐才常在长江流域一带联络会党，组织了自立军七军，决定在8月9日在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同时举行起义，推翻清政府，“请光绪帝复辟”。但由于海外汇款未到，起事日期一再推迟，以致军机泄露，8月下旬，唐才常等200余人被张之洞杀害，自立军失败。自立军起义的失败，使一些受康有为影响，徘徊于革命与改良之间的进步人士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就在唐才常在华中策划起事期间，孙中山于1900年7月中旬召开会议，决定利用义和团的形势，在惠州再次组织武装起义。计划由革命党人郑士良等赴惠州组织起义，邓荫楠、史坚如等赴广州准备组织策应。郑士良在惠州、潮州、嘉应等地，联络会党和绿林首领，并在惠州的三洲田建立起义根据地，组织了一支600余人的队伍。然而起义尚未发动，就走漏了消息，清军加强了防备并向三洲田根据地进窥。

10月6日，起义正式发动。郑士良率起义军接连打败清军，一度占领了惠州一带沿海地区，队伍迅速扩大到2万余人。但此时起义军的粮饷和弹药都发生了困难。孙中山试图借取已经商定的菲律宾独立军存放在日本的军械，以支援惠州起义军，但到手后才发现这批军械全是废品。日本政府唯恐孙中山在台湾的活动危及它殖民统治，也下令禁止武器出口，孙中山自海外接济起义军的计划因此落空。见接济武器无望，孙中山只能令郑士良向厦门方向进军。起义军血战半月之后，弹尽援绝，被迫解散，郑士良等人退到香港。



惠州起义尽管没有取得胜利，但它却起到了重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孙中山后来回忆这次起义时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惠州起义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如天渊”②。这从侧面反映出，民主革命事业逐渐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众多的爱国知识分子日益倾向革命。

1903 年，民主革命思潮勃然兴起。康、梁对此极为恐慌，接连发表文章，攻击革命，企图扑灭革命火苗。早在 1902 年春，康有为已嗅到革命风暴的将起，为了反对革命，他急忙写了一封公开信《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并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在这篇文章中，他竭力为清王朝的统治辩护，把清政府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美化成“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各国所未有”的“至仁之政”。在他看来，中国民众愚昧，只能实行君主立宪，不可倡导民主共和，否则就会“天下大乱”和“亡国灭种”。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经过一段短暂的徘徊之后，很快又回到他的老师的立场上。1903 年，他写了《敬告我国民》、《论私德》、《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论俄罗斯虚无党》等文章，放弃了一度宣扬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打出了“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旗号，以迷惑群众，扩大保皇阵地。

针对康、梁等保皇派的言论，孙中山在美洲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03 年，他亲自赴檀香山，整顿革命组织，宣传革命思想。之后，他在《檀山新报》（俗称《隆记报》）上连续发表《敬告同乡书》两篇文章，批判保皇言论。在《敬告同乡书》一文中，他针对梁启超散布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言论，指出：康、梁均蒙光绪皇帝的恩泽，他们要感恩图报，因此不可能“名为保皇，实则革命”，这不过是梁启超的一种宣传手段。如果不信，可以读康有为的《最近政见书》（即《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它就是“劝南北美洲华商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只可死心塌地以图保皇立宪”的。孙中山客观地指明，梁启超一时间鼓吹的“破坏”、“革命”并非是有意的政治欺骗，而是由于他受到了革命风潮的激荡，“偶失其初心，背其宗旨”。既然如此，那么他就不可能“真有反清归汉、去暗投明之实心”，“其所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亦伪矣”。他还在文中指出，革命和保皇是两条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没有折中可调和的余地，“革命、保皇

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③

他的另一篇文章《驳保皇报书》，则驳斥了《新中国报》刊载的陈仪侃的《敬告保皇同志书》所散布的谬论，着重批判了先立宪后共和的渐进论。他在文章中以火车在中国的应用作比方，强调时下应直接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立宪政体，而不是走先行君主立宪，再发展为民主立宪渐进式发展道路。他说：“试观中国向未有火车，今日始兴建，皆取最新之式者。若照彼之意，则中国今日为火车萌芽之时代，当用英美数十年前之旧物，然后渐渐更换新物，至最终之结果乃可用于今日之新式火车，方合进化之次序也。世上有如是之理乎？……今彼以君主立宪为过渡之时代，以民主立宪为最终之结果，是要行二次之破坏，而始得至于民主之域也。以其行二次，何如行一次之为便耶？……夫今日专制之时代也，必须破坏此专制，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宪也。既有力以破坏之，则君主民主随我所择。如过渡焉，以其滞乎中流，何不以棹而登彼岸，为一劳永逸之计也。”④

《敬告同乡书》、《驳保皇报》这两篇文章，是孙中山最初与保皇派公开论战的开始。他通过这些文章，在基本问题上划清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界限。在此之前，孙中山并不屑于笔墨之争，他说：“仆非文士，本不欲与八股书生争一日之长，兴笔墨之战；但以彼无根之学，以讹传讹，惑世诬民，遗害非浅，故不得已而驳之。”⑤这也反映出，他正试图摆脱以往秘密小团体反清斗争的相对封闭状态，而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了，对革命思想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1904 年 1 月，孙中山在火奴鲁鲁温逸街创立中华革命军，革命军的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字最早是在 1903 年 8 月提出的。当时孙中山在日本青山建立军事学校，这著名的十六字宗旨是作为学生入学时的宣誓词而出现的。后来，它成了同盟会的纲领。

在檀香山，孙中山加入了致公堂。致公堂是檀香山和美洲天地会的堂名，是华侨中的会党组织，这为孙中山联络其他会党组织提供了方便。1904 年 3 月底，孙中山赶往美洲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在旧金山，他得到了致公堂总堂大佬黄三德的大力支持。由于黄三德的支持，孙中山对由保皇派控制的机关报《大同日报》进行了大胆改组，把该报的主编改派由革命分子刘成禺担任，使之成为革命派的报纸。之后又修改了致公堂的章程，以“驱除

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企图使这个封建色彩较浓厚的民间会党变成一个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团体，但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随后，他在黄三德的陪同下，游历美国，进行革命宣传。他在美国进行了8个月的宣传活动，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后来他在一封信中说：“近在苦战之中，以图扫灭在美国之保党，已到过五六处，俱称得手。……保毒当梁贼在此之时，极为兴盛，今日渐渐冷淡矣。”⑥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除了在美洲与保皇派进行论战外，还在南洋、香港和缅甸等地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使革命派在华侨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虽然这一时期，对保皇派的保皇言论的批判还是初步的，说理未必清晰明透，但在一些基本原则上，已大致划清了与保皇派的界限，革命派正是在批判和斗争中形成的，并不断地扩大自己的阵营，这就为革命团体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和组织条件。

注释：

①孙中山：《非学问无以建设》，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2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141页。

②《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第2版），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页。

③孙中山：《告同乡书》，《孙中山选集》第1卷，第231～232页。

④⑤孙中山：《驳保皇书》，《孙中山选集》第1卷，第236～238页。

⑥孙中山：《复黄宗仰函》，《孙中山选集》第1卷，第240页。

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与革命团体的出现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许多进步的中国人认识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开始有了新的认识。首先觉醒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

中国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出现于20世纪初，是伴随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这个群体，或说阶层，主要是由国内兴办各类新式学堂的学生和海外留学生构成。据统计，这一时期，国内各级学堂的学生，已经发展到了130万余人，远远超出了科举取士时代的知识分子数量。同时，在欧美和日本留学的青年人数也在迅速增长。20世纪最初的几年，出现了留学热，其中日本的留学生人数增加最多。日本所以成为中国学生向往的留学场所，除了因为日本是中国的近邻，还因为日本学习西方很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学习先进技术，一时间出现了“父遣其子，兄勉其弟，航东负笈，络绎不绝”的热闹景象。1901年留学日本的学生仅有274人，至1905年达到8 000人，1906年增至12 000人，增加了几乎近百倍。

为了获得救国的药方，这些留学国外的中国学子进行了紧张而艰苦的探索。他们以满腔的热情，积极学习外国文化知识，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西式教育。在价值取向上，他们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的“欧风美雨”的滋润，把美、法革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同和赞赏，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边，逐步成为民族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代言人。在民族危亡日益加重的形势下，他们对国家的贫困和落后，有着自己深刻的体会。在爱国激情的促使下，他们渐渐对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和残酷现实产生了不满，于是纷纷投身于反清革命的行动之中，成为走在时代潮流前头的革命先行者。他们的出现大大加强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社会基础，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的发展。

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如狂飙突起，得到了迅速传播，震撼着中国的思想界，推动着民主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而传播民主革命思潮的骨干力量，就是正在形成和壮大的新知识分子群体。从1901年到1905年，青年知识分子和留学生最为集中的日本和上海，是他们宣传革命思想的两个主要基地。

1903年前后，在他们中间兴起了翻译介绍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和各国民主革命历史的热潮，出现了不少的译书团体。短短几年之内，出版翻译的译著多达530余种，其中多为政治、哲理、教育等方面的书籍。如卢梭的《民约论》、美国的《独立宣言》以及法国的《人权宣言》等等。除了成立译书馆，翻译外国书籍之外，他们还利用报刊，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和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开智录》、《国民报》、《中国日报》、《游学译编》、《二十一世纪之支那》、《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直说》等130种。这些报刊的内容，主要是宣传严重的民族危机，介绍西方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历史等学说。它们从不同角度抨击清政府丧权辱国、昏庸腐败，宣传民族主义和民主共和思想，鼓吹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并提出了挽救中国危亡的具体方案。这些革命报刊与书籍一样，在国内外销售，传播革命舆论，从而起到了激发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作用。

在同盟会成立之前，经过革命派的不懈努力，革命书刊已经达到了风行全国的地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革命书刊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将出现新的发展高潮。在这些宣传革命思想的宣传读物中，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对启发人们的民主觉悟，组织和壮大革命队伍，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影响力最大。

章炳麟（1869年～1936年），原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他早年深受维新派思想影响，参与了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后前往日本，思想开始转变，逐渐倾向于革命。他写了《客帝匡谬》一文，检讨了自己过去主张拥戴清帝的错误，在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1903年，他在上海《苏报》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批驳了康有为的保皇观点。针对康有为关于中国"公理未明，旧俗俱在"，"因而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的观点，他提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

即以革命去之。”关于保皇派“革命会招致流血牺牲”的说法，他以各国革命的事例说明，革命中流血是不可避免的。他称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泄兼备之良药矣”，相信中国人民在革命以后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邹容，字蔚丹，四川巴县人。1902 年，邹容到日本留学，积极参加了留日学生所发起的革命运动，并大量阅读西方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1903 年 4 月，回到上海，参加了爱国学社的革命活动。与此同时，他以炽热的革命热情，通俗明快的文字，犀利酣畅的笔调，写下了被誉为近代中国“人权宣言”的《革命军》。在书的自序中，邹容自称是“革命军中马前卒”。《革命军》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学说为理论基础，热情歌颂革命，号召推翻专制、卖国和种族压迫的清政府，建设一个独立民主的中华共和国。他论述了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明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他还从天赋人权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国民是权力的主体”的观念。他将未来的民主共和国定名为中华共和国，提出在这个国家中，“无论男女，皆为国民”，男女一律平等，享有言论、思想、出版等权力，又有纳税和保卫国家的义务，实行议会制、地方自治，并以西方宪法为参照制定中华共和国宪法，对外独立自主，与各国平等。《革命军》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风行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警世钟》、《猛回头》的作者是留日学生陈天华。陈天华（1875 年 ~ 1905 年），字星台，湖南新化人。他于 1903 年赴日留学，到东京后立即投入爱国革命运动，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回国后，他怀着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和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写下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以通俗易懂的笔调，精辟地论述了中国必须进行民主革命的道理。他在书中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瓜分中国的危急形势，指出了民族危机的极端重要性，“须知这瓜分之祸，不但是亡国罢了，一定还要灭种”，“不在这时，拼命舍死保住几块地方，世界虽然广大，只怕没有中国人住的地方了”。对于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他也尖锐地批判指出：“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因此，要抵抗帝国主义国家入侵，挽救民族于水深火热之



中，就要进行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他号召人民正确区分“国”与“家”的关系，“国家是人人有份的”，并认为要救国就得先学习西方，“越恨他，越要学他，越学他，越能报他，不学断不为爱国、救国而革命”。《警世钟》和《猛回头》宣传的爱国思想炽热激进，观点鲜明，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人们争相传颂，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的锐利武器。

在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传播过程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她就是女革命家秋瑾。她十分痛恨封建的旧礼教，指出妇女们“沉沦在十八层地狱”、“成为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同时，她还非常厌恶封建社会宣扬的“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道德伦理观念，对其进行了严厉批判，号召妇女起来砸碎封建礼教的枷锁。她强调指出，妇女要获得自由，就必须有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想自立就必须参加革命。她大声疾呼：“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孩须一例担。”[①]秋瑾还积极参加各种反清革命的运动，在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中有着非常独特的作用。

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引起了清王朝统治阶级的恐慌。1903 年 6 月，上海《苏报》连续刊文介绍《革命军》，还发表了章炳麟的《序〈革命军〉》，这使得中外反动势力极为震怒。于是，他们勾结上海租界工部局，逮捕了章太炎。邹容出于义愤，自动投案。7 月 7 日，《苏报》被封。清政府要求工部局将章、邹等引渡，解往南京审讯。列强深怕引渡行为会影响他们在租界的特权，断然拒绝了清政府的要求。经会审公廨的“审判”，章太炎被判监禁 3 年，邹容被监禁 2 年。1905 年 4 月，邹容因不堪虐待死于狱中，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就是震动一时的“苏报案”。清政府本想借“苏报案”将当时国内方兴未艾的革命思潮扑灭，结果却适得其反。“苏报案”后，革命分子将《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收集在一起，题名《章邹合刊》，各地争相翻印，进一步扩大了革命思想的影响。

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涌现，各种革命读物和报刊的广泛流传，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准备了有利的条件，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在国内相继出现。1903 年，留日学生秦毓鎏等组织了一个 20 余人参加的小团体——青年会。它“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②]他们参加了 1903 年的拒俄运动，成为“拒俄义勇队”的成员。运动失败以后，义勇队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为宗旨。不久，

军国民教育会决定派一部分人员回国策动武装起义，其成员黄兴、龚宝诠回国后，分别在长沙、上海组建了革命团体华兴会、光复会。

华兴会是黄兴创建的。黄兴（1874 年 ~ 1916 年），原名轸，号廑午，后因进行革命活动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改名兴，字克强 ，湖南善化人。1898 年入武昌两湖书院学习。1902 年，黄兴被张之洞派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还积极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

1903 年 5 月，他离开日本回国，在长沙明德学堂任教员，同时积极奔走，从事民主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11 月 4 日，黄兴 30 岁生日，他邀请革命分子刘揆一、章士钊、秦毓鎏、宋教仁、陈天华、彭渊洵、翁巩等人，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洵家中为他祝寿。在宴会上，他们商定建立革命组织华兴会，从事推翻清政府封建统治的活动。1904 年 2 月 15 日，华兴会在明德学堂董龙璋的西国寓所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的有 100 多人。会议推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当时，两湖地区参加华兴会的知识分子多达 400 多人。华兴会还建立了两个外围组织，以湖南著名的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建立的同仇会，作为联络会党的组织，又设黄汉会以联络军界。

华兴会成立不久，黄兴等人就联络当地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准备在慈禧太后 70 岁生日时发动武装起义。他们商定在举行祝寿的皇殿中预先埋好炸弹，炸死前来行礼的全省高级文武官员，乘机起义，占领长沙。黄兴被推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任正副总指挥。同时他们还派会员分赴江西、安徽、江苏等地联络革命党人，建立起义联络机关。但由于起义计划泄密，清朝地方官府在各地搜查革命党人，马福益被捕遇害，黄兴化装逃往上海，不久转赴日本。

1904 年 7 月，湖北革命志士刘敬安、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暗中从事革命活动。在他们看来，“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队伍不可”。[③]经过他们的宣传和鼓动，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弃笔从戎，在新军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华兴会计划举行起义时，曾与科学补习所取得联系，准备在起义时，同时响应。后来华兴会的起义计划失败，科学补习所也受牵连，被迫停止了活动。于是，刘敬安等人利用有合法地位的教会阅览室——日知会，继续进行革命宣传，暗中联络同志，在 1906 年春重新组织了秘密的革命团体，名称叫日知会。

1904 年 10 月，在东南地区成立了另外一个革命新团体光复会。早在

1903 年冬，在东京的浙江留学生陶成章、龚宝铨曾两次密商，认为日俄战争即将爆发，正是进行革命活动的大好机会，应该组织革命团体，用暴力发动武装起义。他们回国后积极奔走，联络东南地区的秘密会党。1904 年 10 月，龚宝铨在上海组织了暗杀团，但人数很少，难以开展活动。陶成章到上海后，与龚商量，决定成立革命团体，以壮大力量。11 月，光复会正式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任会长。光复会积极宣传排满思想，以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以暗杀和武装暴动为革命的主要手段。其成员大多是浙江籍人，且多为知识分子及会党成员和商人、手工业者，也有少数的地主士绅。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浙江、安徽和上海等地。后来，光复会在日本成立了分会，参加者达数百人。

1904 年前后，其他地方先后成立了一些革命小团体，如江苏的强国会、安徽的岳王会、四川的公强会、福建的汉族独立会、江西的自强会、贵州的科学会等等。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小团体的增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位全国性革命政党的建立做好了准备。

注释：

①《秋瑾集》，中华书局，1960 年版，第 5 页、第 14 页、第 130 页。

②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 102 页。

③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 55 页。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1903年，在爱国知识分子向革命方向转变时，就已经有人提出要建立全国性政治团体的建议。《汉声》杂志刊载的《论中国合群当自地方自治始》一文中，就提出了“由小群而进为大群”、“由此而联为最大之团体”。[①]邹容在上海筹划组建了一个学生团体——中国学生同盟会，因邹容被捕入狱，该组织没有建立成功。此外，安徽学生还有过成立“国民同盟会”的计划。这些计划中的组织虽然只是具有革命倾向的政治团体，还不是革命政党，但实际上，它们已经与政党组织的建立相差不远了。

1904年以后，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纷纷成立。在革命斗争中，他们认识到要想革命活动中取得胜利，各党派和组织之间就必须联合起来，一致行动。于是，他们把建立统一的政党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1904年12月，黄兴联络留日学生100多人组成革命同志会。第二年，宋教仁和白逾桓、田桐、程家柽等30人创办鼓吹排满革命的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也汇集了各省籍的学生，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革命团体。这份杂志后来被当作同盟会的机关报，它的成员大多加入了同盟会。这在客观上为新的统一政党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准备条件。而此时新的革命政党的成立，迫切需要一个各方都公认的革命领袖。这位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就是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的确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革命领袖，被奉为“革命始祖”。他最先创立了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在10年前他就首唱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孙中山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革命声誉，而且他最早提出了完整的革命纲领。1903年8月，他在日本东京青山创立革命军事学校时，首次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他在一封复友人的信中说，已将这十六字作为“联盟革命人”的誓词。这是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同时，孙中山长期居住在海外，

对西方国家的情况及近代社会政治学说的认识比一般人要深刻得多，对革命的前途和目标有着透彻的见解，因此他很快就成为了公认的革命党领袖，成为团结各方面革命力量的中心人物。

1905年7月，孙中山到达中国留学生集中的日本东京。在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介绍下，他结识了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很有影响力的黄兴，两人共同商讨建立革命组织的问题，黄兴对此表示赞同。7月28日，孙中山与宫崎寅藏到《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会见宋教仁和陈天华，再次谈到了组织全国性革命组织的重要性。他说："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谈话表明，此时孙中山已经把工作重点放在联络知识分子和建立统一的政党上面了。30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70余人在东京召集会议，讨论建立全国性的革命团体问题。会上，孙中山、曹亚伯、黄兴先后发表演说，阐述革命理由、革命形势和方法及革命后如何建设等问题，随后讨论建党事宜，孙中山提议取名中国革命同盟会。黄兴则认为这是个秘密团体，不宜用"革命"二字，于是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又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有些人建议取消"平均地权"四个字，后经孙中山的耐心解释，大家鼓掌通过。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灵南坂日本国会议员阪本金弥的家宅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100余人。黄兴在会上宣读了同盟会章程30条，经讨论后有所增删。章程规定会名为中国同盟会，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章程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并借鉴留日学生会馆的组织形式，制定了一套权利互相制约的组织系统。最高领导人称为总理，由全体会员投票选举产生，四年更换，可连选连任。总理之下设执行、司法、平议三部。总理直接掌管执行部，下设庶务、内务、外务、书记、会计、调查六科，各科职员由总理任命。根据同盟会总章的规定，同盟会本部暂设于日本东京，在各地设支部。支部分为国内之部和国外之部。国内分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支部下按省设立分会；海外华侨分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支部下按国别、地区设立分会。

同盟会的主要成员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据统计，1905年~1907年三年间加入的会员，出身可考的有379人。其中，留学生和学生354

人，官吏及有功名的知识分子10人，教员、医生8人，资本家、商人6人，贫农1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总数98%以上。1905年～1906年，担任同盟会各省主盟人者，先后共有45人，均是具有鲜明的民主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而其中的领导力量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②]

同盟会是一个有明确政治纲领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其总章中写明："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中，明确指出，这次革命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它强调这是一次"国民革命"，最终目标是要结束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将同盟会的16字政纲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即"三民主义"，并宣布将三民主义"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次年，孙中山在为同盟会制定革命方略而写的《军政府宣言》和《民报》创刊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讲中，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三民主义的提出标志着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已经成熟，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有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基础。

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互相联系而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形成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反映了当时的世界潮流，也回答了中国如何应对所面临的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社会改革三大历史任务。

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体系中的首要问题。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推翻以满洲贵族为首的腐朽卖国的清王朝，建立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其基本精神是要求民族平等，反对国内外的民族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与和睦共荣。孙中山批判了革命党内存在的片面的"反满"思想，他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加入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③]这说明，民族主义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它不是一般地反对异族统治，而是要以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代替旧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而这正是民族主义的精髓所在。它远远超出了以单纯地"排满"为主题的狭隘民族主义眼界，具有挽救民族危亡，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现实政治意义。

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创立民国"，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



阶级共和国，实现资产阶级为领导主体的人民自主的民主权利。孙中山认为，封建君主专制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不可调和的敌人，二者是水火不容的。就是说，推翻帝制乃是国民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前提。他在《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全面解说，他指出："……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将来民族革命实行以后，现在的恶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扫而尽，却是还有那恶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忍受。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他还强调指出，民族主义必须和民权主义结合起来，一次完成。他说，"我们推倒满清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要把它分作两次去做"。④

民权主义的目标是建立民国。在《军政府宣言》中，他对建立民国的基本原则做了简要说明，"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民国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而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共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言下之意，就是要建立一个美国模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它将实行共和政体，在这个政体下，保证"平民"享有参政权。

然而，要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建立共和制度，并非易事。革命派认为，在革命后不可立即实现完全的共和制，需要循序渐进地实现。为此他们设计一个逐步实现共和制的方案：分三个时期，依次进行。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由军政府管理国家，扫除旧污，为期3年；第二期为约法之治，中央由军政府管理，地方实行自治，为期3年；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军政府解散，由符合宪法的国家机关管理国家。应该说，这种设计在当时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因为武装革命后，不仅需要一段时间稳定新秩序，而且建立共和制民主国家，需要考虑到国民程度和适应过程。民权主义的提出，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迫切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

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都是政治革命，民生主义则是"社会革命"即实行社会经济组织的革命，它的核心是"平均地权"。《军政府宣言》解释它说："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⑤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包含着如下几项基本思想：（一）鉴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和劳资的尖锐对立，他认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因此，中国革命不能停留在“媲迹于欧美”上，而应“睹其祸害于未萌”、“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6]（二）根据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学说，资本主义之所以产生各种社会问题，是“因为没有解决好土地问题”。为了“预防”贫富的分化和对立，解决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后的迫切任务。（三）在他看来，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定地价的法子”，也就是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所有，将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土地增价归于国家。（四）中国实行平均地权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或平均地权，是防止资本主义贫富分化的一种社会政策，但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案。这个方案后来没能实行，但是它仍有重要意义，它表明孙中山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时，也在探索如何用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的弊端。虽然在当时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不够深刻，但是这对他后来的思想的发展影响了很大。二十年代他提出了联俄、联共的主张，使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

以三民主义为标帜的同盟会纲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较为鲜明和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纲领。它是孙中山按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总结中国和西方历史和经验，而设想的“完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社会制度思想的集中概括。它主张通过革命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这不仅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主题。因此，它成为后来指导辛亥革命的纲领。

但它又是一个不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它主张民族主义，但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口号，反封建主义也不彻底，特别是它没能提出废除封建土地占有制的主张；它提出了民权主义，但又不敢依靠广大工农群众，仅仅靠民族资产阶级自己在奋斗；它主张民生主义，但又缺乏使农民获得土地的内容，满足不了广大农民阶级的利益和需求。这些弱点，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的。

三民主义纲领提出以后，同盟会会员对此态度各异。有的只接受民族主义，对民权、民生两大主义表示淡漠；有的人只接受民族、民权“二民主

义”，对民生主义不感兴趣。除此之外，同盟会所涉及的组织系统，也始终没能完整地建立起来。它规划的国内五个支部，除了南支部外，其余都没能建立起来。各省区的支分会，不仅不健全，且互不联络，处于各自为战、各行其是的状态。组织上的不完善自然削弱了同盟会的整体力量。

尽管同盟会存在着不少的缺点，但它的成立毕竟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件重大事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坚持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立场，团结和发展了革命力量，使中国革命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和统一的指导思想，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促使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同盟会的成立及其纲领的形成，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注释：

①《汉声》。

②《中国同盟会初成立时主盟人统计》，《近代史资料》，1957（6）。

③④⑤《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79～80页，第325页，第297页。

⑥《孙中山全集》（第2版），第76页。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武装暴动

同盟会成立后，一直把发动武装斗争作为全党工作的重心。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朝气蓬勃，积极开展各项革命活动。他们一方面创办《民报》及其他报刊，积极宣扬革命思潮，对改良派进行批判；另一方面派同盟会会员回国，联络会党和新军，准备发动起义。1906 年秋冬间，孙中山和黄兴、章太炎等制定了指导武装起义的《革命方略》，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武装反清的基本方针。随后，孙中山远赴南洋，具体筹划在华南举行起义。在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党人的努力下，从 1905 年至 1911 年，他们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此起彼伏，不断冲击着清王朝的统治，最终击垮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1905 年 10 月，孙中山离开日本到越南，11 月，黄兴赴广西，他们准备在广西发动起义。黄兴到达广西后，便组织郭人漳、蔡锷等人起义，但是郭人漳借口与蔡锷不和，拒绝发动起义。就在此时，在浏阳、醴陵、萍乡地区爆发了大规模会党起义。这次起义不在同盟会的计划之中，它是会党自发的起义，同盟会在起义时给予了指导。

萍浏醴一带，向来会党众多，且与自立军、华兴会有过密切的联系。1906 年夏，黄兴派刘道一（刘揆一的弟弟）和蔡绍南回到湖南整顿会党。他们通过长沙明德学堂的学生魏宗铨，与醴陵、浏阳、萍乡一带的会党首领龚春台取得了联系，准备发动起义。这年湖南大水，“禾谷不登，一粒如珠”，灾民衣食无着，人心浮动，“杀鞑子”、“劫富济贫”等呼声在萍浏醴一带日益高涨。龚春台等人逐渐密谋起义，创立洪江会，在浏阳麻石设立了总机关，势力迅速发展到萍乡、宜春、浏阳、醴陵等县。1906 年 12 月 3 日，龚春台率两三千人在麻石起义，各地会党首领先后举兵响应。起义军由龚春台任都督，蔡绍南、魏宗铨任左右统领。起义群众包括安源煤矿的工人、贫苦农民和部分防营士兵。不到 10 天时间，起义队伍便扩充至 3 万多人，形成了浩大的声势。



起义军竖起白旗，旗上写着“革命军”及“洪福齐天”的字样，并发布起义檄文，宣布其宗旨不仅要推翻清王朝“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①]这说明，本次起义是在同盟会纲领的指导下发动的，明显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

虽然起义军号称“革命军”，但是会党首领们并不懂得什么是革命，更不用说一般会众。龚春台在起义之前，设立了谭嗣同和唐才常的牌位，并杀牛、宰牛、祭祀。起义时他打出的官衔“洪命督办民立自治社会总统全军谢”（龚原名谢再兴）；孙绍山部打出的名号是“扭转汉民复明朝”；姜守旦所率一部打出了“革命先锋军汉勇”的旗号。这些杂乱的旗号，反映了起义宗旨的混乱，也说明他们没有超出传统的“杀富济贫”、“灭满兴汉”的政治水平。

参加起义的有3万多人，但起义仓促发动，事前缺乏严密的计划，各支义军不相统属，分散行动，没有形成集中的进攻力量。而清政府则迅速调集大军进行了镇压，江西巡抚吴重熹、湖南巡抚岑春煊、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端方及直隶总督袁世凯都派兵前往镇压。起义军与清军奋战一个月，交战了20多次，12月中旬，起义军被镇压下去。蔡绍南、魏宗铨、刘道一等领袖人物或战死，或被捕遇害，龚春台逃亡。据估计，这次起义被杀人数约2 500人。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增强了同盟会领导人进行武装起义的信念。东京同盟会本部了解到这次起义后，极为兴奋，立刻派会员回国，响应起义，同盟会会员也都跃跃欲试。但回国参加起义的会员几乎都被清军查获。清政府在长江中下游大兴党狱。湖北、湖南等地同盟会会员先后遭到杀害。由同盟会派回国内的孙毓筠、杨卓林、胡瑛、宁调元等相继在湖南、湖北、江苏被捕，杨卓林等人被杀害。长江中下游的革命活动遭到了严重挫折。

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了南方。1907年5月至1908年4月，在孙中山的策动和领导下，同盟会在广东、广西、云南地区连续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包括：1907年5月的潮州起义，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的防城起义，12月的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的钦州马笃山起义和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按照孙中山的战略构想，首先是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发动起义，夺取两广为根据地，然后挥师北上，革命党

人一起响应，一举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但是由于发动起义的革命党人缺乏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进行长期艰苦战斗的决心，这些起义最终都失败了。

就在孙中山致力于在南方发动起义时，光复会于1907年和1908年分别在浙江、安徽发动了两次武装起义。

在同盟会成立后，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先后加入了同盟会。因意见不同，徐锡麟没有入同盟会，继续以光复会的名义进行革命活动。光复会的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在浙江秘密联络会党，以绍兴大通学堂为据点，策划起义。徐锡麟等召集金华、处州、绍兴等地会党头目入校练习兵操，伺机起事。为打入清政府内部以发动起义，徐锡麟纳粟捐官，以道员分发安徽候补，充任巡警学堂及巡警的会办。秋瑾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在接办大通学堂后，积极联络平阳等地会当首领，吸纳学堂师生参加光复会。经过秘密筹划，徐锡麟和秋瑾相约在7月19日在安庆和绍兴同时起义，遥相响应。部署未定，嵊县会党先期发难失败，各地会党先后遭到镇压。徐锡麟闻讯后，仓促举事。7月6日，他在安庆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率众学生当场枪击安徽巡抚恩铭，随即攻占了军械所。清军尾追而至，包围了起义军，徐锡麟被捕，慷慨就义。绍兴大通学堂受到牵连，秋瑾被捕，牺牲于绍兴轩亭口，年仅31岁。

受光复会起义的影响，1908年11月，岳王会军事骨干、安徽新军炮营队官熊成基率马、炮新军千余人起义，围攻安庆城。起义军与清军激战一昼夜，未能得手。熊成基见不是难以取胜，向集贤关退却，拟取道桐城，袭取庐州为根据地。清军穷追猛打，熊成基部寡不敌众，起义失败。后来，他在东北被捕壮烈牺牲。同一时期，四川、湖南、湖北等省革命党人发动的多次起义，都因起义缺乏有效的组织领导而失败。

孙中山在粤桂滇发动6次起义失败后，引起同盟会内部对起义战略决策是否得当的讨论，他们深刻总结了起义失败经验教训，一致认为过去起义所以不能取得成功，原因在于会党组织涣散，难于指挥。今后革命党人，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动新军上，争取掌握新式武器、有一定作战训练的新军作为基本力量，为发动起义做准备。

实际上，同盟会早就在广东新军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1907年，同盟会员赵声来到广州，在新军和军校中享有很高威望，担任新军第二标二营管带，后又升任标统，扩大了同盟会在广东新军中的影响。1908年，同盟会南方支部责成倪映典到广东负责运动新军。经赵声推荐，倪映典担任了广州



新军炮兵排长。他对革命工作极为热情，并且善于鼓动，常以“讲古仔”（讲故事的方式）宣传排满革命，“言至愤激，拍案几绝”很快成为革命中坚人物，士兵称他为“革命大师”。

革命党人的运动新军工作很有成效。到1909年冬，广州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已有3 000多人加入了同盟会，占广州新军总数一半以上。为了适应革命形式的发展，这年11月在香港成立了以胡汉民为首的南方支部，统一领导南方各省的党务军务。1910年2月5日，南方支部根据倪映典的报告和意见，决定于元宵节前后在广州发动起义。不幸消息泄露，广州地方官吏加强了戒备，并下令收缴新军士兵手中的枪支弹药，革命党人不得不提前起义。2月12日，倪映典率新军千余人在广州城郊起义。清军进行了镇压，倪映典中弹牺牲，起义军损失惨重，最终失败。

广州新军起义的失败，使同盟会的一些领导人出现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一部分革命党人对前途丧失了信心，准备从事暗杀行动，这其中也包括黄兴等领导骨干。实际上，革命党人一直把暗杀作为革命的辅助手段，他们认为面对残暴的强敌，暗杀可以唤醒沉睡的人民，成为革命的导火线，且简便易行。从兴中会到同盟会的这段时期，他们共组织了七八个暗杀团，策划过50多起暗杀活动。有的是为了惩处叛徒、奸细，有的是作为起义的先声或配合、响应起义的行动，还有的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扫除革命障碍和唤醒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其实并不反对采取暗杀手段，但认为像黄兴、汪精卫这样的重要骨干放弃武装起义而搞暗杀是不妥当的。他还是坚持发动武装起义夺取革命胜利。

当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得知起义失败的消息时，他立即动身，经檀香山到达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以及光复会代表李燮和等举行会议，筹划再次起义的计划。在会上，孙中山分析了当时的局势说：“乃者时机日逼，外耳高丽既灭，满洲亦分，中国命运悬于一线；内而有钉门牌、收粱税，民心大变，时有反抗。吾等新军之运动，已普及于云南、广西、三江、两湖，时机已算成熟。”[③]可以看出，尽管孙中山领导的几次起义屡屡失败，但他并没有被革命遇到的暂时困难所吓倒，而是以敏锐的眼光、深刻的洞察力，对国内外形势作了客观分析，坚定了继续革命的信心。对革命党人中出现的悲观情绪，他发表长篇演说，指出：“现在因新军之失败，一般清吏自以为吾党必不敢轻于再试，可以高枕无忧，防御必疏。至新军之失败，虽属不幸，然因此影响于军界最巨。吾党同志，果能鼓其勇气，乘此

良机，重谋大举，则克复广州易于反掌。……今既有先事之计划，当然较有把握，可操胜算。但诸同志疑虑莫决者，乃在于饷械之无着；不知现在因吾党历次之举义与海外各埠同志竭力之宣传，革命精神早已弥漫南洋群岛中。只怕吾人无勇气，无方法，以避免居留政府之干涉，以致贻误时机。今吾人则以教捐、义捐之名目出之，可保无虞也。”[④]孙中山乐观的革命态度和对起义必胜的信念，使大部分革命党人深受鼓舞。他们同意了孙中山的意见，决定再次在广州起义。

会后，革命党人很快就投入到了紧张的起义准备工作中。孙中山亲自到华侨中去筹款，派人到国外购买武器。经过他的努力，共筹得15.7万多元，基本上解决了这次起义的经费问题。黄兴、赵声等人先后返回香港，组织统筹部，作为起义的领导机关。1911年1月，统筹部在香港成立，黄兴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下设八课，分别负责运动军队、联络各省、购运军械、草定规则、秘书事务、出纳财政、侦察敌情等项事务。鉴于广州新军举事的失败教训，他们认为起义不能只依靠新军，还需要革命党人作军事骨干力量，所以决定成立由500名“选锋”（后增加到800名）组成的敢死队，“选锋”一律由革命党人担当，负责首先发难，计划先占领广州，再分兵出湖南、江西、福建，夺取长江中下游，然后大举北伐。

起义的准备工作是在极其缜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但计划还是被泄露了出去。广州地方当局惊恐万分，采取了加强防范的措施。起义所需的款项和部分枪械都未及时运到，起义被迫推迟。4月23日，黄兴赶到广州主持起义的领导工作。由于清军的严查搜捕，部分秘密机关被破坏。他在准备尚未就绪的情况下，临时决定于27日晚举事，进攻计划由原来的十路改为四路。27日下午，黄兴率领120多名的敢死队冲入总督衙门，但其他三路都没能按时策应。两广总督张鸣岐闻讯后潜逃，黄兴下令焚毁总督衙门，并率部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革命志士多人牺牲，起义遭到惨败。黄兴、朱执信等负伤退回香港。事后，革命志士潘达微想方设法，冒着生命危险，收敛了烈士的遗骸共72具合葬于广州红花岗（后改称黄花岗）。因此，这次起义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的失败，对于革命党人的打击非常沉重。它使同盟会丧失了很多优秀干部，领导力量大为削弱，但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同时，革命党人视死如归、前仆后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斗争意志，有力地促使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孙中山后来在评



价黄花岗起义时曾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⑤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领导下连续不断的武装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其主要原因在于革命党人没有深入发动和组织民众，尤其是没能依靠广大的农民群众。他们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了会党和新军身上，而会党和新军由于自身的局限也没能给革命带来胜利。会党的群众虽然多出身农民，但他们长期游离于农村经济生活之外，实际上成了游民。会党对反清活动十分热情，且不乏反清斗争的勇气和决心，但他们缺少纪律性。新军中也有部分成员来自农民，但它毕竟为清政府所控制，革命党人对新军也缺乏长期细致的争取、转化工作。革命党人与会党、新军联络，不等于与农民阶级结成了联盟。革命党人脱离了农民这一主力军，而依赖外部的捐款、枪械和军事骨干力量，因此在南方发动的数次武装起义就变化了单纯的军事冒险行动。除此之外，他们发动这些武装起义，缺乏周密的部署、强有力的统一指挥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这也是导致历次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

尽管如此，但革命党人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扩大了民主革命的影响，激励着人民群众踏着他们的血迹奋勇前进。这些起义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注释：

①《辛亥革命》第2册，第477页。

②《黄洪昆供》，《针砭群丛报》第6册。

③孙中山：《致檀香山同盟会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86页。

④杨汉翔：《纪总理庚戌在槟城关于辛亥广州举义之演说》，《建国月刊》第3卷，第1期，1930年5月。

⑤孙中山：《黄花岗烈士事略序》，《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0页。

辛亥革命胜利　南京政府成立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了武昌起义。这天后来被定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武昌起义的爆发，是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也是湖北革命党人长期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的成果。

武汉位于长江和汉水的汇合处，有“九省通衢”之称，是当时国内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张之洞在湖北任职期间，大力操办洋务，兴办了一批近代化的工商企业，湖北的民族工业有了较大发展，这为革命派在武昌地区发动起义提供了物质基础。湖北的新军是南方各省中编练的最精锐的一支，因此湖北革命党人便把新军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对象。他们长期深入新军中进行艰苦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从科学补习所、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再到文学社、共进会，他们先后组织了许多革命团体，表现出了前仆后继、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为了策反新军，许多人不惜从下级士兵做起。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群众达五六千人，占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为武昌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武昌，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一直进行着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08年，共进会开始在武汉发展组织，孙武、刘公任主要领导。1911年1月，文学社成立，同盟会员蒋翊武任社长，参加者多为贫苦知识分子和新军中的士兵。1911年8月，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建议下，两个革命团体联合筹划起义。9月24日，他们正式成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为未来的军政府总理，两团体的重要骨干刘尧澂、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他们拟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推定了武装起义后军政府的负责人，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来鄂主持大计，同时联络临近各省，策动响应。湖北革命党人为武昌起义作了较为周密的计划和部署。

湖北革命党人决定在10月6日这天举行起义，后来由于准备不充分而



将时间延期。10月8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制造炸药不慎引起爆炸，沙俄巡捕闻声赶到搜查，将孙武等人准备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印信及机关人员名册全部搜去，起义计划暴露。第二天，设在武昌的指挥起义的秘密机关又遭破坏，彭楚藩、刘尧澂等被捕，蒋翊武逃脱。湖广总督瑞澂下令杀害彭、刘及杨洪胜三人，全城戒严，按照查获的名册搜捕革命党人。武昌形势顿时紧张起来，革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革命党人和新军中的革命士兵群众见事态紧急，决定自行联系，提前发动武装起义。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在熊秉坤的率领下，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他们打死了镇压起义的反革命军官，几十人冲往楚望台军械库夺取弹药。军械库守军中的革命士兵们闻风响应，一举占领了楚望台。随后，步兵、炮队、辎重各营和陆军测绘学堂的学生纷纷起义，齐聚楚望台，他们推举原日知会会员、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向总督衙门发起进攻。瑞澂打穿督署后墙，仓皇逃往停泊在江面上的军舰上。起义军一夜之间占领武昌，取得了首义的胜利。11日晚和12日晨，汉阳和汉口的新军先后起义，武汉三镇完全为革命党人所控制。

起义胜利后，革命党人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建立革命政权。10月11日，革命党人邀请咨议局议员和地方绅商举行会议，商讨组建军政府事宜。大家一致同意必须推举一位有名望有地位的人，以号令天下。而此时，孙中山远在海外，黄兴、宋教仁等人也在香港和上海。直接组织起义的文学社、共进会的领导人在起义前，有的负伤，有的牺牲，有的出逃。他们认为咨议局是个“民意机关”，所有议员都是湖北各县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应与他们进行合作，于是推举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

黎元洪（1864年~1928年），湖北黄陂人，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后来在北洋海军中任职，甲午战争后参与训练新军，受到张之洞的赏识，先后三次赴日本考察军事，由管带升至协统的职位，因以军界代表的资格参加过保路运动，赢得进步人士的好感。10日晚，黎元洪曾亲手杀死了响应起义的两个士兵，后即隐匿在一个参谋的家中。黎元洪并不愿意顺从革命，又不敢公然反对，他是被革命党人用手枪逼上都督席位的。湖北军政府设军令、参谋两部，军政多由参谋部主持。原咨议局局长汤化龙，则被推为民政部长，负责政务与交涉。黎元洪和汤化龙进入革命政府后，明目张胆地包庇旧官僚和政官，排挤革命党人。汤化龙为了削弱革命党人的权利，于16日晚颁布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把军政府的一切大权集中到黎元洪手里。

10 月 25 日，革命党凭借拥有的军事力量，推翻了这个条例，重新订立了《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取消了汤化龙包揽政事大权的政事部，增加了革命党人担任部长，把军政府置于革命党人监督之下。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两省。10 月 22 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发动会党和新军进攻长沙，迅速占领了军械局、咨议局和巡抚衙门，巡抚余诚格逃跑。革命党人推举焦、陈为正、副都督，建立了湖南军政府。同一天，陕西同盟会会员景梅九、井勿幕等联络会党和新军起义，他们攻占军械局，推举日知会会员、新军队官张凤翙为都督，哥老会首领张炳南为副都督。

10 月 23 日，驻江西九江的新军响应武昌起义，拥标统马毓宝宣布独立，成立九江军政分府。九江的独立，解除了长江下游清军对武汉的威胁。31 日，同盟会员蔡公时在南昌发动新军起义，成立江西军政府，由同盟会员李烈钧任江西都督。10 月 29 日，山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杀死巡抚陆钟琦，组成山西军政府，由新军统协阎锡山任都督。第二天，云南同盟会员李根源、罗佩金联合新军协统蔡锷以及管带唐继尧等发动起义，组成云南军政府，蔡锷为都督。进入 11 月份，上海率先起义，11 月 3 日，上海的同盟会员张承槱等发动工人、防营和会党起义，次日攻克江南制造总局，占领了上海，同盟会员陈其美被推举为上海军政府都督。上海独立对东南各省产生了极大影响，并直接推动了浙江、江苏的独立。11 月 4 日，浙江革命党人在上海的支援下，联合新军和防营占领了杭州，6 日，立宪派首领汤寿潜出任浙江军政府都督。5 日，江苏巡抚程德全接受立宪派和苏州绅商的要求，宣布独立，程德全摇身一变，由巡抚成了都督。程德全令人捣毁了几块琉璃瓦以示革命的破坏。这种巡抚宣布独立的“和平光复”除了上述省份外，还有广西、安徽和山东等地。

在上海周边省份纷纷独立的同时，贵州、广西、福建、广东等省同盟会会员也迅速响应，在几天内连续发动起义，成立军政府。11 月 4 日，贵州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和陆军学堂学生起义，占领贵阳，成立了贵州军政府，新军教练官杨荩诚为都督。11 月 6 日，广西咨议局中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劝说巡抚沈秉坤宣布独立，并推其为都督。不久，前清军提督陆荣廷发动兵变，攫取了都督职位。11 月 9 日，福州同盟会员许崇智率军起义，推第十镇统制孙道仁为福建军政府都督。同一天，广东宣布独立，同盟会员胡汉民为都督。



武昌起义后，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全国已有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13省和最大城市上海以及其他省许多州县宣布起义，清朝的一部分海军也投奔到革命方面来。革命浪潮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广大农村地区农民群众自发反封建斗争的发展。全国各地农民以各种方式掀起了反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抗捐抗税的斗争。从武昌起义到1912年底，全国农村较大规模的群众起事多大150次，这些农民武装暴动有力地冲击了农村封建旧秩序。各省纷纷独立和各地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汇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在这巨大的革命洪流的冲击下，清王朝的统治四面楚歌，岌岌可危。

在这次革命高潮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情形下，革命派的弱点也暴露出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同盟会组织很不健全，缺乏一个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和把革命推向前进的统一的革命步骤。这样一来，他们在后来日益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自身的地位被不断削弱。

在各省独立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立宪派利用自己在各省咨议局中所取得的地位，积极参与或发动各省独立和新政权的组建，对清王朝的崩溃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他们与革命党始终存在着隔阂，在政治上更接近于就是官僚，主张维持旧秩序，防止革命的深入开展，并窃夺权位。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勾结旧军官，在湖南起义后十天便发动了兵变，杀害都督焦达峰、陈作新等革命党人，夺取了军政大权。不仅湖南如此，立宪派与旧官僚采用“和平”的乃至流血政变的手段，先后取得了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广西、贵州等许多省军政府的权利。同时，还有一些地区，如上海、广东、安徽、江西等地，表面上权利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但是他们掌权以后，在政治态度上很快发生了转变，其中有些人已蜕化为新官僚政客。他们压制工农群众，解除民军的武装。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刚刚去的局部的政权，就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了，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民主革命引向真正的胜利。

武昌起义后，各省相继独立，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以克服当时各省各自为政的局面。于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卷入革命斗争中的立宪派、旧官僚政客等各派政治力量，都在为建立一个由自己控制的中央政府进行各种活动。湖北、上海两地在筹建临时政府的过程中，表现尤为积极。11月9日，湖北以都督黎元洪的名义通电各省，要求

派代表赴鄂商议成立中央政府事宜。而上海方面则提出，由各省咨议局和都督府各举代表一人到上海“集议”。15 日，第一次各省代表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武汉方面对此表示异议，派居正等到上海，坚持代表会应移往武汉举行。由于他们的力争，24 日，各省代表联合会决定迁往武昌开会，各省留一人在上海以便联络。

当时，湖北革命军正与清军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中。清军统帅袁世凯率领北洋军先后攻下了汉口和汉阳，之后便下令停止进攻，以诱惑革命党人接受和谈。在袁世凯的利诱下，立宪派和革命党内部出现了妥协倾向。11 月 30 日，各省代表会在汉口英租界举行。各省代表联合会的成分十分复杂，革命派与立宪派占了几乎相等的席位，另有少数旧官僚和封建士绅，甚至有清政府的密探在内。12 月 3 日，会议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决定临时总统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12 月 17 日，各省代表改赴南京集议，再次议定暂缓选举临时总统，虚位以待袁世凯，并推举黎元洪为大元帅，暂行总统职权。因人选问题争执不下，临时政府的组建陷于难产。

12 月 25 日，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到达上海。各省革命党人大都同意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立宪派和旧官僚政客也认为在“争取”袁世凯反正以前，这个“总统”只能由孙中山来做。29 日，17 省代表举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以 16 票当选。同时约定如果袁世凯拥护共和，孙中山必须将大总统让位于袁。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 1912 年为民国元年，改用公历。

临时政府的人选，经反复商讨，后由孙中山、黄兴提出一个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在内的九名国务员名单，1912 年 1 月 3 日在各省代表联合会议上通过。其中，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为同盟会员，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为江浙立宪派首领，内务总长程德全、司法总长伍廷芳为旧官僚，海军总长黄钟英是起义的舰长，财政总长陈锦涛曾在清政府任职。根据同盟会确定的“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原则，孙中山直接任命的各部次长、局长和总统府秘书长等，除海军次长外，都是同盟会骨干。通过这样人事安排，革命派占有明显的优势，基本上控制了临时政府的实权。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法令。在政治方面，根据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原则，规定人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有请愿、选



举、被选举的权利；通令保护华侨，禁止买卖华工；严禁买卖人口，禁止蓄奴，解放“疍户”、“惰民”等所谓“贱民”，允许他们享有同其他人同等的权利；革除“大人”、“老爷”等称呼，禁止缠足、赌博、种植和吸食鸦片等等。在发展民族工业方面，它颁布了保护工商业的规章，废除了清朝的一些苛捐杂税，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在文化教育方面，它提出了以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为主的教育方针，各级学堂一律改称学校，提倡男女同校；禁用清政府学部颁行的教科书，新编教科书必须合乎“共和民国宗旨”，《大清字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等一律废止。这些政令的发布，表明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政权，它集中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原则。但法令对地主阶级的利益，没有根本的触动。对广大农民的要求更是缺乏任何积极的反映，农村封建的生产方式依然存在，这就注定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府不可能获得最广大农民阶级的支持。

辛亥革命的发生，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气象。从此，民主、共和、议会、选举等新思想、新观念深入人心，大大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南京临时政府鼓励民族资本经济发展的政策出台后，近代民族企业有了显著的增长。国内大小城市商会、农会纷纷设立，这些机构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在新的教育方针指导下，社会上出了一股兴办学校的热潮，出现了大批普通中小学、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学校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传播民主思想，壮大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南京临时政府社会改革的法令下达后，城乡各地掀起了剪辫风潮，很多封建时代的遗留陈规旧习一时间销声匿迹。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在促进中国社会进步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南京临时政府主张对外维护民族尊严，但它又承认清政府同列强签订了一切不平等条约，负责偿还清政府所借的一切外债和赔款，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特权一律加以保护，企图以此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华民国的承认。这充分暴露了临时政府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性，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尽管南京临时政府存在严重的局限性，但它坚持了民主共和的立场，在促成清朝覆灭和民国成立的革命大业上，仍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资产阶级民主派妥协　袁世凯窃国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引起了清朝当局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极大恐慌。清政府急忙派陆军大臣荫昌赶赴武昌进行镇压。但他率领的北洋军队是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许多将领是他的心腹爪牙，根本不听荫昌的调度，他无法指挥这支军队同革命派进行作战。内阁总理奕劻和协力大臣那桐、徐世昌感到局势危机，一再上奏朝廷，要求立即起用袁世凯。

南京临时政府从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处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包围之中。面对这严峻的局面，革命派不去发动工农群众，而是幻想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为此，临时政府在《宣告友邦书》中重申了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承担清朝的外债和赔款，保护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和利益。他们天真地认为承受清政府的可耻“遗产”，就可换取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然而，实际上帝国主义各国并不欣赏孙中山，更不愿意看到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政府在中国出现。就在武昌起义后几天之内，它们便在武汉江面集中了十余艘军舰，随时准备武装干涉。驻北京的各国使团连续举行会议，共商如何维护它们在华的侵略利益。他们接受了美国公使嘉乐恒的建议，大造“非袁不可收拾”的舆论，扬言：“除非清朝政府再次召用袁世凯参与国事，没有任何行动能使清朝取得国内外的信任”，①力促清政府立即起用两年前被罢黜的袁世凯。

10 月 14 日，清政府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要他统率北洋军队南下镇压革命。袁世凯野心勃勃，想乘机向清朝索取更大的权利，借口“足疾未愈”，留在河南彰德不肯出山。27 日，清军进攻武汉，遭到革命党人的顽强抵抗。此时，湖南、陕西、江西等省又相继爆发起义。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清廷不得不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袁世凯仍不满意，提出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诸人、解除党禁、授予军事全权、供给充足军费等六项条件。清政府一时犹豫不决。这时起义的省份越来越多，革命形势不断高涨，迫使着清政府对袁

妥协。

在北京召开资政院年会的议员们，也齐声呐喊，上奏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取消皇族内阁，赦免国事犯。在袁世凯的策动下，驻直隶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三镇协统卢永祥等，电奏政纲十二条，要求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削弱皇族特权、大赦国事犯。同时，驻扎石家庄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同盟会员）正密谋与张绍曾配合，直捣北京。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清朝统治者万分惶恐，被迫屈服，连忙下“罪已诏”，颁布宪法“十九信条”，下令开放党禁你，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这样，袁世凯独揽了清廷的军政大权。11月1日，袁世凯南下誓师，指挥北洋军队攻陷汉口。而后返回北京，于11月16日成立了袁世凯“责任内阁”。

袁世凯是一个既有政治野心又善用政治权术的人物，他深知南方革命党的势力绝非单靠军事力量所能制服的，而这些反清势力的存在恰可以作为自己要挟清廷的筹码。于是，他决定对南方革命党人采取“剿”、“抚”并用的手法，命令北洋军猛攻汉阳，11月27日，北洋军队攻陷汉阳。之后，他即命令军队停止进攻，同时请英国公使朱尔典电令汉口英领事出面，提议南北停战议和。

而此时，西方列强正忙于准备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的战争，革命形势的日益发展和清朝统治的土崩瓦解，使他们感到公开进行武装干涉已很难获得更多利益。于是，他们决定在“中立”的幌子下，加紧扶植袁世凯，胁迫革命势力向袁世凯妥协，利用袁世凯取代清王朝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工具。经英国公使朱尔典和袁世凯密谋后，由英国驻汉口领事出面，向湖北军政府提出南北停战议和的建议。革命党领导人和黎元洪等人欣然接受。12月初，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7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袁即日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18日，袁世凯的议和全权总代表唐绍仪和各省军政府议和代表伍廷芳，开始在上海进行正式谈判。和谈开始后的第3天，英、美、日、俄、德、法六国驻沪总领事即向议和代表提出：“目前中国的战争如若继续下去，这不仅使中国本身，亦将使外国人的物质利益与安全遭受重大的危险。”② 照会表面上公正，实际上是要逼迫革命党人向袁世凯妥协。

在南北议和的过程中，革命派遭到了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压迫。不仅如此，革命阵营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也趁机向革命派施加压力。立宪派害怕革

命继续发展将危机自己的既得利益，希望通过拥有北洋武装而又受帝国主义宠信的袁世凯来维持社会“秩序”，平息动荡的局势。早在武昌起义前，张謇就曾到河南彰德拜访袁世凯，二人进行了长时间密探，就未来政局和彼此的合作达成了默契。在和谈中，袁、张互通信息，始终这保持密切的联系。当唐绍仪到达上海后，张謇等人即展开了紧张的幕后活动。伍廷芳和唐绍仪分别代表南北两方，“在议场时，板起面孔，十足官话”，[3]而每天晚上却在张之洞的机要幕僚赵凤昌家中与立宪派密谋策划，研究如何对付革命势力。立宪派在革命阵营内部极力散布对袁世凯的幻想，制造妥协空气，迫使革命派向袁世凯交出政权。

在革命派内部，对议和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部分激进革命党人和下层广大官兵反对议和，深知议和的实质，主张决战到底。但是这种坚决抵抗的建议，并没有被黄兴和宋教仁接纳，妥协思想逐渐占据了上风。11 月 9 日，黄兴致函袁世凯，希望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并声称“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4]南北议和后，黄兴等人主张“化敌为友”，害怕袁世凯“像曾国藩替清军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搞垮革命”，建议“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5]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因刺杀载沣而被监禁的汪精卫，出狱后投靠了袁世凯，帮助袁世凯推行“南抚北剿”的反革命策略。他在南北议和上积极穿针引线，力劝南方革命党人对袁妥协，还暗地里向袁世凯告密，出卖北方革命组织。他来到上海，担任南北各省议和参赞，极力为袁世凯疏通，并“恶意攻击孙中山先生本人有权利思想”。[6]

在立宪派张謇的撮合下，袁世凯的议和代表唐绍仪和黄兴进行了进行了多次密探，经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最后约定只要袁世凯逼迫情敌退位，即推举他为共和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张謇立即将这一消息电告袁世凯：“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希望他“奋其英略，旦夕之间勘定大局”。[7]12 月 27 日，袁世凯接到了唐绍仪的电报后，当天便召集宗室王公，要求他们表态。在他的要求和恐吓下，清廷被迫表示同意改变国体。

而在此时，南方各省代表决定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原本就不愿意向袁世凯妥协。他从国外回到上海时，曾公开声明：“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8]但当时革命派已经与袁世凯达成了初步妥协协议，黄兴赞成袁世凯若拥护共和，可推举他当民国总统的建议，后来名噪一时的汪精卫，也极力为南北政



治交易推波助澜。迫于党内妥协形势，孙中山在当选临时总统后，即致电袁世凯："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9]不得不对革命党原有的成议表示尊重。可是，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和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还是让袁世凯大为不满。他立即对南方革命势力进行公开的武力威胁。在孙中山就职的当天，他指使北洋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等48人联名发出"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的通电，并撤销了议和代表，故意制造决裂的状态，迫使革命党人妥协。

袁世凯的咄咄逼人和嚣张气焰，刺激了南方北伐声浪的高涨。临时政府接受了孙中山的北伐建议。1月7日，孙中山制定了6路北伐的方略。11日，孙中山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派黄兴为北伐陆军参谋长，兴师北伐。13日，在津浦铁路线上，北伐军取得了首战告捷，打败清军于宿州等地，战略重镇徐州不战而下。在安徽、河南、湖北等省的战场上，革命军也取得了一些胜利。然而，北伐没有继续下去。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在财政上出现了困难，无力支持革命军北伐。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已亲自出马，公开支持袁世凯。他们调集兵舰和军队在长江上示威，并阻止革命军在大连登陆，扬言若中国"内乱"不止，就要实行武装干涉。南京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也乘机鼓噪，反对北伐。革命党人只好再次妥协，重新作出了让权的承诺。孙中山在内外夹击下，很快放弃了对袁世凯的强硬态度。1月15日，他致电伍廷芳，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10]南北双方最后达成了一项协议：革命党人同意让出政权，袁世凯则同意宣布赞成"共和"，并逼清帝退位。

袁世凯虽撤消了议和代表，但南北谈判并没有终止。现在双方争执的中心已不再是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而是如何结束南北两个政权的对立局面，建立以袁世凯为总统的统一政权的问题。袁世凯主张清政府与南京政府同时解散，由他另立统一的共和政府。南京临时政府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孙中山认为取消南京临时政府于理不行，但被迫同意了由袁世凯在清帝退位后重组政府的意见。

如何"处置"清朝皇帝，双方一直争论不止。袁世凯主张给清帝及皇帝以特殊"优待"，并搞了个《优待条例》，其中规定：清帝称号不变；每年由民国政府给予400万元；清帝仍暂居皇宫，以后移居颐和园；原有私产由民国政府保护，等等。孙中山认为这个荒谬的优待条件是对革命奇耻大

辱，表示极力反对。就连主张对袁世凯妥协的黄兴也认为这个条件难以接受。黄兴致电伍廷芳说："议和愈出愈奇，殊为可笑。第一条仍保存下大清皇帝名称及世世相乘字样，可谓无耻已极。"可是，伍廷芳、汪精卫等人竟说这保留的不过是个"虚名"，共和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其他细枝末节可以从宽处理。2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员正式通过了这一《优待条约》。

袁世凯得到革命派的保证后，立即在北京对清帝进行逼宫。1月16日，袁世凯与内阁大臣联衔密奏，极力渲染革命党人的声势和时局的危机，请隆裕太后召开御前会议，就退位问题进行商讨。但在御前会议上，一些王公大臣坚决反对清帝退位，他们组织了"宗社党"，声称要同袁世凯同归于尽，图谋武装反抗。1月26日，袁世凯指使北洋将领五十余人联名发电，要求清王朝立即同意共和，否则将率领军队直捣北京。2月12日，清帝宣布接受优待条件，正式退位。从此，在中国统治260多年的清王朝宣布结束。

1912年2月13日，即清廷宣布退位的第二天，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表示赞成共和，保证"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同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21日又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孙中山在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时，为了防范袁世凯专制独裁，使中国走上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道路，提出了奠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三项条件，并派蔡元培等为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南下。袁世凯虽然表示愿意南下就职，但暗中却密令他的嫡系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制造暴乱，作为他不能南下的借口。孙中山得知北京等地的兵变消息后，紧急召开会议，决定出兵平乱，黄兴也发出了率兵北上的通电。这时，帝国主义再次出面配合袁世凯，纷纷从各地调军队前往北京，加剧了局势的紧张。立宪派和旧官僚也反对孙中山提出的奠都南京的主张，许多革命党人也附和他们。无奈之下，孙中山再次退让。3月6日，临时参议院决定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

3月11日，孙中山颁布了提请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人民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人民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在国家体制上，它改变了原来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的总统制，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内阁总理由议会的多数党产生。总理有驳回总统的权利，总统颁布命令必须经过总理

副署才能生效。《临时约法》是革命的产物，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孙中山等企图用这部临时约法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利，束缚他专制独裁的手脚，维护共和制度。善于权术的袁世凯一面表示他是《临时政府》的拥护者，另一方面表示以后要对它进行“修改”。这就为日后破坏约法埋下了祸根。4 月 1 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次日，临时参议院决议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孙中山的解职和临时政府的北迁，标志着辛亥革命遭到了重大挫折，也从一定程度上预示了辛亥革命最终将归于失败的历史命运。至此，中华民国开始进入了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交出政权后，企图依靠一纸约法实现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使中国走上民主的轨道，但历史证明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

注释：

①《大陆报》，1911 年 10 月 15 日。

②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195 页。

③《辛亥革命史料》，第 292 页。

④《黄兴致袁世凯书》，《近代史资料》，1954 年第 1 辑。

⑤⑥李书诚：《辛亥革命前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1 期，第 200 页。

⑦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1 年版，第 150 页。

⑧《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第 211 页。

⑨《总理全书·文电》，上海大东书局，1934 年版，第 17 页。

⑩《孙中山全集》第 2 卷，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 23 页。

袁世凯称帝　倒行逆施

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袁世凯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正式总统的宝座，进而成为终身总统，然而他还不满足，想恢复帝制，做上了当皇帝的“美梦”。英、美、德、日等列强，为了加强对中国的控制，扩大各自在华的侵略权益，也都先后怂恿袁世凯称帝。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美等西方列强陷入大战，无暇东顾，于是日本借此机会独占中国。它借口对德宣战，派兵在山东半岛登陆，向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进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日本占领青岛后，认为向中国提出扩大侵略权益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奉令向袁世凯递交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引诱袁世凯说：“如果总统现在接受这些要求，日本人民将深信总统的感情是友好的，而且日本以后可能对袁总统提供帮助。”[①]他还对外交部次长曹汝霖表示：“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②]充分地暴露日本方面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迫使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险恶用心。

“二十一条”共分五号，其主要内容是：1. 要求中国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2. 要求将租借旅顺、大连的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延长为99年，并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特殊权力；3. 要求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附近矿山不准外人开采；4. 要求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他国；5. 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将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潮州间之铁路建筑权给予日本，允许日本在福建省有投资修筑铁路及开采矿产的优先权。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显然是要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但袁世凯为了当皇帝，寻求日本的支持，竟不惜卖国求荣。他派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与日本公使秘密谈判。谈判期间，日本以“换防”为名，增兵大连、青岛、塘沽等地，进行武力威胁。经过几个月的交涉，日



本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迫使袁世凯于5月9日接受了除第5号外的全部要求。

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和袁世凯政府签约的消息一传开，立即在全国人民中激起了强烈的愤慨。上海、北京、天津、杭州等地的商民和学生纷纷集会，一致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要求政府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各地的反日爱国团体纷纷出现，上海有“国民对日同志会”、山东“救亡团”、江西有“妇女救国会”、广东有“中华商务救亡会”等。3月，上海绅商学各界联合发起召开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余人，与会者强烈要求提倡国货，拒用日货。各地群众纷纷响应，大家走上街头，罢工抗议、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运动。由于全国人民的反日爱国斗争，“二十一条”最终没能完全付诸实行。

袁世凯在获得日本的支持后，便开始放手推进帝制活动。1915年8月，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公开抛出《共和与君主论》一文，污蔑中国人民“智识不甚高尚”、“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并认为辛亥革命“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的结果”，于是说中国用君主制“较共和国为宜”。袁世凯的另一名政治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发表了《共和宪法持久策》，认为中国不适合共和制度，只有实行君主制度，国家才不致分裂，并露骨地鼓吹中国须由袁世凯做皇帝，总揽大权。

随后，在袁世凯的授意下，由杨度出面，联络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人组织了“筹安会”，打出“学术团体”的旗帜，标榜“研究共和政治得失”为宗旨，实际上为袁世凯大造复辟舆论。筹安会成立后，立即通电全国，说谋国之道在“废民主而立君主”，要求各地文武官吏和商会团体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问题。遍布各省的袁世凯党徒爪牙，也纷纷派代表进京参加讨论。几天后，筹安会通电全国说：各省机关及各团体代表投票表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为了制造“民意”，在京各省文武官吏的代表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公民请愿团”。袁世凯的另一名得力助手梁士诒也乘机收买各方，组织了京师商会请愿团、教育会请愿团、妇女请愿团等情愿团体，再次基础上，又于9月19日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主张以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以加快帝制进程。这些请愿团多次向参政院投递请愿书，要求召开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

10月6日，参政院根据他们的意愿，决定不再召开国民会议，由“国民代表大会”来“决定国体”。10月8日，袁世凯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

选举法》。接着，袁世凯及其党徒便操纵各地的“国体投票”。11 月 20 日，全国各省区投票结束，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皇帝。12 月 11 日，参政院又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名义上书“劝进”。袁世凯故作姿态，说“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③“谦让”一番之后，第二天宣布接受“民意”，承认帝位。13 日，接受文武百官朝贺，大加封赏，同时下令查禁反对帝制的活动。31 日，袁世凯下令 1916 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元旦正式登上皇帝宝座。复辟帝制的丑剧，至此达到最高潮。

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和复辟帝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痛恨，反袁斗争此起彼伏，一场全国性的反袁运动迅速兴起。其中规模最大的反抗斗争史白朗起义。早在 1912 年，白朗就率领河南贫苦农民爆发了起义，反对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历史两年多，起义军转战河南、安徽、湖北、陕西等地，沉重打击了反动统治势力。1914 年以后，白朗领导的四万起义军改称“公民讨贼军”，自己则以大都督的名义，声讨袁世凯“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④体现了这次起义的民主革命色彩。但这次起义在袁世凯的重兵的镇压下，最终失败，白朗在战斗中牺牲。

遍及全国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特别是白朗起义，有力地鼓舞和支持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袁斗争。“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往日本，但他“不以挫抑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却”。⑤为了继续领导革命，他决定解散国民党，重新建立一个内部统一、有纪律和战斗力的政党。1914 年 7 月 8 日，孙中山在日本创建了中华革命党，宣布“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⑥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但中华革命党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它认为民族主义已经完成，只提民权和民主主义，没有提出反帝的纲领。在组织上，为了防“异党入据，以伪乱真”，规定凡入党者必须按手印，宣誓服从总理一人，“若有二心，甘受极刑”，这样就陷入严重的宗派主义。由于中华革命党这种落后的宗派性，不仅使自己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而且使黄兴等大批同盟会和国民党中的骨干力量离开了孙中山，黄兴联络一些同盟会会员在日本东京另行组织了欧事研究会。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积极进行反袁活动。1915 年间，孙中山一面派胡汉民、邓铿、许崇智等先后往南洋筹款，一面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11 月 10 日，中华革命党派人刺杀袁世凯心腹、上海镇守使郑汝成。12 月初，发动停泊上海的肇和舰起义，但被镇压失败。除了会党、军队起义外，孙中山还



联络原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准备武装反袁。在袁世凯称帝时，中华革命党是资产阶级各派中反袁斗争最坚决的力量。他们组织反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由于它缺乏群众基础，这些起义变成了单纯的军事冒险。中华革命党未能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影响。以黄兴为首的欧事研究会，此间也进行了反袁斗争，但在群众中的影响更为有限。

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原先是袁世凯的追随者，后来遭到了袁的弃用。他们看到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不得人心，袁的垮台早晚不可避免，同时也注意到了革命党人在西南策动武装反袁，深恐在将来的政局中落伍、被动。为了不致落入“我为牛后”的境地，他决心改弦更张，走上反袁的道路。

梁启超的态度的转变，对他的弟子蔡锷有着相当的影响。蔡锷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爱国将领。武昌起义后，策动云南独立，被推举为云南都督。他既不参加国民党，也不参加进步党，但在思想上与梁启超接近。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引起了他的极大不满。就在筹安会发表宣言的第二天，蔡锷便于梁启超密商反袁，表示“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命去干这一次不可”⑦。决定分头并进，文字鼓吹与武力讨袁双管齐下。1915 年 8 月 20 日，梁启超拒绝了袁 20 万元的收买，不顾枪弹威胁，毅然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对袁世凯和古德诺进行揭露和讽刺，鲜明地表达了他坚持共和、反对抵制的态度。他说：“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此文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震动。

11 月 7 日，在梁启超的帮助下，以养病为名来到天津的蔡锷登上了日轮山东丸，绕道日本，潜回云南。云南的部分军官和士兵，在李烈钧等人的鼓动下，已经开始酝酿武装讨袁事宜。而云南将军唐继尧模棱两可，不敢贸然行动。蔡锷到后，进一步协调各派力量。12 月 25 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联名宣布云南独立，发布讨袁檄文，组成了护国军政府，以唐继尧为都督。随即组织讨袁护国军，编为第一、第二、第三军。第一军由蔡锷为总司令，进军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两广；唐继尧兼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护国战争全面爆发。

护国军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进展迅速。为了镇压云南护国起义，袁世凯调动了 5 个精锐师和十几个混成旅团，分路进行讨伐。但军事力量处于劣势的护国军却取得了节节胜利。1916 年 1 月，蔡锷率军进攻四川，夺取了庐州、叙府等地，全川为之震动。同时，李烈钧率领的第二军也在两

广取得了重大胜利。护国战争促进了反袁斗争形势的发展，继贵州之后，广西、陕西、浙江等省先后宣布独立。广东在中华革命党压力下也被迫独立。此外，中华革命党还在福建、山东安徽、奉天等未独立各省，不断策动起义。讨袁斗争已成燎原之势，给袁世凯统治造成极大威胁。

随着袁世凯军的节节败退，帝国主义列强改变了对他的支持态度。云南起义后，日本料定袁世凯迟早必败，难以保护自己在华利益，开始加紧与反袁势力联络，物色新的代理人。它还几次同英、俄、法等国向袁提出警告。1916 年初，日本拒绝接待袁派出的特使，在通知中责备袁世凯“断行帝制，无视友邦劝告”,[8]并表示不承认洪宪王朝。

日本对帝制态度的变化，对袁世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此时，袁世凯的亲信也感到复辟帝制已经绝望，不愿跟着他同归于尽，因而各谋出路。段祺瑞和冯国璋是袁世凯手下的心腹大将，他们希望等袁下台后继任总统职位，但袁一直谋求建立世袭王朝，让其子孙掌权。这与他们的愿望相差甚远，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对此表示消极。在袁积极策划帝制期间，段祺瑞离开他长期担任的陆军总长职位，托病退隐西山；坐镇南京的冯国璋，密电江西、浙江、山东、湖南等省将军联名发动其他未独立的各省，共同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乘机逼他交出权力。袁世凯在众叛亲离的窘境中，被迫于 3 月 22 日，取消帝制，次日废除“洪宪”年号，改政事堂为国务院，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段祺瑞为参谋总长。至此，袁世凯仅做了 83 天“皇帝梦”。

袁世凯取消了帝制，却还想继续当总统。但是，全国人民已经不能容许他继续窃据总统位置了。5 月 8 日，各独立省份的军人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宣布“指挥全国军事，筹办善后庶政”。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任抚军副长，梁启超任政务委员长。军务院统一指挥独立各省的护国战争，这实际上是一个与袁世凯政府相对峙的临时政府。袁世凯致死不愿让出总统宝座，引起了全国舆论的一致声讨，人们纷纷通电谴责袁世凯：“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9]甚至海外华侨也相继发出讨袁通电，要求将袁世凯“执行国法”。5 月 9 日，孙中山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除恶务尽”，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生于国内”。[10]他提出不仅要打倒一个袁世凯，还要和所有同袁世凯一样的反动派斗争下去。

然而，袁世凯并不甘心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他还想做最后的垂死挣扎。5月29日，他发出了“宣布帝制始案末”的申令，将帝制的责任推给了别人。同时，他还策划由四川和湖南向西南反攻。但是，他的心腹重臣四川将军陈宧、湖南将军汤芗铭，迫于形势也相继宣布独立。他们的倒戈，对袁世凯来说是一个致命打击，现在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从此更加沮丧。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声中死去。

袁世凯复辟帝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不得人心，必然为人民所唾弃。辛亥革命影响下产生的民主思想的高涨，在反袁斗争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袁世凯死后，进步党人和西南实力派开始与北洋军阀寻求妥协，以期南北相持局面的结束。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原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6月29日，黎元洪召开国会，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7月14日，护国军方面宣布撤销军务院。25日，中国革命党发出通告，宣布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护国战争到此正式宣告结束。

护国运动是一场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运动。护国战争打破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幻想，结束了袁的反动统治，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共同心愿，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是，护国战争的胜利果实最终又归于北洋军阀段祺瑞，国家政权并没有发生根本转移，中国社会并没有因此摆脱北洋军阀专制独裁的黑暗统治。

注释：

①芮恩施：《一位驻华的美国外交官》，第130页。

②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39页。

③《政府公报》，1915年12月12日。

④《大公报》，1914年4月24日。

⑤《致黄兴书》，《孙中山选集》，第110页。

⑥《中华革命党总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邹鲁全集》，台北三民书局，1976年版，第161页。

⑦《蔡松坡先生遗集》第1卷，第20页。

⑧《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0页。

⑨《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袁世凯国记》下册，第13页。

⑩《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4～285页。

宋教仁被刺　议会道路破灭

临时政府北迁后，袁世凯立即着手准备把“临时大总统”改为正式大总统，并在民主共和的幌子下实行专制集权。

1912 年 3 月，袁世凯经南京临时参议院同意，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在南京组织了第一届内阁。唐绍仪在清末是深得袁世凯信任的官僚，这时加入了同盟会，以“调和南北”自居。在唐内阁中，同盟会员担任着重要职位，如国务总理唐绍仪、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刘揆一、司法总长伍廷芳、教育总长蔡元培，但一些关键职位如陆军总长一职则由袁世凯的亲信担任。连同唐绍仪在内的十个内阁中，同盟会员占了半数，所以这个内阁也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或“唐宋内阁”。4 月初，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这样，所谓的“共和”取得了胜利，南北也宣告“统一”。

南北的“统一”，实际上是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等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妥协的结果。尽管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政权，但此时民主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民主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在这种形势下，他还不敢公开反对共和制度。相反，只能信誓旦旦地表示“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①]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已经让出了中央的主要权利，但他们仍然控制着南方数省和参议院的多数，在社会上有着较大的影响。他们是保卫共和政体、捍卫共和制度的中流砥柱。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在政治上依附于袁世凯，同时也积极要求改良政治。他们还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云南和贵州两省，因此他们在北洋军阀和革命派之间，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正是在这种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下，从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人民的政治热情十分高涨，整个社会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武昌起义后，封建专制政权土崩瓦解，国人被压抑的政治热情和对新鲜

事物的浓厚兴趣日趋高涨，势不可挡。禁朋党、畏党祸的历史传统不复存在，入党结社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成为一时流行的风尚。各种社团、政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正如时人所说："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近百。"[②]1912 年 10 月，仅在民政部立案的团体就有 85 个，其中包括政治团体 22 个。[③]众多的政党合法并存，相互竞争。临时参议院的存在，第一届国会的选举和成立，表明议会民主制仍然是革命派以及改良派努力争取的目标。议员们为了限制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坚持斗争，从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共和政体，捍卫了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民主空气的浓厚，民主潮流的高涨，使反映社会舆论的报纸业受到了人民的普遍关注，一时间"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据统计，辛亥革命后的半年内，全国的报纸由 10 年前的 100 多种，猛增至近 500 种，总销数达到 4 200 万份。其中，在北京出版的就有 50 多种。许多报纸以监督政府为己任，议论时政得失，评说政府官员，甚至公开斥责大总统。

伴随着民主政治热潮的出现，创办实业在这一时期也蓬勃兴起。各种实业团体如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民生团以及河南、山西、陕西、安徽、苏州、镇江等地方实业协会纷纷成立，试图乘共和政体成立的"运会"，实现产业革命以此来振兴中国。1911 年～1913 年，全国共成立实业团体 72 家，几乎遍及了各大省区。许多政党都把发展实业列为政纲，许多政党领袖都兼有企业家的身份。中国民族工业在辛亥革命的推动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民间兴办厂矿的活动，无论在规模、声势和范围上，呈现出了空前绝后的景象。特别是中小资本和工场手工业迅速增加，湖南"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④]；黑龙江"自民国革新以来，有陈、朱、孟、徐诸君组织之惠通耀华各工厂，复继有磁业公司之组织，而光华火柴，兰海火磨各公司相继发现"。[⑤]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兴办实业的热情。

文化教育也呈现了勃勃生机。1912 年，大中小学学生总数超过 1911 年的一倍，其中女学生增加得更多。由于"社会对政治兴味非常亢进"，政法学校和大学法科学生猛增。资产阶级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移风易俗。

在社会形势渐好的情况下，各派政治力量迅速分化、重组。为了谋求自身政治权利，各党派展开了激烈竞争，开始了"政党政治"的尝试。

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章太炎与江浙立宪派组成了统一党。孙武、刘成禺等湖北部分同盟会员则拥护黎元洪，组成民社。1912 年 5 月，统一党又联

合民社等政团，组成共和党。共和党是当时在临时参议院中占有席位和同盟会大体相等的一个大党。它以黎元洪为领袖，骨干分子有张謇、程德全等人，主张“保持全国统一，取国家主义”，实际上拥护袁世凯，反对同盟会。后来，章太炎等人退出了共和党，重新组建了统一党。除此之外，还有蔡锷、王之详、孙毓筠等的统一共和党；林长民、汤化龙等的共和建设讨论会；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等大小政团300多个。这些政党团体数目众多，主要是来自原有的革命、立宪派、旧官僚三派势力的分化组合。其中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为三大党。同盟会在参议院居优势地位，共和党拥护袁世凯，而统一共和党则更接近同盟会。

同盟会希望用“责任内阁”来约束袁世凯，唐绍仪的内阁政府确实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唐绍仪虽然深得袁世凯的赏识与信任，但他却是一个思想开明的官僚，事事强调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经国务院副署的“责任”，对袁破坏民主的行为进行了一定抵制。袁对此十分不满，于是他唆使内阁中的亲信与唐对抗，又不经唐副署直接发布任免命令，迫使唐绍仪辞职。“责任内阁”遭到破坏，唐绍仪及同盟会的四个阁员被迫辞职，改良派的两个阁员随之辞退。

对唐内阁倒台，同盟会内部反映不同。宋教仁向往西方的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并以此为众生奋斗的目标。他主张积极从事民主政治的建设，经过民主选举产生国会，制定宪法，实行“责任内阁制”，以保障宪法的贯彻执行。此时，孙中山对政治抱着悲观情绪，希望袁世凯维持现状，自己则专心从事交通、实业建设，为民国谋长远的利益。黄兴对消极对待政治，1912年6月，他主动撤消了“南京留守府”，解散南京临时政府的军队。其他一些“地方实力派”如李烈钧、胡汉民等人主张地方自治，积极巩固自己的地盘，很少过问其他斗争。戴天仇、何海鸣等“激烈分子”，对袁世凯执政多有不满，提出要用武力推翻袁世凯的统治，但既无组织，又无核心，不能左右政局。

1912年8月，经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宋教仁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几个小党派，组成国民党，推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为理事。实际上，整个党务为宋教仁代理，实权为宋掌握。国民党宣布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国民党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政党，但其政治纲领中把“平均地权”改为含混的“采用民生政策”，又删除了体现反封建精神的“男女平权”的主



张，还将原来的“力谋国际平等”，改为“维持国际和平”。其革命精神与同盟会相比已大为减弱。国民党在“新旧合作”的口号下，把大批官僚、政客、投机分子拉入党内，其自身组织也更加涣散。但由于吸收了各方面人物参加，声势浩大，在临时参议院中占多数，成为第一大党。和国民党并立的还有两湖、江浙的原立宪派为核心的共和党，以章炳麟为首的统一党和以梁启超为首的民主党。这些党派由于势力较小，没有组阁的希望，便提出了“超然内阁”的主张，向袁世凯靠拢，要求分享政权。

袁世凯提名无党派人士陆徵祥为国务总理。陆徵祥向临时参议院补提六个国务员时，遭到了参议院的否决。袁世凯见自己提拔的人员没有通过，便指使反动军警通电、通函、召开会议，痛斥参议院，甚至以武力解散相威胁。陆徵祥再次提出了六个国务员名单时，迫于压力，参议院让其通过了五人。但随即提出弹劾陆徵祥失职案。陆徵祥从此称病住进医院，袁世凯又任命其亲信内务总长赵秉钧代总理。

为了稳定政局，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加紧开展对革命派的攻心战术。他在大搞独裁统治的同时，多次重申自己“忠于共和”的诺言，极力笼络革命党人与之“精诚”合作，甚至以欺骗手法邀请孙中山、黄兴到北京“共商国是”。而当时同盟会内部思想极为混乱，就连孙中山、黄兴都产生了“功成身退”，从事实业的幼稚想法。早在1912年4月，孙中山解职后不久，他就发表演讲说：“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会革命尚未着手。故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紧要。……仆此次解职，即愿为一人民事业之发起人”。后来他在同盟会饯别会上说：“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当效力的，惟在此事。”他还表示10年内不问政治，以在野身份筹款60亿元，筑路20万里，使中国早日富强。

1912年8月，孙、黄抵京，袁世凯“百般地曲意相从”，称孙中山为“革命元勋”，使孙中山进一步落入圈套。入京期间，两人多次会谈，孙中山每谈一个实业计划，袁都点头称是。一次谈话中，孙中山提出不当正式大总统候选人，专门从事修筑铁路，希望袁训练精兵100万，袁欣然应允，高呼“孙中山先生万岁”。9月，孙中山接受全国铁路督办的任命，高兴地回到上海，成立全国铁路总公司。接着，袁世凯也尊黄兴为“革命元勋”，任命他为川粤铁路督办。25日，袁发表了所谓四巨头协定的“八大纲领”，宣布“立国取统一制度”、“收束武备”、“整理财政”、“维持秩序”等等，为

其进一步专制集权制造了法律依据。孙、黄陷入了袁世凯的圈套，此后袁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加快了独裁统治的脚步。

从1912年12月到1913年2月，第一届国会选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宋教仁等全力投入到了竞选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获得了392个议席，占有绝对优势，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计仅占223个议席，遭到了严重挫败。宋教仁以为选举获胜，就可以出面组织责任内阁，因此兴奋不已。他踌躇满志地在周游长江流域各省，沿途发表演说，抨击袁世凯政府，反复宣传国民党的政见，满怀信心地准备北上组阁，实现它的政治抱负。他甚至还制定了一个废弃袁世凯，另选黎元洪为总统的"大计划"。但宋教仁的天真想法，在当时并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他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北洋军阀手中的武力。

袁世凯对国民党在议会竞选中的胜利并不害怕，他决定要用铁血手段扑灭民主势力。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准备北上组阁，当他在上海车站准备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时，袁指使亡命徒连开数枪，他倒在了议会政治的血泊之中。22日，这位年仅31岁的政治家与世长辞了。临终前，还不知道向他开枪的幕后指使者正是袁世凯。他请黄兴代笔给袁拍电报，报告自己的不幸，并希望"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宋教仁的悲剧再次暴露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宣告了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幻想的破灭。

袁世凯在得知宋教仁被刺后，大为"惊愕"，电令江苏地方官吏"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可是，清查的结果，发现直接部署暗杀的就是袁世凯的心腹、内阁总理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背后主使者正是袁世凯本人。残酷的斗争现实，使孙中山等人"欲治民国"、"袁总统适足当之"的幻觉中清醒过来，开始感受到辛亥革命的流产所带来的沉痛打击。

宋教仁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值得后人称道与尊敬。当时，人们在哀悼他时评价道："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⑥

注释：

①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2页；《袁大总统文牍类编》，第2页。

②丁世峰：《民国一年来之政党》，《国是》，1913（1）。
③《远生遗著》第2卷，第24页。
④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49页。
⑤《黑龙江大兴工业》，《时事新报》，1913年1月27日。
⑥陶菊隐：《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4页。

二次革命失败　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建立

刺杀宋教仁的案件很快被查明，其幕后的操纵者正是现任总统袁世凯。4 月 26 日，宋案公布，全国舆论一片哗然。袁世凯竟不顾革命派的反对，公然向共和制度发起进攻，结果“全国人心鼎沸，国贼国贼之声，震于寰宇。”[①]《民权报》连续发表了《胆大妄为之袁世凯》、《大总统之叛逆》等文章，批判袁世凯为“专制魔王”，提出了“以暴易暴，惨无人道，欲真共和，重为改造”的口号。4 月 13 日，宋教仁追悼大会在上海举行，全国各地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沉痛悼念这位誓死捍卫民主共和制的革命志士，怒斥袁世凯的反动独裁统治，时人无不群情激愤。

宋教仁案的发生，惊醒了许多对袁世凯抱有幻想的革命党人，他们重新走上了积极的反袁道路。孙中山获悉宋教仁被刺的消息后，立即从日本返国，主张立即兴师讨袁。他说：“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②]但孙中山的正确主张难以得到贯彻，响应者寥寥无几。当时担任地方都督的许多国民党人，对武装讨袁没有信心，另一部分国民党议员贪恋官禄，主张在国会中进行“法律解决”，汪精卫等人甚至公开为袁世凯帮腔。只有江西都督李烈钧等少数人支持武力讨伐的主张。在国民党内部极不团结一心的情况下，孙中山纵有满腔的讨袁热情，也很难将国民党的力量真正集中起来。

就在国民党内部举棋不定的时候，袁世凯早已做好了内战的准备。4 月初，他通过参谋部下达了秘密动员令，准备派军队南下，消灭南方异己势力。为了筹集革命战争经费，他不经国会同意于 4 月 26 日夜，指派赵秉钧和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同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代表签订了 2 500 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其年息为 4 厘，扣除折扣、到期的借款和赔款，袁世凯实际能拿到手的不过 760 万英镑，而规定 47 年还清的

本利则高达6 785万英镑。尽管条件苛刻，但袁世凯为了购买军械、扩充军队、收买南方海陆军，发动内战，悍然签订了借款合同。

“善后大借款”没有提交国会审议。国会中国民党议员强烈反对这项借款，并不予以承认。袁世凯立即指使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合并，组成了以梁启超为实际掌权者的进步党，以对抗国民党。他还授意北方各省都督通电斥责国会反对借款是“不顾大体，无理取闹”，向国民党议员施加压力，打压他们的反抗呼声。通过多种手段，国会最终落入了袁世凯之手。

袁世凯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充分暴露了专制独裁的真实面目。他斥责国民党人“破坏民国”，还攻击孙中山、黄兴，说他们“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还扬言“彼等若敢另组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3]5月1日，他起用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确立了“战时内阁”体制。6月9日，他借口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曾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不“服从政府”，下令将他们予以免职。7月5日，北洋军南下九江，发动反革命内战。

面对袁世凯的步步紧逼，国民党人被迫起来应战。7月12日，李烈钧奉孙中山命令由上海回到江西湖口誓师，宣布起义，发表讨袁通电。黄兴迫于形势，也在15日逼使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讨袁，自任讨袁军总司令，宣告“法律解决，既无实效，仍不得不诉之于武力，作最后之解决。”[4]接着，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重庆等省区先后宣布独立。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二次革命”。

然而，革命派的行动为时已晚。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袁世凯的力量已经到了可以控制全国政局的地步，而革命派的力量则已大大削弱。更重要的是，他们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放弃了原先的革命纲领，严重脱离了民众，内部涣散无力。所以，各省虽然宣布了武力讨袁，但独立的各省之间互不统属，彼此观望，革命力量十分脆弱。

袁世凯以江西、南京为进攻重点。战争主要在这一带进行，故“二次革命”又称赣宁之役。江西方面，湖口的讨袁军遭到了北洋军的水陆攻击，于7月25日败退，湖口失守。在南京，袁世凯用金钱收买了部分讨袁军队，发生了内变，国民党军很快战退，南京被占。28日，黄兴因军事失利出走，程德全通电取消独立。8月13日，上海的陈其美等弃吴淞炮台而去，上海失陷。安徽的柏文蔚也被袁军追逐。随后，其他各地相继取消独立。至此，

"二次革命"仅持续两个月便以失败而告终。资产阶级革命派控制的地方政权全部丧失，北洋军阀势力乘机控制了整个长江流域。孙中山和黄兴再度逃往日本。

在"二次革命"期间，各地也发生了许多自发的群众反袁斗争。其中河南白朗起义军活跃于豫西、鄂北广大地区，影响甚大。但由于革命派没能与之建立起联盟，这些群众的反抗斗争也相继被各个击破。

在袁世凯加紧破坏民主共和制度的情形下，孙中山重新举起了革命民主派的旗帜，毅然发动了"二次革命"，"为巩固共和战，为表示国民反对专制战"。[5]这是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抵抗北洋军阀反革命暴力镇压的义战。从这个意义上说，"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由于革命已经退潮，国民党的涣散瓦解，党员脱离领袖，阶级脱离政党，政党严重脱离群众，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袁世凯武力进攻面前，惨遭失败。

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孙中山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幻想同反动派妥协，在中国推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振兴实业，促进近代化，结果不能不使"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了皇帝，又来了皇帝，来了军阀。"[6]"二次革命"的失败使民国初年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时期。

袁世凯以武力镇压了南方的"二次革命"，而在北京却保留着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他假惺惺地宣布要尊重议员的权利，目的是要国会选他做正式大总统。1913 年 7 月，为了给自己的专制装饰门面，他任命进步党人熊希龄为内阁总理。9 月内阁组成，只有司法、教育、农商等少数总长职位由进步党认识梁启超、张謇等分别担任，而陆军、内务、外交等重要部门则牢牢掌握在袁世凯的嫡系军阀、官僚手中。由于梁启超、张謇等人都是社会名流，这个内阁也被人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

在用武力实现"统一"后，袁世凯便急于使自己由临时大总统变为正式大总统。本来国会应该先制度宪法，然后依照宪法选举总统。但袁世凯为了尽快攫取正式大总统的职位，主张国会应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他指使党徒发表通电，要求先选总统，后制宪法。在内外压力下，进步党和国民党先后赞同先选总统的意见。9 月，国会顺利通过了选举总统案。同时，袁世凯又指使梁士诒收买了一批议员，组成了公民党，让其在国会内大肆活动，并通电各省都督，要他们拥护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10 月 4 日，国会

讨论通过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的总统选举法。

按照袁世凯的意愿，他要求在武昌起义两周年时登上总统宝座。于是，国会在10月6日召开了总统选举会。选举这天，袁世凯仍放心不下，命令京师警察厅和拱卫军联合派出军警“保卫”国会。接着，又派出便衣警察千余人，打着“公民团”旗帜，把会场围住，扬言“非将公民所瞩望的总统选出，不许选举人出会场一步！”议员们忍饥挨饿，从早上8时到晚上10时，连续投票三次，知道宣布了选举结果之后，“公民团”才在一片“袁大总统万岁”的呼啸声中撤走。第二天，国会又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10月10日，袁世凯特意在太和殿举行就职仪式，俨然以皇帝自居。4月8日，国会召开时美国首先承认了中华民国。继美国之后，英、法、俄、日、德等13国也先后承认了中华民国，表示支持袁世凯政府。

袁世凯登上大总统的宝座之后，便决定把政党和国会一脚踢开。他公然宣称：“议会政治之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也。”⑦他以《临时约法》对总统的权利限制过多为理由，要求在宪法制定之前修改《临时约法》，增加总统的紧急命令权和财政紧急处分权。他唆使在各省的亲信反对国会制定的“宪法草案”，说它“妨害”国家者“甚多”，是议员“干犯”行政，企图“国会专制”，要求解散国会。11月4日，他借口国民党议员与“二次革命”有牵连，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资格，派出军警连夜追缴他们的议员证书、徽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名存实亡。12月，袁世凯制造了一个御用机构“政治会议”。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公然下令取消国会。随后，他又下令撤销各省议会，停办地方自治。

熊希龄内阁在部署了所有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设立政治会议等命令之后，不再为袁世凯所需要。1914年2月，袁世凯指使其党羽制造种种舆论对熊希龄内阁进行攻击，迫使他辞职。

解散国会后，袁世凯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废除《临时约法》。1914年3月，他授意政治会议召开约法会议。依据袁世凯提出的“修改约法大纲七条”，约法会议很快就炮制出所谓的《中华民国约法》。5月1日，袁世凯正式公布，同时废除《临时约法》。这个约法将总统的权利扩大到了与专制皇帝相似的程度。改责任内阁为总统制；撤销国务员，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作为办事机构，政事堂以“国务卿”为首脑。经袁世凯提名，首任国务卿是他的把兄弟、清末“相国”徐世昌。根据这部约法，又成立了行立法机关职权的参政院，其成员全由袁世凯任命，且大多是清朝遗老和袁的亲信官

僚、政客，进步党的梁启超等人也被纳入其中，黎元洪任院长。

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参政院修改了《总统选举法》，其中规定：一、总统任期改为十年，任期限界满后，连选连任无限制；二、总统任期届满时，若认为“政治上有必要”，不必改选，即可连任；三、总统继承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被推荐者并无限制。这样，袁世凯不仅可以终身担任总统，还可以由他的子孙后代继任总统。6 月，袁世凯又将各省都督改称为将军。至此，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包括《临时约法》、国会等等，被袁世凯全部破坏，专制独裁统治则被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辛亥革命仅存的一点资产阶级民主制形式被彻底地取消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只剩下了“中华民国”这块空招牌了。时人悲愤地哀叹道：“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8]

这样，无数资产阶级革命志士经过浴血牺牲争取的民主共和，被彻底破坏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的阴谋权术攫取的一干二净。辛亥革命无可挽回地失败了。但辛亥革命却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完整意义上的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摧垮了统治中国 260 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辛亥革命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空前的解放，民主共和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民主思潮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第二，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发展环境。清王朝的垮台，帝国主义势力受到冲击，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一系列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法令，从而刺激了人们兴办实业的积极性。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渐成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扫荡了社会上的陈规陋俗，冲击了人们的传统思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规定以民主共和为教育宗旨，废除读经，提倡男女同

校，新式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封建时代遗留下了的陋习如男人留辫、女人裹脚等统统被废除，社会景象焕然一新。

然而，辛亥革命是不成功的。革命失败以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开始了在中国的黑暗统治。中国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之下，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一个也没有完成。人们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其根本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没有也不可能鲜明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最后只得向列强和封建势力妥协。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从一开始，就没有认识到发动群众的重要性，反而处处压制工农群众的反抗斗争。他们提出了“平均地权”的纲领，但却没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当然就不能团结广大农民这一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它不能动员本阶级的力量，团结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来战胜强大的敌人，最后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打压下归于失败。

这就说明，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革命胜利，也完成不了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对内，推翻封建统治势力，实现民族解放。而要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需要一个更为先进的政党的出现。这样的政党必须具备思想意志统一、组织严密、政纲先进、纪律严明等条件。而辛亥革命恰恰缺少这样一个领导核心，这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也是它留给后人的沉痛教训。

注释：

①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3），第69页。

②《孙中山选集》，第542页。

③《时报》，1913年5月24日。

④《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致上海各西报电》，《民立报》，1913年7月22日。

⑤《李烈钧将军自传》，第30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3页。

⑦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22页。

⑧《民立报》，1912年9月13日。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袁世凯破坏共和、复辟帝制的反动行径，不得人心，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断反抗。除中华革命党继续进行反袁斗争外，一些原来对他抱有幻想的人，也看透了他的一心称帝的野心，纷纷离他而去。帝国主义国家看到形势的变化，为了维护他们在华的商务利益，也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失去帝国主义支持的袁世凯，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在众判亲离的窘境中，他被迫取消帝制，恢复内阁制。1916 年 6 月 6 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病死。

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国家失去了他们共同的在华代理人。一时间他们也找不到可以替代袁世凯的最佳人选。于是，他们各自寻找和扶植自己的代理人。北洋军阀的实际掌权者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也分别投靠各个帝国主义，自成派系，拥兵自重。从此，中国进入一个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

军阀割据在近代中国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近代中国生产力落后，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小农经济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主导地位。这种以地方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业经济，客观上为军阀割据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袁世凯下台后，中国缺少一个能被各方公认的领袖人物，于是他们必须寻找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军阀派系，以维持在华统治的话语权。军阀割据得到列强的支持后，愈演愈烈，内乱不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在袁世凯垮台之前，北洋军阀已经形成了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袁世凯死后，两派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日趋激烈。段祺瑞（1865 年～1936 年），安徽合肥人。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后赴德国留学。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成为他的心腹。民国以后，历任陆军总长代国务院总理。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得到了日本的背后支持。他控制着北京的中央政权，并占据安徽、陕西、山东、浙江、福建等省，以北洋派正统



自居，势力最大。冯国璋，直隶河间人。早年也就读于天津北洋武备学堂。袁世凯窃国后，任直隶督军兼禁卫军总统。冯国璋以英、美为后台，控制着江苏、江西、湖北等广大地盘，势力仅次于皖系军阀。除了这两大派系外，还有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他原先占据奉天一带，护国战争期间，乘机在东北三省扩张势力。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下，成为除皖、直两系之间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在这三大势力之外，还有山西的晋系阎锡山、徐州的张勋等大小军阀。在西南，各省军阀自行其是，积极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其中势力最大的有两派，一个是唐继尧的滇系，一个是陆荣廷的桂系。滇系占据云南、贵州两省，在护国战争中向四川扩张，与四川军阀进行争夺。桂系则控制着广东、广西和湖南等地区，势力不可小看。两派都以英美为后台。

袁世凯死后，南北军阀围绕所谓新《约法》展开了争斗。段祺瑞依据袁世凯炮制的新《约法》(《中华民国约法》)，以国务院名义发布了由副总统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的通电。这一行为，立即遭到了护国军的坚决反对。当时，唐继尧等南方军阀把持的军务院，梁启超等进步党人，孙中山、黄兴等原国民党人，以及北洋军阀内部如冯国璋等各派势力，都支持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抵制所谓的新《约法》。面对全国一致的反对和声讨，段祺瑞被迫暂时退让。1916 年 6 月，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同时恢复了《临时约法》和国会，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7 月，军务院撤销。各省取消独立，南北表面上又归于统一。

临时约法和国会的恢复，引起了各系军阀对政府内部权力的争斗。当时在国会中，议员居多的国民党和进步党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派。进步党人梁启超、汤化龙等组成了宪法研究会，也称研究系。他们攻击原国民党，支持段祺瑞的统治。以国民党人张继为代表的部分议员组成了宪政商榷会，主张把《临时约法》作为制定宪法的基础。研究系与商榷系的斗争，首先在宪法问题上反映出来。研究系主张中央集权，省长由中央任命。这实际上，反映了段祺瑞等北洋军阀的态度。而商榷系则坚持把地方制度列入宪法，实行省长民选，并给予地方一定的自治地位，反对北洋军阀的集权统治。他们的意见代表了不当权的资产阶级和与段有矛盾的某些地方军阀的利益。双方各不相让，1916 年 12 月 8 日，宪法审议会进行第四次投票表决，两派斗争更加猛烈，甚至大打出手。段祺瑞以日本为后台，掌握着北京政府的实权，勾结研究系，对黎元洪施加压力。黎元洪和副总统冯国璋依靠英、美帝国主

义，拉拢商榷系，与段祺瑞集团争夺领导权，形成了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所谓的“府院之争”。

1917 年，围绕“参战问题”，“府院之争”更加尖锐化了。这年 2 月，德国宣布将以潜艇无限制封锁海面，还击沉了美国的商船。美国随即与德国断交，准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要求中国与它采取一致行动，并答应向中国提供参战借款。日本得知后，唯恐美国因此获得对中国更大的控制，也积极怂恿段祺瑞参战，还向段祺瑞表示向其提供贷款，而且可以用这些借款编练参战军，用于“先清内外”。段祺瑞为了扩充皖系势力，立即附和日本的建议，积极主张参战。美国见中国参战将促进日本与段祺瑞的勾结，反而对自己不利，便又指使黎元洪等人进行抵制。从这可以看出，“府院之争”实际上是美、日在中国的利益纷争。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矛盾，不是在于是否参战，而是由谁来主持参战的问题。谁能主持参战，谁就能乘机扩大自己派系的实力。

段祺瑞以参战为名来扩充武力的企图，受到了一些地方军阀的反对。在国会中，研究系的议员完全追随段祺瑞，支持对德宣战；而多数国民党人持反对态度。3 月，国会通过了对德绝交案。当时，国会内已外形成了很强烈的反对参战的舆论。1917 年 4 月，段祺瑞在北京召集各省督军开会，组成了以皖系军阀为主干的“督军团”，通过了对德宣战案。黎元洪被迫在提案上盖了印。5 月 10，段祺瑞效法袁世凯的伎俩，指使军警流氓数千人组成“公民请愿团”，包围国会，殴打议员，强迫国会通过参战案。段祺瑞的武力威胁没有吓倒议员们，他们抵制了对德宣战案。19 日，国会复议对德宣战案时，决议暂缓讨论。这样，对德宣战的问题，被搁置起来了。黎元洪在美国的支持下，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内阁总理的职务。段祺瑞不甘心轻易放弃中央政权，他唆使皖系、奉系 8 省军阀宣布独立，并于 6 月初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总参谋处”，准备进攻北京。“府院之争”就此达到极点。面对段祺瑞的武力威胁，黎元洪无计可施，只能求助自成一派的辫子军大帅张勋来京调解。这就为张勋复辟提供了良机，一场复辟闹剧开始上演。

自清朝统治结束后，力图复辟清廷的活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辛亥革命时，张勋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巡抚兼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民国以后，袁世凯给了他一个长江巡阅使的头衔，屯兵徐州。张勋和他的部下，一直留着长辫子，表示怀念旧主、效忠清朝。因此，人们称这支军队为“辫子军”，称张勋为“辫帅”。1916 年 6 月，张勋就已经开始谋划把清废帝溥仪再次扶上



帝位，他多次在徐州开会进行密谋复辟。到了1917年，他见段、黎有矛盾，可以加以利用，于是上演了一场“丁巳复辟”的丑剧。

除张勋这股复辟势力外，还存在着其他的复辟力量。曾任陕甘总督的升允，辛亥革命时期在陕甘武装反抗失利后，逃至黑龙江，勾结日本和俄国，组成了“勤王军”、“满蒙举事团”，成为一支强大的武装复辟势力。以恭亲王王溥伟、肃亲王善耆为首的王公贵族复辟势力，也曾活跃一时。当初清廷举行“让国御前会议”时，溥伟等人即坚决反对逊位，拒绝“优待清室条件”，同时反对把最高权力让给袁世凯。清朝垮台后，他们逃往青岛、大连，投靠了俄国、德国和日本，从事复辟活动。还有一股复辟势力，他们是封建时代的遗老，对旧社会恋恋不舍，因此一直图谋重回清王朝。他们散居在上海、青岛、天津、徐州、北京、南昌等大城市。这些人思想顽固，跟不上时代潮流，对民主共和嗤之以鼻。他们有的成立“孔教会”、“读经会”各色团体，有的著书立说，攻击民主共和思潮，为抵制复辟制造舆论，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复辟势力所以能生存下来，还与帝国主义的支持分不开。日本就是这股势力的支持者。日本为了达到侵华的险恶用心，极力在中国制造“内乱”，以便从中谋利。为此，它与清朝复辟势力的各派力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北方，它帮助善耆编练“勤王军”，策动“满蒙独立运动”的武装叛乱，幻想“进占东三省”，实现全国复辟。

1917年6月7日，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率3 000辫子军北上。8日，张勋的辫子军进入北京，他本人则在天津停留。他在天津会见了段祺瑞。段表示只要解散国会，赶走黎元洪，“复辟一事，自可商量”。[①]张勋电致黎元洪必须解散国会，否则就用武力征讨。14日，张勋进入北京。各地王公贵族和封建遗老喜出望外，纷纷涌入北京。7月1日凌晨，张勋率文武官员300余人，进入清宫，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清朝复辟，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恢复清末旧制，大封百官。一时间，北京城里三角龙旗纷飞，封建余孽个个粉墨登场，弹冠相庆，一片乌烟瘴气。

张勋复辟的行为，立即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北京市民纷纷拒挂龙旗，许多报纸自动停刊，以示抗议。湖南、广东、上海等地人民举行集会，愤怒声讨张勋的复辟罪行，要求“护法讨贼”。在张勋老家江西，声讨愈演愈烈。长沙市民万人集会，誓师拥护共和，呼吁出师讨伐。在人民斗争的推动下，孙中山继续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进行反帝制、反北洋军阀的斗

争。当张勋复辟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孙中山异常愤怒，表示“誓不与共天日”，立即着手筹划兴师讨伐，并发表了《讨逆宣言》。随后南下广州，准备建立与复辟势力斗争的根据地。

此时，段祺瑞看到驱逐黎元洪、解散国会的目的已经达到，而且复辟帝制不得人心，于是他借助反复辟的声势，乘机而起。7 月 2 日，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组织了“讨逆军”，自任总司令，宣布讨伐张勋。12 日，“讨逆军”攻入北京，辫子军被打散，张勋逃入荷兰使馆，其他复辟分子也如鸟兽散，溥仪再次宣布退位。这次复辟前后只有 12 天，在全国人民的一片谩骂声中宣告失败。段祺瑞再次出任国务总理，重掌北京政权大权。黎元洪通电下野，由副总统冯国璋继任总统，但实权仍完全被段祺瑞把持。

重新掌权的段祺瑞，放手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大肆出卖国家主权利益，扩张皖系势力。1917 年 8 月 14 日，段祺瑞政府正式对德奥宣战，并以参战为名，向日本借款购买军火，扩充皖系军力，实现“武力统一”的目的。到 1918 年，日本秘密地或公开地借给段祺瑞政府的款项总数达 5 亿日元以上。这些借款大部分由日本政客西原龟三经办，所以统称“西元借款”。通过这些借款，日本从段祺瑞政府攫取了大量权益。如段政府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并将东北的吉长、吉会铁路及满蒙五铁路、多座金矿、森林，还有印花税、交通银行等抵押给日本；允许日本派遣军官训练中国军队。1918 年 5 月，段祺瑞又和日本签订了反苏卖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取得了战时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利，并把七八万军队开往中国东北。

段祺瑞对外投靠日本，对内则实行独裁统治。他借口参战，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换取大量借款，以实现其“武力统一”的野心。他重任国务总理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并勾结研究系政客准备召集由各省军阀指派的“临时参议院”。对此，孙中山非常失望，他也看清了段祺瑞等人是“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

注释：

①《张勋致电》，《复辟始末记》卷上，文艺编译社，1917 年版，第 17 页。

各派军阀混战　民族灾难加深

20世纪20年代初，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略夺日益加深，它们的代理人直系和皖系、奉系之间的矛盾被迅速激化，其他各地军阀为了抢占地盘，争夺权益，时而为私利联合，时而分赃火拼。从此，中国出现了军阀长期混战的动荡局面。其中地方性军阀的火拼，以西南军阀在四川的混战最为典型；中央军阀的大混战，以直、皖、奉三大派系的互相残杀为代表。民初这些的军阀混战，造成了政局动乱，破坏了国家统一，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920年7月，直系和皖系为了争夺统治权，爆发了北洋系统分裂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直皖战争。直系首领冯国璋、皖系首领段祺瑞，都是袁世凯的心腹大将，但两人为争权夺宠，一直面和心不合。袁世凯死后，两派之间斗争愈加激烈。1918年10月，冯国璋代总统任期届满，段祺瑞便指使以徐树铮为首的“安福俱乐部”，操纵新国会的选举。结果冯国璋被挤出了总统府，徐世昌当选为下届大总统。冯国璋下台后，曹锟、吴佩孚成了直系军阀的新首领。段祺瑞手里掌握着北京政府大权，他利用安福国会指挥内阁，排挤直系势力，结果引起了直系军阀的严重不满。

10月以后，段祺瑞先后出任参战督办和边防督办，继续把持中央大权。他依仗日本的财力、武器支持，于1919年成立了参战军，后改为边防军，作为他的嫡系部队。6月中旬，段祺瑞推举其心腹徐树铮出任西北筹编使兼西北边防总司令。徐树铮到任后，乘机编练了5个旅的西北边防军，并掌控了西北的一切军政大权。不久，徐树铮又取得了督办外蒙善后事宜和张恰铁路的权利。这样，皖系的势力扩张到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和外蒙地区。皖系势力的大肆扩张，加速了直皖两系的利益冲突，也对奉系军阀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迫于形势，直系和奉系决定联系起来，共同反对皖系。1919年秋冬，在曹锟的串联下，直系的四省督军和奉系的东北三省督军，正式成立了7省反皖同盟。第二年，河南督军加入，扩充为8省联盟。与此同时，直系

吴佩孚则在湘南前线与西南军阀的代表签订了“救国同盟草约”。这样，直系就与奉系、桂滇系结成了3方反段军事同盟。1920年春，8省反皖同盟共同密谋了反皖计划，在解散安福系及国会、支持吴佩孚北上等问题上达成一致。至此，直皖间的矛盾已发展到无法调和的地步，混战即将一触即发。

皖系以日本为后台，直系以英美为靠山，而日本与英美之间在华利益向来都有冲突。实际上，直皖两系的战争，就是日本与英美在中国的利益矛盾的反映。双方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加紧了调兵遣将的备战。1920年3月中旬，作为讨伐西南时的前敌总指挥吴佩孚，以未发军饷为由，从湖南衡阳撤兵至河南郑州，发表反对皖系宣言。接着，冯玉祥旅也筹得“10万开拔费”，自常德统兵北上。此时，段祺瑞将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调回京畿附近，以备不测。6月，段成立定国军并自任总司令，委派段芝贵、曲同丰、魏宗翰分任各路总司令。大总统徐世昌也感到皖系军阀的威胁甚大，于是借直奉联合的声势，下令免去了徐树铮西北筹边使及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等职。段祺瑞看到这些措施会使他们失去现有实权，便决定先发制人，对直系发动战争。7月10日，皖系下达了总攻击令。

7月12日，曹锟、张作霖联名通电讨段，13日，吴佩孚通电斥责段祺瑞为卖国汉奸。第二天，直皖战争正式爆发。双发军队在京汉铁路与津浦线间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展开了激战。17日，西路的吴佩孚所率直军与皖系曲同丰所部大战于涿州之北，在奉军援助下，皖军大败，曲同丰被俘，中路皖军陈文远弃械逃跑，旅长张国榕、齐宝善投降。东路徐树铮部曾一度击败直军曹瑛的军队，越过杨村占领北仓。同日，奉军加入了直军作战，徐树铮见形势大变，匆忙逃往北京，他的军队也就不战而降了。19日，军力大减的段祺瑞，宣布辞职。随后，奉直联军进驻南苑，办理军事善后，直皖战争宣告结束。在直奉军阀的授意下，总统徐世昌随即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免去段祺瑞的职务，裁撤边防督办事务处，并解散安福国会和西北边防军，惩处徐树铮等10人。皖系北京政府因此而垮台，其势力仅仅剩下了浙江的卢永祥部。从此，北京中央政权落入了以直系为主的直奉两系军阀的手中。

直皖战争中，直奉两系联合对付皖系，并取得了北京政权，英、美和日本也成了北京政府的共同主人。然而，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是不可协调的，所以，其各自的代理人派系之间的暂时联合也就不可能维持长久了。

直皖战争结束后，为了扩张各自的势力，直、奉两系争先恐后地收编皖



系残军，争夺内阁席位和各省地盘。两派之间又因分赃和地盘之争使新的矛盾日益尖锐。直奉双方争夺中央政权的斗争尤为激烈。奉张直曹“合作”控制北洋政府之初，经过一番明争暗斗，他们共推靳云鹏出面组阁。这期间，张作霖将奉系势力由东三省扩张到热、察、绥特别区及京、津、库伦等地，成了“东北王兼满蒙王”及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直系的曹锟和吴佩孚则除了掌控中枢权利外，还让手下的大将们抢占了长江中下游和华北、西北各省地盘。双方的矛盾变得更加激化了。靳云鹏与张作霖是亲家，与曹锟是结拜兄弟，又与吴佩孚是同乡。但由于靳的态度更接近直系，张作霖便以“征蒙”为名赴京，迫使靳云鹏内阁辞职。1920 年 12 月，亲日的梁士诒内阁成立。梁士诒上台后，推行亲日外交，积极为奉系效力，赦免了以往被通缉的皖系军阀和政客，极力压制直系将领吴佩孚。这引起了直系的强烈反对。吴佩孚一面电斥梁士诒是卖国媚外的帝制余孽，同时还联合直系 6 省督军，以脱离政府为辞，呈请总统徐世昌免去梁士诒职务。梁士诒下台后，奉张直吴双方的矛盾已不可收拾，直奉大战迫在眉睫。

1922 年 4 月，在日本政府的怂恿和支持下，决心与直系一决高下的张作霖，于军粮城组成了镇威军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以张作相、张景惠分任东西两路总指挥。直系军阀吴佩孚，也以英美为靠山，分兵御敌抗奉。这次战争，奉系投入兵力 12 万，直系也有 10 万兵力。双方军队在东路津浦线、西路京汉线附近地区进行激战。4 月 29 日，第一次直奉大战正式打响，双方在长辛店、固安、马厂等地先后开始交战。交战之初各有胜负，后来直系吴佩孚以主力迂回到奉军侧背，对奉军内部进行分化。5 月 4 日，奉系第十六师邹芬部在阵前倒戈，导致奉军西线崩溃；接着奉军东线也在直军重击下全线溃散，张作霖等仓皇逃往滦州。直奉此战只打了 6 天，即以直胜奉败而告终。在直军的穷追猛打下，张作霖退出山海关，宣布东三省“自治”，自己仍为“东北王”。

奉系战败后，总统徐世昌在直系的包围和威逼下，下令惩办梁士诒等人，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和蒙僵经略使，免去张作霖的所有职务。5 月 12 日，张作霖宣布东三省实行“联省自治”，自称“奉军总司令”。不久，张作霖又在东北宣布“闭关自治”，自称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6 月 18 日，直奉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式结束，北京政权完全落入了直系军阀的手中。

对这次直奉战争的失败，张作霖并不甘心。退出关外后，他在日本的支

持下整编奉军，健全兵种，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同时，他积极加紧与孙中山、段祺瑞联系，强化“三角反直同盟”，并与直系内的冯玉祥订立反直密约，准备与直系再决雌雄。1924 年 9 月 3 日，江浙战争爆发后，张作霖通电响应卢永祥对直系作战，并于 15 日重组镇威司令部，亲率 17 万大军入关讨直。而此时，直系曹锟、吴佩孚等也已做好了再战的准备。他们成立了讨逆军司令部，投入兵力达 20 万之多，分东、中、西 3 路，抵抗奉军的进攻。17 日后，双方军队在山海关、九门口一线拉开了战争的序幕。九门口、石门寨被攻下后，先与张作霖有约的直系将领冯玉祥，于 21 日率直系第三军倒戈回师。抵京后，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逼曹下令免去吴佩孚的本兼各职，并将废帝溥仪逐出紫禁城。前线直系军官获悉后，军心动摇、阵脚大乱。奉系乘胜追击，在山海关一带将直军精锐歼灭，并入关围困了大部直军。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率残部从大沽口乘船南逃。第二次直奉混战以奉系大胜直系而结束。此时，奉系军阀势力发展到了顶峰。北京政权从此被张作霖、段祺瑞掌控。

直皖奉军阀除了上面这几次比较大的混战外，还有 1924 年 9 月至 10 月间，江苏直系齐燮林部与浙江皖系卢永祥部的江浙战争；10 月至 11 月，直系孙传芳与皖奉系杨宇霆、姜登选的浙奉战争；11 月至 12 月，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的战争；1924 年春秋间，奉鲁联军及奉直联军先后进攻冯玉祥国民军的战争等等。

北方军阀内斗的同时，南方军阀也在为各自的利益而相互混战。就在直皖战争爆发不久，就发生了粤桂战争。

1917 年，当时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实权。他任命广西军阀陆荣廷为广东督军。3 月，又任命他为两广巡阅使，任命陆的亲信陈炳坤为粤都，谭浩明为桂都。从此，两广被桂系陆荣廷所控制。7 月，孙中山到达广州，发起护法运动，依靠桂系的力量建立了护法军政府。但各省的军阀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参加护法运动。孙中山的护法运动没有成功，自己反而被排挤出了广东。军政府成了由桂、滇等军阀控制的政权。孙中山对桂系军阀极为不满，力图打倒桂系在两广的势力。于是，他找到了粤军领袖陈炯明。陈炯明部是在护法军政府时，由孙中山改编的，后来被桂系排挤到福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此时已在闽南有了一定的根基。1920 年 7 月，陆荣廷以讨伐福州北军为名，进攻粤军。8 月 11 日，桂系控制的军政府发出了动员令，兵分三路进攻福建。12 日，陈炯明率粤军回师广东，在漳州公园举行誓师大会，

也兵分三路，迎击桂军。

8月16日，粤桂战争正式开始。由于桂军在广东祸国殃民、鱼肉百姓，人民对他们十分憎恨。而粤军则得到了广东各地军民的支持，军事上连连取胜。桂军受到了打击，毫无斗志，望风而逃。10月22日，粤军攻占了惠州，直逼广州。岑春煊见大势已去，于23日通电去职。第二天，陆荣廷宣布撤销军政府。26日，桂系督军莫荣新宣布广东取消自主，随即率残部逃出广州。

桂军被逐出广州后，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受到广东军民的热烈欢迎。到达广州后，孙中山重新组建了军政府。29日，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选举了各部部长。孙中山兼任内务部长，唐绍仪、唐继尧、陈炯明、伍廷芳、徐谦、汤廷光、李烈钧分任财政、交通、陆军、外交、司法、海军、参谋等各部部长，派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

粤桂战争桂系退回广西后，孙中山随即决定讨伐广西。1921年5月，广东召开非常国会，决定成立正式政府。国会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正式就职，再次举起了护法大旗。6月，孙中山以大总统兼陆军大元帅的名义，率兵讨伐广西的桂系军阀。6月13日，桂军沈鸿英派兵进攻广东，北江防军赖世璜、李明扬等败退韶关。陈炯明派第一师师长邓铿为北江总指挥。抵抗沈军，第二次粤桂战争就此爆发。

面对粤军的攻势，桂军将领刘震寰宣布独立。在他的协助下，粤军于6月21日攻下了梧州。26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7月，李烈钧在桂西北成立了“滇黔赣讨陆联军总司令”，准备进攻桂林、柳州。粤军所到之处，所向披靡，接连取胜。7月9日，沈鸿英以“救桂军总司令”的名义，宣布广西“自治”，与陆荣廷脱离关系，柳州、桂林、贵县等地纷纷响应。

7月中旬，粤军由梧州西进，大败高雷、钦廉一带桂军。陆荣廷见大势已去，于16日通电宣布下野，由南宁逃往龙州。8月5日，粤军占领了南宁。9月3日，占领了龙州，陆荣廷逃亡，第二次粤桂战争结束。

直、皖、奉军阀除了上面这几次比较大的混战外，还有1924年9月至10月间，江苏直系齐燮林部与浙江皖系卢永祥部的江浙战争；10月至11月，直系孙传芳与皖奉系杨宇霆、姜登选的浙奉战争；11月至12月，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的战争；1924年春秋间，奉鲁联军及奉直联军先后进攻

冯玉祥国民军的战争等等。

北洋军阀和各地军阀的混战，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为了应对战争的庞大军费开支，这些军阀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出卖国家主权和地方权向西方列强大举借债；二是滥发公债及增加税捐等来疯狂地掠夺贫民百姓。1918 年，北京政府发行的各种公债券竟高达 1. 39 亿元，当时中央全年军费支出只有 2. 03 亿元，也就是说，中央全年军费的 68. 5% 用在了军阀战争上。这一时期，地方军阀频于内战，由于缺乏资金来源，也对人民进行无情的掠夺与洗劫，其恶劣程度更是触目惊心。如湖南发行的纸币就“不下六七种”[①]，弄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而张作霖在东北疯狂征税，“仅第二次奉直战争，就向东三省人民摊派了 4 800 万元”。[②]军阀混战除了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还导致了许多人民家破人亡。据统计，在 1918 年的南北交战中，醴陵“全县被杀人数达二万以上，房屋被毁达 1 5000 栋，财产损失达二千万”；宝庆县之“城厢内外，及各乡百里间，凡兵队经过驻扎之处，几使家无幸免，女无完节，户少炊烟，路断行人，伤心惨目，天日为暗”[③]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痛苦和灾难，使广大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注释：

①黄征：《段祺瑞与皖系军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63 页、第 165 页。

②王鸿宾：《张作霖与奉系军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29 页。

③《湖南历史资料》，1959 年第 3 期，第 115 页。

新启蒙运动在中国的兴起

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专制主义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平等、自由思想的传入，使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受到了一定的冲击。辛亥革命的胜利，摧垮了长期统治中国的封建帝制，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在时代大潮下奄奄一息。然而，袁世凯上台后，竟逆历史潮流而动，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在国内掀起了尊孔复古的逆流，辛亥革命带来的民主共和新气象又消失在专制复辟的冰水之中了。

正当资产阶级的领导者离群索居之时，一批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顺应时代变迁，积极倡导民主科学，猛烈地抨击封建专制主义，以 1915 年 9 月《青年杂志》（第 2 卷改名为《新青年》）的创刊为标志，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从此，激进民主主义思潮如狂飙巨澜席卷着中国大地。

“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一般被称为启蒙运动。从含义上看，“启蒙”二字带有启封建之蒙的意思。因为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统治下，封建的专制主义思想造成了人们的愚昧无知。为了打破加在人民头上的思想枷锁，启发民智，开阔视野，日益发展和壮大的资产阶级需要一个思想上的启蒙运动。因此，我们说中国的启蒙运动是反封建的产物。

欧洲的启蒙运动则要早于中国，它可以上溯到 14 世纪到 16 世纪的文艺复兴。这一时期，欧洲正经历着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度的历史转折。文艺复兴，是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借助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所发起的弘扬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的运动。它的出现反映了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兴起。文艺复兴运动借助古典文化，对教会和神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使人们从封建愚昧中解放出来，摆脱了神学的桎梏，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发现了“人”的力量，建立起了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世界观，为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壮大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这场文艺复兴运动是思想文化领域中一次伟大的变革，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产生。

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将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下去。但是，西方列强的大肆侵略，使中国失去了这样的发展机遇，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同时，西方国家又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带入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西方现代文明中，看到了救国救民的希望。他们紧紧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开始了强仆后继的探索。救亡呼唤启蒙，新文化运动首先就是在西方文明传入的过程中，慢慢积累了发生的因子。

自鸦片战争发生后不久，西方的学说，特别是自然科学就在中国开始传播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在与西方的接触中，认识到了自然科学的重要性，积极主张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也开始羡慕外国的“船坚炮利”。当时，清朝的一些有志之士，率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要求学习外国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以达到抵抗外侮。但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顽固的当权派视西方的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

大规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也使他们看到了利用洋枪、洋炮镇压革命的重要性。于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封建官僚开始兴办洋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投资创办近代企业。他们陆续创办了机器制造局、新式造船厂、轮船局、电报局等现代化企业。为了培养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他们开始在中国设立洋务学堂，教授西方科学知识。1861 年，他们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同文馆，随后，上海、广州、福州、天津、武昌、南京等地，也陆续设立了洋务学堂。通过这些学堂，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如当时福建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就开设了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等课程，教授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

为了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清政府还派了大量留学生出国。而不论是办学堂，或是向外国派遣留学生，洋务派其目的都是要学习外国的“长技”，培养技术人才，维护腐朽的清王朝统治。洋务派所能容许的学习范围仅限于科学技术，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他们是十分排斥的。所以国内洋务学堂的学习科目，仅被限定在自然科学；出国的留学生的学习范围也被规定在军政、船政、数学、制造诸学等。1887 年，清政府以西方新学开科取士，也只是添设了算学一科。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清朝的惨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惨痛的事实启发了人们，要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不能仅仅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还要改变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因此，在甲午战争后，主张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维新运动兴起了。“新学”的输入突破了自然科学的范畴，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开始在中国传播。法学启蒙运动中的一些名著，就是在这时开始传到中国的。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等西方名著。除严复翻译的这几本主要著作外，还有许多西方哲学、社会政治经济学及各国历史的著作，也被逐渐翻译成中文。至1904年，这方面的书籍已达二百五十多种。资产阶级改良派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的资产阶级学说，但并不主张使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统治，而只是想通过自上而下的维新变革来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然而，改良派在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时，却夹杂了许多“封建余毒”。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①]他们极力主张推行与封建制度相妥协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自始至终表现出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依赖、妥协的倾向，所以注定了他们要失败。

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介绍过西学，作过一些启蒙工作。但是，他们所介绍的西学，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远远不够的。辛亥革命过程中，革命派对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批判传统观念做过一些努力，但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夹缝里生长起来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政治上、经济上具有天然的软弱性。他们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宣传民主思想的同时，也带有一些封建思想的残余。因此，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但却没能攻破封建主义的思想堡垒。它没有发动广大群众，所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不能取得胜利。

辛亥革命失败后，反动政治势力疯狂反扑，在思想文化方面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人们对民主共和的期待彻底破碎了。袁世凯控制的北洋政府公开命令尊孔读经，企图在“保存国粹”的幌子下，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从1912年开始，各地纷纷成立了各种名目的尊孔复古组织，比如孔教会、孔道会、孔社、宗圣会、尊崇孔道会、尊孔文社、经学会、读经会等等。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康有为的孔教会。康有为常以孔圣人自居，对辛亥革命后废除尊孔读经深感不满。1913年底，刚从国外回来的康有为就电致

袁世凯："尊圣卫道，想公同心，冀出援手，圣教幸甚。"[②]还说："亘古未有之变，俎豆废祀，弦诵绝声，大惊深忧"；[③]"灭国不足计"，而灭孔教"是与灭种同其惨祸"。他设立孔教会，发行《不忍》杂志，连篇累牍地攻击共和制，鼓吹非孔教、非复辟不能就中国。他还掀起了请愿活动，要求中国当"以孔教为国教"，"编入宪法"。

袁世凯窃国后，严重破坏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一度改革过的学校教育。1914 年，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下令："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尚孟，以端其基而致其用。"在学校教育的内容上，又规定"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如此一来，就辛亥革命以来革命派进行的一些教育改革从根本上被废除了。

袁世凯不仅破坏革命派的教育改革，还摧残了刚刚兴起的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思想。辛亥革命时，全国约有 500 家左右的报纸，"二次革命"后，进步报刊遭到封闭，主笔、记者或是被逮捕，或是被枪杀，报纸数量大大减少。结果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家报纸，不仅销路大减，而且从内容上也丧失了革命气息。

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的阶级局限性，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最终成果还是落入了封建军阀手中。在短暂的民主共和之后，中国社会又回到了袁世凯的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对当时的历史状况，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对同盟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④]这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派解决不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先进的中国人必然要继续寻找救亡图存的真理。只不过，当时他们的思想并未完全突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局限。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所以在中国行不通，其原因不在这个方案本身，而是由于中国人的思想还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因此，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就缺少思想的根基。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一场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拉开了历史的序幕。

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是戊戌变法以来民主思想的延续

和发展，特别是辛亥革命反对封建文化思想的继承和深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虽然被封建军阀所窃取，但它的影响力却历史深远。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使民主革命的历史潮流成为不可抵抗之势。此后，谁要想逆历史潮流而动，在中国实行专制独裁统治，都会遭到人民的唾弃，中国社会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从张勋的复辟帝制，再到袁世凯的尊孔读经，种种企图破坏民主共和的行为，无不在在人民的反对声中销声匿迹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新兴社会力量的壮大，亿万群众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以及孙中山等老一辈革命军对民主、自由，对国家富强的追求，都在不同程度提出了在中国进行一场思想革命的要求。可以说，民主革命的大潮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有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各国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华掠夺，中国的民族资本工商业抓住这一机会，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所谓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民族资产阶级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要求有统一的市场和合理的税收等等，但是当时中国仍处于封建军阀的统治下，这些发展条件很难得到满足。在整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封建剥削制度基本上被原模原样地继承下来了。全国多数农民仍然被束缚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导致中国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农村购买力极其薄弱，由此也使得国内市场狭窄，轻工业原料供应不足，民族工商业难以自由地、充分地发展。同时，民族经济还要受到军阀官僚政府的压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战频繁，常对工商业造成损害。但其主要损害在于捐税及征敛”。苛捐杂税使得经营民族工商业很难获利或只能获得微利。这些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反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就是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要求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在思想领域里的反映。

新兴社会力量的产生，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群众基础。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通过新式学校、教会学校、留学和其他的大众传播媒介，中国的新知识分子开始出现，并逐渐在社会中形成了新的力量。20世纪初，这些思想活跃、视野广阔，富有爱国感情的新知识分子大量涌现。作为新知识分子的上层和核心的留学生，虽然在数量上不及国内的新知识分子，但他们在外国留学多年，目睹了西方国家的现代文明，对西方的文化有着比较丰富的感性和理性的了解。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国内从维新到革命的政治变迁，对中国的衰弱和腐朽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他们思想活跃，对政治时局有着

敏锐的洞察力，这些人逐渐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当时，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知识分子都曾留学国外，又都受到过辛亥革命的洗礼，他们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向往西方民主制度，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推动者。

在北洋军阀黑暗的统治下，这些激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力图为中国思想文化界指出新的发展方向。他们反省过去，在文化思想领域发动了一场反对封建复古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斗争，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

注释：

①④《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②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 923 页。

③《致北京孔教会电》，《康有为政论集》（下），第 921 页。

《新青年》创刊　开启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因其刊名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物《上海青年》雷同，所以从第二卷起便更名为《新青年》。

《新青年》创办时，中国正处于深重的内忧外患之中。政治上，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落入袁世凯之手。袁世凯建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加紧谋划封建复辟。思想文化上，竭力提倡封建道德和尊孔读经的旧文化，鼓吹复古思想，宣扬鬼神迷信，人民依然深受专制主义的思想束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为了救国救民，积极寻找新的出路。他们从现实斗争的实际出发，认为要实现民主共和，须从思想启蒙，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替代封建主义思想，唤醒民众。曾参加辛亥革命的知识分子们，从过去热衷于政党政治活动转向了思想启蒙运动。

就是在这样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新青年》创办起来了，它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后来，《新青年》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青年》杂志是16开，月刊，每出满6号为一卷，从创刊到1922年7月止，共刊出9卷54号。

《新青年》杂志创刊号和《社告》中说，它的宗旨是“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在《通讯》栏里又说：“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判时政，非其旨也。”这表明陈独秀想让自己和《新青年》摆脱旧的政党活动，致力于发动一场“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运动。陈独秀本以为《新青年》会“轰动一时”，但《新青年》第1卷影响并不大，每期印数仅千份，出满一卷后即宣告休刊。

由于第1卷没有达到理想的宣传效果，陈独秀对《新青年》进行了调整。从1916年9月第2卷起，他把“改造青年思想，辅导青年修养”的宗旨和现实的社会政治、青年的思想实际结合起来。经过调整后的《新青年》，其影响力日益扩大。1917年初，陈独秀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

任该校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之迁往北京出版。来到北京后，一批进步教授、学者被吸引到《新青年》的杂志中，从事编辑部工作。这样，《新青年》就由陈独秀个人主编发展成为拥有一支优秀编者、作者队伍的同人刊物。从1918年1月第4卷第1号开始，新青年社友组成编辑部，共同研究，轮值主编。据沈尹默回忆："《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人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除这些轮值编辑人外，主要撰稿人还有鲁迅、周作人、高一涵、陶孟和、王星拱、陈大齐、张申府等。如此一来，以《新青年》为中心，大体上形成了一个新文化阵营。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发动了一场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

从创刊到五四运动之前，《新青年》的新文化运动以启蒙为中心，其启蒙主张围绕以下主题而展开：

人权自由。陈独秀对法国的人权说推崇备至。他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写道："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①

在陈独秀看来，人权的重要性绝不次于进化论，他把人权放在了新文明价值的首要地位。"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权利自由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权力自由，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②胡适则十分欣赏易卜生"健全的个人主义"，并区分了三种个人主义：一种是假的个人主义，或称为我主义；一种是独善的个人主义，采取出世或避世的方式，"要想在现社会之外另寻一种独善的理想生活"；一种是真的个人主义，亦称个性主义，其特性是独立思想，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蒋梦麟倡导个人主义和个性主义。他主张，对社会国家而言，要倡导个人主义；平民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平等，就是保障个人之说；对文化教育而言，也要倡导个性主义。发展个性，养成特才，这样文化才能得以发达。

民主自由。《新青年》提出了两大口号，一是民主，另一个是科学，即



“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iense）。陈独秀将“民主”和“科学”，归为现代文明的两大核心要素，并将其列为中国现代化的两大基本目标。陈强调，现代国家是民主的国家，而非民奴的国家。民主国家是真国家，它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民奴国家是伪国家，它以执政为主人，以人民为奴隶。李大钊在《劳动教育问题》一文中曾指出：“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有 Democracy 的颜色，都沿着 Democracy 的轨辙。政治上有他，经济上也有他；社会上有他，伦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学上、艺术上，凡在人类生活中占一部位的东西，靡有不受他支配的。简单一句话，Democracy 就是现代唯一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 Democracy 的时代”。五四时期著名思想家谭平山也认为，现时代思想的根本特质在于民治主义，而所谓的民治主义就是平等自由的观念。

科学理性。所谓科学理性就是提倡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中国是一个长期受封建主义统治的国家，鬼神之说曾十分盛行。辛亥革命失败后，反动派不仅提倡尊孔读经，还大力宣扬鬼神之说。然而，鬼神之说与科学理性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自然不能被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的《新青年》所容忍。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纷纷发表文章对其进行猛烈批判。北大心理学教授陈大齐，运用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基本原理，论证了鬼神之说为无稽之谈，实为荒谬。陈独秀认为，当今人类已进入科学的时代，中国人欲脱离蒙昧时代，必须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民主和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易白沙在《新青年》5 卷上发表了《诸子无神论》一文，介绍了中国历史上王充等人的无神论学说，并尖锐地指出：“鬼神之势大张，国家之运告终”。鲁迅在他的《随感录》中对这场论争做了科学的总结：“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

孔教批判。孔家店是民主和科学的大敌。针对“五四”前的尊孔逆流，《新青年》进行了有力的反击。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认为，孔教是帝制的伦理基础，并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阐述。陈独秀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对康有为执意把孔教定为国教的论调，批判说“别尊卑、重阶级、事天尊君”这些孔教思想，正为历代帝王所利用。袁世凯帝制虽然失败了，可是“康先生”很怕人们丢掉“帝制根本思想”，所以仍然“锐意提倡”。李大钊也发表文章对孔教和帝制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孔子是“历代专制之护符”、“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将孔教载入宪法是“专制复活之先

声”。[3]他们还认为，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对于这个问题，陈独秀有着独到的见解，集中体现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他指出，现代生活以个人独立主义为原则，它兼有伦理上之个人人格独立、经济上之个人财产独立和政治上个人精神独立的含义。而孔教属于封建时代的道德礼教，与个人独立主义相违，故孔子之道不合于现代生活。胡适也批判说礼教的节烈观念是一种男子专制的贞操论。批判最为强烈的要属文学巨匠鲁迅。他在《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愤怒地揭露了几千年来封建礼教的真面目：“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他对“吃人的礼教”的声讨，则成为启蒙运动颠覆礼教最有力的口号。

文学革命。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又一个重要的内容。1917 年 1 月，《新青年》2 卷 5 号刊载了胡适寄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论文《文学改良刍议》，文中提出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模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呻吟；五、务去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胡适的文章发表后，陈独秀随即撰《文学革命论》刊于《新青年》，以“文学革命”来呼应胡适的文学革新主张。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新青年》文学革命的领军人，也十分赞同陈独秀“以白话文为文学之正宗”的主张，多次给反对文学革命的言论以有力地回击。《新青年》在倡导文学革命的过程中，从第 4 卷第 1 号起大量刊载介绍西方近现代文学的名著。先后译载的有屠格涅夫、高尔基、莫泊桑、莎士比亚、歌德、易卜生、辛克莱、安徒生、但丁、泰戈尔等 20 多个国家的百余名作家的作品。同时，《新青年》还对“彻底暴露人生”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和“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文学理论进行了批驳。从而，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也为反封建文化思想提供了武器。

社会主义思想。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开始传入中国。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分子，相继转入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从此，新文化运动逐渐由“伦理革命”向“社会改造”演变。《新青年》也一改其“不谈时政”、专事启蒙的宗旨，转而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重镇。1918 年 11 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两篇政论《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1919 年秋，《新青年》6 卷 5 号刊出由李大钊轮值编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这是《新青年》创刊以来的突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创举。卷首刊载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中概略

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此文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开山之作。李大钊在《新青年》上不遗余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但却遭到了胡适的阻挠和反对。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不久，胡适又在《新青年》7卷2号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阐扬其“输入学理，研究问题，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中国文艺复兴方针。李、胡二文作为五四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代表作，是“问题与主义论战”的继续。1920年12月，《新青年》8卷4号刊载陈独秀编辑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他批评罗素及研究系梁启超、张东荪宣扬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中国的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这反映了《新青年》内部同人矛盾的症结在于要不要宣传布尔什维克的问题上。

随着新文化运动转向社会主义，《新青年》编辑部内部分歧日益加深。1919年10月5日，在《新青年》编辑部会议上，胡适提出《新青年》改同人轮流编辑为其一人编辑。但会议采纳了鲁迅的意见，决定《新青年》自7卷1号起，仍改由陈独秀一人编辑。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遭警厅逮捕的陈独秀，获保释不久即摆脱警方监视而秘密前往上海，从事社会主义活动。不久，陈望道、沈雁冰、李达等左翼知识分子在上海相继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形成了南北两个编辑团体的局面。

1921年初，《新青年》编辑部内部分歧继续加深。胡适复信陈独秀，提出解决《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的三种方案：一、听任《新青年》政治化，而另创一本哲学文学杂志；二、将《新青年》迁回北京，改变内容，声明不谈政治；三、停办。鲁迅、周作人、陶孟和同意杂志迁回北京，但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陈独秀接胡适信后，对其方案极为不满，而未予采纳。自此，《新青年》启蒙阵营趋于解体。

陈、胡的矛盾和《新青年》编辑部的分裂，标志着启蒙运动的瓦解。之后，以胡适为代表的追求中国文艺复兴的知识分子，从《新青年》中分化出去。另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创办了《努力周报》，宣传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新文化人终于分道扬镳。从1921年4月1日，《新青年》在出第8卷第6号时，迁到广州出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1年9月又迁回上海，一度成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1922年7月第9卷6号出版后休刊。1923年6月复刊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仍在广州出版。由瞿秋白担任主编并为主要撰稿人。至1924年12月共出4期后再次休刊。1925年4月改为不定期刊，共出5期，1926年7月最后停办。

《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路标，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产生于中国内忧外患之际，构成了中国启蒙运动的独特时代背景。《新青年》从创办、到发展壮大、再到最后停办，浓缩了人类自启蒙时代以来二百多年的思想历程。它鲜明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时代强音，对以儒家为骨干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价值重估，由此终结了先秦以来两千年的“轴心时代”。它以思想自由和多元价值的为精神追求，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它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确立了中国现代化的两大价值目标，“以法治国”和“科教兴国”仍是我们今天的基本发展战略。它对“人权”和“自主独立之人格”的呼唤，为新时代、新社会的诞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以《新青年》为灵魂的新文化运动，以海纳百川的襟怀和凤凰涅槃的勇气，在迎受世界文明的洗礼中推动了中国文化的转型。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这场启蒙运动“荡涤了封建文化的污泥浊水。”《新青年》以她革命的思想内容、热烈的战斗精神，影响和培育了一代新的革命者。一大批青年受《新青年》的熏陶和影响，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就是其中一位。早年的毛泽东就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经常为《新青年》写稿，并向他热心推荐。受老师的影响，毛泽东成为《新青年》的追随者。他后来回忆：“《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④正是受《新青年》的影响，毛泽东、蔡和森在经受五四运动的洗礼后，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青年时代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等革命先烈也都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和作者。正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下，纷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新青年》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青年们的前进道路，引领着他们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

注释：

①②《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136页，第166页。

③《李大钊选集》，第17页。

④《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5页。

“民主”“科学”与文学革命

新文化运动是由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发起，目的是要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力争实现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1915年9月5日，《新青年》的在上海创刊标志着这场运动的开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反对封建专制和迷信，抨击以孔孟为代表的封建腐朽文化思想。他们还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喊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竖起了民主主义的大旗，向封建主义发起了猛烈攻击。“民主”、“科学”的口号，最初是由陈独秀提出的。他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深刻剖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腐朽，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罪恶，号召青年要担负起改造社会的历史责任。他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为此，他对广大青年提出了六点希望：“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里，陈独秀倡导的科学，指的主要是自然科学的进化论学说；人权，就是包含平等、自由、民主内容在内的天赋人权说。这就明确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努力方向。

在此之前，先进的知识分子们也大都谈论民主，但他们只是从共和、议会、宪法以及程序和手段等视角看待民主，民主仅限于制度的层面。新文化运动中特别强调民主的核心是人权，首先是尊重人，是人的解放，重视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力等，可以概括为人格独立、人权平等和思想自由。《新青年》在创刊号中指出：“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力，载诸宪章，国法不

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新文化健将们强调民主和人权，实际上是要实现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目的。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真正建立起民主制度，国人在“共和政体之下”，却依然“备受专制统治之痛苦”。因此，必须大力宣传民主主义，反对封建军阀专制。1916 年，陈独秀发表了《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强调中国欲求生存，必须抛弃数千年相传的“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在他看来，要真正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依靠全国大多数人民有政治觉悟，而不能希望于“善良政府，贤人政治”。[①]同年 5 月，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大声疾呼：“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②]

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科学，指的是自然科学和科学态度、科学理性，其核心是求实，是一种“事事求诸证实”和“步步皆踏实”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态度。它的对立面是“迷信狂想”。陈独秀认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他特别强调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号召人们用科学态度来对待传统观念和一切社会问题，破除迷信，坚持真理，打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树立“真实的合理的”信仰。[③]胡适倡导“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在他看来，19 世纪是科学史上最光荣的时代，而其最重要的是科学基本观念的变迁，科学家对科学律例不再视为天经地义的永恒“天理”，而是将其看作解释自然现象的有效假设。鲁迅也积极宣传科学思想，他指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主张用“科学”这味药来医治思想上迷信、愚昧、不改现状、不思变革的病。[④]这一时期，《新青年》刊载了许多文章，介绍世界著名科学家发明创造的事迹及生物起源、医学、生理学、物理学等科学知识，开展了对灵学和鬼神之说的批判，大力破除迷信思想，否定“君权神授”、“祸福天定”的谬论，极大地冲击了封建顽固思想。

新文化干将们在宣扬民主、科学，反对专制、迷信的同时，对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封建传统文化，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他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批判维护封建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掀起了“打倒孔家店”大旗。五四之前，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文化严重束缚着人民的思想。孔教是帝制的伦理基础。自西汉以来，孔学就逐步同封建专制主义融合，到宋明理学时期逐渐成了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工具。封建统治者以孔学作为天经地义的正统观念，对人们进



行思想控制。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极力推崇封建纲常名教，掀起了一股尊孔复辟的逆流。1916 年 9 月，鼓吹尊孔、复辟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向北洋军阀政府上书，要求把孔教定为“国教”，并载入宪法，主张把孔孟封建伦理学说作为立国精神，强迫人们信奉。

针对康有为这位孔教教主的谬论，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政论，尖锐地批评了“尊孔”思想和以孔子学说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李大钊也先后发表数篇文章，深刻揭示了封建旧礼教是反动统治赖以维持的思想基础，认为孔子之道不合适今日社会，不能作为国民“修身之大本”。对封建专制文化批评最有利、最猛烈的要属文人鲁迅。1918 年 5 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他在问中，借“狂人”之口，愤怒地揭露了几千年来封建礼教的真面目：“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他对“吃人的礼教”的声讨，则成为启蒙运动颠覆礼教最有力的口号。吴虞在《吃人与礼教》一文中，盛赞鲁迅揭露得彻底。他说：“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残酷极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⑤对此，胡适进一步指出，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挂别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摧碎、烧去！可以看出，胡适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孔子是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的护身符。他还热情地歌颂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学革命，即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力图通过文学革命，把宣传封建思想的旧文学，改造为适合传播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学。最先举起“文学革命”旗帜的是胡适和陈独秀。早在 1904 年，胡适就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文学进化论”的观点。1917 年 1 月，他在《新青年》第 2 卷第 5 号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改革文学体裁和形式的问题，认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词俗语。”后来，胡适又把这八个方面概括成四条，即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里，胡适用“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来概括他的文学

主张，还只是涉及到了文学改革的形式问题。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革命”实际上是由陈独秀发起的。1917 年 2 月，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明确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把文学的革新和政治的革新联系在一起，认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表示“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长‘文学革命军’大旗”，公开宣扬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张：一是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二是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三是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他主张对旧文学必须实行“革故更新”，而不是“朝代鼎替”，认为封建文学和老八股必须彻底打倒。他呼吁中国文学界应像欧洲那样出现一批反对旧文学的战士，并表示“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了前驱。”

鲁迅继《狂人日记》之后，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孔乙己》、《药》等小说，并在该刊的《随感录》栏发表了许多杂文。鲁迅的白话文作品，树立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典范，使文学创作与反封建主义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为新文学树立了真正的典范。

钱玄同、刘半农也是文学革命的积极响应者。他们赞同陈独秀“以白话文为文学之正宗”的主张，多次给反对文学革命的言论以有力的回击。钱玄同对腐朽的旧文学和八股文深恶痛绝，他说：“现在我们认定白话诗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那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作文章是写自己脑筋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对于那些腐朽的旧文学，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才能使新基础稳固。”⑥刘半农在《我的文学改良观》中提出要建立新文学，必须破除迷信，认为旧文学是虚伪文学，正是这种“虚伪文学”和“虚伪道德”相互推波助澜，才阻碍着社会进步。

随着文学革命的日趋深入，许多报刊陆续改用白话文出版。从 1918 年起，《新青年》杂志开始用白话文出版。之后，《每周评论》、《新潮》、《晨报副刊》等也改用白话文出版。其他刊物上的白话作品也日渐增多。新式标点符号也由《新青年》的提倡而推广开来，并逐渐完备。这些改革对于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文学创作的发展，以及国民教育的推广有着积极的作用。文学革命的开展进一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强化了反封建的斗争，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延续，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旧文学的一次激烈交锋。它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武器，对传统封

建专制主义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清除。它大力宣传了民主和科学，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封建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使人们特别是知识青年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促进了全民族的觉醒。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推动者人们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从其内容来看，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其时代的局限性也是不容忽视的。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忽视了人民群众，没有把运动和广大群众相结合。运动的范围仅局限在知识分子圈内，没能调动起工农群众的积极性，也没能从经济上剖析旧思想、旧文化的根源，触动整个封建剥削制度，“批评时政，非其皆也”。[7]在对待中外文化问题上，新文化的倡导者往往带有形式主义的倾向，认为中国文化一切都坏，西方文化一切都好。例如钱玄同为了反孔，主张中国的书籍一律束之高阁，甚至还提出了废灭汉文采用世界语的建议。这种对中国文化一概否定的态度，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脱离了实际，对后来产生了的不良影响。

正当新文化运动逐渐深入发展时，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后不久，即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就在要闻栏里，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同时，上海的《申报》、《时报》，天津的《益世报》、北京的《晨报》等有影响的报纸刊物也都对十月革命进行了介绍。十月革命的爆发其实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新道路，极大地鼓舞了知识分子的革命信心。

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它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帮助中国的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观察国家命运，重新思考自己的问题。受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一部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等，开始认真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使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变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

李大钊是歌颂十月革命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1918年，李大钊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确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十月革命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并阐明了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前途。他热情地写道：“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

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5月，他把轮值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同时，他还在专号上发表了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李大钊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宣传，成了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鲜明特征。

注释：

①《新青年》第1卷，第6号。
②《李大钊文集》上册，第175页。
③《偶像破坏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
④《随感录》33、38，《新青年》第5卷，第4、5号。
⑤吴虞：《吃人与礼仪》，《吴虞文录》卷上，第71页。
⑥《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81年2月。
⑦《新青年》第□卷，第1号，1951年9月。

偶像破除运动与打倒孔家店

自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中国大门后，国人就开始了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历程。他们以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为武器，对封建专制主义文化进行不懈的斗争。数百年来，无数先知先觉们前仆后继，勇于探索，如康有为、梁启超的资本主义改良思想；孙中山、黄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以及一些先进人士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潮等。这些思想的出现，对封建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总体来看，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封建文化在人们思想中的统治地位。辛亥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开始反扑，在思想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以武力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但他并不满足现状，登上总统职位后，又坐上了当皇帝的美梦。他利用手中的武力，开始破坏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逐步策划复辟帝制。而在思想领域，则公开命令尊孔读经，企图在“保存国粹”的幌子下，加强对人们的思想控制。

1912 年 9 月 20 日，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下令“尊崇伦常”，提倡“礼教”，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唯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难。……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这就是说，旧的纲常伦理还不能改变，因为它是维系人心的好工具。这时，袁世凯的尊孔还比较掩饰，他没有公然提倡“尊孔读经”，而用道德说教来转移视线，妄图再度取代国民心中刚刚建立的一点点民主和自由的思想。

1914 年，袁世凯为配合复辟帝制，加紧进行尊孔活动，大造社会舆论。9 月 25 日，袁世凯正式颁发了《祭孔令》，公开恢复了前清的祭孔规定。明令于孔子诞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必须举行祭孔典礼。9 月 28 日，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于早晨 6 点半抵达孔庙，换上了绣有四团

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下围褶紫缎裙，头戴平天冠，由侍从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廕昌引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与此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在省会文庙祭孔，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祭孔。过了几天，他又叫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并自捐银 5 000 元相助。有人甚至发出请愿书，要求北洋政府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同时，教育部明令全国中小学校，恢复讲经、读经。《宪法》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后来，又在《教育纲要》中规定，学生要读《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

在这场复辟帝制逆流中，康有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早在 1912 年 6 月，康有为就攻击辛亥革命时导致“国危民悴”、“纪纲尽费”的“暴民之祸”，咒骂民主共和是“夫号为共和，而实则共争共乱，号为共和，而必至分争分裂；号为博爱，而惨杀日加酷烈；号为自由，而困苦日不聊生，号为平等，则大将中将勋位金章，多如鲫焉。今遂至伏火积薪，万弩持满……”，流露出了对民主共和的憎恨。

在康有为看来，中国不可一日无君。为此，他积极奔走号呼，竭力鼓吹尊孔，为帝制复辟摇旗呐喊。他在担任《不忍》杂志期间，以“当代孔子”自居，把孔子说成是参天地、通鬼神的“教主”，宣扬“孔子之道，本于天……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还公然提出：“今在内地，欲治人心，定风俗，必宜遍立孔教会。”

为了推动尊孔复古运动，康有为积极筹划建立孔教会组织。1912 年 7 月 30 日，他给弟子陈焕章写信，指示其开办孔教会，并为即将成立的孔教会拟出了较为详细的操作方案，力促孔教会的成立。

10 月 7 日，全国孔教总会在上海成立，而当日正值孔子诞辰之日。陈焕章、沈增植、朱祖谋、王人文、梁鼎芬、姚文栋、尚贤堂等为发起人。军阀张勋和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也在发起人之列。孔教会的实际操纵者则是康有为，总部设在上海海宁路西 1789 号。在孔教总会的影响下，新的支会、分会纷纷成立，组织不断扩大。一时间，无论国内的偏远省份，还是繁华城市，都有孔教会的分支机构。仅城市就有上海、北京、天津、济南、青岛、南京、兰州、成都、香港、澳门等。海外如纽约、东京、南洋等，也有孔教会的下级组织。据统计，从总会建立始至 1914 年初，孔教会的各分支机构累计达 140 余个。

孔教会成立后，颁布了《孔教会开办章程》，明确宣布以“倡明孔教，



救济社会”为宗旨，“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仿白鹿之学规，守蓝田之乡约，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敷教在宽……以挽救人心，维持国运，大昌孔子之教，聿昭中国之光”孔教会的目标，是要定孔教为国教，并载入宪法中。孔教会鼓吹纲常名教，攻击自由平等，反对共和政体，以孔教为中国的国魂，认为孔教可以救国。他们还把孔教与西方思潮结合起来，赋予孔子学说以西方文化色彩，认为“孔教者，进步主义，非保守主义；兼爱主义，非独善主义；世界主义，非国别主义；平等主义，非专利主义。”

孔教会人员的构成比较复杂，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1. 清末保皇党人，如康有为、麦孟华、陈焕章等；2. 封建文人名士，如陈三立、王锡蕃、张尔田、林纾等；3. 清朝遗老，如梁鼎芬、沈增植等人 4. 孔氏家族成员，如孔令贻、孔祥霖、孔祥柯等。从出身来看，他们大都是前清举人或进士出身，深受封建文化熏陶。这些人相互配合，极力鼓噪尊孔复古思想。他们或是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或是通电吁请，或是派代表进京请愿……自孔教成立以来，在这些人的渲染下，尊孔复辟之声从未间断。

1913 年 9 月，孔教会在山东曲阜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大会。会议受到北洋政府的高度重视，颇具规模，聚集了全国各界人士。会后，孔教总会迁往北京，推康有为任总会长，陈焕章为主任干事，各地广设支会。

除孔教会外，这期间孔社、孔道会、尊孔文社、宗圣会等尊孔团体也纷纷登场。在这样的气氛中，康有为一面提倡要尊孔，另一面又鼓吹复辟。他指出：“中国承数千年之帝制，本不知共和之情状”、“民习于专制太久，而不能走骤改也”；只有让“旧朝旧君”复辟，才能“弭乱息争”。以康有为、陈焕章为代表的守旧和复古派，在社会的复古风潮，正好迎合了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的野心，最终成了袁世凯的宣传工具。

尊孔复古逆流的形成，还与帝国主义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曾跑到孔教会去演说，公然鼓吹孔教应与基督教“相互和合，互相敬爱，互相劝勉，互相扶助”，以防社会骚动的发生。他还在《孔教会杂志》上发文说：“孔教崇道德，尚伦理，尊为国教，则民德无堕落之虞，此利于国者一也”，支持把孔教定为国教。

沙俄贵族盖沙令在辛亥革命后，也极力鼓吹孔教是中国的基础，只有尊孔，才能使中国实现“古道之复兴”。

1515 年 8 月，总统府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在《亚细亚日报》上发表文

章《共和与君主论》，明目张胆地主张复辟帝制。

袁世凯的日本顾问贺长雄也极力鼓吹中国必须像日本那样实行君主制，才能“立宪而强”。“筹安会”与“尚贤堂”相互配合，为袁世凯的尊孔复辟活动助威呐喊。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尊孔思潮与帝制复辟运动相互交织在一起，持续了近十年之久，对当时的思想文化界产生了不小的动荡。从根本上说，它是帝制复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它既是帝制的幽灵和辩护者，又是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大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社会转型时期新旧思想的激烈冲突。

野心家袁世凯做了几十天的皇帝美梦，终于在国人的谩骂下郁郁而终。张勋的复辟闹剧，也仅仅维持了 12 天，之后便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帝制复辟的事实，映射出了君主专制思想的根深蒂固。这也给民主革命者一个深刻的启示：民主共和所以没能站稳脚跟，说到底是以孔子和孔教为核心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还在相当的地位，孔子的权威和偶像形象依旧束缚着国人的思想。不打破孔子偶像，不批判孔子的道德思想，就无法从根本上遏制复辟浪潮，同时也无法为民主平等思想的传播开辟道路。基于这样的认识，一部分民主主义者，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决定进行一场精神解放运动，对孔子和儒学作出有力的批判。他们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开展了一场偶像破除运动。

这时，以民主和科学为主线的新文化运动正蓬勃兴起。新知识分子们首先举起了“民主”、“科学”的大旗，对封建文化进行了彻底地批判。而要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就要破除孔子的权威地位，打破孔子的偶像形象，把孔子从高高的圣坛上请下来。也就是说，要树立人的“自我权威”，从根上动摇传统的权威主义，猛烈冲击包括孔子在内的旧偶像的束缚。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李大钊，在 1916 年 8 月提出了“振其自我之权威”的命题，以此作为破除偶像破除的理论基础。他认为，个体应从他依附的权威、偶像中解放出来，追求政治上的自由的自我。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对国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使作为未来希望的青年，“自沉于荒冢之内，自缚于偶像之前，破坏其理想，黯暗其灵光。”他列举了现代科学实验始祖培根的学说来证明他的观点。他说：“昔者，培根氏创说，首提出四类偶像，谓欲得真理之奥，必行破坏此四类偶像。”不仅如此，他还拿海涅、尼采的理论，从政治上的自由解放来论证偶像破除的必要。他认为，前



有海涅等“魁俊”，“各奋其颖新之笔，掊击时政，攻排旧制，否认偶像之道德，诅咒形式的信仰，冲决一切陈腐之历史，破坏一切固有文明。”后又尼采“倡言超人哲学”。尤其是尼采的超人哲学，在他看来，是解放人们思想、冲破一切传统偶像束缚的力量。由此，他得出了“孔子生而吾华衰”的结论，彻底否定了传统的权威主义。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是不可动摇的权威，超越世人的偶像。经过各代帝王的渲染，孔子成了道德楷模、智慧力量与治国神器的象征。李大钊则对孔子持具体分析的态度。他指出，先秦时代的孔子，并未让人做自己的傀儡，“使孔子生于今日，或且倡民权自由之大义，亦未可知。”只是到了后来，才被统治者作为偶像加以利用。所以，时人就要打倒这个作为偶像的孔子，树立“自我权威”。

与李大钊一样，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旗手陈独秀，也对孔子的偶像地位进行了有力地批判。他认为，国人应树立自我本位，破除一切偶像，追求政治上的独立与平等。他在《偶像破坏论》中，指出：“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都应该被破坏。”在他看来，“君主也是一种偶像”、“国家也是一种偶像”、“中国女子的贞节牌坊，也算是一种偶像。”他要冲破的偶像，是君主专制与封建道德。“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自我本位，就是自己做主，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要求平等自由，不做“他人”的奴隶。他的反孔言论十分激烈，对冲破传统思想，启发后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鲁迅也加入了对传统封建思想的批判行列。他说：“不论中外，诚然都有偶像。但外国破坏偶像的人多；那影响所及，便成功了宗教改革，法国革命。旧像愈摧破，人类便愈进步；所以现在才有比利时的义战与人道的光明。”显然，鲁迅把偶像的破坏，视为了社会政治进步的动力。在他看来，不摧毁旧社会中形成的权威主义，中国政治上的新陈代谢是不可能的。

为了从根本上扫除专制思想的影响，他们在批孔的时候，往往将孔教与帝制联系起来批判。如陈独秀就指出：“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胡适认为，要废除礼教法制，就要批孔。新文化知识分子将孔子与帝制、礼教联系起来批孔，揭穿了袁世凯、张勋等人打着尊孔招牌而行复辟之本质，对当时的思想界起到了震耳发聩的作用。

这一时期，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表了大量的批评孔子和儒家学说的言论，但应该指出的是，他们反对的只是孔子的偶像及定孔教为一尊

的形式，而非孔子及其思想的全部。如李大钊曾指出："余之抨击孔子，非抨击孔子之本身，乃抨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抨击孔子，乃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陈独秀也认为："愚之非难孔子之动机，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适于今世，乃以今之妄人欲强以不适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故不能已于一言。"[①]胡适后来更明确地解释说，我们批判孔孟，反对孔教，是为了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

总之，新文化的先知们，打着"民主"和"科学"的旗帜，猛烈地对孔子和封建专制思想进行了批判，破除了一切偶像崇拜，解放了国人的思想，在思想文化界点燃了启蒙运动的火炬。在他们的影响下，广大青年掀起了争取民主和追求自由的热潮。

注释：

①陈独秀：《复辟与尊孔》，《独秀文存》第 1 卷，1917 年 8 月，第 116 页。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是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他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毛泽东生前多次谈论陈独秀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极有魅力的进步思想界的领袖，这段光彩照人的历史，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实际上，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陈独秀就是青年革命民主派中的先锋，他活跃在思想战线和政治舞台上，成为风云一时的重要人物。陈独秀（1879年~1942年），字仲甫，笔名三爱、实庵、只眼等，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他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代接受的是封建旧学教育。1896年，陈独秀参加县考，考中了秀才，次年又赴南京考举人，落榜。当时，维新改良运动正蓬勃兴起，一时间宣传维新思想的报刊林立，鼓吹进行改良、实行新政的言论盛行开来。陈独秀深受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思潮的影响，放弃了传统的仕宦旧途，转而走向西方新学。从21岁起的五六年中，他多次东渡日本求学考察。同时，他还在国内外组织团体，创办报刊书社，传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从事反对君主专制的活动。

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在反动势力的打压下先后失败了。《辛丑条约》的签订，充分暴露出了清王朝的腐朽无能，清廷正逐渐沦为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工具。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华民族的生机何在？自幼具有叛逆性格的陈独秀，此时毅然抛弃了对维新派的信仰，从思想到行动日益倾向革命民主派。

1910年10月，陈独秀为求新知、寻真理，东渡日本，到东京（专门）学校学习，参加了“励志会”、“中国青年会”、“拒俄义勇队”等爱国团体。1902年，他从日本回国，在安庆组织了安徽爱国会，并协助在上海的章士钊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日报》，宣传革命思想，推动抗俄运动。1904年

3 月，陈独秀在安庆（后迁芜湖），与人合作创办并主编《安徽俗话报》半月刊。他以“三爱”为笔名，写了大量通俗的时事评论，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激励国民的志气，克服“奴隶根性”。第二年，他与柏文蔚、常恒芳（藩候）等秘密建立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

武昌起义后，他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积极建设新政权，后来任安徽师范学堂教务长。1913 年倒袁的二次革命失败，他被通缉，曾一度陷入消沉苦闷之中。后逃亡上海，闭门读书，研究文字学。1914 年夏，他应邀去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从文稿交往中，结识了李大钊等忧国忧时的友人，后来这些人大多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重要成员。1915 年，陈独秀从日本返回上海，创办了《新青年》，倡导新文化运动。1917 年，他受聘于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迁往北京。陈独秀在北大工作期间，积极宣传新文化，提倡新文学，以民主和科学为思想武器，猛烈地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及孔学儒教。1915 年 9 月 15 日《青年杂志》（第 2 期改为《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自 1918 年起，《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一校一刊”，联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当时的陈独秀是著名的民主派和广受学生尊崇的启蒙导师，被时人比作“思想界的孙黄”[①]、“思想界的明星”[②]。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猛烈批判旧社会、旧思想，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为改造旧社会、创造新文明，起到了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列，用自己的智慧和胆量，不断推动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为新社会、新国民的产生作出了突出贡献。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首要的贡献就是创办了启蒙杂志《新青年》。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并没有给人民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胜利果实落入袁世凯之手。袁世凯建立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社会黑暗到了极点。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彷徨、迷惘，找不到出路。正当大家面临困境之时，1915 年 6 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中国上海。他认为要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③]他认为办杂志“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生”。[④]1915 年 9 月 15 日，经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介绍，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本世纪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新青年》。尽管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它的伟大意义，然而“它一经诞生之后，一个光彩夺目的



思想巨人便出现在众人的面前”。[5]

《新青年》的宗旨，在于革新青年“修身治国之道”，即改革青年思想，使其具有现代国民的品格。在创刊号卷首，由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提出了六大启蒙主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文中将“人权”和“科学”归为中国进步的两大关键，从而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努力方向。这篇著名的启蒙宣言开启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创办人和长期的主编、主持人，积极为《新青年》的发展出谋划策。他制定了《新青年》的发展宗旨和不同阶段的办刊方针，提出开展思想文化斗争的原则，并从社会上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加入到刊物的创办中来。同时，他自己又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一共撰写发表了100多篇政论、专论和杂文，通信专栏署名记者大答疑辩难文章多出自他手。在主持《新青年》的7年中，一次被捕入狱，两次被抄家罚款。不仅如此，他还要承受来自社会封建顽固势力的咒骂，所受人身攻击，更是不计其数。但他始终不畏艰难，坚持《新青年》的革命方向，努力宣扬新思想、新文化。《新青年》能够成为五四时期最著名的舆论重镇，与陈独秀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新青年》以其革命的思想内容、热烈的战斗精神，影响和培育了一代新的革命者。由于受到《新青年》的熏陶和影响，一大批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当时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即是其中的一位。“据当时跟他接近的同学回忆，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外，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各种问题”。[6]除了毛泽东外，青年时代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等革命先烈也都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和作者。正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他们纷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五四运动后，《新青年》日益倾向社会主义。在这一阶段，《新青年》同样发挥了巨大的效用。据统计，从五四运动爆发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新青年》“先后发表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的文章达130篇”，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引导者，陈独秀始终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带头向传统封建思想的堡垒发起了攻击。二十世纪初，“民主”与“科学”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两个陌生的词。陈独秀以人权说作为武器，要求效仿法、

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中国的共和制度，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向西方寻找真理，探索国富民强的道路。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也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并说民主和科学应当并重，"苦舟车之两轮焉"。其后，在实践中更加明确地倡导民主与科学思想。他说："追本溯源，本志国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eienee）两位先生才犯了滔天大罪。"陈独秀认为，《新青年》几年来所做的事情，如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论理、旧政治、旧艺术、旧宗教、旧国粹、旧文学等根本原因就是为了拥护德赛两位先生。

针对当时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尊孔复古逆流，陈独秀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多篇文章，对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进行了有力地批判。他痛斥孔孟之道为"失灵之偶像，过去的化石"，[7]他说，"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进德政治之大原"，它使人失去"独立自主之人格"，变为他人的"附属品"；儒家所提倡的忠孝节义"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8]要想在政治上采取共和立宪制，又想在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9]他反复论证了旧礼教旧道德与民主政治势不两立，尊孔必将导致复辟，孔子之道不能适应现代生活，坚决反对把孔教列入宪法。他认为，要"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10]他号召青年大胆解放思想，冲破封建道德的束缚，成为独立自主的人。这些反对封建礼教的宣传，对长期受封建思想束缚的人民来说，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可以说，此时的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中反封建最坚决的斗士。

新文化运动成效最显著的是文学革命。陈独秀是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最早的一位勇猛战士。早在1916年秋，他就与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讨论文学革命问题。他说："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如何如何?"[11]并要求胡适作一切实的论文寄来。随后胡适在"文学革命"入手的"八事"建议的基础上，写出了《文学改良当议》一文。陈独秀收到胡适寄来的《文学改良刍议》后，十分快慰，立即将其刊登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1917年1月）。紧接着，为了呼应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自己又写成充满战斗激情的《文学革命论》。文章开宗明义，表明他推行文学革命的坚定态度和必胜信念和必胜的信念："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



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中国文化界之所以“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推其原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所以，文学革命已是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他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一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在陈独秀看来，单纯的政治革命，不能改造社会，还必须辅以思想意识、文学艺术的革命，而中国现在的文学不过是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这是封建时代的旧文学，不能适应时代变迁的发展需要，必须以新文学代替旧文学。他指出：旧文学“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因此，陈独秀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鲜明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文学革命兴起后，首先要解决的便是推行白话文，《新青年》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好的示范。1918年1月起，《新青年》第4卷第1号大部分文章都改用通俗易懂的白话。紧接着，胡适的《一念》，沈尹默的《月夜》，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等白话诗，也相继刊载问世。尽管他们的创作不能称作完美，但这毕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批白话诗，这种敢于尝试新事物的勇气，值的后世称道，他们所表现的敢为天下先的勇敢精神，其本身就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5月15日，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这是第一篇白话小说，它借一个狂人的精神活动，对中国的封建社会和反动礼教作了极为深刻的批判。鲁迅在谈起自己怎么做起小说时，还深情地说，那是《新青年》的编辑们“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1918年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又创办《每周评论》，以作为《新青年》的补充和后援。北京大学学生积极响应，次年1月，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新潮》。以此为标志，文学革命的生力军日益壮大。这一年，全国至少有400种白话报面世，著名的有《星期评论》、《建设》、《解放与改造》等。与此同时，《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时事新报》

副刊《学灯》也开始刊载白话文。就连一些政客、军人的报纸为附庸时髦，也不得不请学生出白话文副刊。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几家杂志，如《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也开始使用白话文了。由此可见，白话正日益被全国民众所接受和利用。1920 年 1 月 12 日，中华民国教育部下发命令，规定从当年秋季起，小学校一、二年级国文一律改用白话。之后，全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都用白话教学，文学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同志曾说："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中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⑫在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以顽强的毅力和坚韧的精神为运动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无愧为五四的"总司令"，无愧为思想界的巨人。新文化运动距今已有 80 多年的历史了。当我们将告别百年沧桑的历史，昂首迈入新时代时，我们不可忘记是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新篇章，更不可忘记这场启蒙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是他高喊着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一步步将中国从黑暗和愚昧中引领出来，走向寻求光明、真理的历史征程。

注释：

①《新青年》第 3 卷，第 2 号，1917 年 4 月 1 日。

②毛泽东：《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湘江评论》创刊号，1917 年 7 月 14 日。

③任卓宣：《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传记文学》，第 30 卷 5 号。

④汪孟邹：《亚东简史》，《安徽革命史资料》第 1 辑。

⑤任建树：《陈独秀传》，第 94 页。

⑥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上），第 102 页。

⑦⑩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2 卷 3 号，1916 年 11 月 1 日。

⑧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1 卷 5 号，1916 年 1 月 15 日。

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1 卷 6 号，1916 年 2 月 15 日。

⑪《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1916 年 10 月 5 日，第 5 页。

⑫《毛泽东选集》（新版），第 832 页。

蔡元培与北大教育改革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是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和实践者。他从事教育工作半个多世纪，致力于变革中国专制主义教育理念，探索新式教育体制。他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积贫积弱，其根本原因在于衰败的专制主义教育制度和忠君、尊孔的教育思想。因此，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革除弊政，不仅要推翻清朝的腐败统治，还要改革当时的教育制度，培养具有新思想的人才。他的教育理论与改革实践，为新文化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开辟了肥沃的土壤，在打破封建束缚，传播民主科学、唤醒中国人民方面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梁漱溟所说：他“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新潮流，冲破了社会旧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为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①

1916年袁世凯死后，蔡元培从海外回国。1917年1月，他进入北京大学，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从而开始了他的“教育救国”实践活动。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才改名北京大学。此时的北京大学，旧思想和旧文化十分盛行。学校犹如一座官僚衙门，学生多为官僚或大地主子弟，抱着升官发财的思想上大学。有钱有势的学生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丝毫不感兴趣。教师中不学无术或思想保守者很多，讲课陈陈相因，敷衍塞责。蔡元培就是在这样的学校氛围中赴任北大校长一职的。在就职典礼演说中，他对学生提出三项要求：“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砥砺德行，开展正当娱乐；敬爱师友。”②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引进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实行“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除旧布新，开高教改革之先河，导高校管理之新路，对旧北大作了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

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改革，首先是从教师队伍建设开始的。蔡元培选聘教师，坚持严格的学术要求。他认为，合格的教员不但要求有学问，还要求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而且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此外，还要具有广

博的知识。不但掌握本国的文化，还要对世界的最新学说有所了解。他执掌北大后，选择了从文科入手进行改革。当时在北大文科教员中，顽固守旧的人较多。蔡元培刚到北大几天，就聘请具有革新思想，因创办《新青年》而颇有声望的陈独秀来北大担任文科学长。事实证明，蔡元培的努力是完全值得的。他请来的不仅是一位文科学长、《新青年》的主编、而且是五四及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后，蔡元培又陆续请来了当时致力于新文化的各方面的领导人物，如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杨昌济等来校任教。

理科方面，他聘任了知名的物理学家、相对论学者夏元任学长，其他学有专长的教授有李四光、朱广骅、任鸿隽、翁文瀚等；法科方面，蔡元培改变以前教员多为政府官员兼任的状况，聘请专任教员，同时规定专职教员不得在外校兼课，政府官员不得为专任教员。蔡元培在北大期间，教师队伍呈现出了“年轻化”的态势。据1918年的一项统计，当时北大共有教员217人，其中教授90人，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蔡元培还经常聘请世界知名学者、教授来北大讲学，如他先后邀请世界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罗素、班乐卫、杜威、杜里舒等，来华讲学。

为了发展学术，有效地完成北大的教育改革。蔡元培一方面广延名师，同时大胆辞退了一些不学无术、不尽工作职责的教员。例如，他初到北大时，和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浮药商议，辞退了几个没有学问、只图多赚钱的外国教席。其中有一个法国教席控告他，另一个英国教席要求英国公使朱尔典去同他交涉。蔡元培执意进行教育改革，坚持他的办学理想（人才主义），断然回绝了英国公使的请求。朱尔典出去后对人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面对这种压力，蔡元培却一笑置之，毫不畏惧。

蔡元培主张学术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聚集人才，以求学术的发展。他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应该广泛吸收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让其互相争鸣，自由发展。他认为，不论什么学派，无论其政治态度如何，只要言之有理，有真才实学，就可为我所用。这种“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其实质是向封建主义斗争，为新思想、新文化开拓道路。在北大期间，他也聘请了一些思想保守的人，如黄侃、陈汉章；甚至政治上反动的人，如刘师培（帝制派）、辜鸿铭（复辟派）。刘师培是与章太炎齐名的古文经学家，有深厚的国学根底；辜鸿铭精通英语，能把“四书”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他们被聘到北大后，刘师培讲授经史，辜鸿



铭讲授英国文学。他的这种在当时看来很激进的做法，自然会引来学生的质疑。他说："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③]蔡元培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求得学术的发展。他这种对教员"以学诣为主'"、"积学而热心"的标准，提倡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民主作风，对提高教育质量、繁荣学术、解放思想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整顿和充实教帅队伍的同时，蔡元培对北大的领导体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建立了一些必要的机构和规章制度。首先设立评议会。1917 年前的北大，一切校务都由校长和学监主任、庶务主任等少数人办理，连各科学长也无权过问。蔡元培接任校长后，认为这不利于学校建设和教学活动的开展，于是他模仿德国大学教育制度，把原来由校长、学监主任、庶务主任等少数人掌握教育大权的制度，改为由职员和教授代表组成的评议会制度。学校一切大政方针都由评议会决定，然后各职能部门去贯彻执行。其次，各系成立教授会，推选主任一名，由教授会主任和各科教授分担各系教学行政任务。第三，组织行政会议，对教务以外的事务取合议制，并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如图书出版委员会、训育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建筑委员会等。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这种民主办校的制度，虽然民国初年蔡元培提议执行，并又规定到《大学令》中，但真正付诸实现还是在蔡元培主持北大工作以后。这种改革方案的实施，实际上是将校长权力下放，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师，让真正懂得教育的人来管理学校。这样的改革有助于发扬民主，给教育者以真正的办教育的权利。如此一来，北大从立法、教学到行政管理，形成了一套让教授直接决定学校大事、参与学校管理的组织系统，初步构建了教授治校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这对加强全校管理，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克服分散状态，推动北大向近代资产阶级大学的转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对于旧京师大学堂遗留下来的封建传统和衙门作风来说，"教授治校"无疑是个历史的进步。

注重科学研究，握倡文理互习，这是蔡元培先生组织和指导大学工作的一个重要思想。蔡元培强调学术研究为立校之根本，他又反复指出：大学是教师和学生"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在他到任之前，北大的科学研究十分薄弱。蔡元培任校长后，大力提倡科学研究，强调大学应以学术研究为本位。他认为大学生"但能教室听讲，年考及格"，以"取得毕业证书"为目的，这实际是封建旧式教育思想。他提倡应该分班讲授与专门研究"同时

并进”。之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1918年他拟定在北大创设国文、英文、哲学、政治、经济、法律、数学、物理、化学等九个研究所，千方百计集资扩建图书馆，建设实验室、标本室，为科学研究创造条件。由于他的提倡和重视，北大的科研工作在当时的高校中呈放异彩。

他在北大期间所从事的科研探索与实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他一直把“科学化”作为奋斗目标，致力于建立我国自己的科研阵地和科研队伍，努力把大学办成造就科研人才的重要基地。他说：“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地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在这竞争激烈的二十世纪，更要依靠学术。”④他多次讲到，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原是很有贡献的，只是“经过两千年专制的锢蔽，学术遂致落伍”、“我们以后要想雪去被人轻视的耻辱，恢复我们固有的光荣，只有从学术方面努力。”⑤在他看来，大学首要的任务是抓好科学研究，培养自己的科研人才。在科学研究上，他承认落后，不甘落后，主张依靠自己奋力赶上先进。

二、他重视把科研同教学结合起来，以科研促进教学。他列举大学设立研究所的好处，首先强调的就是有利于更新教材，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他认为，大学教师只讲课不搞科研，“易陷于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有可能“专己守残，不复为进一步之探求”。为了使科研同教学结合得好，他认为大学设立研究所，应与专门的科研机构有所不同，必须兼顾教师和学生的需要。蔡元培坚持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互相促进，应是教学、科研管理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

三、他主张大学生参加科研。他认为大学是教员与学生共同研究的场所，不仅教员要从事研究，大学高年级学生也应参加。在《对于筹办杭州大学之意见》中，他明确提出：“大学课程四年，前两年授各该门一般的功课，后两年入研究所作较专门的研究”。这一主张是有远见的，至今仍然适用。

与注重科学研究的思想相联系，他在学科改革上，主张大学要文理互习，以克服知识上的狭隘性和片面性。当时，他看到了在教学中由于文理科绝对分隔所产生的流弊：“乃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⑦他认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的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⑧为了促进文化科学的发展，他于1918年正式提出：“为融通文理两



科之界限，习文科各门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中之某门（如习史学者，兼习地质学，习哲学者，兼习生物学之类），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之某种（如哲学史、文明史之类）。”⑨

为了实现这些主张，蔡元培首先对北大的科、系设置进行了调整。北大原来是文、理、法、商、工五科并立，没有重点。蔡认为当时的经费与校舍，不能广设各种应用科学。于是，把工科并入北洋大学，商科停招新生，并准备把法科分出去另立专科大学，而集中力量扩充文、理两科。又以原来的预科自为组织，与本科不相衡接，便把预科分属于文、理、法等科，预科的主要教课也由本科教员兼任。1919 年，他实行了废科设系重大调整，废除了文、理、法三科的名称，改称第一、二、三院，又将过去“科”下所属的“门”改为“系”，全校共设十四个系，使学校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从此中国大学行政体制上就没有“科”和“门”，而有“院”和“系”的名称。

在教育和管理学生方面，蔡元培也有许多值得后人称颂之处。在中国旧式的封建教育思想下，学生读书是为了升官发财，享受荣华富贵。在蔡元培初入北大之时，学生不愿学习，一心想依靠裙带关系向上晋升；教员不思进取，固步自封，校园中弥漫着这种腐朽思想。蔡元培在《北大月刊发刊词》中指出这种弊病，“吾国学子承举子、文人之旧习，虽有少数高材生，以知科学为单纯之目的，而大多数或以学校为科举……年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证书之资格，则他无所求；或以学校为书院，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蔡元培认为这是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恶习，它严重阻碍了学术的发展。要革除这种腐败现象，就必须进行改革。所以蔡元培到北大后劝诫学生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应把大学视为当官发财的平台。他一贯反对把大学看成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法，反对学生只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不求新知。为了改观全校学生的学习精神风貌，他一方面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另一方面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蔡元培在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方面大做文章，采取一些具体措施，鼓励和帮助学生成立各种学术团体、研究会，自办社团，自办刊物，形成生动活泼的气氛，还积极提倡课外高尚的娱乐活动，锻炼学生自主的精神，养成服务社会的能力，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由于他的积极提倡和支持，北大校园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当时著名的社团有：阅书报社、进德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社、音乐会、雄辩会、新闻学会、技击会、学生银行、消费公社等。组织社团的不仅限于学生，好多教员也参加进来，蔡元培还兼任好几个会社的会长。在蔡元培的影

响下，学生的自动精神有了很大的提高，加上当时进步教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引导，以及《新青年》、《每周评论》等革命刊物的宣传，促使了许多学生走向社会，参加了政治斗争，由原来的“老爷”，变成了革老爷命的“新青年”了。

蔡元培当校长期间，做的最骇人听闻的事是开放女禁。蔡元培主张男女平等，实行男女同校。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积极鼓吹民权和女权，在“壬子癸丑学制”中，明确规定实行男女同校。他主持北大工作以后，从1920年开始在北大招收女生。那时有一个勇敢的女生王兰（王昆仑的姐姐）向蔡先生请求入学，蔡就让她到北大当了旁听生。这件触动了封建主义神经末梢的小事，当时轰动了全北大、全北京。至此以后，北大在招生时，就允许女生和男生一样地应考了。这不仅在北大校史上，就是在整个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当时也是破天荒的创举，后来各大学争相仿效。

蔡元培先生在主持北大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民主教育改革，打破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专制局面，树立了思想自由、研究学术的新风气，使北大在“五·四”前后已逐步完成了向近代资产阶级大学的转变，建立了一整套资产阶级教育体制。在他的改革下，北大焕发了崭新的精神风貌，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北大改革的成功，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建立了一个稳固的基地，从而使中国近代教育逐步进入一个新时期。蔡元培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先行者，毛泽东称他为“学业泰斗，人世楷模”。[⑩]他那坚持真理、勇于改革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注释：

①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60页。

②《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7页。

③《蔡元培选集》，第79页。

④⑤《现代学生的三个基本条件》，第23~24页。

⑥《论大学应设务科研究所之理由》，《文选》，第230页。

⑦《蔡元培先生言行录》，第92页。

⑧《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文选》，第223页。

⑨《北京大学月刊》，1918年10月30日。

⑩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各种社团的兴起

五四前夕，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国事日蹇。无数爱国志士、热血青年，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积极寻找救国图强的道路。在席卷全国的反帝反封建、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浪潮的冲击下，各种社团和组织犹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事实上，从1918年下半年，在各地区各学校内，已经出现了很多类型的社团。一时间社会上形成了社团繁荣的壮丽景观。

学生救国会。1918年5月，学术界掀起了规模宏大的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斗争。与以往学生运动不同，在这次斗争中学生们已经开始组织起来了。北京的一部分学生（包括北京大学和其他各校的学生）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学生救国会。救国会成立后，为了开展社团活动，派出代表许德珩、易克嶷为代表南下天津、济南、武汉、九江、上海等地进行联络。就在北京学生成立救国会的同时，天津的学生们也自发组织了自己的团体。所以，当北京代表到达天津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天津，他们会见了马骏、郭隆真（女）、谌志笃、马千里、张传琦、张泰来（即张太雷）等人。在随后举行的欢迎会上，张传琦当面砍掉小指，以此来鼓励大家。继天津后，代表们又分别去了济南、武汉、九江、南京等地，会见了当地的学生中的先进分子。

北京学生代表去的最后一站是上海。此时，上海的学生也已组织起来了。七月的一天，他们在龙华体育场召开大会，欢迎并邀请北京学生代表在会上报告学生运动的情况。到会者有几千人之多，而且还有许多工商界的代表参加。上海的妇女界的代表们，经过筹划后，成立了上海女子联合会，宣传爱国思想，抵制日货的蔓延。北京学生在这里会见了“留日归国的女学生李果、程孝福，神舟女学生舒惠贞，黄兴夫人黄宗汉，女子救国会的朱剑霞，还有天津去的刘清扬。”[①]此外，他们在上海还拜会了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人，联系了各大报刊的知名人士和工商业名人，如《民国日报》的邵力子、叶楚伧，《时报》的戈公振，《申报》的史量才，江苏教育会的

黄炎培，商会的虞洽卿、宋宗敬等。1918 年 9 月初，代表们回到北京。由于他们的积极联络，学生救国会不仅几乎成为了全国性的团体，还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同情与支持。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种学生团体是不会得到当局的承认的。救国会的组织活动，受到了军阀们干涉，北京政府教育部曾下训令给北京大学说："该生等此种行动实属秩出教育范围，各该校主管职员对于校内生徒等务各严切告诫……。"[②]

新潮社。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北京大学文科、法科的部分进步学生，成立了新潮社，出版了《新潮》杂志。《新潮》创刊的宗旨，就如其出版启事中宣称的那样："同人等集合同趣组成一月刊杂志，定名曰《新潮》，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判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③]新潮社对社员入社的要求非常严格。想要入社的学生，必须在《新潮》刊载本人投递的规定数量的稿件。其组织章程规定："本校同学投稿三次经本志登载者，有社员二人以上之介绍，得由本社约为社员"；"非本校同学投稿三次经本志登载者，有社员二人以上之介绍，得由本社约为社员。"[④]由于入社条件较为严格，所以新潮社的社员比其他社团人数要少很多。新潮社成立之初，只有 21 人，后来放宽尺度，陆续增加了些成员，但直到 1919 年底，人数也仅有 37 人。新潮社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是傅斯年（编辑部主任编辑）、罗家伦（编辑）、徐彦之（干事部主任干事）等。新潮社设在沙滩北大红楼东北角的一个小房间里，与北大图书馆毗邻。他们的创刊活动得到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的支持与帮助。蔡、陈代表校方为他们办社提供了经费、房屋等必需条件。李大钊、鲁迅也很支持他们办社活动，李大钊"曾给过《新潮》许多的帮助和指导，他虽不公开出面，但经常和社员们联系，并为《新潮》写稿。"[⑤]而胡适则一直担任他们的顾问。

《新潮》是在 1919 年 1 月创刊的，它与《新青年》是同步期刊，两者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共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新潮》第一卷刊出后，产生了广泛影响，曾在一年之内重印了三次。它在推动新文化运动方面的主要功绩在于：一、它仿效《新青年》，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纲常名教，主张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二、它与《新青年》紧密配合，倡导"文学革命"，主张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虽然它所主张的还只是着重在文学形式方面，即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但它仍对新文化运动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它是继《新青年》、《每周评论》之后又一个白话文刊物。三、它大量看载了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作品，并由此产生了一批



小说作家。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从《新青年》上，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较多的倒是从《新潮》上。从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到次年主干者们出洋留学而消灭的两个年中，小说作者就有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同时，《新潮》的错误倾向也是很明显的。如当时新文化运动已经发展到了必须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时期，但《新潮》没有跟上时代潮流，仍停留在《新青年》早期的水平上，孤立地强调一些改良主义观点；又如它继承了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偏向，坚持全盘西化，对民族文化遗产采取了彻底的虚伪主义态度等等。尽管《新潮》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在新文化运动中彰显的光辉仍是不可磨灭的。

国民社。与新潮社成立的同时，救国会的成员们，为加强联系，做好宣传工作，决定成立国民社，并筹备出版《国民》杂志。杂志的经费是由国会成员分摊的，南北各地学生自己凑集，每人出五块大洋，一共凑了近1 500元。凡是提供经费的人，都可成为国民社的社员。《国民》杂志创办的目的是宣传爱国、反帝、反军阀，参加的人不仅于北大的学生，而且社会上的人也有参加的，最多时社员达到了180多人。1918年10月20日，国民社正式成立。1919年1月，《国民》杂志正式发行。国民社在其成立的启事中说"本杂志由学界同志组织而成，抱定左列四大宗旨：（一）增进国民人格；（二）研究学术；（三）灌输国民常识；（四）提倡国货。"[⑥]这个杂志的宗旨反映的是一般的爱国主义思想，所以它团结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据许德珩先生回忆，担任杂志主编的有邓中夏（康）、黄日葵、高尚德（君宇）、陈宝锷（剑修）、陈钟凡、马骏、许德珩以及张国焘、段锡朋、孟寿椿、易克嶷等人。国民社成立之初是一个学生团体，但它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如蔡元培和《京报》主笔邵飘萍、画家徐悲鸿都予以帮助，李大钊、杨昌济则经常为杂志写稿。

这一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有所激化，《国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有力抨击。杂志除了经常刊发时事评论外，还发表一些专文，揭露日本的侵华行为。如黄日葵在1卷2号上发表的《东亚永久和平之基础》一文，就系统地指出了日本的侵华罪行，要求废除中日密约及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在这方面，李大钊的文章批判的最犀利、最深刻。他积极为《国民》撰稿，对日本侵略阴谋进行深刻剖析，集中体现为他发表在《国民》第1卷第2号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文章指出，日本侵

略分子提倡的“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他说：“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和平主义，是侵略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族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

《国民》是全国性刊物，当时社会上对于白话文还不容易接受。所以在五四之前，《国民》都是用文言文写作的，还刊载了一些章炳麟、刘师培、黄侃等人的旧体散文及诗词。“五四”之后，杂志开始全面使用白话文了。《国民》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兴起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的大多数成员，在五四学生运动中都成为积极的参与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创办和编辑《国民》杂志的过程中，邓中夏深深感到《国民》杂志只能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进行宣传和鼓动，而对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青年工人、农民，就显得很不够了。在此期间，邓中夏曾接到湖南老同学熊光楚的信，说毕业回乡亲见农民由于缺乏文化知识，而“饱受痛苦”。因此，他决心走出校门，向广大贫苦民众传播文化知识和爱国救国的道理。1919 年 3 月，为了使贫苦的平民也受到教育，邓中夏等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3 月 7 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征集团员启事和讲演团简章。讲演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又指出：“共和国家，以平民教育为基础。平民教育普及也，平等教育也”、“学校教育，惟饶于赀财者之子弟始得享受，而寒酸之子弟不与焉。”征集团员启事强调：“吾因平民识字少，能阅印刷品出版物者，只限于少数人”、“欲期教育之普及与平等，自非从事演讲不为功。”讲演分定期和不定期两种，“定期讲演每月 4 次，于每星期日下午 1 时至 4 时举行”，“不定期讲演，此项讲演如有事件发生，或春假暑假及国庆日经本团团员认为必须讲演时，临时酌定”。在讲演团简章发布后 10 天内有 30 多人报名参加，其成员多为国民社和新潮社的社员，发起人邓中夏被选为总务干事。1919 年 4 月 1 日下午，讲演团在邓中夏的率领下，乘举行庙会机会，到东便门外蟠桃宫进行第一次露天讲演。邓中夏的讲题是《现在皇帝倒霉了》。学生们的演讲，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是时黄沙满天，不堪张目，而其听讲者之踊跃，实出乎意料之外。”[7]4 月 27 日，讲演团在地安门外的护国寺进行了第二次演讲。演讲涉及的题目有：《互相帮助》、《头彩十万元》、《国家思想》、《权利》、《天赋与人造》、《什么事国家》、《为什么女子要守节?》等。这些演讲活动，提高了群众的爱国觉悟，得到广大市民的广泛欢迎，并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

少年中国学会。1918 年 6 月 30 日，由王光祈联络曾琦、张梦九、陈愚生、雷宝菁、周无在北京岳云别墅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后来，又邀请李大钊作为发起人之一。1919 年 7 月 1 日在北京总会召开成立大会，宣布少年中国学会成立，最初会员 42 人。大会选举王光祈为执行部主任，陈愚生为副主任，曾琦为评议部主任，宗白华、左舜生、雷宝华、易克嶷为评议员。会议讨论了学会的规约，明确学会的宗旨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学会在创立之初，提出最终目的要创造"少年中国"。究竟创造怎样的"少年中国"，又怎样去创造，并没有明确规定，各人理解不同，分歧很大。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有的会员成为早期的中共党员，必然要把他们的政治观点带到学会中来。1921 年在南京大会上，共产主义者邓中夏、恽代英等，坚决主张学会应明确社会主义方向，成为政治性的团体。1925 年 7 月南京第五届年会上，沈泽民、张闻天，提出会员应采取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会员应参加政治活动，不应离开政治讲学术、讲事业，但遭到国家主义派的坚决反对。于是，友谊不复存在，双方发展成为势不两立的政敌。每次会议即使勉强通过决议，也无法付诸实施，而处于中间立场的"超然派"，对对立双方的观点都不能接受。学会创始人王光祈反对政治斗争，主张对各种主义的思想兼容并包。由于学会内部成员政治态度各异，学会分裂已不可避免。加上当时的政局发展迅猛，1923 年以后已进入国共合作阶段，不少党员投身于革命运动，无暇顾及学会的问题。学会最终瓦解。

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是由毛泽东发起的。当时毛泽东正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读书期间，毛泽东的思想主流是民主主义，而且已经倾向了社会主义。1917 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征求有志青年做朋友，为"集合同志"组织社团做准备。经过几个月的联络、酝酿、商讨，在南国的湘江之滨，一个著名的青年社团——新民学会便应运而生了。1918 年 4 月 14 日，新民学会正式成立。学会的简章中规定，本学会"以砥砺品行，研究学术为宗旨"。入会的会员要求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学会成立后，湖南第一师范和其他各校的进步学生和长沙的中小学优秀的青年教师，陆续加入该会，会员达 70 多人。学会以讨论学术和时事问题为活动，会员间相互砥砺思想、品行、工作和学习。

根据毛泽东的主张，会友应有计划地去俄国或法国，学习新思想，了解各国实情，加以选择采纳，为中国所用。新民学会采取了国内外并重，共同寻求革命道路的办法，一部分人到国外，以蔡和森为首的会员赴法国等地勤工俭学；一部分人在国内，以毛泽东为首在长沙开展各种活动。1919 年，蔡和森、李维汉、罗学瓒、张昆弟、向警予、蔡畅及萧子升等一批会员相继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则留在国内以长沙为斗争中心，领导新民学会开展驱张运动，组织湖南学联。他还自己担任总编，创办《湘江评论》。毛泽东在组织新民学会开展活动中，两次到达北京。第一次是 1918 年 8 月，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到北京，结识了李大钊，阅读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第二次是 1919 年 12 月，为了领导驱张运动，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先后 7 次到新华门请愿，揭露军阀张敬尧的祸湘罪行，发表“驱张宣言”。在北京期间，毛泽东还参加了李大钊组织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办的活动。正是第二次去北京期间，毛泽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主义信仰。毛泽东为新民学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新民学会在其存在的 3 年多时间里，不仅为湖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挥了领导组织的作用，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了思想理论上的探寻和干部队伍上的准备，被后人誉为“建党先声”。正如毛泽东在《西行漫记》中谈到，新民学会“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

这个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想在青年中曾有过较大的影响。各地先后出现了一些无政府主义小团体，如实社、进化社、奋斗社等。最初它们也表现过某些反帝反封建的意愿，但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类社才越来越趋于反动，最终成为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帮凶。

除了上述几个著名的社团外，还有许多地方上的社团，如同言社、工学社、工学会等。

五四前后，各种社团的兴起，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知识界的文化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文化斗争不仅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了，而且在斗争中知识界已感到了组织起来的必要。这些社团的出现，实际上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注释：

①计德国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 60 辑。

②《北京大学日刊》，1918 年 7 月 23 日。

③④《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2月3日。

⑤顾撷刚，《回忆新潮社》，《五四时期的社团》，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⑥《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2月19日。

⑦《平民教育讲演团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4月11日。

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

五四前后，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和以杜亚泉、章士钊、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围绕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比较、新旧文化的关系和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等问题，展开了一场延续十余年的思想大论战。这场论战的实质是中国封建旧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斗争，也可以说是清末以来中学、西学之争的继续。它发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后来中国文化的走向影响深远。

这场论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与当时的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和社会黑暗密切相关。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为中国这个东方古国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契机，但由于没有从政治、经济上彻底摧毁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更没有在思想文化领域铲除封建势力的根基，辛亥革命的成果只是昙花一现。辛亥革命后，随着封建帝制的复辟，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又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民主共和的命运会怎样，国家的出路在哪里，迫切要求人们进行思考和作出回答。

在此背景下，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激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竭力宣扬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批判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由此引发了这次长达十余年的东西文化论战。由于内容和重点的变化，论战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从1915年的《新青年》创刊到20年代初，论战内容大体集中在比较东西文明的优劣；二、1919年~1921年，关于东西文化能否调和的争论；三、20年代初至1925年，论战内容主要是科学与玄学之争。

第一阶段，1915年，围绕东西文化的异同优劣，这场论战拉开了序幕。这年12月，陈独秀率先在《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从三个方面论证了东西民族思想的差异：（1）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

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2）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宗法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之法、惨苦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之因。（3）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①]

在这里，陈独秀鲜明地指出了东西文化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的源自于东西方社会制度的不同。在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中，陈独秀把个人和家庭本位的差异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坚决主张“一定要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庭本位主义”。出于这一思想，他提出了精神意志权利的主体观，即突出强调人的权利。所以，陈独秀特别推崇法兰西的人权说，并把人权作为发动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之一。而对中国固有的宗法制度，陈独秀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实行宗法制度带来了四大恶果：损坏个人独立自尊的人格；窒碍了个人意志的自由；剥夺了个人平等的权利；破坏了个人之生产力。他通过封建宗法制度与西方强调个人权利的对比，得出了结论，即认为中国社会的改造，归根到底是思想文化的改造。我们必须西方文明为样板，实现“伦理的觉悟”。[②]

在陈独秀的文章发表后不久，《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在 1916 年 10 月，以“伧父”作笔名发表了《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提出了与陈独秀针锋相对的观点，其目的是为了证明西方文化不如东方文化。他认为东西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这些差异表现为：西洋社会注重人为，而中国则注重自然；西洋人的生活是向外的，中国人的生活是向内的；西洋社会内，有种种之团体，中国社会无团体；西洋崇拜竞争之胜利，视胜利为最重，而道德次之，中国则崇尚与世无争，视胜利为道德之障害；西洋社会以战争为常态，和平为变态，而中国以和平为常态，战争为变态。他用“动的社会”和“静的社会”来归类西方和中国社会，并断言由“动的社会”发生“静的社会”，由“静的社会”产生“静的文明”。他认为这两种文明可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但是“不可不以静为基础”。因为中国的传统文明，正可以弥补西方文明的弊端，可以修补西方文明的漏洞。他主张用儒家思想加以“统整”，以儒家思想为“国是”、“国基”，使中国固有文明发扬光大。杜亚泉的观点代表了封建复古派的思想，他的文章发后在东方杂志上，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针对杜亚泉的观点，陈独秀、李大钊等新

文化运动的干将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继陈独秀和杜亚泉的文章发表后，1918 年 6 月，李大钊也撰写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参加论争。在他看来，东洋文明同西洋文明相比有如下八大弊端：（1）厌世的人生观不适于宇宙进化之理法；（2）惰性太重；（3）不尊重个性之权威与势力；（4）阶级的精神，视个人仅为一较大单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价值全为单位所吞没；（5）对于妇人之轻侮；（6）同情心之缺乏；（7）神权之偏重；（8）专制主义之盛行。因此，“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炎炎垂死之期，此实无容讳言”。[③]他针对伧父以东方“静的文明”可以济西方“动的文明”的主张，力主中国应“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提倡青年人全力以赴研究西方文明，学习西方文明中的科学精神，清除国人静止的观念和怠惰的态度。

从表面上看，这些纷争只是从文化道德领域比较中西文明的优劣异同，似乎是学理之争。但如果细细考察这场论争的时代背景，我们就可看出，它实际上是 19 世纪中叶以来国人学习西方文化的阶段性总结，它标志着中国人在学习西方文明的道路上已经摆脱了过去“器物模仿”和“制度移植”的阶段，已经开始从理性高度探讨文明的优劣，以图国家发展长期之计。

1919 年下半年，就在激进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激烈争论时，以章士钊、伧父为代表的文化守成主义者提出了“东西文化调和论”，从而将论战引向了一个新阶段。1919 年秋天起，章士钊先后在上海、广州、杭州等地发表讲话，鼓吹新旧调和论。陈嘉异、伧父等人也纷纷发表文章相互附和。一时间，“折衷”、“调和”的主张充斥着思想界。他们指出：“不有旧，决不有能迎新”，主张把东西文化“撷精取粹”、“熔铸一炉”，以成为“吾国新社会研治之基”。[④]这些守旧派看到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思想、新文化的出现已成不可抵挡之势，于是只好改头换面，提出新旧调和的论调。然而，从实质上看，这些调和主张仍坚持“中体西用”的保守观念。伧父的言论最能体现出这些观念的存在。他指出，中国固有的文明虽然不能直接运用于未来，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样证明了西方文明不能适应新形势。只要经过科学方法，对中国固有文明进行革新，就可以成为“未来世界文明之指导者”。两种文明的调和折衷，不能以中国固有文明的废除为前提，而应把西洋文明“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⑤]

面对“调和论”的挑战，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者起而

反驳。除《新青年》外，《新潮》、《民铎》、《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时事新报》，都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他们认为，旧文化和新文化是水火不相容的，只能“以新代旧”，而不能“以旧容新”。陈独秀坚决反对新旧文化、新旧道德调和之说。他在《答佩剑青年〈孔教〉》一文中指出：“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礼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只得任取其一。”文章中，他不仅批判了中国的旧道德，而且指出西方一切不良社会现象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所造成的。因而反对那种“物质上应当开新，道德上应当复旧”的调和论调。从而表明了学习西方文明，改造中国社会的坚定决心。时任《时事新报》总编的张东逊也发表了题为《突变与潜变》一文，从辩证法角度反驳了章士钊的调和论，他认为在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中，不仅存在“潜变”，而且还常常出现“突变”现象。他写道：“我们鼓吹新思想便是创造潜变（即下变的种子），决不能与旧的调和……”。[⑥]“一经调和，那么成熟的新思想便被消灭了”，“改造的动因”也就消灭了。[⑦]

李大钊当时也积极参与了论争，他连续撰写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第一次用唯物史观对新旧调和论思潮进行了批判。他指出：道德的性质和状况必然与经济的性质与发展程度相适应，经济变动是道德变动的根本原因。因此，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东方的封建伦理纲常加以调和，只不过是守旧派的主观幻想。中国的经济变动是不可阻挡的，中国的大家族制度的“崩颓粉碎”，“君权”、“父权”、“夫权”的消失，都是不可逆转的“运数”。而新思想则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因此也是无法阻挡的。通过这篇文章，他充分论证了新思想、新文化代替旧思想、旧文化的客观必然性。

激进派和守旧派关于调和论的斗争，实际上已突破了学理上的分歧，它标志着中国文化精英对东西文明认识的深化。客观上为20世纪20年代后中西文明的交融准备了思想条件。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后期，论战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西方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严重的危机，战胜国和战败国两败俱伤，昔日高度繁荣的西洋工业文明瞬间化为灰烬。于是，“资本主义文明破产论”出现了，思想文化界兴起了一股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浪潮。

东西文化论战的第三阶段中，无论是文化保守论者，还是文化激进主义者，都从自己特定的角度出发，鲜明地表达出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怀疑和批判。

1920 年，梁启超在游历了一战后满目疮痍的欧洲各国后回到中国，发表了《欧游心影录》一文，在文中他描述了战后西方人凄惶、失望、不安的复杂心态，断言西方凭借科学建立起来的物质文明已经破产，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拯救欧洲。他主张以中国古代文明为主体，吸收了一些西方文明，构成新的文明，并鼓动中国青年到大海对岸去拯救那里近乎破产的物质文明。1921 年 1 月，陈嘉异发表《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一文，宣称自己是东方文化的崇拜者，反对一切赞扬西方文化及融合东西文明的观点，他认为东方文化具有西方文化所不具备的优点，将来的世界的文化必是我们的东方文化。

持文化保守思想的梁漱溟，此时加入了批判的行列。1921 年，他出版了曾轰动一时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书中，梁漱溟提出生活的根本在“意欲”，“文化之所以不同由于‘意欲’之所向不同”。（1）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为其根本精神；（2）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3）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这三种不同的文化取向，在梁看来，并没有什么先进落后之别。而从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上看，在西洋哲学基础上建立的西方文化，因科学发达、物质进步，已经暴露出了众多弊端，其人生哲学已经走到了末路，西方文化已到了不变革就会消亡的地步。而“意欲反身向后”为根本精神的印度文明时代又没有到来。因此，时下文化的选择必然指向了中国文化。西方文化要想摆脱危机，就必须走中国文化的道路。他还写道：“看着西洋人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是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一条路吗！我又看见中国人蹈袭西方的浅薄……我不应当导他们于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来吗?”⑧这里，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复兴的期望，其理论在当时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极强的震撼力。

除梁启超、梁漱溟等温和保守派外，以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为代表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也对西方文明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批判最有力的当属瞿秋白，其代表作有《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等。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时下资本主义文明弊病，指出：



“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9]虽然西方文明有诸多毛病，但与封建宗法社会文明相比，它还是略胜一筹。然而，不论是西方文明，还是封建宗法社会文明都无法与社会主义文明相比，“社会主义的文明是热烈的斗争和文明的劳动所能得到的。……那不但是自由的世界，而且还是正义的世界；不但是正义的世界，而且还是真美的世界！”[10]虽然瞿秋白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不够全面深入，存在片面性，但他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敲响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晨钟，达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深度。

中西文化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受到各派人士的关注。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连续不断，可以说伴随着整个近代的历史进程，反映了近代历史的发展变化。在这场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中，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批判旧思想、旧文化，其主流无疑是正确的，体现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这对打击封建主义腐朽文化，启发国人思想，破除了封建教条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起了巨大作用。这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他促进了人们更加迫切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保守派则站在它的的对立面加以反对，鼓吹尊孔读经，维护儒家的文化传统，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是逆潮流而动的。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存在着绝对化、简单化的缺点和错误，他们强调文化的时代性，但忽视甚至否认文化的传承性和民族性。杜亚泉等东方文化派固守传统文化，缺乏时代精神和时代意识。这都是缺乏科学的分析态度。因此，激烈的论证并没有使问题得到真正解决。

注释：

①《陈独有文章选编》。

②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独秀文存》，第41页。

③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

④章士钊：《新时代之青年》，《东方杂志》，第16卷第11号。

⑤伧父：《新旧思想之折衷》，《东方要志》，第16卷第9号。

⑥张东荪：《突变与潜变》，《时事新报》，1919年10月1日。

⑦张东荪：《答章地严君》，《时事新报》，1919年10月12日。

⑧《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3~544页。

⑨瞿秋白：《东西文化与世界革命》，《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第380~381页。

⑩瞿秋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

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出现

无政府主义是反映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它最早出现在18世纪的欧洲，19世纪下半叶广泛流行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早期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施蒂纳和号称“无政府主义之父”的普鲁东。60年代以后，著名的代表人物有俄国的巴枯宁（1814年~1876年）和克鲁泡特金（1842年~1927年）等。

早在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由旅居欧洲与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一些同盟会会员传入中国。在一战前，许多留学欧美和日本的学生接触了西方各种思想，并把它们介绍到中国作为救国救民之道，无政府主义思想最初是被当作一种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的，而且把它同虚无主义混为一谈。1903年，在《江苏》、《浙江潮》、《民报》等刊物上，出现了介绍俄国虚无主义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量介绍了无证主义思想，认为中国的政治情况同当时俄国相似，因此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也值得借鉴，并提出了“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①的虚无主义主张。

一些刊物在介绍虚无主义的同时，也涉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学说。他们指出社会主义是医治社会疾病的“卫生术”、“治疗术”，并说社会主义学说在欧美已经显现出了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由于刚刚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学说，他们的理解还十分肤浅，非常片面。他们对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极为混乱和模糊。直到1907年，刘师培、张继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办“社会主义讲习会”，刊行《天义报》（后改为《衡报》）；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刊行《新世纪》，才开始系统地介绍与研究无政府主义学说，并形成了以张继、刘师培、何震为代表的“天义派”，以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为代表的“新世纪派”。他们正式打出了无政府主义的旗号，积极宣传无政府思想，成为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的代表。

无政府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流传，对辛亥革命后无政府主义者有着较大的影响。尽管如此，但在辛亥革命前，无政府主义在国内并没有形成有影

响的思潮。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民主共和遭到破坏。继袁世凯之后，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格局，各派军阀依靠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群众对军阀政府的厌恶情绪也在日益滋长着。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了探索新的救国救民道路，对无政府主义也发生了新的兴趣。这就为无政府主义在国内的传播，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条件。一时间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与社团纷纷涌现。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前，无政府主义成了在国内流行一种主要的社会政治思潮。

辛亥革命后，最早在国内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是刘师复。刘师复（1884年~1915年），字子麟，广东香山人，1912年因信仰无政府主义，改名为师复。早年曾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由于受到无政府党人的影响，在横滨学习制造炸弹。1907年，同盟会准备再广东潮惠发动武装起义，刘师复被派回广州担任暗杀水师提督李准的任务，不幸事败被捕入狱。在狱中经受种种刺激和磨难，思想更加倾向无政府主义。1909年，又在香港组织了“支那暗杀团”，号召推翻强权，推行无政府主义，与同盟会中断了联系。1912年5月，刘师复与莫纪彭、郑彼岸在广州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晦鸣学社”，出版刊物《晦鸣录》（后改为《民声》）。刘师复在《晦鸣录》的发刊词中说：“二三人相聚读书论道于一室，名之曰晦鸣学舍”。他们提出要从“根本上是实行世界革命，破除现社会一切强权，而改造正当真理之新社会以代之”[②]并提出了几条政纲：“共产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工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族主义；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③]晦鸣学舍成立后，积极开展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大量翻印在巴黎出版的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至1914年5月出版的刊物达16种。不久，他又与郑彼岸、莫纪彬、林直勉等，于广州东园组织了心社，并规定戒约十二条，即“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乘轿及人力车；五不用仆役；六不婚姻；七不称族姓；八不作官吏；九不作议员；十入政党；十一不作海陆军人；十二不奉宗教。”[④]该社“取绝对自由主义，无章程、无规则、亦无一切组织，各凭一己良心以相集合”。[⑤]

晦鸣学社和心社是国内成立最早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它们的成立标志着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晦鸣录》只在广州出了两期，就被袁世凯的手下龙济光所查封，心社也被迫解散。刘师复逃往澳门，并将《晦鸣录》移至澳门出版，但不久后又被查禁。



1914 年 7 月，刘师复在上海成立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他在同志社的宣言中说：“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何？主张灭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也。”[⑥]还表示，创设同志社，作为传播主义联络同志的机关，为将来组织联合会做准备。在这个组织的影响下，广州的刘石心等成立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南京的杨志道等成立了“无政府主义讨论会”，江苏常熟的蒋爱真等成立了“无政府主义传播社”。以刘师复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还积极与国际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格拉佛等人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1914 年 8 月，无政府万国大会在伦敦召开，刘师复代表“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向大会报告了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和现状，并向大会提出了组织万国机关；注意东亚之传播；与工团党联络一致进行；万国总罢工；采用世界语等建议。10 月 10 日，在上海南京路“惜阴公会”开庆祝大会时，无政府主义者曾散发《致无政府党大会书》和《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等传单，积极宣扬无政府思想。

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主要是受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无抵抗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其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一、反对一切剥削、压迫和权威，要求个人绝对自由。他一再强调人民完全自由，不受一切统治，反对强权，为无政府主义之“根本思想”。[⑦]他对强权的理解，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凡法律或章程所规定或社会习惯所认定之一种权利”，还包括“由法律或章程规定有权管理公务之机关”。[⑧]刘师复认为自由和强权是对立的。人人都有自由生活的权利，人人都有自治的本能，根本不需要什么强权来统治；所有的强权都是“妨碍完全自由之障碍物”，“凡无政府党无不以反对强权为职志。”[⑨]这种思想建立在追求个人绝对自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反映了当时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要求个性解放的要求。二、反对革命政党的领导作用，主张小团体联合“革命”。他认为要想在中国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唯一手段就是革命，并肯定“无政府之成功，必由于平民革命”。[⑩]这种革命不是组织政党领导群众进行推翻政府的武装斗争，而是由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少数人，自由组成了秘密小团体，再由他们“用口舌笔墨之传播”，促使“大多数平民赞成无政府乃起而革命”。[⑪]为了促使大多数平民赞成无政府主义，还要“从中助以急进之方法”，就是通过不断地发动罢工、罢市、暴动、暗杀等活动，借以扩大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待时机成熟时，把各个无

政府主义的小团体集合起来，发动总同盟罢工推翻政府。三、反对社会主义学说。刘师复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内最早公开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人。他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看成是“国家社会主义”、“集产社会主义”，指出：“无政府党所攻击者：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也”。[12]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的最大“障碍”，要想使无政府主义思想为广大群众接受，“必先战胜此种谬说，……然后人民能推翻政府，然后吾主义能实现”[13]，在他积极宣传下，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15 年 3 月 27 日，无政府主义的领袖和理论家刘师复因病逝世，时年 31 岁。他是无政府主义最坚定的信仰者，而且言行一致，其精神常为同道者所称颂。他“不但对于主义是鞠躬尽瘁，就是连带的对于素食主义等也能以死自矢”。[14]当他“生病很重的时候，医生屡次劝先生（指刘师复）食肉，先生以死自矢，终不破戒”。[15]虽然他英年早逝，但其门徒却把无政府主义思潮继续传播开来，在广大青年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异常活跃，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出现了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正统派，还有几个较小的派别，如朱谦之的新虚无主义、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等。据统计，当时全国无政府主义社团达到 90 多个。在北京有实社、进化社、奋斗社、互助社、学汇社、中华农村运动社；在上海有道社、民众社；在南京有群社、民锋社、安社；在长沙有安社、星社；在广州有民钟社、火焰社、民声社；在山西有平社；在江苏有微明学社等等。国外的还有巴黎的工余社，加拿大温哥华的加拿大木瓦业华工联会，旧金山的平社。此外，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报刊书籍也大量涌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进化》、《学汇》、《工余》、《民钟》、《奋斗》、《自由录》等。

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对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大钊就是其中一位。虽然他早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赞成阶级斗争学说，但他在 1919 年 7 月发表的《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仍然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当作是“确信不疑的道理”，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16]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经常刊登一些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他还把“相爱互助”列为自己推崇的新社会的重要原则之一。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马克思主义分子，也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感染。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

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17]恽代英是五四时期湖北学生运动的著名领导人，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明确地宣布：“我自信懂得安那其的真理，而且曾经细心的研究”。[18]1917 年 10 月 8 日，他和挚友黄负生等人成立了互助社，“定名互助社，取克鲁泡特金新进化论的意义”。[19]

五四前后，无政府主义虽然异常活跃，传播这一思想的社团和刊物也很多，但在理论上并没有太多的创新。他们只是引进了一些西方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为无政府主义主张辩护，因而这时期无政府主义的论点更加矛盾和混乱。但不管怎样，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曾喧嚣一时。无政府主义的基本政治观点和主张，集中地体现在：

第一，主张个人绝对自由。无政府主义者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他们说：“无政府主义的妙理，就是自由两个字。”[20]刘师复认为：无政府主义“主张人民完全自由，不受一切统治”。[21]黄凌霜还进一步解释说，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万能，因而它是极端的自由主义，所以无政府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好朋友。无政府主义者还根据克鲁泡特金的“互助”思想，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认为人类的本能是互助的，是性善的，正是这种本能推动着社会进步，决定着人类可以自由，决定着人人都能自治。在他们看来，人生活在世界上，应该是自由自在的，无拘无束的，不受任何来自个人以外的力量的束缚，个人的自由丝毫不容侵犯。倘若个人的自由受到限制，那么个人的才能就不能发挥，社会的进化也会处于停滞的状态。无政府主义的“基石”是个人主义，但把个人主义看得重于一切的观点，实质上是不顾集体利益，不顾他人死活的极端个人主义。

第二，反对一切强权和国家。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强权和国家是有损他们个人的自由和意志的。他们主张无限制的自由，不承认法定的权利。所谓的强权，就是妨害完全自由之障碍物，凡无政府党，无论是什么党派，都要坚决反对。为此，他们首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国家政权。刘师复说：“无政府党主张完全自由，排斥一切政府，实为无政府主义之根本思想。”[22]他们把革命的首要目标定为铲灭强权，使之永远不能存在或再生。

无政府主义者不仅反对强权，还反对国家。他们不要国家的，认为一切都是坏的，国家是权威的集合。他们给国家列出了一系列的罪名：国家制定宪法，限制个人自由；国家保护阶级制度，制造不平等；国家坚甲利兵，破

坏和平；国家圈定范围，妨碍人类共同生活。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认国家有存在的必要，也不理解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区别。他们幻想在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后，一下子进入无政府的社会。因此，他们在宣布国家罪恶的同时，集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建立国家，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实际上自己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国家。

第三，幻想建立无政府共产社会。中国政府主义派鼓吹无政府共产主义，幻想建立无政府共产社会。他们说："无政府则剿灭私产制度，实行共产主义，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贫富之阶级既平，金钱之竞争自绝。此时生活平等，工作自由，争夺之社会，一变而为协爱的社会。"[23]还说："无政府之社会，人人自由，人人自治，以独立之精神，行互相之大道，其组织之美善，比远胜于政府之代谋。故不必虑无政府即秩序扰乱也"、"将来之社会，各个人完全自由，无复一切以人治人之强权，是之谓'无政府'。引无政府于共产社会，是之谓无政府共产主义。"[24]他们以克鲁泡特金提出的"自由的共产主义"为依据，认为无政府主义的宗旨是：废除政府，废除资本制度；一切生产机关归公，力图经济上、政治上的自由，依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理，组织自由共产的社会；在个体主张最大自由，在群体主张最大的互相。

以上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尽管他们在内部某些观点上尚有千差万别，但基本的东西却是一致的，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在中国社会上流传着。它的出现及其传播，对当时知识分子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但无政府主义并不能给中国人民找到一条摆脱封建统治的正确道路。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无政府主义思潮最终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注释：

①太炎：《五无论》，《民报》第16号，1907年9月。

②《晦鸣录》，第1期，1913年8月20。

③④⑥《师复文存》，革新书局，1927年版，第58页，第144页，第56页。

⑤《师复启事》，《晦鸣录》第2期，1913年9月。

⑦⑧⑨《江亢虎之无政府主义》，《民声》，第17号，1914年7月。

⑩

⑫《答恨苍》，《民声》第20号，1914年7月。

⑬《驳江亢虎》，《民声》第15号，1914年6月。

⑭《答蔡雄飞》，《民声》第18号，1914年7月。

⑮《怀念师复先生》，《民钟》2卷3号。

⑯《师复先生传》，《师复文存》，第8页。

⑰《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9页。

⑱《五四运动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页。

⑲《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624页。

⑲《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8页。

⑳《告非难无政府主义者》，《民声》第30号，1921年3月15日。

㉑师复：《无政府主义释名》，《民声》第5号，1914年4月11日。

㉒《江亢虎之无政府主义》，《民声》第17号，1914年7月4日。

㉓师复：《无政府浅说》，《晦鸣录》第1期，1913年8月1日。

㉔《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民声》第17号，1914年7月14日。

工读互助主义在中国

1919年底至1920年初，“五四”爱国运动已经接近尾声，此时思想界掀起了一股“社会改造”的谈论热潮，关于社会改造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共度互助主义，一种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出现了，并且广泛流行于知识分子阶层。

一战前，中国人十分向往欧美式的民主制度和思想文化，但一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他们对西方文明的弊病看得越来越清楚，“资本主义支配下的社会，已经没有存在的余地了！他的黑暗，他的势力和消费量的不均，他的残酷，‘以人类为牺牲’以及其他种种，已经使生活在他底下的大多的人类，感到极端的痛苦，而想用各种的方法，做各种的运动群起而推翻之了！”[①]很多知识分子不再相信西方文明能够救中国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让中国人重新看到了希望。之后，社会主义学说逐渐进入了知识分子的视野，并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和热情。

“五四”运动后期，出现了一股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各种报刊、书籍纷纷涌现，除《民心》等个别刊物公开声明“不偏取何种社会主义”外，其余的刊物杂志都对社会主义表示了好感和向往。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开始陆续刊载与各大刊物。它们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的福星，是现在社会的解放之道。但对什么社会主义，大家都没有科学的了解，也没有一定的标准。许多并非社会主义思潮的东西，也被他们当作社会主义新思潮进行传播，如施蒂纳、普鲁东、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各种无政府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柯尔等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考茨基、伯恩斯坦的社会民主主义等等。热衷谈论社会主义的人，也是各种各样。其中有思想界的先驱和青年学生；有梁启超等研究系的成员；有安福系著名政客王揖唐；甚至军阀陈炯明在他授意创办的刊物上，也大谈特谈社会主义，并说“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思想”。[②]



虽然宣传社会主义的流派众多，人数不少，但他们几乎没人能分清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及各种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主张，其中也包括毛泽东、瞿秋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曾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③]瞿秋白很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人对社会主义的模糊信仰，他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像，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定出流的方向。其实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④]

"隔着纱窗看晓雾"，模模糊糊，朦朦胧胧，恰当地形容了当时的青年人队社会主义的了解。正是在这种对社会主义的模糊认识中，工读互助主义发展起来了。倡导工读互助主义最突出的是王光祈，他自称："不知不觉地就中了社会主义的魔术了"。[⑤]他把无政府主义也当作社会主义，并承认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所谓"共产社会主义"的优劣，不甚了解。在当时的各种新思潮中，对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较大的，除了科学社会主义外，还有互助论、工读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等。工读互助主义的产生，主要就是来源于这几个较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

互助论。互助论是克鲁泡特金所创造的，是无政府主义学说的一种。克鲁泡特金推崇社会进化论，主张用生物发展的自然规律来解释社会现象。但是他不同意"物竞天择"的规则，认为"互助"才是生物和人类发展的规律。他说："人类社会建设在人类休戚相关的良知上，……建设在个人幸福与众人幸福密切相关的感情上"[⑥]以此为理论前提，他写出了《互助：一个进化的要素》一书，提出人类可以通过互助进入"各尽其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主张。

辛亥革命之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接触了互助论，并把它介绍到中国，作为天演论的一个补充。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互助论被广泛地传播，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大钊就是受其影响的一位，他说："自虫鸟牲畜乃至人类，都是依互助而进化的，不是依战争而进化的。由此可以看出人类的进化，是由个人主义向协和与平等的方面走的一个长路程"，而"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和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他指出："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

造，灵肉一致的改造。”[7]恽代英也受到了互助论的影响。1917年10月8日，他在武昌创立了以互助社命名的进步社团，之所以定名互助社，是“取克鲁泡特金新进化论的意义。”他在《论社会主义》一文中说：“与其提倡争存的道理，还不如提倡互助的道理”。[8]王光祈也十分欣赏互助论。在他看来，列宁的社会主义，虽然不完美，但是其以“国家权力来干涉个人生活，实是一件不合民情的主张”。他希望“将来的组织，是宜在个人自由主义之下，为一种互助的、进步的、自由的、快乐的结合”。[9]他的工读互助主义就是以互助论为其理论基础的。

工读主义。工读主义，也称为工学主义，最早宣传工读主义的是李石曾等无政府主义者。一战期间，李石曾在巴黎创办了勤工俭学会，帮助华工和留学生边作工边学习。1918年3月，吴稚晖创办了《劳动》月刊，刊载了数十篇有关工读主义的文章。从文章的内容来看，大部分讲的还是如何通过工读解决学费以及如何普及教育问题，只有少数文章把工读主义作为社会理想来提倡，如《工读主义进行之希望》，就指出了“将来社会进化，达至如何地步，虽不可得知。工与学合为一途，工人即学者，学者亦工人，造成‘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正当社会，有可预料”。[10]

工读主义虽然提出的较早，但在“五四”以前，其影响力并不大。“五四”后工读主义结合了泛劳动主义，才成为流行的思想。工读主义在进步青年中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天津觉悟社的刊物《觉悟》第一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工读主义》的文章，对工读主义的理解、主张以及实行的办法，都作了系统的、具体的论述。觉悟社还曾多次开会讨论、研究工读主义。这一思潮对赴欧勤工俭学运动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周恩来曾写道：“迨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之行者因以大增。”

泛劳动主义。“五四”前后，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进入了知识分子视野。他认为现代所谓的文明生活，充满了压迫、刑罚、战争、欺骗等种种罪恶，是“虚伪”与“不正”的。而这些罪恶的产生正是由于财产和金钱的存在。因此，他提出了以泛劳动主义消除社会不公平的主张。1918年3月，《劳动》登刊译文《托尔斯泰之劳动主义》，公开鼓吹“劳动实为人生最大之义务，故亦为最大之善行”。还提出，在理想的国度，人人劳动，每天劳动半天以解决衣食住行问题，余下时间用于娱乐和学习，如此一来“人类

身心得健全，社会之病气绝迹矣。”随着中国思想界对欧洲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特别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的深入了解，大部分进步刊物，开始大规模谈论劳动问题。“劳工神圣”的口号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他们说：“平素我最钦佩的就是头脑简单、人格高尚、着短衣的劳动界”[11]、“我很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12]在对劳动界的一片颂扬声中，泛劳动主义空前流行。

新村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是“五四”前夕开始传到中国的。在这之前，无政府主义者江亢虎等人，曾对法国的和美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兴办的“鹰山共产村”、“兰路共产村”等“新村”作过介绍，但其影响力都较小。直到十月革命前后，其影响才开始渐渐扩大，形成一种新的思潮。新村主义提倡“人的生活”。它认为：“对于这将来的时代，不先预备，必然要起革命。怕惧革命的人，除了努力使人渐渐实行人的生活以外，别无他法。”[13]人的生活应是各人先尽了人生必要的劳动义务，再将其余的时间，做各人自己的事情。1919 年 3 月，《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周作人，发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热情介绍了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和日向新村。之后，他又在北京、天津讲演，连续发表文章。在他的大力宣传下，新村主义在进步知识分子中传播开了。当时，毛泽东、恽代英和林育南等，都曾有组织“新村”的设想。

王光祈等人融合了这些思想，提出了一个以新村主义为基础，以工读主义为主干，以互助为团体内生活原则的工读互助主义，即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并把这种构想应用到实践中去。1919 年 8 月，王光祈向其友人建议在乡下搞“菜园”生活。他想通过这种菜园子生活的乡村乐园来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他说：“我们在乡间半工半读，身体是强壮的，脑筋是清楚地，是不受衣、食、住三位先生牵制的，天真浪漫的农夫是与我们极表示亲爱的；我们纯洁青年与纯洁农夫打成一气，要想改造中国是很容易的”。他十分欣赏自己的杰作，“我现在觉得我们新生活园里的花儿、草儿、鸟儿、蝶儿正在那里盼望着我们，我们没必要再作纸上的空谈了，赶快实行我们神圣的生活”。他这种想法当然是空想的，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一则，需要相当数量的土地；二则，所要求的具有翻译外文能力的知识分子，都长期生活在城市，要他们去乡间进行长期劳动和生活是很难的。于是，他不得不改变主意，他很快就把菜园子“新生活”的设想，移植到城市，想在城市中去创建他“中国式……主义”的新生活。

1919年12月4日，王光祈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城市中的新生活》。开头就说："数月以前我与左舜生君讨论组织新生活问题，注重乡间的新生活，今天我们所提倡的是城市中的新生活。"他把这种城市"新生活"的小组织定名为工读互助团。他的倡议，受到了思想、教育界的广泛支持，列名为募款发起人的有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高一涵等新文化界的名人。由于这种支持，不到半月工读互助团就首先在北京问世了。虽然参加参加者和支持者众多，但他们的思想认识并不完全统一。胡适就认为，它并不是一种"新生活"，而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尽管如此，互助团的"共产主义"色彩还是很鲜明的。该团的《简章》除规定"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团员每日必须作工四小时"外，还有如下的条规和说明：第一，所得归公。"工作所得必须归团员公有。团体的盈虚利害；便是团员的盈虚利害，团体的痛苦幸福，便是团员的痛苦幸福。"第二，各尽所能。"工作以时间为标准，不以工作结果的标准。譬如甲只有两点钟便可织一匹布，乙需要四点钟始可织一匹布，但是甲仍然应该作四点钟的工，已尽其所能。"第三，各取所需。"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团体供给"，"团员所需之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惟书籍系归团体公有。"王光祈解释说："现在团体对于团员所供给的各种费用，尚略有限制。将来办理久了，已养成互助习惯，便可由团员自由取用，以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通过贯彻以上各项原则，工读互助团希望实现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

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消息传出后，数百人报名参加。它的成立即刻在新文化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许多报刊对此进行了报道，称其为"是极好的一桩事"，说"把这一桩事充满在社会，那社会上的腐败和恶浊可以完全打消"。[14]在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影响下，不少地区，积极筹划创办社团。先后成立的社团有南京师范学校学生发起组织的"工读互助团"；天津学生发起组织的"工读印刷社"；武汉"利群书社"恽代英等发起的"武昌工学互助团"；广州女界发起组织的"粤女工学互助团"等等。工读互助团虽然流行一时，但由于它的空想性，其失败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在短短几个月中，工读互助团就暴露出了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最早，失败的也最早。他们办的食堂，"事少人多，入不敷出"；放映电影，"生意冷落，不得已只得停止了"；其他如洗衣等生意都欠佳，难以为继。[15]同时，工读互助团的成员虽然都表示要以工读互助主义改造社会，但实际上他们各自

倾向于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其他种种主义。这就使得社团内部思想不统一，人心涣散。因此，没过多久北京工读互助团就解散了。其他各地的工读互助团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最后都不得不以解散而告终。

“五四”前后的中国空想社会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思潮，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它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它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正是通过这次工读互助主义的广泛试验和完全失败，才使“五四”以后的进步青年，第一次较深刻地认识到改良主义的错误。同时，也促使代表着各种思潮的人们组成的新文化阵线，发生了明显的分化。一部分坚持社会主义的知识青年，仍然坚持对社会问题应进行根本解决。虽然，当时主张“根本解决”的人们中，思想状况仍较复杂和不稳，但他们毕竟抛弃了或开始抛弃社会改良主义的影响。从而为他们接受科学社会主义，选择正确的革命道路，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注释：

①郑振铎：《现代的社会改造运动》，《新社会》第1号，1920年2月11日。

②《强权的斗争终局阶级的斗争开始了》，《闽星》第1卷第5号，1919年12月15日。

③《毛泽东给周世钊》，1920年3月14日，《新民学会通信集》第1集。

④《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3~24页。

⑤⑨《王光祈致君左》，《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4期，1919年6月1日。

⑥《互助论》，平民出版社版，导言及目录第23页。

⑦《阶级竞争与互助》，《李大钊选集》，第222页、第224页。

⑧《论社会主义》，《少年中国》2卷5期，1920年11月15日。

⑩凌霜：《工读主义》

⑪曹靖华：《男子去长衫女子去裙》，《青年》第5期，1920年4月4日。

⑫《施存统复轶千》，《民国时报》副刊《觉悟》1920年4月16日。

⑬周作人：《日本的新村》，《新青年》第6卷，第3号。

⑭星：《要整理社会非提倡“工读互助”不可》，《上海周刊》第1卷第2期，1920年4月4日。

⑮施存统：《“工读互助团”的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第73号，1920年5月1日。

实用主义在中国

实用主义是19世纪70年代发端于美国，之后影响至全世界的一种哲学思潮，也是在五四时期对我国影响较大的一种社会思潮。实用主义，日本人译为“实际主义”，胡适把它称为“实验主义”。

实用主义最早形成于美国，其始祖是查理·皮耳士。他在一篇叫《科学逻辑的举例》文中首先提出了实用主义的概念。另一位创始人威廉·詹姆士在哲学讲座中重新提出了实用主义，并出版了《实用主义》一书。在他的积极宣传下，1907年，实验主义在美国形成了一种哲学流派。后来，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 w ey 1859年~1952年），在继承皮尔士、詹姆斯实用主义思想基础之上，将实用主义思想发扬光大。不过，杜威的实用主义与詹姆斯的实用主义略有不同。杜威认为，詹姆斯的实用主义把真理的概念、理论的效用仅仅满足于个人，只为了满足个人私利的需要。这种观点容易将实用主义的概念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潭。与他不同的是，杜威更注意利用和汲取自然科学的材料，强调“实验的经验”与“效果”。在他看来，任何观念、学说和理论都应该以实验为基础，并要接受实验的检验。因此，他将通用的实用主义提法改为了实验主义。杜威还认为，真理的概念、理论的效用必须是对公共而言的，应当涉及“存在方面的特性”，涉及“变化的过程”。只有经过实验证明，满足了一切公共的、客观的条件，在实践中解决了实际问题，才是“有价值的”。杜威实验主义虽然与以前的实用主义一脉相承，都注重实际效果，但是它更注重实验的方法。

在中国，最早介绍和宣传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胡适。1915年胡适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开始追随杜威学习哲学。从那时起，他就成了杜威的得意门生、实用主义的忠实信徒。1919年3月，胡适回国后不久，就力邀杜威来华，不但陪同杜威前往全国各地讲学，而且大张旗鼓地宣传其实验主义哲学。到1921年7月，在杜威来华长达两年的时间里，胡适先后发表了《实验主义》、《杜威先生与中国》等文章。他说：“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

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他只给了我们一个析学方法，使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他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实验主义’。”[①]的确，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一直指导着胡适的政治和学术生涯。杜威对胡适的影响，我们可以从胡适后来的回忆中清楚地看到：“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青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青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②]

“五四”时期，胡适是新文化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积极领导参与新文化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人之一。1919 年 7 月，胡适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革命，鼓吹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1921 年 2 月，胡适和《新青年》编辑部脱离关系，从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中分离出去。后来，他先后创办了《努力周报》、《新月》等刊物，积极宣传改良主义，坚持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革命，在政治上日益走向了反动。

仅就“五四”时期来说，胡适的实用主义及其社会改良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16 年 9 月到 1918 年年底。这一时期，胡适主要通过文学的形式，比较隐晦地向中国介绍实用主义，推行社会的改良主义思想。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就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白话诗、翻译小说和信函等，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此时的新文化运动还没有冲破封建思想禁锢的局面，十月革命也还没有爆发，马克思主义没有在中国传播。因此，胡适回国后没有立即直接谈实用主义，而是想把新文化运动维持成一个“超政治构想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③]用比较隐晦的方法宣传实用主义，以推行不改变现存社会制度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这一阶段，胡适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许多关于文学方面的文章。虽然都是有关文学的文章，但这并不是说他不谈政治，只不过世人把“政治”这一概念错误地理解为专指时事政治罢了。实际上，胡适在这期间发表的一些作品，都是谈政治的，他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提倡妇女解放，反对封建传统观念等政治思想。

第二阶段，从 1919 年 1 月到 6 月。胡适公开打出了实用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旗帜。这一时期，十月革命在中国愈来愈广泛地显示了它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自此以后，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

知识分子受其影响，非常赞赏十月革命的道路。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热烈地讨论着改造中国社会的出路问题，积极为民族复兴寻找思想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实用主义的信徒们再也坐不住了。于是，他们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不朽》和《实验主义》两篇文章，公开掀起了实用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大旗，放弃了过去在宣传实用主义时的隐晦做法。在这两篇文章中，胡适虽然仍继续反对封建传统观念，宣扬资本主义思想，但可以明显地看出，他论述的主题已经变为了社会改良主义理论——实用主义。

第三阶段，从1919年7月到1921年2月。这时，胡适公开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极力鼓吹社会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公然地对马克思主义发起了进攻，鼓吹实用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反对对社会问题进行“根本解决。”8月17日，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对胡适的观点进行了批驳。胡适针锋相对地接连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1920年1月，他以《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为题，先后在天津和唐山发表演讲，宣传其社会改良主张。他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十六字纲领，鼓吹“一点一滴的改造”的社会改良主义，反对暴力革命。

胡适不仅向马克思主义发起进攻，还热情地邀请他的导师杜威来华演讲，宣传实用主义，鼓吹社会改良。不过，在杜威来华开讲之前，胡适等人就对实用主义进行了系统介绍。胡适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4号上的《实验主义》一文，就是详细介绍实用主义的一篇演讲稿。在这篇讲演稿里，他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实用主义的形成脉络，详尽地介绍了皮耳士、詹姆士，特别是杜威的思想。他还对实用主义的实在论、真理论、方法论进行了一些发挥和“通俗”的解说。通过这些解说，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清实用主义的本来面目。

第一，实用主义的实在论。按照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观点，实在就是客观存在，就是物质。感觉和经验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而实用主义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把经验和实在混为一谈，并认为经验可以任意创造“实在”。胡适在论述实在论时说：“总而言之，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

雕成什么像。'”他还从感觉的关系和意象的关系方面，列举了一些事例。他指出：“一样的满天星斗，在诗人的眼里和在天文学者的眼里，便有种种不同的关系；一样的两件事，你只注意到时间的先后，我却注意了它们的因果关系；同一篇演说，你觉得这个声调得宜，我却觉得他的理论完密……”。由此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总而言之，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宇宙是经过我们自己创造的工夫的。”④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胡适实用主义的实在不是客观存在的实在，而是经过人们主观加工的实在。这样，他就把政治上的改良主义和哲学上的实用主义的实在论联系在一起了。

第二，实用主义真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是客观的。而胡适的实用主义真理论则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他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真理和我手里这张纸，这条粉笔，这块黑板，这把茶壶，是一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工具。”⑤“世间没有纯粹的理性，也没有纯粹的知识思想。理性是离不了意志和兴趣的；知识思想是应用的，是用来满足人的意志兴趣的。”⑥胡适认为有效用的就是真理，真理不过是应用的工具。他举例说：“昨天下午北京大学哲学教授会审查学生送来的哲学研究会讲演题目。内中有一个题目是：‘人类未曾运思以前，一切哲理有无物观的存在?’这种问题，依实验主义看起来，简直是废话。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我们承认未有思想以前已有哲理或没有哲理，于人生实际上有何分别?”⑦这就是说，真理没有任何的客观标准，只不过是应用的工具。这种人造真理的观点，就是实用主义的真理观。

第三，实用主义的方法论。胡适特别注意实用主义的方法论。他把实用主义改名为“实验主义”就是因为“他更能点出这种哲学所最注意的是实验的方法。……就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用的方法”⑧除此之外，他在许多地方还直接把实用主义看成是一种方法论。他说：“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⑨杜威把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分为了五步。胡适在他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概括，分为三步：（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特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唯一试金石。后来，他还把它简化为两步：第一步是大胆的假设，第二步是小心的求证，并说：“杜威一系的哲学家论思想的作用，最注意假

设。”他还反复地解释这种方法，说：“律例（指某种科学定理）原不过是人造的假设用来解释事物现象的，解释的满意，就是真的；解释的不满人意，便不是真的，便该寻别种假设来代他了。”[10]然而，这种方法论并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实用主义的实在，事实和真理都是主观的，它不承认主观意识以外的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所以实用主义方法论和它的实在论、真理论而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胡适实用主义的实在论、真理观和方法论的产生，与他在政治上的社会改良主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是社会改良主义的理论基础。他在政治上的社会改良主义的内容主要有：

（一）主张点滴改良，反对“根本解决”。胡适社会改良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主张点滴改良，反对“根本解决”。他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反对对社会问题“根本解决”的主张。随后，又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了“一点一滴的改造”[11]的口号。他认为，社会的改造时制度的改造，是思想的改造，但这种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他以实用主义理论为依据主张人和社会的进步，靠的是积极地运用智慧以解决一些真实而具体的问题，只承认一点一滴的改造，反对“根本解决”。他说，人类社会只有一点一滴向前进步才是真正的进化，社会问题也是这样，只有一步步解决具体问题，才能实现社会的改造。依据这种思想逻辑，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对人类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法。他说：“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至于大失望。”[12]这就是说，解决社会问题，不需要进行根本解决，只要一个个问题进行解决就行了。

（二）主张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实用主义认为，有用的才是真理。胡适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认为阶级斗争对资产阶级产生了不利效果，对资产阶级没有用处，因此反对阶级斗争。他说“阶级战争说指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能并立的理由，……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一方面，无形之中养成了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得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多少本不须有的惨剧。”[13]这里，他否认了这两个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否认是“两

座对垒的敌营”，主张阶级调和。在他看来，两个阶级之间不仅“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甚至把几千年来阶级斗争的“惨剧”，也归罪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造成的。

（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胡适宣传实用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虽然他在口头上也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开许多生路”。但是实际上，他从心里对马克思主义是仇视的。他的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就能充分说明这个问题。

他在这篇文中给马克思主义罗列了许多“罪名”，包括：(1) 谈主义的危害。他指出，主义是很容易被无耻的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而其容易招致反动当局的摧残和镇压。不仅如此，他还说主义“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就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言！”[14] (2) 大谈外来“主义”的无用论。他认为外来的主义，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因此，这种主义不是“有永久价值的真理”。[15]他认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这里，他把问题的矛头指向了马克思主义，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3) 攻击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做招牌”。他认为“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只是考察社会、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只能“做参考资料”。所以，对于主义只应该“摆在脑背后”，不应该“挂在嘴上做招牌”、当“口头禅”。[16]显然，这里他影射的是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浅薄的新典主义”[17]，是使人停止思想的有害之物。

胡适在攻击马克思主义之后，还向人们提出不要“受人惑”的警告，污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是“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面对胡适实用主义的猛烈进攻，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坚决而有力地反驳。

注释：

①欧阳哲生：《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1998 年版。

②欧阳哲生：《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5），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③唐德刚译：《胡适的自传》，《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第 194 页。

④胡适：《实验主义》，《胡适文存》，第 1 集第 2 卷，第 439～440 页。

⑤⑥⑦⑩《胡适文存》（二），第 435 页，第 428 页，第 420 页，第 412 页。

⑧胡适：《实验主义》，《胡适文存》，第 1 集第 2 卷，第 435 页。

⑨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存》，第 2 集第 3 卷，第 99 页。

⑪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胡适文存》第 1 集第 4 卷，第 184～185 页。

⑫胡适：《这一周（一）》，《胡适文存》第 2 集第 3 卷，第 157 页。

⑬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胡适文存》第 1 集第 2 卷，第 530 页。

⑭⑯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⑮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

⑰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存》第 2 集第 3 卷，第 101 页。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黄金时期”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开始有了初步发展，特别是1914年以后，民族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出现了所谓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当时的国内国际的某些有利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应该说，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发展，得益于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共和政体的建立。辛亥革命沉重打击了封建制度，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地位，适合他们生存的社会机制有所改善，经济法制建设有了很大的进步，在这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他们投资近代工业的热情。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强烈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这种从未有过的社会状况，孙中山对此颇有感慨：“中国处在大规模的工业发展的前夜，商业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再过五十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为此，他积极为振兴实业奔走号呼。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当时的国际环境也是分不开的。这时，西方国家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的精力主要投入到了战争之中，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客观上也为中国某些轻工业商品进入世界市场提供了可能。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在纺织业和面粉业方面有了重大发展。同时，群众性的反帝斗争，尤其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而掀起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也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中国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一时期工商业的蓬勃兴起。在“共振实业”浪潮的推动下，民族工商业进入了持续10年快速发展时期。据有关统计，1912年至1921年6月间的10年间，在农商部注册的工商企业达764（不含金融业），资本总额近28 540万元，与1911年前相比，企业总数增加1倍左右，资本总额增加了近2倍。[1]民族资本工商企业的资



本总额，1913 年为 28 741 万元，1920 年为 57 977 万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 29 236 万元；产业资本平均年增长率 10. 54%。[②]从各个行业部门的发展情况来看，有的发展较快，有的相对较慢，其中纺织业和面粉业的发展最为显著。几个主要行业的部门的发展状况如下：

棉纺织工业。据统计，这一时期新建的棉纺织厂总计为 54 家，与 1911 年相比增加了近 4 倍，其中 1914 年～1919 年为 15 家，1920 年～1922 年为 39 家。1912 年～1913 年虽无新厂建成，但已在筹建之中。从 1912 年开始，实业家张謇筹建大生新厂，拟集资 60 万两，购锭 1. 2 万枚（1914 年建成）。同年，他与聂云台联合发起上海模范织棉工场，计划集资 200 万两，设锭 5 万枚。在新建工厂的同时，一些原先建成的老厂此时也焕发了新的增长态势。如无锡的荣家在 1906 年创办的振新纱厂，1914 年扩大了生产规模，纱锭数由初创时的 1. 2 万枚增至 1. 8 万枚，资本数由 30 万元增至 50 万元，后来又增加至 3 万枚、资本 100 万元。南通的大生一厂，在 1915 年增设布机 400 台，后逐步扩大到资本 250 万元、纱锭 7. 7 万余枚、布机 720 台。[③]此外还有宁波的和丰纱厂、崇明大生二厂、上海恒丰纱厂，也都扩大了生产规模。

丝织业。中国的机器丝织业最早起步于江浙地区的苏杭。1912 年，苏州和杭州的丝织业者，首先引进日本的手拉提花织机，设立新式丝织厂，结果引起了各地同业的争相效仿。在杭州地区，自 1912 年纬成公司购置 6 台日本提花机设厂织稠以来，到 1920 年购机设厂者增至 11 家，提花机的数量也有明显增长达 3 800 余台。同时期的苏州，到 1920 年已设立机织厂 10 家，新式织机已有 1 000 余台。1915 年，上海开始引进了电动织机，出现了我国第一家电机织稠厂——物华绸厂，到 1920 年又有锦云、美文、龙飞、美亚、大美、达华、开源等厂相继开办。其他各地丝织工场，也在这一时期陆续使用电动织机进行生产。据初步统计，到 1920 年时，仅杭州、苏州、湖州、上海、盛泽、嘉兴等地，已开办了 40 余家机器丝织厂，延至 1926 年更剧增至 430 余家。由此可知，此时中国的丝织业正从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向着机器生产迈进，向着现代化生产的道路迈进。

面粉业。这一时期面粉业的高速发展，实际上是顺应了世界市场的形势需要。一战爆发后，交战各国粮食生产减少，不仅不能输出，为了应付战争，还得从外国大量进口。这在客观上从中国的面粉业提供了输出海外市场的机会。从 1915 年起，中国的面粉由入超变为出超，大量面粉被输往英国、

法国、俄国、日本和东亚各国，从而刺激了中国制粉业的发展。从 1911 年 ~1922 年，面粉工厂总计达家 1，资本总额达 4 000 余万元，较 1911 年的工厂数和资本数，分别增长了 3. 5 倍和 4. 5 倍左右。[4]

此外，中国的火柴业、卷烟业、造纸业、制革业等行业，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如火柴业，1911 年时全国共有 30 家左右的火柴工厂，资本数有 180 万元，到 1919 年增加至 90 家，资本达 700 余万元。[5]在工业落后的中国，一时出现了“面粉大王”、“火柴大王”等称号的民族资本家。

与轻工业的发展相比，中国重工业的发展要有所限制，但仍然有所增长，尤其是煤矿业、机器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较为迅速。煤矿业的发展是最快的，从 1912 年到 1915 年，领照注册的煤矿公司达到 116 家。虽多为小煤矿，但也不乏规模比较大的煤矿，如 1914 年设立的河南焦作中原煤矿公司（资本 350 万元）、浙江长兴煤矿公司（资本 220 万元）、安徽宿县烈山普益煤矿公司（资本 100 万元）、1915 年设立的黑龙江鹤岗煤矿公司（额定资本 600 万元，先招 125 万元）、1917 年成立的直隶井陉宝昌煤矿公司（资本 100 万元）、1918 年成立的宁乡煤矿公司（额定资本 400 万元）。此外资本在百万元以上，还有山西大同同宝煤矿公司、江西鄱乐煤矿公司、河北票煤矿公司等。随着新式煤矿的增加，机械开采的煤产量在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加，1913 年占到了 59. 2%，1919 年占 63. 6%，1920 年占 66. 3%。

钢铁冶炼业。1914 年开始兴建大冶铁厂等六家钢铁厂。1916 年，建立了龙关（后改名为龙烟）铁矿公司。1917 年，和兴钢铁公司在上海成立。1918 年，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开始兴建。全国其他地方钢铁厂也纷纷建立。采矿业也有较快的发展。铁矿石的产量由 1912 年的 72 万余吨增加到 1914 年的 100 万吨；锑矿的开采和冶炼从 1916 年迅速发展，两湖、两广和云南 5 省相继设立了炼锑才厂 64 家，1917 年时全国锑产量达到万吨，居世界首位。

轮船航运业。民国建立后，中国轮船航运业进入了 10 年的快速发展时期。1911 年，全国轮船企业 596 家、轮船数 1 092 只、吨数 147 087、资本总额 2 184 万元；到了 1921 年时，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轮船企业 1 328 家、轮船数 2 332 只、吨数 489 190、资本总额 8 900 万元，分别增加了 1. 2 倍、1. 1 倍、2. 3 倍、3 倍。[6]随着轮船航运业的发展高潮，几个较大规模的航业集团开始出现了。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以吴洽卿为首的三北航业集团，包括三北轮埠公司、鸿安商论公司、宁兴轮船公司和鸿升码头堆栈公司，资本



总额达到320万元，资产总额达600万—700万元，有轮船18艘，总吨位2万吨以上。若算上宁绍商轮公司，其资本总额达470万元，轮船21艘，总吨位数2.7万吨左右，航线沟通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张本政兄弟创办的政记轮船公司，也是规模较大的航运企业。1905年创办时资本只有12万元、3艘轮船、3 000余吨位，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到1921年时，其资本已扩大到500万元、17艘轮船、1.7万总吨位，并开辟了可达汉口、菲律宾、西贡、新加坡、泗水等地的长江及南洋群岛航线。

这一时期，电力工业、公路运输业、机器制造业等部门也呈现出了发展的态势，但总体来说，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还是赶不上轻工业的快，而且普及面也没有轻工业的宽。

民族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者金融业的发展。民初10年间，金融业的发展格外引人注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银行业。1911年底，全国华资银行实存16家，实收资本总额2155.5万元。民国成立后，由于采取了鼓励实业的政策，全国掀起了兴办银行的新高潮。仅1912年有23家银行成立，其中官办和官商合办的有13家，商办有10家，全国银行总数较上一年增加了1.3倍，资本总额增加了26%，成为民初10间成立银行最多的一年。从1912年~1922年，从全国银行发展状况的数据来看，除1912年新增银行数较多外，1913年~1918年处于平稳发展的状态，银行数在逐年增加，但比较平稳。1918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银行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仅仅五年左右的时间，至1922年，新设银行达151家，资本总额21 669万元。⑦

银行业的发展高潮的到来，催生了资本雄厚的金融财团的出现。在银行相对集中的北京、上海、天津、香港、广州等地区，逐渐形成了华北、江浙、华南三大金融财团。华北的金融财团主要由政府系、“北四行”系和直鲁系组成。政府系包括中国、交通、新华信托储蓄三家银行，“北四行”系由金城、盐业、大陆、中南银行组成，直鲁系包括边业和东莱银行。其中以“北四行”系为中心。华北财团所含的9家银行，除中南银行由南洋华侨开办外，均由大量的军阀官僚私人进行投资，与北洋政府的关系比较密切。江浙财团的实力要比华北财团更强些，它由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上海商业储蓄、浙江实业、浙江兴业银行组成的“南四行”系；由中国通商、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组成的宁波系；由中国实业、中孚银行组成的安徽系。它以经济中心和在华投资的中心地上海为依托，其经济辐射力超出江浙范围，影响全

国。与前两个财团相比，华南财团的实力相对弱些。它由港粤系的广东银行、东亚银行、国民商业储蓄银行、和丰银行和福建系的中兴银行组成。这些银行大多由华侨投资和主持，吸引了大量华侨资本，与华侨的关系密切，成为港、粤、闽系工商界的金融活动中心。

华资银行业是整个社会经济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工商业发展的有力支柱，为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地位和作用不可小看。

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势力开始向农村渗透，从而刺激了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加速了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以工业品为原料的农村加工手工业逐渐兴起，各种农业垦殖公司也有了发展，还出现一些专门生产工业原料的经济作物区。1913 年时，苏北的垦殖公司仅有两家，1914 年 ~ 1918 年间新增了 14 家。1912 年 ~ 1916 年，广西的农垦公司增加了 35 家。尽管如此，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农业经济中的比重还是十分微弱的，有些农垦公司实际上仍是出租土地，并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关系。

民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确实出现了一段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但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所谓的“黄金时期”是相对的，相对于之前的阶段而言的，它包含着种种隐患。就整个社会大环境而言，民族资本始终处在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势力的包围之中，这一点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不过，民族资本家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紧紧抓住了这十几年的有利时机，在困境中艰难突破，给自身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然而，中国社会毕竟还是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发展终究还是要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其基础仍是薄弱的。尤其是当一战结束、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卷土重来后，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又陷入了停滞乃至衰败的境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

第一，军阀的专制统治使实业兴国的活动受到很大打击。民国初年，实业兴国团体成立后，就不断给政府提建议，要求政府鼓励实业，制定经济法律法规，但都未得到最高当局的支持和采纳。特别是袁世凯上台后，对兴办实业不但不予支持，还处处限制。从 1913 年 6 月，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复辟专制统治起，实业救国活动就受到严重挫折，或是被取缔，或是被迫解散，或是停止活动，直到 1916 年后才开始有所恢复。代表民族家利益的经济团体曾向政府提出数以千计的改革商政建议，绝大多数被束之高阁，得不到支持。甚至像工商总长刘揆一、张謇这样的高官和有影响力的人



物提出的实业计划，也很难得到采纳，最后落得“设计已穷，日在官署画诺纸尾”的结局，深感“深感国民实业前途，茫无方向”。[8]经济法规的颁行，也经常遭到军阀的破坏，民族企业中遭受军阀抢劫、勒索、吞噬的不在少数。

第二、军阀混战使新式工业的资金来源愈发困难。军阀们为了争夺地盘，不断发动战争。政府募集战争的经费，无非两种方式，一是出卖国家主权向外国借债；二是发行大量的国内公债。军阀政府强行摊派巨额非建设性公债，造成了新式工业的招股困难。因为这些公债利率很高，许多银行业见有利可图，便纷纷将投入资金购买国债，结果使银行对工商业的放款数量大受影响。同时，在公债高利率的吸引下，社会上的闲散资金开始流向银行业和其他投机性金融企业，这样对工业企业的投资意向就大大削弱了。另外，北洋政府还大兴苛捐杂税，征税关卡林立，税种名目繁多。从而阻碍了商品的流通，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利润减少，使企业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

第三，政局不稳，中国社会缺乏稳定有效的经济发展规划。早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北洋政府就制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划。他死后，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原先的实业规划也被放在一边，无人过问。在这样的状况下，各地民族资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从事实业活动。如此一来，这种缺乏国家引导和规划的各地经济必然陷入无序、畸形而盲目发展的境地。

第四，国际环境的重新恶化。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它是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缝隙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受国际环境的影响较大。战前西方对华输出大量商品，战争爆发后，西欧列强在华经济势力和对华商品输出大为削弱，而中国输出外国的商品有了较大增加。然而，随着大战的结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华势力卷土重来，加大了对中国的经济渗透。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环境已不复存在，它们面临着更大的外资压力和竞争，所以，很快便由快速发展阶段转为停滞衰败阶段。

总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黄金时期”后，又回到了艰难前行的境地。这一时期，民族经济由盛及衰的历史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国家要实现工业化，不仅要有一支动员和组织起来的工业化主干队伍，而且要有一个独立、稳定而且善于规划和领导工业化运动的国家政府，创造出适合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显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资本主义缺乏这样的环境，所以无论资本家百般努力，仍不能阻止民族经济衰

败的历史命运。

注释：

①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年版，第 2～6 页。

②参见许涤新、吴澄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046～1047 页。

③资料来源：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全国棉纺织厂统计资料选编》，该委员会，1937 年版。

④虞和平：《中国现代化进程》，第 2 卷，第 477 页。

⑤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⑥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470 页。

⑦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第 2 卷，第 481 页。

⑧沈家五：《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408 页。



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

中国工人阶级的出现，可以上溯到19世纪下半期。这一时期，中国开始出现了一批新式工业，正是由于近代工业的发展，催生了一个崭新的社会阶级——中国工人阶级。应当说，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中国早期的官僚资本和中国民族资本这三种资本兴办的近代工业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早期的工人阶级成长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最早一批产业工人的出现。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产生在19世纪中叶外国资本在中国直接经营的企业里。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后，迫切地想从中国掠夺原料，扩大商品输出。因此，他们在中国创办了以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为目的的船舶修造业和航运业。由外国商人开办的轮船公司陆续在广州、香港、上海、厦门出现。1845年，英国人柯拜在广州黄埔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近代船坞。在这些船舶企业中，出现了最早的产业工人，主要是船舶修造工人和海员。外国商人为了谋取更大的利润，他们争先恐后地在各通商口岸兴办加工工业，如砖茶、缫丝、制糖、蛋粉、轧花、打包等厂。接着，又开办了像造纸、肥皂、火柴、玻璃、印刷、木器、制药等一批轻工企业。这些企业为节约成本，往往雇佣中国人来做工。据统计，从1980年到1894年，外国商人在中国共开办了191家近代企业，投资总额达2 800万元，约雇佣工人3.4万人。

洋务运动兴起后，洋务派自己创办了一些官办企业。这些企业中也产生了一批产业工人。如江南制造局雇工2 000多名；福州船政局雇工约1 700至2 000名；天津机器局雇工1 400至2 500名。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30多年里，由洋务派创办和经营的军用和民用近代企业，共有40多个，雇工约3万余元。这样，中国的早期产业工人就在外国资本、中国早期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三种企业中陆续产生了。

二、甲午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产业工人数量的新增长。这段时

期，中国近代工业有了较快发展，产业工人的数量也随之有了明显增加。它的增长首先是由于外国资本企业在中国的迅速扩张和发展。1894 年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乘机攫取了许多特权，争先恐后的到中国修筑铁路、开矿山、办工厂、银行和航运公司，掀起了一股在华投资工业的热潮。1895 年到 1913 年，外国在华投资超 10 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达 136 家，投资总额多大 10 300 万元，是甲午战争前 50 年的工业总投资额的 3 倍以上。在采煤业方面，根据对开滦、抚顺、本溪等外资开办的七大煤矿的统计，1899 年投资额共 152.7 万元，1913 年投资额猛增至 6 316 万余元，增长了 40 倍。在修筑铁路方面，1911 年，中国铁路里程为 9 600 公里，其中由外资控制的就达 93.1%，中国有自主权的仅占 6.9%。在航运方面，以长江为例，外国资本扩建和新开的轮船公司，占了 70% ~80%。纺织业方面，1897 年外资纱锭为 160 548 只，至 1913 年增至 338 960 只。随着外资在华企业的不断扩张，受雇的中国产业工人数量也随之增加，数量增加最明显的是铁路、矿山、海员和纺织工人。

与此同时，民族资本工业的初步发展，也促使着产业工人数量的增加。这期间，先后出现了民族资本创办近代企业的几个次小热潮。据统计，资本在 11 万元以上的新设厂矿共 594 家，投资总额达 1.2 亿元。这些厂矿规模比以前要大，开设的地点也由上海、武汉、广州等地逐步扩展到杭州、无锡、天津、哈尔滨和营口等地。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使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又有了新的增加。据大致统计，到 1913 年，全国中外工矿企业的工人数大约有 50 至 60 万之间，20 年间人数增加了 4 到 5 倍。[①]

三、1914 年至 1918 年，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这一阶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各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战争之中，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工业出现了近十年的发展“黄金时期”，而中国的工人阶级队伍也随之壮大起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战争，不得不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这种情况可以从各国来华船只和商品的减少看出：1913 年各国来华船只为 24 艘，49.1838 万吨，1916 年就减少为 18 艘，58.1333 万吨，1918 年更减为 14 艘，35.7648 万吨。各国输华商品总值：1913 年为白银 586 290 千两（海关两，下同），从 1914 年至 1918 的 5 年间，每年都低于 1913 年，其中 1915 年减少为白银 477 064 千两，为 1913 年的 79%。而处于战争状态下的西方各国，无暇顾及轻工业生产，急需从别国得到某些工业品。这样，就从客观上为中国的轻工业品进入世界市



场提供了可能。中国民族资本家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民族工业，使民族资本经济出现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海外市场的扩展，使民族企业的利润有了显著的增加，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国内工商业者的投资。根据1895年的以来新设厂矿及资本额的统计，从1895年至1913年的19年间，新设厂矿数共583个单位，投资总额为12 029.5万元，平均每年设立厂矿30至31个单位，每年投资额为633.1万元，而从1914年至1919年代的6年间，中国民族工业新设厂矿379个单位，投资总额为8 580万元，平均每年设立厂矿63个单位，每年投资额为1 430万元。以上海和无锡为例，1911年共有98家工厂，1919年迅速增加为385家。江苏无锡1911年至1913年每年建一个厂，而大战期间每年建7个厂。

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轻工业方面，尤其是纺织和面粉业的发展。民族资本的棉纺织厂，1915年共有15家，到1922年增至64家；1915年纱锭共有544.01万枚，1922年增至1 593.034万枚；1915年布机共有2 254架，1922年增至9 817架。据不完全统计，1920—1921年间，中国共有面粉厂123家，资本总额约有4 000万元。其中，民族资本经营的有105家，生产能力占82.2%。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发展起来的纺织、面粉工业，成了当时中国民族工业的两大支柱。同时，火柴、造纸、针织、玻璃、肥皂、食品、碾米等也都有较快的发展。重工业方面，如机器制造业、采矿业、电力业、公路运输业等，与战前相比，都有所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其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远不及轻工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西方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相对地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但是日本和美国趁着其他各国处于大战之中，却乘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从1914年~192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设的较大的厂矿达220家。在重工业的采煤和冶铁方面，日本强占了中国的抚顺、本溪等全国著名的大型煤矿。同时，它还通过合资和借款等方式，攫取了中国煤矿11家单位，并几乎夺去中国全部铁矿的控制权。在棉纺织业中，日资纱锭由1913年的111 936只，增加到1919年的332 922只，约增加了2倍。1916年，日本已在中国设立了27家银行，成为掠夺中国经济的总枢纽。美国当然也不会错过这一机会，它在中国积极进行银行贷款、修筑铁路、扩大和增建航运公司等方面的业务，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民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确实出现了一段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但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所谓的“黄金时期”，也是障碍丛生，包含着重重隐患。

不过，由于民族资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日本、美国资本在华企业的增加，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的工人阶级队伍也在迅速发展壮大。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前后，全国约有产业工人261.5万名，邮电工人3万名，海员15万名，汽车、电车工人3万名，搬运工人30万名，中国工厂工人60万名，外国资本在华工厂工人23.5万名，矿山工人70万名，建筑工人40万名。[②]可见，此时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这支重要力量，不久后就已独立的姿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中国的工人阶级与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一样，有着共同的优点，他们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势相联系，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是最先进和最革命的阶级。不但如此，中国的工人阶级还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中国工人阶级特别集中。从地区分布上看，他们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武汉等少数大城市。据统计，1894年，仅上海、广州、汉口三大城市的工人，就占了全国工人总数的76.7%，其中上海一地久占了46.4%。[③]1925年，上海及其附近地区，就集中工人100万人；武汉40万人；天津30万人；香港25万人；沈阳及其他地区约60万人。[④]从产业分布上看，他们又都集中在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等大企业中。从所在的企业上看，他们多集中在大型厂矿中，特别集中在外国资本企业中。据1900年至1910年间，13个省不完全统计，工人人数在50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有156家，雇工达240 395人，约占当时工人总数的30%～40%；工人人数在1 000人以上的有56家，共有工人152 452名。在156家大型企业中，外国资本企业有40家，占了45.5%。

其次，中国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第一，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与国外的工人比，中国的工人阶级劳动时间是特别长的，一般都在12小时左右，有的甚至达14、16小时，而且星期日多半没有休息。如上海纱厂，原来工人每天劳动为11小时，到1905年左右改为双班，每班12小时。上海织布厂没有夜班，白天劳动14～16小时。煤矿工人的境况也不乐观，工作时间就更长了。如开滦煤矿的工人，名义上每班劳动8小时，日夜三班替换，但工资太低，为了养家糊口，他们被迫加班加点，往往连续干24小时。他们不仅劳动时间长，且劳动强度也很大。由于当时的企业机器设备陈旧，大多采用手工操



作，如火柴盒卷烟的包装，制粉时的供料和运输，以及矿石的采掘等，都是粗笨的体力劳动。这样，工人在劳动中始终处于高度紧张和极度劳累之中。第二，工人工资低。当时中国工人的每日收入，一般的只有两三角钱。工资虽低，但物价却在上涨。如 1894 年上海纺织工人的工资仅为 1 角至 2 角，当时的米价为每担为 2. 8 元；1920 年上海纺织工人的工资为 2 角至 4 角，而此时的米价却涨到了每担 12 元左右。就是说工资涨了 1 倍，而米价却上涨了 5 倍。工人的实际工资降了很多，生活更加困难。第三，没有劳动保险。他们既要面临着失业的危险，又要面临工作时的死亡威胁。而且，厂矿中普遍缺乏劳动保护和安全设备，工人伤亡事件经常发生。如 1917 年 1 月 11 日，抚顺煤矿发生爆炸事件，一次死亡工人就达 900 多名。第四，受各种封建性的野蛮剥削，毫无政治权利。在近代企业中，中外资本家与中国封建头目和其他黑暗势力相勾结，普遍实行了带有封建性的剥削形势，如包工制、养成工制、包身工制和学徒制等，在层层剥削下，中国工人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

正是由于工人们深受种种不公的待遇，生活特别痛苦，所以它的斗争性也较强。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从工人阶级产生那天起，就不懈地进行着英勇的斗争。虽然这种斗争初期是自发的，但它却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伟大的革命精神。

帝国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最主要敌人，所以，中国工人阶级首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例如，1858 年，2 万多香港市民、搬运工人，为了反对英法侵略军占领广州城举行了罢工，全体回到广州，给英法殖民者以沉重打击；又如，1885 年为反对法国侵略中国，香港造船工人拒绝修理法国兵舰，其余各业的广大工人也拒绝为法国人运货和服务。他们举行了长达 35 天的罢工，给法军以应有的打击。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东北的矿山、伐木和筑路工人，纷纷起来反抗，如沙俄在旅顺的海军工厂中做工的华工 2 000 多人，为抗议俄国侵略和对工人的暴行，“皆一概辞职”。⑤

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同时，中国工人们也为反对封建压迫而斗争。这些反抗斗争，有的是为了反对奴役和迫害，有的是为了反对摊派捐税、延长工时和克扣工资。据统计，从 1840 年到 1904 年，中国工人发动了 50 次反对延长工时和克扣工资的斗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1868 年，上海英资耶松船厂的广东工人，为反对厂方无理降低工资而举行的罢工；1883 年中至 1890 年，上海江南制造局工人，先后两次因总办延长工时而罢工。

辛亥革命前后，随着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发展，工人运动也参与了进来，并成为一支重要的革命动力。他们纷纷响应、支持和参加各种革命团体。在孙中山的兴中会中，就有54名工人，占可考会员总数的19%。此外，他们还积极帮助孙中山筹集革命活动资金，购买、运输和隐藏武器，并直接参加武装起义。如1906年，同盟会领导的萍、浏起义，就有6 000名煤矿工人参战。1911年的反对“铁路国有”的运动中，也有川汉铁路工人举行起义相互配合。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增长、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工人的罢工斗争也日益加强了。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至“五四”前夕，历年的工人罢工次数是：1912年14次；1913年11次；1914年11次；1915年8次；1916年17次；1917年23次；1918年30次；1919年5月前19次。

中国工人运动的增长，工人斗争日益明显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促使中国工人群众的觉悟进一步的提高。但它在“五四”以前，仍然处于自发斗争的阶段，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它们只是作为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当时工人阶级还没有自己的政党和现代的工会，工人的组织，多半还是一些秘密结社的帮会和封建的同乡会等团体。在当时的条件下，它们不可能提出远大的政治目标和组织工人进行自觉的斗争。

“五四”运动中，中国的工人阶级纷纷响应学生运动，投入到了这场伟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中。在这场运动中，工人阶级第一次以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冲锋在斗争的第一线，为反帝反封建斗争做出了突出贡献。

注释：

①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8～39页。

②刘明逵：《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1月版，第122页。

③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02页。

④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21页。

⑤《俄事警闻》、《旅顺之同盟罢工》。



第一代产业工人的反帝斗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处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现实的困苦，迫使着中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奋起反抗。这种反抗斗争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而不断增长。1904 年以前工人的斗争还只是零星的发生，据不完全统计，1840 年～1904 年的 64 年间，全国工人各种斗争约 50 次，平均每年不到一次。之后，工人斗争的次数明显增加。从 1905 年～1913 年 9 月间，全国工人各种斗争约 70 余次，平均每年增至 8 次；而 1914 年～1919 年 5 月的 5 年多时间里，全国工人的各种斗争即达 120 余次，平均每年约 20 多次，其中 1 918 年一年全国就发生工人各种斗争 33 次之多。

中国工人阶级初期的斗争，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

一、甲午战争前后工人的斗争。这一阶段，中国的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列强加紧了对华侵略。工人阶级虽然刚刚起步，但他们积极投入到了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表现出英勇的反抗精神。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香港、澳门工人、雇员的反侵略斗争。

1. 反对列强的侵略斗争。早期工人阶级产生后，首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侵华的外国势力。1857 年 12 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实行军事占领，对当地人民进行更加野蛮的烧杀抢劫，从而激起人民群众的更大愤怒和坚决反抗。1858 年 3、4 月间，广东花县团练总局为了反对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城，号召在香港、澳门等地外国企业中和洋人家中教书、办理文案以及一切雇工服役人等，限一个月内一概罢工回籍。结果，港、澳工人、雇员在一个月之内，罢工回籍者几占十之七八，达 2 万余人。并且实行“封港之法”，绝其贸易接济，凡是敢私买卖者，拿获治罪。香港顿时变成一座死城，洋人各项经济活动停顿，所有中外人等，两不交易，生意寂然。甚至洋人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困难。管制广州的“联军委员会”头目巴夏礼派人到新安县张贴告示迫令复工，团练义勇突起袭击，先后杀死侵略者、汉奸百余

人。吓得侵略者不敢再来。香港同胞以极其秘密巧妙的方法劫杀英人，使之不得安宁。港澳罢工是外国在华企业中中国工人、雇员反对侵略者的第一次大罢工，沉重打击了英、法殖民者的嚣张气焰。

中法战争期间，香港船舶修造工人在王合会领导下，拒绝为侵略军修理军舰，直接影响了法军作战物资的运输。甲午战争时，东北的煤矿工人和大连的产业工人，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八国联军侵华和沙俄占领东北期间，东北的矿山、伐木和筑路工人，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中国工人反对外国侵略的情绪还表现在对外资企业和洋人的执视。1881年9月14日，福州附近一家俄商砖茶厂起火，该厂经理要求所雇中国工人救火，被工人一口拒绝。他们不仅不救火，还阻止前来救火的其他工人，愤怒地高喊到："把洋鬼子和他们敞财产都给烧光!" 1 891年，唐山平铁路局一个外国技师因为期压了一名广东工人，结果引起了在路矿工作的其他工人的一致声讨，一百多名粤籍工人提起木棒石头就要揍他，不是他及时逃走，几乎要丢了性命。

2. 反对压迫、迫害和资本剥削的斗争。由于此时工人人数有限，觉悟不高，所以起初的斗争，大多数经济斗争，且主要不是为了提高他们的工资、缩短工时及改善待遇，而是为了反对人身迫害。如1882年发生的"船局命案"（又称"林永成事件"）。1882年7月21日晚，清军福靖营洋枪教习、守备朱得桂的差役林永成，不慎失手摔破朱的磁烟斗。朱随即对林拳打脚踢，致使其左肋和腹部遭受重伤，之后又用布带将其活活勒死，并谎称林永成是无故自缢而死。船政衙门与闽县官吏包庇罪犯，激起了船政工人和附近乡民的无比愤怒，大家将船政衙门团团围住，引发了近代福建产业工人首次大罢工。在工人罢工的压力下，凶手得以惩处。1891年，开平煤矿的广东工人愤怒地拿起木棒和石头，反对外国技师对他们的侮辱。广东工人的反抗行动得到了全厂工人的支持，在他们的奋力斗争下，所有外籍雇员都吓得逃到了天津。

与此同时，他们还进行着反对摊派捐税、延长工时和克扣工资的斗争。从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发展的经验来看，他们的斗争最初一般都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待遇有所改善。当然，中国人阶级也不例外。最早开展反对中外反动势力摊派捐税斗争是香港工人。1844年10月，香港工人和商贩反对英国当局颁布和实施的人头税法案。仅30日这一天，罢工、罢市回到广州的就有3 000多人。又如1860年和1862年，香港的轿夫、水艇工人和码头搬运工



人，先后举行了反对交纳“牌照”费和登记注册费的罢工斗争。据统计，从1840年到1904年，中国工人在近代为反对延长工时和克扣工资而举行的罢工，有近50次。其中较著名的有：1844年，开平煤矿工人大罢工。这年的7月，这个矿的部分工人，因要求与工资较高的广东籍技术工人拿同等工资，曾使“矿厂大半已陷于停工状态”，而“知县束手无策”。1883年和1890年，江南制造局工人先后两次因总办延长工时而罢工。1905年5月，江西安源煤矿工人，因为反对“新来洋矿师督责过严，兼又罚扣太重”而罢工。1913年，汉阳兵工厂工人也由于反对以贱价纸币发给工资，在老君会领导下罢工。这次罢工时间很短，只几小时就梭湖北督都黎元洪镇压，领导人刘某被处死。除此以外，在新生的民族资本企业里，也曾发生过多次工人要求改善待遇的罢工。但由于规模都较小，没有详细的记载。

二、辛亥革命前后工人的斗争。这一时期，中国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新阶段。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队伍的壮大，工人运动出现了有了新的发展。

1. 积极投入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治运动。20世纪初，民主革命思想开始传播，革命活动此起彼伏，工人阶级受其影响，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来。1904年底，《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不平等条约期满。中国人民特别是旅美华侨强烈要求废除条约。在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改约要求。但美国政府悍然拒绝，蛮横无理地要求续约。这一行径，遭到了国人的强烈愤慨，于是一场“抵制美货”运动，反美爱国斗争开始了。工人阶级们纷纷响应这一爱国运动，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从事反美斗争。如香港的搬运工人拒绝为美商运货。上海的刻字工人，对美货商标一律拒绝刻印，抵制美货的宣传品。广州工人提出了“永远不用美国货”的口号，搬运工人宣称坚决不抬美货。南京、苏州、扬州等地的工人也纷纷投入抵制美货、拒用美货的爱国斗争。

“收回利权”运动兴起后，广大工人积极参加了各种保路、保矿和保地的组织。他们强烈反对帝国主义国家抢夺中国经济主权，要求把铁路、矿山等权利收回国有。1911年，湖北宜昌筑路工人数千人，为了保路与当地清军发生冲突，经过激战，打死清军20人。在保路运动最激烈的四川省，号称拥有10万“同志军”的队伍中，手工业工人、船工和苦力占了很大的比重。他们为打击外国侵略势力，保护国家利权作出了突出贡献。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领导的各种革命组织和团体中，都有工人阶级的身

影。如1905年的兴中会，据可考的286名会员中，工人占了54人。同盟会中的工人也占到了7%。他们有的参加革命组织，有的帮助筹集革命的活动经费，购买运输和隐藏武器，有的直接参加武装起义。如广州机工陈本新和梁业崧，为研制炸弹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06年，同盟会领导的萍、浏起义，就有6 000多名煤矿工人参战。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得到了国内工人的支持，还受到了海外华侨工人的拥护。1911年，孙中山到美国各地去进行革命活动，当年9月2日在美国旧金山致公总堂接到附近各埠的报告称：人们听了孙中山演说后，“人心倾向革命，如水就下，即平时最不喜欢谈革命者，至今亦连声诺诺，以革命事业为救国之唯一上策”，“捐款尤以工人为多，且有无工栖身而借贷捐助者”。[①]辛亥广州起义前夕，刺杀清廷署理广州将军孚琦的温生才，就是华侨矿工；广州起义时在黄兴率领下进攻清廷总督衙门英勇杀敌的李文楷，也是一位华侨工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已经查明的烈士中有27人是华侨，其中华工就有11人。1911年10月，各地工人群众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了辛亥革命的大潮中。京汉铁路工人和川汉筑路工人，首先掀起了参军参战的热潮。上海的工人，组织了义勇军、敢死队，积极参加上海起义。汕头码头的水手得知革命的消息后，毅然剪掉辫发，与码头工人一起，拿着手榴弹，喊着打倒清朝皇帝的口号，举行了示威游行。工人们为革命活动的支持，促使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2. 工人罢工增多，同盟罢工出现。这一时期，工人罢工的次数有了明显的增加，规模也越来越大，并且出现了同行业和同产业的同盟罢工。据不完全统计，从1840年到1904年的60多年间，全国工人罢工仅有50多次，平均每年不到1次。然而从1905年至1911年的7年中就有55次，达到了平均每年8次之多。之后，由于辛亥革命的推动，工人罢工出现了新的高潮，仅1912年和1913年两年，全国共发生罢工24次，每年达12次之多。以上海市为例，1902年至1911年的十年间上海熟练工人罢工11次，而1912年~1914年三年间罢工达16次之多；同期，上海非熟练工人在1902年~1911年的罢工为16次，而在1912年~1914年的三年间，罢工达11次。1912年~1914年这三年的罢工已绝非单纯的要求增加工资之类的经济罢工，而是包含了成立工会，掌握雇佣权利为目的的政治性罢工。例如，1911年11月上海光复期间，“电报生罢工支持革命”。1912-1913年间，缫丝、翻砂、豆腐等行业工人在中华民国工党的领导下多次举行罢工。1912年7月，翻砂业工人要求成立工会而发动罢工。并于1913年2月再次罢工，



要求掌握雇佣权利。1917 年 3 月，印刷业工人也为了成立工会而进行罢工等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此时不仅罢工的次数在增加，规模和范围在扩大，而且同盟罢工，这种高级的罢工形式也开始出现。比如，1911 年 8 月，上海四家丝厂的 2 千多女工举行联合罢工，抗议协和厂买办任意削减工人工资和压迫女工。1912 年 7 月，上海翻砂工人反对厂主所定工作时间，要求成立工会，举行同盟罢工，取得完全胜利。1912 年 10 月，沪北漆业工人接连数次举行同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基本上取得了胜利。1912 年，广东顺德缫丝工 5 000 人发动罢工，反对资本家苛待工人和用低价纸币发放工资。同盟罢工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逐渐成为一种风潮。辛亥革命之后的数年里，沪上报纸不时惊："上海南北市各业工人。近来纷纷同盟罢工，要挟加价，甚至酿成极大之风潮。"

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五四运动前的工人斗争。一战的爆发，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影响巨大，它给了民族工业暂时喘息的机会。民族资本家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发展民族资本经济，出现了"黄金"发展的十年。民族资本经济的繁荣，促使着工人阶级队伍的迅速壮大。但中国依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深受压迫和剥削。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他们必须团结一致，奋力抗争。这样，随着工人阶级自觉性的提高，他们的斗争较以前，又有了明显的进步。

1. 工人罢工频繁。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从 1912 年至 1919 年"五四"前夕，全国罢工次数达到 133 次。仅 8 年的时间，工人罢工次数超过了几十年的罢工总数。其中 1912 年为 14 次；1913 年 11 次；1914 年 11 次；1915 年 8 次；1916 年 17 次；1917 年 23 次；1918 年 30 次；1919 年 5 月前 19 次。如此频繁的罢工，促进了工人觉悟的提高，其斗争方式也有了新变化。他们在斗争时，开始更多地利用散发传单、争取社会同情和支持、选择罢工时机，在罢工前精心筹划应变措施。与此同时，同盟罢工的次数也在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计，较大的同盟罢工有 6、7 次之多。如上海的水木业、香业、漆业、翻砂业和苏州的丝织业，工人举行同盟罢工时，参加者少则几千人，多则上万人，场面非常大，战斗力也很强。此时的同盟罢工不止限于本行业，而是超出了产业范围和地区。如 1916 年的天津法租界工人反对法国殖民主义吞并老西开的同盟罢工。

2. 罢工日益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这期间，工人斗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反帝反封建的倾向非常明显。1915 年，工人阶级参加了反对"二

十一条”的爱国运动，表现了他们坚定的反帝立场和浓厚的爱国情感。当“二十一条”消息传到上海后，舆论大哗。上海工人和各界人士纷纷集会游行、通电反对。3月上旬，工人、市民上街宣传抵制日货，反对“二十一条”，遭到租界捕房及华界警察署的弹压，引起公愤。3月18日，上海工人参加由上海国民对日同志会等团体发起的国民大会，到会约4万人，会上议决反对“二十一条”，要北洋政府终止与日谈判。4月上旬，抵制日货发展成为罢工斗争。4月3日，杨家渡、日清、三菱公司等码头工人宣称抵制日货为“我民应尽义务”而停止工作。4月9日，浦东日商新老大阪公司、洋泾三井煤栈等码头工人拒运日货，举行罢工，结队游行，散发传单。在这场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中，充分表现了工人阶级反帝爱国的决心和勇气。

类似的还有，1916年11月15日，天津法租界工人为反对法国侵占老西开而举行的罢工。虽然，这次工人的斗争没有能够完全达到目的——保护老西开不受侵犯，但是迫使法帝国主义不得不由完全侵占改为中法共管。

总起来说，中国工人阶级的早期斗争，是随着工人队伍的壮大而不断发展的。但是，不论是经济斗争还是政治斗争，都是工人阶级自发的斗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们还没有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革命纲领。所以尽管他们积极追随革命派，进行反帝反封斗争，而且非常英勇，但仍然很难取得胜利。这就说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武器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拯救不了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中国的工人阶级只有接受更先进的理论指导，才能获得自己的彻底解放。

注释：

①朱学范：《工人群众对辛亥革命的支持——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原载于1981.10.14《人民日报》。



工人行会和秘密社的出现

马克思曾经指出："工人们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恩格斯也曾指出，在阶级统治的政治斗争中，组织是最重要的武器。根据他们的论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所进行的反抗和争取解放的斗争，除去依靠自己的组织和更广泛的团结以外，没有别的可以依靠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进行斗争需要加强组织。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仅受到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且还受到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和奴役。因而他们的斗争自然也就更加需要依靠自己的组织和工人之间的团结。

工人阶级的组织，是在广泛斗争中随着工人群众阶级意识的产生、发展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恰如工人阶级的斗争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发展阶段一样，工人阶级的组织也经历了一个由原始的非封建性组织，到低级自发的阶段性组织，再到集中统一的阶级组织的发展过程。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早期中国工人阶级，由于阶级队伍还处在早期自发斗争的阶段，阶级觉悟不高。因此，工人的组织形式，大体说来，还是行会、帮口和秘密结社，以及资产阶级影响下产生的劳资混合团体和早期工人的自发组织等。只是到了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才出现了近代工会的萌芽。这也是中国早期工人组织的主流和特点。

中国早期工人组织或工人有关的团体，大致有四个类型，其简况如下：

一、旧式传统的组织形式，如行会、帮口和秘密结社。由于中国早期工人阶级队伍，大多数是刚从封建制度下的手工业工人、店员、苦力和各种破产的个体劳动者、小业主、农民等转化而来。他们在社会化的机器大工业中

受到的锻炼并不多，阶级意识还很少，甚至还没产生。所以，他们深受封建传统劳动者思想的束缚。特别是在组织上，他们不可能一下子就脱离封建社会长期以来的旧组织。他们身上或多或少地带上了旧式组织的烙印。这些封建旧组织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是小生产的行帮组织。

行会是封建社会中期，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工商业者为了防止竞争、排除异己、垄断市场而组织起来的一种团体。在封建社会里，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部分手工业和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镇形成了。行会就是在这些城镇的生产、销售各类商品的不同行业中逐步产生、发展起来的。封建行会是封建社会工商业者的同行业组织。各行会内部的成员较为复杂，一般来说，主要有3部分人：一是拥有本钱和生产、经营设备的作坊业主、店东及掌柜等业主代理人，他们雇佣的学徒、帮工则是被剥削者；二是拥有生产技艺和经营技能的师傅；一般作坊、店铺带学徒的师傅是业主、店东本人；另有一些不是店东、业主而带有学徒的工匠师傅，他们既是被雇佣被剥削者，又对学徒有封建性的剥削和压迫；三是被雇佣的一般帮工、工匠和学徒，他们是被剥削、被压迫者，特别是那些徒工处在行会中等级的最底层。

这样，各种行会成员之间，逐渐形成了经济地位不同的阶级关系。虽然行东、师傅与帮工、雇工、学徒之间，存在着利益矛盾；但是，在行会发展初期，他们之间的这种深刻矛盾，一般不会转变为尖锐的冲突和斗争。到了近代，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行会逐渐演变成了同业“公会”，即一个行业的人协同对外的组织。他们共同议定工作的价钱和条件，议定收学徒的条伙和年限，议定内部的各种规章制度。工人行会的宗旨和职能是维护工人的利益。因此，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当各种工人运动兴起时，许多地方的工人行会都转化成工会。

帮口是一种按同乡、地域结成的劳工组织。如上海造船业的木工，航运业的海员，由于多是来自宁波和广东各地，于是他们团结起来结成了宁波帮和广东帮。当时，在芜湖码头行业中有山东帮、湖北帮、寿州帮、金斗帮（合肥人）、杂帮（巢县、定远人），米行业中有广帮（广东、广西）、烟台帮、潮帮（潮州人）、宁波帮；剪刀行业中有本帮（合肥、和县人）、北帮（湖北人）、江西帮。帮派之间斗争很激烈，例如有一次在芜湖，寿州帮和山东帮闹事，双方共打死九十二人。帮口内部，有时在官方和外帮人的挑动下，进行激烈的斗争。1908年，清政府在各帮口中推行封控等级式统治，通过帮口中的兑老板、大老板、小老板，对工人进行严密的控制。老板工资



实行“益成制”；从工人全部工资中，层老板一人拾取 8.8%，大、个老板拍取 15%、20% 不等。芜泅汀北岸招商用码头行业的杂帮，工人工资被抽取 6% ~70%。

帮口组织出现后，流行于工业集中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它的产生有利于团结工人，解决相互间困难，共同向资本家进行斗争，维护同帮利益。但是它具有很大的落后性和狭隘性，它们为了自己帮派的利益，排斥非帮口工人，因而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和统一，而且它的头目也容易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收买和利用。随着帮口组织的发展，后来就逐渐演变成了秘密结社。

秘密结社。早期工人中的秘密结社活动也是工人联盟斗争的一种组织方式。它最早出现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当时，全国各地破产的农民、失业的手工业工人等游民，曾组建许多秘密结社组织。它们起初大多以寺庙、山林、码头为中心，并且主要活动在广大农村和水陆交通运输线上。鸦片战争以后，一部分产业工业加入了秘密结社，其活动的中心也逐渐由乡村转移到了近代城镇和工业区域。在城市里，它们以苦力运输者、无业游民及其他工人和城市贫民等所谓“下层社会”为重点，渐渐地将其组织渗入到社会各阶层。同时，这些组织与三教九流和各业工人组织的行帮组织结合，从而形成了与城市官方政府既相抗衡，又暗中勾结的一种特殊势力。这些组织结构严密，帮规严格，内部等级森严，有共同信奉的宗旨和彼此联系的一套暗语，招收和发展成员有一定的仪式和手续。

当时比较著名的，南方有洪帮、清帮（青、红帮）、哥老会和三合会等；北方为安清道友、大刀会、红枪会等。与帮口和行会相比，这些组织更有战斗力，活动范围也有所扩大。因此，它们在香港工人反对修理法舰而组织的同盟罢工中，在孙中山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中，在后来上海没些行业和产业的同盟罢工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些组织毕竟不是工人阶级的组织，它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落后性。特别是有些社团的首领，往往利用手中权力肆意为非作歹，干出了许多一般民众的坏事。比如说，它们进行贩运私盐、鸦片等非法的黑市买卖，开设赌场、烟馆、妓院，从事偷盗抢劫等活动。它们在“劫富济贫”、“反对为富不仁”的口号下，到处奸淫掳掠、乱杀无辜。甚至有些秘密社被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和帝国主义者收买利用，充当镇压革命、残害人民的鹰犬和帮凶。后来青、红帮走向反面，成为破坏、镇压工人运动的走狗和帮凶，就是例证。

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工人团体。随着工人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所发挥作用的增大，中国工人阶级日益引起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的注意。辛亥革命前后，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团体所组建的政治派别，提出了有关劳工问题的主张，并开展了一些活动。这些派别组织是早期工人组织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工人斗争的组织者。

孙中山在领导资产阶级革命中，非常重视工人工作。同盟会建立后，他不断派人在海外侨工和香港、广州工人中开展活动，帮助工人建立自己的团体。1898 年，他指派兴中会会员尤列在日本建立了“中和堂”的工人俱乐部。同时，又在新加坡、吉隆坡等地推动成立“中和堂”。1909 年，在他的领导下，香港和广州建立了“中国研机书塾”和“广东机器研究公会”。实际上，这两个组织是同盟会领导下，由进步的民族资本家和机器工人联合组成的团体。后来，成为全国有名的香港华人机器工会和广东机器总工会。1913 年，孙中山逃往日本后，指示革命派人士赵植芝、陈炳生等，在日本横滨华侨海员中成立了“联义社”，还在香港组织了联义分社。1921 年 3 月，中国海员工人在香港成立了第一个按产业联合的海员工会，即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还帮助广州工团总会、华侨工业联合会和茶居工会等组织的工人，组建了自己的团体。这对于启发工人觉悟帮助他们摆脱传统行帮和会党组织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的另一些人，利用“临时约法”有利条件，也乘机打出工人的旗号，纷纷宣布成立所谓工人的政党和工会组织。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中华国工党和中国社会党。这些政治派别从本阶级利益出发，为了把工人群众吸引过来，在宣传其政治主张的同时，它们还抨击资本剥削的罪恶，赞美劳动神圣，主张改善工人生活。有的甚至号召工人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所有这些，使尚处于“自在”状态下的中国工人启迪了觉悟，开阔了眼界。不过，这些政党并不是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也不能给工人运动以正确的理论指导。他们中有的甚至是以此作为猎取社会地位和政治资本的手段，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工人的问题。

三、工人自发组织的工会和团体。在五四运动前一段时期，由工人自己组织起来的团体，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和航运、铁路等产业中开始逐渐出现。虽然这些团体也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保留着旧式组织的一些痕迹，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某种影响，但是它们毕竟是在



长期的阶级斗争中出现的，同资本家作过不少斗争。

这一时期工人自发建立团体的情况，按地区来看，主要集中在广州、上海、武汉、长沙等城市。

广州地区新式工业发展较早，同时受香港影响也很大，工人运动一直十分频繁。因此，在这个地区出现工人自发建立的团体可以说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据陈达著的《中国劳工问题》一书记载，早在清朝咸丰年间，即1851至1861年，广州就已经出现了打包工人组织的打包工业联合会，这很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工人自发成立的团体。

上海也是工人队伍相对比较集中，工人运动开展得较早的地区。据《上海工人运动史》中记载：1912年，江南制造局工人组织制造工人同盟会，银楼工人组织饰业团；1914年，南北17家码头堆栈的民工创建裕后社；1917年3月，商务印书馆工人组建集成同志会等。

制造工人同盟会，成立于1912年7月，在其成立宣言中，它宣称同盟会由工人发起，代表全体工人的利益。由于制造工人同盟会经常为工人利益而斗争，1913年6月，制造工人同盟会被北洋军阀政府强迫解散。银楼业工会也称饰业团。

银楼业工会是1912年由上海金银饰业工人组织的手工业会，其首领是工人张鸿尧。1912年12月，银楼业工会领导了一次罢工。这次罢工实际上成为上海整个行业规模的罢工。罢工最终使雇主答应大大提高工人的工资，罢工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给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分子以极大的震动。

广州、香港和上海工会运动影响的逐渐扩大，迅速波及长江上游长沙和汉口一带。武汉地处长江边，水路有轮船往来于沪汉之间，而且陆路交通方便。京津、唐山一带有什么情况，可迅速传到汉口。武汉、长沙相距不远，并且交通便利。另外，这两地工业都有一定的发展，交通运输业比较发达。所以，两地工会运动非常容易受到发达地区的。

在武汉，汉口租界车夫同益会在罢工斗争中产生。1912年6月，汉口租界的广大人力车夫，因英商车行提价，引起工人强烈不满。在车夫不允、车行坚持的情况下，车夫发动罢工。罢工拖延两星期之久，双方情绪极为激昂。在罢工期内，汉口租界车夫成立汉口租界车夫伺益会，以便随时召集代表集体商议。同益会会长为王玉山，即罢工的领袖。但是随后不久，该会也被租界当局勒令解散。

1913年5、6月间，汉阳兵工厂工人自动组织工业同盟会，汉阳翻砂工

人也组织了“砂帮联合会”。罢工期间，汉阳兵工厂工业同盟会屡屡开会，商议罢工对策，并强烈反对当局残害罢工领袖梁瀚生。工人们异常激动，准备与当局作坚决斗争。

这一期间，工人自发创建的工会组织和团体，无论从人数、规模上，还是质量上较以前要高些，如 1916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华字部工人，成立“集成同志社”。他们宣称结社的目的是“目击资方的压迫，工友生活之痛苦，遂毅然联络同志数十人，以谋解放之策。”①此外，1914 年，上海海员 6 000 余人，成立了“焱盈社”；1918 年，上海宁波籍水手又成立了约 4 000 人的“均安公所”；同年，长沙印刷工人联合组织了“湖南印刷公会”。从他们各自成立的宗旨来看，有的已经包含了由自发向自觉转变的成分。从其组织看，虽仍带有行会、帮口的某些特点，但总体来说，已接近职工会的性质。

早期工人组织和团体的出现，在领导工人发动罢工，争取改善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保护或扩大工人应得的利益，开展工人之间的互助团结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工人阶级还是一个对旧社会的本质、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都没有明确认识的“自在的阶级”。他们的斗争还是分散的、自发的。他们的组织主要还受封建性的帮口、行会、“青帮”、“洪帮”等秘密结社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随着这些斗争的逐步发展，他们逐渐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大大增强了阶级意识，逐步显示了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和影响。

注释：

①《商务印书馆工会史》，1924 年版，第 1～2 页。



产业工人参加“辛亥革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革命进入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的新时期。在当时的条件下，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起步，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已渐渐形成一个阶级并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曾苦苦追寻救国之路。

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迅猛传播，震撼着中国思想界，并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到来。为了宣传革命主张，建立革命组织，资产阶级积极奔走号呼。同时，他们不断壮大革命力量，发动武装起义，并在 1911 年武昌起义的推动下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革命高潮，即辛亥革命。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又一次高潮。

而此时，中国民族工业资本经济的发展，促使着产业工人队伍的壮大。他们紧紧追随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要求参与民族独立、政治民主的活动。他们在资产阶级立宪派的领导下，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事业，参加“抵制美货”、“收回权利”运动，投入到了推翻清政府的武装暴动。

在民主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产业工人参加了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为民族复兴、救亡图存，积极组建革命组织，准备用武力推翻清王朝。中国的产业工人积极响应号召，支持和参加各种革命团体。据调查，兴中会会员人数约 300 人，其中可考者 286 人。在这 286 人中有工人（包括海外华工和国内工人）54 人，占 19%。

1905 年 8 月，孙中山提议，将原有的兴中会与黄兴领导的华兴会以及章炳麟领导的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合并在一起，建立中国同盟会。这就形成了领导全国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参加同盟会的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商人和知识分子外，也有一些会员是工人，约占会员总数的 7%。同时，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也得到了海外华侨的支持。在这些海外华侨团体中，以及在革命党人在国内一些地区所联络和依靠的一些会党中，许多搬运工人、

苦力、手工业工人和一些工矿交通部门的近代产业工人是其中的会员或团员。他们积极帮助孙中山筹集革命活动资金，购买、运输和隐藏武器，并以实际行动，直接参加武装起义。

据调查，从兴中会、同盟会的成立，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在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人曾经发动过 10 多次武装起义，而每次都有很多工人参加。他们前仆后继，不怕牺牲，有时还充当了起义的先锋和主力，给了革命党人很大的的支持。

1895 年 10 月，兴中会成立不久，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中大约有 600 名香港苦力，约定前往广州，充任革命军士兵。起义士兵中绝大多数也是工人。另外，约 3 000 名广州及近 2 000 名澳门织工也参与进来。这次起义因消息泄露，革命失败。40 多海员被当场被捕，陆皓东等人牺牲，孙中山流亡海外。这次起义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它首次反对帝制的革命精神对广州、香港工人却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

1903 年，在孙中山革命活动的积极影响下，云南蒙自矿业资本家周云祥，十分痛恨清政府出卖云南、广西路矿权的无耻行为，并发动了一场以矿工为主的武装起义。这年 4 月，周云祥组织建立了“保滇会”，5 月，云南个旧工人群众两三千人在他的带领下发动起义，反对法国抢筑滇越铁路、侵占锡厂，遭到清军镇压。起义军击溃清军，直捣个旧，各族群众纷纷参加，使队伍扩展到 1 万多人，接连攻克临安（今建水）、石屏、宁州（今华宁）等地。7 月起义失败后，余部进入广西，与当地农民革命军合并坚持斗争。

1906 年 12 月 4 日，同盟会策动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和矿工武装起义。史称“萍浏醴起义”，因 1906 年是农历丙午年，故又称“丙午萍浏之役”。值的一提的是，这次起义有大量工人参加，其中仅安源矿工就有 6 000 余人参加起义，队伍最后发展至 3 万多人。起义军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华南革命先锋队”，推会党首领龚春台为都督，按同盟会纲领发布檄文，强调除反清外，“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受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成不平社会”，此举震动长江中、下游。清政府十分惧怕，即派湘、鄂、赣、苏四省清军数万人前往镇压，起义军终因分散作战，互不统一，被各个击破。起义军与清军交战 20 余次，顽强坚持 1 个多月。1907 年 2 月初，起义被渐渐镇压下去。同盟会员刘道一、魏宗铨、肃克昌牺牲，群众被害者达 1 万人。



浩大的萍醴浏起义是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可谓是辛亥革命的一次重大演习。安源矿工虽然在这次起义中没能够充分表现出自己的力量，但是他们和萍醴浏各县的其他工人仍然给清军以非常大的打击，在起义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受到了一次有纲领、有组织的革命武装起义的实际锻炼。

继萍醴浏武装起义之后，1907 年和 1908 年，同盟会还在广西、广东和云南发动过 6 次武装起义。如潮州黄岗之役、惠州之役、钦（州）廉（州）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以及云南河口之役等。在参加这些起义的“志士”行列中，很多都是各地的一些产业工人。

1911 年 3 月 29 日爆发的广州起义，是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前最后奋起的一击，也是最壮烈的一幕。起义前，香港、广州等地机器工人和码头工人、海员负责弹药运输、储藏、分配等事务，他们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对起义的发动起了重要作用。

广大工人对这次起义，十分重视并要求参加起义队伍，但因名额有限，愿意参加的人数又过多，所以只得用拈阄的方法来决定队员。结果只有 6 名工人获准参加，那些因拈阄未中而不能参加的工人竟失声痛哭。

尽管革命党人和工人起义军，作战勇敢，不怕牺牲，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最终失败。大部分革命志士壮烈牺牲。事后，有人将他们的遗体葬于黄花岗。因尸体共 72 具，世称“七十二烈士墓”。后来，发现在这次起义中牺牲的还有 14 位，因此，烈士总共是 86 人。其中，工人占 17 人，在各个阶层中比例最大。

早期产业工人不仅参加反封建统治的斗争，还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他们为争夺开采煤铁和修筑路权，与帝国主义国家展开了斗争。

自 1904 年开始，南方各省广泛开展了收回路矿权利的运动。这一运动得到了资产阶级的领导和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配合与支持。它与革命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成为辛亥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

运动是由湖南、湖北、广东 3 省绅商发起收回粤汉铁路筑路权的斗争而引起的。早在 1898 年和 1900 年，由美国银行团所组织的华美合兴公司与清政府铁路总公司先后签订了《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以及《续约》。其中规定“美国人无权将此合同转与他国之人”。但是，美国人却违背规定，不仅再三延长工期，还私自 2/3 的股票转售给他国。与此同时，美国工程师在施工过程中居然任意开枪打死中国人，而且经常强占土地，殴伤工人。

美帝国主义的种种暴行，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慨。1904 年冬，湘粤两省绅商，首先组织起来要求废约自办。他们的反美斗争，立即得到了到湖北和其他各省民众的热情支持和声援。这样，声势浩大的废约运动掀起了。

在工人激烈与勇敢的斗争压力下，在废约运动的强大呼声中，清政府经过交涉终于于 1905 年 8 月签订了《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全兴公司售让合同》，以 675 万元收回路权，废除原订借款条约。此外，江苏、浙江人民也为反对政府与英国订立的苏杭甬铁路借款而斗争。

1911 年，湘鄂粤川等 4 省的人民发起保路运动，把收回路矿利权的运动推到了高潮。清朝皇族内阁于 5 月 9 日颁发“上谕”，实行所谓“铁路国有”政策，准备以“国有”为名，出卖全国铁路主权。他们强行接收湖南、湖北、广东、四川 4 省的商办铁路公司，把湖北、湖南、广东 3 省人民在 1905 年收回路权运动中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赎回的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又重新出卖给帝国主义。因此，清政府的这种卖国政策，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愤慨。与粤汉、川汉两干线相关的湖南、湖北、广东、四川 4 省大举展开了保路斗争。

5 月 13 日，湖南绅、商、学界各团体发出传单，抨击清政府的卖国行径。14 日，长沙举行了各阶层人士参加的万人大会，决议拒外债、保路权。16 日，长沙、株洲 1 万多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倡议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人民抗租税。18 日，湖南各界人士聚集在巡抚衙门前，抗议卖国的“铁路国有”政策。另外在湖北、广东等地，各省工人群众也在为争夺利权而斗争。

很短的时间内，湖南、湖北、广东的保路风潮连成一片，声势浩大。全国各地以及海外侨胞、留学生，也纷纷集会，并通电、写信予以声援。

在这场保路运动中，四川的保路斗争最为激烈。需要指出的是，在四川保路运动中，工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工人们对清政府出卖主权的行为，十分愤慨，纷纷表示要坚决斗争到底，夺回铁路、公路主权。在保路同志会组织的罢工、罢市、集会、请愿等各种抗议活动中，都有大量工人参加。成都电报局职工同当地的学校、商店，积极参加保路同志会组织的罢市，从而造成成都电信几天中断。清政府十分惊惶。清政府在“上谕”中自己承认，成都电报几天不通，朝廷十分焦虑。

9 月 7 日，发生了“成都血案”。在这场血案中，牺牲的烈士中也多是刻字、机织、缝纫等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城市贫民。血案发生以后，各地工人还积极地参加了同志军的起义。灌县、郫县同盟会员、哥老会首领组织的西



路同志军共分5路，其中，第三路军的部队由近700名矿工组成，第五路军也基本是由伐木工组成。

保路运动的日益高涨，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有利条件。1911年10月10日，正当四川的保路风潮时，受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武昌新军士兵发动起义，一举占领了湖广总督衙门，辛亥革命发生了。

在整个辛亥革命期间，广大工人群众积极响应革命党人的起义，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武汉地区的工人，浴血杀敌、英勇无畏。起义开始后，武汉地区的工人积极参加了革命军的战斗，并迅速占领汉口、汉阳，投入到保卫武汉的斗争中。迫于形势，起义领导机关决定要扩大革命队伍，急需革命战士。此时，武汉工人闻讯后，积极踊跃报名参军参战。甚至很多老工人也愿意为革命献身。他们被编人各队，投入这场激烈的战斗。此外，积极参军的还有大冶矿工1 000多人。

在保卫汉阳的斗争中，汉阳兵工厂的工人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为了给革命军赶造军火，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们迅速复工，加班加点，从而保障了前线的弹药需求。平日里，每个工人每日造枪60支，而为了支援前线每天努力生产枪达到80支。在汉阳光复的头几天，制造厂工人加工赶造，竟然造成野战炮140尊。

10月18日，革命军与清军在刘家庙展开激战，许多工人协同革命军作战。100多名铁路工人不避炮火，拆毁铁路，切断清军的支援后路。这些铁路工人顷刻之间拆毁铁路10余丈。沿途农民及伏在稻田的铁路工人也奋勇杀敌。他们中有的拿锄头，有的拿铁锤，有的拿刀矛，一声呼喊，如暴风骤雨、雷轰电闪一般，蜂拥而往，与清军拼杀。

在保卫武汉的战役中，工人们表现出了英勇的革命献身精神。当时，清军从北面妄图反扑，部署在武汉西北方的清军装作攻打汉阳，却实打荆州。宜昌筑路工人决定成立决死团，居然有1 000多人自愿参加。决死团成立后，作战无比英勇，在攻占荆州的战役中立下了很大的战功，最终粉碎清军从西路进袭武汉进而摧毁革命政权的阴谋。

辛亥革命时，上海工人积极参加武装起义，并积极参军助饷，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坚强决心和支持民主共和的政治觉悟。上海光复时，江南制造所（即江南制造局）是清军在上海的最后一个堡垒。革命军攻打江南制造局时，制造局木工师傅莫宽、叶辛等人也参加了攻打清军的革命斗争。革命军进入上海后，把造船所四面包围，守卫的清军将大门紧闭，在内死守，革命军的进攻一时受挫，莫宽等人协助革命军将大门撞开，又带领革命军控制厂

内天、地、玄、黄等八个火药库，得到很多枪支弹药，武装了工人。这样，制造局工人便和外面的革命军内外夹攻，逼使守门的清军缴枪投降，不久全厂遍插白旗，制造局攻下了。

与此同时，上海的工人积极参军助饷。据《时报》报道："本埠民国军克复以来，各帮人民投效者实属不少，昨有广潮帮工人一百余人齐赴军政府报名，愿充敢死团。"《申报》则报道了工人踊跃助饷的消息："制造局办事员司以及各厂头目，下至工匠，夫役人等，因民国临时政府将次成立，一切兴办事宜需款浩繁，特于前日共同集议，拟尽义务一星期，将所得体薪，悉数充作军饷。"该局钳床、车床、铜匠木匠、翻砂匠、铁匠等行工人数百人踊跃捐款。"海生"轮船帐房唐梅村等人还发起自由助饷会。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入广东后，广九铁路工人和香港、惠州、九龙等地农民、工人一道组成了一支敢死军。这支敢死军有数千人，像匕首一样直插广州城郊，随时准备配合革命军消灭盘踞在广州城内的清军。

当消息传到汕头时，"绍兴轮"上的水手们当即剪掉辫子，与码头工人一起，拿着手榴弹，喊着打倒清朝皇帝的口号，举行示威游行，热烈欢呼革命。工人队伍所到之处，插起白旗。

11 月 15 日，厦门同盟会也发动了武装起义。在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中，铁路工人可以称做是一支骨干力量。他们为推翻清朝帝制而冲锋陷阵，不惜牺牲，为起义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上述地区外，其他的武装起义中，也都有工人参加。如陕西革命党人于 10 月 22 日发动的武装起义，煤窑工人的斗争；山西宣布起义时，山西铁路工人也功不可没；南昌、九江等地宣布起义时，广大人民特别是工人群众更是纷纷响应。

工人参加革命的事很多，甚至连清政府京城附近的张家口，也有许多铁路工人强烈要求革命党人发给他们武器，直接参加斗争。工人们鼎力协助革命党人把从天津购买的武器秘密运到张家口，准备起义。

从当时的情况看，在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中，各地都有很多工人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一起参加斗争，并做出了很大牺牲。然而，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这次革命没有能够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窃取，中华民国也是名存实亡。

但不管如何辛亥革命的胜利，与工人阶级的参与直接相关，工人没有广大工人的奋勇杀敌，无谓奉献，革命是很难取得成功的。在辛亥革命中，工人阶级显示了高度的爱国精神和革命精神，成为革命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产业工人参加“五四”运动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是中华民族与帝国列强矛盾的总爆发。五四运动发生的直接导火线则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去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合理要求，而且在对德合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

面对如此不平等条约，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最终，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呼声，在4月30日签订了《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在全国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等十三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挠到天安门前集会演讲，后举行游行示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等口号，同时要求惩办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进发，遭到使馆巡捕的阻拦，转而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学生冲入曹宅，曹汝霖急忙躲藏起来，正在该处的章宗祥受到学生痛打，曹宅也被焚烧，军警当场逮捕了三十多名学生。北京学生实行罢课，通电全国表示抗议。紧接着，全国

各大中城市的学生纷纷起来响应。

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迅速扩大。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城市和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也展开了爱国活动。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

从5月4日北京学生集会天安门、游行使馆区和火烧赵家楼的爱国行功开始，到6月3日以前的全国各地响应支持利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总罢课，历时一个月，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运动的中心在北京，运功的主力是青年学生。虽然各地已有不少工人和其他城市人民响应支持学生的爱国斗争，但是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学生的集会、游行和宣传演讲、抵制口货等活动，没有工人和工商业者的罢工罢市。因此，运动的发生发展虽然引起了中外反动派的极大震惊，但是并未对他们统治的构成严重威胁，以致他们不仅拒不答应学生的爱国要求，反而从5月下旬开始，日益加紧了对北京学生斗争的镇压破坏。

6月1日，北京军阀政府下了一道命令，公然为卖国贼辩解，企图掩饰北京政府媚日卖国的丑恶行径，达到抑制爱国运动的目的。紧接着，又发下发了第二道命令，污蔑学生的爱国运动是“纵火伤人”、“举动越轨”，已“构成非法行为”，要求学生立即停止罢课，对不听命令的学生，一律逮捕法办。同时，北京警备司令段芝贵，派出军队逮捕了部分学生，结果引起了学生的更加忿恨。

6月3日上午，北京大学等20余所学校数百名学生，走上街头，慷慨激昂地进行了爱国讲演宣传。反动当局闻讯，调集大批军警，四处驱散听众，逮捕讲演学生。当日就有178名学生被捕，警察厅无处关押，竟将北大法科校舍改为临时拘留所，将被捕学生关入其中。尽管如此，第二天，有更多的学生投入到了爱国宣传活动中。他们分散到达街头，然后集中起来，展开旗帜进行爱国演讲。反动当局不能容忍学生的爱国活动，又加派军警进行镇压，逮捕了700多人，将其关押在由北大理科校舍改的临时监狱。接连两天的大逮捕，并没有吓倒北京学生，反而激发了更高的爱国热情。6月5日，学生的演讲队伍迅速扩大到5 000余人，他们抱定了被捕的决心，出门时每人随身携带行李，带齐了牙粉、牙刷、面包等生活用品。当日，他们分三个大队，沿着东四、东单至崇文门一带，游行演讲，声势浩大。受学生运动的影响，许多市民和街上行人也加入了学生队伍。

由于3日和4日的大逮捕，引起了全国广大阶层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抗



议，特别是北京政府已得知当天上海实现了“三罢”斗争。为了缓和人民的愤怒情绪，当局对5日的学生游行，并未采取逮捕的措施，反而决定改变镇压学生的方针，主动撤走驻扎学校的军队，释放被捕学生。

然而，各地人民的示威游行，不仅是为了抗议政府逮捕爱国学生，而是要求北京政府改变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方针，承认学生“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爱国要求。所以，当局释放学生，并没能阻止上海和各地爱国运动朝着“三罢”的深入发展。

这样，6月3日，这个北京政府逮捕学生，企图镇压人民爱国运动的日子，就成了“五四”运动的新阶段、新起点。因为这个新阶段是从6月3日开始的，历史称之为“六三运动”。“六三”以后，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工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三罢”——罢课、罢工、罢市的先锋主力。

上海的“三罢”，是从学生的罢课开始的。早在5月26日，上海60多所的学生共计2万余人，就开始实行总罢课，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呼吁政府惩办卖国贼。

按照上海的计划，在实行总罢课时，应联络商界，得到商界的支持，组织“商学两届联合会”。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像学生想象的那么简单。当他们同总商会交涉，劝商界罢市来呼应学生的爱国运动时，却被商会负责人以各种借口敷衍、拖延。6月4日，当上海人民得知，昨日北京学生遭当局逮捕迫害的消息后，各界舆论哗然，群情激奋。上海学生闻讯后，纷纷走上街头，呼吁社会各阶层主持公道，支持学生的爱国活动。广大学生满怀爱国激情，分队向城内外和租界等处大小商号内，跪求商界一律罢市。对他们的爱国行为，上海政府不但不予支持，反而派兵镇压。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亲自调来四五十人的保安队，手持刀枪，忍地迫害手无寸铁的学生。这一无耻行为，激怒了上海各界人民。在这种形势下，首先是大小东门内外大街一带的商号，决定罢市，以此声援学生。接着，商界的爱国人士，再也坐不住了。从6月5日清晨起　到当天中午，上海各马路的大小商店纷纷罢市停业，法、美租界内的店铺也相继休业，公共租界内各马路商铺也大多罢市。

受学生运动和商界罢市的影响，工人阶级也行动起来，开始举行罢工。最先点燃罢工烈火的，是上海日商纱厂的中国工人。这个工厂的工人，平日没少受日本商人剥削和压迫。而这次学生爱国运动的发生，又与日本的对华侵略行径有关，这更加激发了工人心中的怒火。于是，他们联合起来，举起

了大罢工的旗帜。6 月 5 日，纱厂 5 000 多名工人，宣布罢工。与此同时，杨树浦日商上海纱厂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此外，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码头工人，也相继举行了罢工。当天罢工的人数达 2 万余人。①

6 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仍在继续，工人罢工有了进一步发展。在英、法、美等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本家开设的企业里，工人们出于爱国情感，纷纷举起罢工大旗。当日，法商电车公司、英商电车公司（部分工人）、华商电车公司、锐利机器厂、求新机器厂、英商祥生铁厂、锦华和小烟囱两丝厂、海关造册处印刷工人及全体职员等，相继宣布罢工。

7 日，工人罢工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这天罢工的工厂有：吴淞张华浜、沪杭甬铁路总机厂、英商别发印书房、日晖桥中日合营的兴发荣机器制造厂、北浙江路信通织布厂以及闸北手艺作坊。

9 日，罢工如大海浪潮般迅猛展开，席卷上海。这一天，全市的钢铁机器业工人、江南造船厂、英商耶松老船坞、瑞容机器造船厂船厂工人、美孚和亚细亚火油栈房、浦东荣昌火柴第一、二厂、华昌盒片厂，叉袋角日商各厂、英美电话公司、中国电话公司工人和水木业工人、马车夫、清道夫、上海海员、电灯公司和自来水公司以及小菜场等行业的工人，几乎全部参加了罢工。

10 日，上海的工人的罢工行动继续发展。美商奇异电灯厂和茂生洋行、日商铃木洋行、英商和平铁厂、伊文思图书公司、荣昌火柴厂、华昌盒片厂、大有榨油厂、各马车行等等，都加入了罢工的队伍。沪宁、沪杭两条铁路工人，不听劝阻，执意罢工到底。上海的码头搬运工人、轮船水手的罢工进一步扩大，继 9 日浦江轮船水手罢工后，宁波、广东水手一律罢工，所有轮船停止出航。一时间，海陆交通完全中断，“码头已无华人踪迹”，机器停止运转，通讯全无，整个上海陷入瘫痪状态。据统计，从 6 月 5 日 ~ 11 日，全市参加罢工的单位约 50 多个，罢工人数约 6 万人，加上店员、职员，罢工人数超过了 10 万余人。

在上海罢工浪潮的推动下，全国各地的工人纷纷行动起来，投入这场伟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中。上海工人“六三”大罢工后，武汉工人紧接着开始酝酿举行同盟大罢工；天津各界爱国群众两万人，在河北公园召开公民大会，要求商会罢市；宁波搬运工人和船工为拒绝运送日货而举行罢工；江西各地工人也纷纷举行了爱国罢工，或参加了其他形式的爱国斗争；厦门码头工人为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拒绝为日本轮船卸货；在山东济南，工人



群众数千人召开演说大会，痛斥日本在山东的罪行，决定举行大罢工。除了许多地方工人举行罢工，推动了“三罢”斗争的发展外，更多的工人积极参加了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例如，6月3日，湖南省城学生全体罢课，组织了“救国十人团”、讲演队，开展爱国宣传。接着，省城工人也组织了“爱国十人团”和“锄奸团”，开展抵制日货等活动。

这就是从上海开始，迅速波及其他各地的“六三”政治大罢工。以上海“六三”大罢工为中心的全国各地工人的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巨大的革命能量，给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一个有力的打击，促成了五四爱国运动的胜利。

第一，“六三”罢工有力地支援了青年学生的爱国斗争。在“五四”运动开始阶段，上海青年学生最先行动起来，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行动，实现总罢课，还积极动员商界罢市。然而，商界却犹豫不决，致使动员工作度受挫折。但是，当“六三”大逮捕的消息传到上海时，上海工人阶级立即采取果敢行动、举行总同盟罢工，支援青年学生的爱国斗争。上海工人阶级高喊“罢工救国”的口号，坚决要求“惩办卖同贼”、“释放被捕学生”，甘做商学两界的后盾。这样，就坚定了青年学生的斗争信心，他们开始认识到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是运动中的两大主力，“这学生的力量，和工人的力量总和起来……便是解决山东问题的真正力量”。

第二，“六三”罢工显示了工人防级的威力，对实现“三罢”，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起了重要作用。初始，相当一部分资本家并不赞成罢市。上海“三罢”的第三天，上海纱业资本家穆藕初在官绅商学各界代表会上发表演说，说他“以工界罢工，最为危险。遂邀请各纱厂开紧急会议，竭力遏止”。[②]丝茧总公所在决定罢市后，借口“工人一日不工作，即一日不得食”[③]，硬要工人照常开工。6月8日、上海钢铁机器业万余工人开会，当“群情愤激，主张罢工，众心坚决，不可遏止”的时候，该业资本家出来“设法开导”，要工人“静帜三日”。企图阻止罢工。但是，工人们冒着被开除的危险，冲破了厂主的劝说和阻挠，于次日实现了大罢工。

第三，“六三”罢工沉重打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坚强革命意志和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三罢”斗争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但也遭到了他们的反扑。他们挥舞屠刀，镇压罢工，迫使工人就范。他们下令：“凡在界内通行，成群结队，一棍不准。”[④]不仅如此，他们还出动反动军队进行镇压。他们手持武器，强行驱散游行队伍，许多人被打

得头破血流。面对反动势力威胁，中国的工人阶级英勇无畏，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如沪宁、沪抗两条铁路罢工，立即中断交通，对全国影响极大。上海海员罢工使所有开往沿海及内河口岸的轮船全部停航，接着上海 10 万余工人几乎全部投入罢工浪潮，使整个上海陷于瘫痪状态。在随后全国各地的反帝高潮中，工人罢工直接威胁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恐慌不安，竭力向北京政府施压，要求军阀政府派兵镇压各地罢工。然而，全国罢工已成燎原之势，风起云涌，强烈冲击着军阀政府和外国势力。在罢工浪潮的迅猛冲击下，北洋军阀政府惊慌失措，只得释放被捕学生，罢免卖国贼职务，并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工人阶级的斗争，有力地推动着“五四”的顺利发展。

上海和其他地区的工人大罢工，给帝国主义与军阀政府一个强有力的打击，对五四运动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上海学生联合会在《告同胞书》中说：“学生联合会对于此次救国运动，虽奋起在先，而决不敢居功，何也?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仅不理，且对待学生日益严厉”，“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这充分表明了革命的青年学生，已经敏锐地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中所蕴藏的伟大力量，并且充分肯定了工人阶级在“六三”以后的大罢工中，在罢免卖国贼的激烈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注释：

①参见《新闻报》，1919 年 6 月 7 日。

②《新闻报》，1919 年 6 月 8 日。

③《申报》，1919 年 6 月 7 日。

④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室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 年第一版，第 417 页。

张勋复辟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决定实行帝制，开始自称皇帝，但不到半年，就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和讨伐声中死去。袁世凯死后，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纷争的局面。

北洋军阀和西南军阀，是当时两大军阀割据势力。在北洋军阀系统中，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以日本为后台，控制着北京中央政权和安徽、陕西、山东、浙江、福建等省，势力最大；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以英美为靠山，占据长江流域的江苏、江西、湖北等省，势力仅次于皖系；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得到日本的支持，控制着东北地区，在直、皖两系之间举足轻重，在西南军阀中，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势力最大。前者占据云南、贵州两省和四川的一部分，后者则占据了两广的地盘。但二者均接近直系军阀，同属亲英美的势力。此外，还有山西的阎锡山、徐州的张勋等许多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各派军阀不仅独霸一方，而且都力图扩展自己的实力和地盘，进而统治整个中国。就这样，中国社会长期陷入了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割据混战的局面。

北洋政府内部权力之争的加剧，是军阀割据纷争的集中反映。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以副总统资格继任大总统，恢复了《临时约法》和国会，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段祺瑞出任国务院总理兼陆军总长，但是政府的实权却操纵在段祺瑞的手中。

黎元洪就任大总统，当时南北双方均无异义，但在出任的法律解释上，却发生了分歧。南方认为黎元洪的出任，根据旧约法（《临时约法》）制定的总统选举法，应是“继任”，北方则认为是根据袁世凯新制定的修正总统选举法，应是“代行”。这样，在南北方之间展开了新旧约法的斗争，南方主张恢复旧国会议员资格，段祺瑞在冯国璋的促使下，接受南方的条件。7月29日，黎元洪宣布按《临时约法》，召集国会，并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8月1日，黎元洪在国会行大总统宣誓礼。10月30日，国会又选冯国璋为

副总统。

南北矛盾就这样暂时缓和，但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矛盾又尖锐起来。他们之间的矛盾反映了他们的后台美日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夺利益的矛盾。正如列宁在 1916 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所说；“瓜分中国才刚刚开始，美日等国争夺中国的斗争愈来愈激烈。”[①]在 1917 年爆发了府院之争，并由此引起了一出张勋复辟的闹剧。

黎元洪与段祺瑞争执，段不愿意去总统府，把事情都交给了徐树铮（国务院秘书长），徐依仗段的权势，出入总统府，常常与黎元洪发生争吵。徐树铮的专横跋扈，为孙洪伊（内务总长）所不满，黎与孙结合对抗段和徐。就这样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开始了。

在国会中，议员多为原国民党人和进步党人。原进步党议员分别组成以汤化龙、刘崇佑为首的“宪法讨论会”和以梁启超、林长民为首的“宪法研究会”；两会合并为“宪法研究会”，（被称为研究系）。原国民党议员为对抗“宪法研究会”，组成“宪法商榷会”（被称为商榷系），两派在国会中斗争非常激烈。

在 1916 年 10 月讨论“省制加入宪法”问题时，商榷系议员主张学习欧美各国，将地方制度订入宪法，给予各省地方以一定自治地位，省长民选。其目的在于限制中央集权，防范段祺瑞专制，以保护和他们有利害关系的西南各省势力。研究系则按照段祺瑞的意旨，对这一提案积极反对，主张加强中央集权。黎元洪拉拢商榷系以压段，段祺瑞则勾结研究系以限黎，府院之争愈演愈烈，到 1917 年初因参战问题，这一矛盾就显得十分尖锐。

为了对黎元洪实压，段祺瑞在北京召开了督军团会议。当五月间国会讨论参战案时，段祺瑞命陆军部人员指挥“公民请愿团”、“五族请愿团”等团体包围国会，殴打侮辱议员。在目的尚未达到时，段祺瑞指使督军团联名呈请总统解散国会。黎元洪拒绝了这一要求，督军团则离京赴徐州集会。到达徐州后，极力煽动张勋反抗黎元洪。这时，段祺瑞以出卖中国主权换取日本借款的卖国行径被完全揭露，全国人民反段情绪高涨。黎借此时机，于五月下旬免去了段的国务院总理职务。段祺瑞便唆使皖系、奉系各省督军纷纷通电，宣告独立，于 6 月 2 日在天津设立了军务总参谋处。

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这一时机，企图使在徐州的张勋和段祺瑞合作，以推翻黎元洪。黎元洪在军事压力下无计可施，也想着借张勋的武力于段祺瑞对抗，以便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而段祺瑞则想利用张勋的实力来实现借刀杀

人的阴谋。6 月 7 日，张勋率“辫子军”自徐州北上，到天津和段祺瑞商议。在段的指使下，张勋电告黎元洪提出调停条件为先解散国会。12 日，黎元洪只好下令解散国会。14 日，张勋到达京城，7 月 1 日，复辟丑剧正式上演了。

自清政府被推翻后，张勋的复辟活动就未曾停止过。他曾被清廷任命为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辛亥革命后，委身袁世凯，成为“民国”的“上将军”。他统率的军队一直拖着辫子，以示不忘清朝。被称为“辫子军”。在短短几年内，他将“辫子军”扩充到 2 万多人。张勋以徐州、兖州为巢穴，这里成为阴谋复辟的罪恶窝渊。

清末任陕甘总督的升允，在辛亥革命中曾负隅顽抗，后逃窜哈尔滨，勾结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招收马贼和旗军残部，组织“勤王军”和“满蒙举事团”等复辟武装。升允盘踞的哈尔滨，成为清朝复辟的另一策源地。

王公贵族复辟势力以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为代表。当年清廷举行“让国御前会议”时，溥伟等人坚决反对逊位，也拒绝“优待清室条件”，同时反对把最高权力让与袁世凯。清朝垮台后，他们逃亡青岛、大连，投靠俄国、德国、日本帝国主义，从事复辟活动。他们奔走在故宫小朝廷与徐、满、蒙复辟势力之间，成为清朝复辟的一支活跃力量。

以康有为、劳乃宣、胡思敬为代表的封建遗老，是清朝复辟势力中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一支。他们散居在上海、天津、徐州、北京、南昌、苏州等南北各大城市。这些人顽固不化，与民主共和格格不入。他们有的成立“孔教会”、“读经会”等各色团体，有的著书立说，上书建白，无非就是攻击民主共和，为帝制复辟制造舆论，但在社会上还产生了颇大的影响。

日本是复辟势力的一个主要支持者。日本侵华的一种主要策略就是极力制造中国“内乱”，以便从中取利。为此，他们与清朝复辟势力的各派力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北方，它帮助善耆编练“勤王军”，策动“满蒙独立运动”的武装叛乱，幻想“进占东北三省”，然后在全国实行复辟。在南方，则特派其驻津司令赴徐州见张勋，“力劝速办复辟，且谓该国陆军，亟愿设法援助”。[②]随后，寺内首相也接见张勋“特使”升允，为他撑腰打气。日本支持复辟的真实目的，是企图使满蒙独立，并将其置于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进而逐步控制整个中国。

德国是支持复辟势力的另一个国家。1912 年溥仪逃到青岛后，就曾乞求德皇帮助恢复清王朝。10 月，德皇之弟亨利亲王至青岛，向溥仪当面表

示，“他的皇兄陛下和他本人将竭力支持清朝的复辟”。[③]后来，德国不断向张勋提供军火和财政援助，助长了张的反动气焰。

沙皇俄国也是复辟势力的后台。沙俄曾与升允签订密约，助清王朝复辟。并帮助制定了武装叛乱的计划，计划由“俄蒙之兵”与“满蒙联兵”、“旗兵”等分路进攻北京，以夺取政权。

清朝复辟势力在民初策划过一系列复辟活动，但因袁世凯实力相对强大而多次阴谋终归流产。而袁世凯失败后，张勋之流荒唐地认为这是袁“辜负皇恩”、出卖清王朝的结果。因此，这些人的复辟之火由于袁世凯的死而更加狂热起来。

张勋到北京后，各地复辟分子纷纷涌来。6 月 28 日，从上海到北京的一列客车上，有一个身穿布衣的六十岁左右的老头，新剃去的胡须，并用大蒲扇遮住自己的脸膛，显然是在有意避人耳目。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鼎鼎大名的康有为。当时，张勋被称为“武圣人”，康有为则被称为“文圣人”。这两位所谓的圣人早有预谋。这时，康有为正带着十几道预先替溥仪草拟好的“诏书”，化装北上。这位“文圣”一到北京立即与“武圣”会合，复辟即将实现。

7 月 1 日凌晨 3 时，张勋穿着清代的朝服，头戴红领花翎，率领复辟群臣 300 多人，进入故宫拥 12 岁的溥仪“登基”。溥仪按照事前安排，立即发布由康有为起草的诏书，宣布自即日起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还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定国名为“大清帝国”。在溥仪的复辟诏书和随后发布的诏书里，张勋被授予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政府的最高权力，徐世昌被授予弼德院正院长，康有为被授予弼德院副院长兼太傅（皇帝的老师），升允被授予大学士。其他清胡的封建余孽，则分别被任为尚书、侍郎、都御史等官职。各省督军改为巡抚。

北京城里，警察挨门挨户让居民挂龙旗庆祝，老百姓用纸糊的旗子应付。一些封了官的人和遗老少们，戴上马尾假发，穿上很久不见的清朝袍褂，弹冠相庆，一片乌烟瘴气。

张勋复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北京市民纷纷拒挂龙旗，许多报纸自动停刊，以示抗议。湖南、广东、上海等地人民举行集会，愤怒声讨张勋的复辟罪行，有的当场断指血书：“护法讨贼”：有的自动发起“国民哭灵大会”。在张勋老家江西，声讨更加激烈。江西张氏同宗通斥张勋为破坏共和国的“不肖子孙”，通告全国决不认国贼为“赣省张氏子孙”。[④]在群众怒火

中，张的家属也被迫四处逃窜。

狡猾的帝国主义在看到张勋复辟不能得逞时，于是像对待搞帝制活动的袁世凯一样，马上将张勋这只不中用的走狗甩掉，继续寻找更为得力的在华工具。例如，张勋在徐州召集会议时，日本参谋次官田中义一曾去过徐州，与张勋会晤，张勋也扬言日本已赞成复辟的主张，但后来当徐世昌派曹汝霖去日使馆询问时，其公使林劝助却又代表田中义一说“日本政府决不赞成张勋的复辟”⑤了。这种出尔反尔的态度使张很恼火，他后来对人十分肯定地说；“田中义一明明赞成复辟”。

段祺瑞借助张勋解散国会，赶跑黎元洪，他的目的已经达到。看到全国人民一致声讨复辟，便与冯国璋联合声讨张勋，反对复辟。乘机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梁启超被聘为“讨逆军总司令”的参赞，宣布讨伐张勋。7 月 2 日，即复辟第 2 天，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向北京进发。此时张勋不仅在政治上完全陷于孤立，而且仅带 3 000 辫子军在京，在军事上也无招架之力。12 日，“讨逆军”攻入北京，辫子军溃散，立即投降，张勋在德国人的保护下逃入荷兰使馆，康有为躲入美国使馆，后化装逃出北京，其他复辟分子也如鸟兽散，溥仪再次宣布退位。这次复辟前后只维持了 12 天，就宣告破产了。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815 页。

②孙毓筠：《复辟阴谋纪实》，载《中华新报》，1917 年 7 月 17 日。

③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 3 卷，255 页。

④《全赣张氏同宗通告》，载《国民日报》（长沙），1917 年 7 月 29 日。

⑤《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 125 页。

护法运动

孙中山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据此召集的第一届国会（俗称旧国会），一向被公认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孙中山在被迫让出政权后，一直为维护约法和国会而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对张勋废弃约法，解散国会，拥清复辟极为愤慨。7 月 1 日，张勋拥清室复辟；3 日，孙中山便在上海召集在沪陆海军及国民党要人讨论拥护共和、出师讨逆大计，决定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4 日，孙中山致电参众两院议员，号召议员南下护法。当时控制广东的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为借助护法声浪，确保两广地盘，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并向湖南扩张势力，表示欢迎孙中山来粤护法。7 月 6 日，孙中山偕章太炎、朱执信、廖仲恺、陈炯明等，乘“海琛号”军舰离沪南下，准备在广州筹划武力讨伐张勋。但张勋复辟很快失败，段祺瑞乘机控制了北京政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社会政治依然如故。孙中山坚持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对段祺瑞的专制统治进行坚决斗争，他指出：“一定要除尽假共和，才有真共和出现。”①毅然举起了“护法”的旗帜。

7 月 17 日孙中山到达虎门，19 日到达广州，受到广东督军陈炳焜、省长朱庆澜等的欢迎，当晚他在黄埔公园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中国共和垂六年，国民未有享过共和幸福”，是因为“执共和国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也、希望海陆军“为国民争回真共和”，“以贯彻吾人救国救民之宗旨”，并号召各界“同心合力”②，奋起护法。

海军首先起来响应。7 月 21 日，北京海军总长程璧光和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联名通电，提出拥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惩办祸首三项主张。并率海军第一舰队巡洋舰海圻、海筹、海容三舰及炮舰六艘、辅助舰四艘，由吴淞口开赴广东，8 月 5 日到达黄埔，同行者有唐绍仪、汪精卫等。当时控制滇、黔两省的滇系军阀唐继尧也为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并向四川扩充势力，于 8 月 11 日通电加入护法行列。由于段祺瑞打败

张勋重新掌握政权后，拒绝恢复约法和国会，采纳梁启超建议，准备另行召集“临时参议院”，重新制定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选举新国会，以达到取消国民党议员占优势的旧国会和废除临时约法的目的，从而引起了旧国会议员的不满，他们响应孙中山择地另开国会的号召，纷纷南下到达广东，广东就成了护法运动的根据地。

孙中山到广东后，国会议员纷纷响应护法，至八月中旬，到广州的议员已达150多人。8月18日，孙中山在黄埔公园宴请国会议员，商讨召开国会问题。考虑到来粤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决定效仿法国大革命前夕第三等级代表举行国民议会的先例，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俗称“非常国会”）。19日，以国会议员名义发表通电，定于25日召开非常国会，制定军政府组织大纲，在约法恢复效力之前，以军政府作为西南各省的中央政府。25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开幕，到会议员120多人，讨论了组织政府事项。31日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13条，规定中华民国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三人，由国会非常会议分别选举。《临时约法》的效力完全恢复以前，中华民国之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大元帅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元帅协助大元帅筹商政务。军政府设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交通六部。为了适应护法戡乱的战争需要，军政府没有采纳《临时约法》规定的内阁制，而采取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中提出的党、政、军权合一的大元帅制方案，实行军事、内政、外交合一的元首制，体现了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希望通过护法运动建立本党单独执政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意图。

9月1日，非常国会进行大元帅选举，到会议员91人，孙中山以84票当选为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10日，孙中山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发表就职宣言，重申护法的目的是：“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3]同时，经非常国会推选，孙中山任命各部总长：财政唐绍仪，外交伍廷芳，内务孙洪伊，陆军张开儒，海军程璧光，交通胡汉民。以大元帅名义任命章太炎为秘书长，许崇智为参军长，李烈钧为军政府参谋总长，林葆怿为海军总司令，方声涛为卫戍总司令，李福林为亲军司令，李耀汉为筹饷总长，陈炯明为第一军总司令，张继为驻日外交代表。军政府的人事安排，体现了中华革命党人主动与西南实力派合组护法军政府的愿望。但是陆荣廷与唐继尧等追求的是建立护国战争时期军务院那样的合议制政府，按各方实力排定座次，实现他们称霸西南的野心。而军政府却采取了元首制，树

立了孙中山在护法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他们反而成了配角。所以陆荣廷与唐继尧对军政府的组织原则及选举结果都非常不满，均不肯就任元帅。伍廷芳、唐绍仪、程璧光、李烈钧等国民党人士为求得与西南实力派的合作，也赞成合议制，故这四人也不肯就职。于是孙中山任命了一批中华革命党的骨干和原同盟会或国民党的激进分子代理各项工作。这样，军政府实际上成为中华革命党力图领导护法运动的资产阶级政府，从而决定了它必遭西南军阀的反对而难以长期存在下去。

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护法运动高潮的到来，也标志着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

段祺瑞继承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决心以北洋武力镇压西南护法，挑起第二次南北战争。其军事战略有两个重点：一是对湖南用兵以制两广；一是对四川用兵以制滇、黔。8 月 6 日，段派出心腹大将傅良佐代替谭延闿为湖南督军；派其内弟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9 月 9 日傅良佐率北洋军到湖南后，即下令免除原同盟会会员、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和驻衡阳湘军旅长林修梅的职务。18 日，刘、林二人联名通电，宣告“自主”，与海军和西南护法各省一致行动。西南护法各省将湘督易人看作是北洋派进军西南的信号，桂系决定派出桂、粤联军 80 个营援助湖南。10 月 3 日孙中山正式下令讨伐段祺瑞等民国叛逆。湖南省护法军组成以程潜为首的湘南总司令部，粤、桂、湘三省护法军的总目标是会攻长沙。此时，段祺瑞也向北洋军下达了讨伐令，傅良佐任命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分三路讨伐湘南。10 月 6 日，北洋军和湘南护法军在湘潭西倪铺交战，护法战争正式爆发。南北两军在湘南激战了一个多月。11 月 14 日，直系军阀王汝贤和范国璋不愿为皖系卖命，通电议和，撤离衡山前线。20 日护法军轻取长沙。段祺瑞对湘用兵以制两广的计划宣告失败，桂系控制了湖南。与此同时，唐继尧为首的滇系为对抗吴光新率领的入川北洋军，也组成滇、黔联军，与孙中山派往四川的中华革命党组织的四川国民军（后改四川靖国军）相配合，与北洋军交战，于 12 月 3 日攻占重庆，赶走了段祺瑞新任命的四川督军周道刚和四川查办使吴光新。在其他各省，由中华革命党和国民党人领导组建的护法武装也相继而起，纷纷宣布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

接着，规模较大的湖北襄郧镇守使、鄂军第九师师长黎天才等组织的“湖北靖国军”，在襄阳宣布“自主”；前陕西警备军统领郭坚组织“陕西护



法军”，在凤翔宣布“独立”。此外，在山东、河南、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甘肃，乃至东北等省区，都先后组织了“护法军”、“靖国军”，宣布“独立”或“自主”，护法战争的烽烟席卷了全国大部分省区。这种形势使孙中山非常振奋，他多次召集军事会议，制定了护法北伐的进兵战略：令桂、滇两军肃清湘、川北军，出师合击武汉，其他各路护法军、靖国军也与桂、滇军会师武汉，然后占领南京，大举北伐，会攻北京。

北洋军在湖南的失败是直、皖两系矛盾分裂的结果，同时又进一步激化了直皖矛盾。直系首领、代总统冯国璋一直同皖系首领段祺瑞争夺北洋派正统地位及北京政府大权。护法战争打响后，冯企图借助西南军阀势力对抗皖系，因而暗中主和，且对皖系利用直系军队打头阵的部署深为不满，正因此，王汝贤、范国璋二将在前线擅自停战撤兵，打乱了皖系夺取湖南的战略部署。对此，段祺瑞极为恼火，愤而向冯国璋提出辞职。冯索性暗示号称“长江三督”的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江苏督军李纯于18日发表联名通电，主张南北双方罢兵休战，和平解决南北问题。11月22日，冯免去国务总理段祺瑞，任王士珍为国务总理，段祺瑞内阁再次倒台，直皖两系公开分裂。25日冯国璋颁布南北停战令。此举在护法阵营内部引起不同的反响。孙中山始终坚持护法，反对南北调和，在11月18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除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余地。以程潜为首的湘军将领则要求乘胜攻取岳阳，巩固护法军在湖南的胜利。然而以扩张实力和地盘为目的的桂、滇两系，在分别控制了湘、川两省后，便不顾孙中山护法运动的宗旨，很快和直系军阀妥协。陆荣廷在11月24日，即冯国璋颁布停战令的前一日，就表示赞成“长江三督”的主和通电，带头发起南北停战。28日又授意广西督军谭浩明以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名义通令响应冯国璋的停战令，命护法军前敌各军停战。滇系军阀则采取两面派手法，一面慷慨陈词，表示坚决护法，敷衍孙中山；一面又与陆荣廷沆瀣一气，彼此呼应，下令驻川滇军停战。

直系的主和政策引起皖系与北洋主战派的强烈不满。在段祺瑞及其心腹徐树铮的策动下，吉、黑、奉、直、鲁、晋、陕、豫、甘、新、皖、浙、闽13省督军代表分别于1917年12月2日和1918年1月5日，连续召开两次天津会议，强烈要求冯国璋明令讨伐西南。冯被迫让步，于1917年12月15日任命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分别为第一、二路军总司令南下讨划湖南。18日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皖系干将段芝贵为陆军总长，让

皖系重掌中央军事指挥大权。1918年1月10日，又以参谋部、陆军部名义下达局部讨伐令，令北洋军进攻湖北荆州和襄阳。1月14日，吴光新率北洋军攻占荆、襄。桂系与湘军看到直系屈从主战派，也向岳阳发动进攻。1月27日护法联军攻克岳阳，俘敌1 300余人。护法联军乘北洋军兵力集中荆、襄之机直捣武汉，将会使护法战争出现重大转机。但桂系以保守湘境为满足，按兵不动，并提出“北不攻岳，南不攻鄂”为议和条件，从而丧失攻取武汉、会师北伐的大好时机。湘军夺取岳阳后，北洋主战派气势更凶，胁迫冯国璋于1月30日下达对整个西南的讨伐令，命曹锟、张怀芝和张敬尧统率所部分路进兵。2月中旬，各路北洋军约10万人分别向湘鄂、湘赣边界进军。3月18日，北洋军“后起之秀”、直系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率部攻占岳阳。3月23日，冯国璋被迫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立即组织北洋军大举南攻，护法军在湖南战场接连失利。26日，吴佩孚占领长沙。北洋政府旋即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命吴佩孚等部分左、中、右三路向湘南进军。4月24日，吴佩孚率中路军占领衡阳，湖南大部分地区沦于北洋军之手。进攻湖南的第一路总司令曹锟及其部下、第三师师长吴佩孚为直系军人，挥师南下后连克岳阳、长沙、衡阳，战功最大，而段祺瑞政府竟把湘督兼省长一职授予皖派嫡系张敬尧，使曹、吴大为不满，直、皖矛盾再度尖锐。吴佩孚秉承曹锟意旨，占领衡阳后即停步不前。5月底，曹锟擅自回师天津。6月15日直系与桂系代表签订停战协定，息战言和。8月，吴佩孚通电主和，直系将领纷纷响应。8月下旬段祺瑞被迫命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

桂、滇两系军阀不仅在护法战争中勾结直系罢兵议和，破坏孙中山护法宗旨，而且陆荣廷、唐继尧等还拉拢国会议员，联合政学会政客，排斥孙中山，分裂护法军政府。在军政府成立之初，被国会非常会议选为元帅的唐继尧、陆荣廷以不就职表示不与孙中山合作。陆荣廷视两广为私产，不满孙中山于广州的活动。陆荣廷所派之广东代理督军莫荣新说：“孙某之政府，空头之政府也，彼无兵无饷，吾辈但取不理之态度，彼至不能支持之时，自然解散而去。”[④]他为迫使孙中山离职，甚至令其部下杀死大元帅府卫队官兵数十人。为了抵制桂、滇军阀的破坏活动，孙中山公开揭露桂系军阀扼杀军政府的罪行，命令海军炮轰挂系广东代理督军莫荣新的军署。但是，因为孙令山没有自己的武装，桂系军阀不仅无视孙中山的警告，还于2月26日在广州珠海谋划暗杀了支持孙中山，拥护北伐的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而唐继

尧不仅阻止驻粤滇军支持护法军政府，而且擅自组织“西南护法各省联合会”，还指使国民党一些人士出面，正式提出改组军政府的主张，并拟定《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七条，其中心用意在于改大元帅单独首领制为若干总裁合议制，以排挤孙中山。4月10日，滇系军阀唐继尧率先通电西南各省支持这一主张，提出护法各省现宜推举黎元洪或冯国璋为大总统，推岑春渲为国务总理，至于孙中山，则宜游历各国，办理外交。孙中山坚决反对国会的非法决定，表示“对于改组一事，根本反对，即于改组后有欲以为总裁者，亦决不就之”。从而使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⑤他看到了军阀的本质，深深懂得不可能依靠军阀达到护法的目的。5月4日，孙中山愤而辞职。

同日，陆荣廷、唐继尧利用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废大元帅制为七总裁制，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七人为政务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由桂、滇军阀及其附庸政学会所控制，护法成为空名。5月21日，孙中山乘大阪商轮“苏州丸”号离开广州，经日本前往上海。护法战争宣告失败。

注释：

①《民国日报》，1917年7月20日。

②胡汉民：《总理全集》，第2集，第176页。

③《军政府公报》第1号。

④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7集，第19页。

⑤孙中山：《辞大元帅职通电》，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026页。

日本窥视胶州

胶州湾位于中国山东省山东半岛南部，又称胶澳。胶州湾口窄内宽，面积446平方千米，为伸入内陆的半封闭性海湾，无泥沙淤积，冬季一般不结冰。青岛港位于湾口北部，胶州湾是青岛的母亲湾。有南胶河、大沽河等注入，湾口为青岛港。是黄海沿岸水运枢纽，山东省及中原部分地区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地势如此重要，所以帝国主义者（特别是德帝国主义者）觊觎已久，他们的殖民专家认为：欲图远东势力之发达，非占领胶州湾不可，可以从胶州湾作为一个突破口，即可占领物产丰富的全山东，并由此进而将魔爪四伸，占领全中国。

在1898年，胶州湾成为了德帝国主义的“租界”。

1897年11月13日，平日常驻上海吴淞口的德国远东舰队出现在了青岛南面的外海。在此前的11月6日，德皇威廉就决定借口曹州教案（两名德国籍教士于四天前在山东曹州巨野县被大刀会土匪所杀）出兵欲占领胶州湾。次日深夜，威廉电令远东舰队司令海军少将迪特里希做好准备。10日，德军舰启航向胶州湾进发。迪特里希率领的这支舰队由五艘军舰组成，分别是“威廉王妃”号、“鸬鹚”号、旗舰“皇帝”号和并未参加实际行动的“伊伦娜”号和“阿克纳”号。

实际上，在13日下午4时德国舰队一出现，就被驻防清军的瞭望哨发现。当时，章高元（青岛建置第一任总兵）命人前往德舰询问前来之目的，迪特里希委派副官带领两名军官和翻译上岸拜会章高元，在得到“借地演习，进行临时休整，很快就会离开”的答复后，章高元这才如释重负。为了表示友好，并尽地主之谊，章表示要在衙门设宴招待迪特里希，但被德方婉言谢绝。由于此前，每到冬季经常有俄国舰队来此军演，而且德国一直对华“友好”，又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公正”，诸多的因素蒙蔽了曾参加过甲午中日战争的章高元，他的懈怠与麻痹大意，直接导致了次日他与德军的对峙，并且弄的满盘皆输。

德国舰队在入夜后有了充足的时间来进行占领前的部署。“皇帝”号和“威廉王妃”号留在小青岛附近的外锚地，准备在遇到抵抗时炮击沿岸的总兵衙门、兵营和炮台。而“鸬鹚”号则夜黑乘机驶入胶州湾，停泊在马蹄礁附近，准备伺机占领位于小鲍岛的军火库和军械库，并从背后进行迂回包抄。

1897 年 11 月 14 日，依照旧历是光绪二十三年 10 月 20 日。黎明时分，“鸬鹚”号放下几艘小船，船上所载的 100 余名德国士兵，趁着未散的晨雾，一举占领了清军后海营房和不远处火药库。在得到“鸬鹚”号得手的信号后，迪特里希命令舰队开始登陆。就在 720 多名德军士兵在栈桥西侧登陆的同时，恰逢驻防清军在进行早操。两军相遇，出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出操的绿营兵们对全副武装的德军没有丝毫的戒备，竟然还跟德国军队打招呼，还有人因能说两句德语而沾沾自喜。

德军登陆后，立即按照预先部署的计划，分兵抢占制高点和沿海炮台，并包围总兵衙门和各处营房，并切断各营之间的联系。上午 11 时左右，德军向清军发出照会，清军全部撤退至女姑口和崂山以外，只能携带步枪，以 48 小时为限，过此即当敌军处理。此时，在众人的影响下章高元曾考虑过抵抗，但却发现枪里没有子弹，而军火库已早被德军控制。无奈章高元则亲自去面见迪特里希，说没有收到本国公文，不能随意撤离。但迪特里希坚持德军必须接管防务。章高元急电山东巡抚李秉衡和北洋大臣王文韶表示没有办法只好撤离。

中午 12 时 30 分，章高元的总兵旗从衙门前的竿头降下。下午 2 时 30 分，停泊在青岛湾海面的德舰鸣放了 21 响礼炮，庆祝在这一次占领行动中的胜利。半个小时后，随着对德国皇帝的三声万岁，德国海军的三色战旗缓缓升起。而章高元的部队也在此时退到了四方村。

迪特里希在衙门大堂内宣布占领胶州湾及附近一切海岛与陆地，并称倘有中国人敢挑起事端，必定严加惩处。新的临时政府也同时成立。随后，德军还派遣了一支分遣队，前往最近的即墨县城，但在德国人达到之前，驻守的清军就望风而逃了。随后，这支部队继续向胶州前进，追击溃退的清军。

1898 年 3 月，德国在沙俄的帮助下，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其中规定：南北两面，租与德国，先以九十九年为限。德国所租之地，租期未完，中国不得治理，均归德国管辖。当时境内包括胶州湾四周及岛屿，整个租界地被称为“胶澳租界”。1899 年德皇下令将胶澳租界地改

名为青岛。《胶澳租界条约》还规定了德国在山东境内建造胶济铁路和在铁路附近左右各30里内开采矿产的权力。青岛就成了“国中之国”。

这样，在19世纪末的“割地狂潮”中，胶州湾就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日本对侵占中国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并不满足，伺机进一步扩大侵占地。而日本对青岛良港的优越条件是早有耳闻并极为重视，在青岛被德军占领之前，日本就常派日商到青岛做买卖。日本当局为了及时掌握青岛和山东的近况，还时常派特务化装为中国人，潜伏到胶济铁路千里沿线进行活动，日本对青岛的垂涎程度可见一斑。日本明治天皇就曾叫嚣要以武力开拓万里波涛。1897年，德国强租胶州湾，日本打心眼里不自在，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比德国入侵中国早，却由于自己忙于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利益，山东和青岛这块肥缺成了来自欧洲德国的囊中物，这对日本殖民地野心是一种挑战和刺激。早已垂涎青岛的日本对此耿耿于怀，一直想方设法的寻找时机染指山东和青岛。

德国盘踞青岛的前些年，日本不敢轻举妄动，很少有人到青岛活动，看上去日本对山东和青岛似乎没有什么想法和兴趣。可到了1913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突然活跃起来，对青岛表示出超乎寻常的关注与兴趣，频频派军政要员到青岛调查，窥探青岛的德军情况，伺机取代德国对青岛的占有，以建立向东亚侵略扩张的桥头堡，这种强烈的占有欲，促使日本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了。1914年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在欧洲爆发，先后卷入这次世界战争的国家多达33个，战争双方是两大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一边是德国、奥匈、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称为“同盟国”；一边是英国、法国、俄国以及埃尔维亚称为“协约国”。日本、意大利和美国，都是在战争开始后才陆续加入各自阵营的。东方的日本帝国主义，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他们夺取山东和青岛的大好时机。

欧洲各国都收缩战线，把主要精力和兵力用在欧洲战场上，远在他国的殖民地就顾及不上了。胶州湾只有德军数千兵力，这一形势，正中日本下怀，于是日本有了乘虚而入的打算，他们准备与驻青岛德军大干一场，趁势取代德国人对青岛的占有。此时，战火缠身的德国有意识地向中国政府表示愿意将青岛归还给中国，但要求中国政府给以建设青岛的资金赔偿，并要求重新为德国找一个适宜的港口，德国这种“归还”青岛的形式其实对自己并不吃亏，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很好的缓兵之计。袁世凯政府与德国就此问题

进行了秘密接触，日本政府得知消息后，向北洋政府发出警告，指责这是破坏了中立立场，站到了德国一边。日本政府这纯属无理取闹。但胆怯的袁世凯政府，腐败无能，仅在8月6日宣告中立，说："各交战国在中国领土、领海不得有占据及交战行为，各交战内之军队军械及轻重品，均不得由中国领土领海经过"[①]等等。可是，日本帝国主义根本不理会这一套。就在袁世凯政府宣告中立的第三天，日本军舰已出现在青岛海面上了。

1914年8月15日，日本以"维护远东和平"为名义，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以8月23日正午为限期。日本要求德国，立即从日本海面和中国海面撤走装甲舰和全部军舰，不撤走者，则立即解除武装。日本帝国主义发出最后通牒后没有得到回复，于8月22日开始作战，以求占据胶州和青岛港口。8月23日，日本正式向德国宣战。北京政府立即划出所谓特别区域供日军使用，不再顾及曾宣布过的中立条款了。同时，德国驻华代办马尔参代表其政府向袁世凯建议把胶州湾租借地立即无条件地归还中国。袁世凯不敢表示同意，却建议美国政府从德国手中接收胶州湾，以便随后归还中国。然而，袁世凯企图利用日美矛盾的希望落空了。美国政府不愿意干预，怕冒风险。帝国主义列强，尽管相互间矛盾重重，但从整体说来，他们纵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动。中国作为中立国，要求日本和德国把战事限制在租借地境内。但是，日军司令部无视这一要求，到9月26日，日军400余人即超出所谓特别区域，进占潍县车站，把军事行动开展得远远超出了租借地。这时，北京政府虽然向日本申诉了"政府失信于军民"的苦衷，但日本政府不仅置之不理，而且继续派军前进。

在北京政府退让下，日本军队于10月6日直达济南车站。11月7日，日军不是从德国人已设防的海上，而是从后方、经过筑有工事的胶州地区去攻打青岛，在青岛的德国人向日军投降。至此，在中国境内的对德作战宣告结束。按理，日军应该撤退，并将青岛等地交还中国。但是，日军仍借口一战尚未结束，拒不撤离。

就这样，太阳旗在青岛到处飘动，日本开始了对青岛长达8年的殖民黑暗统治。

1914年11月27日，就在日本攻占青岛的半个月后，日本大正天皇发布命令，在青岛设置日本守备军司令部，任命率兵攻占青岛的日军中将神尾光臣为首任司令。其职权和责任包括，直隶天皇，统率守备驻军各部队及特别指定之各机关，担任占领地区之守备；统率占领地区之民政；监督、守备

山东铁道及矿山的经营管理等，其职权责任与德国胶澳总督相似。日本守备军司令部建制庞杂，远超过德国总督公署，有：参谋部、副官部、宪兵队、通信部、经理部、军医部、军理事部、青岛军政署、李村军政署、闸邮电部、水道部、埠（码）头部、港务部、山东铁道管理部、运输部、防备部、无线电信所等。以上各部，除山东铁道管理部外，全由陆军将校充任。为镇压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在青岛部署了由 8 个步兵大队、一个重炮大队、一个铁道联队以及骑兵中队、工兵中队等组成的守备军，总兵力两万余人，分别驻扎在青岛和胶济路沿线，还有日本海军舰队停泊在青岛港内。

日本依仗军事实力，对青岛和山东实行严酷的军事管制，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控制青岛，实行野蛮的殖民统治和疯狂的经济掠夺。日军占领青岛之初，宣布设立青岛、李村军政署，在青岛城乡实行“军政”，并颁布《军政施行规则》十条，规定中国人一切活动，均需经军政署批准方能进行，不许有所稍违。倘有违者，无论如何情由，必定从严惩办，毫不宽宥。之后，日军又颁布数十部军规法令，对青岛人民实行残酷的军事殖民管制和野蛮镇压。日本宪兵和警察可以随意逮捕、关押、审讯、残杀中国居民，严禁一切群众聚会和反日活动，将 20 万青岛人民逼进了苦难的深渊。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充分显现了它的贪婪本性。攻占青岛后，日本将德国公产和中国人的财产据为己有，拒不返还中国主人。青岛海关历来归中国政府所有。日军占据青岛后，悍然占为己有，驱除中国关员，截留海关税银。中国政府一再抗议，均被日军以“军政时代，不能承认”为由予以拒绝。仅此一项，日本即掠夺了巨额关税。日本占领胶济铁路后，驱赶原有中国职员，逼迫中国护路军警撤走，而以其铁道联队管理和警卫铁路。通过铁路，日本掠夺了大量资源，获取了高额利润。据统计，日本统治山东 8 年中，仅从胶济铁路就获利 5 126 余万元。

土地掠夺是日本经济掠夺的重点之一。日军将德国已征官用地据为己有，出售获利。同时不断强占民地，扩充官地。据 1922 年统计，日本官用地已达 4 620 万平方米；日本还以低于德国一半的价格强行霸占沧口、李村大片民地。日本经济掠夺的主要手段，是在青岛开办工商企业。据 1922 年统计，日本在青岛和胶济路沿线开办各项企业商店 299 家，其中 50 万元以上有 36 家。而此时这里全部中国工商企业不足 30 家，50 万元以上者仅有 2 家。日商内外棉、大康、宝来、钟渊、隆兴、富士 6 大纱厂建成后，青岛成为与上海、天津并驾而驱的轻纺城市。日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军

事力量，控制青岛与山东的经济命脉，为日本掠夺了大量财富。最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大量走私武器，制造中国内乱，培植亲日势力，以扩大其侵略。而日本守备军公开输入贩卖鸦片，实行毒品专卖，牟取暴利，毒害中国人，罪恶昭彰。据报纸刊载：8年中，日军仅贩毒一项即获利1亿元。在日本统治下，青岛人民陷入空前的灾难之中，摆脱异族统治，完成青岛回归，已成为青岛人民共同的心声。

注释：

①《东方杂志》第十一卷，第三号。

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

在北京政府处处退让的形势下，日本侵略者更是步步进逼。到了1915年日本不仅占据了山东，反而进一步提出了灭亡全中国的“二十一条”。

1914年11月7日，日本攻占了青岛。12月末，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从日本匆匆返回中国，马上要求同袁世凯会晤。到1915年1月18日，日置益向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亲自递交了“二十一条”。共分为五号。具体内容是：

第一号是关于山东问题。其中规定：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概行承认；中国政府允试，凡在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中国政府允诺，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铁路之铁路；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

第二号是关于南满及内蒙东部问题。其中规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甫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订；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用款项之时，中国政府应允，先经日本国政府同意而后办理；中国政府允诺，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

第三号是汉冶萍公司问题。其中规定：两缔约国互相约定，俟将来相当

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国政府之同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此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

第四号是沿海岛屿问题。其中规定：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是对全中国的控制问题。其中规定：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以致酿成之事不少，因此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管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钦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在福建省内络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因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议；允认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十分明显，这是一个包括了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的，旨在灭亡全中国，排斥第三国在中国扩张势力，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殖民地的条约。为了避免引起第三国（主要是英、美）的干涉，日置益在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时，要求袁世凯要：“迅速商议解决，并且严守秘密。”[①]对于袁世凯政府来说，这个卖国条约如此露骨，要在这样的条约上签字，不仅要担心会遭到第三国的干涉，还担心会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抗。因此，袁世凯政府在谈判中也做了一些努力。

袁世凯对具体条款作了批示

第一项关于旅大南满铁路年限问题，袁批示：

此本于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续俄国未满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此条不必争论。

对第二项至第四项这三项，袁批示：

对承认德国利益问题批：应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

对于合办矿业批：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

对于建造铁路批：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又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可允与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唯须斟酌慎重。

对于开商埠批：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

对汉冶萍铁矿厂批：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

对浙闽铁路批：须查卷，似与英国有关。

对福建让与批：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

对内地杂居批：治外法权未收回之前，不能允以杂居。

第五项，袁批示：

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日本自己亦觉不妥，故注“希望条件”，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

谈判中据理力争

在谈判之初，中国外交总长陆征祥就提出，“将来对于各条款讨论之时，中国政府拟每条提出一修正案”。[②]且讨论一条，提出一条。在实际谈判中，中方确实逐条提出修正案，步步为营。所以，头几次会议时间很长，除了程序问题外，没有什么进展。但是事理上的优势不能弥补实力上的差距，日本公使日置益步步进逼，反复勒索，甚至以直接出兵相威胁，3 月间日本增兵东北、山东、津沽等地，向袁世凯政府进行恫吓。日置益在 3 月 8 日往访曹汝霖说：“会议迁延，日本国军国民，势难再殉情，若于数日内对与重要各条，无满意之承认，恐生不测之事。中国因决定，旅大南满安奉问题完全照日案同意，其他各条亦拟相当让步”。[3]如此反复，“溯自二月二日开议至四月十七日，前后会议共二十四次……综计在二十四款要求中，中国已表示同意者凡十五款，其中有大体承认者，亦有照原文允定者，并有六款早经双方签字”。[④]但中国在某些方面，则态度坚决，不肯让步。如 5 月 1 日，中国提出最后修正案，并且声明为最后的决定。“该案虽承认日人在南满之居住营业及土地租界权，但不允永租，并要求日人服从中国警章，与华人纳同样之各种税课，且关于土地之争讼，无论中国人与日本人，或日人与日人，均归中国官吏审判；于东部内蒙，则拒绝我合办农业及经营附随工业之提案，且不但要求胶州湾之无条件归还，及参加日德讲和会议，更要求日本政

府负担中国因日德战役所生损失之全部，并即时撤废日本因战事之军事设施，先行撤退占领地之守备兵；而对于第五项之各条，则全行拒绝”。[⑤]到5月1日，双方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谈判，但中国的最后修正案仍然坚持对日本所提出的诸多条款的修改和拒绝，使日本很难通过谈判手段迫使中方做出让步。

拖延谈判时间

袁世凯虽然被迫同意与日本就“二十一条”展开谈判，但是并没有放弃通过欧美列强外交干涉而迫使日本收回条款或做出让步的想法。所以，谈判过程中，袁世凯指示中国外交总长陆征祥要尽量的拖延谈判时间，以寻求转机。陆征祥遵从袁世凯的指示，与日置益展开周旋。在谈判时间上，日本公使日置益要求天天谈，全天谈，以尽快结束，免得引起国际干预。陆征祥以事务繁忙、身体不好为由，坚持把日本的天天谈变为每周会议三次，每次下午二时至五时。并在每次会议的开场白后，既命上茶献烟，侍从们稳步慢走，又是点烟又是鞠躬，等到一一敬献完毕，三个小时的谈判时间已变成了二小时了。在谈判中，陆征祥容颜和气，时常发些模棱两可的长篇议论，使日本代表既抓不到把柄，又不便发作。这样，“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自2月2日正式开始谈判，至4月26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止，历时84天。政治会议25次，会外折冲不下20余次。”[⑥]从谈判时间之长，我们可以看出交涉的艰辛和难度。

刺探日方情形，制定让步底线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袁世凯在谈判过程中，多次派人了解日本各方面对“二十一条”的态度，以便知道他们可能在那些方面做出让步，确定中国能够在哪些方面予以拒绝，在那些方面需要做出适度的让步。袁世凯派他的日本顾问贺长雄为特使，前去东京和与日本政府，特别是与日本外务省有影响的元老联络，因为日本的各项政策都先在天皇主持的元老院决定。他希望从元老们的私人意见中得知在迫使中国接受第五项条件上，日本要走多远。后又派政事堂参议金邦平去日本活动，再次走访松方正义（日本元老），并秘密支持四个日本议员竞选，进行幕后交易。这些接受了16万日元选举“运动费”的议员也果真弹劾了大隈内阁。袁世凯还收买大批日本浪人间谍竭力搜求日本公使馆的内部情况和日本商民的动静，从而了解如何在不激怒日本的前提下，把对中国权益的损失降到最小。

袁世凯政府的这些措施，基本上没有改变日本要灭亡中国所提出的

“二十一条”的内容，最后，英美等第三国的还是干涉了进来，并起了一定作用，让日本作出一些让步。

1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仅以一至四号通知英、美、俄、法四国。“二十一条”全文真相披露后，欧美对日本损害他们在华权益激烈抨击。2月10日，英国驻日大使赴日本外务省声明，英国政府对日本之要求条款“漏告”第五号，深表遗憾。声称长江流域铁路，中英已有成约，请勿相侵。日方迫于各方压力，遂于4月26日提出修正案，共二十四条，仅将若干条文采用换文方式，实质上依然如故。它声言，此系最后修正，务请同意。并称，如中国政府将二十四条全体承认，日本政府拟将胶州湾以适当时机，附加条件交还中国。袁世凯政府认为日本的修正案比初次提案有部分让步，但仍有一些条款“与中国主权、其他列强条约上权利以及机会均等主义均相抵触”，故不能接受。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下达最后通牒，声言：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之各项，及第五号中的福建问题，必须按照日本提出之修正，迅速做出回应。第五号的其他各项可以日后另行协商。这一通牒，要求袁世凯政府在5月9日以前作出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⑦

这时，袁世凯正急于复辟帝制，为了换取日方的支持，早日登基称帝。5月9日，袁世凯令其代表对日本的要求作了完全的承认，并在条约上签字。从此，5月7日（或5月9日），就成了中国人民的国耻纪念日。

注释：

①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93页。

②③④《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86页，第185页，第246页。

⑤《内外时报》，1919年7月10日。第8～12页。

⑥石建国：《陆征祥传》，1999年版，第167页。

⑦《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307页。

段祺瑞的卖国独裁和南北议和

张勋利用黎元洪、段祺瑞之间的矛盾复辟，最终失败了。段祺瑞却借反对张勋复辟，捞到了“再造共和”的政治资本，再次组阁，建立了一个封建专制独裁的政权，实行着对外卖国的政策。

段祺瑞的封建专制政权是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建立起来的。袁世凯死后，日本寺内内阁认为，段祺瑞可以成为他们在华夺取利益的新的代理人。因此段祺瑞取得政权后，立即向日本保证：“中国政局几经变化后，我再度出任总理，将来一切施政，当按预定方针进行。”[①]日本认为这是一个有利的机会，便通过中国驻日公使章宗样，要求中国对德宣战；协约国驻华公使也通过外交总长汪大燮，要中国参加协约国。段祺瑞的预定方针就是对德宣战。

1917年7月4日，段祺瑞入京。8月1日，冯国璋就任大总统。此时，国会已被解放，加之冯国璋对参战没有表示异议，西南军阀又以中国对外应当一致，表示了可以接受。4日，国务会议顺利地通过了公开对德宣战案，14日，由大总统正式命令公布。

在参战的名义下，段祺瑞向日本大借外债，以扩充皖系军阀的实力，总额高达5亿日元。这些借款大都由日本政客西原龟三经办，所以通称西原借款。段祺瑞政府为了获得这些借款，不惜向日本大量出卖国家权益：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并将东北的吉长、吉会铁路以及所谓满蒙五铁路和吉林、黑龙江两省的金矿、森林以及印花税、常关税、交通银行等抵押给日本；允许日本派遣军官训练中国军队。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段祺瑞政府又与日本订立反苏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允许日本在中国驻军，战时日本可以向中国军队派遣“联络主任”，实际上使日本得以指挥中国军队。日本也正是通过这些对华贷款，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达到了它在袁世凯时期所未能达到的侵略目的。日本首相寺内下台后，曾恬不知耻地自我夸耀说：“大限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之利益。本人在任期间，借与中国之款，三

倍于从前之数，其实际扶植日本对于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②]

这时美国已经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无力东顾，在中国问题上转而求与日本妥协。1917 年 11 月，美国国务卿兰辛与日本外务相石井菊次郎在华盛顿签订了《兰辛石并协定》，规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日本也重申尊重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个协定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前提，暂时实现了美日两国间的妥协，但它同时又为日本独占中国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段祺瑞大量卖国，加剧了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特别是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尤其是亲日派封建军阀的矛盾。

段祺瑞对外卖国，对内则谋专制独裁。再次组阁后，加强了北洋军阀的军事专政。当张勋复辟时，为了阻止西南个省讨逆军进入北洋军阀的地盘，段祺瑞与 7 月 4 日曾以国务总理名义发出通电，声称复辟即将结束，各省治安重要，不必移师北来。企图阻止南军北划，这样就加深了西南各省和北京政府的对立。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以“再造民国”的功臣自居，把不要国会和“武力统一”作为施政重点，甚至公开声明：“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③]

对于“武力统一”政策，段祺瑞对西南用兵。1917 年 10 月，命令直系军队进攻湖南，借以消耗双方实力。冯国璋反其道而行之，力谋与西南军阀联手，排挤皖系势力。他一方面指示进入湖南的直系军队消极怠战，同时又指使曹锟等人发出和平通电，反对“武力统一”，迫使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职务。但是段祺瑞并不甘休，指使不讲徐树铮勾结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兵入关，对冯国璋进行武力威胁。1918 年 3 月，他又唆使皖系督军团通电要求段祺瑞复职。冯国璋只好再度任命段为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上台后，继续推行“武力统一”的政策，并以扩大地盘为诱饵，拉拢军阀曹锟、吴佩孚为其效力。4 月，曹、吴在湖南得手，连下长沙、衡山、衡阳诸城，但段祺瑞却任命皖系亲信张敬尧为湖南督军。这引起了曹、吴的极大不满，这促使曹、吴转与西南军阀联合。6 月，吴佩孚等通电主张和平，八月，吴又在致江苏督军李纯电中，痛斥“武力统一”是亡国政策，之后又在通电中，请冯国璋颁布全国一体停战之命令，让南北军队留有余力，一致对外。在直系与西南军阀的联合反对下，段祺瑞被迫于 8 月下旬命令前线部队停止进攻。其“武力统一”的政策，归于失败。

对于国会问题，段祺瑞及其党徒组织了安福国会。段、冯矛盾激化时，

段祺瑞政府在对待冯国璋问题上有“政变倒冯”和“合法倒冯”的两种主张。段祺瑞为不影响整个北洋派的统治地位，决定采取“合法倒冯”手段，成立了临时参议院代行立法机关，改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法，重新召开新国会，改选总统。这同时也抵制了孙中山的非常国会。

在南北交战中、段祺瑞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对冯国璋造成威胁，逼冯就范。12月31日，北方主战派曹锟等发表坚决恢复旧国会的通电后，冯国璋被迫让步，同意临时参议院关于国会组织法的修正案通过后，即可进行选举。1918年2月17日，冯又被迫公布了临时参议院所“修正”的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法。次日，命令内务部筹备新国会的选举。3月6日，发布参议院、众议院议员选举和复选的日期。

1918年，大总统任期将满应当改选，为了排斥冯国璋操纵新国会的选举，徐树铮与王揖唐共商，取款80万元。3月，王揖唐、曾毓隽等人组织了安福俱乐部（因会址在北京西单安福胡同而得名），从而正式形成一个政治派别——安福系。在总统选举问题上，段祺瑞建议推北洋军阀集团中处于待客地位的徐世昌为下届大总统。如冯愿意，可退为副总统；如冯不愿作副总统，段表示愿意陪冯一起下台。6月19日，天津督军团会议一致同意推徐世昌为大总统的意见。

8月12日，皖系一手包办的以安福系议员为主体的新国会在北京开幕，史称安福国会。安福国会是段祺瑞的御用国会。它采取了贿选手法，给安福议员每人预支出席费300元。选举结果，安福系大获全胜，以安福系的王揖唐、刘恩格为正副众议院院长，梁士诒、朱启钤为参议院的正副议长。

9月4日，安福国会参、众两院召开联合选举委员会，到会议员436人，徐世昌以425票当选为大总统。

袁世凯死后，徐世昌一直是段祺瑞扶植的傀儡，但他并不愿居傀儡地位。他在对待西南的问题上，打算继续推行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留副总统位于西南，换取西南对自己的拥护；在对待北洋派问题上，计划继冯国璋之势力，团结直系作自己的政治资本；在对外政策上，他企图改变只依靠日本一国之方针，等等。这与段祺瑞的施政政策有一定的矛盾。

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大总统一职，在怀仁堂与冯国璋举行交接典礼。当天，徐世昌发布命令，解除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以内务总长钱能训暂代。12月20日，经安福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徐世昌正式任命钱能训为国务总理。次日，任命各部总长。

安福国会成立以后，“安福系之势力，遍于全国，而支部分部，遂满布各省。”[④]虽说第一任国务总理是钱能训，第二任是龚心湛，但实权仍掌握在段祺瑞手中。安福系分子对各届内阁都进行着控制。事后，段祺瑞不再任国务总理，专任参战督办（后改为边防督办），就是为了利用日本帝国主义作为支柱，以巩固和扩大皖系的武装力量。

安福国会后，冯国璋虽然退出总统之位，但南北军阀的战争却愈加激烈。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各帝国主义又将侵略目光对准了东方，重新回到了争夺中国的角逐场。为了反对日本支持皖系独霸中国的企图，在徐世昌就任大总统时，美国就劝告其迅速谋求中国国内之统一。后来，美日帝国主义达成谅解，共同向中国南北双方提出“和平劝告”。10 月 23 日，社会“名流”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等 24 人通电宣告成立“和平期成会”，推举熊希龄、蔡元培为正副会长。这个举动得到各省的响应，并在北京成立了“全国和平联合”。23 日，军政府下令停战。25 日，徐世昌以总统名义发布和平令，并于 11 月 16 日付诸实施。于是，南北军阀就从争权夺利兵戎相见的“南北战争”阶段转入彼此分赃的“南北议和”阶段。和议只不过是企图和平划分地盘的形式罢了。

1919 年 2 月 20 日，南北议和会议在上海举行，北方以朱启钤为总代表，吴鼎昌、江绍杰、徐佛苏等为代表。南方以唐绍仪为总代表，章士别、胡汉民等为代表。和会开幕时，唐绍仪首先提出陕西停战问题，朱启钤表示要电达北京政府，请示后回复。22 日，唐又提出停止参战借款、取消参战军、公布中日密约等问题，朱启钤还是要电达北京政府请示。

关于陕西战事，是段祺瑞破坏和会的一个措施。和会前，段一面在北方代表中安插安福分子，设置障碍；一面利用皖系的附庸陕西督军。徐世昌下达停战令后，段祺瑞调集军队，指使陕西督军大举进攻，对抗徐世昌，破坏和议。

鉴于陕西战事和参战借款事宜没有解决，南方代表团宣布从 26 日起停止正式会议，改为谈话会。28 日，唐绍仪在谈话会上向北方代表团提出要求陕西停战及撤换陕西督军等三项质询，限四十八小时答复。北方代表团没有接到北京回电，不能作答，3 月 2 日向北京政府提出总辞职，会议中断。

上海和会在帝国主义操纵下开始的，也在帝国主义控制下进行。和会中断后，3 月 6 日，美、英、法、意四国公使联合“劝告”北京政府恢复和谈，暂时不提参战借款。同时，根据以前外交团的共同决议（中国未实现

统一前，各国不得提供借款），压迫日本声明停止提供参战借款。并由北京政府和日本政府与3月14日同时公布中日军事协定全文。北京政府在全国人民一致呼吁声中，回电留北方和谈代表。3月13日，下达陕西停战的命令。4月1日，长江三督和吴佩孚联名电请重开和会，同日，陕西停战实现。4月上旬，南北和谈正式恢复，旋又转入秘密谈判的“扃门会议”。会议上，在南方代表提出的取消中日军事协定等十三项问题中，国会问题是争论的焦点。南方代表要求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北方代表要维持安福国会，因为它既是段祺瑞的工具，又是徐世昌总统上台的法律根据。双方代表既进行激烈的争论，又进行秘密的交易，但都无法解决矛盾。北方代表请示北京政府没有得到回答，从4月29日起，装病不到会。这次会议中断的原因，主要是段祺瑞安福系的阻挠破坏。当和议复合时，北方代表、安福系头子吴鼎昌就从北京致电上海朱启钤，要求北京代表“态度似应强硬，力往决裂一方做去”；[5]接着安幅国会议员联名通电，反对和会讨论国会问题，说讨论国会问题，是紊乱国宪，动摇国本。因此，恢复了的和会又再次停顿下来。

南北代表宣布总辞职，北方代表封闭了办事处，带着和议文卷，全部返回北京。至此，这个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的会议结束了。

注释：

①西原龟三：《西原借款回忆》，《近代史资料》总38期，第146页

②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下，第139页。

③觉民：《天津通讯》，载《民国大新闻报》，1917年7月22日。

④《直皖战争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2期。

⑤《一九一九南北议和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0页。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4年之久，与1918年11月11日结束。1919年1月，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举行讨论战后问题的国际会议。1919年1月13日~17日，英、法、美、日、意五国举行巴黎和会准备会议，背着多数国家制定了和会的议事规则。规定英、法、美、日、意五大国为有“普遍利益的交战国”，可参加和会的一切会议。比利时、中国、塞尔维亚等国为有“个别利益的交战国”，只能出席与其本国有关的会议。玻利维亚等与德国断交的国家，只在五大国认为有必要时，才得以用口头或书面陈述意见。议事规则还限定各国出席会议的全权代表的名额，五大国各5名，比利时、塞尔维亚、巴西各3名，中国、波兰等国各2名，共计70名。和会一切重大问题均先由五大国会议讨论决定。先有“十人会议”，由美国威尔逊和兰辛、英国劳合·乔治和贝尔福、法国克里孟梭和毕盛、意大利奥兰多和桑尼诺、日本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组成。“十人会议”为五大国“经常的正式会议”。

北京政府派出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原本是：陆征祥（北京政府外长）、顾维钧（驻美公使）、魏宸组（驻比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四人，后来在美英等驻京公使的要求之下，加派了王正廷（代表南方政府），以表示南北统一。陆征祥为首席代表，他参与了历次与日本签订的密约，而代表团中英美派比较多，所以到巴黎后不久，就于2月10日提出辞呈，没有获得批准，又于3月间称病被送往瑞士，到4月5日才返回巴黎。因此，列席会议的经常是顾维钧和王正廷二人。

中国代表团最初向和会提出希望条件七条：一、废除势力范围；二、撤退外国军队、巡警；三、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四、撤销领事裁判权；五、归还租借地；六、归还租界；七、关税自由权。

原来计划的还有“铁路统一”这一项，但因交通总长曹汝霖等人的积极反对，最终删除。中国留学生对巴黎和会高度关注，并结成团体，派出代

表，要求中国的外交代表必须向和会提出废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代表团又提出了取消“二十一条”的项目。但是，这个提案提交到和会最高会议时，却遭到拒绝，和会认为这不在讨论之列。

既然提案没有机会实现，那么唯一的希望就是山东问题能够顺利的解决。

1月27日，“十人会议”讨论德属殖民地问题，中国代表被指定列席。在会议上，日本代表提出已经准备好的日本政府宣言书，声称胶州湾租借地、铁路以及德国在山东所有权利，应该无条件让与日本。日本代表还发表了1917年初英、法、俄、意、日五国签订的秘密谅解协议，即应该承认日本的上述要求。中国代表团对山东问题竟没有丝毫准备，认为山东问题应该可以包括在希望条件中了。因此，当日本代表陈述完宣言后，中国代表感到措手不及，只好说希望等中国代表在申诉完理由后，再做讨论。就这样，第一次讨论山东问题的会议结束了。

1月28日，“十人会议”再次召开，中国代表团出席并申诉了理由，从山东的地理、历史，人文等各个方面说明：“胶州租借地、胶州铁路及其他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回中国。青岛完全为中国领土，当不容有丝毫损失。”[①]日本代表接着发言，说胶州湾已在事实上成为日本属地……中国代表接着发言，说中日之密约，是中国被迫所签订的，而且是一种临时办法，应该由和会作最后之核查再行解决。就这样，中国代表发完言之后，第二次讨论山东问题的会议又结束了。

会后，日本政府对北京政府施压，日本驻北京公使向外交部提出种种质问。全国舆论十分愤激，而北京政府外交部发布正式声明中竟然说：“中日两国现正谋亲善之实现，更不应有何误解，盼望我国代表在巴黎和会场中，勿再生何等之误会。”[②]2月15日，中国代表将山东为图之换文送交和会，并附件多种，包括“二十一条”、济顺高徐铁路合同及解决山东问题的办法行文等等。3月10日，日本代表发表关于山东问题的宣言，说：“关于胶州湾问题，对于中国并不为何等之要求，故无从谅解责问之趣旨。但关于解决此问题之基础，中日两国业已解决。”[③]也就是说，日本现在享有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利，是合法的，而且是中国政府自己愿意让给的，有条约作证，而将来该如何处理，则应该是由中国和日本政府来直接解决，和会及其他国家无权干涉。后来，中国代表在会下也进行了若干活动，但都没有取得明显效果。英法意与日本有1917年的密约，站在了日本方，美国虽然想通过中国

代表团来抵压日本，但是当日本以退出和会及不参加国际联盟来威胁时，也让步了。没有办法，在各帝国主义大国妥协下，中国外交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1919年3月26日起，“十人会议”缩减为“四人会议”，即英、法、美、意四国首脑就和会中有关问题私下协商。

4月16日，“四人会议”再次讨论山东问题，中国代表团却被禁止参加。在会议上，美国代表提出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利，由和会暂时收管，这项提议，遭到日本代表的拒绝。日本认为，青岛问题中日业有成约，应交日本转交。讨论结果，英、法、意均缄默，美搁议。4月17日，再次开会，美国代表又提出了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利交五国共管的建议，再一次遭到日本的拒绝。日本代表说：“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对于中国问题由五国处置一层，不能同意。”④

4月22日，和会召开大会，中国代表出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提出两个办法，一是按照中日成约办法；一是使日本继承德国权利，由中国任选其一。这两个办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即牺牲中国。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则表示完全同意英总理之言。4月23日意大利首相奥兰多离会，由英、法、美三国首脑以“三人会议”形式控制局面。4月24日，中国代表向英法总理及美国总统，提出四点建议：“一、胶州交还中国起见，先交五国赞收；二、日本承认于对德和约签字日起一年内实行上条之交还；三、中国重视日本因胶州军事所有费用等，愿以款项若干作为报酬，其数额由四国公决；四、胶州湾全部开作商埠，如有必需之外，亦可划一区域作为专区，任缔约国人民居住通商。”⑤但就这样的让步，也都被拒绝了。

4月26日，英、法、美三国开会，日本代表被邀出席。30日，三国会议再次召开，拟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下列条款：⑥

（一）第一五六条，德国将按照1898年3月6日与中国所签订条约及关于山东省之其他文件，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及特权，其中以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放弃以与日本。所有在青岛至济南铁路之德国权利，其所包含之路，连同无论何种附属财产，车站工场，固定及行动机件，矿产，开矿所用之设备及材料，并一切附随之权利及特权，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自青岛至上海及自青岛至烟台之德国国有海底电线，连同一切附随之权利及所有权，亦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各项负担概行免除。

（二）第一五七条，在胶州领土内之德国国有动产几不动产，并关于该领土德国因直接或间接负担费用实施工程或改良而得以要求之一切权利，亦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各项负担概行免除。

（三）第一五八条，德国应将关于胶州领土内之民政军政财政司法或其他各项档案，登记册，地图，证券及各种文件，无论存放何处，自本约实行第三个月内移交日本。

经过几个月的讨论，中国从巴黎和会上是一无所获，而日本却得到了山东权益并被明文规定下来。看这三款，其规定的之详细，措辞之强硬，都是对中国的奇耻大辱。但就是这样的罕见条约，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也计划要签字了。陆征祥在5月1日回北京政府的密电中竟然说："有三端关系，亦不能不加熟审：一、对日关系，公约虽不签押，而日本仍可根据1915年约，向我直接再定约，将举所允日本之条件，完全承认。倘彼时势仍不能不签，则较之现在公约签字，事实则一，威望更逊。二、对德关系，倘单独与德订约，则所得权利能否比公约所许为优。三、对英法美关系，此次经三国讨论数日，而结果仍然如是，在我虽属不平，而在彼亦有种种苦衷，难免不于彼我感情因此妨碍，且于日后一切亦不无多少之关系。"⑦

当巴黎和会开会的时候，中国各界各团体的人士都在密切地注视着它的进展。公理不是应该战胜强权的吗？但中国代表提出的希望条约和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怎么就被和会给拒绝了呢？这不得不使人们产生怀疑。《每周评论》1919年2月2日登载的随感录中，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对于参战，简直算没有出力，如今若在和平会议席上，提出无数的要求，固然可耻。但是在各国方面，要把这个理由来拒绝中国，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国力强弱来分配权利吗？"

中日代表因山东问题在和会上发生争执，日本驻华公使于2月初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施压，这一事件，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各界各团体纷纷发表通电，有的致电北京政府，有点致电在巴黎的中国外交官，表示必须要抗拒日本的干涉。这时，学生们已开始行动起来。2月5日晚间，北京大学学生2 000多人开全体大会，并推出干事10多人，分头联合各高校学生，致电巴黎专使，拒绝日本要求。其他各地学生，也都有类似的活动。

由于中日密约的宣布，中国各界群众对帝国主义者的幻想开始破灭，同时，也更加重了对卖国贼的痛恨。《每周评论》不断揭露卖国贼的罪行，并启示各界群众向其展开斗争。4月20日的随感录中点了章宗祥、曹汝霖、

陆宗舆等亲日派的名字，并披露出："这次章公使由日本回国，许多中国留学生，都手拿上面写着'卖国贼'三个字的旗子，送到车站"。

山东人民对山东问题最为关注，因此对卖国贼也最为痛恨。4月20日，山东10多万群众，在济南举行国民大会，表示力争山东主权之决心。大会致电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代表，说："现闻我国军阀及二三奸人阴谋卖国，示意退让，东人闻之，异常愤激，本月二十日在省城开国民大会，集众十余万，佥谓此说若行，是陷山东于不复之惨。若辈包藏祸心，多方掣肘，丧心并狂，万众同仇，东人死丧无日，急何能择，誓死力争，义不反顾。"⑧

当和约中关于山东问题的三条已经决定的消息传到中国以后，人民群众的悲愤情绪达到了极点。在这时，人们对巴黎和会的幻想彻底的破灭了。人民终于看透了，巴黎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利益，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都是一文不值的空话；巴黎和会是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着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全国人民大为震惊，而北京政府还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于是，全国舆论鼎沸，群情激愤，爆发了五四运动。

注释：

①④⑤⑥⑦《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41页，第313页，第371页，第321页，第317页。

②《东方杂志》第16卷第3号。

③《东方杂志》第16卷第4号。

⑧蔡晓舟、杨景工：《五四》，《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期。

天安门集会

北京大学学生当年从事集会活动的地方，一般是两个地方：

一是在马神庙（现为景山东街）的西斋学生宿舍，即校本部西边不远的地方。这是一座很大的中式院落，在沙滩红楼建成以前，北大学生们的食宿主要都在这里。因此，各种消息首先在这里传播，许多活动首先在这里展开。这里可以随时看到各种海报、布告、通知等。另一处是在北河沿的法科礼堂。凡是人数比较众多的集会，特别是联合其他各校的集会，大多时候是在这里举行。

当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新闻传到北京时，人们群众烦躁不安。噩耗传来，并且得到了证实。5 月 1 日，上海《大陆报》之北京通讯说：“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界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5 月 2 日，身为徐世昌顾问和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的林长民，也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外交警报敬告国人》的文章，该文沉痛地写道：“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并说：“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证实了这次外交的失败。

北大学生是从蔡元培校长那里得到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的。许德珩回忆说：“五月二日，我从蔡校长那里听到了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便约集参加在《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高工的一位学生代表夏秀峰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得眼里要冒出火来。于是发出通知，决定五月三日（星期六）晚七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后来的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十三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①]

5 月 3 日，北京市民的各个阶层，包括学界、商界、政界、军界等，都举行了各种各样的集会，讨论怎样抗议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当日下午，北京一些政界人士所组织的国民外交协会召开全体职员会，作出下列决议：“（一）五月七日在中央公园（现为中山公园）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

团体同日举行；（二）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款，及英法意等与日本关于处分山东问题之密约；（三）如和会中不得伸我国之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四）向英美德各使馆声述国民之意见。”协会还发出了下面一个通知：“本会因山东问题，消息万分险急，特定于本月七日，即国耻纪念日，午后二时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讨论对付方法，届时到会，入场券由本会临时在门口分赠。”②

但是，学生们已经不能等到5月7日了，就在国民外交协会开会时，北京的学生们已经在准备发起和筹备五月四日的示威游行。

5月3日晨，在北大各公告牌上出现了于当晚7时开会的措辞激昂慷慨的布告。关于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全失败的消息，不仅登载于许多刊报，有些外国教员也直接向学生口头传布说：“失败的原因完全在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秘密订定的高徐、济顺两路借款合同的换文上所有的‘欣然承诺’四个大字上面。……这一个消息宣传以后，北京所有的学生除了那些脑筋素来麻木的人以外，没有不痛骂曹、章、陆等没有良心的，没有不想借一个机会来表示一种反抗的精神的。”③

5月3日晚，还没到约定的开会时间，北大法科礼堂已经有上千人了。参加这次集会的，除北大学生外，还有事前通知的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法专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汇文大学、高师附中、铁路管理学校等学校的学生代表。大会推举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为临时主席，北大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二人做纪录，并推许德珩起早宣言。④大会开始，先由北大新闻研究会的导师、著名的新闻记者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的经过和目前形势。接着，北大学生谢绍敏、丁肇青、张国焘、许德珩以及各校学生代表夏秀峰等很多人在会上发言。他们发言时，都痛哭淋漓，与会者更是掌声雷动，会场中出现了一种如火如荼的，不屈不挠的气象。“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这就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于是决定第二天即五月四日早上全体游行示威。大家掌声如雷一致同意。”⑤并一致作出如下决定：“（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五月四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⑥“同时推举代表到各国（日本除外）公使馆，陈述对于青岛之民意以及决心”。⑦北大学生、新潮社社员段锡朋、傅斯年分别被推

举担任天安门大会主席和游行总指挥。

为了筹备游行，学生们当场自动进行了热烈的捐助，银元、钞票、铜元以及手表、戒指、手巾、帽子等，都纷纷捐掷到台上来。大家的爱国热情达到了沸点。

当会议结束时已经是深夜十一点了。

会议结束后，学生们更加忙碌地分头筹备起来。住西斋的北大同学一夜未睡，有的负责联络其他学校，有的准备宣言、电报、传单。更多的人则是准备大旗、小旗、标语等，有人热情地把床单扯作旗帜用。许德珩在回忆中写道："我于宣言写好后把自己的白布床单撕成条幅，书写标语，一直搞到天亮。有的同学咬破手指，血书标语。那时还没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集会的主要目的在收回山东主权，收回青岛，反抗日本，反对列强以及惩办卖国贼和军阀官僚，所有标语大部是写着'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等句子"。[8]

虽然有的学校已经在5月3日晚上筹备，但是有的学校还不知道5月4日的计划。因此，在北京大学学生的积极联络下，在5月4日的上午10时，又在法政专门学校召开了一个各校学生代表会，学生们在短促的一个半钟头内，议决了下列几件事：(一）拍电国内外；(二）唤配各地国人；(三）预备七日的国民大会；(四）组织北京学生对外的永久机关；(五）本日下午大家游行示威。路线由天安门经东交民巷美、英、法、意四国使馆，转入崇文门大街。

这次会议开得很紧急，大家议论行事很迅速，面上都显着很愁很怒。会议后，各学校代表便迅速返校准备下午的游行去了。当年的会议参加者周予同在回忆中说："五月四门上午，各校派出的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举行了联合会议。到会的有数十人，我是高师的代表之一。大家讨论了游行不威的进行办法，决定散布'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政治斗争口号。那天由高师工学会代表联络到的各校激烈分子有二十人左右，大多属于高师的工学会高工、北大的共学会等组织。大家相约暴动，准备牺牲，有的还向亲密朋友托付后事，我和匡互生等都写了遗书。"[9]

中午过后，各校参加游行的队伍，就按照预定计划，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围立在金水桥前的两个华表之下。高等师范和汇文大学的队伍到的最早，其他各校的游行队伍也陆续到达。在广场上，每到一批

学生，先来的就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后到的则挥舞手中的旗帜表示敬意。北京大学的学生是首先发起者，但他们却是最晚到达天安门的。这是因为当他们的队伍在沙滩红楼操场集合准备出发时，被北京政府教育部的代表（次长）和几个警察阻拦了，不准他们去参加游行。学生代表邓中夏、黄日葵等和教育部的代表展开了一段时间的辩论最后突破阻拦，队伍才急速向天安门进发。到达时已是下午 1 时半了。

这次前来参加集会游行的共有 13 个学校的 3 000 多名学生。他们中的多数穿着长衫，也有的穿着黑制服，他们手里拿着各种颜色的小旗，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勿作五分钟爱国心”、“争回青岛方罢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头可断，青岛不可失”、“中国宣告死刑了”、“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国民应当判决国贼的命运”、“誓死不承认军事协定”等等。有的标语是用英文或法文写的，也有的旗子上画着漫画。最引人注目的是金水桥南竖起的一面大白旗，上面书写着的一副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边款是：“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北京学界同挽。”北大学科学生谢绍敏昨晚用自己鲜血书写的“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也悬挂在了天安门前，很是激动人心。

各校学生齐集天安门，教育部又匆忙派人赶来阻拦，并询问集会的本意，“学生团付以传单一纸，指而告之曰：‘区区苦衷，尽在于此，一览便知，无待赘述。’该部员接阅一过，乃曰：‘事先未通知公使馆，恐不能在使馆界内通行，劝诸君暂先归校，举出代表以便进行。’学生团当以严词拒绝。既而步军统领李长泰、警察总监吴炳湘亦先后至，均有照例之劝慰阻止之辞，然亦不过官样文章耳，安足动此如火如荼之学子听哉！”[10]

冲破了军警的拦阻，集会宣布开始。一名北大学生代表登上放在华表前的一张方桌，宣读了事先由北京大学学生、国民社社员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

“呜呼国民！我最亲最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搞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黯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之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

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侪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拱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之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11]

学生们还散发了一份由北京大学学生、新潮社社员罗家伦起草的白话文宣言：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12]

学生们的呼声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各界市民的支持。当学生队伍在天安门广场集合和演讲时，不少市民前来围

观，开始游行后，有些市民自动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来。

注释：

①④⑤⑥⑧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51页，第52页。

②《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50页。

③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93页。

⑦《青岛潮》，《五四爱国运动》上，第167页。

⑨周予同：《火烧赵家楼》，《人民教师的摇篮——北京师范大学》（非卖品），第74页。

⑩蔡晓舟、杨景工：《五四》，《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54页。

⑪⑫《时报》，1919年5月6日。

火烧赵家楼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出中华门，奔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行至东交民巷的西口，即被阻于铁栅栏之外，原来反动派早已做好准备，命令阻挠游行队伍。在学生的要求下，巡捕假惺惺地说和总统府电话磋商，结果电话往返达两小时之久，仍没有动静。“虽由代表再三向美、英、法、意各同公使署交涉，因庚子条约（辛丑条约）的束缚，终没有允许通过的可能！”[1]

学生游行队伍已不可能按原定计划通过使馆区，“不得已乃举罗家伦等四人为代表谒美公使，适美公使未在，馆员某君接见谓：今日星期，恐他公使亦难晤面，诸君爱国热忱当尽情转陈于美公使，此意即能转达外交团云，遂将所递陈词收下。”[2]其全文是：

“大美国公使阁下：吾人闻和平会议传来消息，关于吾中国与日本国际间之处置，有甚悖和平正义者，以最真挚最诚恳之意，陈词于阁下：1915年5月7日二十一条中日协约，乃日本乘大战之际，以武力胁迫我政府强制而成者，吾中国国民誓不承认之。青岛及山东一切德国利益，乃德国以暴力夺去，而吾人之所日思取还者。吾人以对德宣战故，断不承认日本或其他任何国继承之。如不直接交还中国，则东亚和平与世界永久和平，终不能得确切之保证。贵国为维持正义人道及世界永久和平而战，1917年1月10日协约国美国公使公牒，吾人对之表无上次钦爱与同情，吾国与贵国同胞抱一主义而战，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吾人念贵国与我中国素敦睦谊，为此直率陈词，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本国政府，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3]

当时学生对外的斗争矛头主要是指向侵占山东青岛，威胁中华民族存亡的日本帝国主义，对所有帝国主义者都是一丘之貉这个真理还缺乏认识，对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还抱有幻想，期望它们能够主持正义，“同情”和“援助”中国人民收回山东权益。

学生代表们由美国使馆出来，继续向东行，在英、法等国使馆，不仅没见到公使，甚至连递意见书也遭到拒绝。到日本使馆门前，被日本卫兵阻止，不许入内。这时，北洋政府又派大批军警准备镇压学生。中国还没有亡，中国人就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通行，这使得学生们义愤填膺，怒火满腔。于是大家决定去找帝国主义的走狗，卖国贼曹汝霖算账。“这时候负总指挥责任的傅斯年，虽恐发生意外，极力阻止勿去，却亦毫无效力了”。[④]游行队伍从东交民巷西口往北走，经富贵街、长安街、东单，再往北折，经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大羊宜宾胡同，出东口沿宝珠子胡同北行到前赵家楼胡同西口，再由此往东行至曹宅。

学生们在向营宅进发的时候，沿途又散发了许多传单，其中一张传单上写道：“民贼不容存，诛夷曹章陆”；“泣告我同胞，患莫留心腹。”学生们边行进，边宣传，爱国热情，溢于言表，使沿途观看的群众都非常感动。许多人民看见掉泪，许多西洋人看见脱帽喝彩，还有好些巡警也掉泪了。

当日中午，曹汝霖、章宗祥正应徐世昌之邀在总统府参加宴会，主要是徐世昌为章宗祥洗尘，在座者还有钱能训、陆宗舆等人。当学生游行及要求惩办卖国贼的消息传来，有人劝告曹等应暂留公府，不要出府回家。但他们没有理会这一劝告，认为赤手空拳的学生是起不了什么大浪的，武装的警察完全可以把赤手空拳的学生镇压下去。

曹宅主要部分是西式洋房，一排平列，西面连着中国式平房。学生们发现门已紧闭，并且有四五十名军留守卫。学生大队要求曹亲自出来解释与日本订结密约的原因。对于这些要求，警察不但置之不闻，反而企图使学生退后。所以使得游行示威的学生非常愤怒，大声喊叫“卖国贼！卖国贼！”许多学生都向窗口和墙头抛掷石头和白旗子，曹的父亲患半身不遂，这时正坐在东厢廊下，由一婢陪侍，一块石头飞来，由那婢女挡住，打在她的背上，曹的父亲未被掷中，曹等仓促扶他进内室。学生要冲进门去，可是没有办法。正要退回返校的时候，五个奋勇激进的学生突然爬上了那不太高的围墙，砰然一声，打破窗口玻璃，跳进了曹宅。这五个学生学生在墙内遭遇到十来个曹宅的警卫，但是这些警察卫兵都已被学生吓住了，毫无抵抗，任凭学生搬开堵门的石头和木块，把前门打开。就这样大群学生涌进了曹宅。

学生当时都以为三个亲日分子正在客厅内开秘密会议，不料客厅和书房都找不到人，便大声呐喊：“拖出曹汝霖来、揍他一顿！”“曹汝霖在那里?”激动的把客厅和书房的花瓶磁器等物都扔毁在地上，又跑到曹的两个女儿的

卧室．两女已不在，学生们就拆下铁床的柱子和零件，转到曹汝霖妻子的卧房，曹妻已经锁住了房门，独自在内，学生就用铁柱撞开房门，问曹在什么地方，曹妻说他在总统府吃饭还没有回来，学生便把所有的镜框家具等完全打碎，打开抽屉，希望能搜索到一些卖国文件，把首饰等物抛掷在地，用脚踩碎。随后又到东面曹汝霖父亲的房里，对他父母却都没有采取行动。学生们又找到曹的儿子和一个年轻的妾（本是妓女的苏佩秋）。让警察卫兵把曹的父母妻儿四人带走，只把房内一些燕窝银耳等物摔了满地，踩得粉碎，捣毁了许多家具。随后少数激烈派学生。走到汽车房。捣毁曹的汽车，取了几桶汽油，到客厅和书房等处浇泼，放火烧屋。

那时（约五点钟），章宗祥和丁士源（曾留学英国，时任交通部航政司司长，兼京绥和京汉两铁路局的局长），及著名的日本记者中江丑吉都躲在地下锅炉室里，听见上面放火，都跑出来，向后门奔走。章宗祥穿着晨礼服，学生们以为他就是曹汝霖，把他包围，撕破西装，有一学生用铁杆打了他后脑一下，章即倒地。丁士源冲出去叫警察的时候，警察也不愿意来干涉，章躺在地上假装死去。在混乱当中，学生看见起火，当时又听见有人大叫：“曹汝霖已给打死了！”就害怕做的有些太过分，于是有很多人散开了，有的回家，有的回校。中江丑吉和警察乘机扶起章，逃到邻近一家油盐店的一间黑屋子。在那里床上，章宗祥被另一批学生认出来了。他们把他倒拖到油盐店的门口。因为他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所以学生用旗杆把他打到失去了知觉，还把店里的皮蛋丢在他身上。后来他被警察送到日本同仁医院，医生说全身共受伤大小56处。据报导章宗祥在天津的房子也在同一天被学生给毁坏了。

当学生攻击曹宅时，曹汝霖实际上在家和章宗祥、丁士源及中江丑吉商谈。他见学生掷石头进来，便匆匆忙忙，躲进他和他妻子的卧房与他两女的卧房隔壁间两面都相通的箱子间小室内，学生居然没有想到这两个卧房中间还有这箱子间，所以没有找到他。学生离开后他仍藏在小室里，这时吴炳湘亲自到曹家来，向他道歉，并派车把他送到六国饭店。陆宗舆不在场，但学生在殴伤章宗祥后，还走到陆宗舆家，因见军队林立，并驾有机关枪，便自动散去了。第二天，5月5日曹汝霖在给总统的辞呈里对捣毁他的房子和章宗祥被殴等事记叙如下：

“呈为信望未孚，责难交集，恳请罢斥以谢天下事：窃汝霖本月四日上午，牵派人府公宴。午后二时半回抵东城赵家楼私宅。适与驻日公使章宗祥

晤谈，忽闻喊声甚厉，由远而近，势如潮涌，渐逼巷口，巡警相顾束手。约十余分钟，突见学生千余人，破门逾墙而进，蜂拥人内，遇物即毁，逢人肆殴。汝霖生父就养京寓，半身不遂，亦被殴击。旋即纵火焚屋，东院房屋，至汝霖起居所在，立成灰烬，其余亦悉遭毁损。章公使当火发之际，仓猝走避邻舍，为群众见执，摔地狂殴，木石交加，头部受伤九处，伤及脑骨，流血不止，立时晕倒，不省人事。幸警察总监吴炳湘及步军统领李长泰，闻信先后到场，强迫解散凶徒，饬警护送章公使人医院调治，据云脑筋震动，遍体鳞伤，性命尚无把握。而汝霖宅内暴徒，闻军笛捕拿，遂纷纷窜散。此汝霖因公被祸，家室焚毁，及章公使同时殴辱，重伤濒危之实在情形也。”⑥

在骚乱中院子里学生和警察也有些冲突。但是当时警察在那种情形之下，态度相当温和，实际上他们有些人保持一种宽厚的中立，只是受到了上峰几次紧急命令之后，才被迫干涉学生。双方冲突的结果，受伤的有些是学生，有些是警察。

学生和警察的冲突一直继续到接近下午6点，那时大多数游行示威的学生都已散去，只剩下几十个人在看热闹。直到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带着警察、军队和宪兵来镇压时，他们才散去。以前对学生客气的警察和兵士，现在可能是因为上峰在场督促，所以态度忽然改变了。他们吹起警笛，向空中放了几枪，遵照吴的命令（吴等是总理钱能训派去的），在现场附近逮捕了几个人，沿街又逮捕了一些。结果32个学生被押到警察厅去。

被捕的32人，其名单是：

北京大学20人：

熊天祉、梁彬文、李良俊、胡俊飞、梁颖文、陈树声、郝祖宁、杨振声、萧济时、邱彬、江绍原、孙德中、何作霖、鲁其昌、易克嶷、许德珩、潘淑、林君损、易敬泉

高等师范8人：

向大光、陈宏勋、薛荣周、赵允测、唐国英、王德润、初铭音

工业学校2人：

李更新、董绍舒

中国大学1人：

刘国干

汇文大学1人：

张德

学生们被捕后，备受苦辛。“既到警厅，32 人共住一处，如待贼寇，看管颇严。”[7]

当日晚间，日本驻华公使馆人员、新闻记者以及曹汝霖的党羽、新旧交通系要人等纷纷出入于六国饭店。曹为自己的卖国罪行辩护，要求徐世昌对其负责；他还指使北京政府交通部下令各电报局禁止拍发学生的电报，但这个阴谋未能得逞，因为学生的电报已由外国电报局发出了。

同日晚，国务总理钱能训的家中，也在召开阁员的紧急会议，研究应该怎么对付学生的办法。有的主张将参加此次游行的学校一律解散，有的主张将各校校长免职，有的还主张对学生大逮捕。与此同时，总统府也在准备取缔和镇压学生行动，警察总监和步军统领也在筹划进一步的武装镇压。

总之，反动派慌作一团，对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恨之入骨。他们百船设法，企图把已经掀起的革命浪潮给疯狂的镇压下去。

但是，反动派也不是铁板一块的。总的来说，大总统徐世昌、教育总长傅增湘等一些无实权的人们主张采取怀柔政策，释放被捕学生，以缓和民众的愤慨情绪。而执政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徐树铮、段芝贵（京畿卫戍司令）等和曹汝霖、陆宗舆这些人则主张对学生运动要严厉镇压。段芝贵甚至叫嚣：“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容此学风”。[8]《青岛潮》一书中说：“被捕学生在徐总统意，尚无成见。而段祺瑞、徐树铮及曹陆诸人，从旁耸动，不曰党派阴谋，即曰过激举动，拟兴大狱，处以非刑”。“有人造访曹汝霖，曹曰：‘此无他，党派问题耳。’其机关报纸又大言以鼓吹之，谓为过激派之输入，固已预备一网打尽之计矣。”[9]

不久以后，徐世昌将曹汝霖安顿在北海团城，将章宗祥安置在北海北岸之静心斋（当时北海未开放），并派人送曹、章各五万元，“一为盖房，一为养伤”。[10]但是，曹汝霖等完全是听命于段祺瑞的。段慰问曹说：“这次的事，他们本是对我，竟连累了你们，我很不安。”徐世昌派人送来五万元的事，也立即向段报告了，但段回答：“还了他，我们不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曹按段说的立即将款退回。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反动派之间确实是充满了矛盾。

对于被捕的 32 名学生，反动的司法、宪警当局也是意见不一的。当学生被捕至密厅后，诸要人即在密厅中开一紧急会议。列席会议的有司法总长朱深、交通次长曾毓隽、大理院院长姚震、李统领、吴总监、宪兵陈总司令（兴亚）会商处置学生方法，众议不一，有主张最激烈者，要立送交大理院

审查主使，看有什么行动，非从严惩办不可。这时有人以两种例证告诉吴总监，日本国务总理桂太郎被殴及民国五年公民团扰乱议院事，都没有移交至法庭，今天发生的事应该用同种办法。吴即采纳了这个意见，将学生拘押在了警厅。

注释：

①④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94页，第307页。

②蔡晓舟、杨景工：《五四》，《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54页。

③北京《晨报》，1919年5月6日。

⑤《山东问题》，《每周评论》，1919年5月21日。

⑥《五四运动爱国资料》，第300~301页。

⑦《五四爱国运动》上，第293页。

⑧⑨《青岛潮》，《五四爱国运动》上，第170页，第168页。

⑩《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5页。

5 月 5 日的总罢课

5 月 4 日晚，在北洋政府密谋对策的同时，北京各校学生也在开会，讨论如何营救被捕同学和继续坚持斗争的问题。

蔡元培当晚参加了北大的学生大会，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表示同情，并说要负责营救被捕的学生，但他劝告学生不要再继续开会，而应照常上课。愤激的学生们没有采纳停止活动、照常上课的意见，而认为应该实行罢课，并进一步组织起来。有的学生还表示，应该用集体“自首”的办法来营救被捕同学。当晚，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宣告成立。有成百的学生纷纷参加干事会，他们分别担负起总务、文书、交际、会计、庶务、纠察、讲演等各股的事务。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很多都是干事会中的积极分子。如邓中夏、黄日葵等都参加了文书股的工作。当时的文书股，负责编辑《五七》小报，是个宣传机构。

5 月 5 日上午，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召开会议，决议自即日起一律罢课，并通电各方面，请求支援。学生们宣布罢课的理由说：“各校学生既痛外交之失败，复愤同学之被拘，更有何心研究学问？此罢课之第一理由也。青岛问题当以死力争，被拘同学亟宜营救，全体奔走，日无暇晷，学虽至宝，势难兼顾，此罢课之理由二也。”[①]学生们在罢课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如下要求：直电巴黎和会，不承认“二十一条”，将山东、青岛直接归还中国；致电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立免曹章诸贼之职，以正其卖国之罪”。罢课学生表示：“国权一日不复，国贼一日不去，吾辈之初志一日不渝。”并呼吁社会各界与学生“一致联合”，齐心协力地去“外争国权，内除国贼”。[②]

同日下午三时，各校的学生又在北大法科召开了全体联合大会，有 3 000 人参加。北大学生干事会负责人段锡朋主持会议，传达了上午会议的情况，并报告了关于营救被捕同学的办法，以及怎么样坚持罢免曹、章、陆等卖国贼的要求。从会议上，学生们知道了他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社会各

界爱国人士都同情和支持他们的爱国要求。5 月 4 日晚，地处西郊的清华大学得到城内学生举行反帝爱国游行的消息，校园内顿时沸腾起来。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连夜抄写了岳飞的《满江红》词，贴在学生饭厅门口，激励同学们为保卫主权、收复失地而奋斗。5 日下午，他们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了联合大会，并在会议上发言说："清华僻处西郊，（昨日）未及进城，但今已全校决议与各校取一致行动，自今日起一律罢课"。[③]在会上，许多学生代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警官学校一个学生代表血书"杀卖国贼"四个大字，悬挂在会场上，以表示爱国的决心。为了筹集活动经费，许多学生踊跃捐献，当场已达数千元。

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学生罢课刚开始就筹备建立自己的组织——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5 月 5 日召开的各校学生联合会上，在决定总罢课的同时，就曾讨论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问题，并委托北京大学和北京高师负责起草组织大纲。第二天，各校学生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组织大纲，宣布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组织大纲规定：（一）学生联合会分为评议、干事两部。评议部负责议决一切进行事件，干事部负责执行评议部所议决的一切议案；（二）评议部评议员的产生以学校为标准，即使说不论学校人数多少，每个学校只允许出两名评议员，而干事部则专门委托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代理。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会址设在马神庙北京大学第二院（理科）。

以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校长团，虽不赞成学生罢课的行动，但对学生的爱国热忱深表同情，并积极参加营救被捕学生的活动。5 月 5 日下午，14 所专门以上学校的校长在北大开会，讨论如何营救被捕学生问题。大家一致认为，这次事件是多数市民的运动，不能让被拘捕的少数学生负责，如果说这次运动为学校运动，则应该由各学校校长负责。会议推选北大校长蔡元培、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农业专门学校校长余邦正、工业专门学校校长洪镕、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中国大学校长姚憾等为代表，负责与北洋政府交涉。代表们先到警察厅，警察总监吴炳湘推托说："此次捕人系出院令，若欲释放仍须院令。"[④]代表们又到教育部，因教育部长傅增湘提出辞呈，部中无人负责。无奈，他们再到北洋政府国务院和总统府，但是国务总理钱能训和总统徐世昌都托辞不见，结果只能返回。

学生被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各地。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学生和社会各界纷纷发出通电，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强烈要求北京

政府迅速释放被捕学生。天津北洋大学全体学生5月6日给北京学生的电报说："惩贼有勇，极表赞同，以后共同进行。"[⑤]上海复旦大学等33所院校5月6日给北洋政府的电报说："北京学生5月4日的爱国行动是'迫于义愤，情有可原'，对'警厅拘捕学生32人，欲加死罪，兴此大狱，重情愤慨'，应速将被捕学生释放。"[⑥]北京的社会名流汪大燮、王宠惠、林长民等都以个人名义纷纷致电警察总监，保释被捕学生。甚至有的安福系国会议员，也为此事表示要对政府提出弹劾。

必须指出，在这些要求释放学生的人士中，绝大多数人是站在爱国立场上的，是真正同情学生，反对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但也有的人怕学生再闹出更激烈的行动，弄的局面不可收拾。如当时国会议员的质问书中，便这样提出问题"若必将逮捕少数学生，按寻常违法治罪，则恐惹起绝大风潮而后患将不堪设想"；"原情宽宥以息乱端"；"为息事宁人计，必有适当措置，然后可以弥患于无形。"[⑦]

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在给徐世昌、钱能训等的电报中，要求对被捕学生"即行释放"，"否则全国暴动，更难收拾"。[⑧]

"五四"之后，北京全体学生罢课，全国各界人士的声援，使反动派感到有所畏惧。而且"五七"即将来临，学生们要是闹出什么"乱子"，真是"不堪设想"的。在这种形势下，北洋政府不得不考虑释放学生了。警察总监曾告诉总统说："必须将学生释放，若是总统一定不放，北京的秩序如果紊乱，我可不负责任，并且我即刻辞职，请总统再另简贤能。"随后吴炳湘又把学生如何筹划，商界如何愤激，一般公民如何激烈，在野诸政客如何不平，一样一样的说个不停。徐世昌一听知道要真下命令（即送法庭惩办学生），恐怕会出别的乱子，所以不顾曹、章的面子，当时也就答应了吴的建议。

六日晚间，吴炳湘向蔡元培等提出在实现两个条件下释放被捕学生。两个条件是：（一）明日（七日）不许学生参加群众大会；（二）各校在明日一律复课。蔡元培等当即完全答应了这两个条件。

在蔡元培等的劝说下，5月7日各校学生一律复课。同日上午，各校被逮捕的学生被释返校。当人们去迎接的时候，被捕的学生认为，"我学生多拘一天，则国民多一次刺激，甚至我三十二人被杀，其刺激甚大，坚不肯出。"后来，"经同学再三劝慰，始各返校。"[⑨]蔡元培和北京大学的全体学生，在汉花园文科新校舍（即红楼）前，迎接了被捕的北大同学返校。被

捕学生许德珩回忆说："汉花园红楼北面的广场里放了五张方桌，北京大学全体学生都在广场上等候着我们的归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借来了三辆小汽车，我们就是坐着这三辆小汽车回来的。我们被捕的同学都站在方桌上和同学见面，蔡校长也在场。大家的情绪都万分激动，被捕的同学没有一人说话，蔡校长讲了几句安慰和勉励的话，大家都激动得热泪交流。"⑩

在北京高等师范，一位当时的被捕者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时回忆说："我们北京高师被捕的学生共有八人，五月七日由警察厅派两辆车于送我们回校。刚到校门口，就被欢迎的同学和邻近的居民围住。我们一下车，就给戴上大红花，把我们一个个抬起来，高高举起，并为我们拍摄了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我一直珍藏到现在）。群众的爱国热情倾注在我们被捕获释者的身上。我们能获释返校，这是群众的力量，这是全国人民的胜利，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终生难忘。当时的情景，到今虽已整整六十年，但仍历历在目。"⑪

事后，同学们了解到，被捕的人在监禁中的表现，都是很不错的。他们被捕以后，先是监禁在步军统领衙门（地址在前门里公安街，当年叫户部街），32 人挤在一个极为肮脏的监房内，室内放着小便木桶，满屋臭味。第二天，他们又被绑着，用板车送到了京师警厅，32 人住在一个大房间里，室内仍然放着两个大尿桶，空气非常恶劣。在警厅，同学们一个一个地被传讯，时间长短不同，但都被追问的问题一个是：谁是指使人。但审问者没能达到目的，因为被审问者都回答说：自己就是自己的指使人。

这次总罢课胜利了，使被捕学生得以释放。这次胜利是广大学生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奋斗的结果，是反动派镇压爱国运动的失败。

被捕的学生们虽然获释了，但 5 月 7 日这一天，却平静的过去了。北洋政府严禁国民外交协会原订于 5 月 7 日在中央公园的国民大会的召开。警察总监吴炳湘认为这个大会与"地方治安关系极大"，经呈请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钱能训同意，5 月 6 日发出布告，禁止召开这次大会。他在布告中向市民宣布："本月七日中央公园并无国民外交协会开会之事"，告诫大家"是日幸勿前往"，并威胁说："届时由厅饬警在天安门一带指挥弹压。"⑫这天上午，中央公园的门被封锁了。天安门左右两三里间的交通断绝了，南至中华门，东西至两个三座门，都被两千多巡警、几百马队、几百步队布满了。四周汇集来开会的群众，都被驱散了。"然而在道旁和中央公园门前，十点钟以前集合的人还能集合演说，不久便为马队冲散。有的往农场，有的往商

会，又都被军警解散。”[13]最后，由各界推出代表二百余人，改在国民外交协会开会，最后通过了四项决议：“一、宣布取消民国四年五月七日‘二十一条’；二、胶州、青岛应由德国直接交还我国；三、胶济及顺济、高徐铁路换文，认为无效；四、巴黎和会如不容我主张，我专使不得签约。并决定下星期日仍开大会，一致对外。万一政府再行禁止，即当改于山东、南京等处联合各省，特开国民大会，务达对外目的。”[14]

5 月 7 日这一天虽然没取得多大成果，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却一点没有丝毫冷却，他们的爱国活动也丝毫没有停止。例如，在 5 月 7 日的当晚，高师的学生们便开会发起建立各界联合抵制日货的组织。许德珩在回忆中说：“五月七日返校的当天晚上，我们高师学生会评议部就召集评议员开会。参加开会的评议员陈我外，回忆出来的还有董鲁安（于力）、熊梦飞和匡互生三人。在这次会上，建议组织成立北京各界抵制日货联合委员会，我被选派为高师代表去参加这个会。后来，我被推选为全国各界抵制日货联合会主席，委员会内还有北大代表李光宇及女高师代表朱光玉。委员会向全国各界宣传抵制日货，即：不买日本货，不用日本货，不卖日本货。并动员中学生制作一些家常日用品如手巾、儿童衣帽等等代替日本货，送往商店销售。全国各界都支持这个运动……。”[15]

远在西北郊的清华大学学生虽然没能在 5 月 7 日进城开会，但在 5 月 9 日于校内体育馆举行了“国耻纪念会”，会上决议通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要求拒绝签字。全体同学庄严宣誓：“口血未干，丹诚难泯，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校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此誓。”[16]会后，同学们当即在大操场上焚烧了校内的日货。

注释：

①蔡晓舟、杨景工：《五四》，《五四爱国运动》上，第 457 页。

②北京《晨报》，1919 年 5 月 7 日。

③④蔡晓舟、杨景工：《五四》，《五四爱国运动》上，第 458 页。

⑤天津《天益报》，1919 年 5 月 6 日。

⑥《申报》，1919 年 5 月 7 日。

⑦《近代史资料》，1955 年第 2 期，第 56 页。

⑧《申报》，1919 年 5 月 8 日。

⑨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5月17日。

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五四运动会议录》（续），第56～57页。

⑪《会议我在五四运动的战斗行列里》，《五四运动会议录》（续），第94页。

⑫《京师警察厅布告第四十九号》（1919年5月6日），北京大学档案室藏。

⑬《每周评论》第21号，1915年5月11日。

⑭《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7页。

⑮《会议我在五四运动的战斗行列里》，《五四运动会议录》（续），第94页。

⑯《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1921年4月28日。

蔡元培的出走与挽蔡斗争

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不满，远不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对北大的改革，就曾受到反动势力的记恨和攻击。蔡元培在1917年1月到北大，立即开始了改革这坐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他广招具有革新思想、又有真才实学的人来充实教师队伍，淘汰那些腐败守旧分子。并坚持“兼容并包”的方针，提倡和培养思想自由、学术研究的空气。不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里，持之有故，……而悉听其自由发展”,①这就保护和促进了新思潮的传播。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不是偶然的，与蔡元培的这些改革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反动派对蔡元培是相当的不满。五四爱国运动，北京大学又是主要的发动者和主力军，而蔡元培对学生的爱国运动深表同情和支持，积极营救被捕学生。因此，蔡元培校长就成了反动派攻击的主要目标。“于是北京学生一万五千人所为之事，乃加罪于北大之一校，北大一校之罪加之于蔡校长之一身。”②

在5月4日当晚的内阁紧急会议上，反动派即深责教育部门，并集中攻击北京大学和蔡元培，教育总长傅增湘曾为蔡略加解释，便遭到内阁总理钱能训的责问；“汝谓蔡鹤卿（即蔡元培）校长地位不能动摇，假若蔡死则何如?”③傅增湘因而于5月6日便提出了辞呈。

在5月8日，总统徐世昌给教育部一道密令，令中引用警察总监吴炳湘对于“五四事件”的报告，并且指出虽然32名被捕学生当时已被保释，但是仍将受到法庭的制裁和惩罚。同时又说明学生的本分是读书，年纪太轻，不应“干涉政治”。令文如下：

“据内务总长钱能训转据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呈称：本月4日，有北京大学等13校学生约3 000余名，手持白旗，陆续到天安门前齐集，议定列队游行，先至东交民巷西口，经使馆巡捕拦阻，遂至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持砖乱掷，执木殴人，兵警拦阻，均置不理，嗣将临街后宙击破，蜂拥

而入。砸毁杂物，燃烧窗户，并殴击保安队兵，致有重伤。驻日公使章宗祥被其攒殴，伤势尤重。经当场拿获滋事学生多名，由厅预审，送交法庭讯办等语。学校之设，所以培养人才，为国家异日之用。在校各生，方在青年，质性未定，自当专心学业，岂宜干涉政治，扰及公安。所有当场逮捕滋事人，既由该厅送交法庭，宜即由法庭依法办理。至京师为首善之区，各校学风，亟应力求整饬。着该部查明此次滋事确情，呈候核办；并随时认真督察，切实牖导，务使各串训诫，勉为成材，毋负国家作育英豪之意，此令。”④

总统不但在命令里要严厉惩罚学生，而且指令里暗含拒绝接受曹汝霖和陆宗舆的辞职。盛赞曹汝霖体国公诚，陆宗舆有裨大局。此举当然使得新知识分子和民众觉得不能容忍。此外，这道总统命令中的最后一段很清楚的暗示他要教育总长和所有学校的教师对“五四事件”负大部分的责任。事实上教育总长和各大专学校校长自“五四事件”起都被军阀和旧官僚所严厉抨击。

于是曹汝霖、章宗祥行将报复之说四起，有的说他们“一方面以三百万金购人刺蔡，一方面派人焚北大校合，杀北大学生。”⑤有的人还说徐树铮已经调来了军队，在景山上架起了大炮，准备轰击北京大学。这些传说，很可能都是谣言，但它并不违反逻辑的。而且，在许多传说中，有一条确是事实，即内定要更换蔡元培的校长职务。“某派即提出马其昶（亲安福系的桐城派文人）为北京大学校长，已得当局同意。”⑥

在这种形势下，蔡元培知悉总统5月8日的命令后，当天晚上11时又收到他被解职，而由马其昶接替的通知。便准备了向北京政府的辞呈。辞呈说：“元培滥膺校席以来，不称厥职，久图引退。此次大学校学生，因爱国之故，激而为骚扰之举动，元培实施其咎。唯因当场学生被枫不能归罪于少数，未即引咎。目下学生业经保释，各校亦已一律上课，元培不敢尸位，谨请辞职以避贤路”。⑦

蔡元培辞职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在后来解释这一行动时说：“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宣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转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⑧

蔡元培于5月9日晨5时半，悄然离京去了天津，不久离天津，乘津浦

车南下。蔡辞职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要离京呢？后来，他在天津答友人问时解开了这个迷。他说："八日午后，有一平日甚有交谊而与政府接近之人又致一警告谓：君何以尚不出京？岂不闻焚烧大学、暗杀校长等消息乎？我曰：诚闻之，然我以为此等不过反对党恫吓之词，可置之不理也。其人曰：不然，君不去，将大不利于学生。在政府方面，以为君一去，则学生实无能为，故此时以去君为第一义。君不闻此案已送检察厅，明日即传讯乎？彼等决定，如君不去，则将严办此等学生，以陷君于极痛心之境，终不能不去。如君早去，则彼等料学生当无能为，将表示宽大之意敷衍之，或者不复追究也。我闻此语大有理。好在辞呈早已预备故即是晚分头送去，而明晨速即商标以保全此等无辜之学生。"⑨

以上可以看出，从蔡元培这方面来说，显然是为了保护学生才秘密出走的。

蔡在临行前还给北大师生留了一封颇为令人费解的信："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迄可少休。'我愿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唯知我者谅之。"⑩

"杀君马者道旁儿"，这是什么意思？学生们不能理解。5 月 10 日，一位北大的文科教授向学生们指出了这个典故的出处和含义："'杀君马者道旁儿'《风俗通》曰，杀君马者道旁儿也。言长吏养马肥而希出，路旁小儿观之，却惊致死。按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⑪蔡元培引用这个典故的意思，显然是说，同学们不要再挽留我了，让我走吧，不然，我会积老致死的。同学们虽然是爱护我，其结果反倒害了我。

为避免学生误解，5 月 10 日他给北大学生写了另一封信，明确地解释自己出走的原因。全文是："北京大学同学诸君鉴：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五日即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今幸承教育总长、警察总监之主持，及他校长之援助，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至一面提出辞呈，一面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虚套，而促继任者之早于发表，无他意也。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去留，决无妨于校

务。唯恐诸君或不见谅，以为仆之去职，有不满意于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急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12]

这封信充分反映了蔡元培对五四运动的矛盾心情，学生行动是爱国的举动，他是同情和支持的，但学生的职责应该是读书，5 月 4 日的行动“越轨”了，自己是校长就应该负责。由于对学生的同情，积极营救被捕学生；由于认为学生运动越轨，又“引咎辞职”。这种矛盾，生动地说明了这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的特性。

蔡元培提倡和保护新思潮，同情和支持五四运动，并积极地营救被捕学生，在当时受到了广大师生的尊敬。所以，广大师生坚决要求蔡元培回校，拒绝北京政府另派校长。在当时它的主要意义不仅在于蔡个人的去留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要明辨是非，分清功劳罪过，维护五四运动的正义性质。也就是说，正义的一边是广大学生和蔡元培校长，而错了的是反动派北洋政府。蔡的辞职和出走，对他个人来说，是一种消极的行动。但是，这一消极行动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社会积极效果。

当9 日蔡元培出走后不久，载有“杀君马者道旁儿”的那封信，便让北大学生油印出来，在北京各校学生中广为散发。蔡被逼走的消息，不仅震动了北京大学，也震动了北京教育界，广大师生迅速掀起了挽留蔡元培校长的斗争。

各校学生纷纷召集代表会议，讨论向政府斗争的办法。北大学生，以全校学生的名义致函北洋政府教育部：“生等闻知，不胜惶恐”，“若令校长得留，则生等虽去校之日，犹怀补过之思，否则非惟贻教育前途以莫大之危险，且恐激起全国舆情之非难”，[13]同时上书教育部并面见教育总长傅增湘，要求明令挽留蔡元培并立即采取措施，提出：（一）请总统特下命令挽留；（二）派司长赴津劝驾；（三）由学生方面通电全国陈述一切。对前两项，傅增湘答应办理，后一项北大学生径直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要求支援。他们在通电中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受外界胁迫辞职他去，请一致挽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辞职离京，群情惶惑，恐酿大变，务乞各界重察。”[14]当日晚八时，北大教职员召开大会，专门讨论挽留蔡元培问题。会议推选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康宝忠、徐宝璜、王星拱、沈士远等为代表，面见教育总长傅增湘，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傅答复得比较明确，但表示不能代表总统和总理。于是，教职员作出了：“如蔡不留，即一致总辞职”的决议。5 月 10 日下午，北京专门以上 12 所学校教职员于北大召开联

席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蔡元培的去留关系着教育和外交的前途，要去北京政府务必挽留。5 月 11 日，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正式成立，会议期间各校教职员一致签名要求挽蔡。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致函教育部，指出："此次学生行动，纯属全体公意，出自至诚，责无旁贷"，"既属生等全体行动，与各校校长绝不相关，尤非北京大学校长一人所能代任其咎。且蔡校长德高望重，海内宗风，自其入长大学，招致贤哲，成绩斐然"，要求北洋政府"俯顺众情，对于北京大学校长辞职，勿予批准；并迅下明令，切实慰留。"[15]12 日，反动政府仍无明确表示，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于是推举出 9 名代表去面见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钱能训，要求挽蔡。13 日，北京各校校长为力争挽蔡，一致提出辞呈。有的校长当日就离京去了天津，以表示与蔡元培共去留的决心。同日晚，北京大学评议会和教授会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挽蔡，会后发布的联合布告中说："本校教职员及学生全体，以蔡校长因学生救国义举致受奸人逼迫而去，其一身之去留，不独关系大学前途，实为全国人心民气所系属"，"五六日以来，蔡校长之踪迹杳然，而政府之挽留之指令未下。是以本校群情愤激，有单独罢课之议。同学诸君爱国爱校长之热诚，当为国人所同谅。"[16]全国各地要求挽留蔡校长的电报，也纷至沓来。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要求北京政府"自今日始，于一星期内，作正当明确之表示，维持蔡校长之地位，与大学之尊严。"并严正指出："若满一星期，犹无满意之表示，则誓筹最后之对付。"[17]

在广大师生们的团结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当 13 日各校教职员联合会的 9 名代表向政府询问时，政府不得不表示让步了。5 月 14 日，徐世昌以大总统的名义下达了要挽留蔡元培的命令。

在政府的让步下，北京的一些学校校长开始复职了。5 月 16 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工业专门学校校长洪镕、农业专门学校校长余邦正等联合通电蔡元培，劝其千万不要坚决辞职。电文中说："公去留关系极大，万勿坚辞，为吾道留一生机，泉等现以时局艰难，暂出维持现状，仍视公为去留。"[18]蔡元培到了上海，又由上海到了杭州。徐世昌的挽留令下达后，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也去电通知蔡元培，并派代表赴杭州面邀蔡回北京。学生联合会也派了代表一同去了杭州。

蔡元培在得电后，即刻复电回京。复电的全文是："大总统、总理、教育总长钧鉴：奉大总统指令慰留，不胜愧悚。学生举动，踰越常轨，元培当任其咎。政府果曲谅学生爱国愚诚，宽其既往，以慰舆情，元培亦何敢不勉

任维持，共图补救。谨陈下悃，伫候明示——元培。”[19]

蔡的电文说得很清楚，他复职的前提是政府“曲谅学生爱国愚诚，宽其既往”。但反动的北洋政府却毫无诚意，一面挽留蔡元培，也同时挽留曹、章、陆。一面又连续下达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后来，在校内广大师生的一再恳请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劝说下，蔡元培在7月9日复电给全国学联、北京学联和北大学生干事部的电文中才表示愿放弃辞职，重回北大。于1919年9月蔡元培终于由杭州返回北京，再次出任北大校长。

注释：

①《致公言报并附答林琴南君函》，《蔡元培选集》，第79页。

②⑤蔡晓舟、杨景工：《五四》，《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60页。

③北京《晨报》，1919年5月10日。

④《字林西报周刊》，1919年5月17日，第411页。

⑥《青岛潮》，《五四爱国运动》上，第171页。

⑦《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选集》，第292页。

⑧《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464页。

⑨北京《晨报》，1919年5月13日。

⑩《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17日。

⑪《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下册，第335～336页。

⑫⑭《五四爱国运动》上，第174页，第462页。

⑬⑮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5月13日。

⑯《评议会、教授会联合会布告》，载于《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1919年5月13日。

⑰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5月15日。

⑱⑲《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36页，第238页。

5 月 19 日的总罢课

如前所述，北洋政府在被迫的情况下，下达了挽留蔡元培的命令。同时，也发表了挽留曹、章、陆等卖国贼的命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就在发布上述命令的同一天，北洋政府又连续下达了恐吓和镇压爱国学生的指令。在北京，他们责成京畿警备总司令、步军统领、京师警察厅总监等要认真防护，“遇到纠众滋事不服弹压者，仍遵照前令，依法逮惩”；在外地，则责成各省督军、省长、都统负责镇压群众爱国运动。还命令教育部和教育厅长，切实约束京内外各校学生，使其“安心向学，毋得干预政治”，并说：“其有不率训诫，纠众滋事者，查明斥退。”[①]所有这些使广大学生们更加认清了反动政府的本质，从而进一步激起了他们的斗志。

教育总长傅增湘对蔡元培一直深表同情。蔡被迫出走后，他还曾派员赴津挽留。5 月 15 日，傅增湘被明令免职，而由教育次长袁希涛暂行代理职务。

5 月 16 日，安福系政客们在太平湖安福俱乐部总部召开会议，企图乘机垄断教育大权。他们在讨论教育总长人选时说：“有人报告由该党首领与政府交涉之结果，已提出该派重要人物田应璜，众皆欣然喜其势力从此复伸于教育界，当时并有人大呼云：自有会议以来无如今日之痛快者。田应璜长教育既决定，复决以黄云鹏或吴文瀚为次长，于是教育部之各司长及其所辖之各校校长皆有所拟议。且有北大教员胡钧者，湖北某县人，新国会开幕之始即卖身于某派，当五四事件发生后，乃首趋曹章之前慰问，并痛訾学生之无礼。北大学生闻之，力绘极秽亵之讽刺画张贴各宿舍中，见者莫不指其善舐之长舌以为笑，至是某派宜欲以此人继蔡任接办北大。”[②]

安福系政客们想窃夺教育大权的活动，不仅激怒了广大的青年学生们，而且也使教师们认为这简直是教育界的奇耻大辱。

5 月 18 日，北京学界五千多人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隆重举行了郭钦光的追悼大会。郭钦光（广东文昌县人），是一个舍生忘死、不畏强权的

爱国青年。还在广州就读初级师范时，“与人抵掌谈国事，辄奋眦欲裂，唏嘘终日。”1915年5月7日，日本向我提出“二十一条”后，粤督秉承袁世凯旨意，禁止人民集会结社。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袁世凯的卖国行径，郭钦光不顾反动当局的禁令，与同学们一起在东园召开了国耻大会。登坛演说，直到呕血。1916年夏毕业于师范。1917年北上就学于北京大学文预科，更加关心国家的危亡。5月4日游行的那天，因他患有肺病，同学们都劝他不要参加，但他仍执意不肯，积极参加。“奋袂先行，见当局下逮捕学生之令，愤然大痛，呕血盈斗。至法国医院，已有不起之势。临危之际，他犹关心国家大事，痛恨反动政府对学生之镇压，他不断叹息说；“国家濒危政府犹以狮子搏兔之力，以压一线垂尽之民气；日政府待我留学诸君之事，不图乃见于生斯长斯之祖国，事可知矣。”③

这是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死去的第一位爱国志士，因而引起大家的沉痛哀悼。追悼大会上悬挂着北京内外各界送来的三千多幅挽联，郭的遗像两旁，书有“力争青岛，死重泰山”八个大字。激昂悲壮的气氛笼罩着会场。到会的五千多人中，有很多妇女代表参加，北京女子师范及汇文、协和等女校均派有代表到会。许多人包括北大学生代表、留日学生总会代表、长辛店十人团代表、妇女代表等都发表了演说。首先发表演说的是北大学生代表许德珩，他说：“今日追悼郭君，实无异追悼我们自己。因郭君未了之事业，全凭我们继行其志，做到他现在的地位，方肯罢休。”④当最后一位演说的妇女代表在台上声泪俱下时，所有与会者都放声痛哭，泣不成声。此时，数百名与会者当场将自己戴的东洋草帽扯碎，以示抵制日货的决心。

为郭钦光举行的郭钦光追悼会，进一步激发了学生们的斗志，为行将举行的总罢课起了动员作用。

5月19日，总罢课开始。参加罢课的，除北京中大专院校学生外，还有许多中等学校的学生，共计25 000多学生。学生们在以“北京学生联合会全体学生”名义发给“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工会、各学校、各团体、各报馆”的《罢课宣言》中宣布：

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等以此呼吁我政府而号召我国民，盖亦数矣，而未尝有纤微之效，又增其咎。夫青岛问题，学生等集急之焦点，会议已决矣，事频败矣，卒未见政府有决心不签字之表示，而又破裂南北和议以资敌。学生等之失望，一

也。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国人皆曰可杀，乃政府不惟置舆论之指击于不顾，而于其要挟求去，反宠令慰留，表彰其功德，以与教育总长傅公之免职相况；外间复盛传教育全局举将反动之说。国是前途何堪设想！学生等之失望，二也。五月十四日两令：一则以军威警备学生，防公众集合；一则禁学生干政。凡公忠爱国之天良，一切不容表见。留日学生以国事被拘，政府则置之不理。学生等之失望，三也。学生等之为学，恃有此方寸之地耳；今一朝而三失望，方寸乱矣。瑾于五月十九日起，一律罢课。至三失望之回复为止。至于罢课期内，仍本我函（十四日）电宣言之大纲，始终无悖。一则组成“北京护鲁学生义勇队”，以备我国家不时之需，再则推行各校平民教育讲演团，使国人皆知以国家为重；三则由各校组十人团力维秩序，以纾我国家内况之忧；四则以暇时潜心经济，俾勿负我国家树人之意。学生等深受教育，修养有素，凡所作为，皆循我智任勇之国风，决不致自逸轨道，而遗我国史之羞也。学生等一任良能，行为良知，知我罪我，今非所计，惟付诸百世之公评而已。[⑤]

同时，北京学生联合会上书总统徐世昌提出六点要求：（一）巴黎和会上有关山东交涉的和约决不可签字，以固国土；（二）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以除国贼；（三）挽留傅总长，蔡校长，打消田长教育之议，以维教育；（四）政府应撤销对学生作猛烈压力的措施，以维人权；（五）向日本抗议，释放被捕学生，重惩日警，以重国权；（六）在上海重开自5月15口暂停的南北和议，速谋国内统一，以期一致对外。[⑥]学联会强烈表示、除非他们的要求政府都接受，否则学生将继续罢课。

5月21日上午，北京大学教职员，在法科大礼堂开全体大会，一致表决，誓不承认田应璜一流为教育总长，吴文瀚一流为教育次长。他们还拟好了一个意见书，偕同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代表，赴国务院面见总理钱能训，声明此等决议。“而学生方面，闻又宣言向两院及政府要求取消前议；若田等贸然登台，则学生拟有以对待之云。”[⑦]

学生的要求，经教职员联合会的代表转递北京政府。钱能训当即逐项作了回答：“（一）不签字问题，若由政府明白宣布，实于邦交有碍；但必审慎进行，期无负于国人。（二）惩办卖国贼问题，以为其必根据法律重证

据，学生如能得其卖国证据，政府自当依法惩办；如徒凭空言，政府不能办到。（三）打消田长教育及挽回傅蔡问题，田消蔡回，均已可靠；惟傅去志坚决，政府无法强留。（四）收回警备令问题，警备令本为保卫地方治安，并未以之干涉学生，虽有若无。（五）留日学生被逮问题，政府已电询江监督，言已完全释放。（六）维持和议问题，南北和议，虽现决裂之象，但北大代表必不撤回。”⑧当教职员联合会的代表向学生联合会传达了钱能训的答复后，学生们极不满意，特别是对第二项的答复感到十分愤慨。因此，学生继续罢课。

面对这种形势，北京政府极为恐慌。22 日下午，代理部务的教育次长袁希涛来到北京大学，召开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企图通过他们迫使学生复课。结果，除几个私立学校校长到会外，所有公立学校校长因早已提出辞呈而拒绝参会。袁希涛只好对私立学校校长和各校出席学联会议的学生代表讲话，动员学生立刻复课，说：“中国教育基础之危险，万不可使其再陷于动摇之地位”，劝学生要“以顾全大局保持国家元气为重”。学生则不为之所动。“仍坚持非惩办卖国贼之目达到，决不上课”。⑨袁希涛的目的没有达到，回去后即提出了辞呈。

学生们在总罢课期间，大规模地展开了各项爱国活动。

第一、组织“十人团”，广泛的开展演讲活动。“五四”游行前，北京大学的学生为了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的自觉心。成立了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五四”后不久，北大、高师、清华等学校学生，普遍建立起组织演讲团，分段分组开展讲演活动，每组十人左右，称为“十人团”。人烟周密的商业区、游览区和庙会，是他们经常活动的场所。他们讲演题目比以前更结合当前的斗争，讲题中包括有“青岛问题”、“爱国”、“争回青岛”、“痛史”、“团体”、“国民自觉”、“中国现在的形势是怎么样”、“青岛交涉失败的原因”、“山东全国之关系”、“青岛关系我国之将来”、“国民快醒”等等。这对促进群众的觉悟和爱国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虽然反动派从一开始就进行干涉和阻挠，但学生们讲演团的规模和影响却越来越大。19 日总罢课当天，分道讲演的约三四百人，20 日，增至六七百人，21 日，又增至 1 000 多人。学生讲演团的活动，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每当学生演讲是，群众都踊跃参与。学生讲到痛切处，听众深受感动，有时甚至痛苦淋漓。许多群众主动给讲演的学生送茶送水，热情支持。有些前来干涉的警察，听到学生们的演说后，也深受感动，就不在阻止学生。学生们的演说活

动，没有局限在北京城内，他们还派出代表到长辛店和保定等地去讲演，甚至在京奉铁路的旅客列车上，也都留下了北京讲演学生的足迹。

第二、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五四运动所反对的帝国主义侵略者，主要是日本和卖国贼，所以排斥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也是爱国的一项重要内容。5月9日，清华大学在校内体育馆召开完国耻纪念会后，当即在大操场焚烧了校内的日货。5月13日，北京大学的学生将该校学生消费社储存的日货，集中于文科大操场中焚毁，当场宣读和散发了有关抵制日货的宣言传单。5月18日下午4时，北京许多学校的学生又将个人所有之日货汇集于先农坛进行焚毁。"既至先农坛，天忽下雨，观者仍颇踊跃，有数百余人之多。当焚毁日货时，有大学演讲团，及北京师范附属小学第二部童子军张宁全（年十四岁）、龚渤（十二岁）、卢荣祥（十五岁）三人，及公立第二小学学生卢荣福，相继演说，言辞均极动人。综计此次焚毁日货学校，有北京大学、汇文大学、第四中学、工业专门学校。其他法政专门，因天雨，改在该校校门前举行。"[10]

学生们的爱国行动，也在影响着商界。5月20日，北京商会开全体大会，50多个行业到会，共同议决：一、各行业速开会议，宣示各商行，一律停止贩运日货，违者从重议罚；二、不使用日钞；三、不阅日人在京所办报纸《顺天时报》，不在该报登广告。大会当场宣布成立国货维持会，附属于总商会，各商董均为会员。商界的这次大会，在实际中迅速产生了效果，各店贩运日货一律停止，日本人所开商铺也无人问津，日货价格迅速下跌。各店均拒绝收用日钞。《顺天时报》的销量也大大减少。

5月24日，北京学界和商界在北京大学联合召开了国货维持会，北京高师，发文专修馆、清华大学、汇文大学等都参加了会议。该会内分文书组、调查组、贩卖组，并计划设立国货陈列所和国货贩卖所。

第三、发行日刊，扩大爱国宣传。学生们在罢课后，计划准备出版《五七》、《五四》两种日刊，后因经费困难，就先出版《五七日刊》一种。该刊于5月20日创刊，由北京学生联合会编辑。由于它紧密结合现实，反映人民呼声，"发行之后，车夫工人皆争相传诵，甚至销罄之后，尚纷索不止，至二十二日竟销去万份"。[11]对这样一张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爱国小报，反动派也不容它存在。京师警察厅以该刊没有立案，违背出版法律为由，通令禁止发行。5月22日，北大学生徐骥等四人前往警察厅理喻，却被拘留了。23日，日刊不顾禁令，继续出版，警察厅则派警察四处搜索，

见有阅读者即强行夺走，并将印该刊的文益印刷局封闭。拘押其经理。在这种情况下，诞生不到3天的《五七日刊》只好被迫停刊。5月24日，警察厅总监吴炳湘，还专门为此事发布了布告，说："乃近日风潮愈演愈烈散布传单之不已，进而集众演说，集众演说不已，进而相率罢课，复有一种五七报组织，并不呈报本厅，遽行出版，其中论调偏激，鼓煽为多，长此纷纭，地方治安，将无维持之法。"[12]

警察厅在禁止《五七日刊》出版的同时，还决定了自5月22日晚起，派人监视北京《晨报》、《国民公报》发稿，并进行新闻内容检查。23日，《国民公报》新闻栏有空白两处，稿件被删除。可见，反动派对言论控制之非常紧。

第四，组织护鲁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5月19日，北京学生在《罢课宣言》中宣布："组成北京护鲁学生义勇队，以备我国家不时之需"。总罢课后，许多学校都建立了这个组织，其中"以清华大学创办最佳，该校高等中学全体加入，除请该校军操团团长会同军操教员订定操演枪法战术外，并聘有陆军官授军事学"。[13]在学校里，不少人荷枪佩刀，同学间见面还互行军礼，校园内搭起帐篷，犹如真的军事阵地一般。

注释：

①北京《晨报》，1919年5月15日。

②《五四》，《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63～464页。

③⑧⑩《青岛潮》，《五四爱国运动》上，第186页，第180页，第185页。

④《五四爱国运动》下，第256页。

⑤《五四爱国运动资料》，第52～55页。

⑥⑬蔡晓舟、杨景工：《五四》，《五四爱国运动》上，第64～65页，第466页。

⑦《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65页。

⑨北京《晨报》，1919年5月23日。

⑪《新闻报》，1919年6月3日。

⑫《公言报》，1919年5月26日第3版。

中外反动派对爱国运动的破坏

五四运动自从打响以来，其主要的直接的目标就是反对当时急欲独吞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他们根本不允许中国人民从事反日的爱国运动。因此，日本侵略者在一开始就百般地进行干涉和破坏。

5 月 4 日的爱国运动爆发后不久，日本驻日公使小幡酉吉几次到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警告”，要求取缔中国人民的反日爱国活动，特别是学生的爱国讲演和抵制日货的正义斗争。当学生在街头讲演时，在华之日本浪人则不断进行破坏活动。在东京，日本警察则以野蛮的手段逮捕中国留学生。驻华的日本舰队，频繁调动，纷纷驶向天津、吴淞、山海关、青岛等各埠。驻北京和山东的日本兵和日本浪人，一再进行挑衅活动，妄图制造事端。在北京竟出现了一种咄咄逼人的怪事：驻北京日军的一个排，持枪游行示威，至中南海总统府门前横行而过，而中国守门之陆军不仅不加阻挠，反而向其行礼，日军的骄横简直是达到了顶点。当年中南海总统府大门前有东西于两门，曾写有“车马行人，不准经过”之明白告示，是一般行人不能通过的。因此，日军的这一行径明显违法，侵犯了我国主权。而中国守军之表现，则显得十分媚外，反映了中外反动派之间的不正当关系。

5 月 19 日北京学生总罢课后，日本侵略者的干涉更变本加厉。21 日，日本公使小幡酉吉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严厉责问的紧急照会，要求取缔反日行动和“过激”言论。照会中说：“近来北京方面散布‘胶州亡矣！山东亡矣’等传单，传之于各省各处，实行煽动，排斥日货。此种传单及其他之檄文、宣言等，不能不认为故意曲解、谗诬中伤之行动，本使殊难默视”，“而贵国政府，对于此等荒唐无稽之无政府的主张，阻害友邦国交、挑拨两国国民恶感之言动，并不加以何等之取缔，本使甚为遗憾。苦放任此等风潮，不仅酿成贵国内政上意外之扰乱，且引起两国国家上重大之交涉，深堪忧虑。兹特照请贵国政府，于此时深加考量，速筹适当之处置，是为至盼。”[①]对于日本公使小幡酉吉这样一个蛮横无理的照会，《每周评论》编者

陈独秀曾这样评论说："有一班好说直话的人，以为小小幡酉吉公使的照会，不是对等国的口气，简直是中央政府对于地方长官申饬的命令，未免太不客气了。"

对日一向奴颜婢膝的北洋政府，顺从日本侵略者的旨意，对人民的一切反日爱国运动想方设法地进行破坏和镇压。一些爱国报纸刊物纷纷被封闭。"《五七日刊》和《救国周刊》两种，皆是争青岛问题的，所以皆认为'扰乱治安'了，派了很多警察在各处禁止发卖，并把印刷局封闭了。"'鼓动风潮'的《益世报》，也未幸免，遭到同样的命运。而'奖励学生运动'《晨报》、《国民公报》，则从22日晚上起，由警察厅派人审查后才允许发稿复印。至于被认为是'鼓吹社会革命、无政府、同盟罢工、共产等邪说为宗旨'的《进化》杂志、《民声丛刊》、《工人宝鉴》、《太平》等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印刷品，也都被查禁。"②学生的讲演活动，从一开始就受到军警的阻挠和破坏。"据北京警察厅第一、三、四分所5月21日的5份报告供认，当天至少有10个大中学生讲演团经他们所谓的'劝谕'而被迫停止活动。"③当5月22日上千名学生走上街头，讲演形成高潮时，"政府于是令袁希涛次长到联合会言：如学生能停止讲演，政府必予学生以适当之答复。联合会遂停止讲演。"④

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在争夺中国问题上有矛盾，在五四运动初期，英美的干涉不像日本侵略者那样露骨，特别是美英等国的人民，对爱国运动还表示了一定程度上的同情。但是，当学生的爱国运动不断发展，英美侵略者感到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和统治都受到威胁时，他们的态度就去了相反的方向。5月20日的美国《大陆报》以《列强对华的积极外交政策》为题发表社论说："如果中国某些行政部门不放在外国人手中，交其控制，中国就站立不稳。""中国内部各种关键性事业，均应交由外国人来监督。不如此，中国是没有希望的。"5月21日，各国驻华公使向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会同调查"他们的旅华侨民是否因抵货而受到损失没，如有损失，应予赔偿。到了"六三"以后，当运动的中心转到西方帝国主义的侵华基地上海时，美英侵略者的凶残面目就更加赤裸裸地暴露无遗了。

北京学生演讲团在东城日本兵发生口角互殴，双方数人被警察厅逮捕，日本公使小幡酉吉借口这事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交涉。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取闹"下，中国的反动派北洋政府对日本是唯命是从，按照日本公使的旨意，对爱国运动进行破坏。特别是在北京学生

5月19日总罢课实现后，日本公使的历次责问和东城事件的发生，使北洋政府大为恐慌，“政府诸公群认学生之行动为妨碍邦交。”⑤于是，反动派接连下令压制学生的爱国运动，展开大规模的镇压活动。

5月21日，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指使北京政府撤换了镇压学生运动不力的李长泰。大总统下令以号称“屠夫”的王怀庆继任步军统领，将北京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军警们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变得更加严紧，荷枪实弹的步兵，马队在北京的各街道上，来来往往。学生讲演团的旗帜被夺走，传单被撕毁，听众被驱散。整个首都被恐怖气氛所笼罩。

由于军警的武装镇压，学生们的讲演活动不能在进行下去。于是，学生们只好将自己的活动主要放在贩卖国货上。“自《五七日刊》封禁之后，公园市场里边，就没有卖东西的学生。过了两天，又有许多学生，手拿布袋，有的写‘国货’两个字，有的写‘提倡国货’四个字。每到茶桌前面，先向游人鞠躬，发一种极和蔼的话，劝人买货。所卖的货物，不外牙粉、肥皂、手巾、香水、纸烟类，也有卖《国民》杂志和《国体与青年》的。游客之中，十个人总有八个人买的，照他们说，卖出去的钱专做学校联合会费用。”⑥

5月22日，北京政府内务部关于“严禁学生干预政治训令”中，攻击学生是“激于爱国之诚，而流弊所极，乃至破坏秩序、凌蔑法纪”，甚至污蔑学生是“名为爱国，适为误国”。“训令”责成教育部和各省长：“随时申明告诫，切实约束，其有不率训诫、纠众滋事者，查明斥退。”⑦果然，这天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学生举行会议，反对派政府“军警千余人包围校舍，并用马队冲锋，致负伤者无数。”⑧5月23日，内务部在给京师警察厅的训令中说：“近闻京师地方排日风潮，愈演愈烈，竟有制成泥偶，指作日人，陈列道路，加以种种污辱。又各学校所组织之学校演说团游行街市，所有旗帜及宣言，有指日本为敌国，日人为敌人字样。似此昌言不讳指斥日本，不惟妨害国家友谊，亦且扰乱地方治安。且现闻安徽芜湖地方，并有击毁日人商店，殴打日人情事。万一京师地方亦遇有前项同一事实发生，殊非所以慎重邦交、维持治安之道。”⑨因此，内务部要求北京警察厅严格取缔“排日风潮”。接着，北京警察厅和警备司令部派出了大批军警，禁止学生们的集合、讲演等活动。5月24日，“商学界联合会在北京大学开会，突来武装警察二百多人，包围该校，捕去学生六名。”⑩

5月25日，大总统徐世昌向北京地方及各省下达了一道严厉镇压爱国

学生运动的禁令，其中说："近日京师及外省各地，辄有集众游行、演说、散布传单情事。始因青岛问题，发为激切言论。继则群言泛滥，多轶范围，而不逞之徒，复借端构煽，淆惑人心。于地方治安，关系至巨。……着责成京外该管文武长官剀切晓谕，严密稽察。如再有前项情事，务当悉力制止。其不服制止者，应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京师为首善之区，尤应注重。前已令饬该管长官等认真防弭，著即恪遵办理。倘奉行不力，或有疏虞，职责攸归，不能曲为宽假也。"[11]同一天，北京政府教育部下令，限3日内结束罢课，一律复课。政府同时还制定了三项对付学生的措施：以武力干涉学校的行政管理；解散学生组织；派遣警察到学校去向个别学生施加压力，让他们签署复课的保证，拒绝签署者立即予以开除。北京的教员立即向政府提出抗议，并威胁说，如果政府采取这种强硬的手段，他们就集体辞职。在这种强烈反对之下，北京政府只好对其策略稍作缓和，答应暂时放弃武力干预学校的计划。

北京政府的恫吓和压制未能使学生们屈服。5月26日，北京学生联合会所属的36所学校一致主张把斗争坚持到底，不达到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征祥等的目的，绝不罢休，就是牺牲一切，也在所不辞。5月28日，即限令3日复课期满之日，学生们没有遵命复课。而在北京高师召开临时代表会，一致决定继续坚持罢课，并将自己的行李书籍等物收拾齐整，如果反动派政府悍然解散学校，就全体出校，另谋救国之道路。

反动派政府对学生除了武力镇压之外，还使用了分化手段：

第一，提前一个月给学生放假，以分散学生。这个办法是代理教育总长袁希涛提出来的。五月底，教育部召开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宣布各校自即日起停课，停课以后，即放暑假。毕业班要举行考试的各班，照常举行考试。"凡愿考者，如期与考，其余各班，一律提前放假。"[12]反动派企图以此达到"考者考，回者回"的愿望，使学生运动自然瓦解。

第二，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及外交司法官考试。这是安徽省主席吕调远提出来的。反动派认为，举行这样的人才考试，使广大学生意志转移，把个人重心放在自己的前途上，而不让学生有时间参与学生运动，使学生的这种狂热爱国情自动打消。其并不是真想把一些有能力和有志向的学生吸引到政府里来。吕调远在给其大总统的密电中说："准厉行考试，则学生有途自效，必能狂热潜消。"政府显然很受这种新奇想法的影响，于是"立下明令，令本年实行各种考试，并令铨叙局即日筹备，定九月实行。"[13]

北京政府的这些分化手段，还真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起了作用。当时报载：“各校暗潮又起，数日以来，争持颇烈。北京农业、法政等学校，本年暑假皆有一二班毕业，毕业人数约占各校三分之一，此中分子以切身利害关系，益以父兄师友之相诏，皆极端希望如期毕业，现在罢课风潮稳定，遂向各校长积极怂恿举行考试，于是遂与多数主张罢课者渐渐分携。”⑭

在反动派的镇压和分化下，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一度转入低潮，一部分学生退出了运动。但是，运动并没有也不可能消失，广大的学生仍在坚持着罢课，与反动派斗争着。到6月初，由于反动派的过分行为，学生们新的斗争高潮再次被激发。

注释：

①③⑤⑦⑨⑪《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01~202页，第190~192页，第195~196页，第192~193页，第195~196页，第197页。

②《每周评论》第24号，1919年6月1日。

④⑧《新闻报》，1919年6月3日。

⑥《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

⑩《时报》，1919年5月29日。

⑫⑬⑭《时报》，1919年6月5日。

爱国有罪的镇压：六三大逮捕

反动派北洋政府为了更好的对学生爱国运动进行镇压和破坏，在1919年的6月1日，以大总统的名义接连发布了两道命令：

第一道命令是为国人所痛恨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贼辩护，说什么“曹汝霖迭任外交财政，陆宗舆、章宗祥等先后任驻日公使，各能尽维持补救之力，案牍俱在，无难复按。”[①]很明显是在替曹、章、陆洗刷卖国罪行，为他们塑造另一种形象，为的是掩饰北洋政府亲日卖国的丑恶行径，妄图达到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的目的。

第二道命令是再次污蔑学生的爱国行动是什么破坏社会秩序，扰乱国家安宁的不法举动，要求取缔学生的爱国活动并要求学生立即回复上课。说什么“在京者责成教育部，在外者责成省长及教育厅，警饬各校职员，约束诸生。即日一律上课，毋得借端旷废，致荒本业。其联合会、义勇队等项名目，尤应切实查禁。纠众滋事，扰及公安者，仍依前令办理”。[②]

卖国者获得了肯定和保护，而爱国者却遭受到了诬陷和镇压，政府的这种反动政策使广大的学生异常激愤。6月2日下午，7名正在东安市场出售国货的学生，被北京警备司令段芝贵和步军统领王怀庆所逮捕，这更加激怒了广大学生。这也标志着政府严厉政策的恢复。学生们蔑视反动派的高压政策，决定从6月3日起恢复一度中断的街头讲演活动。倘若被逮捕，次日加倍出动。倘若再被逮捕，则次日再加倍，直至全部学生被逮捕完为止。

6月3日上午，北京20余校各派了数百名学生上街讲演。他们陆续集中在各自的预定地点，举起讲演团的大旗，佩戴上讲演员的徽章，慷慨激昂的展开爱国宣传活动。学生们的爱国举动使反动派感到惊慌，紧急派到街头的警察比平时增加了好几倍，步兵、马队横冲直撞，驱散听众，侦缉队、保安队则纷纷逮捕学生。学联立即给上海新闻界发电，报告当天学生被捕者有178人。其中北大学生占十分之七八，也有清华大学、高等师范、汇文大学等学校的。这使得首都的监狱已经人满为患。政府不得不把北大法科校舍作

为临时监狱，正门上贴了“第一学生拘留所”的纸条。北京学联致上海新闻界的电报说：“今日（6月3日）学生游行讲演，各校之出发者九百余人，被捕者178人。北京大学法科已被军警占据，作为临时拘留所，拘囚被捕学生于内。校外驻扎兵棚二十，断绝交通。军警长官，对于学生，任意侮辱，手持国旗，军警夺而毁之。讲演校旗，亦被撕掷。其坚持国旗与校旗者，多遭枪殴。受重伤者二人。旋被送入步军统领衙门，榜掠备至，尚不知能否生还。此外马队之冲突而受伤者亦多。东华门外有一军官对学生曰：‘吾系外国人。’其颟顸昧良，有如此者；学生等文弱，拘囚榜掠，任彼军警之所为。一日不死，此志勿夺，杀贼杀敌，愿与诸君共勉之。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叩。肴”。[③]

6月4日，有一封从天津发往上海的电报，报告北京的形势：“昨日（3日）十时，北京学生大演讲，被军警拘捕，现闲置译学馆四百人；断绝粮食，四周架武器，设帐置围。又二人被步兵统领拘去，笞刑镣铐下狱。未捕者连日仍续演讲，以示决心。并电各界县学生、各界，火速营救。”[④]

6月4日，反动派更是如临大敌，森严戒备。“东华门一带直到东安市场，有陆军第九师步兵一营和第十五团一团驻扎，连接北河沿一带，直到法科门首，都像前敌战线上的防备一般。东华门一带的交通，一齐断绝。法科大学临着北河沿，两岸杨柳之中，露出二十个帐篷，夹着法科大门两旁，东边十个，西边十个。”[⑤]但是，威武不屈的学生们未被武装镇压所吓倒，把个人安危完全置之度外，按计划出动上街讲演的同学比前一日多了一倍。“四日上午十点钟时候，各学生怀里藏着白旗，上写某校某队讲演团字样，或五六人或十几人不等，静悄悄的出去，走到行人多的地方就从怀中摸出白旗子，大声疾呼的演说。这个时候街心的警察，比平常增加好几倍，又有穿灰衣的马队，背着枪，骑着马，四处乱跑。遇到有人讲演，不问他人多人少，放马过去，左冲右突，也不知道踏伤了几多人。把听的人冲净之后，便让游缉队、保安队把演说的学生两人夹一人送到北河沿法科大学里边去监禁起来。”[⑥]这一天，有700多名学生被逮捕，北河沿法科校舍已无法容下，以致马神庙的北大理科校舍也被扩充为第二临时监狱。

杜威夫妇在6月4日的北京报道中说：“今日上午11点左右，当我们开始找房子的时候看到有讲演的学生，后来听说他们已被逮捕，衣袋里装着牙刷和牙粉，有消息说被逮捕者不是两百人而是两千人。仅在北京一地就有约一万名学生罢课”。[⑦]

反动派的大逮捕，激怒了北京各校的女学生，6 月 4 日下午 1 时，北京 15 所学校的 1 000 多名女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当队伍到达中南海总统府时，派出 4 名代表入内要求会见总统徐世昌，徐的秘书陈子厚会见了她们。女学生们提出四点要求："（一）大学不能作为监狱；（二）不可拿待土匪的法子来待高尚的学生；（三）以后不得再叫军警干涉爱国学生的演说；（四）对于学生只能诰诫，不能虐待。"[8]

教员们也前来援救学生，北京教职员联合会的 8 名代表，其中包括汇文大学的一名美国教授，冲破阻挠来到学校监狱慰问被逮捕学生，送来了食物和毛毯。各大专学校校长也像女学生们所提出的要求一样抗议把大学作为监狱。北京的基督教徒决定把他们的布道坛借作学生们的讲台。

被捕学生整整饿了一天一夜，警察厅才于 6 月 4 日致函北京大学，令北大筹备饮食用具。在这个公函里面，他们供认了 3 日和 4 日曾被逮捕的讲演学生，监禁在北大法科和理科校舍。函中如是说："昨夜及本日迭有各学校学生一二千人在各街市游行演说。当经本厅遵照五月二十五日大总统命令，派出警员尽力制止，百般劝解，该学生等终不服从，犹复强行演说。当时地方秩序，颇行扰乱。本厅商承警备总司令部为维持公安计，不得已将各校学生分送北京大学法科及理科，酌派军警监护，另案呈请政府，听候解决。惟各该校人数众多，所有饮食用具，应请贵校速予筹备，以资应用"。[9]

被捕学生在监狱中的惨状一经在公众中报道，立即引起了一场抗议政府的大风暴。各团体组织，如国民外交协会、女学生联合会、和平联合会、红十字会等的代表及个人代表数百人，前往监狱，慰问被监禁的学生，向他们提供食品和其他援助。

反动派的接连两日的大逮捕没有使学生们屈服，没有挫伤学生们的斗志。学生们是勇敢的。5 月 5 日晨，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向全国各界发出《宣言》，其全文如下："各省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工会、各学校、各报馆均鉴：学生等以内除国贼、为外争国权之资，爰有五四运动。其后事理纷纠，三失望踵至，不得已而致于罢课。寒巧二电之宣言，言之详矣。皓日以后，政府极端威压，干涉交通，摧残舆论，学生等遂坐困于北京。然以三失望未复，绝不以时迁而气馁。先日两令，其一以劝学诱学生，以法纪威学生。是固因学生之所求而未得者也，勿庸深议。其一涉于外交，直不啻为国仇示私恩，为国贼作辩护。直欲以一纸空文，掩尽天下耳目。而谓外交繁重，责在当局，则直灭弃民主国之精神，直欲任少数官吏使其包

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之挟持于内，概可知矣。夫国贼不除，则外交之挽救无望；国权不复，则世界之永久和平难期。学生等之于国贼，人知其非有私怨。而必欲除之而后快者，非仅为国家计，亦正为正义人道计也。为国家及正义人道计者，宁肯避难。肴日（三日）以来，恢复露天讲演，被捕者一百七十八人，军警横加虐待，肴电已陈其概。豪日（四日）被捕者七百余人。今日明日，有加无已。是即明知其难而故蹈之也，学生等方当求学，唯知有真理耳。真理所在，死生以之，求仁得仁，又何怨乎；用布区区，伏维亮鉴。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叩”。[10]

5日上午，学生们再次上街进行讲演活动，人数再次翻倍，达到5 000多人。他们的斗志更加激昂，当出去的时候，每人都背着行李，连牙膏、牙刷、面包都带了，准备好去陪伴坐监的同学。这天聚集大队出发，分路演讲。共分为三队：

第一队：北京大学、第一中学、第四中学的学生，由东四经东单，到崇文门一带讲演；

第二队：法政专门学校、蒙藏专门学校、崇德中学的学生，由西四经西单出顺治门一带讲演；

第三队：高等师范学生，拟从前门到东西长安街一带讲演。

反动军警开始时对学生讲演还滥肆破坏，不断逮捕。齐黄色军装的马队，迎头冲来，把几千几百听的人冲得东奔西散，老啼幼哭，叫苦连天。但学生们不为威武所屈，不断冲破马队的阻拦，坚持讲演。在这种情况下，反动派没有办法了，只好改变方针，只赶听众不捉学生。因此，这三队学生能沿街游行，手拿国旗，大叫爱国，而许多军警则跟随着。“午后时打东长安街经过，看见第一中学的讲演队正在树荫之下演说，突来坐脚踏车的警察三四人，把听者一齐赶开，至于演说的学生他们就不过问了”。[11]

学生们的分路演讲的方法的确起到了效果，使反动派无能为力了。《每周评论》的记者报道6月5日的现场情况时说：“五日上午记者打前门经过，看见三个学生，站在路旁演说，来了几个警察，身长黑面，犹如城隍庙里的阎王一般。把三个学生一人捉一个，那三个学生两手虽然被他们捉住，嘴里还说个不止，听的人不知道有多少都流下泪来。后门外边，有两队学生，一向西行，一向东行。达个地方只有十几个警察，到东边去赶人，西边又演说起来了，到西边去赶人，东边又演说起来了。闹得很久，听的人个个拍手，几个警察也就不敢动手了”。

学生们的游行队伍奔赴北河沿作为第一临时拘留所的北大法科，许多市民也自动地跟随在学术队伍的后边，汇成一股愤怒的人流。到法科门前后，学生们要求军警拘捕，要与前两天被捕的学生一起坐牢，并肩作战。昔日耀武扬威的军警现在也被吓得面面相觑，不停的往后退缩。被关起来的学生听到外边的喧闹声，纷纷跃起向窗外眺望。校内、校外的学生同时振臂高呼，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就在此时，在门前看守的军警突然撤走，围困北大的军队拆掉帐篷匆匆的离去了。

在这个时候，北京政府突然撤退军警，是因为6月3、4日的大逮捕，引起了全国各阶层人士的不满和强烈抗议，特别是上海实现罢市的消息传入北京后，犹如一声霹雳，让北京政府极为震惊。实际上，他们也无法再拘捕了，因为已经无地收容了。

学生虽未被逮捕，包围北大校舍的军警也撤走了。但是，学生们深知，斗争还没有结束。斗争目标还没有实现，而且自己也不能这样被人给随意侮辱。因此，当时军警撤走后，被捕的学生们并没有离开。他们还反逮捕了7名警察，留下了两顶帐篷，作为揭露反动当局摧毁民权、破坏爱国运动的人证和物证。还派出代表到警察厅索取被捕近千名学生的伙食费和卧具。学生们经过讨论，决定把反日爱国运动坚持进行下去，并拟定了两条具体的办法："（一）暂时不出校，并举出纠察队员数人维持秩序。（二）想政府要求集会、言论、出版自由，不受限制"。[12]

6月6日，学生们以北京中等以上个学校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说："肴（三）豪（四）两日，共计捕去讲演学生七百余人。歌（五）日出发讲演者，共计五千余人，政府未施逮捕，仅以军警四逐听众。歌日午后防守被拘学生之军警，忽然全数撤去。然政府白为儿戏，而学生等无端被拘，决不能自行散去，致陷逃法之咎。故被拘者仍在北京大学法理两科，保持拘留时原状，以俟正当解决。谁此次军警蹂躏教育，破坏司法，侵犯人权，蔑弃人道，种种不法行为，皆政府纵使之。武人之跋扈日恣，国家之运命自蹙，长此优容，何以为国？学生等一面质问政府有以处置军警，一面仍应亟筹应付国仇国贼之道"。[13]

当天，北京政府为研究新的镇压学生运动的措施而召开了国务会议。大多数官员认为，若是一味的捉拿，越捉越多，恐怕会惹出别省的反响，不如拿和平方法对待。官员们还议定了两项举措：（一）更换大学校长，让蔡元培辞职，让胡仁源继任；（二）更换教育次长，叫袁希涛辞职，让傅岳棻代

理总长的职务，并责成傅氏同各学校校长接洽，商议善后的办法。晚上，官员们又到总理钱能训家开会，再次主张不能对学生采取极端严厉和极端放任主义，首先要做的还是让学生复课，但对各学校之根本问题绝不能动摇。

北京政府确是免去了教育部次长袁希涛，而以傅岳棻取代。傅氏声称愿作调解人，并宣称说今后学生事件由教育部直接管理，军警不得过问。但与此同时，北京政府也令胡仁源任北京大学校长。这当然引起教育界和学生界的极大不满，认为政府挽留蔡元培毫无诚意。6 月 6 日，教育部派了四名代表去北河沿法科校舍，劝在禁学生回校，代表无果而返。7 日，大总统徐世昌又特派参议员偕同教育部专门、普通司两司长前往道歉，说什么是政府处置不当，劝诸生还是回学校休养。到了 6 月 8 日，学生们为准备参加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大请愿，才离开了北大法科和理科，返回到各自学校，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注释：

①《青岛潮》，《五四爱国运动》上，第 296 页。

②上海《民国日报》，1919 年 6 月 4 日。

③④謦盦：《学界风潮记》，第 130 页，第 129～130 页。

⑤⑥⑧⑨⑪⑬《每周评论》第 25 号，1919 年 6 月 8 号。

⑦John and Alice Dewey, Lrtters form China and Japan (New york , 1920), pp, 209～211.

⑩《五四爱国运动》上，第 409 页。

⑫《新闻报》，1919 年 6 月 7 日。

学生罢课　商人罢市　工人罢工

“六三”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里程碑，以它为界大致把五四运动分为两个阶段：从“五四”到“六三”是运动的第一阶段，这个时候运动的中心是在北京，运动的主力军是青年学生；从“六三”到6月28日的拒签和约运动，是运动的第二阶段，这个时候运动的中心则由北京转移到了上海，工人阶级开始登上了政治的舞台，成为了运动的主力军。人们通常把第二阶段称为六三运动。即指由6月3日北京学生被逮捕而触发的全国响应、支援的运动，而以6月5日上海三罢斗争的实现为标志的。

北京政府的“六三”大逮捕，其结果和反动派的预料之结果是完全相反。不仅没有把学生的爱国运动给镇压下去，反而进一步激怒了全国各界人民，掀起了更大的革命风暴。特别是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上海人民，要求惩办卖国贼，要求释放北京被捕的学生，展开了史无前例的“三罢”斗争。革命烈火燃遍了整个上海。

上海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城市。当时，上海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有两万多人，人数与北京相差不多。上海学生和北京学生一样，都是“首先觉悟的成分”。[①]上海各种社会力量基础雄厚，加以上海又是一个交通发达、消息灵通的近代城市，因此当北京的五四运动爆发时，上海各阶层人民立起响应，密切配合，而且在某些方面（如提倡国货、反对日货等），运动的规模超过了北京。

5月5日，上海复旦公学的学生就听到了北京学生5月4日游行的消息。这一消息，是由当时兼任复旦国文教师的邵力子传递的。邵力子是上海《民国日报》的总编辑，他在5日夜里看到北京发来的有关学生示威游行的新闻电讯后，即赶来复旦作报告。同学们听完了邵老师的报告，极为愤怒，主张马上积极响应。接着，上海人民也纷纷知道了这个消息，掀起了爱国运动的浪潮。各学校各团体都发表通电，表示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谴责庇护卖国贼、镇压爱国运动的北京政府，指出：“此次外交失败，人人知为

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所误，几乎国人皆欲杀之。政府何爱若辈，而以国家为孤注？乞速按律严惩，与众共弃。至学生爱国，起与卖国贼为难，正合全国民意，因此被逮，商民等全体愤激。应请政府垂念学生，无罪即行释放。”[②]在给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的通电中，要求将青岛“直接交还中国，并撤废密约，务达目的；否则退出和会，万勿签字”。[③]5月7日下午，上海各团体、各学校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召开了国民大会，出席人数达到两万余人，一致推选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为大会主席。他报告了开会的宗旨，希望国民迅速觉醒，团结救国。各界代表也相继演说。演说结束后，分队游行。游行队伍本计划是去外滩的旧德国总会面见南北和会代表，但在通过法租界时被阻拦，于是只好改派代表去会见了南北和会代表唐绍仪、朱启钤等，向他们提出三项主张：“（一）废除中日一切有损国权之条约，欧洲和约非青岛收回不能签字；（二）惩办卖国贼段祺瑞、徐树铮、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要求北京释放被捕学生”。[④]唐绍仪应允代为转达。会后，《英文沪报》报道说：“今日（七日）午后，男女华人及学生二万人，各携申讨卖国贼之旗帜，与其师长群集本埠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开会，抗议青岛之丧失、中国官场之卖国及北京学生之被捕。主席者为黄任之君，当有数人起而演说，并通过决议案数条，电达巴黎中国代表，继乃决定全体同赴德国总会吁请南北代表团救国。行时秩序颇为整齐，直至法租界，当与法界官吏磋商后仍不准其通行。决定仅派代表赴和会（按：指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会），惟仍有大多数学生集于德国总会之外。印捕荷枪梭巡以防扰乱秩序，实则秩序甚整，正无须印捕为之维持也。”

5月9日，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4年前的这一天，袁世凯在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上签了字。为了纪念国耻，上海的许多学校停课一天，许多工商业团体也停业一天，许多戏馆、游艺场也均停止演出一天。有的商号还以拒售日货的行动，表示爱国的决心，“沪城大小东门内各商号门前皆大书特书，声明‘本号自今日起始终不售日货’等字样。”[⑤]有的学生当天还组织了游行和演说。在浦东一带讲演的学生声泪俱下地用朝鲜沦为殖民地的悲惨历史启发群众的爱国觉悟，他们讲到：“朝鲜何以亡？亡于卖国贼。欲救中国，先除国贼，永久坚持不用日货”。[⑥]

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复旦大学的何葆仁被推选为会长。在成立的宣言中，明确地宣布成立学联的目的是：“期合全国青年学生之能力，唤起国民之爱国心，用切实方法，挽救危亡。”当天，上海救国十

人团也宣告成立，在宣言书中说明了建立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为了把爱国运动持久地开展下去。还规定不买日货、不用日币、不乘日船、不被日人雇佣等是人团者必须所遵守的。12 日，国民大会上海事务所成立。这些团体都密切注视着北京运动的发展并恳切希望全国人民能够进一步组织起来，挽救民族危亡。

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后不久，就决定派学生代表到南方各地去扩大宣传。北京、天津的第一批学生代表在 5 月 14 日抵达上海，受到上海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他们先后在上海学联、国民大会事务所、上海报界举行的欢迎会上详细地介绍了北京学生“五四”火烧赵家楼、痛击章宗祥的英勇事迹，北京学生的爱国壮举，使上海学生深受鼓舞。有的当场咬破手指，写下鲜红的“决心”二字；有的表示指出，不仅曹、章、陆是卖国贼，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徐树铮也是大卖国贼，甚至有人主张推倒卖国政府。在这个欢迎会上，一致发表宣言：“限政府于一星期内，自 15 日对于维持蔡校长地位及保护大学尊严两事为满意的表示，否则上海全体学生同时罢课”。到 21 日一星期期限已到，反动政府无明确态度。决定从 22 日起开始罢课。后经江苏省教育会代表恳请，延缓 3 日再行举行。

5 月 25 日，即罢课的前一天，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表了罢课宣言，控诉和斥责了北洋政府的反动政策。宣言说：“自外交警讯传来，北京学生实当先觉之任，士气一振，奸党寒心；义声所播，咸知奋发。而政府横加罪戾，是已失吾人之望；乃以此咎及教育负责之人，致傅、蔡诸公纷纷引去。夫段祺瑞、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迭与日本借债订约，辱国丧权，凭借外援，营植私利，劣迹昭著，中外共瞻。全国国民，皆有欲得甘心之意。政府于人民之所恶，则必百计保全；于人民之所欲，则一网打尽；更屡颁文告，严儆学生，并集会演说、刊布文字，公民所有之自由，亦加剥削，是政府不欲国民有一分觉悟，国势有一分进步也。爱国者获罪，而卖国者称功，诚不知公理良心之安在。在此民族危亡关头，不敢自弃责任，谨自五月二十六日始，一致罢课，期全国之民，闻而兴起，以要求政府，惩办国贼为唯一之职志。”⑧

5 月 26 日上午，上海学生两万余人，举行总罢课，并在公共体育场，齐声宣读了如下誓词：“民国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男女各校学生二万余人谨在中华民国国旗之下宣誓曰：吾人期合全国国民之能力，挽救危亡，死生以之，义不反顾，谨誓。”宣誓完毕，学生们还在市内游行，“全队共五

十二校，约二万五千人，首尾经过，约二时之久。步伐整齐，精神严肃，绝无凌乱之状。夹道观者，无不为之兴感。”⑨学生在罢课的过程中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各校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组织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还规定了各种制度，供大家遵守。许多学校还组织了讲演团，从事爱国宣传活动。在一些圣约翰大学讲演团有百余人参加，每天至少有 8 组上街讲演。在一些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里，罢课遭到学校反动当局的无理阻挠和破坏。但是广大学生没有屈服，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激励斗争。

5 月 31 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工商各界在公共体育场召开了追悼北京学生郭钦光的大会。会场中校旗林立，悬挂着烈士遗像，周围陈设花圈，两旁分布着军乐队和各校送来的挽联。这些挽联既颂扬了死者的爱国事迹，也表示了后继者的斗争决心。有：“君去矣，甘将热血红青岛；吾来也，不许狂奴撼泰山”。“杀身成仁，豪气横吞沧海日；前呼后应，哭声寒咽浦江潮”。“怕作安重根，万死不干亡国泪；愿追陈太学，千秋共矢摘奸心”等等。全场气氛显得庄严肃穆。北京来的学生代表段锡朋、许德珩、陈宝锷、杨钟键、黄日葵和天津的学生代表张阳先等应邀出席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激昂沉痛。杨钟键介绍了郭钦光的历史，并代表烈士家属和北大师生对与会者表示感谢。许德珩在会上报告了他们化装逃出军警重重包围的北大来到上海的经过，回顾了郭钦光忧国忧民，舍生忘死为国捐躯的壮烈事迹。大概意思是：“人皆有死，为什么要追悼郭君呢？就因为他的牺牲精神和坚强毅力，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也应该用此精神和毅力，去达到郭君争取的取消密约、收回青岛、惩办国贼的目的。如果我们达不到这个目的，郭君地下有知，就要为我们追悼了。”大会最后，由各女校学生在悲壮的气氛中演唱了追悼歌，歌词是：“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大好是中原；商於陷地，督亢呈图，媚外无心肝；血性男子，爱国健儿，赤手挽神州；城狐未除，陈东骤死，一死惊千秋。”⑪

追悼会后，参加大会的 52 个学校的所有学生浩浩荡荡的前往南市上海县总商会，动员商界罢市。学生代表们针对资产阶级的利己思想，指出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们应该以大局为重，牺牲个人利益，与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学生们说：“学界牺牲光阴，牺牲生命，商界似亦宜于利益上有所牺牲也。……他日未及邦本，未尝不牺牲及商家也。”⑫尽管学生们如此苦口婆心地向他们晓以利害，商会仍犹豫不决，采取敷衍态度，对付学生。6 月 1 日，学联代表按时到总商会，再次要求他们与学界采取一直行动。总商会会

长顾馨一，副会长苏筠尚一方面向学生表示："商界方面同属国民分子，咸具爱国之心理。"但又说罢市"事关重大，必须公众讨论，意见相同，方可表示"；并借口"适值夏季，商界例有结束账款之事，故今日到会者尚不足法定人数"，[13]推托以后再讨论决定。6月3日，上海学联代表和北京学生代表再赴上海县商会动员罢市，又是无果而回。同日，学联代表和京、津、杭各地代表赴总商会接洽，得到的答复，竟是"对于示威运动，似非大国民所共有。"[14]

上海反动当局见学生对商界的发动步步加紧，罢市有一触即发的形势，于是反动派便出来干涉了。6月4日，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增派军警，发足子弹，妄图用武力威胁和镇压爱国运动。他在致上海县总商会函中说："现奉淞沪护军使训令，以凡有集会结社情事，务须先期报告，非得官厅允可，不准擅自举行。"并以"此次开会涉及政治问题"为由，勒令商会"即行停止开会"。在警察厅的压力下，总商会屈服了。在门前贴出通告，宣布本会停止会议。就在当日，传来了北京学生连日被捕的消息。震动了上海各界人士，给学生动员商界罢市带来了新的局面。

由于北京政府封锁消息，学生被捕的消息是由天津发电报传到上海的。上海学联当日立即行动起来，向各省各界发出呼吁的电文，指出；"政府摧残士气，惨无人道，一至于此！同属国民，宁忍坐视？务乞主持公理，速起援救，性命呼吸，刻不容缓。"[15]同日下午，学生们纷纷出现在上海的街头。他们手持载有天津学联电报的传单，不顾反动军警的镇压，到处宣传，并按户动员各商号自5日起一律罢市。在遭到店主的拒绝后，他们不惜以"沿街跪求"的办法，进行哀告。

上海工人非常集中，他们也都没有任何丧失私有财产的顾虑。因此，当罢市消息传来的时候，许多工厂的工人，并没有被学生动员和哀求，便自动罢工了。5日，日本在上海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的五六千工人全体首先罢工；接着，日华纱厂、上海纱厂的工人相继全体罢工；同一天内，实行罢工的还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工人及码头工人，沪宁、杭甬两路部分工人也开始了罢工。

在学生们的要求和广大店员的支持下，各商号迫于形势，也在5日陆续宣布罢市。5日清晨，南市和城厢内外各大小商店，首先罢市停止营业了；到中午，公共租界各马路的店铺十之八九也停业罢市；南京路上的永安和先施两大公司曾一度营业，后没有办法，也只好关门；法、美租界内各商店也

都相继罢市；罢市店铺门外，都悬挂着"为国家，今罢市，救学生，除国贼"、"万众一心"、"抵制日货"的旗帜，或贴着"为国雪耻"、"挽救北京被捕学生"和"为良心救国牺牲私利"等标语。这一罢市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各个娱乐场所均停止售票，理发店外也贴上了"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请君不必光顾"的标语。

在此之前，参加总罢课的都是大中学校的学生，小学学生仍在上课。5日，各小学和租界工部局所设学校学生，获悉"北京学生被拘后，下午一时，学生一律罢课，虽经中西各教员婉言劝导，并不依从，各自星散"。[16]学生们出动在街头上，组织游行、演说和维持秩序。

就是在6月5日，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和工人罢工的"三罢"斗争实现了。

注释：

①《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59页。

②⑭《申报》，1919年5月7日，1919年6月4日。

③《五四爱国运动》下，第242页。

④《时事新报》，1919年5月8日。

⑤⑥⑯《新闻报》1919年5月10日，1919年6月6日。

⑦⑬⑮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5月12日，1919年6月2日，1919年6月5日。

⑧⑨⑩⑪⑫《申报》，1919年5月26日，1919年5月27日，1919年6月1日。

“三罢”的坚持和扩大

上海“三罢”斗争实现的当天，上海各界代表在宁波卡尔登西饭店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上海商学工报联合会，会议推选上海学联会长何葆仁为临时主席。参加会议的的有二三百人。其中包括商业公团的邹静斋、汤节之，省教育会的黄炎培、蒋梦麟，报界的张东荪、叶楚伧，北京学界的许德珩、段锡朋，上海学联的朱成洵等。买办虞洽卿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其实这个会议没有工人代表参加。

在讨论中，学界、教育界、报界的代表比较坚决。北京学生代表在会上介绍了北京学生斗争的经验和决心。许德珩还提出了“国民自决”的口号，他说：“‘国民自决’四字，吾人心日中所恒有，望政府惩卖国贼，恐不可得也。”[①]上海教育界代表黄炎培，在会上提出主张：以“不办卖国贼不开门”八个字印刷数千份，遍贴各商店门口。又说：“吾人办亭，亦须如学权中之有课程。今日功课，须发表中西文宣言；其西文者宜送登西报。明日功课，开会亦其一端，罢市不停，须每日开大会也”。[②]上海报界代表叶楚伧在会上说：“吾人最大武器，即为罢市二宇。设一二日后上海各商号或受压力，或不一致而今罢市之举渐归消灭，则今日此举反为多事。故今日所当问者非他，即明日开门不开门耳。”[③]商界代表担心自己的利益，表现得比较被动。不过，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他们也都同意了不惩办卖国贼不开市的主张。

联席会议还讨论了运动的目标和口号问题。有人提出三项：一、惩办国贼；二、争取人民自由；三、释放被捕学生。有人提出五项：一、力阻和约签字；二、取消中日密约；三、惩办卖国贼；四、取消逮捕学生命令；五、恢复约法上人民之自由。还有人主张，定下九条标语口号：（一）不去卖国贼誓不开市！（二）军警也是国民，何以要保护卖国贼？（三）不争回国权，坚持到底！（四）不遂自由，不纳赋税！（五）卖国贼所订各密约，比山东问题更要紧！（六）青岛即使交还，密约不取消，还是亡国！（八）军警也

是国民，也应爱国！（九）国民出钱养军警，天良岂能不动！也有人认为定目标须简单明了。讨论的结果，会议认为目标应集中在惩办卖国贼上，并表示，此目的不达，即不开市，不复课。

会议最后，以该会名义向全国发表了通电："北京政府庇护卖国诸贼，主签亡国条约。北京学生为国请命，突被滥捕毒刑至四百余人之多，高压毒手，显非空言所能挽回。此间工商界全体，于本日起一律辍业，与学界一致进行。卖国贼存在一日，商学工界即辍业一日，誓不反顾，岂与应援，涕泣布闻"。[④]

"三罢"实现后，中外反动派就如坐针毡，他们采取各种手段进行破坏和镇压。5日中午，百余名学生在警察厅门前讲演，揭露北洋政府的腐朽。警察厅派人前去制止，学生不服，与之说理，警察恼羞成怒，将学生逮捕送入警察厅监狱。与此同时，16名学生在街上演讲，进行爱国宣传，一群如狼似虎的警察，用带刺刀的步枪向学生猛刺，并相加拳打脚踢，横加迫害，最后16名学生全被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逮捕了。据上海学联统计，就5日当天因进行爱国活动的被捕学生达到100多人。这一天，上海人民的爱国活动还遭到租界巡警的阻挠。到晚上，三四千名学生和店员在浙江路一带游行，当时租界巡警横栏马路，阻挡学生们的前行，并且还有警棍殴打进行驱赶。愤怒的学生奋起反抗，他们爬上附近住宅屋顶，向马路上的巡警投掷砖块，当场打伤8名巡警，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革命精神。

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和破坏，并没有使上海的广大人民群众所屈服，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加入和坚持战斗的激情。6月6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仍在继续中，而工人罢工也进一步的扩大。一些英、美、法租界的工人，随着南北市各商店的罢市形势，故提议罢工，冲破外国资本家的阻挠，取得了一直行动，从6日起开始罢工。还有一些工人不仅罢工，还以自身的积极行动来支持整个爱国活动，他们集体建造了一座"国耻纪念"牌楼，还集资在工厂街口建造一座高大的铁木牌楼，上写"毋忘国耻"四个醒目大字，以激励国人。行人们经过此处，无不触目惊心。

这天，反动军警继续镇压人民群众的爱国行动。军警把积极参加罢课斗争的南洋中学、大同学校的学生围困在学校，不准他们到校园外参加爱国活动。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是镇压和破坏爱国活动的罪魁祸首，上海群众对他无不切牙痛恨，称他为"上海的王怀庆"。6日上午9时，学生爱国者

手持一面白旗，上写“徐国梁忠心卖国”，在街上讲演，揭露徐国梁的罪恶行径。上海人民还针对帝国主义的镇压和破坏展开了斗争。公共租界工部局贴出布告，严禁悬挂和张贴带有“排外及强迫煽惑等性质之旗帜与招告”，规定凡有“抵制日货”或“坚持雪耻”的标语都得除去。但是，帝国主义的这个禁令没有得逞。“租界当局发出命令要撤除所有的标语和旗帜，各个捕房的巡捕和商团都奉命出动去执行这个任务，但是他们都未获得成功，特别是在中央和老闸区。午后捕房派了修电线的汽车出来撤除旗帜。有一辆车是从中央捕房开出的。由奇南、琼斯两巡长指挥，配备了一对印捕和商团，到中央区巡行了两次。第一次撤除了数百面旗帜；第二次车子开到福建路福州路转角处就被阻塞了，群众立刻将汽车包围起来，有一些勇敢的人不顾巡捕的棍击，撕破了司机的衣服，企图将他从驾驶座上拖下来。附近茶楼上的人从窗口纷纷向车子上的巡捕抛掷茶壶、茶杯、刀子和石块，当时，三道头西捕奇南的头部被击中，琼斯的手臂也被石块击伤”。[5]

6月7日，中外反动派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继续破坏上海人民群众的爱国活动。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召集商学工报有关团体领袖开会，诱骗各界结束“三罢”。他对各界撒谎说：“北京拘捕学生四百余人一事，颇多误会，与以永祥所知，只捕四人，因此四学生发布共产主义之传单，巡警阻止不服，即行拘押，并无四百之多”。他要求立即各界要立即结束“三罢”，学生开课，商界开市，工人上班。上海护道尹沈宝昌，也在会上讲“南北市罢市今已第三日，此中危险甚多，务请商界速劝商店开市，学界却学生上课，为唯一之办法”，并威胁说：“若旷日持久，恐地痞流氓从而煽惑，终至糜烂地方，彼时负直接之损害者，我商民固首当其冲也”。买办虞洽卿竭力附和卢永祥和沈宝昌的意见，说：“军使、道尹既有负责担保之宣言，吾商人极应体念官厅诚意，切劝各店铺即日开市营业。……学生方面则由教育界劝告上课。”[6]学生代表坚定地站在爱国立场上，明确表示反对他们提出的办法。在街上，武装警察挨户勒令开业，但各商家仍闭市不开，遇到太凶恶的，商家勉强暂时开门，等警察离开，则再闭市。一些商店为了应付勒令开市的警察，在门前贴出启事：“本店清理账目暂停交易”、“本店为救国甘愿牺牲营业，生财召盘”，等警察走后，仍将“不除国贼不开市”的标语贴上。

6月8日，这已是上海各界坚持“三罢”斗争，进行爱国活动的第四天了。因“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的要求仍未达到，上海全市商店

仍未开业。而且，金融界的中国、交通、浙江兴业、中华、浙江地方实业、金城、上海商业储蓄、中孚、盐业、四明、广东、聚兴诚等12家银行，在广大学生、工人和商人的爱国热情感召下，也在8日起停止营业，宣布罢市。工人的罢工浪潮在继续高涨，又有一批工厂的工人开始罢工，日本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九纱厂的工人也拒绝为日本资本家生产，实现了罢工，并进行了声势浩大示威游行。同济学校工厂、华商电车公司、自来水厂等处的工人也在街上游行，手持小旗，上写“罢工救国”的口号。

6月9日，工人运动更加扩大，上海电器造船厂、英美烟草公司及附属印刷厂、浦东美孚、亚细亚两火油栈和叉袋角日本纱厂等处工人参加了罢工，这时已有产业工人和其他工人约两万四千人参加了这次罢工斗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铜铁机器业工人和海员从9日起实行大罢工，给中外反动派以沉重打击。上海海员罢工的当天就使水上交通陷于瘫痪，所有驶往沿海及内地口岸的轮船全部停航。后来，几乎所有轮船公司的水手、伙夫和其他职工都参加了罢工。海员罢工参加者朱宝庭后来回忆时说：“记得那天下着很大的雨，码头上除忙碌着的起卸工人以及坐客外，没有吵杂闲人。有两船已坐满了四千多客人，正当他们归心似箭的时候，我们秘密宣告罢工，此两船为首当其冲者，自此从海上泊来之船只，无不立时罢工。第一天即罢下了五只船。罢工当中有不少买办阶级捣乱分子从中阻碍破坏，但我们始终不曾威胁利诱。有一次，一位买办因捣乱罢工被工友提来打屁股，结果他放鞭炮挂红才算了结。英领事不敢与我们正面交涉，迫上海总商会令我们开工。总商会会长亲到钧安公所见我，他叫我通知海员工人到四明公所（宁波同乡会的组织）开会。到会工友千余人，都被巡捕、暗探、包打听包围监视着。总商会副会长方椒柏向我们讲：‘……如再不开工，你们就不能吃饭……’，他正要继续说下去，猛不防他身后一下体大力壮的工友，把住他的衣领，沙的一声撕破了他的绸衫。群众都鼓掌称快，并喊着：‘打！打……’，结果这位先生默然而退。”

朱宝庭在评论这次罢工的意义时说：“这次海员参加五四运动，是中国海员工人的第一次罢工，罢工海船数十只，工人有五千余，罢工时间四昼夜。在罢工过程中，虽组织较差，然工友的情绪高涨，精神不屈，始终处于自动自愿，实开中国海员运动的光明新纪元”。⑦

9日，上海的学生和商人仍在坚持着罢课、罢市，与反动派不停地做着

斗争。上海学生联合会在五四运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是上海人民群众实现和坚持“三罢”的重要机构，而帝国主义却对它恨之入骨，必欲去之而后快。这天，公共租界工部局悍然宣布封闭上海学联。在给上海学联的信中声称：“本局不准以上海公共租界为政治活动之中心点。再贵会近来行动，实有害治安。今特知照，如此种举动再不停止者，本局准于本月十日上午十时实行封闭贵会之静安寺路五十一号屋。”[8]后来，上海学联被封后迁至法租界，坚持领导学生开展爱国运动。

军阀卢永祥与帝国主义勾结，竭力破坏罢市。在卢的策划下，反映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上海总商会沿街张贴和分发通告，劝导商店开市。通告全文如下：“本埠各商店因请求政府释放被拘学生，罢黜曹、章、陆诸人，一致罢市。今学生已释放，教育部齐电各生均回本校，渐复原状。至曹、章、陆诸人罢免，已蒙护军使及护沪海道尹担任负责，急电政府照办。本日午前会议公决，学生已经释放，免职一事由护军及护沪海道尹担任负责，必达要求目的。若金融停滞，工界休业，长此以往，危险不可思议。商会有维持之责，不得不通知劝告各商店及工界于本月旧历十三日（6 月 10 日）先行开市，照常工作，特此布告，务请注意”。[9]

总商会的这个通告一致遭到广大爱国工商业者的反对。工会、商家均公开表示坚决不能接受这个通告，并将原件退回。再次强调惩办国贼，释放学生的要求没有达到满足，拒不开市，斗争要坚持到底。这样，总商会劝告 10 日开始的通告，成为了一纸空文。

6 月 10 日，上海工人的罢工进入最高潮。在这一天，沪宁、沪杭铁路全体工人开始罢工，在写给《大陆报》编者的信中声明：“今晨我们罢工纯粹是为了希望释放在北京被扣押的学生”，并提出了复工的条件：“（一）在罢市期间我们不替日本人接通电话。（二）要求大班请领事致电北京政府释放一切被捕学生，立刻罢免曹、章、陆等卖国贼。（三）要求不追查罢工发起人，因为工人都是自愿参加的，故请明白保证不予追查，然后我们才按时复工。（四）昨天割断的所有中国用户的电话应全部予以恢复。”[10]同时，轮船水手罢工扩大了（不仅水手、生火工人全体登岸，连船主雇用的管事、厨师等也纷纷离轮），各马车行的工人也罢工了。这就是说，上海市外市内、海上陆上，交通均已断绝了。同一天内，上海电话公司的接线员和工人，也参加了罢工。此外，电灯工人、卷烟工人、火柴工人、榨油工人、外商洋行的中国职工，都相继罢工了。

6月11日，上海的“三罢”斗争还在继续，海员罢工在不断扩大，黄浦江两岸各码头的轮船有进无出，凡进口停泊的，就与已经罢工的海员采取一致行动。各轮船公司损失严重。下午，各界工人召开大会，讨论设共同总机关，成立中华工界大会，并通电全国工界采取一致行动和设法救济罢工工人等问题。大会还推举了12名代表，负责与各界联系。

6月12日，北京政府罢免卖国贼曹、章、陆三人的消息得到证实，上海各界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大会并举行了游行，学生、商人、工人同时开课、复市、复工。从6月5日到11日历时7天的“三罢”斗争宣告胜利结束。这次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还是第一次，表明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有了飞跃的发展。给国内外的反动势力的威胁和打击是巨大的，空前的。

注释：

①②③④《申报》1919年6月6日。

⑤⑩《大陆报》，1919年6月7日，1919年6月11日。⑥《新闻报》，1919年6月8日。

⑦《五四运动回忆录》，第112~114页。

⑧《五四爱国运动》下，第282页。

⑨《时事新报》，1919年6月10日。

运动中的资产阶级

“三罢”斗争能够胜利，中国资产阶级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特别是在商人罢市中，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坚决反对的，而民族资产阶级在整个运动中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爱国精神。但民族资产阶级也不是完全的投入这次运动中，他们具有一定的两面性。

上海全市性的资产阶级团体主要有上海总商会和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两个。前者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所控制，反映着帝国主义的利益，对运动一直起着破坏和阻挠的作用；后者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为运动也一直贡献着一份力量，有时积极有时消极。

早在五四运动爆发时，给帝国主义充当代言人的上海总商会，在5月9日，就发出臭名昭著的通电，对爱国运动进行歪曲和诋毁，说什么“凡我国民深知国步维艰，当静以处事。……遴派资格声望足以胜任大使者，任命日使，克日起程前在，坚持欧战平定交还清国一语，径与日廷磋商交还手续……应将此项议案提出大会，由中国派员与日本直接交涉”。①

商业公团联合会在与总商会的通电针锋相对，采取了严正的态度，主张“是我全国人民所誓死坚拒而日本所求之不得者……上海总商会佳电，主张青岛与日本直接交涉，本公团极端否认，……。”②在全国舆论的指责下，总商会理屈词穷，没有办法。其会长朱葆三不得不提出辞职，其副会长沈联芳也逃亡浙江。

上海著名买办虞洽卿，当时是总商会的会员，也是商业公团联合会的干事。在朱葆三辞职，沈联芳出逃后，虞洽卿主持总商会的会议，竟然领衔挽留朱、沈，并为他俩的罪责进行辩护。虞洽卿是一个媚外老手，声名狼藉。“早在1905年为了英国副领亭韦德门在会审时诬指黎黄氏贩卖人口而酿成的大闹公堂案，引起当时公共租界商店的罢市，虞洽卿就跟了当时的上海道袁树勋，挨户向各商店劝导开市，甚至打躬作揖，企图获得帝国主义者的青睐，充当工部局的中国董事。可是他尽管很卖力，仍然没有达到目的，只由

工部局总董恩纳生送了他一只金表，说什么‘租界闹事，承我公大力维持，得以转危为安。’虞洽卿后来对人家谈起这件事，居然还引以为荣。”[③]虞洽卿既然是这样的一个人，当然受到商界同仁的严正指责批评。经过反对总商会和虞洽卿等的斗争，很好地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积极性。

“三罢”斗争的实现，对民族资产阶级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这次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一些中小店主，有着良好的表现：

他们同外国侵略者进行过斗争。例如，罢市实现后，租界工部局进行破坏，连日贴出布告：“不可再有排外及强迫煽惑等性质之旗帜与招贴，违者罚办。”工部局还派出大批包探、马巡，并借用电车公司修接电线的汽车，纷纷出动，强迫除去商家的旗帜和贴的标语。但是，帝国主义分子并没有达到目的，一些商家写有“抵制日货”、“坚持雪耻”等字样的旗帜虽然被暂时除去，但等外国巡捕离去后，马上关门又挂出新的旗帜。有的商店在外国巡捕离去后，立即又贴出反抗的标语，上面写着：“爱国自由，不受干涉”；“你会撕，我会贴”；“我心已决，越扯越贴”；“你扯我贴，越扯越多。”[④]

他们也同封建军阀进行过斗争。例如，罢市实现后，反动军阀即强迫开市，并派出大批军警勒令实行。但是，反动军阀的这些措施也没有达到目的。据6月7日的报道：“城内今晨有武装军士约八百人赴西门强迫商家开市，各商语以我等死生与学生共之，军队与刀枪威胁无效。”[⑤]

“三罢”斗争实现后的第三天，上海各界联合会开会，商、学两界旁听者近两千人。当在会的群众得知上海反动的军、政、警等官僚拟勾结买办散发传单“劝告”商家开市时，情绪十分愤激，纷纷发表斥责的演说，许多在场的商家大呼：“吾等罢市三日，学校罢课多时，政府对于国民所一致要求之惩办卖国贼，置若罔闻。今日欲以空言希望开市、上课，试问吾人牺牲财产，学生不顾生命，究为何来？于国何补？……开市、上课只须目的达到，今同政府下令将卖国贼曹、章、陆、徐等人先交法庭惩办，吾等明日即开市、上课矣。何用他人干涉！”[⑥]第四天，上海“道尹、警察厅长……亦秉承护军使钧旨，驾乘汽车，亲至南市里街、大小东门一带挨户押令开市，有不遵者，即由所随军谷代为将门取下，并在该地徘徊片刻，监视其营业。然有人入店买物，商人皆以无货可卖对，虽开仍与不开无异。迨军警去，则一律重复将门闭矣。”[⑦]

以上这些，都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在“三罢”斗争中表现了一定的积极

性。但是，我们评价这种积极性时，还必须估计到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他们的罢市带有被迫性，是在一定的压力下实现的。学生的要求和监督，是他们的外在压力；店员的要求和监督，则是他们的内在压力。6月7日，虞洽卿在淞沪护军使召开的一次阻止“三罢”斗争的去议上说：“此次罢市，店东均下愿意，由各伙友怜惜学生之一念耳，事如有转圜地步，无有不从命也。”[⑧]这一段话，除抹杀了中小商人的积极性外，所谈店员惰况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店员是商界爱国运动的骨干。还在“三罢”以前，店员就积极参加运动。例如，“南市等处街道路口，概高揭白色竹布横联，……此种自竹布横联或旗帜，皆由商界行号伙友学徒，从每日点心、月规等费，积省饯丈，购买书悬，以尽热心爱国之本志。”[⑨]罢市开始后，店员积极加入。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对勒令开市的反动军告进行怒斥，虽被拘捕，但是被捕者都欣然去了捕房，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恐惧。

店员们还向动摇、软弱的资本家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例如，先施、永安百货公司的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分子相勾结，本定于6月7日复市，结果，两公司只有不到百分之三十的职工回来供职，而导致复市的失败。又如，“某某等号经理，迫令伙友开排门数扇，照常营业，稍补损失。各伙以情愿在闭市期内扣除薪本，贴除伙食等词答复。该经理后令学徒将门紧闭，向外一笑而去。”[⑩]再如，某店店员曾破指血书“学生一日不放，本店一日不开”十二个大字，贴于门前，表示坚持罢市的决心。

所以，没有这些坚决而积极的广大店员，商界罢市的坚持，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参加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是很不彻底的。在罢市实现后，他们极力强调远动只是“对内”而非“对外”，他们也同意买办的反动主张，只希望同胞能守秩序，并不想引发暴动。他们还向“各友邦”正式发表宣言说：“此次举动纯系爱国热忱，对内有所要求，秩序井然，并无丝毫暴动行为。凡我旅华各友邦诸君，与我商界平日感情素洽，惟希主持公道，弗生误会，是为至幸。”[⑪]

民族资产阶级有着依靠英美各国来反对日本的幻想，他们在向巴黎和会呼吁的电文中，曾表示过，请求亲爱友邦主张人道公义，勿使日本肆其野心。他们怕运动涉及了英美“各友邦”，也怕“友邦”误会，因此他们不断地进行解释，千方百计地限制运动的范围。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他们也是有

所畏惧的。在6月7日的会议上，反动军阀上海护军使要求不要使用“抵制日货”的字样，商业公团联合会的代表也就顺从地说：“至于抵制日货字面不妥，有关条约，吾人此后当依从军使之谕，改用揭倡国货等字样。”[12]对于军阀政府，他们也不敢于彻底反对。他们承认自己一贯的态度是软弱的。商界对于政府，敢怒而不敢言。而这次被迫参加了贩卖国贼的活动，他们认为应该“派代表赴北京，为最后之请愿，而我辈以镇定工夫、和平手段为保中华民国坚持到底可耳。”[13]这都反映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运动中，还有一种借机发国难财的奸商，如有的曾贩运日货而把日货冒充国货来出售。除奸商外，就是一般的工商业者，也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使自己的利润不受影响。这又反映出一些资产阶级的投机性。

第三，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同意罢市了，但是他们坚决反对罢工。他们不断地表示，商界如果罢市，是十分危险的。罢工如果实现，对社会发展是不利的等等。

资本家去极力阻止罢工。6月7日，纺织业资本家穆藕初在卢永祥召集的会议上说：“查上海人民号称百万，而劳动工人居百分之十二（实际下止此数），纱厂工人占最多数，一闻商界罢市，各工人亦有罢工之议。湘玥以工界罢工最为危险，遂邀各纱厂开紧急会议，竭力遏止，……。”[14]

但是，工人们并没有遵从资本家的意旨，而是陆续实现了全市的大罢工。这很使资本家恼火。在一些资本家看来，由日资开办的一些工厂实行罢工，还情有可原；由中国人开办的工厂则绝不应该出现罢工。他们甚至提出“工战”（意思是说用加紧生产，发展工业的方法未抵制帝国主义）的口号，对工人们进行欺骗，企图把工人们的热情引导到增加生产，以便利他们赚取更多的利润，而不是引导到工厂不开工，与他们作对。当然，资本家的这些小把戏并没有骗过工人，他们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得到实现。

第四，资产阶级在罢市后不久，就随时准备着开市。因为他们是资本家，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像这样旷日持久罢市，对他们的利润剥削究竟是有影响的。有一个商人在事后曾经说：“我们前次罢市真不值得，罢了七天，损失了两千多万，仅仅罢免了曹、陆、章。”[15]因此，在罢市期间，商店开门的，经常是有所闻，偷卖日货和进行投机倒把的，更不是个别现象。6月9日，反动政府及总商会“劝导”开市，各银行、各钱庄经理，都同意了；一部分商店代表也主张早日开市。但是由于店员，职员、学生和广大中小工商业者的坚持，反动派和资本家的这项阴谋还是未能实现。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三罢”斗争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正如毛泽东所说：“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表现出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⑯这种两面性，在“三罢”斗争中，是表现得十分清楚的。

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具有这样矛盾的两重性，很显然，在当时就不会成为罢工斗争的主力军，不会引导整个中国社会前进。也这就注定了资产阶级不能长久地站在中国历史舞台之上。

注释：

①《民国日报》，1919年5月10日。

②⑤⑥⑨《时事新报》，1919年5月11日，1919年6月7日，1919年6月8日，1919年5月28日。

③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5辑，第36页。

④⑦⑩⑫⑭《新闻报》，1919年6月7日，1919年6月10日，1919年6月9日，1919年6月8日，1919年6月8日。

⑧⑪⑬《申报》，1919年6月8日，1919年6月7日，1919年6月6日。

⑮《新潮》第2卷，第489页。

⑯《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9~640页。

北京政府罢免卖国贼

自从五四运动爆发以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就是全国人民攻击的对象，被全国人民异口同声地称为卖国贼，要求北京政府必须严惩。曹、章、陆长期以来任政府要职，却屈膝媚外，丧权辱国，特别是直接与日本签订了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导致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交通总长曹汝霖，辛亥革命前任清朝外务部副大臣。1913 年 8 月，在袁世凯政府任外交次长。1915 年参与了和日本公使日置益谈判“二十一”条，并且受命多次私访日置益，探听日方意图，秘密商议签约之条件，还起草了相关文件。在正式谈判过程中，日本代表日置益于 3 月 17 日因坠马受伤了。既然如此，那么就应该停止谈判或者应由日方改派谈判代表。但是，卖国贼曹汝霖等人，却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日置益的床前去进行会议。曹汝霖在回忆这次谈判时说：“适日使坠马受伤，会议停了三次，小幡来部告我，公使伤未愈，腿涂石膏，不能下床，但急于会议，拟请陆总长与您枉驾使馆会议。余告陆总长同意，遂移至日本使馆会议。日使不能下床，就在床前设桌会议。”[①]这种国家之间外交代表的谈判，实在是古今中外外交史上罕见的丑闻。曹还以中国的矿山、银行、交通事业等为抵押品，向日本借了大批外债，作为北洋军阀进行战争的经费，并且他个人从中牟取暴利。

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曹汝霖关系友好。在袁世凯政府任大理院长、司法总长。从 1916 年底开始出任中国驻日特命公使。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章授段祺瑞的旨意，与日本签订了矛头指向苏俄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是日本军队大批进入我国东北和内蒙。1918 年秋，日本为了维护其在山东的权益，除用 2 000 万日元借款取得对济顺和高徐两条铁路的控制权外，又向中国提出处理山东问题的照会，其中就包括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胶济铁路归“中日合办”等七项内容。北京政府为了能拿到借款，不惜断送山东主权。章根据曹汝霖的指示，以政府名义承认了上述日本的无理要求。这就成了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抢夺山东的证据。

币制总局总裁陆宗舆，在袁世凯政府任驻日公使。1914 年，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侵入山东。陆奉袁世凯之命向日表示了愿意划出山东龙口、莱州和胶州湾附近地带为“交战区”。1915 年，陆在袁世凯与日本政府谈判和签订“二十一条”的过程中，曾奉命到东京与日本外相多次秘密会晤，打探日方的意图和动向。1918 年，陆还以中华汇业银行总理身份，代表日本兴业等三银行团，先后与北洋政府签订了“有线电报借款”和“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合同，将中国有线电报财产和收益及吉黑两省的森林金矿资源抵押给了日本。

曹、章、陆忠实地执行了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所以他们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但是反动派还竭力为这些卖国贼加以庇护。“五四”学生游行队伍前往曹宅时，反动派立即派军警前去保护曹汝霖，与学生对抗。当学生焚烧曹宅，痛打章宗祥时，反动派则逮捕了几十名学生，护送卖国贼逃走。后来，曹汝霖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被迫提出辞呈，北洋政府却竭力为其辩解，进行挽留，说什么“该总长从政有年，体国公诚，为本大总统所深识。流言诋毁，致酿事端，驯至毁屋殴人，扰害秩序。该总长因公受累，实疚于怀。业经明令将当场逮捕滋事各生及疏于防护人员，分别惩办。时艰孔亟，倚畀方殷，务以国家为重，照常供职，共济时艰。所请应毋庸议。”陆宗舆在人民反对声中也提出辞呈，北洋政府同样也是竭力挽留。

北洋政府庇护卖国贼，镇压爱国学生的行为，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各地各界人民群众纷纷起来，举行罢课、罢市、罢工。要求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拒绝签订巴黎和约，成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斗争口号。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爱国运动逼的反动派不得不考虑对曹、章、陆进行处理，以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避免引起更大的政治危机。

在上海“三罢”斗争实现后，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和沪海道尹沈宝昌于 6 月 8 日给北京政府发了一分万分火急的电报，电报中如是说：“此次沪上风潮始由学生罢课，继由商人罢市，近且将有劳动工人同盟罢工。现在罢市业经三日，并闻内地如南京、宁波等地亦有罢市之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永祥等伏查上海为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及，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现在上海学界坚以曹、陆、章三人去职为开市条件，商界亦曾有电请求，民心向背，即时局安危，亦不敢壅于上闻，可否查照上海总商会前电所呈，准将三人一并免职，命令宣示，以表示政府委曲求全力顾大局之意，时机万迫，伏候明令遵行”。[②]

上海的“三罢”迅速蔓延到其他城市。这些行动都给北京政府以巨大的压力，但是最严重的打击还是来自在经济上控制着北京的天津市。6月9日，天津学生联合会组织了一次市民群众集会，有2万多市民参加。天津总商会在学生和市民的说服和压力下，决定从6月10日起举行一次罢市。6月9日下午，天津决定罢市的消息传到北京，北京商界心理上的反应立即引起了金融恐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在市场上突然变得不受欢迎。北京的商人也打算暂停营业。政府开始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此后不久，从天津传来的消息更为恶化。工人们步商人的后尘，将于6月10日开始罢工。如果这种形势继续下去，全市的公用事业将陷于停顿。

全国斗争的开展，又推动了五四运动发源地北京斗争的不断深人。6月7日，北京总商会在给北京政府的呈文中，讲到北京地区的情况时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气之奋兴，诚未可遏塞而致使溃决。侧闻罢学罢市，各省已有逐渐响应之虑，京师彼此儆刺，亦暗有浮功情形”。[③]到了6月10日，北京的形势更加严重了。

6月10日这一天，北京学生团体决定：“身背卧具往公府请愿，一，惩卖国贼；二，青岛不签字；三，不承认胡仁源为大学校长。如不允，即卧以待命，非允后不散。”[④]当天，北京各团体代表也面见了徐世昌，一致表达了形势严峻，需惩办卖国贼之意。

在北京各阶层人民的斗争中，以直接参加生产的工人劳动者，对反动派的威胁最大。以长辛店的铁路工人为例。一些老工人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六月三日以后，卖国政府逮捕学生，上海工人大罢工。消息传到了长辛店，我们厂里工人再也不能沉默了。本来这些天大伙早就没心干活，这时几个工人骨干和学生们商量了一下，就决定举行示威游行。一天中午，史文彬和陈励茂、张珍领着很多工人到大街艺员养成所的门口去集合，陶善琮也领着艺员养成所的学生出来了，大家上了大街……于是在长辛店大街上开始了第一次工人的游行，队伍里边也有几个工头，史文彬和陶善琮两人在前头领头，有一百来个工人，艺员养成所和车务见习所的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在后面……这次游行开了头，以后就游上了劲，三天两头尽游行，晚上还搞过一回‘捉灯会’，也是个示威游行。”[⑤]据当年长辛店救国联合会会长盛成的回忆，他于1919年6月9日上午去天津，接受天津各界援助罢工的爱国捐款，下午回到长辛店，当地工人即酝酿罢工。曹汝霖在得知要罢工的消息后更加胆战心惊，感到不辞职是不行了。

面对这种危机，北京政府与6月9日午夜召开会议，讨论接受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辞职的事情。6月10日，下达了处理国贼的命令，但是当日上午仅仅发布了一条准免曹汝霖职务的命令，这当然不足以平民愤。新闻界报道北京学界在当日的活动说："上午，各学校学生拟齐赴公府，谒见总统，要求惩办曹章陆诸人。当由警察厅（告）各学校，谓免曹之命，上午准颁下，请即从缓。各学生遂即准备下午再行出发，准曹令既下，章、陆并无下文。乃由学生联合会曾举出代表六人，赴国务院，教育部两处，请见总理及傅次长。结果当局告以章陆免职令立时可下，学生代表立即退出。"[⑥]在各界群众的愤怒抗议下，北京政府才又不得不在当日午后发布了一条准免陆宗舆职务的命令。可以看出，北京政府的让步，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只是采取了一种敷衍塞责的态度。

对付北京政府这种老奸巨猾的态度，只有坚决斗争。10日下午，天津总商会给北京政府发了一封急电，其中说："本日仅准曹汝霖辞职，似此可以谢国人乎……？查栖息于洋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迁延不决，演成实事，其危厄之局，痛昔有过于罢市者。"[⑦]天津总商会的急电，使北京政府极为震惊。因为天律近在咫尺，如果那里的几十万工人大罢工将直援威胁到北京，北京政府将不稳。在这种"危厄之局"的逼迫下，北京政府才又发布了准免章宗祥职务的命令，在最后一次命令下达后，北京政府以十分恐惧的心情，紧急将以上三种命令送往天津，提示大众，可以开市了。这时，已经是6月10日的深夜。就在这样严峻的情势下，北京政府才被迫下令免去了曹汝霖的交通总长、章宗祥的驻日公使和陆宗舆的币制局总裁职务。6月11日北京的《晨报》记载："罢免曹、章、陆的命令之发表，实分为三次：其第一次发表者为免曹令，盖日前已定者也。乃该令发表之际，既得天津罢市之消息，同时上海各银行又电京行报告上海罢市绵延多日，形势日益重大，政府如不能尽本日将罢免曹、章之命令发表，则沪上金融无法维持，危险万状云云。京行得此电报，遂联合向政府声明，并请速定办法。政府无可如何，遂于昨午后将陆宗舆免职令发布，以为如此，似可餍足商学界之心，而镇压眼前之危险。孰意下午复得上海中国各银行团体及商会来电，略称：政府如能将曹、陆、章三人同时罢免，则彼等可担任向商界极力疏通，劝其明日开市，如不能完全办到，则商民有所借口，前途将易纠纷，安危所系，只在一日，专候明令云云。京中各银行得此电，复向政府交涉，政府踌躇再三，谓章宗祥并无辞呈，无从批准免职等语。个银行代表

谓：安危已在俄顷，政府如尚无决心，彼等实不能负责云云。政府迫于无法，遂答应再将章宗祥免职令发表。”

曹、章、陆的被免职，是全国人民一个多月来共同斗争的结果，是群众运动的伟大胜利。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群众都为此高兴。陆宗舆的家乡浙江海宁县，还特意召开了公民大会，决定为卖国败竖石立碑，使之遗臭万年。“当场由众踊跃输金、饬匠赶办，已于前日制造就，竖立邑庙前及北门外海塘镇、海塔下等三处。碑约五尺余长，真（直）书‘卖国贼陆宗舆’六大字，左右两边并刊民国八年六月海宁公团立，一时观者人山人海，途为之塞云”。⑧

注释：

①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93页。

②《新闻报》，1919年6月10日。

③④《申报》，1919年6月12日。

⑤《北方的红星》，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第49～50页。

⑥上海《时报》，1919年6月13日。

⑦《晨报》，1919年6月13日。

⑧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内务部查办浙江海宁县人民竖立“卖国贼陆宗舆”石碑咨文》，1919年7月23日。

陈独秀的被捕与营救

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亲日派卖国贼被罢免，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目标算是达到了一个，但是，山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斗争并没有结束。再说三人的被罢免，就反对统治者来说，不过是缓兵之计。就在三人被罢免的前后，徐世昌和段祺瑞都曾亲自到曹等的住宅看望。皖系军阀只要控制着中央政权，这三个卖国贼就有可能复职的一天。在北京城，那些反动的步军统领和警察总监们仍然耀武扬威，欺压百姓，许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在这种情形下，学生们的导师、中国思想界的先驱们，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便进一步提出了对北京政权予以“根本之改造”的问题。

6月9日，陈独秀和李大钊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左：（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二）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①]

《宣言》起草完后，陈独秀把它交给了老乡胡适，由胡适译成了英文。为安全起见，李大钊建议把《宣言》送到北大平时印讲义的蒿祝寺旁小印刷所印刷。当晚陈独秀与高一涵前往该处，印刷所内的两位工人警惕性也很高，事毕将底稿和废纸一概烧得干干净净。传单印完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

陈独秀想试探一下市民对《宣言》的反映，于是他和友人首先来到中央公园（中山公园），时值暑假，市民多在午后去中央公园转转，吃茶的，

乘凉的，会友的，十分热闹。陈独秀友人将一张张传单放在公园没有人的桌上，用茶杯压好，然后在一旁悄悄等待。等到吃茶的人回来，看到传单，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他们就在远处偷着看传单在中山公园受到的欢迎，使陈独秀在更大范围进行宣传的信心更足了。永安路北侧香厂路的新世界游艺场，成了下一个散发传单的目标。对此事件，北京市档案馆藏京师警察厅档案有较详细的记录。

6月11日下午7点，陈独秀、高一涵和邓初三人受友人之邀，来到新世界附近一个名叫浣花春的四川饭馆聚餐，他们随身带上了千余份传单。晚餐后约8点多，陈独秀西装革履，头戴白帽，立即前往新世界游艺场。到新世界后，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于是潜入了第五层的屋顶花园，那里既无游人，也无电灯。时间已近10点，恰好四层的楼台正放露天电影，趁此良机，四十一岁的陈独秀，凭空一挥，大把的传单如雪片般飘向人群，人群一片骚动……

陈独秀没有料到，此刻危险正向他逼近，新世界早已布满了密探。几天前，外右五区警察署查获了一张传单，说将在新世界安置炸弹，于是警察署立即加派了区警署侦缉队的便衣侦探，每天晚间分布在各楼严密侦查。此外，步军统领衙门也安排了密探严加防范。弹丸之地的新世界，已布下了天罗地网。

进入新世界后，“白帽西服”的陈独秀，因上下楼频繁，而且衣服兜中显现膨满之物，引起了侦缉队两名便衣侦探和步军统领衙门一名密探的注意和跟踪。当陈独秀在五楼屋顶花园准备再次抛洒传单时，一伙埋藏在暗处探员立即涌出，把陈独秀抓住，并从他身上搜出传单一卷和信函一封。因新世界处于闹事繁华地带，为避免引起公众注意，一名侦探脱下灰色大褂将陈独秀罩住，秘密押往外右五区警察署。高一涵回忆陈独秀被捕情景时说：“我同陈独秀、邓初三人到新世界，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陈独秀同我两人只得上新世界的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这时刚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电影，我们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那知道，我们正在向下撒传单时，屋顶花园的阴暗角落里走出一个人来，向陈独秀要传单看，陈独秀实在天真、幼稚，就从衣袋里摸出一张传单给那个人，那个人一看，马上就说；‘就是这个’。即刻叫埋伏在屋顶花园暗地里的一伙暗探，把陈独秀抓住，我乘着这个机会，急走到屋顶花园的天桥上，探子大叫；‘那里还有一个！’我就在

此一刹那间，把手中拿的传单抛了，赶快走下去，杂在戏园的观众中，并脱去长衫，丢掉草帽，躲藏起来。转限看到邓初一人，压在对过台球场内，把传单一张一张地放在茶桌上。我小声告诉他，说：‘独秀已被捕’。他还说：‘不要开玩笑罢！’正说间，遥见陈独秀已被探子们捉下楼来。陈独秀怕我们不知道他被捕，故意大呼大跳起来，说，‘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②

当晚12点，数百军警立即前往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的住宅，从陈独秀家中搜出《北京市民宣言》传单一共数百张，以及杂志、稿件、信札数十件。

在“五四”这个敏感时刻，陈独秀的被捕，立刻引起全国极大的震动，各大报刊、社会团体、学者名流及政界人士强烈谴责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汹涌的营救浪潮席卷而来。

媒体很快向社会披露了此事。6月13日，北京《晨报》等率先报道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全国舆论一片哗然。14日，上海《民国日报》全文发表陈独秀的《北京市民宣言》。15日，《时事新报》刊出《陈独秀无端被捕》时评，《民国日报》发表《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黑暗势力猖獗》的述评：“当此风潮初定、人心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过之诚心，不应对于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17日，《申报》刊载《北京之文字狱》的杂评：“陈独秀之被捕，益世报之封禁，皆北京最近之文字狱也”，“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树欲静而风又来，是诚何心耶?”随之，《神州日报》和《时事新报》等各大报纸都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

学界和教育界立刻行动起来了。15日，在张国焘等学生的艰苦努力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率先致函京师警察厅，提出以下两点：“（一）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倘此次以嫌疑遂加之罪，恐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澜。当此学潮紧急之时，殊非息事宁人之计。（二）陈先生向以提倡新文学新思潮见忌于一般守旧学者，此次忽被逮捕，诚恐国内外人士疑军警当局有意罗织，以为摧残近代思潮之地步。现今各种问题已极复杂，岂可再生枝节，以滋纠纷”。③

16日，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联名马裕藻、马叙伦、程演生、王星拱等知名教授40人，致函警察总监：“查陈独秀此次行动，果如报纸所载，诚不免有越轨之嫌，然原其用心无非激于书生爱国之愚悃。夙仰钧厅维持地方，向主息事宁人，商学各界钦感同深，可否于陈独秀宽其既往，以示国家

爱护士类，曲予裁成之至意”。[④]

17日，江苏省教育会致函教育部：“陈独秀被捕，众情疑骇，谓将兴文字之狱，查言论自由载在约法，学潮甫息，似不宜再激波澜，请从速省释，以免各方误会”。[⑤]

20日，民国大学校长应善以，联名中国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新华商业专门学校等学校29人，致函警察总监：“查陈独秀平日言论无论是否适当，然原其用意无非出于书生爱国之忱。窃念钧厅保卫地方，维护士类，素为学商各界所钦仰，可否于陈独秀宽其既往，以示国家宽大之至意”。[⑥]

共同起草《宣言》的李大钊，得知消息后，立即组织学生将陈独秀被捕消息四处传播，通过制造社会舆论压力营救陈独秀。23日，北大学生黄昆仑致信全国学联，请求声援：“夫苟使鼓吹新思想之人而受武力之摧残，是明与吾等运动之初意相背戾，且去吾等之目标更远矣”，“敢请同学诸君对于陈先生竭力营救，或出于示威运动亦所不惜”。[⑦]

李达在发表的《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中，把陈独秀称为‘鼓吹新思想’先生。‘鼓吹新思想’就成了北京政府逮捕陈独秀的原因。“‘鼓吹新思想’的书生，北京政府何以要逮他呢？因为现在的北京政府，是顽固守旧的政府、卖国的政府。陈先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并且还用文字反对政府卖国的行为。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朦胧里提醒觉悟起来。北京政府为了这样，卖国的举动不大方便。所以，忌到这位‘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想把‘莫须有’的事随便戴在陈先生的头上，说是在他家里发现过激派的书籍印刷物。这事并不是真的。要把陈先生做个标本，来恐吓许多鼓吹新思想的一般人”。[⑧]

随后，政界也卷入了拯救阵营。

6月22日，社会名流章士钊分别致电龚心湛、王克敏等政要，谴责这是“忽兴文网，重激众怒”，[⑨]“试观古今中外，每当文网最盛之秋，正其国运衰败歇之候，以明末为殷鉴，可为寒心。今日谣诼繁兴，清流危惧，乃迭有此罪及文人之举，是真国家不祥之象，天下大乱之基也”。[⑩]

在京皖籍官绅、安徽省长吕调元，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国民大会上海干事部、中华工业协会也都致电当局，要求释放陈独秀。远在上海的孙中山，在会见徐世昌、段祺瑞的和谈代表许世英时，也郑重地提出了陈独秀在北京被捕之事，要求予以释放。

当年的毛泽东也加入了呼吁释放陈独秀的行列。7 月 14 日，《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署名“泽东”的《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一文：“陈君之被逮，绝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绝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11]

在五四浪潮汹涌澎湃的 1919 年，军阀政府还不敢太肆无忌惮。社会各界的声援和营救，给北洋政府当局造成了巨大压力。

面对日益浩大的保陈声势，实际捕控陈独秀在手的吴炳湘想早日扔掉这个烫手的山芋了。吴炳湘与陈独秀是同乡，于是对陈也没有苛待。在被捕期间，陈独秀患上了胃病，由警察厅医药室医师进行诊治，经过十多天的坚持服药，胃病痊愈。

在各方声势浩大的营救浪潮下，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京师警察厅于 9 月 16 日作出了释放决定。9 月 17 日，在监狱拘禁近百天的陈独秀，终于回家了。

按照豫戒法规定，出狱后陈独秀的行踪仍旧受到警察署的严密监视。尽管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走出监狱无论如何也是值得喜庆的事情，大家都为陈独秀的释放而高兴和鼓舞。李大钊、刘半农、胡适、沈尹默等同人在《新青年》发表白话新诗，欢迎他的出狱。李大钊在《欢迎独秀出狱》中写道：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相别才有几十日，这里有了许多更易；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却不见了你和我们首创的报纸！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惜，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1920 年 1 月底，仍受到监视的陈独秀，假称去拜访胡适，经友人协助顺利脱身，离京赶赴上海，彻底获得了人身自由。

注释：

①⑧⑩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6月14日，1919年6月24日，1919年6月23日。

②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 第62~63页。

③④⑤⑥⑦《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页，第62页，第63页，第64页。

⑨《湘江评论》创刊号。

⑪《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成立

自从五四运动开始以来，青年学生都起了先锋和带头作用。根据斗争的需要，各地都先后建立了学生联合会组织。为了加强对全国学生运动的统一领导，能够使各地学生运动更好地配合起来，迫切需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机构。

还在5月底，北京和天津两市学联就邀请上海、南京、太原、济南、保定、汉口、杭州等市学联各派代表前往上海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6月1日，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及留日学生代表即在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召集全国学联的筹备会，“议决名称为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并发电各地联合会，请于两星期内各派代表二人来沪，商订章程及办法，再开成立大会。”①

6月12日，在上海人民庆祝“三罢”斗争胜利的同时，在上海的全国学联筹备会上，“多数以为此次要求，一为外争外交，一为内惩国贼。今外交既未脱离悲观境界，国贼亦止于准免本职，揆诸最初之希望，百未一达。”筹备会在致各省各团体的通电中，指出：“如曹、陆、章辈，实繁有徒，若段祺瑞、徐树铮实为元恶，倘不除恶务尽，虽有华盛顿莫与维新，陈东等之伏阙上书宁有济耶?”②

6月16日下午2点，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在上海大东旅馆六楼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代表。他们是：“北京段锡朋、陈宝锷、许德珩、黄日葵、黄炳蔚、罗国焜、罗发组. 张伯谦；上海何葆仁、陈伦会、恽震、瞿宣颖、舒志侠女士、程孝福女士、陆匀绡女士、高时侠；日本留学界廖方新、王之祯、凌炳. 邹卫、刘振群、盛世才；天漳张阳光；武昌蒋元龙、潘德芬；南京郎宝銮、曹公瑾、吴邦杰；杭州连瑞琦、黄维时、陈中嶽、曹烈；济南崔书馨、卓景泰；嘉兴吴乃燮、葛敬庚；松江陈熹、王同福、汤爻、庄居正；崇明王欧、施英；南通罗元恺、潘润夫；九江邓毅；保定吴震寰，吉林吴仁华；安徽常万元、汤志先；宁波张其昀、丁福成；河南

李仁荣、李九朝；唐山周易；苏州尤敦信、周承澍；扬州孔庆洙。”[③]

除各地学生代表外，教育界、商界、工界、报界的一些著名人士应邀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其中包括教育界人士蒋梦麟、黄炎培等二十余人；商界人士卢伟昌、汤节之等十余人；工界人士吴琢之等六人；报界人士戈公振等十余人。还有个别外宾，如教会学校的教职员等，也来参加了此次大会。

北京学生代表段锡朋主持会议并发表演说。北京学生代表许德珩在会上强调："我辈宜去虚荣心而牢守坚忍心。"[④]上海学生代表何葆仁报告了全国学联筹备经过，并针对曹章陆被罢免后学生运动可能出现松劲甚至半途而废的情况，在会上强调指出，全国学生联合会一定要长期存在下去，"当与中华民国终始"，决不可"于去卖国贼废条约后所能中止"，是因为"中国社会不良，卖国贼必不能止绝。"[⑤]

各界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教育界代表黄炎培强调："无论何种团体，融洽一致最难，内部一有猜疑，对外即无能力。"教育界演说的另一代表蒋梦麟，则宣扬英美的影响，他说："杜威博士曾劝我辈尝以英文论著送英法美诸国，引动友邦对我中国学生表同情"；又说："中国学商工各界之活跃，实美国之新感想新精神有以玉成"。[⑥]

求新厂的吴琢之代表工界发言，表示要克服工人队伍中"无团体力"等弱点，增强工人阶级的团结。报界代表在致辞中赞赏北京大学去年提出的"求学不忘爱国，爱国不废求学"的口号，并说"商则应去贵族商会而别成一平民商会，此上海人士之公言也；工则处此万国劳动同盟说盛行时代，我国更应急起直追，俾不至以地位悬殊而见屏于世界各国之劳动界。甚望商工两界亦能早自设备，如我学界之联合开大会茸。"[⑦]

6月18日，全国学联召开选举职员会。选出了36名全国学联职员，北京学生代表段锡朋当选为正会长，上海代表何葆仁当选为副会长，北京学生代表陈宝锷当选为评议长。全国学联设评议部和执行部。会址设在上海。

会议还通过了《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章程》，确定"以联络感情、昌明学术、促进社会、辅卫国家为宗旨"，讨论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办法，出版了《全国学生联合会日刊》，决定由北京、天津、上海等7处学联各派一人组成全国学联第一届理事会。这次会议宣告了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的正式成立，推动了全国学生运动的健康发展。

全国学联成立后，立即号召和组织各地学生，投入到拒签和约运动当中。

注释：

①⑤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6月2日，1919年6月17日。

②《时报》，1919年6月13日。

③④⑥⑦《申报》，1919年6月17日。

中国代表拒签和约

在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中，“惩办卖国贼”、“收回山东、青岛主权”、“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等等这些要求，只有“惩办卖国贼”在艰难的斗争下实现了。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互相勾结，进行交易，企图把我国山东、青岛的权益让与日本，帝国主义这种野蛮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一场轰轰烈烈的拒签和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参加这个运动的人员极其广泛。有城市里的工人、学生、店员、教师、商人，也有乡村里的农民，特别是工人，自从“六三”运动后，表现得非常坚决和英勇。他们认为：“若卖国首领未诛，卖国条约未废，亡国之祸终难幸免。”有的工人大声疾呼：“徐世昌去职难成事实，签字势在必行。签字而山东亡，山东亡而全国随之，亡国大难迫于眉睫，吾同胞忍坐视家国之亡而甘心作奴隶乎！”①

由于5月4日以来人民群众表示的巨大威力，使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和北京政府对签字问题都不能不有所考虑。在北京政府给各省区的密电中就反映了这种矛盾状态。密电中说：“此事国人甚为注重，既未达最初目的，乃并无交还中国之规定，五国断难承认。但若不签字，则于协商及国际联盟种种关系亦不无影响。故签字与否，颇难决定。”②可是这些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奴才们考虑的结果，却认为签字比不签字好，认为签字有六大害处。特别是“若竟拒绝签字，不唯有负各国调停之苦心，抑且不啻自绝于国际联盟之保障，各国将来更难过问”。③

北京政府的卖国行径，再一次激起了全国人民群众爱国运动的高潮。要求拒签和约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更加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由于和约直接牵涉到山东问题，因此山东人民在拒签和约运动中特别积极。早在五四运动刚刚兴起时，山东人民就表示坚决反对在和约上签字。5月5日，山东省议会要求北京政府“迅电专使拒绝署名，一面提出抗议，借谋挽救，否则，退出和会，以为后图”。④5月6日，山东各界致电北京政府，指出：“青岛

问题，日人主张德国直交彼国，且以退出和会相要挟，是其必得青岛之心，昭然若揭，倘非尽力争拒，以杜贪婪，恐将来抱蔓摘瓜，祸至无日”。要求“严饬陆顾王各专使，坚持正谊，勿稍游移。如不能贯彻主张，即请撤回专使”，表示“山东人民，誓为后盾”。[5]到了6月，随着巴黎和会签字日期的临近，山东各界人民群众反对在和约上签字的斗争更加激烈。6月5日，山东农会致电北京政府表示：“青岛交涉，日趋险恶，和会签字期迫，东人誓死否认。恳速电陆专使，据理力争，万勿签字，以保国权。”[6]不久，有几千农民包围山东省长公署，请求不在和约上签字。6月12日，山东工商业联合会也致电北京政府，提出了罢市的四项要求，明确要否认青岛签字。

为了能够使北京政府明白山东各界人民反对在和约上签字的强烈要求，6月18日，山东省议会、律师工会、教育会、学生会、农会、商会等团体决定派出请愿团进京。“不达目的终不返籍，倘政府仍是敷衍，则农人亦将罢耕，以表一致。”[7]6月20日，山东80多位代表到达北京。中午，齐赴新华门，向总统府和国务院请愿。提出以下三项要求：“一、拒绝和约签字；二、废除高徐、顺济铁路草约；三、惩办国贼。”[8]但是，徐世昌拒绝接见，代表们受到卫兵、军警的种种无理阻挠。后来代表们进入总统府第一道门，徐世昌派秘书前往代见，对代表们是极度敷衍。反动派的这种态度，更加激怒了充满爱国义愤的各界人民，代表们齐声大呼说：“山东之存亡，即吾辈之生死关头，今日如不得见总统要求以相当之保证，则誓死于此，亦不归寓。”[9]代表们在新华门前坚持数小时不走，甚至“跪在门外，放声号哭。时适下大雨，一小时后，各代表尽陷宁水污泥淖之中，痛哭失声，闻者悱恻”。[10]代表们就这样坚持斗争了数小时，直到下午5时，北京政府才被迫答应接见，但须“改定日期，限定人数”。

6月21日，山东全体代表到国务院，并推举出五人面见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总理钱能训已于6月13日辞职），向他提出前面三项要求，结果无功而返。23日，山东代表推出6人在怀仁堂面见徐世昌。一位代表先朗读了请愿书。在请愿书中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山东的暴行，详细陈述了山东人民的三项要求。接着几位代表轮流发言，他们重述了三项要求，并哭泣地说：“起程之际，我东民父老昆季姊妹环跪车站，泣不成声，嘱代表等，请求不遂，不得生还。”[11]代表们发言时，声泪俱下，极为动人，有的警卫人员甚至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在代表们沉痛哀切的泣诉和义正言辞的要求下，徐世昌不得不说：“进京请愿的意思很好，但不可长留北京，应当即日回

济，以免荒废职务。关于对德和约，已由巴黎和会中国全权大使陆徵祥，在'山东三条'上拒绝签字。关于和日本签订的修筑高徐、济顺铁路草约，可以废除，但所借日款二千万元，须归还。此时国库支绌，须由山东担任半数。至于惩办曹、章、陆事属法律范围，总统无法律根据不能随便予人以罪。"[12]接着徐世昌又说，山东提出的三项要求，将由国务院批复。6月25日，山东代表六人再至国务院见龚心湛，要求拒绝签字之保证。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北京政府在山东问题上，被迫暂时采纳了民意，但是对惩办国贼和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则竭力回避拒绝。

山东代表的请愿斗争，使北京和各地人民再一次聚集起来，一致行动。6月27日，山东代表请愿团、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代表请愿团、京师总商会代表、留日学生代表、报界代表、基督教代表、陕西学生联合会代表等。各界代表达到数百人。同日，天津各界联合会也派了10名代表（包括女界同志会代表两名）到京，参加了联合请愿的活动。联合请愿的代表们要面见徐世昌。但徐又拒不接见，只派了一个教育部的次长出来。反动派这种敷衍的态度，当然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学生和各界代表们守候在门前坚持不散，在新华门前伫立了一天一夜。直到28日，徐世昌才被迫接见了10名代表。但是徐世昌竟然敷衍学生说："你们年纪太轻，没有政治经验，容易受别人利用。我们国家多年积弱，不能操之过急。学生们爱国心切，陈述意见，情有可原，如果聚众滋事，那就不对了。希望你们安心读书，国家大事自有权衡。"代表们对徐的答复一致不满。陕西学生代表屈武激愤地说："现在国家都快要亡了，今天丢青岛，明天丢山东，后天就可能丢整个华北，如果政府再不想办法，不答应学生们的要求，我们只好以死力争。"[13]说完，屈武就长跪痛哭，以头触地有声，头部受伤。当即被送往医院诊治。徐世昌趁机溜走，再由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敷衍学生。

当山东、天津、北京各界代表联合请愿的时候，上海各界人民也积极配合，开展拒签和约的运动。

6月21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各界各团体召开会议，反对在和约上签字。会议由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段锡朋主持。北京学生许德珩发言，批驳了北京政府主张在和约上签字的所谓理由，说："北京政府主张之理由，首以加入国际联盟为词，但查国际联盟第一条，则以保持联盟各国之状态为主旨。试问我国今日送一土，明日卖一地，如中日密约不取消，青岛不收回，则加入联盟，是永无收回国权之希望。"[14]与此同时，上海工商界报界等

也尖锐地指出：北京“当局者为日人所协诱，不惜与民意宣战，悍然主张签字。是北京之当局非代表民意之机关，乃代表日本侵略我土地、攫取我国权之事务所也。”并郑重宣布：“已集合各界会议一致决议：‘北京当局纵允签字，吾人誓不承认并否认欧战中中日一切协诱而成之密约。’”6月23日，上海一些团体还向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拍发了要求不签字的电报，电文中说：“如或违背民意，不保留青岛及山东主权而签约者，当与曹、章、陆同论。”[15]

为了反对在合约上签字，上海各界还举行了集会和游行。6月27日，各界群众纷纷集于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召开了拒签和约的万人大会。北京、天津等各地的学生代表和上海各界代表都发表了演说，一致反对在和约上签字，主张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为此大会还以上海学商工报各界大会名义给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和国内各群众团体发了电报。在给各省议会、各团体、各学校的电报中，号召速开国民大会。7月1日，由于尚未得到拒签和约的消息，上海各界再次召开了有十余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学生们和各界代表愤激地提出了各项拒约救亡的主张，一位工界代表在大会上明确主张：“救国必须从根本解决，就是要推翻卖国政府。因卖国政府一天存在，他可以在外交上、内政上活动，订约借款，压迫国民，为所欲为。故国民必须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讲话结束后，沿城区主要街道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

除山东、北京、上海外，其他许多地区也都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拒签和约的斗争。

巴黎的中国代表们，不仅受到国内群众爱国运动巨大的间接的压力，还受到在巴黎的中国学生、工人和华侨的直接压力。6月28日签约的当天，在巴黎的中国学生、工人和华侨包围了设在露蒂霞饭店的中国代表团总部及陆征祥在法国圣克劳德疗养院的住处。这些群众把代表团围住，阻止他们前去签字。只是在法国鸣炮向世界宣布凡尔赛和约已签字后，中国学生和工人才离开他们回到了各自的岗位。《时事新报》7月6日载：“据说二十八日那一天，各专使的寓所满被侨法的中国工人和学生围住了，不准专使出门，扬言如果出门，当扑杀之。吾们（指工人学生）已预备了每一个专使的命用三个人的命去偿他。这预备偿命的人已开了名单，不管要出门的专使是被谁打死的，这预备偿命的人总去偿命。因此专使不敢出门，二十八日未曾列席。”《民国日报》7月7日记载“至德代表莅法之日，我国旅法华工万余人

纷纷集议，向各专使请求拒绝签字。翌日（即全约签字之日），旅法华工集合至三万余人，奔走呼吁，其结果则我国专使声明山东不保留，和约不签字云。又据其使馆之消息，尚谓华工曾经将专使寓所包围，以致专使等不能赴会签字云云。”

全国人民所掀起的拒签和约运动阻止了专使在巴黎合约上签字，这在北京政府所编的《巴黎会议关于胶澳问题交涉纪要》中也供认不讳。《既要》的第三部分说：“自专使来电，对德草案于交还胶澳一层未能列入，全国舆论鼎沸，愤懑达于极点。各界合词请愿政府，对于和约毋得签字。府院两处，接各团体来电日数十起，而尤以学界最为激烈。始而中学以上全体罢课，渐至联合商界，终至津沪各处相继罢市……政府以民意所在，既不敢轻为签字之主张，而国际地位所关，又不敢轻下签字之断语，左右掣肘，而地位益臻困难矣。会巴黎方面各专使，亦迭接国内数十处去电，对于签字保留，一致呼吁，异常愤激。各使鉴于全国舆论，不敢拂逆众意，对于保留办法，坚持益力，顾会中仍不允认，于是不签字之局遂以实现。”[18]

这次的巴黎和会，是世界上几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制订的，中国代表竟然敢于拒绝在这个合约上签字，这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确是空前的。这也是一切侮辱、轻视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所万万没有想到的。6月28日拒签对德和约，标志着自“五四”示威开始的群众性抗议的胜利结束。

注释：

①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6月23日。

②③④⑤⑥《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20页，第327页，第333页，第338页。

⑦⑪⑭《申报》1919年6月23日，1919年6月27日，1919年6月22日。

⑧⑬《五四爱国运动》下，第290页，第862页。

⑨⑮⑰《时事新报》，1919年6月23日，1919年7月2日，1919年6月23日。

⑩《国民公报》，《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462页。

⑫《记五四时期山东各界代表晋京请愿》，《五四时期在山东》，第38页。

⑯《新闻报》，1919年6月25日。

⑱《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56页。

觉悟社的成立

如火如荼的爱国学生运动，使人们的思想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一批先进青年由于共同的觉悟，共同的使命走到了一起，他们志同道合为着拯救处于危难之中的祖国而奋力拼博，历史忠实地记下了他们的光荣业绩。1919 年 9 月 2 日，从北京到天津的火车飞驰着，在车上坐着周恩来和郭隆真、张若茗、谌小岑等被释放的天津代表 7 人。

他们从列车的窗口瞭望着祖国的大地，同时也在思索着和谈论着如何拯救这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铁蹄所蹂躏的破碎河山。以前，由于封建习俗的束缚，男女学生不能在同一个团体中活动，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分成了以南开学校、高等工业学校等男校为主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主的“女界爱国同志会”两大团体。他们虽然也在斗争中彼此支持，但是由于封建观念的束缚，没有在一起联合行动过，更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形势的发展，使他们感到两大团体的联合已是势在必行。几位学生代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酝酿和讨论。郭隆真提出，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应当紧密合作，成为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核心。张若茗提出将两个团体合并起来，女界爱国同志会应该加入天津学生联合会，以壮大学联的阵容。周恩来除同意以上的意见外，还进一步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把两个组织合并外，还要把这两个组织中的骨干分子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比学联更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另组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小组来推动各项斗争和工作；第二，由两会各推若干人办一个刊物，来指导运动的方向，并向广大爱国同胞宣传我们的主张，成为引导社会的先锋。周恩来的这个建议，得到了全体代表的一致赞同。

回到天津，周恩来就和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进行筹备工作，他奔走于两个组织之间，和持有各种观点的同学交换意见，求同存异，统一思想。经过十多天的准备，建立一个新的团体的计划终于确定了。1919 年 9 月 16 日，这个团体在天津草厂庵学联会内成立了。最初由 20 人组成的严密组织，定

名为“觉悟社”，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女会员各十人。他们中有周恩来、邓颖超、马骏、郭隆真、刘清扬、张若茗、李毅韬、谌志笃、谌小岑、潘世纶、李锡锦、关锡斌等。10个男社员中，有7个是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学生，一个高等工业学校的学生，一个是第一师范的学生，一个是北洋大学的学生，他们有的是学联会的正副会长，有的是《会报》的主编，有的则是在天安门前指挥请愿学生和反动当局进行斗争的学生领袖。10个女社员中，都是女子师范的毕业生和学生，也都是女界同志会的负责人或骨干。邓颖超是年龄最小的社员，当时是学联的讲演部长。在筹备过程中，天津学联和女界同志会的负责人，都推举周恩来为觉悟社的领导人，但他谦虚地不肯担任，表示应该平等的轮流负责。可是，每次开会，社员们都推他为主席，虽然总要经过一番推让，但退让的结果，最后是周恩来不得不任主席。就这样在实际上，觉悟社已经成为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总指挥部。

由周恩来提议，觉悟性的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一个方案，其要点是：

（一）用白话文，出一种不定期的小册子；

（二）本“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

（三）这个小册子定名为《觉悟》，主办这个小册子的团体就叫“觉悟社”；

（四）内容：甲、通过共同研究发表主张，乙、批评社会生活，丙、介绍名人言论，丁、灌输世界新思潮。

“觉悟社”成立后，通过了许多创造性的决议。决议规定组织机构采取委员制，不设置会长、秘书之类的职衔，本着分工负责的精神，将内部工作分为数类，由全体社员分担。决议规定新社员的加人，必须有社员三人以上的介绍，经全体社员同意。还通过了女社员的一项提议：发展社员时必须男女各一，以保持社内男女平等的人数。10月21日和12月21日两次通过的新社员，都是一男一女，就是根据这一决议实行的。后来因为请求入社和社员介绍的新社员比较多，就改用一种“社友”的办法。1920年1月，第一批通过了“社友”10人也是男女各半。决议还规定“社员用抽签办法决定代表个人的号数，代替各人对外的姓名。”抽签的方法是用50个号码，各人抽一个，再用这个号码的谐音取一个别名，用以通信或作笔名。周恩来抽的是5号，因此，他的别名叫“伍豪”；邓颖超抽的是一号，因此，她的别名叫“逸豪”。

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一个活动，周恩来提议邀请北京大学教授、五四时期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到觉悟社讲演，灌输新思潮。这项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那是9月21日，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五天，李大钊被邀请到天津来作学术讲演，并被邀请到觉悟社谈话。在觉悟社，李大钊看到这些年轻有为的男女青年，共处一室，议论国家大事，感到非常的高兴。他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五四”时期，还是男女分校的，北京大学的学生到女高师去活动，还要和女校代表各坐会客室的两边，由学监坐在中间加以监视。现在觉悟社的青年们，却以行动把封建教条粉碎了，这怎么能不使人振奋呢？在和社员的谈话中，他特别强调了男女平等的问题，主张应把女子当成“人”看待。女社员们听了，非常感兴趣。他还对觉悟社的活动，如办刊物等，都非常赞成。他回到北京后将天津的情形加以介绍，北京的学生们都非常羡慕。社员们朗诵了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几篇文章特别是《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战后的妇人问题》等，受到了很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李大钊给社员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除李大钊外，觉悟社还请了许多专家学者来社演讲，其中有徐谦讲《救国问题》，包世杰讲《对于新潮流的感想》，周作人讲《日本新村的精神》，钱玄同讲《研究白话文学》，刘半农讲《白话诗》等。觉悟社还召开各种问题的讨论会，题目先后有：学生的根本觉悟，家庭改造，共同生活，工读主义等。讨论的方法有全体会，分组会，有报告，有批评，也有“忏悔”（就是自我批评）。当时，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在中国还没有出版，只有《新青年》等刊物登载过一些介绍文章。觉悟社的社员虽然有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和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处于比较幼稚的启蒙时期，很少有人像周恩来那样在日本已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由周恩来主编的《觉悟》杂志于1920年1月出版了第一期，封面题字上刊印着醒目的五角星，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照亮了他们前进的道路，促起了他们的觉悟。这本杂志大三十二开，一百余页，将近十万字。第一期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三篇文章和五首白话诗。《觉悟》和《觉悟的宣言》是两篇纲领性的文字，都为周恩来所写。其中《觉悟》一文实际上是该刊的发刊词，仅六百余字，但论述精辟，言简意赅。文中写道：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觉悟”，一切生物不能够“觉悟”。“觉悟”的起点，由于人能够知道自己。因为觉悟，遂能解决人生的人格、地位、趋向，向进化方面求种种适应于“人”的生活。周恩来认为，觉悟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进化过程，觉悟的人，必定是不满意现状，去另辟一条新

道，接连不断地往前走，去求无穷的进化。在《觉悟的宣言》中阐述了觉悟社的宗旨和任务，其中写道："'觉悟'的声浪，在二十世纪新潮流中，蓬勃得很厉害。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有了这种'觉悟'，遂酝酿成这次全国的'学潮'，冲动了全国的学生界，人人全想向'觉悟'方面走。"他还写道：觉悟社的目标是"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于'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抽象的话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周恩来提出，发扬宗旨的办法有四种：一、取共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社会一切应用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介绍社外人的言论——著作同讲演；四、灌输世界新思潮。在这篇宣言的最后，周恩来充满激情地写道："我们的决心就是齐心努力向'觉悟'道上走，同时也盼望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向'觉悟'道上走。努力！奋斗！一步步的'觉悟'，一步步的'进化'。'觉悟'无边无止，'进化'无穷。"[①]

周恩来写的《雨中岚山——日本京都》、《雨后岚山》和《死人的享福》等几首诗也都登在《觉悟》第一期上。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姣妍。[②]

登高远望，
青山渺渺，
被遮掩的白云如带，
十数电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
此刻岛民心理，彷佛从情景中呼出：
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
从此后"将何所恃"？[③]

西北风呼呼响，冬天到了。

出门雇辆人力车，车夫身上穿件棉袍，我身上也穿件棉袍。

我穿着嫌冷，他穿着却嫌累赘；脱下来放在我的脚上，我感谢他爱我，他谢谢我助他便他。

共同生活？活人的劳动！死人的享福！[④]

《觉悟》出刊后，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上海《新人》杂志评价道："《觉悟》内讨论的问题全是长篇而有秩序，为现在各出版物中所未有"。《觉悟》第二期准备了四十余篇稿件，内容更加丰富，本拟2月20日出版，但由于"一·二九"事件发生，周恩来被捕入狱，因而未能印刷出来。

觉悟社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在北京及全国各地引起了很大反响。当时的北京《晨报》，对觉悟社加以评论说：天津的许多青年学生团体"由纯粹的分子来结合而具有特别色彩的，确是微乎其微了，记者敢对诸君说，天津只有一个这种的团体，可以说是天津的小明星"，"这团体就是'觉悟社'，该社产生了三个月，会员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结合的小团体"，"他们抱了时时觉悟、刻刻觉悟的决心，所以叫觉悟社。"[⑤]1920年1月，觉悟社发动青年学生开展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和抵制日货的斗争，周恩来、郭隆真等遭反动当局逮捕。同年7月，周恩来等人出狱。在李大钊的指导和支持下，觉悟社一部分成员于8月间赴法国勤工俭学，觉悟社的主要成员后来大部分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中，周恩来等人创建的觉悟社，以追求真理、不屈不挠的战斗姿态，冲锋陷阵在反帝爱国运动的急流中，它犹如一道闪电，刺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世界，给古老的中国带来希望之光，它的光辉业绩，已载入五四运动的史册。它的战斗精神，永远激励着中国青年奋勇前行，正如《觉悟社社员歌》所唱的那样："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大家齐努力。二十几个同志，大家携手作先驱，奋斗、牺牲是精神，推翻恶势力！"

注释：

①《觉悟》第一期。

②《雨中岚山——日本京都》，1919年4月5日。

③《雨后岚山》，1919年4月5日。

④《四人的幸福》，1919年12月。

⑤北京《晨报》，1919年11月25日。

全国各界联合会的成立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虽然取得了罢免、章、陆，拒签和约等这些重大胜利，青年学生也在运动中起了某种先锋作用，但单独依靠青年学生，没有各界人民群众的联合斗争，也是不可能取得结果的。随着斗争的不断继续，人民的觉悟程度提高了，为了能够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人民的组织程度也愈来愈高。各地在建立了商界、学界、教职员、女界等群众爱国团体后，又出现了各界联合的组织。五四运动后期，为使全国各地的斗争更好地互相支持和配合，全国各界联合会诞生了。

从实践上看，全国各界联合会是由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各界联合会发起和筹备的。"六三"运动中出现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学生联合会的组织"纯出爱国之至诚，惟限于学生一部分，主张固为正当，力量终形薄弱，欲冀外交内政为有实力之匡救，务必结合工商各界组成有系统之团体"。[①]经评议部讨论议决，全国学联以及后来成立的全国各界联合会筹备会先后派代表许德珩、刘振群、王秉乾、施洋等分赴南京、杭州、江西、湖南、武汉等地，通过当地学联组织，推动该地各界联合会的建立。天津各界联合会是在6月18日成立的，它在各地成立的各界联合会中是较早的一个。它在成立后，不仅积极组织代表进京请愿、从事拒签和约运动，而且连续派出代表到各地联络，推动各地各界联合会的建立。经联络各地各界人士的努力结果，到九月份"其已成立各界联合会者如下：石家庄、太原、汉口、南昌、九江、安庆、杭州、南京、镇江。其尚在组织中者如下：开封、芜湖、上海、郑州。"[②]1919年9月中旬，又派出刘清扬等三人到上海，和上海各界联合会发起筹备全国各界联合会。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到11月全国各界联合会正式成立时，各省各地的各界联合会组织已成立了50多个，并在各地的爱国运动中发挥了组织领导作用。

1919年11月10日，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四川路青年会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四五十名代表。他们是由各省和各地方的各界联合会推选

出来的，大都是五四爱国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或骨干。刘清扬主持了大会，她在讲话中指出，在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今天，全国人民“唯一的天旨”，是“群起自救救国”，“今组全国各界联合会，乃国民救国之起点”，亦自救之急务。”[③]她在会上还指出了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宗旨：“（一）救国家于水火；（二）促国民自治精神；（三）救世界人民保守永久之和平。”[④]可以看出，全国各界联合会是一个全国各界群众的爱国团体。

湖北代表施洋在会上宣读了事先起草的《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宣言》，当即被大会一直通过。宣言强调了“国民自决”精神，说：“今之世界，端在多数国民之自决，绝非少数人所能支配。故群众自动，已成世界人类图存之定义”。宣言指出，不论是要摆脱“士无心于学业，商坐困于市廛，农苦苛征，工乏竞进，民生凋敝”的困境，以解民于倒悬；还是要铲除“损我主权”之“不平条约”，以及“权奸之鬻送，他方之侵略”，以保卫国权；都需要“吾人一致奋起而自图之”，决不能“托命于少数特殊阶级”，也不能“专倚他邦为奥助也”。宣言热情赞颂“数月以来，国内之群众运动，风起云涌，虽受种种压迫，而前仆后继，不少顾却；大义当前，决不退让”。接着强调“人类之精神贵团结，不取涣散，而尤赖有正当之组织”。并提出“盖散沙固不足以有为，而乌合足以偾事”。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人民的觉悟有很大的提高，“全国各地，知河群自救为万不可缓之图”。这就是各界联合产生的基础。于是，各地“不约而同，先后有各界联合会之组织，而各地之意见，允宜汇集，俾得发扬真正国民之总意”，“全国人民有一致之动作”，“以求解决吾国数年来未竟之国是”。因此，各地代表云集上海，成立全国各界联合会。宣言最后表示要“合舟共济，众志成城”，“但求有俾于时局，遑恤个人只牺牲。伸张公理，抵御强权，虽遭横逆之加，决不畏难而阻。务使真正民意，永存于世界，自由幸福，普遍与平民。”[⑤]

孙中山的代表黄大伟也到会祝贺和发表了演说，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派当时的状态。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给他们以巨大的震动和积极影响，他们的思想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们认识到：“现在北洋政府固不可靠，而南方之所谓护法（政府）其真能靠乎？既不能，如此所靠者为何人？乃我全国人民也！”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人民的团结和一致在斗争中的重要意义，以往之革命“结果甚微”，其原因就在于“无极大之团结力”，“无一致行动之决心”。资产阶级民主派同情和支持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但是他们不能给人民指明正确的方向，不能领导这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前进。这反映了

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们踏步不前，仍抱着“护法”的旗帜不放，念念不忘的只是民国元年成立的那个临时国会，认为“八年以来，我国如有真正合法之国会，政府亦不能明目张胆卖国”。在他们心目中，国会是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是挽救国家危亡的关键所在。有了它“则卖国政府必可除去，各种事业必可发达，凡各种重大问题均能解决，则南北不统一而自统一矣”。[6]他们不是引导人民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人民早以厌恶了的、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议会上去。章太炎在会上演说中，主张“有范围之革命”。他解释说：“有范围云者，即为护法。护法维何？乃除伪国民、伪总统、卖国贼是也”。他还对当时盛行的“公理战胜强权”的口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挫极等之强权，必须以次等强权行公理以除之，并非仅以公理即能战胜强权也，其中必凡有少许强权乃可。”[7]

各界代表也先后在会上讲了话。有的说：“民国八年以来，各种主权均操之于少数武人政客之手，而所谓民国之主人翁国民，不能奈何之至；今日乃有此平民之大团体成立，岂非幸事！”有的说：“革命不可靠少数武人，必靠全国人民”，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是“全体人民改革腐败政府，打破强权武人之先声”。还有的在会上指出：“不可将工界看得太轻”的呼声，正是“因有中国30万华工在外做工”。[8]中国政府才得派出代表出席巴黎和会。

会议还产生出评议和执行二部，下设六科，所有职员均由各地代表充任。施洋被选为第一届评议部主任。12月9日，在施洋主持下，全国各界联合会召开选举常任委员会议。结果，施洋、张敬之、李耀南、潘惠斋、张正方、卢得华、马少奎、李渤海等就任当选。常任委员负责日常会务工作。

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后，大力开展宣传和组织活动，积极从事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民主的斗争，对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行进行严厉谴责，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爱国运动的延续和发展。1920年5月6日，在北京、上海反动当局和法国使领馆的密谋下，该会被查封。

注释：

①《时报》，1919年8月16日。

②《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582页。

③天津《益世报》，1919年11月13日。

④⑤⑥⑦⑧《时报》，1919年11月11日。

山东惨案

五四爱国运动，从 5 月 4 日的天安门事件到 6 月 28 日的拒签对德和约，历时共五十余天，可以告一段落。7 月 22 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发表了终止罢课的宣言，宣言要求学生们从火热的斗争中回到以前安逸的书斋中去。但是广大的爱国青年学生并没有被这个宣言所束缚，罢课斗争仍时有发生。特别是随着各地惨案的不断出现，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群众运动又不断掀起高潮。影响比较大的是，1919 年下半年发生的山东惨案和福州惨案以及由此引起的全国人民对这两个案件的声援。

山东是皖系军阀和安福系政客控制的地盘，段祺瑞的两名心腹大将张树元和马良掌握着山东的军事大权。张树元是山东督军，马良是济南镇守使兼警备司令。不属于安福系的山东省长沈铭昌，由于当时对学生的爱国运动稍有同情，便遭到了安福系的忌恨。8 月间，安福系的屈映光接任山东省长，据当时报载；“安福为媚日起见，拟将鲁省各官缺尽揽归该派所有。据最近消息，屈映光已允将该省各现任知事一律更动，悉以曾经留学日本人员代之，以便于对日亲善，据说此即安福许屈为鲁省长之一条件。”①

五四运动爆发后，济南市的大部分报纸，如《大东日报》、《民政日报》、《齐鲁日报等》都站在学生一边，对群众的爱国运动表示鼓励和支持。只有日本人办的《济南日报》和安福系的喉舌《昌言报》为日鼓吹，特别是《昌言报》。“屡次谬论，诋毁学潮，并借口省长对学生运动镇压不力，该报曾发表《对省当局进一言》的社论，文章大意是说学生在校，应注意学业，以期科学救国，不宜干涉外事，荒废业务。攻击沈铭昌：不能纠正以正义，反任其操纵驱使，滋生事端，似应退位让贤，以免自贻伊戚等语。”②《昌言报》的反动言论，激怒了山东人民，决定相机予以打击。7 月 21 日上午，济南学、商、工、农各界以及市民共约千余人在省议会召开救国大会。一位小学教师在发言时慷慨陈词，痛斥《昌言报》的卖国行径，并号召各界爱国者誓死不看该报。台下群众情绪激昂。会后，愤怒的人流齐奔《昌

言报》馆。群众涌入《昌言报》馆后，将该报经理张景云、主编薛惠卿等一一绑缚，用纸张书写上“卖国贼”、“汉奸”等字样，贴在他们的胸前背后，牵至街中心。游行的队伍中的宣传队沿途讲演他们的罪状。最后，群众将张景云等送交省长公署和审判厅，请求依法处理他们。不过，就在当天下午，审判厅即将他们给释放了。

捣毁了《昌言报》馆，群众是高兴了，但却触怒了反动派。7 月 22 日，山东督军张树元，以学生强据省议会开会、驱逐议员和群众结队捣毁《昌言报》馆为借口，特发专电北京政府请颁布戒严令。他在电报中污蔑爱国群众是“莠民”“暴民”，把人民的爱国行动污蔑为“肆行强暴，为所欲为”；“拟即实行下令戒严，遵照戒严令取缔一切，并派兵驻护省议会，……倘再有聚众扰乱，肆行无忌者，应请准按照戒严法随时办理，”[③]等等。25 日，北京政府竟无理宣布济南戒严，并委任济南镇守使马良为戒严司令。

马良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卖国贼，他公然主张中国应在巴黎公约上签字。竟然说：“中国要是不签字，一定要亡国；要是签字，中国可以不亡。”[④]马良赤裸裸的卖国言行，遭到了广大人民包括他军中官兵的反对。于是，他在营长以上军官会上说：“参战军之成立，军械饷项皆系日本所供给，如无日本，即无本军。而尔等位置亦无获得，是尔等今日之禄位皆日人所赐，饮水思源，受恩图报，反对日本实系忘恩负义。”[⑤]

马良还是个杀人不眨眼、丧尽天良的刽子手。8 月 3 日，山东学生请愿团向督军、省长请愿，要求解除戒严令，禁止卖米给日本人和释放被捕的爱国者。“马良竟派兵多人，手持利刃，强迫解散。学生坚持不让，即被捕去十六人，幽于第一师范学校。其余学生随往，被拒于门外，跪求亦不允。直至下午一时。马良率大队兵至，每兵携利器数种，挥刃前进，拳足交加，一时哭声达于四衢。”[⑥]马良还惨无人道地杀害了三名爱国回教徒。《昌言报》馆事件后，马良在济南高等师范学堂召集商民开会，公然说：“日本接济饷械有益吾国，理应感激，不宜反对。”七十多岁的马云亭（南礼拜寺首领，济南保安堂药铺坐堂先生）当场予以批驳：“复赴礼拜寺提议将马在寺内所立碑匾一概销毁，以示摒除马良之意。”马良恼羞成怒。会后，立即派兵捣毁了山东回民外交后援会，逮捕了会长马云亭和爱国积极分子朱春祥和朱春涛三人。他们三人都是回民，被捕后受刑很重，并在 8 月 5 日都被枪杀。他们在赴刑场的途中曾大声疾呼：“我三人此次纯系爱国举动，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犯何法律？竟将我枪毙，实为我民国富强前途大有阻碍。”[⑦]当时沿

途观众听到他们的讲话，都报以热烈掌声表示同情和支持。马良还亲自率领拳术队到西关回民聚居区巡查，发现回民骂他的标语或漫画时，即乱劈乱砍。马良还洋洋得意地说："我是回人，先从自己开始，杀几个回人给大家看看！"

接着，马良又到各学校召集学生训话，恫吓爱国学生。他大言不惭地说；"我是拥段（祺瑞）的，段先生参战有功，谁若反段，就是我的对头。"他还说："谁反对我，就逮捕谁。国家大事用不着你们管……不好好念书，这是造反……。"马良讲到这里的时候，台下学生们已是怒不可遏，纷纷起来反驳，"我们是受良心的驱使！""是中国人就应该爱国，试问爱国有罪吗？"马良被问得恼羞成怒，立即唆使大刀队，痛打刚才质问他的学生，结果引起全体在场学生的反抗。

马良这祸国殃民的罪行，不仅激起山东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仇恨，而且也引起了全国人民群众的公愤。全国人民群众又发起了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马良为中心内容的请愿运动。

8月23日，北京、天津、山东、唐山、良乡、上海关等地代表在北京联合进行请愿斗争，要求总统徐世昌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马良。当天上午，各地代表在北京山东中学集会，决定面见总统，呈递请愿书。请愿书写道："下令戒严，横加压迫，以致法网罗织，鸡犬不宁，围校舍如屠城，视人命如草芥，山东全省遂暗无天日。速行解除山东戒严令。济南镇守使马良凭恃权威，平日已无毒不作。自彼兼任戒严司令以来，更逞其摧残教育之积心，肆行荼毒，草菅人命，动触腹诽，市井日惊，居民无告。启我国家法令森严之日，二十世纪民权昌明之世，而容再有此残杀无辜，横蛮无忌之徒，得以行其祸国祸民之计？矧又昌言媚外，发种种合并之谬说，……且恐疼笑友邦，贻坠国体。……即行命令，罢斥马良各职，严加惩办，以慰鲁人，而谢天下。"[8]当日下午，代表们齐赴新华门，徐世昌拒绝接见，派警察处长和督察长敷衍。代表们坚持要当面向徐世昌递交请愿书。反动派认为："无故强人面会，违警罚法定有专条，屋外集合故意喧哗骚扰、举动狂暴者，警察亦有制止之权。"[9]京师警察厅把第一批请愿者多人逮捕，予以拘禁。

反动派的逮捕，吓不倒英勇爱国的人民。在北京，学生们走上街头演讲，散发传单，严厉谴责北京政府无故拘捕请愿代表，表示一定要把斗争进行到底；在天津，学界对山东代表到京请愿，罢免马良职权，反被拘押，大为愤懑；天津公教救国团8月24日急电徐世昌，严正指出："该代表到京请

愿为救国，政府无故捕押，是直与国民构战”，表示将“再推代表晋京”，[10]要求必须尽快正确解决。

第一批山东代表被捕进去，第二批请愿代表又来了。请愿代表们，积极展开宣传活动，到处散发传单，揭露马良的罪行。传单有多种，文字简短有力，北京街道的行人，在看到这些传单后，都非常感动。有一张传单诉述请愿代表被捕，全文是：

取消山东戒严令！

惩办马良！

这两件事，是北京、天津、济南、唐山等处的代表向总统请愿的。总统不但不见，反把代表等一帮囚在警厅里！一帮困在新华门前。

啊！只许卖国的官吏横行，不许小百姓爱国！

大家快起来想法吧！[11]

还有一张传单，揭发马良和反动政府的罪行，全文是：

请愿！请愿！要大家发点天良！救山东同胞！救自己！

山东镇守使马良，原是武人，不能尽他的天职，护卫国家，反倒干涉行政、司法、外交，现在甚至恃借其势卖国，妄杀无辜，殴辱学生，禁止国民提倡国货，竟公然说道日本卖给他军械，是他的恩人，中国要和日本合并等等荒谬极了的话。这样看来，政府不但不惩戒于他，还要信重他，用戒严令钳制人民的口，又拘留这一次的请愿代表，这不是政府竟想叫山东人民无声无思的做日本奴隶么？

诸位呀！时急矣！事迫矣！大家快起来，求政府中人发点天良吧！[12]

8月26日，北京、天津的第二批请愿代表在北京集会，研究继续请愿的有关事宜。会议推举天津学联副会长马骏为会议的临时主席和请愿队伍的总指挥。马骏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讲：“我辈男女各界人士原为挽回外交，促政府以觉悟，俾将亡未亡之国家不致断送于少数卖国贼之手。乃马良祸鲁，反假严令以施威；志士爱国反遭杀身之惨祸，其阻碍我救国之进行者，无以复加矣。于是各界激起义愤，始有进京请愿之举，而所要求之目的，不过解除戒严令，惩办马良而已。乃政府不谅，且将初次代表拘禁，抑压民气，莫此为甚。夫我辈各界之士孰无身家？孰无性命？而所以有此不顾生死之大牺牲者，是否为我四万万同胞将为奴隶牛马日处于水深火热中耶？今既遭此蹂躏，唯有再接再厉，冀达最初之目的。”[13]炽热的爱国激情，激励着代表们顶着暑天的烈日奔赴新华门。分别佩戴着“天津各

界联合会”和“北京各界联合会”的标记，雄赳赳地行进在长安街上。

代表们来到新华门门前，递上请愿书，但徐世昌还是拒不接见。警察总监和教育部派人劝代表回去，代表们则表示不面见徐世昌是不会离开的。反动派派了大批军警，将代表们围在了新华门，不准自由行动。深夜，北京政府又派人劝代表们离去，代表们仍拒绝。27 日，请愿代表们还是坚持要求面见徐世昌，政府代表则以“总统躬不甚健康”为由，再次予以拒绝。代表们还是没有达到目的。

8 月 28 日，北京政府决定强制解散请愿队伍。军警接踵而至，荷枪实弹，气势汹汹，如临大敌，企图劫持学生代表。军警强制把代表从新华门押送到了天安门。当时《申报》记载：“下午一时许，一声令下，每请愿者一人由军警二人挟扶天安门行去，惟对于女代表则以军警围之而行，并未挟扶。即男代表亦多有不容挟扶者。”[14]

当晚天黑以后，丧心病狂的反动派指挥军警手持长枪刺刀，向代表们横扫乱打。结果，许多代表被打伤，有的代表被逮捕。一名叫郭友三的唐山代表因受伤过重，回去后不久便逝去了。接着，反动派又千方百计逮捕了这次请愿斗争中的指挥者之一，天津代表马骏。马骏在这次请愿中起了指挥作用，所以反动派指名要逮捕马骏。代表们为了掩护马骏曾和他调换了服装。九点多钟，劳累而又饥饿的代表们，在天安门内静静地坐着，反动军警们拿着灯挨个在人们的脸上晃来晃去，也未能找出要找的人来。一小时后，反动军警弄来了大汽灯，把天安门照得如同白天一样。深夜十二点钟后，大汽灯还在不断地增加着。代表们一个一个地被架出大门口，详细盘查，结果马骏被捕了。

但是，反动派的逮捕没有压服人民群众。8 月 30 日，学生们仍然在北京街头散布传单和发表演说。为了推动请愿斗争的发展，营救全体被捕代表，周恩来也到了北京，他一方面鼓舞大家的斗志，一方面领导大家积极开展营救活动。周恩来等学生代表们动员了几千学生，分别包围了北京、天津的警察厅。最后，在全国汹涌澎湃的爱国运动压力下，在各界人士的营救和保释下，反动政府不得不在 8 月 30 日将两次被逮捕的代表全部释放。

9 月 1 日，马骏回津时，男女学生列队欢迎。一些商家也在门前鼓掌致意。

注释：

①上海《民国日报》，1919 年 8 月 23 日。

②《五四运动会议录》下，第 705 页。

③⑩《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 359～360 页，第 363 页。

④《天津学生联合会报》，1919 年 8 月 8 日。

⑤⑥⑧⑨⑬天津《益世报》，1919 年 8 月 12 日，1919 年 8 月 25 日，1919 年 8 月 28 日，1919 年 8 月 27 日。

⑦《时报》，1919 年 8 月 10 日。

⑪⑫［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王光宇关于山东请愿代表被捕又有学生来新华门请愿的报告》，1919 年 8 月 27 日。

⑭《申报》，1919 年 8 月 31 日。

日本人制造福州惨案

在19世纪末的“割地狂潮”中，福建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把福建完全看作了一块殖民地。

福建人民群众早已受够了日本帝国侵略者的侵害，在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行动的鼓舞下，积极投身到了反帝的爱国运动之中。“五四”后，福州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集会，决定在5月24日举行示威游行。5月23日，地方反动当局召见了这13所学校校长，责令他们制止学生的爱国行动。他们在一起议定了四项控制学生游行示威的办法：“（一）各校由教职员随同出发，维持保护。（二）向官厅议会请愿毕，即回校不必出城。（三）时间定在二十四号上午起。（四）旗字不得有妨碍邦交字样。”会后，各校长向学生传达了上述办法，遭到学生强烈反对。特别是对第二条的规定。5月24日晨，各学校推举了三四人，齐赴福建督军署请愿，强烈要求允许游行队伍出城。反动当局无奈，只得答应学生的要求。当日，42所学校的几千名学生参加了游行，游戏队伍共分为32队，以工业学校组成第一队。各校代表高举红色队旗走在队伍的前列，学生们则手执小白旗。游行队伍不仅受到普通百姓的拥护，商人也鼓掌表示欢迎，在街道两旁，鸣放鞭炮，以助声威。

在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给其最大打击的是各省广泛开展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福建当时也在轰轰烈烈的搞抵制日货活动，而福州是最大的倾销日货的市场。1919年11月间，福州学生常到各商店进行调查，并有时焚烧日货。但为了制造事端，破坏中国人民的抵制日货斗争，日本驻闽领事馆从银行拨款三千元作经费，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向中国人民挑衅。经过一番策划后，11月16日下午，在日本领事馆警察署长江口善海的指挥下，六七十名敢死队员，手持刀枪棍棒，故意与福州学生发生冲突，结果枪击学生一人，刀伤欧伤学生共五人，并伤市民多人，这就是当时震动全国的“福州惨案”。驻福州的日本领事馆，不仅不对凶手严加惩治以谢罪，反而

电请本国政府借口保护日侨派军舰来闽，其海军并在福州登岸游行，进行讹诈。为此，福州学联向全同各地的各界联合会及学生联合会发电求援，电文说："……衅由彼开，损失均在我国，……只论强权，不问是非，军阀卖国政府昧心隐忍，与之交涉处处让步。虽因外交暗弱，究竟由于亲日关系造成失败，不能彻底坚强抗争，反而摧抑民气。请各省各地爱国团体团结起来一致反抗，……一定使日本政府对其居留民行凶暴行加以严惩，并负法律上责任……。"

面对日寇的暴行，福州人民义愤填膺。16日晚，部分商人及店员就开始罢市。17日上午，福州城内外所有工厂一律罢工，福州各学校全体罢课；下午，福州工、农、商、学各界举行国民大会，到会者数万人。大会作出四项决议："一、电请政府向日政府交涉撤换驻闽领事；二、新领事来闽当向中国官厅道歉；三、死伤损害一切赔偿；四、此次滋事祸首及在场凶手被捕者应由中日司法官会惩办。"①

"闽案"发生后，中国人民群情激奋，爱国运动再次掀起热潮。全国各界联合会急电各地团体、报馆，请一致声援。11月23日，联合会为"闽案"向各地发出通告，呼吁"速开国民大会，举办游行演讲，警告全国父老，使知吾国危亡已在眉睫，迅与日人断绝国民交易，厉行抵制日货。"

消息传到北京，引起学生们的极大愤慨。11月27日，各校代表在北京大学法科集会，决定派代表到北京政府教育部、外交部请愿，要求与日本要严厉交涉，不能丧失国权。一些学生在市内散发传单，唤醒国人。朝阳大学闽籍学生散发了一份题为《惊心动魄之闽闻》的传单，内容是："吾同胞其注意：咄咄怪事，咄咄真怪事！彼三岛倭奴，竟敢以我国为俎上肉，而以奴隶朝鲜之手段奴隶我中国矣。竟敢明目张胆，持械逞凶，无故杀戮我福建教员、学生，殴击我福建巡警、市民。势犹未已，复派遣如狼如虎之舰队，侵入吾闽海，掳我学生多数以去。嗟呼！福建之学生、教员，中国人之学生、教员也。福建之巡警、市民，中国人之巡警、市民也。福建之学生、教员、巡警、市民，既可以任意杀戮，则凡中国之学生、教员、巡警、市民，孰不可以任意杀戮！类是以推，是凡中国全国之人民，无长无少，无男无女，彼倭奴欲臣妾则臣妾之，欲奴隶则奴隶之，欲尽杀戮则尽杀戮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凡吾同胞，岂容袖手旁观，默尔以息乎？呜呼！青岛之交涉未终，福建之事变又起，蠢尔东邻，心怀叵测，哀我中国，危亡旦夕。同胞乎！同胞乎！其速乘此未亡之国，未被杀戮之余，协力同心，急起直追，抵

制日货，以对付此惨无人道、蔑视公理之倭奴，或尚有国权恢复，大仇图报之一日乎！”[2]11月29日，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共五千余人，举行游戏示威。游戏队伍分为三十队：“第一队清华学校，第二队北京学生联合会，第三队旅京福建联合会，第四队中国大学福建校友联合会，第五队女子师范，第六队朝阳大学，第七队俄文专修馆，第八队中国大学，第九队燕京大学，第十队财政补习所，第十一队新华商业学校，第十二队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三队公立第四中学，第十四队医学专门，第十五队法文专科，第十六队高等师范，第十七队高等附属中学，第十八队工业专门，第十九队第三中学，第二十队豫章学校，第二十一队商业学校，第二十二队法政学校，第二十三队北京大学，第二十四队体育学校，第二十五队畿辅学校，第二十六队邮电学校，第二十七队农商学校，第二十八队汇文学校，第二十九队中央大学，第三十队民国大学。”[3]他们各手执白旗，分队游行，高声喧嚷，抵制日货。这次游行，在人数上，是比较多的。在组织上，学生们也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有负责发布新闻招待记者的，有负责救护的。还组织人专门负责侦察日本侵略者和反动军警的动静。

旅京福建学生联合会在《泣告全国同胞书》中说：“同人欲将日人蹂躏福建之惨状，泣告全国同胞，盖不知所以为言矣！乡井何如？人民何如？均不可知。乃以羁旅之身，作力竭声嘶之呼吁，同胞知同人之痛为何如也。日人恨我国民之抵制其货与不甘以青岛断送也，常欲挑动变故以为报复，而福建固其所认为势力范围者，遂不幸首当其冲矣。五四以来，种种寻仇，一发于外交胜利提灯会，再发于天长节。我闽人知弱国人民不特无快意事，且不使有吐气处，故皆默然忍之。彼因挑我之不动也，遂不惮藏心积虑，出此摧残，立时杀死多人，尚犹未足，幽学生于仇店，最后且捕数人至洋菜馆，自上以利物炸杀之。同为人类，何忍出此！彼日人常谓我为野蛮民族，吾人可以此种行动即世界‘人类’，果谁是野蛮民族也。肇事以后，吾闽人虽痛极恨极，然于消极抵御外，未尝有何积极反抗。乃彼固非人心者，以为可邻则遂邻之，派军舰赴闽，率水兵入城，蹂确所及，福建盖已不省矣。旅京学生以事关国体，曾为一度当局之请求，不得要领，遂以为无望矣。继思日人蹂躏福建，固其日来怀抱之野心，而溯其近因，实原于抵制日货。抵制日货，发生于青岛之不交还。今青岛何如者？吾福建又如此矣！福建之被蹂躏，原闽人意料所及，故虽死亦心甘。特不抵抗以死，实贻我同胞羞，遂不能不奋斗。奋斗矣，又恐力弱致败为同胞累，遂不得不求助。凡所以为自卫计者，

请共努力行之，我闽人团愿尽死以活同胞也。”[4]

旅京福建学生联合会还提出了组织“抵货十人团”的办法：“一、宗旨：不买日货，不卖日货，不用日币，不接济日本原料和粮食。二、组织：十人一团，举一个代表，负连带责任。三、责任：团员及自己家庭绝对实行本团宗旨。每人必须劝导十家实行本宗旨。四、报告：各团进行结果，报知各地学生会或其他团体，由学生会或其他团体公布之。

12 月 7 日，北京学生和爱国商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国民大会。此次团体共计六七十个，人数达到十万之多。大会对于目前福建问题，一致议决八条如下：“一、更换日本驻福建领事。二、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谢罪。三、惩办日人杀死华人凶徒。四、日本祭祀被害已死华人。五、禁止米粮出口。六、全国各商铺于三日内将现有日货一律停止发卖。七、惩办日本驻福建警察长。八、收回日本在华领事裁判权。”[5]大会还决定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上述要求的实施，达到目的为止。当日“各界所发传单，计有五六种之多，所携小旗上书‘众志成城’，‘福州问题严重抗议’，‘山东问题反对直接交涉，‘打破强权’，‘时日曷丧’，‘报备宣战’等等字样”。[6]

上海距离福建比较近，消息也比较灵通，声援活动也开始的早。11 月 23 日，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了有三万人参加的各界大会。福建代表在会上报告了“福州惨案”的经过。接着，各界代表相继演说。演说者除了表示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慨外，还积极提供了对付惨案的办法。大会最后通过了给北京政府外交部的通电。其全文如下：

北京外交部鉴：福州日侨击毙我国学生，并伤商民军警，彼国政府反派军舰前往。此间各界异常愤激，特于本日在公共体育场开大会，到者三万余人，公决应向日本政府要求八条：（一）更换驻闽日领；（二）由日本政府谢罪；（三）慰恤死伤者，（四）惩办犯罪日人；（五）保证此后日商不得携带武器；（六）惩罚驻闽日领署警察长；（七）撤销日本领事裁判权；（八）限日本军舰军队离闽。即乞尊重民意，迅即提出交涉，始终坚持，誓达目的，慎勿故示弱点以辱国召祸也。上海各界大会叩。漾（23 日）。[7]

12 月 2 日，上海 76 所学校的万余名学生举行游行大会。他们从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出发，游行了一个多小时，沿途还进行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当天，上海学生会评议部还召开了有 36 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做出如下决议：“（一）福建交涉实中国存亡之关键，唤醒国民，激励民气，绝非一日之游行演讲足以蒇事，故议决通告各分会，自本月三号起停课四日，全体出发演讲，散发传单，及要求各路商店填写永不进日货之志愿书。

(二) 各分会宜于停课期内，从速组织国民军，其办法宜仿照童子军，编列号目队数，设一总司令主持一切。”⑧

“福州惨案”的消息传到天津，各界立即起来进行声援。11月2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为声讨日人无故枪杀福州学生、警察和商民的罪行，组织各校学生千余人举行游行示威，沿途散发了各种传单，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惩办凶手。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天津总商会等团体，分别致电北京政府，严正指出：“若不据约力争，严重交涉，将来凶焰益张，难保不以今天祸闽者更进而祸全中国”，要求北京政府“提出抗议，必严惩凶犯，以杜乱萌而全民命”。⑨

11月30日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召开国民大会，以抗议日本在福州的暴行。同时发电北京政府促其对福州事件向日本提出严重交涉。12月20日，天津国民大会在南开操场举行，声援福建人民。参加会议的各学校各团体约有三万余人。北京国民大会抵制日货委员会和旅京福建学生联合会派了五名代表来津参加此次会议。会议主席和各界代表先后在大会上演讲。大会通过了《天津国民大会宣言书》，其中写道：“五四运动以来，吾津设各界联合会为全国倡，诸君子惨淡经营，奔走尽瘁半载有余，而沪上全国各界联合会始告成立。天下事有志竞成，精神所注，金石为开，以此足见吾国民程度之猛进非常矣。今则于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之后，又值闽事发生，各省纷纷开国民大会，吾律人士，亦义愤填膺，起而为外交后盾，则国民自决之进步固吾中华民国之大幸也。然而吾国固有政府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对内而不蔑，对外而不辱权，则吾国相率而安居乐业，宁非快事？乃今之政府，内为安福武人所把持，外为日本所利用，致每有事变皆须吾国民出而自决，是又吾中华国民之大不幸者也。……滋者日人在闽无端挑衅，杀我学警，调舰示威，虽以政府之抗议，犹复完全否认，蛮横至斯，普天同愤。……吾国存亡，千钧一发，警耗传来，敌忾同仇，慨愤所激，吾津步各省之后尘而开此国民大会，要须认定宗旨方足以救国而自救。”宣言还提出了六项要求：“一、撤换日领；二、日公使与我政府，代表其国家赔罪；三、日政府应出相当赔偿，以恤死伤只学生、警察、公民；四、日政府应担保驻华之侨民不得携带武器；五、应惩办在闽行凶之首从各犯；六、日政府将派赴福州之军舰即刻撤退，然后通电全球，宣布日人破坏东亚和平之罪。”宣言最后指出：“救闽也，救鲁也，救国也，皆自救之计也。自救之效果，皆须由自救之宗旨而取得之。嗟呼！吾国有卖国贼盘踞于中，有日人窥伺于外，又有凉血动物出没于社会，国亡无日，可为寒心。吾数千万同胞，如其愿亡国、亡

身，自处于奴隶牛马之列，则亦已矣！否则，则各发天良，各争义愤，视闽事、鲁事如己事，一致对外，而不容忍政府之通敌以误国，庶几吾黄帝钟明之遗胄，或可绵延而勿绝也。死生存亡，视此一举，惟请诸同胞，亟起而图之。”⑩

“福建惨案”消息传到山东后，山东各界即在12月3日召开大会，表示对闽案声援。接着山东学生联合会发出通知，号召各地学生来省于12月25日召开全省国民大会，以声援福州学生，加强闽案交涉。但济南反动当局竟于23日将学联取消。学生要求恢复未准，于是24日一律罢课，并计划举行游行示威。反动当局命军警包围各校，阻止学生外出。学生奋不顾身，冲出重围，被军警殴伤多人。

济南学生在要求恢复学联的同时，又提出在新年放假期间联合演唱新戏进行募捐活动的要求，但这项活动又遭到反动军警的破坏，学生被打伤多人。这一事件，引起各校教职员的极大愤怒，宣布自1920年1月2日起停职罢教。最后，反动当局迫于形势，不得不予肇事人员以处分，给学生损失以一定赔偿。教师、学生于是在1月19日复课。不久，寒假到了，运动受到一定影响。

除北京、上海、天津、济南外，全国各省许多地区，如南京、松江、长沙、苏州、杭州、开封、广州、嘉兴、南昌、武汉、九江、长辛店、南通、镇江、昆明等地的人民，也都纷纷行动起来，以各种形式声援福建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

声援闽案的斗争后，爱国运动还在持续发展，如反对山东问题由中日直接交涉、声援天津学生反对反动派镇压、逮捕学生等运动，也都是很有声势的。但作为全国性的五四爱国运动来说，到1920年，已是尾声了。

注释：

①《奋兴报》，1919年11月28日。

②③⑤⑥《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453页，第453～454页，第467～468页，第469页。

④《北洋政府京畿卫戍总司令部档案》：《旅京福建学生联合会关于闽案发表泣告同胞书等文件》。

⑦⑧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1月24日，1919年12月3日。

⑨天津《益世报》，1919年11月27日。

⑩《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天津国民大会宣言书》。

中国人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最初了解

早在19世纪70~80年代，曾有一批外交人员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记述他们到欧洲出使、游历的见闻时，就提到了有关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据考证，在中文出版物中，最早涉及马克思、恩格斯的，是外国传教士在上海办的月刊《万国公报》。时间是在1899年2月到5月，这期间，该报分期登载了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一文。《大同学》实际上是翻译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颉德的著作《社会的进化》的前三章而成。文章中有以下一段评述："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为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美国之爵而治，主于均富者也，英国之法便，尤以能文著。皆言人隶律法之下，虽皆平等，人得操举官之权，亦皆平等，独至贫富之相去，竟若天渊。语语翔实，讲求政治家，至今终无以难之。"[①]

这里所讲到的"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就是指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显然，颉德是把当时欧美一些空想社会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社会学派同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把他们都当做社会主义学说。"颉德的书旨，是将非理性的宗教与生物进化论学说结合起来，阐述社会进化的理论，并非宣传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书中曾引述了马克思的言论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言论，借以论证要消除社会的分裂状态，必须求助于非理性的宗教力量。"[②]至于"社会主义"这个词的中文字形，虽然早在1870年就出现在日本学者的某些译文中，但当时国内还没有使用这个词，而是把西欧的"社会主义"一词译为"人群主义"、"民生主义"、"养民学"等等，"安民新学"，就是它的译名之一。另外，在李提摩太的一文中，还有一段着重介绍《资本论》的一些观点，并把马克思称作是"百工领袖著名者"，还称"德



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

《万国公报》是英美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宣传阵地。当时，它对一些欧美的社会改良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介绍，是作为宣传基督教“救世”教义的一种补充，也是为了给戊戌维新派的“大同”理想提供一些西方的素材。李提摩太的这篇译文，尽管对马克思及其《资本论》只是稍加提及，有的从他人的著作中间接涉猎，其译文也不是很准确，但毕竟在中文出版物中，开始提到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半个世纪以后，第一次让中国人知道了世界上有马克思及其学说。

清末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曾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又曾亡命欧美。他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隔、矛盾深刻，“深叹社会主义之万不可以已也”。他甚至敏锐地预感到，“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1902 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 18 号上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以及他在次年发表的另一文《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中，都曾提到马克思（译作“麦喀士”）。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社会主义之鼻祖”，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为德国“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之一。但他并未介绍马克思的学说，而是绝口称赞颉德的学说，认为与马克思的学说相比，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所以他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并不是真正了解。梁启超固然承认社会主义为“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同时又认为这种思想“吾中国固夙有之”，“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视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他把“社会改革主义”称之为“狭义的社会主义”、“极端之社会主义”，把“改良社会主义”称之为“广义之社会主义”，他表示自己是不赞成“极端之社会主义”的，而只是认为中国“宜酌采社会改良主义”而已。他甚至认为，中国当前还处于“产业萎靡之时代，当未有容此问题（按即社会主义问题）发生之余地”。既然如此，他又为什么要向中国人介绍社会主义呢？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作为一个爱国者，他仍然思考着中国的问题，因而不能不注意研究西方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另一方面，更是由于他企图借助西方社会矛盾的尖锐，那里的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奋起斗争的事实来向清廷施加压力，劝说其实行改良。他们自己就曾经明确地说过，当前中国“民族主义尚不暇及，何论于社会主义大同理想哉？曰，吾明知不能骤至大同，而实欲立大同之基也。立大同之基者何？曰，在迫朝廷改专制政体而为立宪政体”。可见，梁启超等人并不是社会主义者，这是很明显的。

1903年，广智书局和《浙江潮》编辑所，分别出版了《近代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的中文译本。这是两本都有日本人所著，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本。同年10月，《浙江潮》第8期刊登了署名“打我”的文章《新世界之理论》。该文介绍了马克思（译作“埋蛤司”）和共产主义者的国际组织（译作“万国劳动党”），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并以赞叹的口吻写道：“今社会主义之披靡欧美，为雷奔电掣，山摧海啸之奇观”。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与梁启超不同，他曾经也真诚地确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为了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他当时努力向西方学习，“从欧美吸收了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提到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摆脱资产阶级而求得解放，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③]孙中山本人也明确地讲过，“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终能比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他认为，中国在学习欧美的时候，必须预防欧美社会已有的弊端和可能发生的社会动荡，因而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他在1905年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时说：“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他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任何过渡的新社会。”“换言之，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1912年10月，他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讲演中还讲到了马克思，说马克思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达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终于使社会主义“成为有系统之学理”。孙中山还强调，“处今天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此非无病之呻吟，正未病之防备也”。

同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著名政治家朱执信，于1906年1月在《民报》第2号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在第3号上改称为《列传》），介绍了马克思（译作“马克尔”）和恩格斯（译作“非力特力嫣及尔”）的生平和学说，以及简要的阐述了《共产党宣言》（译作《共产主义宣言》）的要点，翻译了宣言末尾所列的十项纲领。朱执信在该文中，对《资本论》的基本观点，一面表示赞许，认为马克思把资本家借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目之盗贼，非为过也”；一面又有误解并提出异议，如认为“资本之始，……安有如马克尔所云，自掠夺而积蓄者。故谓之夸大，亦无所辞。”[④]



孙中山、朱执信等这些资产阶级民主派人士，“在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压迫群众和剥削群众”，他们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和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所作的预言，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他们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者。孙中山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是既没有真切的了解，也不表示赞同。他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看待，虽然也从中攫取了某些思想，但并不主张以此来指导中国革命。被他视为走向社会主义步骤的“平均地权”，是以实现资本主义的土地国有化为目标的。正如列宁说讲，这个中国民主主义者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和纲领，事实上是仅仅“改变”“不动产”的“一切法律基础”的主要涵义，也只是要求限制的纲领。他在后来明确提出的“节制资本”的主要涵义，也只是要求限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垄断资本，并不主张是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为了预防资本主义的流弊而提出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和纲领，在实践中被还原成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路线，这就是“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⑤

1907 年，“世界社”在《近代世界六十名人》一书中刊印了马克思像。此书是在法国巴黎印成后运送回国发行的。

十月革命前，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些刊物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也曾作过一些介绍。如刘师培、何震主编的《天义报》（1907 年创刊于日本东京）1908 年第 15 号上，刊登了恩格斯 1888 年为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序言的译文，并在译文前的按语中称赞“《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论，最有裨于历史”。该刊还在第 16 至 19 号刊载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的译文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节译本。1912 年，在煮尘主编的《新世界》（上海出版）上，连载了由施仁荣译述的恩格斯所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大部分内容，题为《理想社会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

另外，一些对社会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人，也在文章中提到过马克思及其学说。如钱智修在《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一文中写道：“近世社会主义之开山，咸推德人楷尔·麦克（马克思）。其资本论所述，意在集土地、资本于社会，以经营共和的生产事业”；就大骂“社会主义违反人性”。⑥

就是在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先进分子也仍然是主要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去寻找思想武器的。他们虽然知道社会主义思潮正在西方流行，一些人在自己的论著中对社会主义思潮也有所介绍和评

论，但他们同时又认为，“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7]所以并没有想到要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来指示中国的发展道路。

从总的情况来看，在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只是刚刚开始接触。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过零星的、片段的介绍，甚至有误解和歪曲，其社会影响微不足道。即使先进的中国人，也还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是由于当时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人阶级的数量还很小，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也由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领袖们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排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严重地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东方和中国的传播。结果，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一个人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注释：

①《万国公报》第123期，1899年5月。

②王继平：《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③⑤《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第294页。

④《朱执信文集》（上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20页。

⑥《东方杂志》第8号第6卷，1919年6月25日。

⑦陈独秀：《答谢葆衡（社会主义）》，1917年1月1日。

十月革命的炮声

十月革命是俄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联合贫农所完成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又称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俄国1917年革命中第二个、也是最后的重要阶段。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圣彼得堡冬宫发起总攻，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由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因为革命发生在俄历（儒略历）10月，故称为“十月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革命形势迅速趋于成熟。1917年2月，俄国爆发了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彼得格勒的工人因为长期的战争、饥馑而走上街头，派去镇压的军队当场哗变。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沙皇尼古拉二世失去了对军队和国家的控制，沙皇被迫退位。在彼得格勒成立了一个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在二月革命中，工人、士兵是反对沙皇的主力军，资产阶级没有领导这场革命。在革命成功后，工人和士兵组织了自己的领导机构：苏维埃。资产阶级在苏维埃中没有任何权力。武装也掌握在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的手中。苏维埃掌握了实际的权力，却还有一个临时政府凌驾在他们之上。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苏维埃成员中，孟什维克占了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则由于在战争中遭受镇压，而且当时，布尔什维克大多数领导人还在监狱和被流放，列宁此时在瑞士，斯大林还在流放地。广大工农群众缺乏政治经验，致使苏维埃的领导权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窃取，他们支持资产阶级建立了临时政府。在士兵（主要由农民构成）选举出的苏维埃中，社会革命党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则占了大多数，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在农民中的传统威信较高。这些孟什维克都是二次革命论者。他们认为俄国还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还需要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合作，进行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因而他们拥护临时政府。社会革命党人来自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倾向追随资产阶级

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在列宁回到彼得格勒之前也采纳了孟什维克拥护临时政府的政策。工人和士兵们不信任临时政府，但信任他们的领导人。临时政府的权威就建立在苏维埃领导人的支持上。这种现象被列宁称之为“双重政权”。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进行罪恶的帝国主义战争，继续奴役广大劳动人民，并且千方百计的扑灭革命火焰。

1917 年 4 月 17 日，列宁在布尔什维克的会议上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四月提纲》为布尔什维克党确立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指明了革命发展的前途，提出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明确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他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布尔什维克支持临时政府的政策。在二月革命后的俄国，临时政府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农民不是追随临时政府，就是支持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没有独立的政治纲领。或者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开始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是临时政府取得胜利，埋葬二月革命的果实，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改变不仅使自身分裂，同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阵营也产生分裂。一部分国际主义的孟什维克党人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行列。托洛茨基领导的区联派也全体加入布尔什维克。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于 7 月 1 日冒险向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军队发动进攻，妄图用战争消灭革命。这次冒险进攻遭到惨败，十天内俄军损失六万人，前线失利的消息传到首都，工人士兵群情激昂。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在 1917 年 7 月 16 日走上街头，举行示威，要求全部政权归还苏维埃。临时政府派出军队进行血腥的镇压，600 多名工人死伤，这就是著名的七月流血事变。这次屠杀使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打倒反革命的暴力。7 月 26 日，成立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联合政府，对工人和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全面的镇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了，布尔什维克党转入地下，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结束，俄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9 月到 10 月间，布尔什维克在全国各地着手准备武装起义，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11 月 6 日列宁秘密来到起义总指挥部——斯莫尔尼宫，亲自领导武装起义。从 11 月 6 日夜见到 11 月 7 日上午，二十多万革命士兵和



起义工人迅速占领了彼得格勒的各个战略要地。7日凌晨1时起义部队占领了邮政总局。2时攻占了波罗的海火车站和尼古拉耶夫斯基火车站。接着关闭了政府大楼的照明电路，电话局切断了临时政府和司令部的大部分电话。6时左右，赤卫队员、士兵和水兵已经占领了皇宫大桥。除了宫廷广场和伊萨基耶夫斯卡广场地区，其他地区几乎都掌握在起义者的手里。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坐上美国大使馆的汽车仓皇逃跑。10时，革命军事委员会散发了列宁起草的《告俄国公民书》，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政权已转归苏维埃。但临时政府仍负隅顽抗，2 000多名军官和士官生继续盘踞着冬宫。11月6日下午5时~6时，2万多名革命士兵和赤卫队员、9辆军车包围了冬宫。革命军事委员会向临时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命令它于11月6日6时20分缴械投降。8时过后，革命军事委员会向临时政府下达了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书，遭到拒绝。晚上9点45分，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炮，发出了总攻的信号。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在雷鸣般的“乌拉”声中越过了街垒，迅猛的冲向冬宫，在冬宫的楼梯间里和楼梯上，革命士兵和工人赤卫队员同士官们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到11月8日1时50分，临时政府的成员（除克伦斯基逃跑外）全部被擒获。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胜利，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推翻。

当晚，在斯莫尔尼宫召开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首先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告各地全部政权一律归转工人农民士兵代表苏维埃。11月8日，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和平法令》揭露了帝国主义掠夺性战争，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迫切希望和平的愿望，建议一切交战国立即进行谈判，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土地法令》法令规定立即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全部土地收归国有，交给劳动农民使用。最后，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下设各部，执行无产阶级国家的各种职能。斯大林当选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当选为外交人民委员。11月9日清晨大会胜利闭幕，它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成立。

十月革命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界性的历史事件。这个革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上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昭示

人们，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一旦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出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崭新的社会制度。这个革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的指引下赢得胜利的。它昭示人们，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争取解放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十月革命发生在中国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尝试遭到严重的失败、中国的先进分子陷于极度的彷徨和苦闷之中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条死胡同，但社会主义的思想旗帜是有可能把中国引向一个新的广阔的天地。正如李大钊当时说讲：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路。”[①]

十月革命给予中国人的一个启示就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指示自己走向解放之路。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以为自己的面前只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由于经济文化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认为以社会主义思想来指导中国革命，那还是遥远的将来才需要考虑的事情。十月革命开始改变中国人的这种认识。这个革命发生在俄国，而中国有许多情况和俄国相同或相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相似的。正因为如此，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并没有成为人民仿效的对象，中国也很少有人想到要学习俄国。十月革命使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潜力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出来，震惊了整个世界，全人类和中国人都对俄国人另眼相看了。于是，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开始思索，既然俄国的国情同中国如此相似，那么，他们可以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来解决国家问题，中国人怎么就不能呢？李达认为：“俄国是农业国，中国也是农业国，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或者有采用老农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②]李大钊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此作了论证。他说：俄罗斯“文明之要素，实兼欧亚之特质而并有之”、“俄罗斯之精神，实具有调和中西文明之资格”。“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种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故“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唯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③]



十月革命诞生的社会主义新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不少中国人曾经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协约国抱有幻想，以为中国既然在战时参加了协约国一方，战后就有权收回日本在中国攫取的特权。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彻底地击破了中国人的这种幻想，激起了他们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极大的愤怒和仇恨。同时，在1917年7月，苏维埃俄国政府公开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废弃俄国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特权”等。这个宣言令长期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无不感到欢喜。这两方面的情况，使中国的先进分子们转变了自己的思想方向，使他们把自己的目光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李大钊指出，近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压的中国人民，“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④一些人由此出发，主张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像俄国人那样，选择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合乎逻辑的。

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广泛发动并由此赢得历史性胜利的事实，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长期的、英勇的斗争，但这些斗争都有两个根本性的弱点。一是没有认清楚革命的对象，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二是没有广泛地发动群众，未能形成有组织的、强有力的群众运动。而十月革命恰好提供了依靠群众赢得革命胜利的成功范例。陈独秀曾讲：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因为自从发生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人也受到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遂应运而生”。“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之一，就是人民的“直接行动”。⑤蔡和森还进一步指出：“受十月革命影响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渐知工人阶级势力比学生大了，恰恰此时工人阶级又起了势力，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的力量表现给他们看了，故反映到中国先进分子方面都赶速地向他们倾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俄国了”。⑥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觉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

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7]毛泽东的这段话，充分地说明了十月革命炮声对中国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注释：

①《新纪元》，《李大钊文集》上卷，第608页。

②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李达文集》第一卷，第73页。

③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文集》上卷，第575页。

④李大钊：《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李大钊文集》下卷，第577页。

⑤陈独秀：《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时事新报》，1920年4月22日。

⑥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8页。

⑦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0页。

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物

像李大钊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如陈独秀、杨匏安、李达、李汉俊等，都比较早地接触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原来是一个典型的欧化派。十月革命以后的一个时期，他对这个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还是持有保留态度。当时他还认为，中国经济文化落后，产业不发达，谈论社会主义还为时过早。他对社会主义思潮发生兴趣，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在五四运动以前，即巴黎和会召开之际，他对英、美、法等帝国主义还抱有很大的幻想，甚至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称作“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他认为，只要巴黎和会能通过一项“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的提案，亚洲人所受的压迫就自然从根上消除了。但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给他上了严峻的一课。他开始把军阀、财阀作为坚持“弱肉强食思想”和“主张侵略主义”的代表，把社会党人作为“人道、互助、平等的新思想”的代表，并加以对比，提出了“我们究竟应该走哪一条路”的问题。他开始宣称，军国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时候了”。他还认识到，“十八世纪以来的政治已经破产，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1920 年夏，他明确地表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年 9 月以后，他发表了《谈政治》等文章，公开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指出，为少数资本家阶级所把持的共和政治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称这“是不可逃的命运”。他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这个时候，他对俄国革命的看法有了根本的改变。当有人提出“中国人现在所需要的是，将俄国精神、德国科学和美国资本这三样集中起来”时，他表示，“我们倘能将俄国精神和德国科学合二为一，就用不着美国资本了”，即不需要像美国那样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了。

可以说，这时的陈独秀已经在理论上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成了颇为有名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者。像陈独秀这样一个虔信过资本主义的人，转而表示崇奉社会主义，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这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中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地步的有力证明。由于陈独秀在当时思想文化界所具有的巨大名声，他宣告自己信仰社会主义的这个行动，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壮大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声势，推广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于他在这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广东的杨匏安，是五四时期在华南地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他早年留学日本，接触了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潮的某些影响，在五四运动前，他在广州任中学教员，还兼《广东中华新报》的记者。五四运动后，他积极参加了社会主义的讨论。在1919年10月，发表了《社会主义》一文，介绍了欧文、圣西门、傅立叶、普鲁东和马克思等各家的社会主义学说，而且赞扬《资本论》“为社会主义圣典”。接着，他发表了《共产主义》一文，在文中，他对共产主义的特征及其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作出了大体正确的说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1919年11月，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上，以“匏庵”的笔名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一文，约6 000字。该文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论证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文章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原理，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表明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文章一开头就写道：“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且去来查尔而归于马氏，在近世社会党中，其为最有势力者无疑矣。……马氏以唯物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作者也明确指出：“一旦群起而取得国家之权力，改一切生产工具为国有，脱去资本家之羁绊，恢复各人之经济自由，此为解决社会经济矛盾之唯一方法，亦即近代社会经济制度所必有之结果，是固循社会演进的程序而自发生者也。”这是中国人所写的一篇系统地论述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轫时期的一篇中国文献。他的发表几乎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可以说是该文的姊妹篇，应该肯定，杨匏安此时已经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仅在新文化运动发源地北



京，就是在南部中国，也是很有影响的。

李达也是早年留学日本，较早的接受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他在留日期间（1913年~1918年），原是学理科的，曾经幻想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十月革命使他改变了方向，在1918年5月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斗争中，他成为积极的组织者，是留日学生回国请愿救国团的带头人。这次运动结束后，他重返日本，放弃理科学习，全力钻研马克思主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读了大量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并在国内出版，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当五四爱国运动发展到“六三”的时候，他撰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在国内报刊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一文介绍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不同、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不同。《社会主义的目的》一文，则分析了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和法兰西革命的不同，指出：“社会主义确是要改掉十九世纪的文明弊病，是一帖对症的良药。”李达在1920年回国后，继续进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在和研究系分子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起了重大作用，并主编《共产党》月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

李汉俊也是较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日本留学生之一。他在日本上学期间（1902年~1918年）原是“最爱数学”的人，后在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学习时，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李汉俊通晓日、德、英、法四国文字。他在1918年底回国后，带回了大量英、德、日等国文字的马克思主义书刊。他还以极大的精力，从事翻译和写作，宣传马克思主义。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他在《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妇女评论》、《建设》、《劳动界》、《共产党》等刊物上发表了六十多篇译文和文章。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也经过了他和陈独秀的校对。李达在翻译《唯物史观》时，也曾得到李汉俊的帮助。董必武曾回忆说：“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此外，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及研究系中一写人也比较早的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他们所办的一些报刊上，也发表了大量的介绍活研究马克思学说的文章。

董必武在武昌起义后曾参加了军政府，并加入中国同盟会，任该会湖北

支部评议部评议员。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东渡日本，又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回国之后，积极从事护法斗争。他曾经是孙中山的坚决追随者。但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屡遭失败的事实，不能不引起他对中国应走什么道路这个问题的思考。他曾回忆说："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孙的路子不对头，总是靠军阀。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五四运动前，李汉俊从日本回来，带有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日文书籍，董必武借阅后，逐渐明白了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是迥然不同的。他"从俄国革命中见到了群众运动"，"又见五四运动是群众运动"。他估计中国还是要革命，但感到"国民党一套旧的搞军事政变的革命方法，行不通了，应改为一种能唤醒民众，接近民众的方法"。所以，"五四运动后，我们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这样，董必武通过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使自己的立场逐步地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了。

林伯渠是同盟会的最初成员之一，早年留学日本。在1905年底回国，积极从事发行《民报》的工作、边疆调查和军运工作，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1913年东渡日本，后加入了中华革命党。次年回国，参加了护国战争，并曾任湖南省署财政厅长。他回忆说："从同盟会成立到民国成立后十年中，自己亲自参加了每个阶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经过了多少的挫折失败，也流尽了无数志士的鲜血，然而反动势力仍然是此起彼伏地统治着中国，政局的澄清总是那样遥遥无期。虽然对于造成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还不完全了解，但总觉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应该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与董必武一样，他也是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和对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经验的研究，开始自己思想方向的转变的。1914年在日本他与李大钊结成了最好的朋友，在实现思想转变的过程中，他得到了李大钊的启发和帮助。他说："约在1918年3、4月，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的启发。如何联系群众，如何组织军队，在实际生活中有些新的认识。次年，'五四'运动更使我认为群众力量伟大，如何使自己确实站在群众内活动，而不是其他。1920年12月，我到上海会见陈独秀，遂加入了当时上海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戴季陶和胡汉民也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都较早地接触和宣传了马

克思主义。戴季陶侧重研究劳动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他的文章多发表在了国民党于1919年8月创办了《建设》杂志上，主要是一些结合社会现实问题的长篇论文，如：《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我的日本观》、《革命！何故？何为?》和《“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发表于《星期评论》）等。胡汉民则专注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试图用它来解释中国历史和哲学史上的问题。他的这类文章，也大都发表在《建设》上，如《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阶级与道德学说》等。

这些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他们表示相信，对实际问题所作的分析，也有某些新颖之处，从而对增进当时人民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外，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做了比较客观的介绍。戴季陶还翻译了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的全文，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但是，戴季陶和胡汉民，都不是真正地相信马克思主义。他们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并捏造出所谓中国的“特殊”，以抵制这个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戴季陶著文宣称：“中国人向来有一个士农工商一律平等的思想”。胡汉民甚至认为“孟子的社会伦理观”同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有“颇似”之处，只是“马克思一派人，有时说得过分”了。他们向读者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是不能完全适合中国的，劝告人们要有阶级退让的精神，不能步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压迫的后尘。他们的这种“阶级退让”，显然是中国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的，同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也相吻合。从马克思那里经过，再回到他们的三民主义，这就是他们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这当然又会妨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

研究系中的一些人在他们所主办的上海《时事新报》和《解放与改造》（后更名为《改造》）等刊物上，也是刊登了有关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数量虽不及《建设》，但在当时全国的期刊中，也显得比较突出。如《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从1919年5月到12月，除了从《晨报》副刊上转载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外，还刊登了河山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之进化》、《马克思社会主义之理论的体系》和《河山肇博士关于马克思之唯物史观的一考察》等长篇论文。他们介绍和研究马克思学说的目的，则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又有区别。张东荪在1919年初就研究过防范“过激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统称）的方法，

他在《时事新报》上公开写文说："对于过激主义之侵入，拒之乎抑迎之乎？此不特英、日之问题，乃各国所共同之问题也。据吾所见，压抑之法必属无效，差抑之犹激之也，是火上加油，益其燃耳。然则奈何？曰，当采纳其主义中之含有至理者，先行改良社会组织，使人民于经济上得相安，于心理上得其平，然后对于过激之谬说，提起正确之舆论以宰制之，则其势必渐杀也。"《学灯》忠实地执行了张东荪的这个意图，在刊登上述文章的同时，还发表了不少恶意污蔑苏俄政府的文章。而这类文章在孙中山积极追随者所办的《建设》和《星期评论》等刊物上是不存在的。尽管如此，作为当时新闻界的著名刊物《学灯》，它刊登的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客观上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能够理解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人是极少的，不少人，包括一些进步青年，连马克思主义这个词都还不是太熟悉。但马克思主义毕竟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迅速地扩大了自己的阵营。马克思主义已被社会公认为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势力了。



李大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李大钊与许多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一样，也曾经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希望通过资产阶级共和国，来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在他青年时代，深受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这些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后来留学日本，开始接触并研究当时世界上的各种思潮，其中有达尔文的进化论、托尔斯泰的毋以暴抗恶的思想、尼采的超人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不过在十月革命以前，他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使世界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它以实际行动证明了第二国际的破产和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因此，十月革命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广阔道路。

李大钊独具慧眼，首先指出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1918年7月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他比较了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以俄国革命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他讲道："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并以辩证的观点观察人类文明史的演讲，认为"一国文明有其畅盛之期，即有其衰竭之运"。而资本主义的欧洲各国，其文明或者"已臻于熟烂之期"，或者"已臻极盛，过此以往，则当入盛极而衰之运"；据此，他预言，"20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一如18世纪末叶之法兰西亦未可知"。[①]我们应当有这样的历史眼光，努力地去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自觉地走俄国人的路。在同年11月、12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中，他揭露了这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指出它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建一世界的大帝国"；而这

次战争的结果，是引发了俄国和德国等的革命，所以这是“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是“庶民的胜利”，是“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他还强调，“1917 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对于这种世界的新潮流，“是只能迎，不能拒的”。他还特别指出，布尔什维克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为宗主的”。而这个主义，就“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显然，中国也只有以马克思创立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作为“新信条”，才能使自己适应这个世界的新潮流。

在 1919 年元旦，他写了《新纪元》，在这篇文章中，他论述了十月革命开辟的“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他还发表的《大亚细主义和新亚细主义》一文，指出日本侵略者所提出的“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并说：“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了民族自决，反对帝国主义。应该说，在此之前，还没行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这样的阐述问题。

在同年 5 月、11 月，他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刊登在《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和第 6 号上。在文章的开头，他明确地把马克思称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说明自己写作本文的目的，在于把这个学说“转介绍于读者”，以便使它“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文章指出，“马氏的社会主义理论，可大分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文章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指出“他的学说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尽管该文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的理解，还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的理解是正确的。可以说，这是在中国人的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第一次比较系统和比较完整的介绍。这篇文章的发表，表明李大钊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继《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到 1920 年以前，李大钊还发表了《物



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侧重宣传唯物史观的文章。这些文章，是针对当时在进步青年中相当普遍存在着的“教育万能”等唯心主义倾向而写的，起到了积极作用。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发表以后，有些青年学生“从他的文章里有生以来第一次地明白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初步地离开了唯心论的迷魂阵，跨上了唯物主义的道路”。[②]在这些文章中，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的理解，也有不够确切的地方。他在强调物质变动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对于意识的反作用重视不够；对于社会历史中的物质概念的理解也还不够精准。如在论述“南道文明——东洋文明——和北道文明——西洋文明”的区别和原因是，作者夸大了地理环境的作用，认为“南道的民族，因为太阳的恩惠厚，自然的供给丰，故以农业为本位，而为定住的；北道的民族，因为太阳的恩惠薄，自然的供给啬，故以工商为本位，而为移住的，……前者因为富于自然，所以与自然调和，与同类调和；后者因为乏于自然，所以与自然竞争，与同类竞争。简单一句话，东洋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洋文明是动的文明。”[③]这类不足之处，对于一个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难以避免的。

当时，李大钊除了在《新青年》上撰写文章外，也在其他的杂志上扩大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宣传。

著名的国民社出版的《国民》杂志，在“五四”前除了登载过李大钊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外，并没有发表过专门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在“五四”后这类文章增多起来了。例如 2 卷 1 号（1919 年 11 月）登载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的译文，2 卷 2、3 号连载有《马克思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译文，2 卷 4 号载有《苏维埃俄国底经济组织》、《苏维埃俄国底新农制度》等文章。

1919 年 4 月 6 日，在李大钊和陈独秀共同创办的《每周评论》第 16 号上，登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的结束部分。这是《共产党宣言》中极其重要的篇章，它鲜明地论述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译文虽然比较生硬，但还是把基本思想表达了出来。在该译文前面，加了一段按语，指出：“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

1919年10月12日，《国民》杂志社召开了周年纪念大会。李大钊在会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五四运动，指出："此次'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斯世有以强权压迫公理者，无论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应排斥之！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灾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接着，他又在《国民》2卷1号上发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一文，阐述了亚洲各弱小民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性，并指出民族解放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革命运动两大潮流汇合起来，必将冲决帝国主义的统治，他说："不要震于日本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势力，轻视弱小民族和那军国主义、资本主义下的民众势力。世界上的军园主义、资本主义，都像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他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闳，他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挖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我们应该在那威势煊赫的中间，看出真理的威权，因而发生一种勇气与确信，敢与他搏战，信他必可摧倒。"④

除《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外，许多报纸的副刊也从不同的角度大量登载了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北京《晨报》是1918年12月由原来的《晨钟报》改组后继续出版的大型报刊。在次年2月，《晨报》副刊在李大钊加入的情况下实现了改组，从而明显地倾向于新文化运动。改组的第一天，就登载了李大钊的论文：《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论文指出："在这回世界大战的烈焰中间，突然由俄国冲出了一派滚滚的潮流，……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且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⑤ 1919年5月1日，《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这是中国报纸纪念"五一"的开始。李大钊在这个专号上发表了《五一节杂感》，预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他说："听说俄京莫斯科的去年今日，格外热闹，格外欢喜。因为那日正是马克思的纪念碑除幕的日子。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⑥从1919年5月5日起，副刊增设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至11月11日，共办了6个多月。《专栏》第一次发表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全译本（原译书名为《劳动与资本》）；刊登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全译本（原译名为《马氏资本论译义》）。还登载了从日本刊物上翻译过来的三篇长文：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马克思



唯物史观》、日本《社会研究》杂志上的《马氏唯物史观概要》和日本《改造》杂志上的《马氏唯物史观的批评》。前两篇，比较简明、正确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后一篇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副刊除《专栏》外，还在1919年三四月和九十月，用一定的篇幅发表了一些革命领袖的传记和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的文章。在1919年8月7日至11日，副刊登载了《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译文（原译文题为《新共产党宣言》）。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晨报》副刊成为当时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在“五四”后有一个猛烈的发展，宣传新文化的刊物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迅速增加，最高达到数百种之多。在这些新刊物中，许多都受到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因此在这些刊物中，不断出现关于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等方面的言论。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起了重大作用，在中国大地上是第一位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先进知识分子。

注释：

①《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2~575页。

②曹靖华：《回忆青年学会》，《五四时期的社团》（3），第109页。

③④⑤⑥《李大钊选集》，第295~296页，第281页，第135页，第171页。

中国工人运动开始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

工人是不可能自主的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要实现工人运动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必须已以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为桥梁，向工人群众宣传和灌输马克思主义，才能使工人阶级获得自身解放的武器，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战斗的生命力。在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同样不是依靠工人运动自身的发展，而是依靠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实现的。这个条件是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逐渐成熟的。

五四运动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转折点。在“六三”大罢工中第一次显示了阶级觉悟和政治威力的工人阶级，通过运动教育了自己，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军阀反动派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民族的凶恶敌人，认识到自己和资本家的矛盾所在，也初步体会到组织起来力量有多大。这个时候，工人群众虽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历史使命，但已经感觉到自己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不再认为自己是天生命中注定的任人奴役的牛马，已懂得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和保障自己的人格而进行斗争，同时对国家命运和社会政治生活也更加关心了。这使许多革命知识分子提高了对工人阶级的认识，这不但使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必须关注社会主义学说，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也促使了他们要走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所以，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1919 年 3 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在北京大学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当时，该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为宗旨”，在北京城内定期进行演讲。到了 1920 午 3 月，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重新整顿，要广收会员，充组织。除在城市讲演外，“注重乡村讲演、工场讲演”。这样，就使原来讲演的对象仅限于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情况有了变化，使讲演团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了工人和农民中。1920 年 4 月，“平民教



育讲演团”举行第一次“乡村讲演”，共分三组，到北京周围的各个村庄进行讲演。讲演团到农村后，先放留声机，吸引群众，然后讲演。由于农村分散，听众不是很多，但短短几天累计仍有900余人。这时，他们讲演的内容与前一段时期相比，发生较大的变化，更加丰富了。讲演的题目，有《平民教育是什么?》、《共和国民应有的精神》、《为什么要读书》、《破除迷信》等等。从这些讲演题目看，他们已初步接触和认识到工人与农村劳动者的辛苦，教育的落后和思想的迷信与愚昧，了解到农村中人思想单纯，易于灌输新思想。因此，他们在实际讲演中，觉得自己所使用的语言实在有改进的必要。诸如，农民间“生活丰富不丰富”等等。后来，他们逐步把讲演的内容逐步扩大。在一次讲演会上，轮到邓中夏上台讲演时，百十名警察群拥上台进行蛮横的无理干涉。邓中夏对此没有表现出任何恐惧，继续大声讲演。这时，“台下鼓掌如雷，很有愤怒的样子。”平民讲演团收到了极好的效果。此后，讲演团与各工厂建立了联系，博得了工人们的好感。

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工人阶级的劳动生活状况，也是革命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结合的一种形式。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十分重视社会调查工作，他希望知识青年能够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鼓励加识青年：“要打起精神采，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要想解脱他们的苦痛。应该用什么方法?”在李大钊们的倡导下，各地的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都先后到工厂和矿山工人中去，调查工人阶级的劳动生活状况。

1920年1月，北京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织起来，分组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进行调查。据当时报载，工人的贫困，悲惨的生活，使他们受到很大的震动，“调查回来、大家相顾失色，太息不止，都现出一种极伤心且不平的样子”。

为了指导社会调查工作，1920年1月，《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发表了一个社会调查表，提出了向工农进行调查的详细项目和具体内容，使社会调查很快发展起来。1920年5月，《新青年》“五一”劳动节专号刊登了大批的调查报告。从这批调查报告可以看出：（1）调查的范围相当广泛，北京、上海、天津、山西、唐山、长沙、无锡、南京等地的情况都有；调查的不只是一两个行业，而是各个行业。（2）调查材料具体详细，包括各工厂的历史、工资、工时、工人家庭、工人待遇、工人组织等等。有些调查还附有统计数字和统计表。（3）调否报告的作者，有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朋友，

有的是《新青年》社的人，有的是看了《新青年》征稿广告而写的。其中有的就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4）从报告的内容来看，虽然还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但却反映了知识分子同情工人的立场和思想。这四方面的情况证明当时革命知识分子已经深入工农群众，已经开始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奔走呼号。这也是当时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初步成果的反映。

接着，各地的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都到工人群众中进行广泛的调查，他们帮助工人提高觉悟，号召工人赶快团结起来，推翻资本制度，实现自己的幸福。这些调查报告，都表示了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了劳动场所，接近工人群众所获得的初步成绩。这些都进一步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五四运动后不久，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人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的接近进一步深入，1920 年“五一”劳动节的纪念活动，有了明显的反映。

在这以前，中国从来没有大规模地纪念过“五一”劳动节。1919 年，北京《晨报》副刊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出专号纪念这个节日，但在当时，反应并不热烈。到了 1920 年的“五一”节，虽然中国工人阶级没有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功，但是这个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节日，在中国工人群众中，特别是在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中已经有了巨大的反应。

在全国许多城市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北京《晨报》，天津《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时报》、《申报》和《新闻报》等都报道了各地庆祝“五一”的活动情况，或发表了纪念文章。《新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星期评论》、《新社会》、《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重要刊物都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新青年》的专号发表了李大钊的重要文章《五一运动史》，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详尽地介绍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产生过程和各国工人阶级为纪念这一伟大节日而斗争的历史情况，歌颂了为工人的解放斗争而牺牲的各国英雄人物。文章号召中国劳动同胞一定要把“今年的‘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这篇文章受到广泛的欢迎，曾在许多报刊上全文转载。宣传了资产阶级下资本家的剥削本质。这个专号在篇幅上比平时大了一倍，并以一半以上的篇幅报道了有关全国各地工人的生活和斗争情况的材料，这些材料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各地工业城市的产业工人的情况。还介绍了香港机器工人罢工的详情，有的还附有统计资料。这些调查报



道说明了知识分子已经和工人群众接近了，并获很了初步的成绩。这一期的《新青年》还全文译载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说明了不劳动者不得食和人人具有工作权利的社会主义原则，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对工人各方面利益的保护和照顾：这与上述调查材料所反映的中国劳动者遭受残酷压迫剥削的情形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增加工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上海《星期评论》的纪念号（第48号）共出了10大张，相当于平时篇幅的10倍，其中对上海一年来的重要罢工均有较详细的记载，也发表了一些报道各地工人农民生活情况的材料。北京的《新社会》从1920年4月第17号起选出三期《劳动号》（其中纪念“五一节”的第19号刚一出版就被查封了），编者们认为中国的劳动者“已有觉悟的样子，劳动运动的曙光也已升在地平线上，将要射出来，遍照大地了。”《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的纪念号，着重强调了“资本家的末日”，指出了劳动阶级在改造社会中的地位，但是它有着明显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倾向。其他刊物的纪念号一般也都介绍了”五一节“的历史和各国劳动运动的情况，说明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意义，表示同情和支持工人运动，也刊登了不少反映工人生活的材料等等。

4月初，在上海陈独秀亲自参加并指导中华工业协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工会总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中华工界志成会和药业友谊会等7个工界团体组成联席会议，共同发起筹备纪念“五一”节大会。18日，陈独秀在筹备会上，提议将纪念会的名称定为“世界劳动节纪念会”，作了“劳工要旨”的演说，深受工人团体的拥戴，被选为筹备大会顾问。26日，筹委会决定，大会定于5月1日下午在西门体育场举行，全市工人休工一天，以示庆祝。

5月1日这天下午，上海各行业约5 000余工人集结起来向西门体育场进发，但却遭到军警的阻挠，不许进场。这时工界团体临时决定将会址改在提蓝桥精武体育会。当大批工人赶到时，再次受到军警的武力阻挠。于是，又不得不将会址改在靶子路青年会体育场，又一次被制止，最后纪念会在老靶子路后一块荒上举行。因为军警的几次阻挠，人数已大大减少，参加人数仅剩几百人，大部分是工人。在大会上，.他们的情绪始终高涨，工人代表站在小车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学生代表也讲了话，并当场议定：（1）要求每日八小时工作制；（2）组织工人真正的工会；（3）各业工人要联合起来。大会结束的当晚，工界7团体根据纪念大会的委托，起草和发表了

《上海工人宣言》和《致俄国劳农政府对我国通牒之答书》。《宣言》中写道："多谢今大军警的强横行动，竟能使中国人由惊讶而怀疑，由怀疑而认识，由认识而决心，由决心而奋斗。从今天起，我们中国工人觉悟的团结的精神。已经足以使压迫我们的人胆战心惊！这一个事实，一定能够使全世界的朋友认识，'不人支那人清梦的五月一日'这一个可羞的批评，更由吾人今天的努力而稍微洗去一点。"在《致俄国劳农政府对我国通牒的答书》中写道："我们是被华盛顿劳工会议摒弃在特殊地位的工人，接你们的通告格外感动，……我们要努力创造新的、美丽的、永久和平的人类世界，决定和你们同心合作，担负这个责任。现在，我们都处在国内国外金钱阶级的压迫底下，希望你们先起的同胞给我们和印度、日本、朝鲜、安南的劳动同胞一个很猛烈的援助。"这封信表明了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解放事业需要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

在北京，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举行了纪念活动。5月1日，北京大学停课一天。上午8时，校工和学生等500余人在二院礼堂召开纪念大会李大钊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会上散发了传单；9时，工读互助团雇了两辆汽车，分头到东西城游行。车前飘扬的横幅上，写着"劳工神圣"、"五月一日万岁"、"资本家末日"等红字，车后还竖着表现革命精神的赤旗，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沿途还高呼着"劳工万岁"的口号，散发印着《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的传单。最后，连人带车全被押往到了警厅。《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全文如下："我们亲爱的劳工朋友们！今天是五月一日，是美国工党同盟罢工争得'每天八小时'的纪念日，全球的工人到了这一天，都是相率罢工，举行示威运动。但是我国的工人，还有很多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所以我们来告诉各位：自从今天起，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凡不做工而吃饭的官僚、政客、资本家、牧师、僧尼、道士、盗贼、乞丐、娼妓、游民，一律驱逐。不准他们留在我们的社会里来剥削我们。所以大家都要联络起来，把所有一切的土地、田园、工厂、机器、物质，通通取回到我们手里，这时候谁还敢来压制我们呢？我们劳工朋友啊！快快起来，休业一天，大大的庆祝一下！"这个宣言虽带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烙印，而且把僧尼、道士、乞丐、娼妓等和官僚军阀等放在一起，都在驱逐之列，这说明这个宣言的起草者对社会问题和劳动问题还缺乏科学的分析，但已经认识到工人是社会的主人，要唤起工人为反对剥削争取自身权利而奋斗，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了。

在广州，5 月 1 日这天，5 万人举行了劳动节纪念大会，其中工人约占一半，会场上一片红旗，欢声雷动。旗帜上写着："打破阶级制度"、"劳工神圣"、"奋斗"、"牺牲" 等口号，提出对今后劳工的希望。有人评论这次大会说，这在广州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在中国劳工运动中也是值得称赞的。

除上述地方外，唐山、漳州、汕头、九江、哈尔滨等地工人、学生也举行了纪念活动。

1920 年中国"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性的纪念自己节日的活动。在这次纪念活动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迈开了走向工人运动的第一步。这次纪念活动，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阶级和指导工人运动的过程。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方式，向工人宣传了劳动创造世界和工人阶级在其中的伟大作用；号召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同罪恶的资本主义进行斗争。这是共产产义知识分子向工人群众相结合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行动。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五四运动后约一年的时间里，革命知识分子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在使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得到提高的同时，也使革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得到了转变，即由激进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向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转变。这样，就为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功的进一步结合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在1911年正当“风华正茂”的时候来到长沙读书，实际上他从未把读书当作个人升官发财的阶梯，而是当作了积极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

1913年春，毛泽东考取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里，他在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老师的指点下，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博闻强记、融会贯通，为日后的成才和奋进奠定了渊博而坚实的根基。在这里，他开始接触新文化，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他的思想随着新旧交替的时代在前进，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在这里，他发起组织湘潭校友会，被学校学友会选为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成功地举办了工人夜校，获得了开展社会工作的初步经验。当学校面临遭受败退的北洋军劫掠蹂躏之险时，他沉着镇定地组织学生志愿军在当地警察的配合下，用鸣枪呐喊放鞭炮的方式镇住了北洋军并将其全部缴械，保住了整个学校和整个长沙城，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的军事行动。在这里，他结识了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罗学瓒、萧三、周世钊、张昆弟等一批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他把他们吸引和聚集在自己的身边，组成了中国现代史上最早的也是最有冲击力和影响力的进步青年组织——新民学会，明确地提出了学会的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共同探讨开创新路、拯救中国的新道路。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和卓越领导人。

1918年，毛泽东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为了组织和筹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他于8月份和萧子升、罗学瓒等一行24人来到中国的首都北京，并在这里住了半年多。在此之前，他的恩师杨昌济先生已经应章士钊之邀到北京大学任教。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引荐下，结识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对于正在孜孜求学而又未得要旨的毛泽东来说，这是他此次赴京的最大收获。他亲耳聆听了李大钊在天安门广场上所作的《庶民的胜利》的讲演。他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到北

京大学图书馆当了助理员，读了李大钊的《青春》、《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他经常向李大钊请教问题，读了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参加李大钊组织的研讨各种新思潮的活动，并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他还参加了邓中夏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他的思想在迅速地发展着、变化着，一步步地成熟起来，清晰起来。当然，在这段时间里，他也读了一些克鲁泡特金《法国大革命》之类的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受到一定的影响，还同北大学生朱谦之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问题。

1919 年 3 月，毛泽东离开北京赴上海，送别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4 月，他从上海回到长沙后，到修业小学当了一名国文教员。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在长沙积极组织学生运动予以响应，发起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并成为这个组织的实际领导人。6 月 3 日，学联发动长沙市 22 所学校的学生进行总罢课。7 月 14 日，以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的《湘江评论》正式创刊，毛泽东为它写了《创刊宣言》，如是说：“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实行它？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他还在《湘江评论》上连续三期发表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指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但是这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对于进行吾国‘民众大联合’果有此能力吗？果可得成功么？谈到能力，可就要发生疑问了。原来我国人口只知道各营最大合算最没有出息的私利，做商的不知设立公司，做工的不知设立工党，做学问的只知闭门造车的老办法，不知共同的研究。大规模有组织的事业，我国人简直不能过问，政治的办不好，不消说，邮政和盐务有点成绩，就是依靠了洋人。海禁开了这久，还没一头走欧洲的小船，全国唯一的‘招商局’和‘汉冶萍’，还是每年亏本，亏本不了，就招入外股。凡是被外人管理的铁路，清洁，设备，用人都要好些。铁路一被交通部管理，便要糟糕。坐京汉，津浦，武长，过身的人，没有不嗤着鼻子咬着牙齿的！其余像学校搞不好，自治办不好，乃至一个家庭也办不好，一个身子也办不好。‘一丘之貉’、‘千篇一律’的是如此，好容易谈到民众的大联合？好容易和根深蒂固的强权者相抗？虽然如此，却不是我们根本的没能力，我们没能力，有其原因，就是‘我们没练习’。原来中

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没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逾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远，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被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毛泽东在文章里明确提出了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这是他思考中国出路的一次质的飞跃。

8 月中旬，《湘江评论》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湖南学生联合会也被强行解散。毛泽东联想到张敬尧主政湖南以来的作恶多端，倾听“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群众呼声，决定进行一场驱张运动，并且把驱张运动作为爱国运动的继续和深入。11 月，他领导被张敬尧解散的湖南学生联合会骨干分子重建学联，并发表了重组宣言，指斥张敬尧倒行逆施、蹂躏民权的罪行。12 月 6 日，学联公开发表驱张宣言，宣称“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全长沙 13 000 名学生一致罢课。同日，毛泽东率驱张请愿团离长沙赴北京，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正式开始。这是毛泽东独当一面发动起来的第一次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他以小学教师的身份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毛泽东到达北京后，北京成为驱张运动的大本营。他们在北京先后进行了七次请愿活动，迫使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接见了请愿代表。在天安门广场展出揭露张敬尧强种鸦片、纵兵奸淫的照片；在湖南会馆向北京同胞揭示张敬尧的罪孽，要求 13 位湖南在京议员在《驱张书》上签字；还成立了“平民通讯社”，由毛泽东亲任社长，起草发出大量驱张的稿件、呈文、宣言、通电，分送京、津、沪等地各报发表。毛泽东还派出新民学会会员到衡阳联系吴佩孚，到常德联系冯玉祥，控诉张敬尧的罪恶，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驱张运动取得卓有成效的进展。张敬尧声名狼藉，处于四面楚歌之中。1920 年 6 月 11 日，被谭延闿的湘军赶出长沙，避难岳阳，后又逃到广州。



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与李大钊的接触更加频繁。由于李大钊的影响，他很注意报刊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搜寻和阅读了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三本书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二是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三是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后来毛泽东会议说："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的书。我热烈地搜寻一切那时候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最正确解释，从此以后，从没有动摇过。"①1920 年 4 月，"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为商讨湖南建设问题，毛泽东离京赴沪。恰好这时陈独秀也在上海，毛泽东与陈独秀多次面谈，与陈独秀讨论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他后来回忆说："陈的坚决的信仰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转变的时期对于我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②

1920 年 7 月，毛泽东带着驱张成功的喜悦，带着两次会晤"南陈北李"的巨大收获回到湖南，应聘担任了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这时，他的思想已急剧地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他已经把中国和世界的希望开始寄托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榜样上。他同易礼容等人创办了一个文化书社，请刚刚就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写了招牌。书社经营的《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劳动界》等书刊很畅销，总是供不应求。毛泽东又和方维夏、彭璜、何叔衡等人组建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被推举为书记干事。经他推荐，湖南《大公报》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的一些重要文章：《列宁的历史》、《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

尽管毛泽东的头脑中已经有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但他这时对社会改良道路仍抱有某些期望。而这种期望在 1920 年下半年毛泽东热情投入的湖南自治运动中彻底破灭了。

7 月 22 日，湖南督军谭延闿发表通电，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湖南社会各界对此寄予很大希望，纷纷发表主张，提倡"民治主义"。毛泽东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发表 14 篇文章，系统地提出实现湖南自治的具体意见。他要求把"湖南自治"搞成发自下层的政治运动。他设想，由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联合起来，用舆论的推动力量，废除军阀统治，建立以民为主的政府，自办银行，自置实业，自搞教育，健全县、乡自治机关，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

权利。

谭延闿担心呼声日高的自治运动发展下去他会控制不住，于9月13日召集“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和省议会各推举若干人充任“湖南自治会”的起草员，草拟“省宪法”，然后召开制宪会议。这是一个“官办自治”的方案。毛泽东针锋相对，与彭璜、龙兼公一起起草了一个“民办自治”的文件，主张直接、平等地选举“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再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这个文件于10月5日、6日在《大公报》上公开发表。10月10日，长沙近两万群众冒雨游行。到达督军府时，彭璜向谭延闿递交了毛泽东起草的《请愿书》。在省议会门前，有人出于对官办自治、包办制宪的不满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

谭延闿接下了《请愿书》，对所提各项要求却断然拒绝。11月下旬，赵恒惕接替谭延闿任湘军总司令后，制造谣言，说是毛泽东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还想捣毁省议会。警察厅随即把毛泽东召去质问，想借此造成一种高压的恐怖气氛。至此，毛泽东的最后一点幻想破灭了。

由此可见，在一个世界性的文化大开放和空前广泛地传播与渗透的趋势之下，一个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出现，也必然要经历一个全面吸收人类文化成果，甚至还难免出现不辨良莠而兼收并蓄的思想发展阶段。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样的阶段又是非常短暂的。

1920年11月，被湖南自治运动搞得十分疲劳的毛泽东来到江西萍乡。他要在这里休息一下，冷静地思考一下。他在给新民学会会员向警予写的信中说：“几个月来，已经看透了。”“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这“另辟”的“道路”在哪里呢？1921年元月，在新民学会的新年大会上，毛泽东批判了其他各种主义，说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他尖锐地指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一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③]

毛泽东的挚友、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的蔡和森，这时正在法国勤工俭学。他在法国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书刊，比毛泽东稍早一些接受了马克



思主义。蔡和森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毛泽东表示完全赞同。这说明毛泽东这时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树立了坚定的信念。同时，毛泽东还认为，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由之路。用和平方法去达到共产主义的目的，是永远不能成功的。必须使用暴力与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家相抗争。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并同意蔡和森关于"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现在"世界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的观点，进一步强调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重要性，无产阶级不得到政权是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的。无产阶级只有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能保卫和最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毛泽东这些坚决主张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与重要思想根据。

毛泽东在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中，在批判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坚持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使他后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

注释：

①②斯诺：《西行漫记》，1938 年第二版。

③《新民学会通讯集》，第 3 集。

问题与主义之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开始就受到了杜威和胡适所提倡的实验主义的阻挠。

实验主义是20世纪在美国颇有影响的一种“现代哲学”流派，其主要特征是：片面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否认真理的客观标准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对社会革命，主张一点一滴的进化和改良。

1919年4月30日，实验主义的主义代表人物杜威，经他的弟子胡适邀请（1904年，杜威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主任，1915年，胡适由康内尔大学转入该校，成为了杜威的学生和忠实信徒），带着他的妻子和次女来到了上海，胡适、蒋梦麟和陶行知等人都到上海去迎接。5月3日，胡适在给蔡元培的信中说：“杜威博士夫妇于三十日（四月）中午到上海。蒋、陶与我三人，在码头接他们，送入沧州别墅居住。昨晚上我在教育会讲演实验主义大旨，以为他明日讲演的导言。今天（三日）明天（四日）他有两讲演，五日他去杭州游玩，蒋梦麟陪去。……在杭约住四五日，只有一次讲演，回上海后，住一二日即往南京。在征约有两星的勾留，大约三星期后，即来北京。”[①]

杜威在中国讲学原计划为几个月，后来在中国住了两年又两个月，到过北京、山西、山东、江西、湖北、浙江等省进行讲演。他在北京作了《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伦理讲演纪略》“五大讲演”，全面、系统地介绍和宣扬了实验主义。在讲演中，他还直接谈到中国的社会改造问题，并俨然以指导者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他说：“中国常有人问我‘改造社会当从何下手？’我的答案必说该从一事一事上下手。如家庭、学校、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没有一处不应改的。在这个时候，大家只有各做个的事，那种笼统的理论最容易被人利用，是没有用的。”[②]他大肆宣言社会改良主义说：“现在世界上无论何处，都在那里高谈再造世界，改造社会。但是要再造改造的，都是零的，不是整

的。如学校、实业家庭、经济、思想、政治，都是一件件的，不是整块的。所以进化是零买来的。……学生呵！你们以各人的知识一点一点地去改革，……。”[③]他还露骨地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竟然说：“19世纪下半叶，直至欧战，是马克思学说盛行的时代。欧战终了以后，人心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渐起厌倦的现象，复有回到从前道德派或伦理派的社会主义的趋势。”[④]

杜威的实验主义在中国当时是非常受欢迎，在他未离开中国前，《杜威五大讲演》就已经出了十版。至于在各地出版的许多小讲演录，就更多了。胡适曾洋洋得意地说：“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我们还可以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⑤]

杜威毕竟是以外国学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的，如果说，他主张改造中国的改良主义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宣言他的实验主义来进行的。而胡适就有所不同，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位知名人物，面对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新趋势，使他产生了一种按捺不住的焦急心情。后来，他回忆说：“当时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这个趋势的危险……”。[⑥]就在这个时候，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而李大钊也准备护送陈独秀离京，这样胡适乘机取得了《每周评论》的领导权，并随之改变了该刊的政治方向。从26号（6月15日）起，《每周评论》大量刊载杜威的讲演录，在第31号上，发表了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回忆说：“一九一九年六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国内‘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谈政治。我在《每周评论》第31号里提出我的政治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⑦]。

胡适在1919年7月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这篇文章里，胡适首先对“主义”进行了冷嘲热讽。他说：“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

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主义来欺人。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数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胡适在这里反对谈主义，但他自己却大谈实验主义。具体地发挥了杜威的工具论，说："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要求"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其实胡适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谈主义，而只是反对谈马克思主义。当时安福系的政客王揖唐曾发表过一篇骗人的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系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大为吹捧。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于是，胡适抓住了这个例子，把马克思主义者和安福系政客相提并论，并恶毒地说："'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绝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胡适还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中国社会，反对进行革命。胡适向谈马克思主义的人"劝告"说："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他说："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又说，如果"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我们还要得意洋洋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反对"根本解决"，反对进行革命，在现存社会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改良，这就是胡适将实验主义在中国政治问题上的具体运用。



胡适的文章发表后，首先写文章反对他的，是一个同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关系的蓝公武，他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问题与主义》。胡适把它转载在了《每周评论》第33号。这篇文章从多个方面论证了宣传主义的必要，对胡适的文章给宣传主义列举的三条“教训”，逐条予以驳斥，但他是以唯心主义立论的，如说：“当问题起初之时，一定先为抽象性，后才变成具体性的，”由于他是侧重从思维逻辑方面进行论证，对于胡适否认“根本解决”，没有给予直接上的反驳，只是在与要不要谈主义这一点上，反对胡适。

李大钊在离京时，已经读到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到了昌黎五峰后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李大钊将该文寄到《每周评论》，胡适把这篇文章全文登在了该刊的第35号上。这篇文章与《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针锋相对。

该文的特点，是从强调群众运动和社会革命来论证宣传社会的重要。首先，他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因此，“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他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

接着，谈论了关于假冒牌号的危险。针对胡适借口谈主义“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的论调，李大钊举了生动的例子“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群众的赞许，就有旺麻子等来混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叶得了群众的照顾，就

有汪正大等来混他的招牌。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词，很在社会上流行，就有安福派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这种假冒招牌的现象，讨厌诚然讨厌，危险诚然危险，淆乱真实也诚然淆乱真实。”但是对待这种现象怎么办呢？胡适的目的是利用这种现象使马克思主义者不谈社会主义。李大钊驳斥了这种谬论，指出：“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刀剪，就闭了他的剪铺。王正大不能因为汪正大等也来贩茶叶，就歇了他的茶庄。开荒的人，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把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后来，谈论了过激主义。李大钊转述了日本《日日新闻》对陈独秀和胡适的批评：“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潮流。”他公开表明自己是一个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人，“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认为“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在我们这盲目的社会，他们那里知道 Bolshevism 是什么东西，这个名词怎么解释！不过因为迷信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日本人把他译作过激主义，他们看“过激”这两个字很带着些危险，所以顺手拿来，乱给人戴。……我们唯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作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哪有闲工夫去理他！”

最后，谈到了“根本解决”。李大钊明确指出：对于一个“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从俄国的革命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两方面进行了论证，他说：“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



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他还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和“根本解决”的关系，必须展开阶级斗争，必须进行革命，他说：“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再论问题与主义》发表后，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分别发表在了《每周评论》的第36、37号上，极力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诬称李大钊文中的一些观点“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主义论”，[8]还说一切主义“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9]胡适在这些辩护的文章中，再一次宣扬阶级调和，直接向马克思主义进攻，指出：“阶级战争说指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并立的理由，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与工党发展史上固然极重要。但是这种学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一方面，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10]

同年12月，胡适又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十六字主张。并说：“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并再一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污蔑，他说：“悬空介绍一种专家学说，如‘赢余价值论’之类，除了少数专门学者之外，决不会发生什么影响”；“十篇‘赢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11]

1920年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指出：“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缘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绝大的权威，……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而“现代的经济组织，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迎合社会的新要求，就发生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这也是新经济

组织上必然发生的构造。”所以“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作出的。”

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和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是问题和主义之争的继续。显示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鲜明对立，表现了社会改良主义和社会革命论两种政治主张的对立。

1919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论战，实际上回答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要不要革命的根本问题。这次论战的范围和意义是深远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它也揭示了中国社会改造的一条重要规律，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根本解决”。

注释：

①《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8日，胡适在这封信中说，杜威到上海是四月三十日。根据杜威的讲演是5月1日，参加《杜威五大讲演》，第256页。

②④《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③《杜威五大讲演》，第14页。

⑤《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文存》（二），第533页。

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第632页。

⑦《我的自述》，《胡适文存》第2集（卷3），第96～97页。

⑧⑨《三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三十六号，1919年8月24日。

⑩《四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三十七号，1919年8月31日。

⑪《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1920年9月，英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应邀来华讲学，他的哲学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在这之前，他曾随同英国工界代表团访问过苏联，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府非常不满。罗素在中国讲演期间，先后到在江苏、北京、湖南等地。《时事新报》、《民报日报》、《晨报》、《东方杂志》上刊登了他的文章和讲演，主要有：《心之分析》、《数理逻辑》、《社会结构学》、《物之分析》、《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教育之效用》《中国向自由之路》等等。

罗素在讲学中，攻击俄国的十月革命，认为布尔什维克想将其方法和目的，介绍到西方国家去，是完全无用的尝试。他宣扬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企图来抵制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认为："对于国家的理想，将来必有一个最大的帝国出来做压制的事情，然后才能出现最平等的共和国；或许有许多联邦，共组成一个大国。"[①]他还反对阶级斗争，极力以实业制度来抹杀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他说："骂资本制度怎么样坏，这并不是资本制度的坏，乃是实业制度的流弊；说共产制度怎么好，这也不是共产制度的好，乃是实业制度的好。……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虽然相反，可是也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同一的趋向，因为同属于实业主义。"[②]因此，他主张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开发中国的资源，发展实业，而怎样发展实业呢，他认为非借用外国资本不可，他说："一个国家在他的实业制度初发达的时候，经济方面都是由少数压制多数的；除非借用外国的资本，便不能免却这个弊病。"[③]而"根本的永久的解决方法，自然惟教育是赖"。他宣言基尔特社会主义，同时又说，它"只适用于实业已发达的国家，而不适用于事业不发达的国家"。在他看来，中国甚至连谈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资格也不具备。

罗素的讲演给了张东荪等人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于是他们配合罗素的讲演，发动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张和吴稚晖、杨端六、李石岑等，在1920年10月间曾随罗素到湖南讲演。他从湖南回到上海后，在11

月6日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文章，他说："我此次旅行了几个地方，虽未深入腹地，却觉得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认为罗素关于"中国除开发实业以外无自立"的主张，是"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的，宣称："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多派主义等等。"将罗素的调子加以发挥，公开向马克思主义宣战。接着在12月间，他又在《改造》杂志上发表了《现在与将来》一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反对社会主义的谬论。1921年2月，梁启超也在《改造》杂志上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的长篇文章，支持张东荪的反社会主义思想，并加以支持和发挥。

张东荪等人在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中，认为中国的出路是资本主义，即发展实业。依靠谁来发展实业？他们希望于绅商阶级，认为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下，中国的绅商阶级能够打败军阀。张东荪说："中国的实业，不论中国自己开发与否，外国总是要求大开发而特开发的；不过外国势力一来，中国自己的企业亦必乘势而蜂起。到那时，外国的势力便不啻给中国财阀以保障和后盾，则末路的军阀便无法相抗了。我预料银行团必成，铁路统一必成，这便是外国势力助中国实业家以打军阀。"④

张东荪等人极力歪曲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主张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他们认为，中国工人的痛苦所在是得不到工作，而得到工作后，所受的痛苦不是来自资本家，而是来自工头，中国工人反而可以从资本家那里得到一定的好处。因此，他们主张社会是不应该指责资本家的。张东荪说："现在人只听工人一方面的话，自然是只看到工人的苦痛；若问一问彼资本家，必亦有一大篇话未尝不是句句实情，从现行制度下亦不能十二分苛责资本家，因为从井救人总不是人的常性。"⑤为了能够缓和和防止阶级斗争，张东荪提倡"温情主义"，在工厂设补习学校，实行分红制度，疾病保险，发给养老金等。梁启超也表示，可以唤起资本家的觉悟，使他们顾及到劳动者的利益。他说这样是"对于资本家采矫正态度"，以便"在现行经济制度下，徐图健实的发展"。他们这些人还给工厂工会的工作规定了方针和工作的范围。《解放与改造》上有一篇文章《说工会》，文中说："工会是消极的，但求改善工人们社会的和经济的地位境遇，不是积极的排斥雇主阶级。换一句说，就是工会是在现经济和现社会制度下面，谋工人们的利益，不是推翻现



经济和现社会制度的组织，希图重新改造”。而对于农村的阶级关系，则他们极力为地主阶级辩护。认为中国农村落后和破产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在于天灾人祸。他们这样讲到：“中国向例地主与佃户多是平分收入，甚至与佃户得六成地主得四，所以农民对于所受地主的痛苦，没有十分深刻的印象。即使废了地主，农人生活虽有变化然未必甚大”。[⑥]因此，他们很是反对农村进行改革，而主张在保持地主所有制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改良，例如，搞合作运动、普及教育、地方自治等。他们认为农村的一些团体组织，“可就原有乡董、村正与联庄会，稍稍改变”。这意思是，地主积极的统治地位不动摇，但需要略微改变下，加以装扮，使这些组织具有资本主义的色彩。

张东荪等人认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资格来讲社会主义。梁启超说社会主义运动不能在中国兴起，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因为“社会主义之传播与实现，不能不以劳动阶级为运动之主体，劳动阶级不存在之国家，欲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张东荪说：“中国除了交通埠头因为有少数工厂才有工人以外，简直是没有。况且他们要发生阶级意识还不知要经历多少次经验的教训，在他们的阶级意识未发生以前，这种未自觉的劳动者，直不能有何势力。”[⑦]而广大的农民更“大抵蠢然一物，较原始人相差无几。”既然工人农民都是这样一种状况，那么就不会有“老农革命”的发生，如果硬要宣传社会主义，这样必然会发生破坏性的“伪老农革命”。张东荪说：“真正的劳农主义决不会发生，而伪的劳农革命恐怕难免。至于伪劳农革命发生，不过在已过的许多内乱上再添一个内乱罢了。”张东荪还说：“党是代表那个阶级的，若他背后没有阶级必不成立。中国现在离劳动阶级的完成与自觉尚早。”[⑧]所以在中国成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条件是不具备的。他们还印证了马克思、列宁的话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例如说“列宁之思想为梯阶只三段。曰由贵族国家旨中产国家，曰由中产国家旨无产国家，曰由无产国家旨无国家”。中国的“资本主义方在萌芽”，但“资本家必定要经过的，世界上并没有不经过此阶段而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如俄国未经过资本阶段，所以难成功。中国若想社会主义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他们声称，“对于资本家当持何种态度，实今日言社会主义者最切要之问题”，今日为改造中国计，不“当努力防资本阶级之发生”，而应“借资本阶级的养成劳动阶级为实行社会主义之预备”。

应该说，张东荪等人关于反对在中国传播和实行社会主义的言论是构成

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系统。这些言论，后来曾被许多反对社会主义人民反复地论证和发挥。在当时确实是造成了一定的思想上的混乱，给正在兴起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添加了一定的阻碍。但正因为此，对这些论调进行驳斥是完全必要的。

当时，张东荪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刚一发表，新文化界立即予以反击，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连续发表了陈望道所写的《评张东荪君底‘又一教训’》、邵力子所写的《再评张东荪君底‘又一教训’》等文章。上海《正报》记者也写了《人的生活》一文对张东荪的言论进行批评。12 月 1 日，陈独秀将双方的文章汇集起来，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为题，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

当辩论展开的时候，卷进这个斗争的人也愈来愈多。各地共产主义者在《新青年》和《共产党》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了许多文章对张、梁等人的言论进行比较系统的批判。例如在上海的李达发表有《社会革命的商榷》和《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在北京的李大钊发表有《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下的实业》，何孟雄发表有《发展中国的实业究竟要采用什么方法?》，施存统有《马克思底共产主义》，在法国的蔡和森，也发表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各地共产主义者对张东荪等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作了针锋相对的驳斥。

发展实业，增加社会财富这是对的。问题在于如何发展实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老路？很显然，张东荪等人主张后者，但这是行不通的。陈独秀在给罗素的信中说：“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⑨李达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中则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是无政府无秩序的状态；社会主义生产组织是有秩序有政府的状态。”因此，“将来社会的经济组织必归着于社会主义。”⑩张东荪等人认为可以依靠帝国主义帮助中国发展实业，企图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来和外国资本主义相竞争，这完全是一种妄想。《质梁任公》一文说；“我们有件事应当注意的，就是资本主义的背面，存有军国主义。若美，若英，若法，若德，都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军国主义最强盛的国家。欧美姑且不说，

就说新具工业国的日本，日本的工业发达的路径，不皆是海陆军助长而成的吗？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资本国经济竞争的焦点，是万国大战争的战场，各资本国在中国培植的经济势力，早已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当着产业万分幼稚的时代又伏在各国政治的、经济的重重势力之下的中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和资本国的经济战争，恐怕要糟到极点了"。[11]

张东荪等人歪曲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反对社会革命的论调，完全是谬论。张东荪曾说，要使中国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只有依靠资本家开发实业，共产主义者用资本主义开发的实业反驳到："比如开滦煤矿，京奉铁路，总算是北方物质上的大工事，不但北方多数人未曾因开滦煤矿、京奉铁道减少生活的苦痛，而且矿坑烧死工人几百名，铁桥压死工人几百名，假使没有开滦煤矿、京奉铁道，这几百工人或者还不至一齐惨死。可见只知开发物质文明，却不用有益于多数人的主义在开发，即令各省都开矿筑路，也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现令官僚的豪华，武人的纵侈、绅士土豪的骄奢淫逸，多数人所以得不着人的生活，都是吃了他们的亏。假如再听他们包办实业，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官僚、武人、绅士、土豪的幸福越发增加，多数人的幸福越发无望，多数人除了充官僚、武人、绅士、土豪的奴隶牛马外，别无生活门径，恐怕还有求为奴隶牛马而不得的。中国官僚、武人与绅士、土豪互相结托的资本主义，比各国纯粹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还要厉害。人的生活得不着，到底仍然免不了社会革命。"[12]张东荪提倡"温情主义"的改良，梁启超还说要唤起资本家的觉悟，采取矫正态度。《质梁任公》一文针对着这种论调说："资本家若果能有著明深切之觉悟，他们一定能觉悟到他们的最后命运，就是他们终于不能存在而必须让给社会主义的世界。若是没有觉悟，他们一定唯利是图。他们宽待劳动者，无非是免得受罢工的损失，而可以安稳的扩张资本势力，换句话说，即是使劳动者安于奴隶状态而不思反抗。"

张东荪等人借口中国产业落后，没有"真正的劳动者"，而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成立共产党。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已经有了大批的产业工人，和由于小农业及手工业经济破产而出现的大批失业劳动者。他们所说的中国没有"真正的劳动者"，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陈独秀在《独秀复东荪底信》一文中质问道："中国若无劳动者，先生吃的大米、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质梁任公》一文也指出："就中国说，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

国劳动阶级的对峙，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中国若是没有劳动阶级，当然就没有资本阶级了”。中国革命的兴起，是客观必然的。蔡和森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的通信中说：“社会革命的标准在客观的事实，而不在主观的理想，在无产阶级经济生活被压迫被剥削的程度之深浅，及阶级觉悟的程度之深浅。”随着中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也必然会产生。而且只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组织起来，中国才会有出路。陈独秀说：“中国劳动者没有组织，没有阶级的觉悟，不能做阶级的争斗来抵抗资本家，所以生活极苦而工价极贱，造成外国资本家群来掠夺的好机会；他们始而是经济的掠夺，接着就是政治的掠夺，渐渐就快做中国的主人翁了。……这种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13]

可以看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已经不是一般地反对改良主义和坚持对社会问题进行根本解决，而是在反对“温和的社会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明旗帜下进行的，并取得了重大胜利。

张东荪在受到共产主义者的严厉批判后，感到自己理屈词穷，不得不在1921年2月发表《一个申说》，承认“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不过他却又积极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说“基尔特社会主义最晚出的，所以他比较是最圆满的”。来企图以此来抵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基尔特，即行会、同业、协会的意思，它是既包括工人又包括资本家、雇主在内的一种组织。基尔特社会主义起源与英国，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学说。罗素和张东荪都宣言过这个学说。但是，他们在宣称这是“最好的社会主义”的同时，都说过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条件。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实质进行了揭露，指出：“既说树立生产的新方式，而又不主张革命，则树立方法自然是舍资本主义以外别没有了。你们主张资本主义就主张资本主义好了，又何必带上基尔特一个社会主义的假面具呢？骨子里主张资本主义，而又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如此‘暗娼式’的行为，可怜亦复可恨！”[14]

通过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批判，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进一步宣传了中国必须走革命道路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扩大传播扫除了有一个思想障碍。这次社会主义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论战，前后进行了一年多，通过这次论战，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起了促进作用。

注释：

①②③《罗素五大讲演：社会结构学》，北京大学新知社，1921年版，第11页，第15页，第12页。

④⑤⑥⑦⑧《现在与将来》，《改造》第3卷，第4号，1920年12月。

⑨《独秀致罗素先生的信》，《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⑩⑪《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

⑫《正报记者爱世先生"人的生活"》，《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⑬《独秀致罗素先生的信》，《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⑭《评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先驱》第3期，1922年2月。

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当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的时候，人们一时还不懂这个革命的性质，更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原则分歧，由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曾流行过，因此，不少人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无政府主义的胜利。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最初就是这么认为的。《劳动》杂志在 1918 年 4 月对十月革命进行了赞扬，有一篇介绍列宁的文章说："现在我们中国的毗邻俄国，已经光明正大的做起贫富一班齐的社会革命来了。社会革命四个字，人人认为可怕，其实不过是世界的自然趋势。现在社会不善的原因，以后处处皆要发现的，好不稀罕。"[①]另一篇文章说到俄国革命："世界惊人的欧战已打了好几年，俄罗斯惊人的革命也闹得轰天震地。世界人士，莫不瞩目关心，打听他的消息，研究他的结果。做官做宦的，恐怕他们乱子闹大了，把自己的利禄势位，也保不住；大地主大富翁，又恐怕他们乱子闹大了，共产世界，一旦实行，把自己欺诈剥夺所得的财产，化为乌有；所以都是栗栗危惧，然又大势所趋，莫可如何。只有那些不幸的劳动家，天天盼望他们的革命，早早成功，早早普及，好大众共享平等的幸福，同过自由的日子。所以俄罗斯来的电报，是格外得人主义，过激党传的消息，格外得人欢迎"。[②]

但是，随着十月革命影响的扩大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无政府主义者感到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他们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一回事，便向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展开了进攻。1919 年 2 月，《进化》月刊刊登了《论俄国过激党》的译文，文章对十月革命进行了攻击："今所以译此文者，本不过为辨明俄国过激党，既非马克思派社会党，亦非其他凡有政治臭味的革命党，更非无政府主义党，究其行为，直可名之曰——杀人防火的强盗。"[③]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挑战中，黄凌霜、区声白等人充当了先锋，扮演了主角。



黄凌箱还是在这期的《进化》月刊上发表了《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思潮》一文，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集产主义”，而把无政府主义说成是“共产主义”，宣扬：“马克思主义的集产主义，现在已不为多数社会党所信仰。近来万国社会党所取决的，实为共产主义。”还说：“现在集产主义以衣食房屋之类可以私有，是明明尚有个人财产，根本已背乎社会主义的定义。……况且同一房屋牛马的圈厩，既为公有，人居的房舍，则为私有，于理论上也说不上去。……集产者主张按个人的劳动多寡，来给他的报酬，那么强有力的将享最高的幸福，能力薄弱的将至不能生活，能力微弱的缘故，或关乎生理，却非人懒惰的罪，而结果不幸如此，还说什么幸福呢？所以我极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集产主义”。

同年5月，他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发表了《马克思学说的批评》一文，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篇比较全面、系统的挑战书，该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进行了全面的系统攻击。声称自己批评马氏的学说，对于马氏的经济论和唯物史观，是以德人伯恩斯坦和俄人克鲁泡特金的批评为根据的。黄凌霜还抹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伟大意义，说马克思主义不过是重复别人的观点，说有的观点在蒲鲁东的书里屡次讲到过。文章中这样说道：“马氏所用的方法，还不出黑格尔的辩证法之外。他虽然说过若是要这个方法合于理性，必要将他转过来，搁在一个唯物的根据之上；但是他自己却不能处处依着这个范围立论……马氏不过把辩证的事业，代替前人辩证的观念罢了。空想会弄坏了科学，马氏恐怕不能自辞其咎吧。”关于唯物史观，黄凌霜承认这是马克思的“最大的创造，为学问界开了新纪元。”可他又抹杀其意义，说：“马氏在他的历史的哲学序中，说明社会机体进化的原理，和达氏（指达尔文）所发明的生物机体进化的论据，很是相近。”黄凌箱主要是攻击科学社会主义，说：“无政府党人以为国家的组织，从历史上观之，无非建立私权，保护少数特殊幸福的机关。现在教育，国教，和保护领土种种大权，都在政府掌握之中。若更举土地、矿山、铁路、银行、保险等等给了他，谁保国家的专制，不较现在还要厉害。我们的首领，谁保他们不变了拿破仑、袁世凯呢？且社会主义，不应当压制个人的自由。社会民主党的政府（指苏维埃），又要设立什么工兵农兵，这不是压制个人的表征吗？”接着，他攻击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并提出无政府主义的主张说：“无政府共产党想将国家的组织改变，由平民自己建立各种团体会社，如办教育就有教育会，办农业就有农业会等

等。由单纯趋于复杂，以办理社会所应需的事，去除一切强权，而以各个人能享平等幸福为主。他们所主张的劳动原则，就是‘各尽所能’四个大字。他们所主张的分配原则，就是‘各取所需’四个大字。无政府党和马克思派争论的焦点，就在这个了。”

1920年2月，易家钺在《奋斗》上发表了《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一文，公开举起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旗帜，说“我们知道布尔什维克是马克思主义实行者”，所以“从原理上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换一句话，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同年4月，在《奋斗》上发表《我们为什么反对维尔塞维克?》一文，攻击布尔什维主义“使社会退化”，“希望我青年不做那主义的信徒，却做那主义的批评家”。1920年5、6月间，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展开了一场“强国应否提倡”的辩论，指出了无政府主义抽象反对强权的错误，解释了“强权卫公理”的道理。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批判了无政府主义。11月，《共产党》月刊出版，这个月刊的第1至第5号发表的一些文章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判，有《社会革命底商榷》、《无政府主义的解剖》、《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夺取政权》、《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等。1920年底，陈独秀在广州继续批评无政府主义。有一次，他在法政学校讲演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也在听讲。区听讲后，立即寄信给陈，表示异议，陈作了答复，区再写信，陈又作答，如此往复达三次之多。为此，陈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开辟了《讨论无政府主义》一栏，把这些信件予以公开披载。1921年2月，黄凌霜发表《克鲁泡特金的社会学说与未来》一文，攻击“今中国的鼓吹劳动主义者”将陷入“罪恶漩涡，万劫不复”。3月，缪金源在《民声》上发表《无政府共产派与集产派之歧点》一文，把马克思主义曲解为集产主义，标榜无政府主义才是共产主义。类似的文字还有，此处不一一列举。这样，就形成了一次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及其同情者主义是围绕以下问题开展讨论的。

第一，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否定一切强权。他们认为设立工农兵就是压制个人的表征，“无政府党对于政治之终极目的，是废除统治权，消灭什么形式的政治”，“强权本来就不好，因为他同个人自由立于对立地位”。“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

们不承认政治家的强权，我们一样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他们污称布尔什维克的“唯一要素是强权”。他们认为“社会革命成功了以后，当然要把资产阶级所私有的财产归之于公，那么资产阶级也变作无产阶级了，还怎样谋复辟呢？资产阶级的势力都是金钱给予他们的，一旦金钱没有了，他们那里再有势力来复辟？”[④]所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成为不必要的了。

针对无政府主义者以上论点，共产主义者提出，不应该笼统地反对一切强权，而应当具体地区别强权和国家的不同性质，对他们采取不同的态度。“强权之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与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我们以为过去和现在的国家和政治，过去的现在的资本阶级的国家和政治，固然建筑在经济的掠夺上面；但是将来的国家和政治，将来的劳动阶级的国家和政治，何人能够断定仍旧黑暗绝对没有进步的希望呢？”“不问强权的用法如何，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像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实在是笼统的武断的，绝不是科学的。”[⑤]因此，反对资产阶级的强权是对的，而反对无产阶级的强权就不对了。“我们要明白世界各国里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这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⑥]

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并不是可以立即废除国家，它只能随着阶级的消灭而逐渐地自然消亡。指出：“我们的最终目的，也是没有国家的。不过我们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却极力主张要国家，而且是主张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阶级一天一天趋于消灭，国家也就一天一天失其效用。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拿国家建树无产阶级的特权，是要拿国家来撤废一切阶级的。”[⑦]强调：“社会革命成了功，政权拿在劳动阶级手里，阶级争斗仍是要继续进行；因为革命后若干时期社会上资本阶级的势力仍然要大过劳动阶级多少倍，在此时期内若有人主张把政权及自由给资本阶级，便是杀害劳动阶级；若劳动阶级肯把政权及自由给资产阶级，便是劳动阶级自杀；‘劳动专政’并没有什么特别深奥的意思，只是不把政权及自由给资产阶级。这些都是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见解不同之要点”。[⑧]

因此，共产主义者指出："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9]

第二，关于个人与组织、自由与纪律的问题。无政府主义者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的组织纪律。区声白说："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以自由加入，自由退出，所以每逢办一件事，都得要人人同意。如果在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做去，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岂不是自由吗?"[10]"我们的目的只是求绝对的自由，无政府主义是要打破一切虚伪的、认为的、不自由的、约束我们自由的，无政府主义就是自由主义——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万能，因而为极端自由主义，所以无政府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好朋友"，而"马克思主义以国家为万能，所以蔑视个人，故变成极端干涉主义"，成了"个人主义的敌人"。

针对以上论点，共产主义者从多方面进行了说理驳斥，陈独秀指出这种主张是行不通的："我们的社会乃由许多生产团体结合而成，一团体内各人有个人的意见，人人同意已不易得，一社会内各团体有各团体的意见，人人同意更是绝对没有的事：一团体内意见不同的分子还可以说自由退出，我不知道一社会内意见不同的分子或一团体，有何方法可以自由退出?"[11]"现代工业发达，一个工厂往往有数千数万人；而无政府主义者要保护人人绝对自由，不许少数压多数，也不许多数压少数，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试问数千人数万人的工厂，事事怎可以人人同意，如不同意岂不是糟极了吗?"[12]

共产主义者主张应当有必要的集中和维护一定的纪律，这不是要无条件的抹煞个人的自由。指出，"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不过，"真实的自由，不是扫除一切的关系，是在种种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宽裕的选择机会"；"真实的秩序，不是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是包蓄种种不同的机会使其中的各个分子可以自由选择的安排"。所以，"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实际上，也"只有从秩序中得到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13]

第三，关于社会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在生产上，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集中，反对有计划的生产，主张"将一切生产机关，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



管理”，“生产机关及生产的物属诸社会，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攻击布尔什维克“要将所有财产，十之七八归国家管理”，实际上就是“小资本家——个人——完美没有打消，大资本家——国家——反而完全成立。”他们还主张一切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应公有化，反对生活资料可以归个人所有，认为“即称社会主义，则凡社会的物，概当属之公有，却不能为个人所私有。现在集产主义，以衣食房屋之类可以私有，是明明尚有个人财产，根本上以背乎社会主义的定义。”在分配上，他们主张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反对各尽所能、按老分配，认为“主张按劳动多寡来给他的酬报，那么强有力的将享有最高的幸福，能力微弱的将至不能生活。能力薄弱的缘故，或关乎生理，却非其人懒惰的罪，而结果不幸如此，还说什么幸福呢?”他们攻击布尔什维克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说：“假使他在实行社会革命以后，把社会产物通通归到社会公有，然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那么这种更好的自由结合，就是我们很希望的理想社会了。……我反对布尔扎维克的理由，不因他的革命，却因他那不彻底的革命，须知不彻底的革命，和‘改良’相同”。[14]

针对上述论点，共产主义者就生产问题指出：“无政府主义的生产组织，有一种最大的缺点，即是不能使生产力保持均平。要使各地方各职业的生产力保持均平，无论如何，非倚赖中央的权力不可。”如果从根本上反对国家权力对经济生活的任何干涉，生产组织就会陷入混乱状态，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因为各个生产团体各个利害不同，若是没有一个统一机关用强制力去干涉调节，各个生产团体主张各个的绝对自由，这样能联合不能？无政府主义者用这种没有强制力的自由联合来应付最复杂的近代经济问题，试问怎么能够使中国的农业工业成为社会化？怎么能够调节生产使不至过剩或不足？怎么能够制裁各生产团体使不至互相冲突？怎么能够转变手工业为机器工业？怎么能够统一管理全国交通机关?”[15]就分配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原理，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否定“按劳分配”的错误观点。指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主张，“非待世界的产业发达到极境的时候，不能办到，譬如今日行了社会革命，明日组织新社会，而新社会都是继承旧社会的生产力继续发展的。这生产力是有一定限制的，生产力既有限制，生产物当然也有限制了，以这有限制的生产，所以各人消费的自由得其平等，是绝对办不到的。若果社会的生产力发到到无限制的程度，生产物十分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各取所需’的分

配原则是很可实现的。只是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秩序就要弄糟了”。[16]

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论战。通过论战，大量的先进只是分子分清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从而坚定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其中包括原来一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这次论战很好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持平：《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事略》，《劳动》第1卷，第1号，1918年4月20日。

②一纯：《俄国过激派行之政略》，《劳动》第1卷，第1号，1918年4月20日。

③《进化》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20日。

④⑥《国家、政治、法律》，《新青年》第8卷，第3号。

⑤《谈政治》，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

⑦《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5号。

⑧《短言》，《共产党》第3号。

⑨《无产阶级专政》，1922年7月，《新青年》第9卷，第6号。

⑩⑪《讨论无政府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4号。

⑫《自由与秩序》，《少年中国》第2卷，第7期。

⑬《李大钊文集》下卷，第437~438页。

⑭《讨论通信》，《奋斗》，第8、9合刊，1920年4月。

⑮《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9卷，第3号。

⑯《社会革命的商榷》，《共产党》第2号。



陈独秀与李大钊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

从五四运动以后，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初步结合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就必须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建立一个像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的酝酿筹建，是从在上海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开始的。

陈独秀因在1919年6月11日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入狱。出狱后，陈独秀没有退缩落后，反而是更加前进了。1920年2月，陈独秀应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的邀请，去武汉讲学，他在以《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为题的一次讲演中提出改造社会的三种方法：“（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二）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业的苦，有产业的安享；（三）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权利”。①

从以上讲演内容来看，陈当时已具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了。陈独秀在武汉讲学深受学生联合会和各界听众的欢迎，但反动当局却很害怕陈的主张，命令他停止演讲，并且迅速离开武汉。陈独秀对湖北当局这种压迫言论自由的做法相当愤慨，于2月7日晚，乘火车北上返回北京。

陈独秀被捕当取保释放时，反对政府仍对他要加以管制，规定他不能自由行动，有任何行动需要向政府汇报并得到批准方可。那么陈被湖北反对当局驱逐出境，在北京也是很难立足的。因此，当陈还没有到达北京时，京师警察厅即在陈独秀的公寓门口，派了警察站岗，等陈到后要立即逮捕。

为了陈独秀不再让反对当局再次抓捕，陈到北京西站时，就下了车。经李大钊等友人商议，陈独秀离开北京向往上海。李大钊决定亲自伴送陈独秀

到天津。他们扮作商人，做一辆骡车，先到了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的家乡大黑坨村。在大黑坨村住了几天，然后起程去了天津。一路上他们交换了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意见，设想了怎样才能使中国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并走向工厂主义的光明前途。他们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活动，要筹建共产党组织。

李大钊送走陈独秀之后，立即在天津设法与苏俄友人取得联系。他和“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南开中学学监姜般若、南开中学学生胡维宪等一起，到天津原俄租界，会见苏俄友人，相互交谈了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看法。由于敌人监视的严密，他们的会面很快被密探发现。第二天，天津《天益报》就登出了“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于是注意防范，之后不久，就乘车返回了北京。

李大钊回京后，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他和邓中夏、高君宇等经过多次酝酿商量，决定首先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为建立共产党作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初步准备。1920 年 3 月，他们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直到 1921 年 11 月 17 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示，才公开宣布这个组织的成立，征求会员。据罗章龙回忆说：“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设立了一个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与法文三组。我们这个组有七、八人是学习德文的，我们曾译了《共产党宣言》。毛主席 1920 年到北京时，大概已有一个《共产党宣言》的油印本子了。”[2]最初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等，他们团结并组织进步青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

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虽然已经传播开了，但是传播的时间是比较短的，范围也是比较小的，影响力不是很大。而那些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和新村主义等等，都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胡乱宣传，使人们分不清楚那些是真正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那些是假的社会主义，因而在当时有一部分热心寻求真理的青年，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误入歧途。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李大钊指导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对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道路，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当时团结了许多进步青年。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具有相当高的声望。许多青年都跟随着他，把他作为良师益



友。毛泽东回忆说："我们那个时候是他的学生"，"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③]李大钊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他的影响下，使许多在五四时期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很快地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许多进步的青年，他们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如邓中夏、高君宇等每天清晨都会到北京大学三院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下午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晚上则聚在一起讨论革命问题。通过这些有组织的活动，他们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且产生了进一步组织起来来开展革命斗争的强烈要求，这些都为后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者之间开始建立了联系。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引起了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东方革命的关注。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虽然开始在中国传播，然而它的内容几乎全是从欧美和日本等国书籍和报纸杂志上翻译过来的，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间还没有直接的联系。那时苏俄还在进行国内战争，尤其是苏俄的远东部分西伯利亚，还在英、法、美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当地匪帮的统治下，当时中国北洋军阀政府配合这些反动派封锁了中俄边界，关闭了中俄交通，所以中国和苏俄两国处于隔离状态。正因是如此，共产国际虽然在 1919 年 3 月在莫斯科宣告成立，但是中国人民几乎没有人知道。在 1919 年下半年和 1920 年初，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东进以后，西伯利亚的形势急转直下。这时美日之间发生矛盾，匪帮首领被擒，并在 1920 年 2 月被红军处决。英美等国纷纷撤兵，日本侵略军也退回了日本本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最终遭到了失败。这时，亲日的皖系军阀段祺瑞政府封锁中俄边境的政策也便宣告破产了，中俄边境交通终于开放了。

1920 年 4 月，李大钊接待了共产国际派来的最初使者。共产国际之所以派代表来华，就是因为共产国际东方组织从海参崴方面的电报，知道中国曾爆发了五四运动的消息。在 1920 年 3 月的时候，共产国际派的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名叫吴廷康）已来到中国。随同来的还有他的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马耶夫及其夫人萨赫雅诺娃、翻译杨明斋。他们于四月份到北京，经过北京大学俄文系讲师鲍李维的介绍，会见了五四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的李大钊。李大钊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为为他们举行了欢迎会、演讲会、座谈会等活动。恰好这时，苏俄政府在 1919 年 7 月 25 日发布的《俄罗

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在中国报纸上全文发表，这个宣言的发表，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响。《宣言》声明“凡是从前俄罗斯帝国时代与中国、日本及协约国所订的密约，一律取消；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取消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一切不平等条约。这对长期受帝国主义压榨和蹂躏的中国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中国人民对苏俄的这种真诚友好的态度，深表赞扬。维经斯基此时来到中国，理所应当受到中国人民热情友好的欢迎。维经斯基举行了多次座谈会，各阶层人士踊跃参加。维经斯基详细介绍了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及其对内对外政策。但是，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只是带着好奇的心理参加了一、两次座谈会后就避开了。只有李大钊等一批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诚恳地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交换了意见。李达回忆说，维经斯基“到了北京以后，首先访问了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许多进步人士，举行过几次座谈会，许多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参加了。因为苏俄政府第一次对中国的宣言（即废除帝俄政府与中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才传到了中国，中国很多社会团体都表示热烈的欢迎，所以一听到苏联（俄）人来到北京，大家对他感到特别高兴。维经斯基在几次座谈会上，报告了苏联（俄）十月革命以后的实际情况及其对外政策。当时李大钊同志等对于这位好朋友，很诚实的和他交换意见，至于那些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带着好奇心，参加了一两次座谈，以后和他也疏远了……。”[④]经过他们多次的交谈，更加明白了十月革命和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真实情况。李大钊还和维经斯基在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多次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事，他们深感这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而且认为中国确实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从而，更加坚定了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决心，更加坚定了创建以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的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中国革命的决心。

不久，李大钊专门写文章说明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说：为了领导“民众的势力”，“从事革新的运动”，实现“中国彻底的大革命”，“中国C派（即共产主义者们）的朋友”现在急需组织一个“强固的精密的”“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社会主义团体”。他说，建立这种团体并不是孤立的，“各国的C派朋友，有团体组织的很多，方在跃跃欲试。更有第三国际为之中枢，将来活动的势力，必定一天比一天扩大，中国C派



的朋友，那好不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以各国 C 派的朋友相呼应?”[⑤]

为了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

陈独秀到上海后，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维经斯基的到来，使他很高兴。陈独秀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研究社会主义和劳工问题。

1920 年 5 月，陈独秀以《劳动者觉悟》为题，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发表了演说，解释了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并指出：“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是要求管理权。”[⑥]他要求中国的工人运动进行第一步和准备第二步。

在同一个月，陈独秀在《答知耻》的通信中，宣传了剩余价值学说。一位化名“知耻”的读者，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认为“工人缺乏知识，非注重工人教育，则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适足以资其为恶。”[⑦]因此，这位读者要求减少工时必先强迫施行工人教育为条件，增加工资必以强迫工人储蓄为条件。陈独秀在回答中，反问道：“社会上有钱不做工的人很多，因何理由要强迫穷人非增加教育时间不能减少工作时间呢?”“工人劳力所生产的价值，远在他们每日所得的工资以上，这工资以上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抢去，叫做‘红利’分配了，所以工人所得工资就是能够衣食饱暖，就是衣服楚楚，而被抢的权利，仍然是绝大的损失，终究是要大声叫冤的，因何理由必须强迫工人储蓄才能增加工资呢？浪费时间及金钱与否，是工人自己厉害所关，不劳他人强迫，若资本家借口教育、储蓄问题来阻止减时加资，实在是笑话”。[⑧]

1920 年初，上海资本家穆藕初办理的厚生纱厂到湖南招收女工，简章规定每日要工作十二小时，而工资只给八元左右，所以引起了长沙舆论界的纷纷指责，穆藕初于是进行自我辩护。陈独秀把双方的言论综合登在 1920 年 5 月 1 日出版的《新青年》上，并在自己的意见中指出：“大家要晓得二十世纪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的时代，不是要求待遇时代了。无论待遇如何改良，终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劳动者要求资本家待遇改良，和人民要求君主施行仁政是同样的劳而无功，徒然失了身份。”在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陈独秀说；“劳动者要求管理权时代还远，眼前的待遇问题，还是不能放松的”，因此他认为还是有和穆藕初讨论劳动问题的必要的。接着他便指出了资本家高度的剥削，并驳斥了资本家借口按“工作能力之大小，与责任心之有无”而限制工人工资的谎言。他说：“‘工值’是什么？是工

人每日劳力结果的生产额在市面上的价值，不是资本家任意定的三角两角。三角两角以外的剩余工值，都被资本家股东用红利的名义抢夺去了工人丝毫分不着；工值抢了去，反过脸来还要审问被抢者的工作能力之大小与责任心之有无，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⑨]

从陈独秀以上的言行来看，他这时已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了。

共产国际代表来华，真正开始了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直接联系，更好地促进了中国共产主义者深入宣传马克思主义，更加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维经斯基来华之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已经有了要组织起来的要求，并且进行了建立组织的尝试。在维经斯基来华后，他对苏俄情况的介绍，对中国已经可以建立共产党的意见，对于中国共产党各地组织的创建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注释：

①《国民新报》，1920 年 2 月 7 日。

②《回忆“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文史资料选辑》，第 611 辑。

③斯诺：《西行漫记》，第 132 页。

④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第 6 ~7 页。

⑤李大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曙光》第 2 卷第 2 期，1921 年 3 月。

⑥⑧⑨《新青年》第 7 卷第 6 号，1920 年 5 月。

⑦《独秀文存》（四），第 215 页。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独秀从北京避居到上海后，把《新青年》也移到了上海出版，改弦更张，大谈政治，积极宣传社会主义。他认为："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①]认为被统治的无产阶级应该把资产阶级统治者手里的权利夺过来的时候到了。这时的陈独秀已经成为一个有很大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宣传者。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上海会见陈独秀，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陈独秀正在为努力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进行着切实的革命工作，陈独秀早有建党的意图，维经斯基的到来，令陈独秀十分高兴。他们一见如故，多次交谈，反复认真地交换了各自的意见。维经斯基则根据自己在北京和上海的所见所闻，依据苏俄革命胜利的经验，认为当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各项条件，认为组织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已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所以建议陈独秀立即组织中国共产党，这正符合陈独秀的意愿，他决定马上进行组建共产党的实际操作。

1920年5月，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积极展开了建党活动。在当时的上海，宣传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三股力量：一是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社，以及陈独秀和李大钊出版的《新青年》月刊（李大钊在北京负责组织稿件），这个刊物是五四运动以后宣传社会主义最有影响力的刊物，而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个时候已经成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带头人；二是戴季陶、李汉俊和沈玄庐等组织的星期评论社，参加该社的还有陈望道、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沈仲九、刘大白等。他们合力创办了《星期评论》周刊。这个刊物是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指导和支持下出版的。由于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星期评论》在五四运动后，以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介绍世界和中国的劳动运动获得了盛名，在当时进步知识分子中影响相当大。由国民党左派邵力子等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从1920年起，也已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

主义闻名。《星期评论》在1920年6月停刊以后，其主要成员大都转到《觉悟》副刊撰稿，从而扩大了它的影响；三是张东荪等人组织的共学社，他们大多数是研究系的人，在上海出版《时事新报》，该报也曾同情过五四运动。可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扩大，它也大谈起“社会主义”。他们还以“北平新学会”的名义出版了《解放与改造》半月刊（从1920年9月第3卷起更名为《改造》，由梁启超任主编），专门研究“社会主义”，曾大量刊登过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和译文，造成一种拥护社会主义的假象。实际上，他们是为了遏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采取的一种手法。这代表了当时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存在着的企图预防社会主义革命的改良主义思潮。张东荪这类假社会主义者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包括在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中间，都是很有影响力的。陈独秀就曾把他们看作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真社会主义者。

在陈独秀的介绍下，维经斯基很快和这些社会主义者建立了联系。他们以新青年社为中心，经常举行座谈会，讨论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参加座谈会的有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李季、袁振英、沈雁冰（茅盾）、陈公培、周佛海、俞秀松、沈仲九、刘大白、戴季陶、张东荪等。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维经斯基根据了解的情况，认为“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大事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太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在这种情况下，维经斯基提出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个意见得到多数与会者的同意，这也正是大多数人的意愿。但是，张东荪却不赞成了，他很快暴露了他的假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挑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大讨论。戴季陶最初也是表示同意建党的，但当真要建立的时候，他却借口不能同孙中山和国民党断绝关系而退出了。戴季陶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党的国民党右派。再后来，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刘大白等也退出了。然而陈独秀等共产主义者却是坚定不移的，决心一定要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走苏俄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建立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

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积极分子会议。这次会议为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上，陈独秀、李汉俊和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共产党。据李达回忆说：“我（在1920年8月由日本）回到上海，首先访问



了陈独秀，谈起组织中共，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②]1920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了。“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③]这个组织“首先拟定一个类似党章的东西，是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格纸写的。所谓党纲，只有劳工专政，生产合作八个字。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上海共产主义者建立的这个组织，一般被称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其实，它一开始就叫党，而不是称小组。至于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似乎是经过了一番斟酌。从 1920 年 9 月 1 日陈独秀发表的《对于时局的我见》来看，他是把社会主义者组织的政党统称为“社会党”的。据张申府回忆，“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曾写信到北京征询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等经过研究，认为应当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陈独秀等接受了这个意见。所以，上海党组织在 1929 年 11 月 7 日创办的党内机关刊物，就是以《共产党》（月刊）来命名的。这个刊物的出版，标志着共产党的旗帜已经在中国大地上正式飘起来了。

据考证，从 1920 年 8 月到 1921 年 7 月这段时间内，上海小组成员有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李季、袁振英、沈雁冰、陈公培、周佛海、俞秀松、沈仲九、赵世炎、李达、杨明斋等人，稍后还有李启汉、刘伯垂等人参加。上述的一些人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活动后，很快就离开了上海。如施存统和周佛海先后到了日本；陈公培和赵世炎先后到了法国；陈独秀、李季、袁振英和沈玄庐到了广州，李季稍后又到了欧洲；刘伯垂到了武汉。这些人到各地后大都成为各地党组织的发起人。因此到 1921 年 7 月，上海党组织的成员只有李汉俊、俞秀松、陈望道、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杨明斋等人。陈独秀赴广州后，李汉俊、李达先后代理过上海中国共产党的书记。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后，通讯处设在法租界《新青年》发行部，来往信件在此处理。他们还经常在新青年社内开会，到会的包括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内，约七八人，讨论的内容大多是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的问题。

1920 年，维经斯基离开上海去了广州。这时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邀请，也去广大就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上海发起组便由李汉俊

代理书记。《新青年》杂志由李汉俊和陈望道负责主编。李达负责主编《共产党》月刊。1921 年 2 月上海发起组由李达代理书记。

1920 年 11 月 7 日，党的上海发起组创办了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这个刊物第一次在中国树起了“共产党”的大旗，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主张。该刊第一号《短言》明确指出：“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面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破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罗斯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4]这个短言相当与《共产党》月刊的发刊词。

《共产党》月刊，还发表了一些研究中国革命纲领的文章。这些文章，初步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驳斥了“中国无地主、无资本家、没有阶级的区别，不能提倡社会革命”等谬论。指出中国不但有本国的资产阶级，而且有国际的资产阶级，对中国无产阶级进行着最严重、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中国的贫民几千年来就遭受着封建地主的最残暴的压榨和掠夺。因此，必须推翻旧的社会制度，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对中国的旧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并且反对当时的省自治运动，认为这是“缙绅运动”，其真正的结果是平民得不到一点好处，反而多了一重压制，多加了一层掠夺罢了。他们还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议会政策”和工会运动，而主张效法俄国革命，实行以工人为主的城市武装起义，即实行所谓的“直接行动”和“无产阶级突发的群众运动”，以推翻反对剥削阶级的政权，使无产阶级走上支配阶级的地位。然后无产阶级借助于“政治优越权”来改变经济组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5]有的文章则谈到了农民的作用问题，指出“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积极的觉悟，可以起来行阶级斗争，我们的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6]所以，共产主义者应该到农民中去开展工作。当时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具体道路，但是，他



们坚信共产主义同样是适用于中国的，中国革命走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这个大方向是没有错的，在当时就能有这样明确的思想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对于探索中国共产党将来有什么途径领导中国革命是有益的。

《共产党》月刊用了大量篇幅宣传有关共产党的知识。其中包括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列宁的学说。列宁的一些重要著作，如在俄共九大上的演说、《国家与革命》的第一章都译载了。此外，还有《美国共产党党纲》等等。这对于刚刚建立的共产党组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对党组织的成员了解共产党的性质、特点和组织机构等都有很大的作用，提高了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

《共产党》月刊针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影响，明确指出："第二国际，是残杀劳动界凶手的组织，是资本家代表的组织。而第三国际是最有进步工人的万国联合会。这些工人，是立志或者推倒资本主义，或者死亡的。"指出第二国际"就要可耻的死去了"。共产国际则"是被压迫的世界有希望的明星"。⑦

《共产党》月刊是深受国内各地共产主义者和旅欧的共产主义者欢迎的刊物，在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中也广为流传。它的发行量最高达 5 000 余份。这对于当时的发起工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上海早期党组织成立后，为了培养干部，在渔阳里 6 号举办了一个"外国语学社"。它对外是公开的，无条件招生。但实际上，学员大都是各地革命团体选送来的。如 1920 年暑假，肖劲光、任弼时、周兆秋、任岳等六人，就是由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介绍来的。也有些青年因受新思潮的影响，有志于革命，自己离开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找《新青年》社的陈独秀和《觉悟》副刊的邵力子，谋求出路。学社由杨明斋具体负责，他和维经斯基的夫人主讲俄文，袁振英和沈雁冰主讲英文，李汉俊讲法文，李达讲日文。学社主要是学习俄文，英文其中一分人将要去俄国深造。除了学习外文，还着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1921 年春，学员先后有 20 多人分三批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到 1921 年冬，学社结束。

1920 年 8 月，上海党组织派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负责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到外国语学社和杨明斋、袁振英一起，在部分先进青年中发展青年团员。第一批有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同志，俞秀松担任团的书记，办公地点就设在外国语学社。经过陆续发展，在外国语学社的团员又增加了不

少。青年团每周开会一次，每次会议都有政治报告，内容多半是由党组织规定的。

上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后，便向全国各地共产主义者发出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要求各地进行建团工作。接着，北京、广州等地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党培养干部起了一定的作用。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11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宣言》是由英文稿译成中文的。内容包括三部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

共产主义者的理想，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于经济方面的见解，提出要消灭剥削制度；二是对于政治方面的见解，提出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政权；三是对于社会方面的见解，提出要最终消灭阶级。概括起来就是无产阶级要建立一个没有经济剥削，没有政治压迫，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共产主义者的理想，也是党的最高纲领。

共产主义的目的，这部分提出："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为了能达到这个目的，第一，以阶级斗争的方式，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使资本主义寿终正寝；第二，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斗争，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这政权是维持资本家的国家的，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正如1917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

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就是榜样。第二，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无产阶级的胜利，实现共产主义。第三，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是要继续消灭资本主义势力的残余，制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规，组织大规模的劳动生产。一个国家不能建成共产主义，要"一直等到全世界的资本家的势力都消灭了，生产事业也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开始运动了"。

《宣言》当时没有向外发表，但是内部则以此为收纳党员的标准，起着临时党纲的作用，对各地建党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在创建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过程中，它和它的领导人陈独秀，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后来讲过："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



人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是说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8]

注释：

①《本志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②《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

③《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3期。

④《共产党》第1号《短信》，1920年11月7日。

⑤《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共产党》第3号，1921年4月7日。

⑥《告中国农民》，《共产党》第3号，1921年4月7日。

⑦《将死的第二国际和将行的第三国际》，《共产党》第3号，1921年4月7日。

⑧毛泽东：《关于“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99页。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维经斯基离开北京去上海后，李大钊积极地利用自己身处北京大学的有利条件，向北京大学的先进知识分子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通过报纸刊物，向广大的人民群众解释苏俄的社会主义，号召人们走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

维经斯基的来华，确实提高了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李大钊已经开始号召人们注意研究中国社会的现状。李大钊对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双重压迫的中国，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既有同情又有无限的期望。他坚信中国社会一定会变革，认为："饥饿是变革的原动力。法兰西大革命，饥饿是重要的原因；俄罗斯大革命，饥饿也是重要的原因。今年北方旱蝗并作，灾区很广，才是初秋，已经饿殍满野，等到明春，更不知惨到什么样子！军阀财阀政客们，还是旁观坐视，依样横行。将来恐不免要造一回大变革。"[①] 李大钊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强调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到群众中去。他说："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打成一片不可。我希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②]当时，许多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一部分青年学生，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他们都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去，接近劳动群众。他们虚心向工人学习，和他们促膝谈心，交朋友，宣传革命道理，深受工人的欢迎。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入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到工人中进行宣传与组织工作，他们有计划地到工厂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与工人群众的联系进一步的加强了。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北京共产主义者不仅在北京促进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而且还给了天津革命知识分子以积极的影响。1920 年 8 月初，天津觉悟社举行年会。会上，周恩来总结了一年多来天津爱国运动的经验教训。指出：今后救国的道路，只有深入劳工群众，依靠劳动阶级；同时要把"五四"以后全国各地涌现出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争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改造中国社会。会后，周恩来等 11 位觉悟社成员来到



北京，提出了上述意图向李大钊请教。李大钊赞赏和支持他们的主张。

1920 年 8 月 16 日上午 9 时，觉悟社的 11 位成员，和北京少年中国学会、青年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团体的代表 20 余人，在北京陶然亭举行了茶话会。会上，首先由刘清扬报告开会的宗旨。接着，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张申府在会上发言。李大钊提议各团体有要标明本会主义的必要。他认为，各团体要有一个正确的主义，主义不明，对内不足以团结一致，对外尤不足以与人进行联合行动。会议决定联合起来，五个团体组合一个“改造联合”，并制定了宣言和约章。③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还帮助天津的革命者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帮着济南的革命者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在北方更广泛的传播。

李大钊在北京一直积极地准备建党，在陈独秀发起建立上海共产党组织以后，李大钊更加快了脚步。据张申府回忆：1920 年 9 月，他去上海，住在渔阳里二号陈独秀家里，“这就是当时党部所在”。陈独秀同他“谈过建党的事”，并且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要发展，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收到党内来”。回到北京后，他把陈独秀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大钊。他们一致认为要立即发展党员。这时正好刘清扬参加全国学联募捐活动从南洋刚回北京，于是，李大钊和张申府把她找到北京大学主任室谈话，准备吸收她入党。④但刘清扬说，她要出国留学，不能立即参加进来。10 月初，张国焘也参加全国学联募捐活动从南洋回到北京，据张国焘回忆：他在 1920 年 7 月底到上海后，陈独秀也同他谈过建党的事，他回到北京后，也把陈独秀谈话的经过告诉了李大钊。李大钊认为，“我们现在起来组织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条件都较为具备”，像陈独秀等在上海所做的那样，我们“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⑤。1920 年 10 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 3 人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张申府在同年 10 月去了上海，11 月到法国里昂大学教书。这时，北京党小组只剩李大钊和张国焘了，李大钊马上做了黄凌霜的工作。黄凌霜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还标榜自己信仰共产主义，赞成社会革命。于是吸收了黄凌霜、袁明熊、陈德荣、华林、张伯根、王竞林等无政府主义者加入了组织，随后又吸收了罗章龙、刘仁静等加入。

黄凌霜等加入党组织后，小组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举行会议，并进行了分工。由李大钊担任联络的任务，张国焘担任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黄凌霜和陈德荣分工创办工人通俗读物《劳动音》，负责编辑和发行

工作，罗章龙、刘仁静等负责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当众宣布，他每月捐出个人薪俸 80 元作为小组的活动经费。可是到了 11 月间，在小组内部，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主要分歧有两个：一是组织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全国性和地方性的领导，反对职务分工和党内纪律。这与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求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是背道而驰的，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是有害的。二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不要一切政府，而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得有一个政府。围绕这两点，小组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共产主义者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如果不承认这点，是无法正常进行工作了。经过争论，因为无法达成共识，结果无政府主义者全部退出了组织。而他们主办的《劳动音》周刊由罗章龙等人接手。《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指出：这些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过分激烈的言论，他们使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了。"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组织以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骨干邓中夏、何孟雄、高尚德、缪伯英（女）等转为党员。1920 年 11 月底，北京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将这个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到 1921 年 7 月前，北京党组织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尚德、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俊、张太雷等 12 人。他们基本上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

北京党组织成立以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成为了党直接领导下的一个群众团体。这个研究会经过将近一年的酝酿和筹备，才正式公布，征求会员。1921 年 3 月 22 日起草了《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11 月 17 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登载。发起人有：高崇焕、王有德、邓中夏、罗章龙、吴汝明、黄绍谷、王复生、黄日葵、李骏、杨人杞、李梅羹、吴容沧、刘仁静、范鸿劼、宋天放、高尚德、何孟雄、朱务善、范齐韩等 19 人。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发起人中未列李大钊的名字。因考虑到他是党的领导人，在外界，他以教授和马克思学说理论家的和身份出现比较好，所以开始时李大钊并没有出头露面，而这是党内指导。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有以下活动：（一）搜集马克思学说的各种外文、中文书籍；（三）编辑、刊印马克思主义论著；（三）组织讨论会；（四）主办演说会。为了研究马克思列宁的著作，研究会成立了一个共产主



义图书馆，起名为“亢慕义斋”。他们从各方面搜集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还通过共产国际代表和苏俄驻中国使馆，搜集和收藏了共产国际出版的英、日、德、法等文字的书籍，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共产主义原理》、《雇佣劳动与资本》、《法兰西内战》、《伟大的创举》、《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共产国际的文件。北京党组织的成员得到这些著作和文件后，边看边译，很认真的学习。李大钊提出，希望这个研究会能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培养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人[⑥]。他们最早翻译的是美国人约翰·里德写的《震撼世界的十天》，这是世界上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最早的一本著作。他们还翻译过《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图书室的藏书，上面都盖有“亢慕义斋”的印章，这是我国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十月革命经验的一批珍贵文献。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富于战斗力的活动是辩论会。一次，辩论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是否适于中国”。这次辩论很激烈，延续了好几天，并且请了李大钊作裁判员。会员们发言非常踊跃，争论异常激烈。最后，李大钊讲话，认为，赞成派如果拿唯物史观来说这个问题，那就更容易驳倒反对派了，并着重指出：社会主义必然到来，人们应该为社会主义事业而献身。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通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平民教育讲习团等进步团体，在斗争实践中培养一大批年轻的革命知识分子。1920 年 10 月，北京党组织成立后，按照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团的要求，立即着手筹备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进一步对青年进行培养教育，组成浩大的革命队伍。11 月初，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由邓中夏、刘仁静、罗章龙、张国焘等负责发起了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团的第一次会议是在北京大学的学生会办公室举行的。参加会议的有邓中夏、高崇焕、王有德、罗章龙、吴汝明、黄绍谷、王复生、黄日葵、李骏、杨人杞、李梅羹、李实、刘仁静、罗汉、范鸿劼、周达文、刘维汉、缪伯英、高尚德、何孟雄、朱务善、郑振铎等约 40 人左右。当时，他们都是北京各大专院校学习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爱国运动的活动分子。会上，张国焘致开幕词，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高尚德当选为书记，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宣告成立。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联络和组织进步学生学习马

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并组织一部分青年赴苏俄参观学习。1921 年 2 月 20 日，青年团开会为赴苏俄学习的同志筹集经费。3 月 16 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召集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大钊、罗章龙、何孟雄等 24 人。高尚德报告了少共国际代表格林来华在京活动情况，会议选举何孟雄为出席少年共产国际大会代表。这个时候，团员已经发展到了 47 人。3 月 30 日，青年团在北京大学二院召开第四次大会，团员增至了 55 人。李大钊出席了这次大会，鉴于团的工作发展比较快，提议建立团的“事务所”（即团的机关），加强团的领导。会议决定青年团实行执行委员制，张国焘被推选为书记、高君宇被推选为组织委员、刘仁静被推选为会计委员。李大钊、郑振铎被被选为出版委员。

但是，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全国各地建立的多数团组织一样，“只不过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没确定哪一派社会主义”。⑦团员不是经过介绍和严格审查后吸收的，而是出通告招收的，成分比较复杂。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还有主张人道主义的。组织不纯。后来，到了 1921 年 5 月不能不宣告解散，直到 1921 年 11 月才重新组建。

1921 年 1 月，维经斯基从广州回到了北京，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再次会见了李大钊，并和北京党组织的成员进行了座谈。他们谈了许多，有共产党人的基本信念、组织原则、俄国革命的实际状况、共产国际成立的经过、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等等。座谈会还对中国当时的工人运动进行了讨论。1921 年春，维经斯基由北京回苏俄了。

注释：

①《新生活》，第 41 期，1920 年 10 月 17 日。

②《青年与农村》，《李大钊选集》，第 146 页。

③《北京会员参加筹备“改造联合”》，《五四时期的社团》（1），第 327 页。

④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1979 年 9 月 17 日。

⑤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篇第一章、第二章。

⑥《李大钊选集》，第 371 页。

⑦《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先驱》第 8 号，1922 年 5 月 15 日。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

在上海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长沙也着手了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作，以毛泽东、何叔衡为中心，在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进步团体的活动中扎实地开展了。

新民学会是当时中国社会影响比较大的进步团体之一，诞生于五四运动之前，在1918年4月17日，在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召开了成立新民学会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萧子昇、萧子暲、陈启民、邹鼎丞、陈赞周、张芝圃、周晓三、罗荣熙、叶兆祯等人。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和邹鼎丞起草的新民学会会章，确定学会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要求会员必须做到：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会员发展到了六七十人。萧子暲后来回忆说：“新民学会是湖南——不限于湖南——共产党的前身，实质上是革命的核心，或如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对我说，‘新民学会起过联共党小组的作用’”。①

新民学会在毛泽东、蔡和森和萧子昇的倡导下，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许多青年学生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水平，毅然决定离乡他国，走上了勤工俭学的道路。1919年至1920年，先后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有蔡和森、萧子昇、李维汉、蔡畅、向警予、熊季光、罗荣熙、萧子暲、张芝圃、劳君展、陈赞周、曾星煌、熊淑彬、熊焜甫、张百龄、刘望成、欧阳玉生、魏韫厂共18人。蔡和森到了法国以后，接触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虽然他对法文不是很了解，严重影响了他的阅读能力，但是凭借字典等手段，还是阅读和翻译了一些《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积极地投入到实际革命活动之中，他很快就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夏天，在毛泽东、蔡和森影响和带领下的新民学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多数会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步地摆脱了空想社会主义、无

政府主义、工读主义等思想的影响。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适合中国，只有走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学会的性质有所变化，影响也在逐渐增大。“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新民学会在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为湖南地区的建党建团工作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一部分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留法勤工俭学的革命活动和建党建团的准备工作中，也部分地起着骨干作用”。[②]

1920 年 5 月 8 日，毛泽东、李钦文等为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熊焜甫、陈赞周、魏韫厂、刘望成、欧阳玉生等人，在上海半淞圆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主张。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主张学会的本事不多做事，但以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在谈到学术研究时，他们主张会友三人以上“即组织学术谈话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气”，“巴黎等会友较多之处，可组织学术谈话会，定期会集”。会议还确定了吸收新会员的四个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③]这是一次对新民学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

毛泽东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革命活动中深受启发，意识到要组织革命斗争首先要推动新思潮的研究，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于是，毛泽东开始创办文化书社。

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联合教育、新闻、工商等各界的知名人士，共同发起文化书社。据《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记载：“本社发起于本年 7 月内，发起人鉴于世界新思潮之必须研究，而研究必须有良好材料，则新出版物之介绍机关必不可少，遂相与共谋书社之发起。”从书社的联络发起，办社宗旨的确定，直到筹备具体事项，都是由毛泽东亲自办理。7 月 31 日，毛泽东在《大公报》第 6 版上发表了《文化书社缘起》的短文：“彻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诸君，我们如果晓得全世界尚没有真正的新文化，这倒是我们一种责任呵！”8 月 2 日，在楚怡小学召开文化书社发起会议，“通过组织大纲后，推定筹备员易礼容、彭璜、毛泽东三人起草议事会及营业部细则，觅定房屋通信外埠订购书报等事。俟筹备妥帖，即行开议事会，推选经理，正式开幕云”。[④]

在各界进步人士的多方支持下，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文化书社于



9月9日开始营业，社址在长沙潮宗街56号。易礼容为文化书社经理，毛泽东为特别交涉员。小店门面不大，进深很长，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书报杂志，共有书籍164种，杂志45种，日报3种。货源来自国内60多家书报社和文化团体，其中小部分是其他书店常见的，大部分是其他书店没有的。《新青年》、《劳动界》、《新俄罗斯之研究》、《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劳农政府与中国》等等，都是通过秘密渠道进来的。这次办文化书社的活动在上海得到了陈独秀的支持，在北京得到了李大钊的支持，在武汉得到了恽代英的支持。并且约定罗宗翰为书社驻京总代表，毛飞为驻沪总代表。

文化书社的创办和发展，对湖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有了重大的影响，对建立共产主义小组起到了特殊作用。文化书社不仅是新民学会的主义活动场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而且也是党的秘密联络机关。

同年8月，毛泽东和何叔衡等又发起了俄罗斯研究会。长沙《大公报》于8月22日发表消息称：姜济寰、易培基、方维夏、何叔衡等，“以俄国事情亟待研究，拟发起俄罗斯研究会，定于本日（星期三）午后三时，约集各机关关心外政之人，商议一切进行方法，假长沙知事公署为会场。”⑤第二日，该报又发表了《俄罗斯研究会成立》的报道。报道说，我国和俄国接壤数千里，关系素来密切，老农政府既有这样千古空前的大变，我们有研究他们的内情的必要。俄国的文化，我们也要研究，所以发起这个研究会。在会上何叔衡宣读了简章，说：”本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本会会务：一、研究有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实地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⑥会议推姜咏洪为总干事，何叔衡、毛泽东、彭璜、包道平为筹备员，从事筹备工作。9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载《湖南之俄罗斯研究会》一文称：俄罗斯研究会正式成立于1920年9月16日。研究会推举“姜咏洪总干事，毛泽东书记干事，彭璜会计干事，并推彭君驻会接洽一切”。上述报道表明，俄罗斯研究会的实际负责人是毛泽东、彭璜、何叔衡等人。他们都是新民学会的骨干。

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的成立，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除长沙《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消息外，北京《晨报》也刊登了《湖南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的消息，副标题是《并派人赴俄留学》。报道了上海全国工会负责人张家鼐（湖南人）在上海与俄罗斯人接洽的情况，介绍了去苏俄的路线、费用，苏俄的生活情况，以及各种专业所需要学习的时间，等等。在这种向

往苏俄，学习苏俄的热潮下，任弼时、萧劲光、周兆秋、胡士廉、任岳、陈启沃6人，通过长沙俄罗斯研究会的介绍，由长沙坐船去上海。萧劲光后来回忆说："那时，我们参加俄罗斯研究会不久，毛泽东是俄罗斯研究会的书记干事。我们是通过在船山中学学习的任岳，找到船山中学校长贺明范的关系加入俄罗斯研究会的。后来，也是通过他办手续去上海的。到了上海进入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⑦然后到苏俄东方大学去学习。

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约集在长沙的会员召开了新年大会。大会在潮宗街文化书社举行，连续开了3天。这是新民学会一次极为重要的聚会。为了使会员预先有所准备，毛泽东、何叔衡等以学会名义事先发出通告，提出会上将要讨论的14个问题，并要求会员无论如何也要到会。1日，会员冒雪聚集到文化书社，10时开会，何叔衡主持了会议，先请毛泽东报告了开会理由，并介绍了巴黎会友召开蒙达尼会议的讨论结果以及国内外会员的情况。会议决定着重讨论14个问题中的前3个问题，即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要用什么方法？目前如何着手？会员们经过认真而又热烈的讨论，大多数会员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的共同目的。至于为达到此目的要采取的方法和从何入手，毛泽东介绍了旅法会友提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供大家讨论：一是社会政策；二是社会民主主义；三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四是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是无政府主义。在讨论中，第一个发言的是何叔衡，他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接着毛泽东发言，他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的老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⑧与会者在讨论中各抒己见，最后，何叔衡主持表决，结果大多数还是赞成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

这次大会对建立党组织问题进行了直接的讨论，这在长沙新民学会的活动中是空前的。许多会员在发言里都把建立党组织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事业中，即刻需要着手解决的问题。他们发表的意思是：陈启民："遇有机会，宜促使实现，故有组党之必要，所以厚植其根基"；熊瑾玎："事实上有组党之必要。多联络，不惜大牺牲，事先宜厚筹经济"；彭璜："组党劳



动党有必要，因少数人做大事，终难望成。分子越多做事越易”；陈子博：“组党分都市、乡村两方面”；易礼容：“宣传组织宜一贯，即组织，即宣传；即宣传，即组织。要造成过激派万人，从各地传布。”⑨这次大会上逐步深入的讨论表明，新民学会的多数成员已经在实际斗争中产生了组党的愿望。

毛泽东、何叔衡作为长沙建立党组织的发起人，从当地社会政治状况的实际出发，在建党组织工作上采取“潜在切实”、注重“打基础”、“找真同志”的方针。不张扬，不标榜，不图形式，不务虚名，而是脚踏实地，开辟多种途径，密切协同配合，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建立党组织的坚实基础。

1921 年 8 月，毛泽东、何叔衡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由上海回到长沙。他们在湖南积极发展党员，由于之前的工作做的比较好，党的发展工作进行得很顺利。10 月，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毛泽东任书记。

注释：

①萧子昇：《毛泽东同志在五四时期》，《新民学会资料》，第 368 页。

②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历史研究》，1979 年第 3 期。

③《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 1 号），《新民学会资料》，第 8、9 页。

④《文化书社昨日开会》，长沙《大公报》，1920 年 8 月 3 日。

⑤《组织俄事研究会》，长沙《大公报》，1920 年 8 月 22 日。

⑥《俄罗斯研究会成立》，长沙《大公报》，1920 年 8 月 23 日。

⑦萧劲光：《回忆参加旅俄支部前后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总第 6 辑，第 120 页。

⑧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 2 号）。《新民学会资料》，第 16 页、第 23 页，第 26 页、第 28 页。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

武汉党组织的筹备工作，是在董必武和陈潭秋等的积极活动下进行的。同时，也受到上海党组织的影响，李汉俊、刘伯垂帮助其开展。

董必武早在1911年就加入了同盟会湖北支部，开始革命活动。1919年春，他和张国恩从鄂西回到上海，住在湖北驻上海善后协会机关。董必武当时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想了解俄国革命的情况，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这时李汉俊正好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到上海，住在董必武的隔壁。李汉俊在日本看过一些马克思主义和有关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他向董必武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一些情况，推荐了《马克思主义入门》、《政治经济学入门》等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告诉董必武中国革命"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董必武根据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赞同李汉俊的看法。于是他们就开始研究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研究马克思主义原理。董必武高兴地说："这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本钱'。"[①]当时董必武还看了《新青年》、《新潮》及日本出版的《黎明》、《改造》等进步刊物，打开了眼界，开阔了视野。他常常与李汉俊、张国恩等谈论，"觉得当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彼此都认为现代社会已发生毛病了，传统的观念、道德、方法都要改变了"。[②]特别是他在上海亲眼看到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认为这是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人们都欢迎这种新的运动。从而认识到过去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总是依靠军阀，不依靠工农群众，方向是不对的。就这样，董必武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决心从头做起。但中国革命究竟该怎么样具体进行，社会如何变革，要变革成什么样子，董必武还是有点茫然的。当时，他想设立一种与人民谈话的机关，想通过办报纸，办学校，来宣传革命，教育青年，与人民群众联系起来。

1919年秋，董必武、张国恩先后回到武汉。准备办报纸，但因条件困难大没有办成。于是和陈潭秋等人商量，利用湖北教育会的旧址创办武汉中学。1920年初，武汉中学在武昌涵三宫开学，全校一百多学生。董必武是



一个教育革新者，他不顾顽固分子的反对，坚持在武汉中学招生不分性别，实行男女同校。学校教白话文，讲授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都受到学生的欢迎。董必武后来回忆说："我们教书，基本上是尽义务，像潭秋这样就只拿仅够个人生活的很少工资。在潭秋的影响和带动下，其他教职员也是底薪或不支薪。我们的着眼点是要建设武汉中学这个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开展革命活动。"[③]当时董必武已经是颇有名气，湖北女子师范、湖北第一师范、湖北省立中学和一些政府办的学校都先后聘请他教学。董必武追求真理，宣传革命，同李汉俊经常联系，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陈潭秋在上学期间，就对社会不满，誓要以从事革命改变中国社会。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宣布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对陈潭秋影响很大。他热切地盼望中国能够实现苏俄那样的"工人之国"。在五四运动中，他以武昌高师学生代表的身份参与组织领导了武汉地区的爱国运动，并作为学生代表到上海去参观学习，在那里结识了董必武。五四运动后，陈潭秋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深入工农和学生中调查研究，"采访撰写学生运动的稿件，刊载于汉口的《大汉》及《新闻》报上，并亲身参加各校学生罢课示威运动"。[④]1920年，董必武等创办武汉中学，聘请他为级任兼英文教员，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大力培养革命人才。为走俄国革命道路作着不懈努力。

1920年8月，李汉俊从上海来到武汉，与董必武谈话，要其准备筹建湖北党组织。董必武便分别找陈潭秋、张国恩进行酝酿。与此同时，陈独秀还派刘伯垂来到武汉发展党的组织。刘伯垂在日本留学期间相识，曾在广东司法界做事。当他由广州回武汉，途径上海时，陈独秀吸收其入党。遂陈派刘伯垂到武汉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筹建武汉党的组织。"刘伯垂还从上海带回一份抄写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和一些《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及有关俄国革命的小册子"[⑤]回到武汉。他按照陈独秀的要求，分别找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等人进行秘密联系，商讨建立党组织的问题。

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都曾在日本留学，同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张国恩毕业于两湖书院，1914年到日本学习政治经济学，后在湖北一师范当学监。他和刘伯垂都有律师资格。包惠僧毕业与湖北一师，是张国恩的学生，当时在武汉当新闻记者。陈独秀曾与1920年2

月应邀到武汉讲学，先后作了《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新教育之精神》等专题演讲，提出要改造当今的社会，必须研究改造的方法，以免重蹈辛亥革命失败的覆辙。陈独秀当时住在文华书院，包惠僧作为记者曾采访过陈独秀，进行过一些交谈，就这样相识了。陈独秀还认识了文华书院工人郑凯卿，并希望郑凯卿调查武汉地区工人的情况，写一个调查材料。

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郑凯卿等人同上海的陈独秀、李汉俊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而且他们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过反复商议，他们对建党组织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在1920年秋，由刘伯垂召集，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正式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会议“首先传阅了刘伯垂从上海带回的党纲草案，刘伯垂还介绍了上海党组织的情况”，并研究了支部建立后的活动。接着提议推选包惠僧为小组书记，张国恩负责财务管理。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决定租用位于湖北警察厅背后的武昌多公祠作为党的机关，门口挂起“刘芬（即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牌子，以掩护党组织的秘密活动。

小组成立后，小组的主要活动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当时的主要读物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浅说》、《马克思传略》等著作，还有《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等杂志。小组的组织生活会有时在抚院街董必武寓中，有时在多公祠5号机关内进行，经大家共同商议，规定每次小组会议要作工作报告或读书心得报告，漫谈国内外时事。这些活动的目的是教育和提高党员的觉悟。

在此期间，共产国际代表曾两次到武汉，与武汉支部成员联系。1920年冬，马马耶夫和鲍立维到多公祠5号找包惠僧等人，了解武汉党组织的工作。包惠僧向他们介绍了小组建立的经过及人员情况。1921年春，包惠僧离开武汉去上海，党的工作由陈潭秋负责。陈潭秋在武汉教职员和学生中开展了研究苏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小组还发展了湖北一师学生赵子健、事业工人赵子俊、进步教员刘子通和黄负生等人入党。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前，武汉小组的成员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不久退出）、郑凯卿、赵子健、赵子俊、刘子通和黄负生等人。

武汉建立党组织的活动，必须讲下恽代英和利群书社。恽代英在武汉对于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曾作出了宝贵贡献。他发



起组织了“互助社”等进步团体，创办了进步刊物，运用科学思想，宣传无神论，反对封建迷信。他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先后发表了《新无神论》、《论信仰》、《经验与智识》等文章。从五四运动到武汉党小组的成立，恽代英是武汉地区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0年2月，在恽代英的倡议和积极筹划下，在武昌横街创办了著名的利群书社，作为传播新文化和试验共同生活的基地。他发表了《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宣言，作为新的共同生活并服务于社会的纲领。利群书社包容了互助社以及在它影响下成立的一些小团体中留在武昌的大部分成员，成了武昌进步团体的联合组织。利群书社还和毛泽东在长沙主办的文化书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文化书社的成员有的也参加了利群书社。利群书社的工作人员实行半工半读的集体生活，他们制定了严格的自修和服务制度，如售货、送报、做饭以及其他一切杂务，全都是由自己动手，一反旧社会中那种轻视劳动的传统观念。利群书社从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介绍新文化的工作，推销了许多进步的书报杂志，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新青年》等进步刊物，读者也可以在书社阅览这些书刊。利群书社广泛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成为当时武汉地区传播新思想的主要阵地，进步青年活动的主要场所。董必武后来回忆说：“那时，武汉有一个激进的青年团体，他们有乌托邦和半无政府主义思想，热衷于搞‘新农村运动’。这个团体的中心在中华大学，他们创办了一个‘利群书社’。他们的领导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名叫恽代英。他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是中国早期最优秀的青年领导人之一。这些‘新农村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不久他们就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并有许多人参加了共产党。”⑥情况正是这样。还可以从1920年10月恽代英发表的《未来之梦》一文可以看出，文章说道：”我们的意思，要改造这个世界，一须做一个共同的生活的模型，使世人知道合理，有幸福的生活是可能的事。一须我们大家协力，不但解决自己及家庭生活问题，而且要有力量与资本家决定。”怎么与资本家决斗呢？他认为固然可以组织工会、鼓动罢工，用阶级斗争为推倒资本家的手段，但想要为世界求一个最后的解决，最好莫如利用经济学的原理，建设个为社会服务的大资本，一方面用实力压服资本家，一方面用互助共存的道理，启示一般阶级，而且靠这种共同生活的扩张，把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显然，这是一种空想的“社会主义天国”。但是他也认识到：“我们信个人主义的新村是错了的，个人主义的

工会罢工亦非根本方法，若用一手一足之劳，想逆经济潮流与资本家争胜，这是工读互助团的覆辙，亦绝不是法子。”[⑦]可以看出，《未来之梦》的主张是混乱的，它反映了作者思想中的矛盾。恽代英当时的这种思想，在利群书社的知识分子中具有代表性。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是在后来逐步地实现的。

恽代英同上海《新青年》社不仅有投稿关系，还和陈独秀、李汉俊有私人交往。陈独秀曾写信要武汉党小组同利群书社的成员多联系，吸收恽代英及其领导下的利群书社成员入党。

1920年冬，陈独秀、李汉俊等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马耶夫都曾先后到过利群书社，想同恽代英为代表的利群书社的成员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使他们早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武汉党组织成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也曾与恽代英交换意见，但由于当时还缺乏共同的思想基础，未能取得一致意见。1920年下半年，上海发起组还派袁振英到武汉，“同恽代英同志联系，劝他加入共产党小组，同时联络武汉三镇的农工学生等，和他到汉阳兵工厂、铁厂、武昌纱厂等处调查劳工状况，到各学校调查学生情况”。[⑧]党的关怀对于他和利群书社的其他成员的转变起了促进作用。

1921年夏，利群书社在黄冈林家大湾召开了会议，这是一次大转变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青年学生、工人、农民。长沙文化书社也派易礼容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举行了三天，一致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拥护苏维埃，赞成组织新式的党——布尔什维克的党，并提议要组织的名称叫做‘波社’（波尔什维克）”。大会决议组织布尔什维克式的“共存社”，“订立社章和通过宣言，明确地号召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苏俄，赞成组织布尔什维克式的党”。[⑨]不久后，利群书社的骨干成员恽代英、林育南、廖焕星、项英、施洋等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

注释：

①《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前后》(2)，第370页。

②《董必武同志的谈话》(1961年)，《楚晖》丛书，第1辑，第234页。

③《董老忆潭秋》，《楚晖》丛书，第1辑，第7页。

④包惠僧：《回忆陈潭秋》，《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第28页。



⑤包惠僧：《回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党史研究资料》（9），1979年8月20日。

⑥董必武：《创立中国共产党》（1937年），《"一大"前后》（2），第294页。

⑦《未来的梦》，《五四时期的社团》（1），第195~196页。

⑧《袁振英回忆》，《"一大"前后》（2），第475页。

⑨廖焕星：《武昌利群书社始末》，《五四时期的社团》（1），第206页。

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以山东主权问题为直接原因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山东人民反响强烈。这里的先进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比较早地接触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思潮。后来，随着爱国斗争的激烈化，不少先进分子开始积极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以王尽美、邓恩铭为发起人，上海、北京党组织的帮助下筹划所建立起来的。

山东省议员、中华革命党人王乐平是王尽美的远亲，他是山东政界和文化界比较厉害的人物，并且与陈独秀相识，受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在当时思想还是比较开明的，后来投入国民党。在1919年冬，他发起组织了齐鲁通讯社，开办了齐鲁报社，社址是在济南市内天地坦街。于1920年改名为齐鲁书社。“该社的精神就是不纯粹以营利为目的，而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为主要目的”，“以传播文化为宗旨”。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进步团体和出版界建立密切的联系，广为推销全国各地出版发行的新书、新刊物。这些出版物的内容虽然相当庞杂，但主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新文化运动，受到进步青年的欢迎。当时出售的革命书刊除《俄国革命史》、《资本论入门》、《社会科学大纲》、《唯物辩证法研究》等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外，还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共产党》、《觉悟》、《少年中国》、《曙光》、《新潮》、《莽原》等进步期刊，当时影响都很大，都是在知识青年中广为流传的读物。这对山东新思潮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济南及山东各地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

齐鲁书社致力于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不仅经销各种进步书刊，还为读者提供阅读的场所，并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学术演讲会和讨论会，探讨改造社会的理论和方法，在当时聚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先进知识分子，既是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地，又是济南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基地。进步的青年学生在这里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加紧追求民主与科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并在这里交流思想，结成团体。济南一师的王尽美、济南省立第一



中学的邓恩铭等人经常到这里购买和阅读进步书刊，在这里他们不仅最早接触到新的革命思想与文化，思想开始了转变，而且还结识了许多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王尽美还以学生会的名义同北京的进步学生组织取得联系，学习并交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经验。1920 年 3 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王尽美与研究会负责人罗章龙取得联系，并成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通讯会员。

1920 年 4 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人由北京去上海途径济南，会见了济南的进步青年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维经斯基与他们商谈了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不久，上海、北京两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通知济南的马克思主义者组建济南党组织。王尽美、邓恩铭等人便开始酝酿筹建工作。

1920 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在济南成立了“康米尼斯特学会”（共产主义学会），会址是在贡院墙根街济南教育会内，这是个读书性质的组织。虽然它的骨干是一批已经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但也有一些并不信仰或者是不完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加入了进来。该会的最初会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段子涵、王象午、王复元、王辩（女）、明少华、王志坚、方鸿俊等，后来逐步发展到了五六十人。会员都有瓷质马克思像的圆形徽章，凭徽章来会址读书和讨论。读的书有《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介绍苏俄革命的书刊，并定期进行讨论会。这些活动，对于深入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提高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批判能力，都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为济南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康米尼斯特学会也参加了一些政治活动。例如，为收回胶州铁路，他们在公园里举行集会，发表演讲，散发传单，鼓动群众。会员还深入到工人群众中间，向工人讲解马克思主义，并认真向工人学习，努力改造自己。康米尼斯特学会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进行革命活动的阵地，必然为山东的反动统治者所不容。1921 年 3 月，康米尼斯特学会便被反动当局以宣传过激思想明令取缔。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20 年秋，王尽美、邓恩铭等联络省立一师、省立一中和育英中学的进步师生王翔千、王志坚、吴隼等 11 人，多次开会讨论酝酿成立学术团体——励新学会。10 月 31 日，公布励新学会《宣言》和《简章》。11 月 21 日，在济南公园大厅正式召开成立大会。王尽美等受学会委托起草了学会章程，规定学会“以研究学理，促进文化宗旨”。会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志坚、王翔千、张世炎、陈汝美、张承豫、于其

惠、李法田、王象午、崔万秋、吴隼、王克捷、赵震寰、谢凤举、李祚周等。学会邀请进步教师郭绍虞等给予指导。后来会员发展到60多人。[①]学会主要是发行报章和举行学术演讲活动。比康米尼斯特学会成员复杂，是一个具有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性质的团体。1920年12月15日出版了会刊《励新》半月刊。该刊以宣传新思潮，介绍新文化，揭露黑暗社会，主张社会改革，倡导民众教育为中心内容。邓恩铭任庶务，总揽会务，王尽美、陈汝美为编辑主任。他们经常在《励新》上发表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分析社会现实，抨击封建主义，号召进行社会改革。如王尽美在《励新》第一期上发表《女子装束问题》一文，宣传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思想。邓恩铭在《励新》第一期发表了《改造社会的批评》一文，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指出了社会上存在着的阶级间的对立，期望有识之士脚踏实地，去改革社会。王尽美在第二期上又发表了《山东的师范教育与乡村教育》一文，揭露了当时教育制度的腐败，探索了农村教育改革的问题。到1921年4月15日，《励新》出完第一卷第五期后停刊。王尽美、邓恩铭等共产主义者，通过学会广泛地联络和团结进步青年，以《励新》半月刊为阵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

励新学会是五四时期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术团体，虽然会员的政治观点尚不一致，但他们在五四运动后出于反帝爱国的热情而组织在一起研究和传播新文化、新思潮，推动有志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起了一定的作用。1921年，随着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斗争的激烈化，学会内部发生了分化。一部分成员倾向于三民主义，参加了国民党；一部分成员转而信奉无政府主义；剩下的成员则信仰马克思主义，坚定地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1920年冬，王尽美、邓恩铭在组织康米尼斯特学会和励新学会活动的基础上，考查团结了一批信仰坚定、愿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革命者，并形成了一个核心。这时，上海和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已经成立，陈独秀、李大钊派人到济南帮助王尽美等组织建立党组织。到1921年春，在济南成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复元、王象午、王用章、贾乃甫等人。

在1921年“五一”劳动节，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王尽美、邓恩铭和王翔千的领导下，创办了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通俗报纸——《济南劳动》周刊。《济南劳动》周刊在一开始就非常注意促进马克思主义和工人劳动的结合，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这个刊物大量报道工人的痛苦生活和工



人运动的情况，促进工人的觉悟和团结，很受工人群众的欢迎。但后来，因经费的问题不得不停刊。后来，党组合决定由王翔千在《大东日报》的副刊上开辟《山东劳动》周刊专栏。该刊从各个方面以各种形势反映了工人的苦难生活。

随后，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又创办了《晨钟报》，从总编辑到编辑全都是共产党员，由王翔千任总编辑。同时，还创办了一个副刊——《钟声》，王尽美经常为其写社论，指出革命的道路，唤醒有志青年参加革命。《晨钟报》成了山东工人阶级的喉舌，代表劳动人民发言，因此受到反动政府的压制，不允许该报出版发行，也不允许报童在街上叫卖。面对这种恶劣的环境，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夜晚编印报纸，白天送寄发行，有时还亲自上街叫卖，深受劳动大众和青年学生的爱戴。这些报刊，前后办了两年多，销到山东各地，成为山东工人最欢迎的读物。

受其他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影响，山东在党小组领导下，也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该团是在 1921 年的下半年开始运作的，到 1922 年正式成立。团的工作开始主要是由王尽美负责，后由贾乃甫负责。近 40 岁的王翔千也加了团，他说自己是“特别团员”。青年团以学校为单位成立支部，组织团员学习团章，学习党刊和进步书报。团的组织生活主要内容是讨论发展团员。山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人数是比较多的，先后入团的有王尽美、贾乃甫、王翔千、王复元、王志坚、李祚周、王克捷、牛淑琴、于佩贞、马克先、秦缓云、王辩、侯玉兰、王兰英、张洛书、庄龙甲等数十人。

在山东当时也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而且影响甚广。无政府主义宣传不要国家，不要法律，人人平等，个个自由，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和符合小资产阶级的口味，所以在山东有不少人是相信无政府主义的。小组领导人王尽美就曾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相信无政府能够给改变中国社会，能够给中国人民带来希望。据一些当事人回忆：“王尽美当时曾一度崇拜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接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后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的信仰。”[②]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好多共产党的优秀代表都曾走过这一步。后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王尽美抛弃了无政府主义信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积极地领导山东的马克思主义者向无政府主义展开了斗争。据一些参加山东康米尼斯特学会的成员说，在学会里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斗争的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要不要组织共产党，

要不要社会主义革命，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等等。经过斗争，无政府主义不久就销声匿迹了。济南党组织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肃清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把更多的进步青年和进步人士带到了社会主义道路上来，使党组织更加符合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要求，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为党的正式成立作了准备。

1921 年 7 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正式成立，王尽美任书记。随着工作的迅速开展，山东区支部后来改建为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仍是由王尽美担任。

注释：

①《励新》第 2 期，1921 年 1 月 1 日。

②《大众日报》，1961 年 7 月 5 日。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

广州在近代是我国比较发达的地方，在这里工人比较集中，工人运动开展、成长也比其他地区早一些，我国的新思潮在这里传播的也是比较早的。这里的先进分子，很早就奔走于国内外，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1917 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不久，在同年的 12 月初，俄国国内革命胜利的消息就在广州传开了，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18 年 5 月 1 日，这里举行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

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在广州影响是比较大的。五四运动前夕，《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宣传新文化的进步刊物在这里广泛流传。在其带动下，广东的进步知识分子也创办了很多新的刊物，有《中华新报》、《羊城报》、《国民报》、《粤报》、《岭海报》等十多种。五四运动，广州锻炼了广大群众，产生了澎湃、刘尔崧、阮啸仙、杨匏安、周其鉴、张善铭、黄学增等一批革命人才。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广州逐渐地传播出来。如广东《中华新报》从 1919 年 7 月到 12 月，连续发表了杨匏安写的《唯物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等十几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曾亲身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北京大学学生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这个时候也回到了广州。他们和刘尔崧、阮啸仙、周其鉴等取得联系，在 1920 年 10 月创办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广东《群报》，编辑部设在广州木排头九母湾，陈公博担任总编辑，谭平山编辑新闻，谭植棠编辑副刊。广东《群报》创刊号上发表的《筹办群报缘起》，阐明了办报的宗旨：“（一）不谈现在无聊政治，专为宣传新文化的机关；（二）不受任何政党援助，保持自动出版物的精神。”办报的目的，“就是主张改造社会”，并“认定新文化运动，是今日改造社会一种很重大很切要的事情。”“我们群报对于社会，就是担负新文化运动的宣传机关，去催促新社会早日实现那个责任”陈独秀在广东《群报》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广州青年》一文，希望青年不尚

空谈，切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群报》设有评论、研究、杂著、马克思研究、特别记载、工人消息、留法通讯等专栏。其内容主要是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宣传新文化运动，社会改造，报道劳工运动状况，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介绍世界新闻和苏俄的消息。还刊载马克思、列宁的传记，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共产国际的文件等。报纸办得生动活泼，是广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是广东各界群众运动的领导者，在广大全省乃至南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广东《群报》曾在《新青年》上公开宣称："本报是中国南部文化运动的总枢纽，是介绍世界劳动消息的一个孤独子，是广东十年来恶浊沉霾空气里面的一线曙光。诸君有关心文化消息，世界趋势，和社会问题，请看社会的前驱——《广东群报》。"

至此，在广州已经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从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工农劳苦群众的伟大力量，并逐步地走向社会，到工农群众中去，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逐步结合起来。1920 年，广州地区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逐步汇合，就体现了这一点。这年 5 月 1 日，广州工人在东园广场召开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当晚，工人、学生数千人一起举行了提灯游行。[①]5 月 7 日，在这里又召开了"国耻纪念日"大会，工人和学生都派代表在会上发了言，愤怒声讨了军阀卖国贼的罪行，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为了反对桂系军阀莫荣新的反动统治，10 月，广州各学校的学生举行了罢课，粤汉、广九两铁路的工人也同时举行了罢工，他们共同的口号就是桂系军阀莫荣新滚出广东。在此前后，广东出现了有利于革命的新局势，陈炯明率领的粤军在孙中山的领导和支持下，1920 年 8 月由福建漳州回师广东，10 月下旬占领了广州，孙中山由上海又回到了广州主持军政府。孙中山对俄国十月革命是称赏的，对五四运动也是积极支持的。当马克思主义日益广泛传播时，国民党内的一些进步人士是非常赞同并积极宣传这一学说的。例如：林修梅（林伯渠的堂兄）当时是大元帅府代参军长，在 1920 年就写过文章宣传社会主义，赞成马克思主义。陈炯明虽然身居要职，集广东军政大权于一身。但他为了维持在广东的统治，这时也伪装开明进步，表示支持工人运动，赞成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 年秋，有两个俄国人以苏联政府代表的名义来到广州，分别是米涅尔和别斯林。设立了罗斯塔分社。他们到广州前，先到北京找到李大钊，通过李大钊又认识了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黄凌霜带他们经上海到广州，把他们介绍给了广东的无政府主义者。当时，在广东无政府主义者活动是活跃



的，苏俄代表在广东首先接触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黄鹃声、区声白、刘石心、梁一余、梁雨川、谭祖荫等。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以极“左”的面目高喊“革命”，鼓吹无政府共产主义。苏俄代表和他们谈了好几次，向他们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要他们联合起来，开展工人运动，进行社会革命。为了开展工作，俄国代表在广州永汉北开了“光光”眼镜店二楼（现在是北京路太平餐馆对面）为活动机关，梁雨川和谭祖荫住在这里。俄国代表和梁冰弦、黄鹃声等七人几乎每周在这里开一次会（有时在黄鹃声家开），主要研究如何开展工人运动和宣传社会主义。他们当时主要在广州河南协同机器厂开展宣传活动，并成立了工人俱乐部。

10月3日，俄国代表和无政府主义者创办了《劳动者》周刊，梁冰弦、刘石心、黄凌霜负责编辑，梁一余负责印刷、发行，经济上由梁冰弦主持。《劳动者》的发刊词《劳动者呵!》阐明了创办该刊的原因。指出：“我们食的东西，穿的衣服，住的房子……都是我们做耕田、织造、裁缝、泥水、木匠、铁工、瓦工、油漆、机器工、驾驶工、搬运工，一班人做出来的，……所以只有做工的人，是最有用的人，是最高贵的人。”但是，社会的现实却是“种田的吃不到半饱，纺织的没有蔽体的衣裳，建造的没得房子可住，……把生活上至苦的境遇，通通放在工人的肩上。”因此，应该把工人组织起来，“第一是改进生活景况的运动；第二是改革生产制度的运动”，这是“做工人自救的唯一途径”。但是，“现在我们工人还没有组织团结，还没有言论机关。大凡工人所应晓得的道理，人家已经做了的事情，我们一点还没有晓得。如此不用讲第二层活动，就是第一层的也是办不来的。想免除这种困难，印书出报，也许是许多办法当中的一件办法。这是我们出版的唯一原因。”《劳动音》为了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事实，指出劳资之间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造成劳资对立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要改变工人困苦境遇的唯一办法，就是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劳动音》第二号发表的《共产党的粤人治粤主张》一文，指出：“根本解决的办法，只有平民振起，由农夫劳动者的组合，把一切政治机关推翻，把一切组织推倒，实行共产主义!”《劳动音》对农民问题也有一定程度的重视。在第六号上发表了《和耕田朋友的谈话》一文。此外还介绍了美国、意大利等国的工人运动的情况，报道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劳工运动、妇女运动及土地政策等方面的情况，这对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促进他们团结起来开展劳工运动，有着积极的作用。

因为该刊是由无政府主义者主持编辑的，也散布了不少无政府思想，对工人有不良影响。如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在《实际的劳动运动》一文中指出："经济学派上所谓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劳工组合主义，虽不能各自独立成为绝对完善之理想，而同为今后社会进化，必经之途径"，鼓吹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以"初"的署名的《罢工的意义》一文也说："政治运动，是和劳工没什么关系的，政治上的要求，终久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根本否定政治斗争的必要。再如发刊词《劳动者呵!》也说道，只有"先开展改进生活景况的运动"，减除目前痛苦，才能有"改革生产制度运动"的能力，解决"工人生活的问题，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这也就是说只有从事改善工人生活的经济斗争，才是当务之急。尽管如此，《劳动者》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教育工人团结起来开展罢工斗争等方面，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

到1920年下半年，广东和全国很多地区一样，建立党组织的条件基本上已经具备。俄国代表同无政府主义者在广州酝酿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因为"党执行委员会的九个委员当中，七个是无政府主义者，只有米涅尔和别斯林是共产主义者"[②]，所以，有"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③]之称。而当时在广州的社会主义者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由于观点不一致都没有参加。

这个"共产党"的成立，无疑受到上海党组织的影响。1920年11月陈独秀接到陈炯明邀请，要他到广州担任广东教育会的委员长。陈独秀首先和共产国际代表商议，认为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应当去开展工作。后又和北京的李大钊等进行商量，一致认为可以接受这位大军阀的邀请。理由是："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广泛地带到广东去；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的组织。"[④]到12月，陈独秀把上海党组织的各项工作交给李汉俊代理，由上海出发赴广州。和他同来广州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李季和袁振英。陈独秀和维经斯基首先和米涅尔、别斯林取得联系，接着就同梁冰弦、黄鹏声、区声白、刘石心、梁一余、梁雨川、谭祖荫等一起开会讨论党的组织问题，陈独秀在会上把他已起草好的一份党纲拿出来让与会者研究，其中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无政府主义者表示不能接受。经过几次讨论，无政府主义者仍是不能接受，双方矛盾激化，不可调和。于是，陈独秀提出，大家主义不同，终究是要分的，联合起来会因活动手段、策略不同，引起争论，不如现在就分，各走各的路。无政府主义者



也表示同意分开。这样，无政府主义者便退出了“共产党”。

陈独秀来到广州就找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他们都是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不仅有师生之谊，而且在北京一起参加过五四运动，关系颇为密切。陈独秀知道他们正在办宣传新文化的广东《群报》，对他们很是赞赏，要他们不尚空谈，切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进行踏实的工作，并和他们商谈了有关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问题。经过酝酿，在 1921 年 3 月，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后不久，重新组建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据陈公博后来回忆：当时他们觉得“中国前途殊可忧虑，兼之那时也震与列宁在俄革命的成功，其中更有仲甫先生在北大的关系，平山、植棠和我，遂赞成仲甫先生的主张，由我们三个人成立共产党”。[⑤]谭平山担任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管宣传。中共一大前，原在上海加入党组织的沈玄庐、李季、袁振英和武汉组织组织成员包惠僧，也参加了广州党组织的活动。

受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影响，广东青年团成立于 1920 年 8 月。公开发展团员，参加者有各学校的教师，也有学生。这些人并不是对社会主义有明确的认识，而是怀着好奇心加入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和受着各种思想影响的人也参加了进来。由于团员宗旨没有取得一致，团的组织没有表明那种主义，而且没有具体的工作计划，所在在 1921 年的三四月间停止了活动。1921 年 10 月，上海总团提出了改组方针，表明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团的中心思想，委托谭平山在广东再次组织这会主义青年团。谭平山先行联络同志，后于 1922 年 3 月正式成立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杨匏安等负责团的工作。

广州党组织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初步组织起一支干部队伍，为党的发展和革命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注释：

①上海《民国日报》，1920 年 5 月 6 日。

②③《广东共产党的报告》，1921 年 7 月。

④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1 册，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 年版，第 128 页。

⑤陈公博：《我与中国共产党》，《寒风集》，地方行政出版社上海，1944 年版，第 203 页。

旅日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

在日本东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由施存统和周佛海二人所组建的。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是有不少有志之士到日本留学的，由于日本政府与袁世凯、段祺瑞等封建军阀相勾结，签订了“二十一条”及其他卖国协定，妄图吞并中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对在日留学的爱国学生更是无比义愤。为抗议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大部分留日学生回国。这样，在留日学生中的进步力量就大大减弱了。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不断加深，在日学生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在日本的成员只有他们两个人。

如前所述，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是由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等人筹建的。施存统后来回忆说：“由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起草党纲十余条，陈公培抄了一份到了法国，我抄了一份到日本。”[①]李达也回忆道：“当时在上海参加发起人有陈独秀、陈望道、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沈玄庐、李达等。”[②]这说明施存统是在上海加入共产党组织，并是上海党组织的发起人之一。

周佛海当时是日本第七高等学校（相当于中国大学的预科）读书，常写文章在张东荪主办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发表。1920 年，周佛海从日本回国，到了上海，他回忆说：“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去访仲甫。……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当天讨论，没有结果。东荪是不赞成的，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我和雁冰是赞成的……经过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③]沈雁冰回忆：“大约 7 月光景，陈独秀他们要我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我记得小组的成员有：陈独秀、张东荪、沈玄庐、李达、邵力子、李汉俊、周佛海，还有一些别人。”

这些都表明，施存统和周佛海都是在上海加入共产党组织的，然后到了日本。

施存统在日本的东京读书，而周佛海在本部南部的鹿儿岛。施存统回



忆："我与1920年6月20日去东京，与周佛海取得联系，成立日本小组，陈独秀来信，指定我为负责人。小组开始只有我和周佛海两人，后来发展到十余人。"还说："到1921年7月1日第一次党代表会时，日本小组还只有两个人，即我和周佛海。我们两人互推担任党代表会的代表，最后由周出席"。④

后来出席一大的代表周佛海说："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两人"。⑤

小组成立后，其主要活动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组织读书小组等。施存统回忆："该小组由我负责，小组成员多数是留学预备生。开过二三次小组会，会议内容已记不清。1921年，共产国际在伊尔库茨克开会，反对华盛顿会议。第三国际派张太雷去日本，通知东京小组派代表参加会议（因当时日苏没有邦交，不便派苏联人去日本）。"当时小组处于秘密发散状态，没有开展多少实际工作。

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首先是在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建立起来的。早在1912年，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北京就组织了"留法俭学会"，得到过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大力倡导和支持，继而在四川吴玉章、黄复生等也发起组织了"四川俭学会"。1915年6月，蔡元培、李石曾等又组织了"勤工俭学会"，提倡"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一些贫穷而热心求学以追求真理的进步青年，渴望了解法兰西革命。在十月革命以后，他们更是希望能够了解十月革命的情况。而那个时候俄国正进行战争，所以他们只能去法国学习。一些著名的学校建立了"留法勤工俭学团"，通过"华法教育会"，办理赴法手续。从五四运动到1920年，勤工俭学运动达到了顶峰时期，我国后来许多党的重要领导人都是这时期出国的，有蔡和森、李富春、向警予、李维汉、周恩来、王若飞、李立三、陈延年、徐特立、邓小平、聂荣臻、陈毅等等，总人数达到1 600多人。他们利用欧洲的有利条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建立了党组织和各种革命团体，把勤工俭学学生和在欧华工中的一批优秀青年团结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

1920年5月赵世炎从北京到达上海，正值维经斯基与陈独秀等人研究建党的问题，陈独秀曾与此事与赵世炎详细交换意见，遂陈独秀介绍赵世炎入党。接着，赵世炎离开上海到法国巴黎，但与陈独秀和李大钊都保持着通信联系。同年7月，陈公培在上海参加完建党的筹备会后，赴法勤工俭学，

并随身携带了一份上海党组织起草的党纲。张申府，原是北京大学教授，在北大期间曾和李大钊酝酿党组织，1920年秋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于12月到法国巴黎，应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的邀请任逻辑学教授。刘清扬和周恩来是由张申府介绍入党的。张申府后来会回忆说："1920年8月觉悟社全体社员到北京来了。有二十人到北京来访问，到了北大，后来觉悟社在陶然亭开了一个招待会，李大钊和我都去了。刘清扬是招待会的主席，周恩来在会上讲了话，我和李大钊也在会上讲了话，所以同周总理熟。到了法国，我……介绍刘清扬入了党。接着我和刘清扬又介绍周总理入了党。我向他讲了国内党组织的情况。时间是1921年2月、3月。"[6]接着，这五人取得联系，一致同意在法国成立党的组织。于是在1920年3、4月间，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陈公培、赵世炎5个共产党员正式形成了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小组负责人是张申府。巴黎小组当时是处于秘密状态，所以在法学生和华工没有以小组名义领导革命运动。

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同时，蔡和森、李维汉、李富春、李立三等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了与中外反动派进行斗争，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自发组织了各种群众性的革命团体，最具代表性的有三个：旅法新民学会、工学世界社和劳动学会。

其一，旅法新民学会。从1919年到1920年，新民学会会员有十多人赴法。他们是萧子昇、罗学瓒、张昆弟、李维汉、蔡和森、向警予、熊季光、张百龄等。在1920年2月，以蔡和森为代表，开展了以蒙达尼中心的有组织的活动。他们和国内的毛泽东等经常保持着通信联系。1920年7月6日至10日，新民学会在法会员在蒙达尼召开会议，决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宗旨。会上蔡和森明确主张激烈革命，提出要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主张虽然没有在会上获得一致通过，但是却得到了国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多数会员的支持。会后，一些会员迁到蒙达尼，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广泛的学习和研究。李维汉后来回忆说："我和几个迁来的会友在附近一个胶鞋厂做工，工余时间。约在八月至九月的时间内，我有机会阅读了和森以'霸蛮'精神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通过阅读和谈话，他们认识到只有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到达"改造中国与世界"的



目的。1920年8月，蔡和森与在法国的部分会员商量打算在法国建立共产党。在9月，蔡给毛泽东的信中，进一步提出了建党的四个步骤。从上面可以看出，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以蒙达尼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团体。

其二，工学世界社。1920年2月，李维汉、李富春、罗学瓒、张昆弟等人，在巴黎成立了工学励进会。7月，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蒙达尼召开会议，会上提出："会务进行，注意潜在，不出风头，如有同志活动之必要时，可新组一会，以新民学会全数加入亦可。"⑦根据这个精神，为了团结更多的人，8月，"工学励进会"改称为"工学世界社"，进一步扩大了组织，社员发展到30余人。同年9、10月间，工学世界社在蒙达尼聚会，住在这里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等也参加了会议。经过讨论，"大多数社员赞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现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出席这次会议的有30多人。萧子昇在1920年12月23日的《时事新报》上介绍"工学世界社"的文中说："工学世界社的宗旨与希望，看他的名字便可知道，他是以工学的精神和方法，谋世界的改造与进步，他是要使世界成为工学的世界。"工学世界社成立后，成为领导在法勤工俭学学生进行斗争的主要力量之一。蔡和森支持工学世界社，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人在实际斗争中逐渐由信仰工学主义，转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后来，工学世界社的多数成员都加入了共产党。

其三，劳动学会。1921年2月，由赵世炎、李立三发起，在巴黎成立了劳动学会。最初的成员有李立三、赵世炎、刘伯坚、鲁易、刘伯庄、陈公培、罗汉、周钦岳八人。该会在酝酿建立时，曾准备定名为"共产主义同盟"，但由于成员中有的人还不完全信仰马克思主义，便取名为"劳动学会"。赵世炎在会上讲话指出："我们是无产阶级必须组织工人进行革命。"⑧但是，究竟如何进行革命，学会会员们并不是十分明确。学会一直积极从事勤工俭学学生的组织工作。

劳动学会成立后不久，为团结更多的勤工俭学学生参加革命斗争和坚持勤工俭学，李立三和赵世炎又于3月28日，以劳动学会为核心，发起成立了"勤工俭学学会"。使劳动学会有了群众基础。勤工俭学学会的宗旨是："本工学主义及互助精神，实行勤工俭学，以谋社会之改造，而劳动与互助为勤工俭学会员共同的信条。"学会原来以里昂为活动的中心，1921年3月以后，由于很多人转到克鲁梭的钢铁厂做工，于是活动中心从里昂转到克鲁

梭。学会成立后，响应的不少，人数很快增至200多人，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庄、罗汉、张伯简等都加入了该会。在勤工俭学学会内还成立了以赵世炎、李立三为首的领导机构——勤工俭学学会委员会。劳动学会和勤工俭学学会成为留法勤俭学生和华工开展革命斗争的主要领导力量之一。

1921年2月劳动学会成立前后，同工学世界社在能不能勤工俭学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以蔡和森、李维汉等为代表的工学世界社一派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勤工俭学是根本不可能的，因而主张发动求学运动，迫使中国政府给勤工俭学学生发放津贴，解决求学问题，并于1921年2月领导4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到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示威，这就是“二二八求学运动”。以李立三、赵世炎为代表的劳动学会派认为，勤工俭学具有可能性，因而主张不择工作，首先解决学生的“勤工”问题。他们没有参加蔡和森等领导的求学运动。但在求学运动遭到镇压后，又联名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驻法公使馆和法国政府殴打中国学生的罪行。这两部分人虽然在具体问题上有意见，但在根本是都主张进行革命。不久，两大组织便团结起来。1921年4月，李立三、赵世炎写信给蔡和森，建议共同创建共产主义同盟。蔡和森回信表示同意，但主张名称应叫“少年共产党”。7月，在蒙达尼举行的工学世界社第二次年会上，蔡和森提出成立“少年共产党”的建议，但因工学世界社内部意见不统一，会议未能对此达成协议。

1921年9月，为了争取里昂中法大学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开放，在赵世炎、李立三、蔡和森、李维汉等人领导下，经过俭学学会和旅法新民学会、工学世界社等革命团体联合组成“各地勤工俭学学生联合委员会”，开展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在中、法两国发动政府的联合镇压下，这次斗争遭到失败，104名勤工俭学学生被武装押送回国，其中有李立三、陈公培、鲁易、周钦岳、罗汉等人。劳动学会和勤工俭学学会在领导勤工俭学学生开展革命斗争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他们在华工集中的克鲁梭组织了“华工俱乐部”，创办了《华工周报》，在华工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受华工的欢迎。

进占里昂中法大学斗争的失败，使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建立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留在法国北方做苦工的赵世炎，与继续在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张申府、刘伯坚、王若飞、李维汉等人通信，商讨筹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有关事宜。同时，他还同已经回国的李立三、陈公培等人取得联络，索要国内社会主义



青年团章程及有关文件。经过半年筹备，1922 年 6 月，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中的一个小广场中正式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在出席大会的 18 位代表中，勤工俭学的成员有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刘伯坚、袁庆云等，大会开了 3 天。在这次大会上，赵世炎当选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为会员书记，周恩来被选为宣传委员，李维汉被选为组织委员。机关设在巴黎意大利广场哥特伏化街 17 号赵世炎所住的旅馆里，经常在那里工作的还有李维汉和陈延年。8 月，少共出版机关刊物《少年》月刊，由陈延年任主编。后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随着旅欧勤工俭学学生中党员人数的增加，张申府等人在德国柏林建立了一个支部。张申府后来回忆说：“1922 年我赴德后乃在柏林成立一个支部，人数渐渐加多。”⑨1922 年 9 月、10 月间，在法国的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和萧子昇 5 人，有阮爱国（胡志明）介绍参加法国共产党。由于党员人数增加，开始酝酿正式建立中共旅欧总支部。

1922 年秋冬之际，中共旅欧总支部正式成立，负责人有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等。旅欧总支部下设三个支部，即旅法支部、旅德支部、旅比支部。

1923 年 6 月，旅欧总支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增选邓小平为总支部委员。决定出版《赤光》以代替《少年》。

中共旅欧总支部是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核心，组织一直处于秘密状态，其作为中国共产党派生在国外的一个区域性组织，没有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的组织关系。但在法德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旅欧党早期组织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④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1956 年 12 月，《“一大”前后》(2)，第 34 页。

②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 年 8 月 2 日，《“一大”前后》(2)，第 7 页。

③⑤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

⑥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1979 年 9 月 17 日，《“一大”前后》(2)，第 223 页。

⑦《萧旭东给毛泽东》，1920年8月《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

⑧李立三：《对世炎的回忆》，1960年9月3日，《“一大”前后》（2），第527页。

⑨张申府：《我对旅欧共产主义小组的一点回忆》，1961年。



创办工人刊物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立即把从事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更加自觉地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起来。

共产主义小组在从事工人运动方面的主要工作方式之一是出版通俗的工人刊物。采用这种方式的首先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1920年8月15日创办了《劳动界》周刊；接着，北京小组创办了《劳动音》周刊；广州小组创办了《劳动者》周刊和《劳动与妇女》周刊；济南小组创办了《劳动周刊》等。在这些刊物中，刊载了大量的文章，都深刻地揭露了中国社会制度的不公与黑暗，反映了中国工人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家重重压迫和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从各个方面表达了工人不满社会现状和自己境遇的心理，逐渐地提高了工人必须进行斗争的觉悟，指出工人阶级只有斗争才能够解放。

上海《劳动界》周刊发起人是陈独秀、李汉俊，陈独秀任该刊主编，李汉俊、沈玄庐、郑佩刚等参加编辑工作，陈望道、袁振英、陈为人、柯庆施、李达、邵力子等是重要撰稿人。总发行处设在《新青年》社。内容丰富多样，分为国内劳动界、国外劳动界、本埠劳动界、演说、通信、调查、时事、小说、诗歌、闲谈、趣闻、读者投稿等专栏。共发行24册，1921年1月23日停刊。

《劳动界》的宗旨是：启发工人阶级觉悟，促进工人阶级的团结，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该刊发行词《为什么要印这个报?》明确指出："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了，或者将来要苦得比现在好一点"。①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劳动界》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深入浅出地向工人阐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如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对立、工人阶级的使命、工人阶级解放的途径，等等。陈为人写的《劳工要有两种心》告诉工人说："我们不要以为受苦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可以都是一样的命运吗？天天起来都不能转运吗？单是资本家都是好命吗？要加道我们这样受苦，都是资本家陷害我们的，虐待我们的。资本家要我们做值1元的工，他只能给我们1角，其余9角，都被他们得了去了！"[②]这类文章还很多，强调社会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人，一种是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的劳动者，另一种处于剥削、压迫别人地位不劳而获的人，而这两种人就形成了两个利益根本不同的阶级。向工人们揭示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是工人阶级遭受穷困的根本原因，使人们清楚地认识了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实质。在《劳动者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推倒资本主义，废止财产私有，把一切工厂、一切机器、一切原料都归劳动者手中管理。"这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和劳动问题的根本方法，"所以劳动者非信奉社会好主意，实行社会革命，把资本家完全铲除不可。"[③]告诉工人必须实行社会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工人获得解放的唯一道路。

《劳动界》号召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斗争，应效仿俄国革命的榜样，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文章《打破现状才有进步》说道："你们没听说么？现在世界已经有了真正纯粹由工农劳动者、由穷人作主的地方，这便是我们北方的俄罗斯。既然有了这样的好榜样，你们为什么还不努力？几个人的力量如果小，你们为什么不联合？你们不要畏难！你们不要说人家程度够你们程度不够。……哪里有什么程度的问题？这一个人能做的事，别一个人或者有不能作的。但若一群人，这一群人能作的，别的群是没有不能坐到的。"[④]这样的宣传，鼓舞了工人们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创办《劳动界》，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事工人运动的良好开端，也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种形式。因而《劳动界》非常重视同工人阶级建立联系，在第2册上特地刊登了《本报欢迎工人投稿》启事，从第3册起，又设立了工人"读者投稿"专栏。从第3册到19册工刊登了工人来稿30多篇，如《一个工人的宣言》、《我们流出来的汗到那里去了?》、《老虎和老板》、《无影的强盗》、《为什么要做工?》、《工人应该觉悟的地方》等。通过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宣传教育，工人阶级的觉悟得到提



高，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第7册上发表了海军造船所工人李中写的《一个工人的宣言》，指出："工人的运动，就是比黄河水还利害还迅速的一种潮流。将来的社会，要使他变个工人的社会；将来的中国，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中国；将来的世界，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世界。……俄国已经是工人的俄国，……这个潮流，快到中国来了。我们工人就是这个潮流的主人翁，这个潮流的主人翁，就要产生工人的中国。"

此外，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维经斯基曾以"吴廷康"的笔名在该刊的第13册上发表《中国劳动者与劳农议会的俄国》一文，他希望中国人民也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一齐做俄国劳工农民所做的事"，并号召："劳工农民快觉悟把！快着手解放自己罢。"

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创建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不高，对中国国情还不是很了解，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也刚刚开始，所以《劳动界》也还存在在一些缺点，如有改良主义的倾向等。但整体来说，《劳动界》的主流是健康的，它不愧是我国最早向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好主意宣传的革命刊物，在全国劳动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受到各地工人群众的欢迎和支持，被誉为是工人的"喉舌"，它对于用马克思主义团结和教育工人，起了积极的作用。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还注意对店员的宣传教育，开展店员工作。上海的工商友谊会表面上是店员的组织，实际上是工商混合（即劳资混合）的团体，标榜"自由平等，博爱互助，提倡储蓄，兴办实业"，争取拉拢店员。当时工商友谊会想利用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等人的声望作为号召，在店员中进行活动。于是，与共产主义小组商定，同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新青年》社的名义代工商友谊会编辑店员周刊《上海伙友》。这样，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支持和帮助下，在俞秀松、李汉俊、陈独秀等人的倡议下，1920年10月10日，《上海伙友》正式刊出，内容有调查、通讯、讨论、评论、随感等专栏。

出版《上海伙友》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数众多的店员工人发表自己意见的需要，以明辨是非，增进团结。该刊重视揭露资本家老板对店员工人的压迫与剥削，指出店员工人和产业工人同是劳动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工人阶级所以受压迫是由于社会存在劳动者阶级和非劳动者阶级的对立而造成的，工人阶级要求得到彻底解放，就必须自己解放自己，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

由于工商友谊会的成分比较复杂，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缺乏经验，工商友谊会作者乘机在《上海伙友》上也散布了不少劳资调和的观点。他们否认劳资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和斗争，以普及教育为幌子，反对工人的解放。他们伪装代表劳资共同利益，实际上是向店员工人灌输劳资调和的谬论。此外，该刊还宣扬了胡适的一点一滴改造社会的观点，告诉工人应该忍耐，走向光明之路不可急等等。这些都是和店员的根本利益是相背离的。

1920 年 11 月 21 日，《上海伙友》出第 7 册后停刊，同年 12 月 26 日，出第 8 册，明显地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公开宣扬改良主义，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断绝联系。

北京《劳动音》周刊是 1920 年 11 月 7 日正式创刊的，主要编辑人是邓中夏。

《劳动音》的宗旨是要提高工人阶级觉悟，促进工人团结，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邓中夏以“心美”的署名写了发刊词《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指出了出版《劳动音》的目的和内容。第一，提倡神圣的“劳动主义”。“劳动就是进化的运动力，劳动就是世界文明的根源，劳动就是增进人生的幸福，故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提倡那神圣的‘劳动主义’，以促进世界文明的进步，增进人生的幸福。”第二，反对不劳而食的剥削者。“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排斥那种不劳动而食的一班人，以维持我们从事正当劳动的同胞，使得满足的生活，快乐的幸福。”第三，增进劳动者的知识，以促进工人运动的发展。指出无产阶级应该用丰富的知识和各种方法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阐明真理，增进一般劳动同胞的智识，研究些方法，以指导一般劳动同胞的进行，使解决这不公平的事情，改良社会的组织。”第四，促进中国无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共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介绍世界的智识，普通的学术及专门的技能，又记述世界劳动者的运动状况，以促进国内劳动同胞的团结，及与世界劳动者携手，共同去干社会改造的事情。”此外，规定了该刊的主要内容，主要是报道国内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包括工厂的组织、生产情况、工人待遇、工钱制度、做工时间、工厂规则，以及工人的生活、感想意见、家庭关系等。刊登这些内容，是为了“使国内各工人容易联络，及使留心社会问题的人，去求解决的方法；更使世界的劳动者和社会改造家，明白我们国内劳动的真相，来设法帮助我们解决，共促文化的进步，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那就是我们出版这《劳



动音》的本意”。[5]

《劳动音》从一创刊就非常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提倡知识分子从事工人运动，进行实际工作。明确指出：“只向知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而不向无产阶级作实际的运动，结果还只是空谈。”“若空谈，只是偷懒，只是自杀”。[6]这就一扫知识分子崇尚空谈，不务实际的旧习，使他们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实际的革命活动，走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劳动音》注重用具体事实和典型事件来反映工人的悲惨生活，对工人进行教育，这样更容易为广大工人所接受，能够迅速的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例如：1920 年 10 月唐山煤矿瓦斯爆炸，死伤工人五六百人，该刊第 1 期以《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同时以《矿局牟利八倍于资本》、《几十分钟内死工人五六百人》、《工人一命只值六十元》为标题，彻底揭露了唐山煤矿资本家残酷剥削和压迫工人的事实。第 5 期用大篇幅报道了南京 1 万多名机织工人捣毁省议会和痛打议员的情况，并发表评论：一方面揭穿南京缎业资本家与警察厅长勾结，利用工人的内幕，肯定这次暴动是“被人家指使的”；另一方面，又揭示了这一事件的经济根源，把它看做“饭碗问题”的革命第一声，肯定工人有为自己的生存采用暴力的权利，赞扬工人敢于反对政府的精神，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引导工人走正确的斗争道路。“现在既然有了这一班人做先锋，好比是一颗稻麦刚发芽一般，我们保护他，培养他，还嫌来不及，又哪里能够苛求他们，说他们的暴动是盲目的行动呢！我们应当知道，世间的事，一起头总是这样的。只须有人领着他们，指导他们，认定目的向一定的方向去做，慢慢儿的，他们自然会知道什么是他们应当做的，什么是他们不应当做的了”。[7]

《劳动音》出版后，很快就在长辛店等地工人中间流传开来，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到 1920 年 12 月，每期即能销售 2 000 份，其后更是增加到 4 000 份。

继上海、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上述刊物之后，广州、济南、天津等地也出版了一些刊物。这些刊物都通过用浅显的语言向工人阐明了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的秘密，进而论证旧社会制度的本质及其不合理性。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这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帮助他们认识实现到社会主义乃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帮助他们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能够为争取自身解放而奋力斗争。

注释：

①《为什么要印这个报?》，《劳动界》，第1册，1920年8月15日。

②《劳动要有两种心》，《劳动界》，第18册，1920年12月12日。

③《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劳动界》，第16册，1920年11月28日。

④《打破现状才有进步》，《劳动界》，第6册，1920年9月10日。

⑤《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劳动音》，第1期，1920年11月7日。

⑥《劳动运动的新生命》，《劳动音》，第1期，1920年11月7日。

⑦《南京机织工人听着！一般工人也听着》，《劳动音》，第5期，1920年12月5日。



创办工人补习学校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为了向工人更好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在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这种学校办得比较好的有两处：一是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一是上海小沙渡工人半日学校。

长辛店距北京20多公里，是京汉铁路北段工人集中的地区。这里有3 000多工人的长辛店铁路工厂。五四运动期间，长辛店工人曾组织过“救人十人团”，举行过爱国大罢工，显示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威力。五四运动后，长辛店工人又多次接待北京“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北京学生来往比较频繁。根据这些情况，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决定把长辛店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据点，首先在这里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1920年12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委托邓中夏、张太雷、张国涛、杨人杞等到长辛店负责筹备，决定先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筹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同月19日，在长辛店召开筹备会，邓中夏讲：“为什么我们工人终日辛苦做工，而不得饱暖；而那般不做工的官僚、政客、资本家等却高楼大厦，衣锦食肉。他们的钱哪里来的，他们的衣食住哪里得的，都是由我们工人血汗成的。所以我们没有享受，弄到困苦的情形。现在我们想得回幸福，非先有知识不行，所以我们要设立这个学校。”会议还讨论并通过了学校的《募捐启事》、《预算案》和《简章》。简章提出，长辛店补习学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的完全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规定：“凡身体强健，身家清白的劳动者，不论年龄大小和识字与否，都可入学。”最后，以陶善琮、史文彬、李茂银等10名工人的名义，发起成立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

1921年1月1日，在邓中夏等人主持下，学校正式开学。校址设在长辛店祠堂口一号。报名入学者有百名左右。分日夜两班，夜班是工人上课，设国文、法文、社会常识、科学知识和铁路知识；日班是工人子弟上课，课程与普通国民高等小学堂的课程略同。学校免收学费，课本有教员自己编

写、油印。教员大都由党组织成员和北大帅生担任，驻校教员是吴汝铭（党组织成员，后叛变）。李大钊和党组织成员都曾去过该校视察或讲课。教员们讲课，先教识字，后讲革命道理，使工人们既能学习文化知识，又能听到革命道理，把提高文化水平和传播革命思想结合起来。教员们讲课生动具体，通俗易懂，因而深受工人们的欢迎。例如，讲述工人阶级伟大作用时，不是讲理论，而是从工人的日常生产活动，如织布、筑路、盖房讲起，具体地阐明“工人的劳动创造了世界一切”这一真理。他们还用通俗生动的事例来说明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着压迫和剥削的不合理现象，以及如何消灭这不合理社会的途径等。教员讲课，强调工人团结，不是空讲抽象道理，而是进行形象的比喻，如，“五人团结一老虎，十人团结一条龙，百人团结成泰山，谁也搬不动”。在课后，教员们还经常深入到工人家中拜访，同工人交朋友，促膝谈心，了解工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学校还备有《共产党》、《劳动音》等几种报刊杂志，供大家阅读。

关于这所劳动补习学校的情况，《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曾这样说到：“开办劳动学校时，我们不能幻想马上提高工人的一般知识水平，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力差，经费少，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学校的任务主要是教育工人，并使其习惯于亲自从工人当中选出有觉悟而又积极的工人来管理学校和工会的事情。而特别重要的是培养召开公开群众大会的习惯，而这种大会最能使到会者养成共同利益感和严守纪律。”“我们教工人干什么呢？我们经常不断地向他们说，他们受资本家掠夺，不得不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其次，向他们介绍外国工人运动史。我们不断地向他们指出组织起来的意义和方法，时常给他们讲课，教他们识字，同时，还教他们习惯于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让他们写出关于家庭日常生活和工厂里所发生的一切不公平事件的书面报告。起初，他们感到有些为难，但后来从他们中间培养出了优秀的鼓动员。可是，要找到导师即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那是极其困难的。”报告认为建立这样的学校，是在既没有工人组织又没有工人领袖的地方，开展发动工人运动工作的第一步。党组织的成员感到，“这所学校看来是我们接近工人的一个途径，我们和工人之间逐渐产生了亲密友好的感情；我们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提出鼓舞我们的重要建议，结果，我们看到提出的各种阶级要求，像增加工资、缩短工时、要求成立工会等思想，在工人中间已不断增长起来”。[②]

北京党组织创办这所学校，目的是通过这一途径，去接近工人群众，教



育工人，启发工人的觉悟，最后组织工会。学校经常向工人讲解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是工人贫穷落后、受苦受难的根源，指出组织起来的意义和方法，并向他们介绍外国工人运动史。经过宣传教育，工人阶级的觉悟有了显著提高。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工人刊物《劳动界》，同时派李启汉到沪西小沙渡地区开展工人工作。沪西小沙渡地区有数万纱产工人（大部分是日本纱厂工人），曾在1919年“六三”大罢工中显示了威力，如果把马克思这个斗争武器带到他们中间，必然更加强大，在改造旧世界的斗争中能够做出巨大贡献。李启汉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深知劳动人民缺乏文化，而没有文化就很难接受马克思主义。因此，根据上海各校学生举办平民教育的经验，于1920年秋，在小沙渡校榔路北锦绣里3号，办了一所工人半日学校。这是共产主义者继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在全国开办的又一所工人学校。李启汉主持校务并任教，教员还有陈为人、雷晋笙等几个外来赴沪准备到法勤工俭学的进步青年学生，教科书用的是基督教青年会编的普通识字课本。当时因为缺乏经验，又没有做好宣传工作，尽管学校设在工人居住区，而且是免费就读，但报名上学的人却是很少。即使来上课的工人，因受工作和生活条件的限制，也是来去不定，经常缺课。到12月初气候转冷，来上学的人就更少了。学校只好提前放假。李启汉等人在挫折面前没有泄气，积极改进活动办法：一是想方设法，打入青帮组织，利用帮会关系结交工人；二是改进教学方法，他决定在寒假期间将学校暂时改为上海工人游艺会，以开展文艺活动的方式，来吸引更多的工人。1920年12月19日，他将工人半日学校改为工人游艺会。在白克路上海公学召开成立大会，有400多人参加，由李启汉担任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及方针。他说：我们工人“从前只是各人苦着、饿着；我们想要免除这些困苦，就要人家高高兴兴的联合起来，讨论办法”；对于“什么金钱万能、劳工无能，我们都要改革，打破。”③邵力子、杨明斋、沈玄庐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也都到会讲演，鼓励工人要强健精神，努力学习，奋发上进。

经过工人游艺会的宣传活动，到1921年春天，工人半日学校重新开学，报名上学的工人明显增多了。为了适应工人的上班时间，学校全天开课，白天没有工夫来读书的，就晚上来读，如果上夜班的，就下午来读，只要大家愿意读．什么时候来都可以。为了增进与工人之间的团结和解除工人们的疲劳，游艺会还购置了留声机、足球，师生一起听留声机、踢足球。上课时，

老师先教工人识字，后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使他们逐步认识到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同剥削阶级斗争，才能改善自身的生活待遇，才能获得最后解放。

工人半日学校的革命活动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意，不久被查封，但它在广大工人群众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1921 年 8 月，工人游艺会改名为“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由李震瀛担任校长。学校分两个班：每日上午 7 时至 9 时为夜班工人学习；晚上 7 时至 9 时为白班工人学习。课程设置和宣传形式，与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大体相同，共有 30 多名学生。李启汉等经常来学校授课，通俗地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成为共产党教育、团结工人，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阵地。

除长辛店和小沙渡工人集中地区办有工人学校外，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小组也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比如：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他们“开始有组织的到纱厂去，到铁路去，到码头去。经过同乡或亲戚关系找工人谈话，讲解工人阶级解放的道理。”小组在工厂中办识字班与工人接近，这种工人识字班办的很广泛，连兵工厂都打进去了。有武昌的武汉第一纱厂、汉口的英美香烟厂和汉阳的兵工厂（包括炼铁厂、制枪厂和火药厂），其他如裕华纱厂、纱麻四厂、南洋烟厂等工厂都有这种识字班。武汉中学在武昌彭杨公祠办起了“平民夜校”，董必武到校讲课，向工农群众灌输革命思想，发动他们起来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开办了一所“机器工人夜校”。陈独秀说：“机器工人比较先进，革命发动要依靠他们。我们得设在那里做试验，这所学校就是根据这个思想办起的。工人积极性很高，夜校外办后，每天映上都有 100 多人参加，分成两班、分别由谭天度、黄裕谦负责。工人除在夜校学文化外，教员还利用多种形式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灌输马克思主义。”⑤在湖南，毛泽东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教时，“为提高工人文化水平，把 1918 年 4 月停刊的工人夜校恢复起来，还在初小部开办平民夜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并主持教学工作”。夜校和补习班“招收附近工厂工人学习文化，通俗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和社会发展史。他解释‘工人’二字联起来就是‘天’字，生动地阐明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力量大于天”⑥的道理。以此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

实践证明，办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夜校和识字班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

工人结合的最好方法之一。通过这种形式，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有了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既可以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有效地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并在工人群众中发现和培养肯干分子，通过他们把广大工人组织起来，奠定建立工会和领导工人进行斗争的基础；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找到了本阶级的基本群众，使马克思于义变成物质的力量，并通过和工人的接触及参加工人的实际斗争，使自己得到改造和锻炼。这种在工人中办学校的方法是后来党在领导工人运动中经常采用的有效的形式。

注释：

①邓中夏：《长辛店旅行一日记》，《晨报》，1920年12月21日。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6页。

③《上海工人游艺会成立大会记》，《劳动界》，第20册，1920年12月26日。

④《董必武通知的谈话》，《楚晖》，第1辑，第241页。

⑤《广大党组织成立前后》，《"一大"前后》(二)，第461页。

⑥《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479页。

深入工人生活　组织工会

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创办刊物和工人补习学校等方式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教育，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有了迅速的提高，迫切要求组织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会。陈独秀在《劳动界》发表的文章中讲，必须号召觉悟的工人赶快“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李中以海军造船所工人的名义，在《劳动界》上发表《一个工人的宣言》，主张“我们少数人同声同类的工人，再联络多数同声同类的工人，成一个团体。由我们大团体，再联络他一大团体，以成一中国之大团体……”。

共产党早期组织帮助工人建立工会，最先是从上海开始的。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派李启汉到沪西小沙渡筹办工人补习学校的同时，就派李中到沪东杨树浦筹组机器工会。李中是知识分子，常阅读《新青年》，思想进步很快，多次找陈独秀请教，在陈独秀鼓励下，为了开展工人运动而到江南造船厂做工。他一面做工，一面联络工人，在厂内开展机器工会的筹备工作。毛泽东在1920年的一封信中提到：“李君声懈以一师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他现寓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帮助陈仲甫（即陈独秀）先生等组织机器工会”。[①]

1920年10月3日，筹备会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召开上海机器工会筹备会，到会者有江南造船厂、杨树浦电灯厂、东洋纱厂、恒丰纱厂、厚生铁厂等厂的七八十名机器工人。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李启汉、王平等6人出席了会议，李中担任临时主席，主持会议。他在报告中强调要建立真正的工人团体，并指出：发起本会的宗旨，是“谋本会会员的利益，除本会会员的痛苦。”“要达到这个宗旨，第一莫使本会逐渐变了资本家的工会；第三莫使本会逐渐变了同乡的工会；第二莫使本会逐渐变了政客和流氓的工会；第四莫使本会逐渐变了不纯粹的工会；第五莫使本会逐渐变了挂招牌的工会。这五种工会，都可损失信仰和名誉，妨碍将来的工人组合。”[②]可见，机器工会要求的是建成一个摆脱资产阶级影响、划清阶级界限



的工人自己的组织。会议邀请陈独秀等6人为名誉会员。杨明斋、陈独秀先后发言，陈独秀在演说中强调指出："现在世界的工会，只有三个团体最有势力。第一是矿工，第二就是铁道工，第三就是机器工。这三个团体，要是彻底联络了，那就社会上一切物件，都要受他的支配，就是政府也不得不受其支配。"[③]他希望大家努力，"建设一个大力量的工会"。会上还宣读了由陈独秀和李中起草的《机器工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章程》共6章32条，其中规定该会的目的是："（一）以公共的理想，训练德性。发展知识，促起阶级的互助观念；（二）以公共的力量，着实的方法，改良地位，增高生产，减轻痛苦；（三）谋互相的亲睦，互相的扶助事业；（四）研究劳动市场状况；（五）要求雇主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设立病伤保险费，设置卫生设备；（六）其他关于增进本会会员福利的各种事业。"会员对象为各业机器工人，本人非工人，但对该会有贡献的，经理事会的承认或推荐，亦可为本会名誉会员。《章程》规定，准备办的事业有13项，为设立职业介绍所、失业工人住宿和法律顾问；举办球房、浴堂、茶食店、音乐室、学校、图书室；出版报纸；对会员及家属生、老、病、死的救济抚恤；以及对经济状况、劳功市场状况、工人生活状况的研究等。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制定的最早的工会组织章程。大会决定在杨树浦设立事务所（即工会机关）。还决定设立经募处，并推定陈独秀为经募处主任，李杰、陈文焕、吕树仁、陆征章、李中5人为办事员。

上海机器工会在发起时即遭到反动派的压迫。10月16日《申报》载淞沪护军使何林风致北洋政府电，称："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与刘鹤林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对这个电文，机器工会理事会曾开会予以驳斥。许多机器工人不顾反动派的阻挠，踊跃入会。发起会召开后仅一个月，加入工会的各工厂工人达到370多人。

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在白克路207号上海公学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近千人，李中报告了机器工会筹备经过，孙中山、陈独秀等社会知名人士亲临祝贺，盛况空前。机器工会日常工作机构是理事会。首届理事会成员是：书记理事吕树仁，调查理事朱鹤琴，会计理事陈文焕，庶务理事李中。交际理事由理事会聘请李杰，编辑部办事员由理事聘请王平。机器工会事务所设法租界西门路泰康里41号。为加强对机器工人的宣传教育，工会事务所出版了刊物《机器工人》，用通俗的形式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

还创办一所英文义务学校，每晚教课2小时，机器工人中的会员、非会员均可入学，免收学费。上海机器工会深受工人的拥护。上海机器工会是中国策一个真正具有阶级性和群众性的工会组织。

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前后，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帮助下，上海印刷工厂铅印部工人也发起组织工会，组织者为《救国日报》的杨迪先。1921年3月6日，在白克路上海中国公学召开了上海印刷工会成立大会，会员共有1346人。该会书记杨迪先报告开会宗旨和筹备经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望道、邵力子到会祝贺演说。会上宣读了章程，章程内容大致和机器工会相同。该会还出版了工人刊物《世友画报》，画报的主笔和投稿人都是印刷工人，以提倡劳工生活增高，改造社会为主旨。

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成立的最早的现代产业工会。他们的成立，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有着某种里程碑的意义。《共产党》月刊1921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上海是中国第一商埠，工厂最多，劳动者之数，不下五十万人。但是工人们多由各地聚合而来，分子非常复杂，言语风俗感情，很不一致。他们里面，有青帮红帮之分，又有广帮、宁帮、扬帮、苏帮、江北帮之分，帮既不同，感情亦异，所以往往互相排挤，转忘了共通的敌人的资本阶级。所以希望他们为阶级的结合，实在是一件难能的事。""在以前也曾有些人组织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工会，如中华总工会之类，但是有名无实，并不知劳动运动的方法。"只有机器工会，印刷工会，才算得"办理得有精神有色彩的工会。"④这样的工会之所以能够成立，客观上是由于"劳动者受掠夺和压迫过甚的结果，当然要发生觉悟出来"；主观上则是由于有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和推动。显然，与五四时期中国工人还处于自发的无组织的状态不同，这时的中国工人已经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开始走上联合起来、开展自觉斗争的道路了。

与上海一样，北方工人也是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组织和推动下成立工会的。最初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从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开始，就有意识的接近工人，从中挑选积极分子，筹备组织工会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筹备酝酿，于1921年5月1日劳动节纪念大会上，通过了成立工会的决定。工会的宗旨是：（一）团结团体；（二）求生活上之富裕；（三）不受工头之压制；（四）铲除工人作工一切之障碍。最初有会员350人。工会由厂里各科选出的代表组织代表会，再由代表会推出正副主任各1人和几名干事。代表会规定每两星期开一次常务会，议决工会各项事务。该工会还创办了当时颇



有影响的《工人周刊》。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说："工会通过成立，实际上并未切实组织，不用说是我们当时经验欠缺所致"。但"的确工人的觉悟从此日益提高了，首先表现在工人与工头的斗争。"开始办劳动补习学校时"还包含有工头，但是工人觉悟日益提高，于是工人内部便发生分化，工头变现反动，而工人便和他斗争。这种斗争是不断的发生，而且愈斗争愈激烈，有几个工头竟被工人强迫工厂开除，驱逐出境。这样一来，工人更感觉得组织团体的重要了。"到10月20日，长辛店机器厂、修车厂、工务厂的代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工会改为"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王俊当选为俱乐部主任。《工人周刊》报道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的消息，影响很广，加入者日益增多，得到了广大工人的信任。当时有好几处的铁路工人知道长辛店有个工人俱乐部，很是羡慕，纷纷派代表前来长辛店参观。各地代表回去后也模仿长辛店组织起了俱乐部。

除上海、北京外，其他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也都着手进行了工人工作，组织工会。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帮助人力车夫成立了工会。工会成立后，于1921年5月1日，小组又领导汉口人力车工人为反对资本家加租而举行了罢工。资本家见工人如此齐心，不得不取消加租，罢工取得了胜利。这是武汉工人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开展的第一次胜利斗争。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经过整顿，工人工作有了很快进展。首先在广州小组的帮助和领导下成立了广州土木建筑工会和理发工会。土木建筑工会成立于1921年春，有会员4 000余人，郭植生被选举为主席。工会成立后，立即领导工人向资本家进行了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斗争。厂方勾结广州公安局长进行镇压，逮捕了六七名工人，工会立即动员了3 000多工人，包围公安局两天两夜，公安局被迫释放了工人，资本家也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斗争取得了胜利。理发工会成立时，广州党组织成员陈公博以及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和沈玄庐都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称赞理发工会有完备的章程，并希望他们把理发工人进一步组织起来。接着，谭平山派梁复然和王寒烬等去佛山组织工会。春末，佛山市土木建筑工会成立，会员有1 500多人，钱惠方被选举为会长。随后组织了佛山市理发工会，梁桂华被选举为会长。广州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派人参加了理发工会成立会议，并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在会上号召工人团结友爱，努力奋斗，夺取政权。无政府主义者李云龙当即反对，他表示，有政府就是对工人的压迫，反对工人掌握政权。谭平山针锋相对地进行了驳斥，说："工人

阶级要夺取政权，才能不受压迫，只有到全世界无产阶级都掌握了政权，全世界都无国界时，才是真正的无政府时代。”[5]参加会议的工人相信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取得了胜利。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到工人中去开展具体的组织工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的进一步结合。通过这种结合，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更加地了解到工人群众的疾苦，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从而使自己的立足点能够完全转到工人阶级一边来。一部分工人则由此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步意识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榨才是他们痛苦的根源，逐渐明了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样，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条件就日趋成熟起来了。

注释：

①《毛泽东给罗荣熙的信》（1920年11月26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②《本埠机器工会开会记》，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0月6日。

③《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纪略》，《劳动界》第9册，1920年10月10日。

④《共产党》月刊第6号。

⑤梁复然：《广东党的组织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第448页。



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积极筹备一大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此外，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五四运动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随着建立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经过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召开一大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由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发起并负责联络的。1920 年底，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领导成员有所变动。陈独秀本来是上海共产党书记，他应广东省长、军总司令陈炯明的邀请，于 1920 年 12 月 16 日由上海去往广东，就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离开上海之后，由李汉俊代理上海共产党书记。

1921 年 2 月，陈独秀在广州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章，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这份党章由广州寄到上海，李汉俊看后甚为不满，认为陈独秀要在党内搞个人独裁。于是李汉俊也起草了一份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使中央成为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到李汉俊起草的党章，大发雷霆，加上过去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和意见，李汉俊和陈独秀的关系愈加恶化。李汉俊不愿再担任代理书记，把党的工作交给了李达。从 2 月至 7 月，李达担任了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代理书记。

维经斯基回国后，1920 年 8 月，共产国际派马林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于 1921 年 3 月从莫斯科动身，取道欧洲赶赴上海，1921 年 6 月 4 日，马林乘意大利劳尔·特利斯提诺公司的阿切拉号轮船到达上海，在上海考察远东各国运动的情况，建立联系并调查是否有希望和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使命。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并兼有赤色职工国际使命的尼可尔斯基也同期到达上海。

马林、尼克尔斯基到上海后，即与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建立了工作联系。李达、李汉俊都能讲英语，李汉俊还会讲德语，马林会讲英语。通告交谈，国际代表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筹建的一些基本情况，得知自维经斯基来华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大中城市已经先后建立或正在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并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和初期的工人运动。根据这些情况，国际代表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提出了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共产国际代表的到来，加速了建党的进程，促进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根据原先的酝酿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和李汉俊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议，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于是决定各地党小组各派 2 名代表来上海开会，马林拿出带来的经费，寄给每位代表路费 100 元，回去时再给 50 元。

由于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由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发起的，开会地址又在上海，于是，上海党的早期组织承担了会议的联络、筹备和会务工作，具体工作也主要由李达、李汉俊等人进行。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日本留学生学生中的组织或党员，通知他们各派 2 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至于法国留学生的党组织，由于路途遥远，已经来不及，所以没有通知。

李达既是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代理书记，又是党的“一大”的具体筹划者，由于工作繁多，忙不过来，便把许多具体工作，如选择开会地址、安排外地代表食宿等后勤事务交给妻子王会悟操办。王会悟当时是《妇女声》杂志的编辑、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

由于当时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军阀相互勾结，欺压人民，但他们害怕人民进行革命活动，因此对革命活动防范严密。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一大”的召开只能处于秘密状态。这样，会址的选择就成为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让王会悟费了不少功夫。她接连找了几个地方都觉得不理想，要么太嘈杂不安静，要么太显眼不安全。她还想到去自己的老家乌镇开会，不过李达认为，乌镇虽然清静，但是小地方一下子聚集十多个陌生人，还有外国人，很容易引起注意，所以还是不宜作为会址。经过几番明察暗访，王会悟最后把目标锁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 3 号（解放前曾改为望志路 106 号，现为兴业路 76 号）“一大”代表李汉俊胞兄李书城家。李书城曾是北洋政府陆军总长，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



思想比较进步。李书城的家是典型的上海里弄住宅式建筑，砖木结构，上下两层，人称“李公馆”。这幢房子有前后两个门，前可进，后可退，十分方便，而且环境十分僻静，附近行人稀少，不易为人注意；还有由于李书城的“大官”身份，外人一般不敢随便接近他的寓所，即使能进，出入也要受到限制和盘问。当时，李书城恰好正在湖北主持驱逐军阀王占元的运动，只有李汉俊一个人住在这里。因此这里成为召开会议的理想场所。当时李汉俊与李达同被陈独秀指定从事筹备工作，王会悟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李汉俊。李汉俊也认为只有这个地方可靠了，又找来李达商议，都觉得王会悟的开会地点选得好。于是，李汉俊答应在这里开会。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就设在李公馆楼底能容纳十几个人的小客堂里。

选好开会地址以后，接着王会悟又找代表们到上海后住宿的地方。王会悟沿着上海的大街小巷作了一番仔细的探访。她选定法租界蒲柏路的博文女校，这里在敌人的心脏里。王会悟想，越是危险的地方往往越是最安全的地方。因此，经过几次筛选，反复权衡，最后确定了把博文女校作为代表们的食宿地。博文女校离一大会址很近，当时正是盛夏 7 月，学校已经放了暑假，学生和老师都已离校，出入人员极少，外地代表住在这里易于保密，甚为安全。当时，王会悟参加了上海女界联合会的活动，担任《妇女声》的编辑，结识了法租界博文女子学校的董事长黄兴的夫人王宗汉和校长黄绍兰，并对校长黄绍兰十分信任。于是，她找到黄绍兰校长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借了该校楼上 3 间教室供代表们居住。随后黄绍兰校长交给王会悟一个“捐册”。党的“一大”结束以后，王会悟捐了些钱，实际上就等于房租。学校里条件简陋，有的房间内有简易木板床，有的没有床铺，为了让代表们休息好，她把教室打扫干净，并特意买来芦席铺在楼板上当床铺。时值盛夏，芦席作褥倒也凉爽惬意。准备就绪后，她叫来李达察看。李达从环境、安全等各方面考虑，也认为不错，对此表示满意。

党的各地早期组织或党员接到上海的通知后，积极响应，纷纷派出各自的代表，来到全国工业中心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当时，党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各地早期组织没有统一的规章和严格的组织手续，加之各地的政治环境和活动条件各有不同，因此，到达上海的时间也先后不一。

北京党的早期组织接到上海的通知后，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为代表，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张国焘在代表产生后，随即动身去往上海。刘仁静于

7月2日到达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南京年会，在南京年会结束后又在南京停留两三天，才动身去上海，大概在7月7日左右到达上海。

长沙的党员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当时，从长沙到上海没有直达的车船，毛泽东与何叔衡于6月29日晚从长沙乘船北上，先到武汉，然后再由武汉转赴上海，途中需要5天左右，所以，他们到达上海的时间应该在7月4日左右。

武汉党的早期组织派出的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董必武和陈潭秋大约在7月20日左右到达上海。

济南党的早期组织派出的代表是王尽美和邓恩铭。张国焘由北京去上海的途中曾路经济南，约王尽美、邓恩铭等党员在大明湖的游船上作过详谈。王尽美和邓恩铭在张国焘走后不久，也乘火车南下，大约在6月底以前到达上海。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党员代表是周佛海。周佛海在学校放暑假之后，由鹿儿岛动身回国，通知的信件和回国的路途需要较长的时间，他大约是7月下半月到达上海的。

广州党的早期组织派出的代表是陈公博和包惠僧。陈独秀由于公务繁忙，不能亲自去上海参加。他提名陈公博和包惠僧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陈公博于7月14日偕新婚妻子李励庄由广州出发，经由香港前往上海，到达上海的时间是7月21日。包惠僧7月15日从广州乘轮船直赴上海，到达上海的时间大约是7月20日。

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代表是李达和李汉俊。他们也负责会议的联络、筹备工作。

“一大”的筹备工作，最初由李达、李汉俊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商量进行。张国焘到上海后，参与了筹备工作。张国焘与马林谈关于大会的筹备问题，彼此意见相当融洽，被推为与马林继续接触的代表。7月23日，各地代表全部到达上海。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筹备工作基本完成。



李汉俊与陈独秀关于党章的争论

建党之初，李汉俊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1920 年底，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成员有所变动。陈独秀本来是上海共产党书记，他应广东省长、军总司令陈炯明的邀请，于 1920 年 12 月 16 日由上海去往广东，就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离开上海之后，由李汉俊代理上海共产党书记。

陈独秀离开上海后，凡重要之事，多由李汉俊和李达、陈望道、杨明斋等人讨论决定。《新青年》也交李汉俊和陈望道主编，并改为党的机关刊物。李汉俊一方面积极负责上海发起组的工作，一方面夜以继日地编辑《新青年》杂志。在这期间李汉俊与陈独秀之间产生了思想分歧，产生思想分歧的原因是他们在政治见解上的分歧和性格上的差异。

李汉俊与陈独秀政治分歧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是采取“分权”还是“集权”的问题上。

1921 年 2 月，陈独秀在广州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章草案意见，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工人组织则主张产业工会。这份党章由广州寄到上海，李汉俊看后非常不满，他认为陈独秀的党章草案是要实行党的独裁，于是，李汉俊以“不能拥护陈独秀独裁”为由，根据自己的意见，也起草了一份党章，主张党的组织采用地方分权制，使中央成为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工人组织则主张先组织职业工会。李汉俊还认为：“要搞社会革命，便不得不依靠宣传。因此，我们必须要着手进行著述。”他提倡在党内第一注意是宣传，主要是理论宣传，尤其主张在知识分子中进行宣传，办专门的学校，设立马克思主义图书馆，翻译书籍。3 月，李汉俊给陈独秀写信表示，他不赞成陈独秀起草的党章说中央集权制，他主张地方分权制。陈独秀看到李汉俊起草的党章，大发雷霆，便一面写信与李汉俊激烈辩论，一面写信劝李达反对李汉俊。陈独秀回话说：“中国革命才开始，都搞地方分权，岂不成了无政府主义。”李汉俊见陈独秀不赞成他的地方分权制，并在

来信中指责上海的党员反对他。而党内大多数人比较赞同陈独秀的主张。

此外，加上在一些其他问题上的分歧和意见，使得李汉俊和陈独秀的关系愈加恶化。在此期间，李汉俊和陈独秀在党的经费问题上也发生了冲突，也使得隔膜越来越深，关系也弄得越来越僵。当时中国共产党每月需要大洋200元的活动经费，但是由于当时在上海的党员大都没有职业，不能挣钱，大家负担不起。而搞工人运动没有钱也不行。当时李汉俊为筹措党的活动经费，煞费苦心，他把教书所得收入和经常写文章所得的稿费大部分都用在革命活动上了，有时为了党的活动经费，甚至把已故妻子的首饰送去当铺。而当时《新青年》在上海法租界大马路开了一家新青年书社，生意很好。据李达回忆，李汉俊曾向陈独秀写信提议由新青年书社按月支200元做党的活动经费，陈独秀没有答应。陈独秀认为《新青年》的经费本来就紧张，每个月再拿出200元，《新青年》很难办下去。所以，他对李汉俊来信提到每个月从新青年书社拨200元的活动经费很有意见。此外，在陈独秀1920年12月去广州时，曾对李汉俊承诺，《新青年》每编出一期，付编辑费100元，后来，李汉俊没有能按月编出，新青年书社也不给他编辑费。事实上，为了不耽误《新青年》预定的排版、印刷日期，李汉俊经常通宵达旦的赶写文章、审定稿件。结果陈独秀连说好的编辑费都不给他，因此，李汉俊对陈独秀大不满意，他曾对李达说，陈独秀私欲很重。这是他两人之间冲突的起源。1921年春，包惠僧从上海来到广州，向陈独秀转达李汉俊的话，说李汉俊不想当代理书记了，请陈独秀要么回上海当书记，要么把党的机构放到广东来。陈独秀不同意把党的机构放到广东，广州的无政府主义太集中，地理位置上广东太偏南，没有上海适中。他还觉得李汉俊性子太急。中国搞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得很。这些本来也不是很突出的矛盾，不过由于两人在关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上已经心生芥蒂，当李汉俊看见陈独秀信中的表现出的不满，于是，便将党的名册、一些文件交给李达，请李达来做代理书记。

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成员李达回忆说："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李汉俊看到草案上主张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制，对陈独秀甚不满意，说他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因此他也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李汉俊这个草案，大发雷霆，从广州来信责备我一顿，说上海的党员反对他，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从此以后，陈独秀和李汉俊二人之间的裂痕愈来愈



深，我觉得党刚才发起就闹起分裂来，太不像话，"[①] "陈独秀是党的主要发起人，李汉俊又是相交颇深的留日朋友，他似乎两边都不好说什么，只得周旋于陈、李二人之间，尽力弥合他们之间的裂痕。可是，李汉俊余怒未息，不肯再代理书记，便把党的名册和文件统统交给李达，要李达做代理书记。李达自己也许并不想做代理书记，以出头担当筹建中国共产党的这副重担；但陈独秀不在上海，李汉俊又不干，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也就只有由他来接手了。"[②]

陈独秀主要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坚决主张中央集权制，他的主张获得了当时党内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蔡和森说李汉俊在主要观点上具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李达等人也说李汉俊原是无政府主义者，有其影响。陈独秀一再强调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与中央集权制的必要。他说："安那其派（即无政府党）……他们反对中央集权及强制执行，如何能组织强大的团体去干革命的业呢？劳动者最应该亲近的，是革命的社会党——即共产党。"[③]陈独秀主张民主集中制与中央集权制，也反对像别的党那样的党魁制。

李汉俊反对中央集权制。李汉俊认为"中国过去都是专制的，如中国共产党新中央集权制必流于覆辙。""他们以为我们第一，只作些文章去宣传学生，何必要中央集权呢？第二，他们是由旧观点出发，以为中央集权可以流于个人专制，可以使一、二野心家利用作恶的。"[④]李汉俊认为中央只要一人坐机关够了，各地方的政策不宜相同，应由各地自行决定，中央大会不能制定一致的政策等等。

在李汉俊等人的抵制下，陈独秀只得做出让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他在广州又匆匆起草了一个关于党的组织和政策的 4 点意见："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主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发动群众。政权问题，因本党尚未成立，应矣诸将来，而先尽力于政治上之工作。"[⑤]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发展和教育党员，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注重组织纪律和争取群众、夺取政权的意思。"[⑥]新提案由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派出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陈公博带到上海，这个提案实际上成为中共一大的指导原则。如果把陈独秀提出的这个提案与 1921 年 2 月寄来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草案详细加以比较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党章草案上的"民主集权制"被改成了"民主主义之指导"，还把中国共产党党章草案上的"党绝对命令党员、党员服从纪律"改为有较大解释余地的"纪律"。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党章时，李汉俊再次提出“不赞成组成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当时李达与陈公博拥护李汉俊的观点”。[7]李汉俊等人的观点导致中共一大后，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还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当时人党手续非常简单，说一声就行了”。[8]对此，中共一大的会议主席张国焘在会后还大发牢骚，责怪“陈独秀搞的党太松驰，要有纪律严明的党”。[9]

李汉俊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离开上海的中央机关去武汉后，1922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陈独秀依然电邀李汉俊赴上海参加会议，但是李汉俊赌气没有赴会，后来，李汉俊依然被选举为候补委员。

实际上，李汉俊和陈独秀关于党章草案中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见解原本是各抒己见，加深沟通与谅解，是可能解决的。但是，由于两人分处上海、广州两地，仅以书信表达，一时半会也很难讲清楚。再加上两人问题上又发生了冲突，也使得隔膜越来越深，关系也越来越僵。

注释：

①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9–10 页。

②王炯华：《李达评传》第 63 页。

③《陈独秀著作选》第 2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363 页。

④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0–81 页。

⑤《苏联阴谋文证汇编》（1928 年编印），原件为俄文，此处引自未刊译稿。

⑥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 260—261 页。

⑦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28 页。

⑧张申府：《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51 页。

⑨包惠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377 页。



马林来华

1921 年 6 月 3 日，马林来华。从 1921 年 6 月至 1923 年 10 月，马林在中国工作了将近 3 年的时间里，尽管他在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错误，但他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SneeV-liet），1883 年 5 月 13 日，出生于荷兰的鹿特丹，在 17 岁时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有许多个化名：马林（Maring）、马丁（Martng）、马灵（Marling）、马伦（Mareng）、倪恭卿（Gni Kong-Chillg）、斯列夫利特（Slevelet）、西蒙博士（Dr. Simon）、菲力浦先生（Mr. Philip）、布罗维尔（Brouwer）、安得烈森（And. resen）、乐文松（Joh Van Son）等，还曾以孙铎为笔名在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以及在广州出版的理论刊物《前锋》上发表过很多文章。

马林曾在荷兰铁路工作，1902 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 年，马林被派到荷兰的殖民地印尼的爪哇从事革命活动。他是把社会主义介绍到亚洲的第一个欧洲人。1914 年 5 月 9 日，马林帮助当地工人创立了印尼社会民主联盟，依靠这个组织，领导爪哇的民主革命。1915 年，他创办了荷文的《自由呼声报》，1918 年又创办了印尼文的《人民呼声报》，这两份报纸都成为宣传革命的阵地。1916 年，马林促成了印尼社会民主联盟与爪哇一个争取民族独立并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组织——伊斯兰教联盟的合作。这两个组织的合作，使印尼民族革命运动迅速的发展起来。这一成功的经验，启发马林后来促成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合作。

1918 年，爪哇当局将马林驱逐出境，他返回了荷兰。1920 年 7 月，马林作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和伊斯兰教联盟的代表，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参加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工作，列宁担任委员会的主席，马林担任委员会的秘书。马林还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十三次会议上发言，他介绍了在印尼工作的经验，对列

宁和罗易的纲领发表了一些见解，受到列宁和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马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后不久，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推荐，派马林来中国帮助开展建党等工作。

马林在 1922 年 5 月到 6 月间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的列宁的推荐书。列宁在推荐书上写道：斯内夫利特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去中国，他的任务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的办事机构。同时，责成他与中国、日本、朝鲜、东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建立联系，并报告它们的社会政治情况。

1920 年 8 月，共产国际正式委派马林来华，9 月，他为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维也纳处理了一些问题；1921 年 4 月，马林才从莫斯科动身，取道欧洲赶赴上海，但马林在路上并不顺利。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从欧洲到上海，一路上引起了各国反动当局的警觉和注意。在维也纳，当他领取中国签证时被捕。6 天后，在朋友弗里德里希·阿德勃和一位律师的帮助下获释，并被驱逐出境。与此同时，维也纳警察局把马林的护照交给维也纳外事局，维也纳外事局把马林打算去的国家都一律作了通知。英国当局在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个港口城市对马林作了严格的检查。在马林到中国的途中，荷属东印度政府还同荷兰驻上海总领事取得了联系，迫使马林一到上海就必须立即到荷兰驻上海领事馆进行登记，并完全以公开身份进行活动。上海法租界工部局和荷兰驻上海领事馆对马林在上海的行踪进行了监视，并作了具体记录，详细记录了马林 1921 年 6 月至 12 月在上海的化名和几度迁移的地址。1921 年 6 月 3 日，马林乘意大利劳尔·特利斯提诺公司的阿切拉号轮船到达上海，化名安得烈森，住在南京路大东旅社。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到上海的第一个正式代表。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并兼有赤色职工国际使命的尼克尔斯基也同期到达上海。马林立即与尼克尔斯基取得联系，开始了在中国的工作。他们与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李达、李汉俊都能讲英语，李汉俊还会讲德语，马林会讲英语。通告交谈，国际代表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筹建的一些基本情况，得知自维经斯基来华后的 1 年多时间里，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大中城市已经先后建立或正在建立党的组织，并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和初期的工人运动。根据这些情况，国际代表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提出了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

马林与李达、李汉俊的会面并不愉快，见面就直接向李达说明自己是共



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不客气地向李达要工作报告和经费预算。这种居高临下、指手画脚的态度，使李达与李汉俊当时对马林很不满。据张国焘回忆："在李汉俊看来，中国共产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我们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可以接受它的理论指导，并采取一致行动；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能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再说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只能是我们的顾问，决不应自居于领导的地位。"①

1921 年 7 月 23 日晚 8 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 3 号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共 13 人，代表全国 53 名党员。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在会上热烈致词，由李汉俊和刘仁静作翻译。马林的题目是《第三国际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他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接着，马林分析了国际形势，介绍了共产国际的工作状况，以及他在爪哇建党活动的情况和经验。他还指出中国党目前基本上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工人成分太少，建议党要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尼克尔斯基也在会上讲了话。鉴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工人成分太少，马林建议要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大会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做出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根据马林的建议还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给予委员会 2 天的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因此，7 月 25 日和 26 日休会 2 天，用于起草会议文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没有出席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会议，但每次会后都由张国焘向马林报告会议进行的情况。7 月 30 日晚，举行了第六次会议，马林和尼克尔斯基都出席了会议。原订议题是由共产国际代表讲话，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通过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但是，会议开始不久，一个陌生男子的突然出现打断了会议。由于马林到上海以来一直受到监视，他对自己被监视也有所觉察，特别在中共一大召开期间，他就有提防。安全起见，马林当即建议停止会议，大家分别离开。后来，在嘉兴南湖继续开会。由于马林和尼可尔斯基是外国人，过于引人注意，行动不便，未去嘉庆参加会议。

在马林的建议下，1921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随后，在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设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分部，作为领导各地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了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劳动周刊》，马林亲自撰写文章指导工人运动，并多次去各地实地考察了解工人运动情况，给以具体指导。

中共一大结束后，任党的中央局总书记的陈独秀不在，党的最高职务依然不能正常履行，许多工作尚待进一步安排和部署，加上与上海中国同志间存在隔阂，马林极为焦急，他派包惠僧去广州，转达中央局和马林的意见，请他尽快辞去广东的职务，速去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陈独秀刚一上任就从李达等人处得知马林不尊重中国同志，擅自处理问题傲慢专横的作风，使得陈独秀对马林不满。但马林在翻译张太雷和张国焘劝说下，陈独秀终于同意与马林会面。他们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赞助经费问题时产生了严重的争执，陈独秀生气离开。据包惠僧回忆："大概就是当天，马林以第三国际代表的名义，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要陈独秀再加考虑改日再谈。陈独秀接到马林来信，尚未作复"。②此后，陈独秀一连几星期也不到马林那里，而此期间发生的另外两件事情，进一步加剧了陈独秀和马林间的矛盾。一件是当马林接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指示，在中国、朝鲜、日本选派代表，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时，马林不征求中共中央同意，事前也未同陈独秀商量，擅自派遣担任其翻译的中共党员张太雷赴日工作。陈独秀得知此事后极为不满，认为马林藐视中共中央。他一再表示绝不再与马林见面，并要求共产的代表职务。二是张国焘为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而用共产国际经费，陈独秀得知后大发雷霆。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越搞越僵。恰在此时，陈独秀突然被捕，马林闻讯后运用各种关系展开营救，他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气，打通了从总巡捕到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并花重金请著名的法国律师巴和出庭辩护。陈独秀出狱后与马林的关系就缓和了。

中共一大后，马林积极同国民党接触。1921 年 10 月，马林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的代表张继。12 月，马林由张太雷陪同，从上海到达桂林访问孙中山。双方进行了 3 次长时间的会谈，共同讨论了国民党与苏俄结盟和开展群众运动等方面的问题。马林建议孙中山组织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队的基础；促进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孙中山也向马林介绍了国民党的一些情况。孙中山对苏俄的新经济政策特别感到兴趣。当他听说苏俄所采取的政策与他的民生主义原则



相符合时，他感到高兴。[3]孙中山表示，他虽然并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他的思想是同马克思主义一致的。孙中山主张“待北伐胜利结束，立即提议与苏联公开建立联盟”。[4]孙中山还表示在完成反对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后，实行马林的建议。桂林会谈后，马林于1922年1月初到达广州，此时正值香港海员大罢工之际，他对这次罢工给予了很高评价。此外，通过与国民党领袖们的频繁接触，使他对国民党的好感日益增强。

马林离开广州后，便去北京同苏俄派来的裴克斯使团会面。他向裴克斯送交了2份报告，请他带转往莫斯科。一份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要谈国共合作，一份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要求苏俄政府派使团前来帮助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后来这些建议都被共产国际有关当局采纳。4月23日马林乘日轮鹿岛丸离开上海去新加坡，又经马赛、阿姆斯特丹、柏林、雷维尔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5]

此后，马林在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参加的一次议会上提出一个新的主张，就是共产党应该参加国民党，同时又保持共产党自己的独立性，也就是“党内合作”的主张。但这个提议遭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的反对。1922年4月6日，陈独秀写信给正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的维经斯基，在信中他提到6个反对马林提议的理由，并要求倘若共产国际问起此事，请维经斯基代为陈述。

7月马林从上海经过新加坡、马赛等地回到莫斯科。1922年7月11日，他写了一份报告，即《给共产国际执委的报告》，17日把这份报告交给共产国际。马林在报告中具体的叙述了他对中国情况的考察和认识，并提出了一些政策性的建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予这份报告很高的评价，18日决定在中国实行马林关于国共合作及把中国共产党总部迁到广州等意见，并决定由马林负责这些工作。文件打印在马林的衬衣上，由他带到中国。苏俄政府还派越飞来华人外交代表。24日，马林被任命为共产国际和国际新闻通讯社的远东通讯员。27日，马林和越飞启程来中国。8月25日，马林与孙中山在上海法租界会谈，介绍了他去莫斯科的情况以及共产国际的决定。此后，陈独秀和李大钊也拜访了孙中山。孙中山决定了联俄的政策，同意改组国民党及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29日到30日，在马林的要求下，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会后，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蔡和森等人加入国民党。9月4日，马林、陈独秀、张太雷参加了孙中山在上海召集的国民党人商谈改进党务的会议，马林

还在会上发言。10 月，马林去唐山擦看工人罢工的情况，还对罢工给予了经济上的援助。此后，马林与越飞频繁联合，积极促成国共合作。11 月，马林在《向导》周报上联系发表了《俄国革命五周纪念》、《吴佩孚和陈炯明》、《国民运动、革命军和革命宣传》等 6 篇文章，这些文章宣传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有力的抨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还论述了照这个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还对国民党提出了一些建议。

当年冬，马林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同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人讨论了中东铁路问题。1923 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定人民马林为驻海参崴远东局第三把手。

马林回中国后，又去沈阳会见张作霖讨论了中东铁路问题。1923 年 1 月 26 日，孙中山和越飞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随后，马林和李大钊召集中国共产党北京区的负责人在苏俄使馆讨论了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马林在会上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还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二七惨案”后，马林派张国焘去莫斯科向萨发洛夫、维经斯基、罗佐夫斯基报告惨案的经过，此时，北京政府还发布了对马林、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马林被迫前往上海。5 月 1 日，马林在广州公众集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还与孙中山多次进行会谈，最后，孙中山决定派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党务方面的情况，并商讨苏联援助的问题。6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马林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改组国民党为左派政党，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共产党内，在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等方面的问题。会后，大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指导下，1924 年 1 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举行，它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建成。5 月 16 日到 7 月，马林在《向导》周刊和《前锋》发表了《第二次的世界战争》、《土匪和外交团》、《中国改造之外国援助》等 11 篇文章，这些文章再次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并且对国民党内的错误提出批评，要求国民党联合工人、农民，负担起领导国民革命的重大任务。马林于 8 月在上海会见了蒋介石，讨论了关于蒋介石奉命派去苏联访问的问题，根据马林的建议组成了包括共产党张太雷等人在内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不久，代表团从上海出发。

1923 年 10 月，鲍罗廷抵达广州，作为苏俄政府驻广州常设代表，马林



完成其来华的使命离开中国。11 月初，维经斯基来到中国，接替马林担任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1926 年夏天以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内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马林在思想上同情托洛茨基，终于在 1927 年脱离荷兰共产党。1940 年德国法西斯占领了荷兰，马林参加了荷兰的反法西斯斗争，后来被逮捕，1942 年 4 月被杀害。

注释：

①《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168-170 页。

②《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 年 12 月，第 101 页。

③⑤道夫·宾：《斯内夫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 年 12 月，第 36 页。

④《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 年 12 月，第 18 页。

各地代表汇聚上海

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共产国际代表的到来，加速了建党的进程，促进了大会的召开。

1920 年 7 月，马林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他在会议中建议为远东和中东建立共产国际的宣传机构，使远东能成为共产国际的成员。1920 年 8 月，列宁委派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来中国，在上海考察远东各国运动的情况，建立联系并调查是否有希望和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使命。马林于 1921 年 3 月从莫斯科动身，取道欧洲赶赴上海，1921 年 6 月 3 日，马林乘意大利劳尔·特利斯提诺公司的阿切拉号轮船到达上海，化名安得烈森，住在南京路大东旅社。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并兼有赤色职工国际使命的尼克尔斯基也同期到达上海。这时维经斯基已经回国。

马林、尼克尔斯基到上海后，即与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建立了工作联系。李达、李汉俊都能讲英语，李汉俊还会讲德语，马林会讲英语。通告交谈，国际代表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筹建的一些基本情况，得知自维经斯基来华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大中城市已经先后建立或正在建立党的组织，并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和初期的工人运动。根据这些情况，国际代表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提出了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

根据原先的酝酿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和李汉俊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议，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于是决定各地党小组各派 2 名代表来上海开会，马林拿出带来的经费，寄给每位代表路费 100 元，回去时再给 50 元。

由于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由上海党组织发起的，开会地址又在上海，于是，上海党组织承担了会议的联络、筹备和会务工作，具体工作也主要由李达、李汉俊等人进行。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



州、济南以及日本留学生学生中的组织或党员，通知他们各派2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至于法国留学生的党组织，由于路途遥远，已经来不及，所以没有通知。

党的各地组织或党员接到上海的通知后，积极响应，纷纷派出各自的代表，来到全国工业中心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当时，由于党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初创时期没有统一的规章和严格的组织原则、制度，加之各地的政治环境和活动条件各有不同，因此，各地确定和产生代表的方式、方法也不尽相同，有的是召开党员会选举出不断，有的是以发起人为当然代表秘密前往，有的是有党组织的负责人制定代表出席大会，最终各地代表到达上海的时间也先后不一。

北京党的组织接到上海的通知后，即在西城暑期补习学校开会，讨论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人选问题。李大钊本是当然代表，但由于多方面原因，李大钊未能亲自出席一大。当时他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北大教授，当时值学年终结时期，公务繁忙。1921年6、7月间，李大钊正筹备并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还忙于在北京对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进行指导工作。1921年春，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因财政困难，竟断绝北京八所高校的教育经费和教职员薪俸，八所高校无法正常运转，教职员的生活难以维持，被迫于1921年3月14日举行罢工，李大钊时任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的代理主席，多次率代表到教育部和国务院请愿，6月3日，在北洋政府的国务院门口立等7小时未得接见，代表们强行涌入，遭到军警毒打，李大钊头部受伤，但还要继续索讨经费，无法离开北京。此外，李大钊是社会名流，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如突然去上海，社会影响很大，还可能不完全。于是，北京党组织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为代表，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据刘仁静回忆：“1921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代表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前是否征求过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

个人去出席‘一大’。”[1]张国焘因参与“一大”的筹备工作，在代表产生后，即动身去往上海。刘仁静于6月底与邓中夏、黄日葵同行，从北京乘车南下，7月2日到达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南京年会，在南京年会结束后又在南京停留两三天，以“留沪习德文”的名义离开南京去上海，大概在7月7日左右到达上海。

长沙的党员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由于当时湖南军阀的残暴统治，政治环境较其他地区更为恶劣，人身安全没有保证，他们在接到通知后，不得不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动身前往上海。1952年谢觉哉回忆：“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者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2]当时，从长沙到上海没有直达的车船，毛泽东与何叔衡于6月29日晚从长沙乘船北上，先到武汉，然后再由武汉转赴上海，途中需要5天左右，所以，他们到底上海的时间应该在7月4日左右。

武汉党组织派出的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根据包惠僧的回忆，他是7月15日从广州动身去上海的，3人到达上海的时间不相上下。所以，董必武和陈潭秋大约在7月20日左右到达上海。

济南党组织派出的代表是王尽美和邓恩铭。张国焘由北京去上海的途中曾路经济南，在济南停留了1天，约王尽美、邓恩铭等党员在大明湖的游船上作过详谈。当时，王尽美和邓恩铭都是学生，他们在张国焘走后不久，也乘火车南下，大约在6月底以前到达上海。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党员代表是周佛海。当时，留日学生中的党员有东京的施存统和鹿儿岛的周佛海。因施存统刚去日本不久，功课比较紧张，周佛海已经离家很长时间了，也想回家一趟，所以确定周佛海回国出席党的代表大会。周佛海在学校放暑假之后，由鹿儿岛动身回国，通知的信件和回国的路途需要较长的时间，他大约是7月下半月到达上海的。

广州党组织派出的代表是陈公博。广州共产党支部接到上海的通知后，在党员谭植棠家开会，除了广州的党员外，陈独秀和包惠僧也参加了会议。陈独秀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也是上海共产党发去组的负责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多次提到过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眼中，陈独秀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肯定是陈独秀。所以，上海党组织的来信中，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意思，特意提到要陈独秀本人和广州代表一



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表示，广州的一些事比较忙，自己又身兼预科大学校长之职，目前正在争取一笔款子用于修建校舍，如果此时离开，那笔款子就会成为泡影，所以不能亲自去上海参加会议。陈独秀提名包惠僧和陈公博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指出：由于湖北党组织比较忙，包惠僧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继续工作；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原是湖北党组织的一位负责人，1921 年初，他带着几个青年团员从武汉来到上海，原准备去苏俄学习但后来由于海路中断，经费也不够，没有去成，他就留在上海参加上海党组织的一些活动。5 月中旬，李达和李汉俊派他去广州与陈独秀商谈有关党务工作方面的问题，包惠僧到广州以后，没有固定的社会职业和收入，陈独秀就介绍他去报馆工作。陈公博很想去上海，他在参加中共一大回广州以后，写过一篇题为《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第 9 卷 3 号上，文章的开头写道："暑假期间我感了点署，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识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倥极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假中补度蜜月。"陈独秀提议要他去上海开会，正和他的心意。陈独秀年长，又是其他人的老师，他讲的话，众人都同意了。陈公博于 7 月 14 日偕新婚妻子李励庄由广州出发，经由香港前往上海，到达上海的时间是 7 月 21 日。包惠僧 7 月 15 日从广州乘轮船直赴上海，到达上海的时间大约是 7 月 20 日。

上海党组织的代表是李达和李汉俊。由他们负责会议的联络、筹备工作。李达在发信通知各地代表后，交代他的夫人王会悟安排开会地址和代表住宿的地方。王会悟选择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 3 号（解放前曾改为望志路 106 号，现为兴业路 76 号）" 一大"代表李汉俊胞兄李书城家作为开会地址。当时王会悟参加了海女界联谊会的活动，担任《妇女声》的编辑，结识了法租界博文女子学校的董事长黄兴的夫人王宗汉和校长黄绍兰。因博文女子学校距离开会地址近，行动方便，加之正值暑假，教师和学生都放假离校了，只有厨役一人，做饭兼看门，代表住在这里比较保密。于是，王会悟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向校长黄绍兰借了房间。有的房间内有简易木板床，有的没有床铺，为了让代表们休息好，她把教室打扫干净，并特意买来芦席铺在地板上当床铺。

根据档案资料记载："代表大会定于 6 月 20 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

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上海。”[3]

7月中下旬，设在法租界的私利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来上海的教师、学生模样的青年人。这样，上海代表住在自己家中，陈公博夫妇住在大东旅社，毛泽东、王尽美、邓恩铭、陈潭秋、包惠僧、刘仁静等其他外地代表便住在博文女校。到上海的各个代表中，最年长的是何叔衡，45岁左右，最年轻的是刘仁静，才19岁，代表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

代表们原盼望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大会，“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陈公博到上海后，带来陈独秀致各代表的信。陈独秀在信中说明他辞职尚未获准，不能抽身出席大会，同时向大会提出有关组织力面与政策方面的四点意见，并且希望会议郑重地讨论：“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主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发动群众。政权问题，因本党尚未成立，应矣诸将来，而先尽力于政治上之工作。”[4]

1921年7月23日所有参加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到齐后，在大会正式开会前先在博文女校开了一个简短的预备会。来自各地的代表，有的原来就相互认识，有的是第一次见面，大家聚集在一起，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交换意见，一致认为应该立即举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拟订主要议事日程为：一、讨论和通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二、讨论和通过党纲（党章）；三、讨论和通过今后工作方针；四、选举。张国点被推举为宣言和党纲的起草人。

1921年7月23日各地代表全部到达上海。晚上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解放前曾改为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共13人，代表全国53名党员。这13名代表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东的陈公博；留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佛海；陈独秀指派包惠僧参加了会议。陈独秀和李大钊因故未能出席会议。留法中国共产党小组因远隔重洋，没有联系，未能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注释：

①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209页。

②谢觉哉：《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新观察》1952年第11期。

③中央档案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④《苏联阴谋文证汇编》（1928年编印），原件为俄文，此处引自未刊译稿。

党的一大召开

1921 年 7 月 23 日晚 8 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 3 号（解放前曾改为望志路 106 号，现为兴业路 76 号）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共 13 人，代表全国 53 名党员。这 13 名代表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东的陈公博；留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佛海；陈独秀指派包惠僧受参加了会议。陈独秀和李大钊因故未能出席会议。留法中国共产党小组因远隔重洋，没有联系，未能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会址是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寓所。这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楼上是李书城夫妇的寝室，会场在楼下客堂中间。代表们先后到达会场，围坐在一张长形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的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

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事繁忙未能出席会议，临开会前才另定主持人选。因会议主持者必须经常与各地代表以及共产国际代表联系，而李达、李汉俊是学者型的人物，都不喜欢交往，与马林接触后，彼此关系也不够融洽，所以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和周佛海任记录。

张国焘首先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并提出这次代表大会的议程，应当具体讨论和解决的各种问题，包括制定党的纲领、实现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在会上热烈致词，由李汉俊和刘仁静即席翻译。马林的题目是《第三国际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他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接着，马林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介绍了共产国际的工作状况，以及他在爪哇建党活动的情况和经验。他还指出中国党目前基本上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工人成分太少，建议党要特别注



意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马林还在讲话时建议成立一个起草党纲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马林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成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第三国际的领导，但当时与会的一部分代表认为，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而不应该自居于领导的地位。马林还介绍了他和列宁在莫斯科会面的情况，并说到列宁对中国的关心，期望中国建立共产党，期望世界的东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代表们对马林的这番话特别感兴趣，对列宁关心中国革命的精神十分感到。马林讲了三四个小时，一直讲到将近半夜，马林的口才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尼克尔斯基也在会上讲了话，他的讲话比较简短，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介绍了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并介绍了俄国革命后的情况，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重视工人运动；最后，他建议将这次大会的情况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作一下汇报。共产国际代表讲完话后，代表们具体商讨了这次会议的议程和任务，认为代表大会应讨论一下问题：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工作情况，并交流经验；讨论和通过党的纲领，明确党的奋斗目标；讨论党在今后实际工作中的方针、任务和方法，并制订出具体工作计划；选举中央机构，建立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这些议题分别安排在以后几天的各次会议中逐项进行，并力求作出一致的决定。

7月24日晚上，在原会址举行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本地区党团组织成立的经过，开展的主要活动，以及进行工作的方法和经验。张国焘作《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陈公博作《广东共产党的报告》、湖北的报告是包惠僧作的，他曾任湖北支部书记。由于各地党组织成立的时间不长，工作只是初步展开，因此，代表们的报告大多数都比较简短。

各地代表在会议上首先汇报了本地区的政治形势和建立党团组织的简况。代表们指出：各地党组织于去年先后建立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的爆发，工人运动的兴起及其在斗争中的表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由于这一切所形成的现实斗争的需要，使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产生了建立革命政党的愿望和要求。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又使党的建立由酝酿变成了行动。社会主义青年团伴随着党的建立而产生，成了党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军。但是，在建党初期成员比较复杂，加入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由观点的分歧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后来无政府主义者发生了分化，有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的退出了

组织，这使得党内较为纯洁和一致了。

各地代表接着介绍了本地区党组织的工作情况，指出，这个时期主要抓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工人运动方面的工作。各地先后公开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作为党的重要宣传阵地。并且出版发行了党的机关刊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译著以及通俗小册子。各地党组织还注意把工作的重心逐步转向工人运动，部分党员开始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调查工人的状况，密切同工人的联系，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工人夜校，出版个刊物，建立地区性的产业工会，组织工人罢工斗争等。

各地代表在报告本地区工作时还指出：由于党组织成立时间较短，缺乏经验，党员数量较少，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源，因此，党的工作尚不能有计划的开展，这与党所担负的历史任务不相符，今后要继续努力创造条件，进行更为有效的工作。

当天的会议，根据马林之前的建议，对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委员会进行了人员的推选。张国焘是会议的主席，他是起草委员会成员的首当人选，李汉俊通晓4国语言，博览马克思的著作，刘仁静也有“小马克思”的雅号，都被选入起草组。这样，起草委员会委员包括董必武、张国焘、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张国焘被推荐为两个文件的起草人。

7月25日和26日休会2天，用于起草会议文件。会议之前，虽然进行了一些酝酿和准备，但由于时间仓促，未能事先拟定供代表们讨论的会议文件草案。经过2天紧张的工作，委员会根据汇集陈独秀和各代表的意见起草了党的纲领（即后来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即后来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油印后发给大家。

7月27日、28日、29日3天，大会举行了3次会议，集中讨论了起草小组提出的会议文件草案。代表们各抒己见，既有一致的认识，又有争论和探讨。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最终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但关于共产党员是否能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当议员或到现政府做官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关于这个问题，代表们在第三次会议上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第四次会议上争论就更加激烈了。一些人认为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且建议挑选党员加入国会，以便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些人则持反对意见，认为参加资产阶级国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幻想议会道路，成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把国会制看作是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会议对是否参加议会的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对于党员能



否担任资产阶级政府官员的问题，认为一般不应任重要行政职务，但可任下层官职。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没有出席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会议，但每次会议后都由张国焘向马林报告会议进行的情况。7 月 30 日晚，举行了第六次会议，马林和尼克尔斯基都出席了会议。原订议题是由共产国际代表讲话，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通过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但是，会议开始不久，一个中年男子的突然出现打断了会议。安全起见，马林当即建议停止会议，大家分别离开。会议的突然中断使得会议未能正常进行，会议计划也未能完成。当晚 12 时左右，多数代表在渔阳里 2 号陈独秀、李达的寓所聚会，商讨下一步会议的安排问题。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法国巡捕的侵扰，虽然没有使大会受到严重的损失，但是代表大会不能再在原会址继续开了，为了党的安全，必须改变开会地点。有人提议到杭州继续开会，但大家认为杭州过于繁华，很容易暴露。后来，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建议大家转移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开会，嘉兴南湖环境幽静，游人少，而且距离上海又比较近。最后，代表决定次日去嘉兴南湖继续开会。并当即决定由她安排嘉兴一切。当晚，王会悟去上海北站了解第二天开往嘉兴南湖的客车班次与时间。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因是外国人，肤色、容貌过于引人注意，行动不便，未去嘉兴参加会议。何叔衡是否去了，有不同的说法，有的当事人回忆，何叔衡提前回长沙去了。李汉俊作为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为了稳住敌人，就留在上海，也没有去嘉兴参加会议。陈公博现在李书城的寓所受了一场虚惊，从那里出来时又有暗探跟踪，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尾巴”丢掉，回到大东旅社。次日黎明前，他们夫妇所在的大东旅社住房的隔壁又发生了一起骇人的凶杀案。陈公博从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而便闻有一个女人凄厉悲惨的呼叫。被谋毙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大名鼎鼎的大东旅社发生了一起凶杀案，立即引来好几位新闻记者，但那杀人凶手早已远飏。7 月 30 日晚发生了法国巡捕搜查“一大”会场事件，31 日晨又发生了大东旅社杀人案。一夜之间两次受惊，使得陈公博不敢再在上海停留，于 31 日晚即与妻子一起乘车了去杭州。所以，陈公博也未出席嘉兴南湖召开的会议。

7 月 31 日上午 11 时，代表们在嘉兴的南湖上继续开会。这天的议程是通过纲领和决议，讨论党的成立宣言，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会议首先讨论了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由于党的纲领问题已在上海的几次会议中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所以此次着重讨论了党今后工作的部署问题，比较具体地研究了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各项实际工作。会议一致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决议。

会议讨论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是一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党纲主要内容有：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党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党的组织方面的规定为，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等。

会议讨论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共六条，其中有三条是关于工人运动的，足见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工人运动的重视程度。决议确定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成立产业工会，开办工人学校，并且成立研究工人运动的机构。在宣传工作上，决议规定一切出版物均应在党的领导下出版，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决议在阐述共产党对现有政党的态度问题时指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我们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和官僚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应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能维护无产阶级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鉴于刚刚建立起来的党的组织几乎完全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大会决议强调党要集中精力组织工厂工人，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把可靠的同志吸收到自己的方面来，并且指出，接收党员要特别谨慎，严加选择。还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

会议接着讨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宣言》。因为在讨论中国共产党对其他党派的态度时产生了分歧和争论，当时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其他党派是采取联合还是斗争的策略，会议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统一认识，会议决定把宣言问题交由组成的中央局处理。由于党当时处于秘密状态，《成立宣言》后来并没有公开发表。

会议最后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由于当时党员数量少，各地组织尚不健全，会议决定暂时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陈独秀虽然没出席大会，但由于他当时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的影响和威望，以及他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作的贡献，会议选举陈独秀



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下午6时左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代表们情不自禁的轻声呼喊着“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的口号。当晚，代表们乘火车返回上海。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鸦片战争以后的80年中，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地进行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失败，就是由于没有先进的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一步步走向胜利。

党纲政纲的热烈讨论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党纲，是一个历史性的重要文献，它申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以及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代表们对党纲、政纲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此过程中对一些问题也发生了争论。

党纲中对党的组织原则进行了规定。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知识分子自由散漫的习气，在党的各地组织中甚至在党的骨干中都有所反映。是该容忍，还是该纠正这种状况？是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有严格组织纪律战斗力很强的无产阶级政党，还是仅仅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松散的争论不休的自由结合的团体？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对这个问题的确定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一大"对组织原则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陈独秀虽然未出席大会，但他的意见对组织原则的确定仍然具有影响。他在"一大"召开时给出席会议的代表的信中提出了四点意见，并且希望会议郑重地讨论："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主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发动群众。政权问题，因本党尚未成立，应矣诸将来，而先尽力于政治上之工作。"①从陈独秀以往的言论和上述观点来看，他其实是主张党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党内生活要有民主和集中，党还要注意发展党员和争取群众的工作。这些问题的提出，对党纲中关于组织原则的制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代表们在大会中讨论党的组织原则时，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据陈潭秋回忆，李汉俊等人"不赞成组织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而主张团结先进知识分子，公开建立广泛的和平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党。基于同样的观点，他提出党员的条件是不分成分，学生也好，大学教授也好，只要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了解马克思主义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即可入党，至于是否实际参加党的一定组织担负党的一定工作，他认为是不关重要的。"②李汉俊的修正意见，遭到多数代表的反对，批评他那种自由联合的想法，支持原有

的草案。大多数代表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建党经验，反对和抵制无政府主义思潮对党的建设的影响，防止和克服知识分子自由散漫的习气对党内生活的侵袭，主张中国共产党应该以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要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而决不能变成松散的软弱的学术团体。于是，在确定党纲时，会议针对性地规定了党内组织生活中的若干原则问题，并以条文的形式作了明确的表述。

党纲还对党在现阶段的斗争目标和策略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代表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发生了分歧。

李汉俊在讨论时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还不成熟，中国的无产阶级尚幼稚，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还缺乏思想准备。目前共产党人应该注重研究和宣传方面的工作，要集中做学生运动与文化宣传工作，要首先用马克思学说武装知识分子，以便使革命的知识分子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致力于组织工人、教育工人的工作，举办马克思主义大学，出版报纸刊物，建立图书馆，大力进行阶级教育，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进而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在现阶段，共产党可以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应该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斗争，这一革命成功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加入议会开展竞选。李达与陈公博拥护李汉俊的观点。

刘仁静（他在北大英文系学习，读过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英译本）反对李汉俊的意见。他提出，欧洲的议会选举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不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应该信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应该立即向产业工人进军，在工人中大量发展党员，带领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直接的斗争目标，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无产阶级政党在斗争中要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反对任何形式的公开工作。包惠僧赞成刘仁静的意见，张国焘也发言批评李汉俊的意见。

据张国焘回忆："我和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在会前曾就党纲和政纲作过几次讨论，各人的立场都显得更清楚，自然也发现了分歧。李汉俊首先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提出现在世界上有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中国的共产主义究应采取何种的党纲和政纲，应先派人到俄、德国去考察，在国内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如马克思主义大学等，从事精深的研究后，才能作最后的决定。他并具体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既为成熟，目前共产党人应着重研究和宣传方面的工作，并应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

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成功后，共产党人可以参加议会。与李汉俊针锋现对展开争论的是刘仁静。他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信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他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策以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也不应对国民党和议会活动有过多幻想，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以为共产革命的准备。李汉俊的意见成为大会讨论的焦点，出陈公博有时对他表示一些含混的同情外，所有代表都给予他不同程度的批评。大多数代表主张中共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对于现成实政治问题，有的主张中共目前不应参加实际政治活动；有的表示中共应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予以支持。”③

对这个问题的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但多数代表不赞李汉俊的观点。李汉俊虽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但表示可以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于是，党纲规定，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联系。在接纳党员的条件中，又强调申请入党者必须断绝同任何违背我党纲领的党派的关系。

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会上代表们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马林在中共一大的第一次会议中已经很清楚的讲明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尼克尔斯基也从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得到明确的指示，要他必须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会议。在这个问题上，代表们赞同李汉俊的意见，认为中国共产党可以接受共产国际在理论上的指导，并采取一致行动，但是不必在组织上明确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代表们主张在党纲中写上“联合共产国际”，这表明代表们实际上并没有接受马林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

关于共产党员是否能在资产阶级议会中当议员，或到现政府做官的问题，在会议讨论纲领时引起了长时间的激烈的争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资料中提到：“代表大会的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有些问题经过长时期辩论以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只有引起热烈争论的一点除外。这一点就是党员能否得到执行委员会许可做官和做国会议员。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建议挑选党员做国会议员，但他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面不同意上面的意见。在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第四次会议中，辩论更加激烈了。”④董必武回忆：“我记得辩论的一个观点，是党员可不可以当官和做技术工作。一些人反对这样做。通过的决议是一个‘关



门'政策，保持党员的秘密和'纯洁'。"⑤

李汉俊等一部分代表认为，在现阶段共产党员可以当议员，可以到政府做官，这并没有危险。"我们必须把公开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它很少到来，可是要在平时做准备。我们应该改善工人的觉悟，扩大他们的眼界，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绝对必要条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共同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但是，我们要向人民指出：希望在旧制度的范围内建立新社会是无益的，即使试做一下也是无益的。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不能强迫他们进行革命。否则，他们会对国会抱有幻想，采取和平的方式，而不采取彻底的手段。"⑥

另一部分代表则反对这种观点，他们指出，共产党员既不能当议员，到资产阶级议会里进行斗争，又不能做官，与资产阶级官僚一起工作。反对者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子进行了说明。共产党员"加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把国会制认为是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为了不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共同行动，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进攻，我们不应当参加国会，而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而且，利用国会，不可能使我们的情况有任何好转，加入国会，就会使人民有可能认为，利用国会，也只有利用国会，可能使我们情况好转，才能为发展社会革命事业服务。"⑦这样不仅不能为社会革命事业增添力量，使无产阶级获得利益，反而有使我们的党变成黄色党的危险。张国焘、刘仁静都是持这种观点。

在这个问题的争论中，陈公博和李汉俊的争论很激烈。据包惠僧回忆："因为陈公博刚在北大毕业，凭借陈独秀的政治关系，镶上了国民党的边，当了广东法专的教授，宣传员养成所的所长，《群报》的总编辑，大有脱颖而出之势。李汉俊刚从日本帝国大学回国，在上海《星期评论》及《新青年》中也露了点头角，加以有李书城的政治关系，也正准备袍笏登场中。他们党共产党是个思想的发展，是个远景，做官是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他两人很激动地先后发言反对这个规定。在当时的情况，这种反对的意见，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如果是出于他人之口，这个意见也还是可以加以讨论的，因为是出于他两人之口，又加以他们的态度过于紧张，所以激起了一些代表对他两人的意见的反对意见，首先张国焘、刘仁

静搬出阶级的仇恨，阶级斗争的大原则，多数代表同意这个意见，一场舌战，颇为激流。”[8]争论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这次代表大会未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只好留待下一次代表大会再作出进一步的讨论和决定。大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修改党纲的条文时，争论的双方都作出了一些妥协和让步。结论是：共产党员不应该当议员，不能担任部长、省长之类的重要政治职务，而可以担任校长、科员等文职雇员，以及警察、士兵之类职务。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得到了彻底解决。

注释：

①《苏联阴谋文证汇编》（1928年编印），原件为俄文，此处引自未刊译稿。

②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7页。

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140页。

④⑥⑦《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页。

⑤董必武：《创立中国共产党》（1937年），《“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3页。

⑧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1953年9月，《“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7～318页。



法租界的侦探闯入会场

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解放前曾改为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举行。会议会址是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寓所。

为了防止受到外界的侵扰，保证大会的顺利进行，王会悟在开会期间担任了安全保卫工作。上海人习惯从后门进出，她就关紧前门，守在后门外，望风放哨。大会前几天进展得比较顺利。

在7月29日，马林曾建议换一个地方开会，他认为一连这一个地方开几次会议，一大会引起巡捕的注意。但是当时一些代表认为只剩一次会议了，而且一时有找不到合适的开会地点，所以，7月30日晚的会议还在原地举行。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没有出席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会议，但每次会议后都由张国焘向马林报告会议进行的情况。7月30日晚，在原会址举行了第六次会议，全体代表中除周佛海因病没有出席外都参加了会议，马林和尼可尔斯基都出席了会议。这是最后一次会议，原定议题是由共产国际代表讲话，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通过纲领和决议。然而，这次会议未能正常进行，刚开始就受到了法租界巡捕的侵扰。

晚上8时多，会议开始不久，一个头戴礼帽、戴着墨镜、身穿灰布长褂的陌生男人从虚掩着的后门闯了进来，探头探脑，东张西望。正在望风的王会悟立刻警觉起来，礼貌地走上前去问来人是谁，找什么人。陌生人非常镇静地答道找社联的王主席。王会悟说这儿是民宅，没有什么社联的王主席。陌生人说了句对不起！找错了。便匆匆走出后门，消失在夜色中。李公馆附近的确有一个社联组织，但这一组织并没有主席，更没有姓王的人。王会悟捉摸有些蹊跷，就到会议室回报这件事。她对坐在门口的杨明斋（山东人，俄共党员）说明了刚才发生的情况，杨明斋马上把情况翻译给马林听。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惕性很高，意识到这是刺探，于是建议立即中止

会议，大家分头散开。说完便匆匆收拾了自己桌上的文件和尼可尔斯基起身离开。杨明斋把马林的意思翻译给大家听了以后，也跟了出去。当时讨论正在兴头上，被迫中断，有些代表觉得这是否有些大惊小怪了，担任会议执行主席的张国焘也有些将信将疑，埋怨王会悟把会给搞散了。但意见归意见，既然共产国际代表起身走了，会议不便继续进行下去，代表们收拾好摊在桌上的文件以后，在李汉俊的带领下分别从前后门迅速撤出李公馆。为了不引起更大的怀疑，李汉俊和陈公博2人留了下来，以主人的身份应付不测。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会悟的警惕和马林的果断是完全正确的。首先闯入会场的神秘男子叫程子卿，他是黄金荣的把兄弟，利用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华人政治探长。程子卿闯入中共一大会址并不是偶然的，他一直在盯梢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行踪。这是因为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北洋军阀政府曾经三令五申密令各地“防范过激党”，对于国际大都是上海，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更是严密注视，防范国内和内外来的革命者的活动。而马林是资深共产主义活动家，曾参与过爪哇（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建立工作。1920年7月，马林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8月，列宁委派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来中国，在上海考察远东各国运动的情况，建立联系并调查是否有希望和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使命。马林于1921年3月从莫斯科动身，取道欧洲赶赴上海。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从欧洲到上海，一路上引起了各国反动当局的警觉和注意。在维也纳，当他领取中国签证时被捕。6天后，在朋友弗里德里希·阿德勃和一位律师的帮助下获释，并被驱逐出境。与此同时，维也纳警察局把马林的护照交给维也纳外事局，维也纳外事局把马林打算去的国家都一律作了通知。英国当局在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个港口城市对马林作了严格的检查。在马林到中国的途中，荷属东印度政府还同荷兰驻上海总领事取得了联系，迫使马林一到上海就必须立即到荷兰驻上海领事馆进行登记，并完全以公开身份进行活动。上海法租界工部局和荷兰驻上海领事馆对马林在上海的行踪进行了监视，并作了具体记录，详细记录了马林1921年6月至12月在上海的化名和几度迁移的地址。马林到法租界望志路开会，显然已经被监视，况且还是和许多中国人在一起，就更加引人注意了。马林对自己被监视是有所觉察的，特别在中共一大召开期间，他就有提防。所以当他在李汉俊家参加会议时，就发生了法租界巡捕房搜查中共一大会址的事情。



代表们离开会场10分钟左右，法国巡捕房的警车便到了，全副武装的巡捕和士兵包围了李公馆。法国警官带着法国侦探、中国侦探、法国兵、翻译进入室内，先监视了李汉俊和陈公博的行动，接着对寓所进行了搜查。这些巡捕除了搜查到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并没有发现什么可以的东西。室内抽屉里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幸好因为涂改的很乱，字迹模糊，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搜查完后，法国警官开始了询问，李汉俊以房主的身份用法语一一作出了回答。"你们开什么会?""没有开会，是我清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学生，来此商谈编辑新时代丛刊问题。""为什么家里藏有社会主义书籍?""我是教授并兼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这些书是作为研究参考用的。""有两个外国人是什么身份？来这里干什么?""他们是英国人，北大的教授，暑假来上海谈谈学术问题。"接着又询问了在场的陈公博的职业、籍贯和来此地是原因等问题，陈公博也一一作出了回答。

法国巡捕得知此处是李书城的寓所，而且又未发现政党活动的证据，气氛比开始有所缓解。法国警官对李汉俊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大概有某种政治企图，但现在中国教育尚未普及，还谈不到什么举动，希望你们今后专在教育上下功夫，不要参与政治活动。今天既然找不到证据，只到便宜你们了。[①]随后，法国巡捕虽然带着一伙人离开了这所房子，但在四周布满了暗探。关于会议期间受到搜查的情况，会后在中国共产党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提到："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是在一个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里召开的。会议刚开始，有一个侦探闯进了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不允许我们再继续开会了。这个侦探的到来，并没有给党带来损失，尽管在他来过以后，很快地经常就突然进行了搜查。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使代表大会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的一个不大的小城市去。"[②]

代表们离开会场之后，回头望望无人盯梢，便穿过小巷，于当晚12时左右，来到渔阳里2号，那是陈独秀的住所，现在住着李达夫妇和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他们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见外面没有异常动静，牵挂着李公馆究竟如何，张国焘让包惠僧去李公馆探视，包惠僧自己心里也着急，便去打探情况。包惠僧来到李公馆，李汉俊、陈公博简要地向他介绍了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包惠僧临走时，李汉俊要他多转几个圈子再回去。包惠僧在马路上兜了几个大圈子才回到渔阳里2号把情况告诉大家。大家开始商讨下一步会议的安排问题。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在原会址继续开会了，必须改变开会地

点。关于开会地点，大家众说纷纭难以定夺。后来，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建议大家转移到嘉兴南湖开会。经过再三斟酌，反复商量，代表们纷纷表示同意，决定去嘉兴南湖继续开会，并当即决定由王会悟安排。

注释：

①《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44 年），《“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423 页。

②《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22 页。



一大会场转移嘉兴南湖

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解放前曾改为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举行。会议会址是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寓所。

7月30日晚，在原会址举行了第六次会议，马林和尼可尔斯基都出席了会议。原订议题是由共产国际代表讲话，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通过纲领和决议。但是，会议开始不久，一个中年男子的突然出现打断了会议。安全起见，马林当即建议停止会议，大家分别离开。会议的突然中断使得会议未能正常进行，会议计划也未能完成。

当晚12时左右，多数代表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李达的寓所聚会，商讨下一步会议的安排问题。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法国巡捕的侵扰，虽然没有使大会受到严重的损失，但是代表大会不能再在上海继续开了，为了党的安全，必须改变开会地点。有人提议到上海别的租界开会，有人提议到杭州西湖继续开会。代表们认真分析后认为，在上海，警察和宪兵专门侦察聚会地点，这么多人聚集到一块儿容易引起注意；杭州西湖过于繁华，那里是达官显贵的游乐场所，护卫军警较多，很容易暴露。众说纷纭难以定夺。后来，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建议大家转移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开会，嘉兴南湖环境幽静，游人少，而且距离上海又比较近。两位年龄最大、阅历较深的代表董必武、何叔衡表示赞同，代表其他这时也没有人能找到更合适的地方，经过再三斟酌、反复商量，认为王会悟的提议不失为一个万全之策，纷纷表示同意。于是，代表们决定次日去嘉兴南湖继续开会，并当即决定由她安排嘉兴一切。当晚，王会悟去上海北站了解第二天开往嘉兴南湖的客车班次与时间。

7月31日上午8时左右，代表们先后来到上海北站。经过法租界巡捕的侵扰后，大家的警惕性都有所提高，更加重视了会议的安全问题，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代表们打扮成商人、绅士、学生、游人，为了缩小目标，免

得引人注意，代表们分批乘车南行。第一批由王会悟带领，有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等人，先乘早班车出发；其余代表为第二批，由李达带领，乘后一趟列车续行。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因是外国人，肤色、容貌过于引人注意，行动不便，未去嘉兴参加会议。李汉俊作为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为了稳住敌人，就留在上海，也没有去嘉兴参加会议。陈公博现在李书城的寓所受了一场虚惊，从那里出来时又有暗探跟踪，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尾巴”丢掉，回到大东旅社。次日黎明前，他们夫妇所在的大东旅社住房的隔壁又发生了一起骇人的凶杀案。陈公博从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而便闻有一个女人凄厉悲惨的呼叫。被谋毙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大名鼎鼎的大东旅社发生了一起凶杀案，立即引来好几位新闻记者，但那杀人凶手早已远飏。7 月 30 日晚发生了法国巡捕搜查“一大”会场事件，31 日晨又发生了大东旅社杀人案。一夜之间两次受惊，使得陈公博不敢再在上海停留，于 31 日晚即与妻子一起乘车了去杭州。所以，陈公博也未出席嘉兴南湖召开的会议。

7 月 31 日①上午 10 时左右，代表们先后到达了嘉兴车站。王会悟在南湖附近的张家弄（今勤俭路）鸳湖旅店（人民戏院处）定下 2 间客房，供代表们歇息。还托旅店账房先生代租一艘画舫。本来是准备租一条大型画舫的，但是租大的需要提前一天预定，当时大型画舫已经出租完了，只好租了一条中型的。代表们抵达后，现在鸳湖旅店稍事休息。王会悟与几位代表先到南湖烟雨楼装作游山玩水，不过其实际目的主要是为了观察周围的环境，选择画舫划行的合适路线和停靠地点。准备工作就绪后，王会悟便领着代表们来到湖畔，通过摆渡的小船登上事先租好的画舫。王会悟让船主把画舫撑到离烟雨楼东南方向 200 米左右比较僻静的水域，用篙插住。这是一艘较为华丽的游船，雕栏画柱，陈设考究。画舫长约 16 米，宽约 3 米，舱内高 2 米，包括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由右边一条夹道相贯通。在宽平的船头上搭有凉篷，便于遮阳避雨，观赏风景。中舱当中摆着一张八仙桌，周围还有茶几、板凳等东西。后舱是供游客休息和船工住宿休息的。为了会议的安全，代表们带着乐器和麻将牌，并在中舱的桌面上备有酒菜，以游客的身份作掩护。王会悟还装扮成歌女的模样，在画舫前舱放哨。一旦有别的游船靠近，她就开始唱家乡小调，以提醒代表们。为了万无一失，还跟代表们约定，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她就敲舱板，他们便开始打麻将，以掩人耳目。代



表们围坐在八仙桌周围继续举行会议。

11时左右，下起小雨，游人见见散去，湖面上更为清静，会议开始了。这天的议程是通过纲领和决议，讨论党的成立宣言，选举党的中央机构。马林不在场，又缺了经常持异议的李汉俊和陈公博，讨论的进程不想往次会议那样猛烈，十分顺利的进行着。

会议首先讨论了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由于党的纲领问题已在上海的几次会议中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所以此次着重讨论了党今后工作的部署问题，比较具体地研究了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各项实际工作。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

会议讨论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是一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党纲主要内容有：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党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党的组织方面的规定为，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等。

会议讨论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共六条，其中有三条是关于工人运动的，足见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工人运动的重视程度。决议确定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成立产业工会，开办工人学校，并且成立研究工人运动的机构。在宣传工作上，决议规定一切出版物均应在党的领导下出版，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决议在阐述共产党对现有政党的态度问题时指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我们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和官僚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应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能维护无产阶级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鉴于刚刚建立起来的党的组织几乎完全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大会决议强调党要集中精力组织工厂工人，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把可靠的同志吸收到自己的方面来，并且指出，接收党员要特别谨慎，严加选择。还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

据李达回忆，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张国焘的回忆录中，也提到曾起草过的《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宣言》。李达回忆说：宣言草案“有千把个字，前半大体抄袭《共产党宣言》的语句，我记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接着说起中国

工人阶级必须起来实行 革命自求解放的理由，大意是说中国已有产业工人百余万，手工工人一千余万，这一千多万的工人，能担负起社会革命的使命，工人阶级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已陷于水深火热的境地，只有自己起来革命，推翻旧的国家机关，建立劳工专政的国家，没收内外资本家的资产，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得到幸福生活。宣言草案中也分析了当时南北政府的本质，主张北洋封建政府必须打倒，但对于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也表示不满。因此有人说‘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但多数意见认为孙中山的政府比较北洋政府是进步的，因而把宣言中的语句修正通过了，宣言最后以‘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一句结束。”因为在讨论中国共产党对其他党派的态度时产生了分歧和争论，当时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其他党派是采取联合还是斗争的策略，会议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统一认识，会议决定把宣言问题交由组成的中央局处理。由于党当时处于秘密状态，《成立宣言》后来并没有公开发表。

会议中还有一段小插曲。下午3时以后，游船逐渐增多。到5时左右，天气开始放晴。这时，远处的湖面上传来一阵马达的轰鸣声，由远而近。王会悟以为是当地政府的巡逻艇，便用手里的纸扇笃笃笃地敲打船板。代表们因有上海的经历而提高了警惕，立即收起文件，暂时休会，船舱里传来麻将声。王会悟马上乘拖梢船上湖心岛打听，才知道那时是当地士绅的私人游艇在游湖兜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会议又继续进行。

天色渐暗，大会进入最后一项议程，即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由于当时党员数量少，各地组织尚不健全，会议决定暂时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选举用的是无记名投票方式。陈独秀虽然没出席大会，但因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并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起了主导作用，享有很高的声望；此外，列宁要马林向中国共产党传达他的意见：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但由于他当时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的影响和威望，以及他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作的贡献，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主持中国共产党“一大”，擅长社会活动，也得到不少选票，被选为组织主任。李达负责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著译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选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代表们轻声呼喊“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



类解放者万岁”等口号，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当天下午6时左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画舫返航以后，代表们弃舟登岸，离开嘉兴南湖，当晚，代表们乘火车返回上海。

注释：

①目前对此看法仍不一致，见诸报端的有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4日、8月5日几种看法。

②李达：《中国共产党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回忆》，1955年8月。《“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页。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学说解决中国共产党建设实际问题的重要文献，它具有党的章程的性质。它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是一个完全新型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武器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

党的"一大"《纲领》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五四运动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艰苦的努力，初步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接受了列宁建党学说的基本原则。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许多共产主义者围绕建党问题进行了讨论，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来建党这个问题上取得基本一致的认识。这就为"一大"《纲领》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党的"一大"《纲领》也是党在创建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各种错误思潮，特别是无政府主义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产物。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各种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也从各种渠道涌入了中国。流传较早的有美国资产阶级学者杜威以及胡适等人鼓吹的实验主义。后来又有英国资产阶级学者罗素以及张东荪、梁启超等人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无政府主义。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李达等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与各种反动思潮进行了坚决的、针锋相对的斗争，驳斥了这些错误思潮的谬论，揭露了它们的伪善面目，使人们通过这几场论战和批判，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各种错误思潮的界限。而当时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曾经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一些活动，但是他们在政治、思想与组织上与共产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早期共产党人认识到建立严密组织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制定党章才能改变组织上鱼龙混杂的状况，纯洁、统一自己队伍的思



想。所以，党的纲领的制定，正是在这一系列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

为了制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各地党的组织和共产主义者对此曾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努力。党的上海发起组于1920年11月7日，创办了秘密发行的内部刊物《共产党》月刊。这个刊物概述了共产国际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和主要活动，介绍了革命导师列宁的经历和部分著作目录，登载了俄国、英国、美国共产党的纲领和章程，并发表了不少文章阐明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在创办《共产党》月刊前后，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宣言》论述了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还分析了国际阶级斗争的状况。这些都对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的制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纲领》的制定有一个探索的过程。早在各地党组织建立前后，就曾经进行多次酝酿，并产生过几个党纲草案。第一个党纲草案，是上海共产党成立时拟定的，有六、七项条文，提出了社会革命、劳工专政和生产合作等内容；第二个党纲草案，是北京党支部拟定的临时纲领，提出了党的奋斗目标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内容；第三个党纲草案，是陈独秀在广州起草的，并寄到上海征求党内同志的意见，强调了党要实行中央集权制；第四个党纲草案，是李汉俊在上海起草的，针对陈独秀起草的党纲草案，主张党要实行地方分权制。

中共一大在起草纲领的过程中，吸取了前几个党纲草案的长处，并且参考了俄国、英国、美国共产党的纲领，拟定了供会议讨论的草案。经过各地代表的认真研究讨论，对一些有争执的条文作了必要的修改，最终在中共一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现在保存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工作计划（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共15条，现存14条（缺第11条），有俄文和英文两种译本。俄文译本来自20世纪50年代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共中央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材料，其中有关于中共一大的文件，有《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译本是1924年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写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附录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两种译本，各经过两次翻译，在文字表述上已经不可能保持原来的面貌，所以具体的表述不尽相同，但从条文和内容上看基本是一致的。其全文如下（此件为共产国际保存的俄文本译稿）：

一、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二、我们党的纲领如下：

(1)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2) 直到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时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3) 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

(4) 联合第三国际。

三、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

四、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受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是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五、接受新党员的手续如下：被介绍人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大多数党员同意，始得转为正式党员，如果该地区有执行委员会，必须经执行委员会批准。

六、在党处在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

七、每个地方，凡是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必须成立委员会。

八、委员会的党员经以前所在地的委员会书记介绍，可以转到另一个地方委员会。

九、凡是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一人，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三十人的，应由委员会的成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规定，下面将要说到。

十、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等地方组织的人数很多时，可以派他们到其他地方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当地执行委员会最严格的监督。

十一、注：遗漏——原译者注

十二、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必须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十三、委员会所管辖的党员超过五百人或同一地区有五个委员会时，必须成立执行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应委派十人参加该执行委员会，如果这些



要求不能实现，必须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组织下面将要更加详细地阐述。

十四、党员如果不是由于法律的迫使和没有得到党的特别允许，不能担任政府的委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在此例。

十五、这个纲领经三分之二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意，始得修改。

《纲领》规定了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实际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任务和最终奋斗目标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最终目标是达到无社会阶级区分的共产主义。这就鲜明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现存的剥削阶级私有制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态度和革命精神，表明了要消灭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奋斗目标，也划清了中国共产党同其他类型政党的界限。

《纲领》还规定了党的组织原则，对党的领导制度、组织机构、组织纪律以及党的组织工作等内容，作了比较明确的阐述和规定。

《纲领》提出的组织原则，首先确定党内生活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针对当时党内有的片面强调民主，有的过分强调集中的情况，《纲领》对党的领导制度作了原则性的规定。《纲领》规定党的组织要采取“苏维埃管理制度”。这种委员会体制从组织上确立党要实行集体领导的制度，决定问题要由委员会讨论，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纲领在提出党内民主的同时，又强调了集中，指出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地方组织必须服从中央。

《纲领》对党的组织机构和组织工作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纲领》规定党必须自下而上，即从基层支部直至中央，逐级建立严密的组织，实行坚强的领导。《纲领》第七、第九、第十三条把党的组织系统划分为3级：地方委员会、地方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每个地方，凡是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必须成立委员会。”“凡是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一人，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三十人的，应由委员会的成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委员会所管辖的党员超过五百人或同一地区有五个委员会时，必须成立执行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应委派十人参加该执行委员会，如果这些要求不能实现，必须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纲领》规定：党员的组织关系如要转入另一个地方委员会，要经当地委员会书记的同意；工人、农民、士兵、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很对时，可派到其他地区工作，但要受地方执行

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如要修改党纲，要经全国代表大会2/3代表的同意。

《纲领》还规定了必须慎重发展党员，严格履行入党手续。针对有人提出发展党员不要限制太严，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入党的意见，《纲领》第四条和第五条规定了党员的条件和入党的手续。提出凡接受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忠于党，不分性别、国籍，经一名党员的介绍，并经当地党组织审查，多数党员同意，再经该地区执行委员会批准，方可接受其入党。入党后，党员必须在当地支部中过组织生活，并担负实际工作，才能转到另一地方组织，并在该地方组织中参加组织生活。《纲领》还规定，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必须同与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纲领》还强调树立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纲领》规定党员必须联系群众，完成党赋予的任务，党员的政治行为和工作必须取得党组织的批准和指导。在条件不成熟时，要保守党的机密。不是法律迫使和没有党的特别允许，党员不能担任政府的官员或国会议员。

《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思想和原则，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质，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确定了党的组织的原则和纪律，从而划清了中国共产党同资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之间的原则界限，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目标明确、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这在建党初期是非常可贵的。它对于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情况下保持党的团结统一，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有严密组织纪律的、战斗力很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由于当时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思想还没有传播到中国共产党内，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当时还没有更多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所以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和革命性质缺乏科学的认识和分析。这种历史的局限，使党的“一大”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现阶段革命的纲领。



一大党的决议宣言和领导机构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现在保存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工作计划（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有俄文和英文2种译本。俄文译本来自20世纪50年代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共中央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材料，其中有关于中共一大的文件，有《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英文译本是1924年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写的硕士林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附录二《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这两种译本，各经过两次翻译，在文字表述上已经不可能保持原来的面貌，所以具体的表述不尽相同，但从条文和内容上看基本是一致的。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分六个部分，以主要篇幅论述了开展工人运动问题。它借鉴俄国和资本主义国家开展工人运动的经验，总结了各地党组织在初期工人运动中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提出了党在当前工运中的任务、方针、政策、方法和要求。

《决议》强调党要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成立产业或工厂工会，把工人组织起来。指出建立各级工会组织是党的基本任务，有大工业生产、工人又比较集中的地区，党必须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成立相应的工会组织，并派出党员参加工会工作。

在一些政治环境不许可，或者工人觉悟还不具备成立工会的地方，应先办工人补习学校或夜校，作为教育工人的主要方式和场所，待条件具备以后再组织工会。各地党组织应努力办好工人夜校，使工人夜校逐步成为工人群众的活动中心。举办讲演会、识字班，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激发工人群众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的迫切愿望。工人夜校必须严格掌握在党组织手中，有工人骨干实施管理，并聘请得力教师担任教学工作。

为了总结经验，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决议》提出要建立工人运动的研究机构，并对研究机构的组织成员、工作目的和研究内容，作出了明确规

定。着重指出工会的研究机构要身日调查各地工会的现状及其活动，认真研究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问题，指导各地的工会工作。通过这些活动，总结和交流工会工作的经验，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

《决议》对今后党的宣传工作也作了决定。早在筹备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且取得了明显成效，为党的建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决议》要求全党努力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来。为了出版更多的共产主义的普及读物，以多种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各地党组织均应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出版报纸、刊物和通俗小册子。《决议》针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群众中仍有一定影响，针对党内一些同志中存在的自由主义现象，特别强调党的宣传工作必须加强组织纪律观念，遵循党的原则、方针、政策，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严肃性。强调一切出版物，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下，均应受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无论是中央的或是地方的出版物，都不得刊登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文章。

《决议》强调在工人运动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把工人运动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防止被其他党派所利用，使这项中心工作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部分。如发现工会组织被其他政党所利用，应果断及时地对该组织进行改组或重建。代表大会在讨论此决议时，为了加强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力量，还认真研究了吸收工人入党问题，提出要把工人运动中的可靠骨干，吸收到党内来。考虑到党在发起时基本上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因此，吸收工人入党显得更为迫切，更有意义。工人积极分子入党时，条件可以比知识分子宽一些，只要纯洁可靠，热爱工会，忠诚于无产阶级，即可准予入党，而不必在是否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苛求，入党以后可以通过学习加以弥补。为了加强对全国工人运动的统一指导，决定成立全国性的工会领导机构。“一大”闭幕后不久，党就在上海成立饿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决议》还规定了党对外关系的原则。会议讨论了对当时的北方政府、南方政府以及其他政党的看法和态度。代表们分析了南北政府的特点和性质，认为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是反动的，军阀之间争权夺利，连年混战，造成了国家的分裂，人民的困苦，党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反对北京政府。但是，怎样认识和对待南方的广州政府和孙中山的国民党，会议出现了分歧。对南方政府和国民党的看法，会议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决议》回避了对南方政府的分歧，但对其他政党表示了排斥的不合作的态度。决议规定党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和官僚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



争中，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决议》指出党应该保持与共产国际和各兄弟党的经常联系。党的“一大”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召开的，代表们确认中国共产党应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东方支部。但在通过决议条文时，作了一些保留，是提出党的中央委员会每月应该向共产国际提出报告，并在必要时，派遣全权代表到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去，派代表到其他远东各国去，以建立相互之间的联系，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支援和配合。

据李达回忆，那天的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张国焘的回忆录中，也提起曾起草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

据李达回忆，党的“一大”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张国焘的回忆录中，也提到曾汇集陈独秀和各代表的意见起草过《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宣言》。这篇宣言未曾传世，迄今未能找到。李达回忆说：宣言草案“有千把个字，前半大体抄袭《共产党宣言》的语句，我记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接着说起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起来实行 革命自求解放的理由，大意是说中国已有产业工人百余万，手工工人一千余万，这一千多万的工人，能担负起社会革命的使命，工人阶级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已陷于水深火热的境地，只有自己起来革命，推翻旧的国家机关，建立劳工专政的国家，没收内外资本家的资产，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得到幸福生活。宣言草案中也分析了当时南北政府的本质，主张北洋封建政府必须打倒，但对于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也表示不满。因此有人说‘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但多数意见认为孙中山的政府比较北洋政府是进步的，因而把宣言中的语句修正通过了，宣言最后以‘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一句结束。”①

一般的说法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1920 年 11 月，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宣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任务，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作用等作了具体论述，明确指出共产党是“革命军的总司令部，”“目的乃在于实现共产主义”。目前见到的是英文译本，由参加远东民族会议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于 1921 年 12 月翻译，1956 年随中共驻第三世界代表团档案由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共中央。《宣言》的正文约 2400 字，

分3个部分：

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宣言》从3方面进行了阐述：经济方面，“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②]消灭私有财产制度，从而消灭产生剥削的根源。政治方面，主张废除政权，如同现在所有的国家机关和政府，是当然不能存在的。因为政权、军队和法庭是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压迫多数劳动群众的。社会方面，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概括起来，就是无产阶级要建立一个没有经济剥削，没有政治压迫，没有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建一个新的社会，这个理想社会的实现，但是这个新社会的创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第一步，就是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而要铲除资本制度，“一定要向工人、农人、兵士、和学生宣传”，以便“组织一些大的产业联合，并联合成一个产业组合的总联合会”；还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领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产阶级争斗，”用强力打倒资本家，“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③]并将政权转移到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手，这不过是共产党的目的之一部分，而共产党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阶级斗争还是继续的。第二步，阶级斗争改换了一个方式——这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宣言》阐明了3个问题：现在其他国家内的阶级斗争日见紧迫，这就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就是榜样，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自然状态；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无产阶级的胜利，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是继续消灭资本主义势力的余迹，制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规，组织大规模的劳动生产。

《中国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宣言，它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纲领；坚持革命的原则而否定改良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而反对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它应该在斗争中引导无产阶级前进。它所阐述的基本思想，表明了中国共产主义者所要建设的党，是一个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划清了界限的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由于《宣言》的内容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公开发表，但作为建立组织、收纳党员的标准，起过临时党纲的作用，也是全国建党的纲领性文件。《宣言》在中国树立了共产



主义的旗帜，为后来起草一大党纲奠定了基础。但是《宣言》没有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党的“一大”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由于当时党员数量少，各地组织尚不健全，会议决定暂时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选举用的是无记名投票方式。陈独秀虽然没出席大会，但因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并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起了主导作用，享有很高的声望；此外，列宁要马林向中国共产党传达他的意见：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但由于他当时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的影响和威望，以及他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作的贡献，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主持中国共产党“一大”，擅长社会活动，也得到不少选票，被选为组织主任。李达负责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著译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选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这对于健全党的组织，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加强中央对各地党组织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释：

①李达：《中国共产党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回忆》，1955年8月，《“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页。

②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47～551页。

陈独秀被捕

1921年10月4日下午，杨明斋、周佛海、柯庆施到渔阳里2号陈宅楼下和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打麻将。过了一会，包惠僧来了。他对周佛海说他从辅德里来，在路上遇到杨淑惠了，此时，周佛海正和杨淑惠谈恋爱。于是，周佛海走了，包惠僧便代替他继续打麻将。

正在打牌的时候渔阳里2号的大门忽地响起敲门声。这显然是陌生客人来临，因为熟人都知道进出后门，不会去敲前门。正在客厅的包惠僧，赶快去开前门。门外站着三四个陌生人，一副上海“白相人”的派头，说是一定要见陈独秀先生。室内气氛骤然紧张，高君曼大惊失色，但包惠僧见来者不善，故作平静地推说陈独秀先生不在家，欲关上大门。听说陈先生不在家，这几个人还要往里走，那班人便抢着进屋，把正在客厅里的杨明斋、柯庆施都看住。其中一个说要买几本《新青年》，包惠僧应付道大自鸣钟下有的卖，那儿是专卖《新青年》的。那几个人边说边向房内走，发现了堆在地上的9卷5号《新青年》，说：“这儿不是有《新青年》吗？为何不卖？”见那几个人动手要翻《新青年》，包惠僧赶忙劝阻道：“对不起，请不要乱动，这是过期的。”但是来人表示就要买这种，并且要买全部。在楼上正在午睡的陈独秀听见下面有吵叫声，便知不妙，连忙下楼准备从走后门，谁知刚到后门，那里已有密探看守，只得折回前庭。那几个人掏出手枪，大声吼问谁是陈独秀，见无人吭声，他们又威胁道不交出陈独秀统统抓。陈独秀本想站出来，却被包惠僧阻止了。这时屋外传来巡捕房的汽车声，在场的陈独秀、高君曼、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五人都被带上汽车，直奔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法国总巡捕房。又将《新青年》杂志和其他书刊资料一部分搬到另一辆汽车上。巡捕都不认识谁是陈独秀，在审讯中，陈独秀自称王坦甫，说是偶然来渔阳里二号，遭到误捕，想蒙混过去。其他人也都用了假名，包惠僧填了杨一如，高君曼填了林氏，杨明斋、柯庆施填了牟有德、胡树人，然后按了手印。巡捕房见未抓到陈独秀，便派密探把守陈独秀的住



所，命令不论是谁，凡是到陈独秀住处的都要抓起来。不料，在陈独秀等五人被捕之后，邵力子（《民国日报·觉悟》主编）和褚辅成（北京众议院副议长、上海法学院院长）去渔阳里2号访问陈独秀，他们一进渔阳里2号，当即被密探抓获，也押送法国总巡捕房。巡捕房的人问褚辅成去陈独秀住宅干什么，褚辅成说去找陈独秀，巡捕房的人又问认识陈独秀吗？褚辅成表示当然认识。于是褚辅成和邵力子立即被带至牢房去见陈独秀。陈独秀见是褚辅成，忙摆手暗示褚不要叫他，因褚辅成不明就里，一张嘴话就出来了："仲甫，怎么回事，到你家就被带到这儿来了？"这样，陈独秀身份就暴露了。巡捕房的见"王坦甫"就是陈独秀，一边放了褚辅成和邵力子，一边叫人去陈家，通知撤人。

周佛海离开陈独秀家后，便和杨淑慧在公园散步，经过渔阳里时，杨淑慧要去看陈独秀的夫人，被周佛海阻止了。周佛海把杨淑慧送回家后去了马林住处，马林给了周佛海一封信，让他转交给陈独秀。信上主要说，如果陈独秀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就应该听第三国际的命令。周佛海来到渔阳里找陈独秀，有陌生人开门说陈独秀不在。周佛海回到在辅德里的家后，陈望道来找他，告诉他下午陈独秀、高君曼、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五人都被捕了。周佛海听后庆幸没有被搜身，如果搜到信，他不但要坐牢，陈独秀等人也要罪加一等。

陈望道走后，张国焘神色慌张地来到周佛海家。说他刚才去陈独秀家，后门一个陌生大汉问他找谁，张国焘感到异样，便说找陈太太。陌生人问他找陈太太做什么?，他回答他是裁缝，来收裁缝工钱。陌生人质问他为什么不说上海话？张国焘借用了一个他所知道的裁缝铺，把裁缝铺的地址、招牌、老板的姓名都说出来，还说老板是湖南人，他也是湖南人，还没有学会说上海话。那大汉打量了张国焘一番，说陈太太不在家，就把后门关上了。听了周佛海介绍，张国焘起身去通知其他同志不要到陈独秀家里。法租界巡捕房在褚辅成和邵力子见到陈独秀，确认陈独秀的身份后，才没有将后来去陈独秀家找他的人抓起来。

实际上，陈独秀返回上海之后，上海报纸曾披露了他的行踪，马上引起了法租界巡捕的注意。他的住处渔阳里2号，恰恰又是法租界，在法国警察的管辖范围之内，陈独秀成了密探跟踪的对象，尤其是陈独秀又与马林密谈，而马林在荷兰和印尼的革命活动和"共产党人"的身份令当局高度重视，他是密探监控的重点人物，他来华后的行踪完全在租界当局的监视之

中，因此陈独秀与马林的来往就更加引起了当局的怀疑。

后来也有报纸披露陈独秀被捕的原因，“陈之被捕，系因曩执笔于《新青年》，宣传过激主义，有人告其害及租界之治安，惟当时陈尚在广东，故搁置未理。此次陈氏回到上海，逐被收监矣。”[①]

晚上，陈独秀等四人关在一间牢房里。牢房里边放着一缸冷水、一个马桶。牢房没有窗户。高君曼关在隔壁，但可以听到说话。包探叫狱卒对这几个人好一点，说这些人都是教育界的名人。过了一会，狱卒送来了两床被子。四个人拿一条被子垫，一条被子盖勉强对付了一晚上。

陈独秀从广州会到上海后，与马林见过面，但是发生了很大的争执。据包惠僧回忆：“大概就是当天，马林以第三国际代表的名义，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要陈独秀再加考虑改日再谈。陈独秀接到马林来信，尚未作复”。[②]在牢中，陈独秀叮嘱大家不可说出共产党的真情，一切都推在他身上好了，以争取其余人先行获释。陈独秀还说，他家里有马林写给他的信，如果被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刑。他打算坐牢，让其他人出去后继续干。

马林得到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后，请当时上海著名的法国律师巴和出庭为陈独秀辩护。

第二天早上9点，陈独秀等人被带到公堂会审。法庭企图追查共产党的关系，认定其余的人是陈独秀的党徒。陈独秀据理力争，说他们是我的客人，高君曼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他负责，和客人无关。由于除了《新青年》之外，所搜去的信件不足以构成罪证，无法定罪。审讯官说：“陈独秀编辑过激书籍，有过激行为，被侦处查实，已搜出此类书籍甚多，因此有害租界治安。”马林花钱请的法国律师巴和说：“这些书籍虽然被搜出，但是否有过激性质，我需要详细察看一下，请求法庭延期审讯。在审讯之前，希望将陈独秀保出候审。”法官说：“我们同意保出陈独秀和林氏，但要人钱并保，需交500两保金。其余几位，等你们找出保人，交足保金，即可放回候审。”回到牢房，陈独秀情绪好转，说：“马林这个人，看来还不错，只是有些居高临下，许多事还要我们继续做工作。过去我们的观点，可能偏颇了些。”

陈独秀是有影响的人物，10月6日，上海《时报》刊登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新青年》杂志主撰，前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陈独秀君，昨年以来，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长，迩因身患胃病，请假来沪就医。星期二（四日）午后下时许，法捕房特派巡捕多人，赴环龙路渔阳里二号陈君住宅



搜检，将积存之《新青年》杂志，并印刷品多种，一并携去。同时将陈君及夫人，及拜访陈君之友人（内有褚、邵两名皆同国内知名人士）五人，一并带入捕房，研询一过，除陈君夫妇外，外来之褚、邵诸人，当即交保除外候讯。昨晨九时，捕房将陈君夫妇，并传齐案内诸人，解赴公堂请究。被告陈君，延请巴和律师到堂辩护，奉判陈长新准交五百两，人洋铺保，候占其两礼拜再讯，其余诸人，均交原保云。又函住居法新租界，平日以提倡新文化为职志之陈某，迩因编辑共产、社会主义、工党主义、劳动主义、新青年等书籍，有过激行为，被探目等，于前日至该处，抄出是项书籍甚伙。当将陈及妻林氏，并牵涉褚、牟、杨、胡等四人，一并带入捕房。陈夫妇管押，余均交保出外。昨日传至公堂，被告陈长新延巴和律师代辩论，此项书籍，是否有过激性质，敝律师尚未详细查察，求请展期讯核。官判陈交五百两，人银并保，陈林氏开释，余均交寻常保出外，听候展期讯夺。"③《申报》也以同样内容报道，天津的《大公报》、北京的《益世报》等各大报纸也纷纷登载，闹得满城风雨。顾名君从上海打电话给北京的胡适，告诉他陈独秀被捕了。胡适给蔡元培打电话，请蔡元培与法国使馆方面联系设法营救。中共中央宣传主任李达知道后，通报各地的组织派人到上海，设法营救，张太雷为此事专门从北京赶来上海，他们电请孙中山先生帮忙，孙中山立即打电话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要求通融，请他们释放陈独秀。马林还动用共产国际的活动经费，打通法国总巡捕房的各个"关节"，并交白银500两，人银并保，还让张太雷联络褚辅成、张继等社会名流出面保释。

10月19日，法国会审公堂再审陈独秀等人。巴和律师说："《新青年》已移到广州出版，并没有在法租界出售。《劳动界》是以前出版的，已经停止出版。《共产党》是以前二房客留下的，不是陈独秀办的。"（房客是指李达、陈望道）法官问陈独秀："报纸讲你在广东主张公妻，你是否有此主张？"陈独秀答："这是绝对造谣。"最后，由国民党要人褚辅成和张继作为保人，法官宣布将陈独秀等人先放出，但7天后陈独秀需到堂听会审结果。

据李达回忆："陈独秀出狱的那一天，我们曾雇了汽车到法国公廨去迎接。我记得前一年秋天派往莫斯科的青年团员中有两三人这时到了上海，在欢迎陈独秀出来的时候，还曾用俄语唱了国际歌。陈独秀出狱以后，仍住在老渔阳里二号，他被捕留的期间，不过两星期，他的寓所并没有党的文件（文件都在辅德里六二五号），所以他在原寓所还住了两个多月。"[4]

陈独秀回家后，写了启事，刊登在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觉悟》

上。邵力子对巡捕房无故抓人，找不到罪证，竟拿报上的谣言作罪证也很反感。

10月26日，法领事当堂宣布陈独秀判罚洋100元了案。

陈独秀出狱当天，很多人去陈独秀家慰问。陈独秀表示幸亏没有搜出重要的文件，他还告诉大家不要气馁，还要继续奋斗，只是以后要更加注意保密工作了。张太雷也来到陈独秀的住宅，转达了马林恳切的慰问，并表示如果不是不方便，马林是要亲自来慰问。陈独秀对张太雷说一两天后再约他会谈，并表示将负起总书记之责。这样，由于陈独秀被捕的事，他与马林以前的一些争执，都因这件事而烟消云散，两人关系缓和了。

文献标注：

①北京《益世报》1921年10月7日第3版。

②《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01页。

③《时报》1921年10月6日第3版。

④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1954年2月23日，《“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中共中央局开展工作

中共一大闭幕后，各地代表陆续离开上海返回当地，积极开展组织和宣传工作。中央局在极端秘密的条件下开始履行自身的职责，谨慎的从事各项实际工作。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后，就开始主持中央局的工作。从中共一大到中共二大召开前的一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在工人运动、开展妇女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的团的组织以及探索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

为了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1921 年 8 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党专门领导工人运动的合法公开的总机关。主任是张国焘，包惠僧、李启汉、李震瀛、董锄平、许白昊等任干事。随后在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设立了分部，罗章龙、包惠僧、毛泽东、谭平山、王尽美分别任分部的主任。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出版了机关刊物《劳动周刊》，作为全国劳动者的言论机关。该刊物的文章生动活泼、文字通俗易懂，深受广大工人群众的喜爱和欢迎，发行量最多达到 5 000 份。此外，各地分部也出版了机关刊物，有北京分部出版的《工人周刊》，武汉分部出版的《劳动周刊》，济南分部出版的《山东劳动周刊》。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及各地分部为了向工人群众宣传、灌输马克思主义，最大限度的把工人群众团结、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作了大量的工作。各地相继成立了大量工人俱乐部，如，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汉口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安源工人俱乐部，京绥铁路工人俱乐部、济南打坏谁机车厂工会等；还开办了大量劳动学校和工人补习学校，如，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唐山工人夜校和工人图书馆、安源工人补习学校、天津工人工余补习学校、天津五五书报代卖社、天津工人图书馆等。

这样，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及各地分部的领导下，从 1921 年下半年开始，就出现了全国罢工潮。直到 1922 年的全国罢工潮，各地已经成立

了100多个工会。

中共中央也非常重视妇女运动的开展，为了更好地指导妇女运动，1921年8月，在上海《民国日报》开办了《妇女评论》副刊，陈望道担任主编，陈望道、李大钊、李汉俊为主要撰稿人。本刊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呼吁妇女解放，提出男女平等等思想。1921年底，党又创办了《妇女声》半月刊，由王会悟、王剑虹负责编辑工作，主要报道国内外妇女运动的概况及各地女工的罢工斗争。

为了培养妇女运动人才，经中共中央局陈独秀和李达商议，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今老成都北路7弄42、44号）创办了平民女校，由李达兼任校务主任（校长），王会悟负责行政管理工作。这是党领导的第一所女校。1922年2月10日，正式成立，学生有20多人，学校设有高等、初等两个班，还有一个工作部。由于经费困难，教员都是义务执教。教员大都是共产党员和社会知名人士，陈独秀、李达、张太雷、张国焘、刘少奇、施存统、陈望道等都在女校做过政治时事演讲。此外，女校还是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点。该学校的学生每天半日读书，半日做工。1922年3月5日，李达在上海《妇女声》半月刊第6期发表文章，称赞平女女校是创新社会的第一步。

《妇女声》半月刊和平女女校是建党初期向妇女进行宣传教育的阵地，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妇女的觉悟，为培养妇女运动骨干人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21年9月，中共中央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成立以后，计划出版《马克思全数》15种，《列宁全数》14种，《共产主义者（康民尼斯特）丛书》11种。经过1年的工作，最终出版了《马克思全数》2种，《列宁全数》5种，《共产主义者（康民尼斯特）丛书》5种，这12种书各印刷了3 000份。此外，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人民出版社还印发了大量战斗力极强的传单、文章等宣传品。

1922年5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局的部署，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纷纷举行了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的纪念大会。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举办的马克思纪念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长沙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召开的马克思纪念大会上，发表了《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与中国》的演说。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举行的马克思纪念大会上，还散发了大量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编印的《马克思



纪念册》。

1921年8月底，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后，研究党如何通过劳动组合书记部集中全力领导和从事工人运动，尤其是把开展铁路工人运动作为重点任务。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党团员还很少，组织也不够健全，党在领导工人运动时的最大问题就是领导力量不足以及开展和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不足。为此，决定召开一次中央扩大会议，主要是讨论如何推动工人运动与产业工人区域建立党与团的组织等问题。

1921年9月，中共中央局在上海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是陈独秀回到上海担任中央局书记后，第一次召集的扩大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上海代表李震瀛、袁达实，北京代表罗章龙、邓培，武汉代表许白昊，山东代表王尽美，湖南代表毛泽东，广东代表冯菊坡等10余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住在上海新闸路三元里。

这次会议共开了5天，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如何具体开展工人运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会上作了关于工人运动的报告，各地代表也作当地工人生活问题报告。会议经过讨论制定了一个工作计划，决定首要的任务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会议还调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组织机构及人选等问题，会议决定将山东分部与北方分部合并，调王尽美到北京工作。这次会议对于党开展工人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全国就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会议结束不久，山东分部于10月正式合并于北方分部，罗章龙仍担任北方分部主任，王尽美任分部秘书兼京奉铁路工会特派员。山东党组织由邓恩铭负责。北方分部工作范围管辖北方12个省和16个大城市的工人运动。10月，张国焘去莫斯科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局只剩陈独秀和李达两人工作，1922年春，蔡和森和向警予回国，参加了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中共中央局再没有其他的工作人员。

随着革命活动的开展和党的组织的不断扩大，中共中央局决定，在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先后成立了地区或地方委员会。1921年下半年，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成立，由李大钊任委员会书记。1922年初，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成立，由包惠僧任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共山东部建立，由王尽美任书记。1922年5月，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由毛泽东任委员会书记。在中共二大召开之前，先后成立了上海、北京、湖南、湖北、广东、山东、郑州7个地区委员会和上海、北京2个地方委员会。

1921年10月27日，陈独秀被捕出狱后以中央局总书记的身份召开一次中共中央局会议。陈独秀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些中央工作和会议的规范，并提议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即以张国焘所起草的草案为讨论基础，迅速予以决定。会议决定《共产党》月刊继续出版、并将《新青年》复刊，其他如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等都由他与有关负责人先行商谈，再提会议讨论。会议还主要通过了由张国焘提出的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草案，做了个别修正。主要是工作人员的待遇不再称薪金或工资，而称之为生活费，其标准也由原规定的每月20元至35元减低到以25元为最高额。关于党员生活费问题，会议还特别指出，原则上共产党员应无报酬地为党工作，现在所规定的生活费只给予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维持生活的同志。党员要更接近劳苦大众的生活，党内所有的同志不论职位的高低，只按个人生活的需要来定生活费的多少，领取最低生活费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最宝贵的精神品质，党内的同志应以领取最低生活费为一件光荣的事情。不论党员领取生活费与否，中共中央局都应该注意一般同志一些意外的需要，如遇疾病损伤或被捕等事件发生，党应予以积极的照顾，等等。会后，以中央通告形式将有关党员最低生活费的精神传达给全党同志，并获得党员的一致赞成。

为了具体贯彻实施中共一大制定的《纲领》和《决议》，领导全党全面开展各项实际工作，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签署《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其中心议题是拟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的具体工作计划。《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以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时还规定：“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前超过三千团员。”并提请各区切实注意青年、妇女团体的建立以及运动的开展。《通告》十分重视劳动运动，议决“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诸同志，都要尽力于次计划。”还指出：“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其余的工会也须有切实的联络，在明年大会席上，各区代表关于该区劳动状况，必须有统计的报告。”《通告》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此外，对于青年运动及妇女运动，都提出了具体计划。[①]《通告》在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的基础上，第一次向全党部署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计划，实际是对中共一大《决议》的必要补充和对已有规定的



具体化。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局在党成立后仅仅4个月，就把筹备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列入了党的工作议程，对于各地党组织的健全和党的队伍的进一步壮大，对党员素质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全国出现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群众运动的高潮，尤其是对党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起到了指导性的推动作用。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在1922年上半年，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着重作了几方面的工作：纪念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牺牲三周年；追悼黄爱、庞人铨惨遭军阀杀害；反基督教活动；支持香港海员大罢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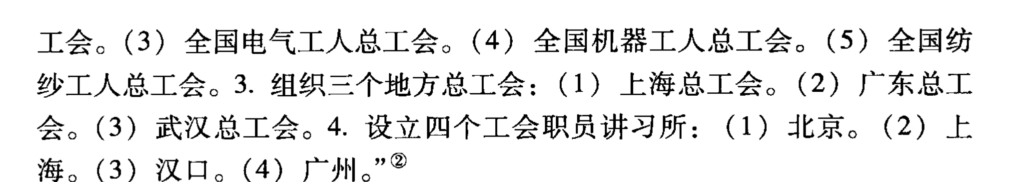
1922年4月26日，少共国际代表达林来到广州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达林为弄清孙中山的内外政策和广州政府的活动，以苏俄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同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孙中山介绍了华南的情况并向达林了解苏俄的形势，再次申明他对苏联红军的规模、组织和政治教育很感兴趣。孙中山充分表达了自己对苏俄的友好感情，并希望与苏俄建立联系。但是达林向孙中山提出建立国共两党民主联合战线的建议，却遭到孙中山的拒绝。

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中央领导人以及各地负责人为了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来到广州。根据达林的提议，中共中央于1922年4月底在广州召集党、团负责干部会议。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谭平山、林伯渠等20多人出席了会议，少共国际代表达林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党在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会上应遵循的路线问题和对广州政府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态度问题。陈独秀在会上报告了劳动大会和青年团大会的意义和国共关系问题。达林在会上再次强调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提出在保持共产党的政治独立性的条件下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上在讨论加入国民党问题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大多数人不反对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但反对加入国民党。林伯渠支持孙中山，认为“国共合作应以与孙中山先生合作为中心”，谭平山等人则主张支持“同情社会主义”的陈炯明，“认为孙、陈不和是由于陈受到孙先生左右的排挤”，张太雷等人认为，“在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与小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和国民党联合以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都是必要的”，张国焘等人则“反对和小资产阶级联合”。陈独秀在作大会结论时，“主张中共应与国民党所有革命分子合

作，国民党内部既有斗争，我们现在应先观察清楚，再作决定。”会议接纳了陈独秀的提议。广州会议虽然未能就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作出议决，但会议传达并初步贯彻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基本精神，对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等问题进行了酝酿，大多数与会者同意了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基本上通过了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这标志着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开始有了转变。

1922 年 4 月底到 5 月初，直奉两系军阀之间爆发了争夺北京政权的直奉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北京政权完全由直系军阀所掌握。直系军阀“武力统一”全国的野心增长了。6 月，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下野，新任总统黎元洪以“废督裁兵”作为“复职”的条件。在南方，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高唱“联省自治”，反对孙中山北伐。其他军阀也都依据实力的大小，或推行武力统一，或主张联省自治。这时，资产阶级学者胡适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由“国内的优秀分子”出来组织一个“好人政府”，以便早日召开南北和会、实行裁兵裁官，改良选举制度、公开财政等。局势的发展使得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发表一个对时局的主张，以阐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1922 年 6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以下称为《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也是党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政治声明。《主张》第一次比较详尽地分析了近代中国的政治状况，正确地阐述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接着，《主张》逐一批驳了“恢复国会”、“联省自治”、“好人政府”“废督裁兵”等政治主张，指出了中国当时的乱源是军阀和帝国主义，首次公开表示愿意与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建立联合战线。

陈独秀在 1922 年 6 月 30 日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给共产国际写的报告中，就系统的总结了自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 1 年来在党务、政治宣传以及各地工人运动等方面的情况，并提出了近期的计划。在党务方面提到：“1. 在全国各都会增设支部。2. 多收工人党员，务求据全数一半以上。3. 厉行中央集权制。4. 严查党员每期工作成绩。”在政治宣传方面提到：“1. 多印行对于农民工人士兵宣传的小册子。2. 发行《共产党》半月刊，专讨论世界的及本国的政治经济问题。3. 联络全国各革新派，作普通选举制及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5. 联络全国工商界，作改正协定关税制的运动。”在劳动运动方面提到：“1. 准备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的工作。2. 集中力量组织全国五个大的产业组合：（1）全国铁路总工会。（2）全国海员总



工会。(3) 全国电气工人总工会。(4) 全国机器工人总工会。(5) 全国纺纱工人总工会。3. 组织三个地方总工会：(1) 上海总工会。(2) 广东总工会。(3) 武汉总工会。4. 设立四个工会职员讲习所：(1) 北京。(2) 上海。(3) 汉口。(4) 广州。"②

文献标注：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0页。

②《"二大"和"三大"》，第61-62页。

陈独秀与马林产生矛盾

1921 年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产生了矛盾。

1921 年 6 月 3 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乘船到达上海，之后马林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李达和李汉俊取得了联系，在李达、李汉俊代表陈独秀向马林汇报工作后，双方谈到中国共产党是否加入共产国际、并接受共产国际经济资助以开展党的工作等问题时，马林由于怀着急切改变中国被压迫者状况的良好愿望，加上他感染了苏俄那种“唯我独革”的意识，性格急，高傲且自负，在言谈举止中不免摆出一副教育者的姿态。马林直接向李达说明自己是共产国际代表，不客气地向李达要工作报告和经费预算。正是这种居高临下、指手画脚的态度，引起李达等人对马林的极大不满。因此，李达在会谈中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组织还处于萌芽状态，没有什么可报告的，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李达、李汉俊等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即使中共成立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代表之间的关系如何，也还得研究，现在根本谈不上工作报告和预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站在国际主义立场，可以接受它的理论指导，并采取一致行动；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中国共产党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而且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只能是中国共产党的顾问，绝不应居于领导地位，从而拒绝了马林的要求。马林碰了钉子后，急切盼望能早日与陈独秀会面，以打开工作僵局。

在马林的催促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派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为使各地代表不致因为旅费问题而误会，马林拿出自己的活动经费，在发邀请函同时向每位代表寄路费 100 元，他还多次发函电，要陈独秀回上海参加“一大”会议，甚至派包惠僧到广东接陈独秀到会。但陈独秀因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争取一笔款子修校舍抽不出身，于是指派包惠僧代表他本人出席会议。对此，马林是不满的，他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应当在资产阶级政府中做官。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马林参加了会议并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性质、组织和使命，31 日闭会。在大会期间，马林与 13 位中国代表虽然一致通过了纲领，但在诸如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与国民党关系，革命如何进行，党如何建设等问题上，双方发生了分歧。在处理这些矛盾时，由于马林以共产国际自居，不尊重中国同志，擅自处理一些具体问题，引起大家对马林的很大不满。

“一大”闭幕后，中共中央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经费问题。中共成立后，绝大多数党员都成了职业革命家，不仅收入全无，还要靠组织上开支养家。而办杂志、搞工运没有一样不要钱。以往的经费多半由陈独秀筹集，因大会的开支已所剩无几，各地代表在离开上海以前，都表示过筹集经费不易，使中共中央无法要求各地分担所需费用。于是李达、张国焘将会议情况以及中央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函告陈独秀，请他设法筹集经费，并催促他速来上海就职。在一次会议上，马林询问李达如何开展宣传工作，如何办党报。李达表示等陈独秀回来再说。马林对此虽然很不高兴，但也无办法。当时，张国焘根据马林的建议，决定组织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按马林的要求提出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草案。草案计划在上海设立总部，在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设立分部，可以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员都应参加这一工作，总共预计有 30 人按月领取生活津贴，每人约需 20 元至 35 元。这个机构全部开支及出版费用每月约需 1 000 多元。这个计划在提交中央会议讨论时，李达对此提出了疑问。李达认为，工作人员按月领取薪金，可能会发生雇佣观念的流弊。但经过讨论以后，这个草案计划还是被采纳了。会议讨论后决定，可以据此开始工作，不过暂时不作最后决定，只将它视为一个试行的草案，等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再作最后决定，并可将这个草案的副本送交马林。张国焘和马林谈到这个工作计划时，张国焘说明了开会讨论的经过，并指出计划中的若干细节还有些疑问，准备等陈独秀回到上海之后共同商定。至于经费数额，可以是由共产国际补助一部分，不足的数字仍由中共中央局自己筹措。马林同意了这个草案，在他了解到所需经费很少后，大感意外，表示全部经费都由共产国际补助，中国共产党自己所筹得的钱可作别项用途。

由于任党的中央局总书记的陈独秀不在，党的最高职务依然不能正常履行，许多工作尚待进一步安排和部署，加上与上海中国同志间存在隔阂，马林极为焦急，他派包惠僧去广州，当面向陈独秀汇报了一大会议的精神，并

转达中央局和马林的意见，请他尽快辞去广东的职务，速去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陈独秀南下广州，本意是发展革命的事业，如今，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党内同志又委以重任，他当然是归心似箭，不愿再滞留广州。8 月 17 日，陈独秀致函陈炯明，请辞广东教育委员长职。可是，陈炯明却在回电中，极力挽留，说尽勉励劝慰的话。应该说陈炯明是赏识陈独秀的才华，满意陈独秀所开创的广东教育新局面的。所以，对他的挽留是真心诚意的。这样，陈独秀只得以胃病复发，需往上海医治为由，悄然离开广州。然而，陈独秀辞去广州教育委员长职务回到上海就任中共中央局总书记后，却不想见马林，不仅如此还对马林表示极大不满，甚至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

这是因为陈独秀刚一上任就从李达等人处得知马林不尊重中国同志，擅自处理问题傲慢专横的作风，而李达和李汉俊所表达的观点其实也是陈独秀的想法，因此，生性倔强的陈独秀立即与马林发生冲突，但在马林的翻译张太雷和张国焘劝说下，陈独秀终于同意与马林会面。

陈独秀和马林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赞助经费问题时产生了争执。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全社会攻击陈独秀是“卢布主义”，这种攻击让陈独秀十分恼火，陈独秀害怕因此被攻击他的人抓到把柄，他更怕因此被共产国际组织所控制。据包惠僧回忆：“马林按照共产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也都未正式展开，似无必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苏两党的兄弟关系，等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①]马林对此很不悦。其实，马林当时的处境也很尴尬。当时新兴的苏俄为了摆脱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其的封锁，从经济上援助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后来逐渐发展到援助亚非拉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苏俄对此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想通过联合这些国家来维护苏维埃的政权。苏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便向世界各地派出代表来掌管援助的钱财，这些人“利用掌管的大权，要求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卑躬屈膝地服从他们一时的兴致和很不高明的政治指导。”甚至把“这些共产党变成了俄国的附庸。”[②]苏俄当时也想让中国共产党处处顺从它。尼克尔斯基是苏俄人，表面



上他是马林的助手，其实他才是真正掌握实际权利的人，他监护着中国共产党，由于马林不是苏俄人，是荷兰人，所以尼克尔斯基也监护着马林的行动。马林名义上是伊尔库茨克局的书记，共产国际住上海的正式代表，但实际上他只是苏俄在上海挂出的招牌。马林的一切行动也要受到尼克尔斯基的监护，他是尼克尔斯基的助手，他当时的处境也很尴尬。张太雷奔走于两人之间，希望解决矛盾。一次，张太雷劝解“说：‘全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应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才能进行，我们中国不能例外。’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的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落后的国家。这和欧洲、苏俄是不同的。我们党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就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说完拿起皮包出门要走，张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请他下来谈，陈独秀不理，很气愤地走了。”③

据包惠僧回忆：“大概就是当天，马林以第三国际代表的名义，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要陈独秀再加考虑改日再谈。陈独秀接到马林来信，尚未作复”。[4]此后，陈独秀一连几星期也不到马林那里，而此期间发生的另外两件事情，进一步加剧了陈独秀和马林间的矛盾。一件是当马林接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指示，在中国、朝鲜、日本选派代表，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时，马林不征求中共中央同意，事前也未同陈独秀商量，擅自派遣担任其翻译的中共党员张太雷赴日工作。陈独秀得知此事后极为不满，认为马林简直是胡作非为，藐视中共中央。由此，他一再表示绝不再与马林见面，并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二是先前所提到的张国焘为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而用共产国际经费之事，陈独秀得知后大发雷霆。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越搞越僵。恰在此时，陈独秀突然被捕，却使他和马林的关系因此事件出现转机。

1921 年 10 月 4 日下午 4 时，法租界巡捕因陈独秀与马林接触而闯进陈宅，并发现屋中有大量禁售刊物《新青年》而将陈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党的干部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马林闻讯后运用各种关系展开营救，他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气，打通了从总巡捕到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并花重金请著名的法国律师巴和出庭辩护。由于重金和巴和律师辩护的作用，10 月 26 日陈独秀获释。出狱后，陈独秀听说马林大力营救的事情，一时很感动，这次和马林共患难，无形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

陈独秀出狱当天，张太雷即来到陈独秀住宅，转达了马林恳切的慰问，陈独秀让张太雷转达他会与马林约时间会谈，并表示将负起总书记之责。这样，以前一切的争执，都因这一意外而烟消云散。27 日，陈独秀以总书记的身份召开中央会议，除决定《共产党》月刊继续出版、并将《新青年》复刊外，会议主要通过了由张国焘提出的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草案，但做了个别修正。主要是工作人员的待遇不再称薪金或工资，而称之为生活费，其标准也由原规定的每月 20 元至 35 元减低到以 25 元为最高额。会议关于党员生活费问题还特别指出，原则上共产党员应无报酬地为党工作，现在所规定的生活费只给予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维持生活的同志。党员要更接近劳苦大众的生活，领取最低生活费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最宝贵的精神品质。在会后，有关党员最低生活费的精神以中央通告形式传达给全党同志，并获得党员的一致赞成。

会后，陈独秀与马林会晤，互相交换意见，气氛显得十分和谐。陈独秀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马林则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这样一切问题都得到解决。此后，陈独秀与马林经常见面，毫无隔阂地商讨各项问题，中共中央计划也按时送交马林一份，马林也从未提出异议，陈独秀也经常将马林的意见向中共中央会议报告。陈独秀与马林还具体规定了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从此，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便成为经常性的事情了。中国革命也得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迅速发展。

注释：

①③④《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 年 12 月，第 100 页、第 100～101 页、第 101 页。

②罗易：《罗易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现代史》(复印报刊资料)，1982，(18)：16。



中国共产党产生是历史的必然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使我们感到自豪的同时也让我们自大，1840 年鸦片战争冲破了国门后，外国侵略者侵入中国，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操纵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迫使中国成为它们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这样，就把一个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独立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成为近代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要改变长期贫困落后的状况，唯一的出路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反帝反封建就成为中国最为迫切的革命任务。

民族何以独立、人民何以解放、国家何以富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列强的蹂躏与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艰难地追求着民主与富强，为“强国富民”之路而上下求索着。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但都相继失败了。太平天国运动尽管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但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结束了持续 2 000 多年的君主专制度，开辟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前进的道路，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致使革命归于失败，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中国旧民主义革命的兴起、发展及其失败告诉人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资产阶级有着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并且表现了他们的革命力量，但是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都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必须有新兴的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必须有新的思想作指导。这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身上。

继孙中山之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一批知识分子，继续探索救国出路。他们认为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必须来一次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于是，他们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向传统的

旧道德、旧文化、旧风俗宣战。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吸引了广大青年走向追求真理的道路，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看到了新的曙光，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唤起了中国人民的新觉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纷纷研究并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先驱，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随之，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大批具有民主思想的人也开始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进行广泛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大量涌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纷纷建立，马克思主义课程开始登上高等学校讲坛，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著作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陆续翻译出版，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队伍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者还与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与反马克思主义者开展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批判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断扩大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阵地，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居于主导地位。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的工人阶级队伍也在不断的壮大。早在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在外资企业中出现。六七十年代在洋务企业和民族工业中，又产生了一批产业工人。1912 年全国产业工人有 60 余万人，他们是近代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对中国的压迫，中国民族工业飞速发展，迎来了“黄金时代”，中国工人阶级也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1919 年中国产业工人发展到 200 万人左右，加上 1 200 万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一支崭新的社会力量。他们除了具有世界无产阶级一般的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拥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外，还有自己特殊的优点，即受剥削受压迫虽深，革命最坚决最彻底；分布特别集中，有利于团结战斗；和农民有天然联系便于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由于具备这些优点。这些优点就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使它必然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工人阶级从它诞生那时起，就开始进行反抗压迫和剥削的各种斗争。早在 1858 年，为了反抗英法侵略军占领广州，香港两万多工人举行罢工。随着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罢工的



行业和地区范围逐渐扩大。据不完全统计，1913 年 11 次，1916 年 17 次，1917 年 23 次，1918 年 30 次。这些罢工斗争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精神，显示出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开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1919 年五四运动揭起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世界舞台，开始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生产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必然历史趋势。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提高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它使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革命力量的强大，纷纷走到工人群众中去，向工人群众宣传灌输马克思主义，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同时，他们自己的思想在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他们在斗争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920 年 1 月，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开始探讨成立共产党的问题；3 月和 5 月，他们分别在北京和上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建党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稍后，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在和毛泽东的通信中，也商讨了组织共产党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给予及时的帮助和指导。至此，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于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的直接领导和策划下，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从 1920 年 8 月至 1921 年春，国内外先后建立起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东、巴黎、东京等八个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积极出版刊物，如《劳动界》、《劳动音》、《工人周刊》、《劳动者》等，向工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指明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道路。他们还开办补习学校、夜校、识字班，深入到工人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发现和培养骨干分子，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建立工会组织。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标志着建立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的、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人民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动日益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向前发展；中国革命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指导思想，就能够制定出彻底的革命纲领和正确的方针政策，保证中国革命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直到胜利；中国共产党沟通了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为中国革命获得广泛的国际援助和避免资本主义前途提供了客观可能性。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就有了自己坚强的战斗司令部，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有了可靠的保证，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中国共产党产生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按照中共一大的《决议》，党的当前工作是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首先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为了贯彻党的决议，广泛地开展全国工人运动，需要有一个公开的中央机构从事这项工作。在党的“一大”闭幕不久，8月中旬，[①]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专门领导工人运动的合法机关，办公地点设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北成都路19号（今成都北路899号）。主任是张国焘，先后在这里工作的有包惠僧、李启汉、李震瀛、董锄平、许白昊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在各地成立了分部，北京分部的主任是罗章龙，湖南分部的主任是毛泽东，广州分部的主任是谭平山，武汉分部的主任是包惠僧，济南分部的主任是王尽美。

关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一名字的由来，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马林曾向张国焘询问这个组织工人运动的中央机构应该用什么名称，张国焘表示，这个名称还在考虑之中，由于这个机构不是由各地工会所产生出来的，不能称之为总工会。马林根据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建议，可以叫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马林还说明了这个名称适合于一般共产主义者从事工会组织工作的称号。

8月16日，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等26人发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宣言》首先指出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接着，《宣言》以中国工人阶级遭受的残酷剥削和非人生活的事实控诉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宣言》在阐述组织现代产业工会对于工人阶级进行自卫和谋求解放的重要性时说：“劳动者没有组织，或是只有公共和无意义的工会组织，自然这种团结是不能够自卫，也自然是无反抗的能力。”针对当时工人群众中受到封建地域观念影响而普遍存在着宁波帮、广东帮、江北帮等帮派的情况，《宣言》指出，这是一种分裂的办法，这种团体不能简单地拿来和资本家斗争。《宣言》还强调，劳动者不应该以地域男女为标准而

分为不同的帮派，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宣言》宣布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性质“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机关”，它的任务是“要发展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联系。”[②]

为了指导工人运动，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它一诞生就编辑和出版了机关报《劳动周刊》，[③]这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人刊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 8 月 20 日编辑出版了《劳动周刊》创刊号。《劳动周刊》在《共产党》第 6 号上发表了发刊词，在发刊词中提到：“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我们希望中国工人们都拿材料来供给这个唯一的言论机关，都来维护这个唯一的言论机关，扩大解决全人类的声浪，促进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实现。”[④]《劳动周刊》的编辑主任是张国焘，编辑是李启汉、李震瀛、包惠僧、李新旦、刘芜人、董锄平、汪洋、杨意贞等人。李启汉、李震瀛等人为编好这个《劳动周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为全国劳动者的言论机关，《劳动周刊》多行销于上海、广东、湖南、湖北等工人集中的地区，该刊物篇幅简短，题材多种多样，文字通俗易懂，深受工人群众的欢迎，发行最多达 5 000 份。工人们称《劳动周刊》是一盏指路的明灯。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月刊称赞《劳动周刊》“办得异常完善，大可以增进劳动者的知识，真是教育训练劳工们的一个最好的机关报”。[⑤]各地分部也有的出版了机关刊物，如，北京分部出版的《工人周刊》，武汉分部出版的《劳动周刊》，济南分部出版的《山东劳动周刊》。

1921 年 9 月，陈独秀主持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开展工人运动，上海、长沙、武汉、广州、济南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央扩大会议后，各分部通过出版刊物、成立劳工补习学校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到 1922 年时，全国在书记部的领导下的工会有 100 多个，会员有 80 万人。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负责推动全国工人运动，同时兼管上海地区的工作。当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进行宣传教育，启发和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1920 年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曾在沪西小砂渡办过一个工人半日学校。书记部成立后，即将半日学校扩大为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当时报名的有 200 多人，经常到校上课的约有 30 余人。李启汉、李震瀛轮流住在那里主持工作，中国劳动



组合书记部的人员轮流来校讲课，针对工人的现实情况作思想发动工作。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通过《劳动周刊》向工人宣传工人阶级团结和组织的重要性，启发工人按产业组织起来。为了和资产阶级所把持的“招牌工会”划清界限，它还强调发扬阶级斗争精神，教育工人掌握和运用阶级斗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劳动周刊》除了登载中国共产党人写的一些文章，还登载了一些劳动工人自己写的文章。1921 年 11 月 26 日出版的《劳动周刊》第十五号，就登载了一位工人的文章《痛快话》，文章揭露了资本家不劳而获、榨取工人剩余劳动的“三种罪大恶极”的罪行。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第二方面的工作，就是深入和发动工人群众，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这项工作当时是十分艰巨的。在上海工厂企业里，不仅有中外反对派的爪牙暗探的监视，而且还有青帮洪帮的活动。在上海，为了打开工人运动的局面，劳动组合书记部决定派几名同志加入青帮或洪帮，利用帮会关系，取得广泛联系工人群众的条件和机会，来开展工人运动。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前后，上海浦东英美烟厂 8 000 多名工人举行罢工，党组织立即派李启汉前去参加领导，使罢工取得了胜利。工人群众经过这次罢工斗争认识了组织团体的重要，李启汉乘机积极帮助烟草工人建立工会。原计划建立全市性的烟草产业工会，没有成功，1921 年 9 月初建立了英美烟厂工会——上海烟草工人会，一时签名入会的就有 400 余人，工人积极分子刘凤臣被推选为会长，张子良被推选为副会长。上海烟草工人会是劳动组合书记部建立的第一个产业工会。1922 年 3 月 19 日，又成立上海纺织工会浦东分会。

除了宣传教育以及深入发动群众这两项工作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和资产阶级所把持的“招牌工会”进行斗争。当时上海有 40 多个所谓工人团体，其中“招牌工会”约占 2/3。这些“招牌工会”大多有劳资混合的性质。它们主要是由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起组织的，还有劳资混合的工界团体，其实际性质和旧式行会类似。工头控制的工界团体有上海电器工界联合会、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等。这些“招牌工会”、劳资混合的工界团体、工头控制的工界团体的特点是提倡阶级调和，抹杀阶级对立；宣扬劳资合作，反对阶级斗争；主张改良主义，阻挠工人运动。其目的无非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蒙蔽工人的自觉。

为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这些“招牌工会”、劳资混合的工界团体、工头控制的工界团体划清界限，进行斗争，揭露其真实面目，以争取其

影响下的工人群众。1921年11月，上海各工团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筹组上海各工团联合会。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了帮助工人组织真正的工会，派李启汉、李震瀛出席了会议。会上，李启汉等主张不用上海各工团联合会的名义，改用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并将其作为建立上海总工会的基础。还主张只准产业工会加入，不许这些盗用全国名义的、工商混合的工团混入，以防它们借工团名义，到处欺骗工人阶级。会上就此发生了争执，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宣布退出会议。不久，机器、纺织、印刷、烟草等工会也相继退出上海各工团联席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代表的工会，为重组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开了五次筹备会，决定分头去联络邀请上海各业工会，等到多数工会加入后，重新召开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成立大会，组成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并以各业工会代表的名义深入到海员、纱厂工人、邮务工人中去开展工作，组织新的工会，增强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并启发工人的觉悟，对工人阶级之所以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进行分析，指出改变社会制度。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揭露“招牌工会”欺骗性的同时，并不拒绝在反帝反封建的大前提下同其中一些团体结成临时的同盟，借以教育和争取这些团体控制下的群众。1922年1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10余个“招牌工会”组成上海工界外交大会筹备会，反对华盛顿会议和军阀政府的卖国外交。4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浦东纺织工会的名义，与中国劳工同盟会、工商友谊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等9个团体举行联席会议，组成“浦东纺织工人经济后援会”，募捐支援日华纱厂工人罢工。

为了加强对统一工人运动的领导，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于1922年5月1日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出席会议的各派代表同意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三大政治口号；会议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度”、“罢工援助案”、“工会组织原则安”等决议案。其中应特别指出的是，会议正式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承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这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推动和影响下，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罢工高潮。通过领导一次又一次的罢工斗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不断提高。

1922年6月1日，上海租界巡捕以“煽动罢工”的罪名，非法逮捕了李启汉，并判刑3个月。9日封闭了《劳动周刊》，总计印刷了165 000份。



7月25日查封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因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已经无法开展工作，又由于当时北方的条件有利于公开领导工人运动，于是，8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上海前往北京。迁到北京后，改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总部主任是邓中夏，副主任是罗章龙。原北京分部取消，另设上海分部，并把北京党组织创办的《工人周刊》改为书记部的机关刊物。

"二七"惨案后，1923年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又迁回上海。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的《劳动运动决议案》中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今后之责任为组织天津、哈尔滨、山东、上海等处已组成之路矿等工会以外之各种工会"。[⑥]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1923年9月5日和9月18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了题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纪念安源工友罢工胜利的传单》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祝安源路矿工会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向工人指出了罢工取得胜利的原因，并告诉工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总司令部，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总营垒……社会主义就是工人的主义，工人应该相信社会主义，应该替社会主义牺牲、努力、奋斗！"[⑦]

1924年1月，中共中央成立了职工委员会，书记是邓中夏。同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了工农部，王荷波担任部长，在工农部内部设立了工会运动委员会。1925年1月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张国焘担任工农部部长，工会运动委员会改称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由张国焘兼任，副主任是李立三、刘少奇，秘书长是邓中夏，委员有：王荷波、项英、李启汉、林育南等。

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从此，中华全国总工会成为指挥全国工人阶级斗争的总机关。

注释：

①关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时间，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成立于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前，有的说是成立于"一大"之后。根据张国焘、包惠僧这些主要当事人的回忆和《劳动周刊》出版日期推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的时间在1921年8月10日到20日之间。

②《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共产党》,第6号,1921年。

③直到今天还不知道它的创刊日期,现在看到的最早的一期是1921年10月22日出版的第10期,按照这一期出版时间往前推算,如不脱期,创刊日期应该是1921年8月20日。

④《劳动周刊》发刊词,《共产党》月刊第6号,1921年7月7日。

⑤《共产党》月刊第6号,1921年7月7日。

⑥俞乐滨:《对"我党工运领导机构的沿革"的一点补充》,《党史研究资料》,1984年4月20日。

⑦《中国工会历史文献》(一),工人出版社,1958年,第59页。



劳动组合书记部联络发动工人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除了在上海设总部外，在其他几个有党组织的地方也先后建立了分部。在北京建立了北方分部，在汉口建立了武汉分部，在长沙建立了湖南分部，在广州建立了广东分部，在济南建立了支部。1922 年 8 月，总部由上海迁往北京，在上海也建立了支部。

北方分部成立于 1921 年 9 月，该分部的工作主要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罗章龙任主任，王尽美为副主任。邓培、史文彬、孙云鹏、王荷波等人也参加了北方分部的工作。北方分部负责的地区很广，包括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热河、察哈尔、绥远、甘肃和东北三省，其重点是北方的铁路工人和开滦煤矿工人。为了提高工人觉悟，发动他们起来斗争，北方分部通过办《工人周刊》、工人补习学校和进行巡回演讲等方式，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

在深入发动和组织工人方面，北方分部做了大量工作，收到了显著效果。鉴于北方分部负责的地区广，工作任务繁重，党组织除决定北方区党员以全力参加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外，还从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征集一批志愿者从事工人运动。由于受几千年来传统习惯的影响，发动青年知识分子从事工人运动遇到了不少思想障碍。学生们怕耽误学业，做工人运动工作没前途；工人们不信任学生等。党组织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引导学生和工人讨论中国革命的方向问题，并针对一些人的实际问题深入做思想工作，逐渐消除了工人和学生之间的隔阂，使二者结合起来。北方分部向各条铁路、重要厂矿和城市派遣了特派员，在各地深入工人群众，通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启发工人觉悟，帮助工人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俱乐部以至工会组织。

长辛店铁路工厂是北方党组织最早开辟工作的地方。1921 年 5 月 1 日，就成立了长辛店铁路工会，这是京汉铁路工人的第一个现代工会。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继续加强这里的工作。由于先前的工会，工人和工头都能参加，现在必须进行整顿，于是派邓中夏来长辛店，先后发展了工人积极

分子史文彬、王俊、杨宝昆、康景星为党员，并和他们商量整顿组织的办法。1921 年 10 月 20 日，长辛店工会召开机器厂、修车厂、工务厂的 50 名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工头、员司、路警从工会清除出去，将工会改名为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制定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简章》，健全了工人俱乐部的内部机构，选出了史文彬、康景星等工人俱乐部委员，史文彬担任委员长。工人俱乐部下设交际、教育、会计等部，成立纠察队、讲演团、调查团。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为一个组织严密、战斗力强的统一工会团体。

唐山是北方分部工作的另一个重点地区。1920 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罗章龙到唐山和邓培等商量组织工会的问题。接着，张国焘也到唐山，进一步讨论了在唐山制造厂组织工会的问题。在这之后，邓培对在“五四”运动中建立起来的爱国组织同人联合会进行整顿和改组，到 1920 年底，在唐山出现了第一个现代产业工会——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同人联合会。这个工会以增强工人团结，唤起工人阶级自觉，领导工人进行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为宗旨。这个工会还与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和京奉路沿线的工人建立了联系，邓培等深入到那里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人的活动。1922 年 1 月，在唐山西新街 2 号创办了唐山工人图书馆，这里成为向工人灌输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的阵地。工人图书馆还创办了工人夜校，李树彝、阮章担任教员，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团结起来组织工会的道理。工人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许多工人要求加入工会。1922 年春，唐山工会会员增加到二三百人。

1922 年初，北方分部派何孟雄到张家口、康庄等地领导京绥路工人运动。他首先在铁路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接着，组织了工人文化补习学校、工人夜校，并把革命书刊《劳动周刊》、《劳动界》、《劳动音》等送给工人阅读，对工人进行教育。铁路工人迅速提高了思想觉悟，很快就建立了京绥路机务工人“精业研究所”，它的任务是救济失业、补习文化、研究机务和开展储蓄等。这个组织一成立立即得到广大工人的拥护。同年 7 月到 8 月间，何孟雄又领导车务工人改组原来的“车务同人会”，把员司清除出去，成立只许车务工人参加的“车务工人同人会”。总会设在张家口，全线分西直门、南口、康庄、张家口、大同、平地泉、归绥、包头八个分会。各分会推举工人李连升为总会长，何孟雄为秘书。

1921 年秋，北方分部派张昆弟到正太铁路开展工作。他在石家庄正太



铁路机器厂深入工人群众，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传播马克思主义，于是，在工人中很快就涌现出孙云鹏、施恒清、赵永庆等一批积极分子。在提高工人觉悟的基础上，工人们迫切要求组织起来。这时，北方分部派贾玉清来石家庄，具体帮助成立工会。1922 年 9 月 3 日，石家庄正太铁路机器厂决议成立工会组织。由于受到反对派的阻挠，工会改名为“石家庄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传习所”，并于10 月 8 日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不久，阳泉、太原也相继成立了同样的组织。接着三个“传习所”的代表在石家庄集会，决定联合成立统一的工会组织“正太铁路总工会”，同时决定将三个“传习所”改名为三个分会，还在正太铁路工人中开始发展组织，吸收党员。

山东也是北方分部的工作范围。早在 1921 年“五一”劳动节后，王尽美和王翔千等在济南创办《济南劳动周刊》，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共一大后，山东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创办了《山东劳动周刊》，作为山东分部的机关刊物。后来，山东支部派王尽美、王翔千、邓恩铭等去济南、青岛、淄博等地深入开展建立工会的工作，加强对劳工的宣传教育，准备建立各级工人组织。经过努力，在济南组织了理发业工会、金汁工会（挑粪劳动者），山东铁路工会、纺织工会也先后成立。很快淄博矿区建立了矿工自己的组织——矿业研究所，1922 年 7 月组织了“矿业工会淄博部”。1921 年 10 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并入北方分部，王尽美调任北方分部副主任兼秘书，负责指导京奉路的工人运动。他在山海关。以铁工厂冶铁徒工为掩护进行革命工作，在俱乐部里开办工人夜校，以学习文化为名，宣传革命道理；针对工人中的行帮思想，耐心进行说服教育，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工人们的觉悟更加提高，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在王尽美的领导下整顿、健全了山海关工人俱乐部，并在俱乐部中设庶务、交际、娱乐等部，民主选举产生了工人俱乐部委员。接着，秦皇岛也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具体指导当地工人运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于 1921 年 10 月，机关设在武昌黄土坡下街 27 号中国共产党武汉区委机关院内，后迁至武昌大堤口利群毛巾厂内。包惠僧、林育南、项英先后在这里负责，陈潭秋、黄负生、许白昊、李书渠等都在此工作过。武汉分部的工作重点是京汉铁路南段的江岸总站。先后派到这里开展工人工作的有项英、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等。1921 年冬，开始酝酿筹备建立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的工作。但这里的工人分为湖北、福建、安徽三帮，各有组织，湖北帮工人用“老君会”名称。各帮之

间常因利害而生隐怨。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分部筹备工人俱乐部是很困难的。1921 年 12 月的一个星期天，武汉分部邀请各帮首领在黄土坡下街 27 号开会。会上，包惠僧介绍了一些世界工人运动简况，宣传了组织京汉铁路工会的意义，反复说明了只有消除隔阂，按产业组合起来才能争取经济、政治权利的道路。最后，各帮首领都表示同意包惠僧的意见。会议决定，各帮口首领作为发起人，筹备组织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同时，推选项英为筹备委员会文书，杨德甫、黄桂荣为筹备委员，林祥谦为财务干事，周天元为庶务干事，曾玉良为交际干事。1922 年 1 月 22 日，在刘家庙举行了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

武汉分部十分重视在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21 年秋，武汉分部先后派包惠僧、林育南、李书渠等在这里办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子弟学校，对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劳工神圣等革命道理，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1922 年 1 月 22 日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后，徐家棚工人受到鼓舞，纷纷要求建立工人俱乐部。1922 年 2 月 26 日举行了徐家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

江岸和徐家棚工人俱乐部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武汉的工人阶级。在林育南、许白昊等的帮助下，汉阳钢铁厂、武汉模范厂等工厂的工人运动蓬勃兴起，纷纷建立工人俱乐部，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创立准备了条件。

1921 年 10 月，以毛泽东为主任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成立。它除了负责湖南全省的工人运动外，还负责对江西安源路矿等地工人运动的指导。李立三、刘少奇、郭亮等都在湖南分部从事过宣传和组织工人的工作。

在湖南分部开展工作之初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对待受无政府影响的湖南劳工会，劳工会领导黄爱、庞人铨既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也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在工人中颇有声望。湖南分部全面分析了劳工会及其领导的情况，决定对其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希望通过对劳工会的改组，进一步健全劳工会的组织，推动湖南全省的工人运动。为了重点培养和教育黄爱、庞人铨，毛泽东指派专人与黄爱、庞人铨保持秘密的联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除了给予他们影响和帮助外，还直接对爱、庞人铨进行诚恳的帮助。同时，毛泽东还批评他们想用炸弹、手枪推翻政府的糊涂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批评他们只谈工会而不研究马克思主义。经过毛泽东等的说服教育，黄爱、庞人铨等放弃无政府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对劳工会进行改



组。他们请毛泽东助理会务，将合议制改为委员制，原有的评议、交际、教育、调查、出版、介绍、俱乐、会计8个部，合并为书记、交际、教育3个部，把所属的22个团改组为基层工会，会员每人每月交纳会费为3个铜板。至黄爱、庞人铨牺牲前，湖南劳工会完全在湖南分部的领导下进行工作。1921年底，黄爱、庞人铨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对安源路矿工人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是当时湖南分部最重要的任务。安源路矿共有16 000余人，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最突出的地方，蕴藏着无限的革命力量。湖南分部成立后，就把安源路矿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地区。1921年秋，毛泽东、李立三等人以“参观”的名义对其进行考察。毛泽东在考察的过程中，从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到受压迫、剥削的情况，建议工人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们纷纷要求他派人来安源工作。1921年11月，毛泽东派李立三以兴办平民教育的合法身份来到安源。经萍乡县知事的批准，李立三于1922年1月在安源五福巷内办起平民学校，公开的课本是平民教育读本，实际用的是教员自己编的启发工人觉悟的课本。随着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人觉悟迅速提高，涌现出大批工人积极分子，这就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建立党团组织奠定了基础。1921年党，建立了由8名团员组成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接着，吸收了团员中的优秀分子朱少连、李涤生等6名工人为共产党员，于1922年2月建立了安源路矿工人党支部，随后又着手筹备工人俱乐部。在召开3次筹备大会后，于“五一”劳动节，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这一天，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同年9月，俱乐部由原来的300多人增加到900多人，团员由8人发展到90多人，党员由最早的6人发展到30多人，还建立了一支工人监察队。从此安源路矿工人基本形成了以党支部为领导核心，以工人俱乐部为公开组织形式的产业工人大军，对全国工人运动有着重大的影响。

湖南分部还派人深入到粤汉铁路、水口山铅锌矿以及长沙各手工业和苦力工人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帮助各业工人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建立工人俱乐部，都做出了可喜的成绩。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设在广州素坡巷。谭平山、阮啸仙、冯菊坡等在这里主持过工作。广东的产业工人不多，特别是广州，真正的产业工人仅限于交通、军用和公用事业等部门，手工业很发达。由于手工业工人具有分散性，小生产观念很浓，因此，手工业工人组织派别林立，情况复杂。在中共广东党组织成立前，广东的机器工人维持会派、广东总工会派、互助

总社派和无政府主义派均在工人中有相当的影响，这就给广东分部开展工作带来很多困难。

根据广东的具体情况，广东分部一方面争取和改造派别团体控制旧工会，同时在工人群众中继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组织新工会。在争取和改造旧工会的工作方面，广东分部首先以广东机器工会为工作重点，派干部打入广东机器工会，对广东机器工会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会。1921 年 10 月 30 日，机器工会成立了工人补习学校，陈独秀向廖仲恺推荐谭平山、冯菊坡，请廖仲恺转荐在机器工会补习学校充任义务教员，借以做工人的工作。但活动一开始就遭到机器工会领导人的反对，谭平山、冯菊坡被迫退出个补习学校，改造工会的任务未能实现。

1921 年到 1923 年，广东分部还派刘尔崧等在广州、顺德等地的油业工会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建立了党支部，并改造了旧工会。1921 年 2 月，广州土木建筑工人在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广东分部成立后，以广州土木建筑工会为基础组织了广东省土木建筑工会，会员发展到 1 万余人，选举郭植生为主席。全省重要地区设有分会。经过广东分部的积极活动，广州组织起来的工人约有 5 万人。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其各地分部以铁路、矿山和工厂工人为重点，以建立工人自己的工会为中心，做了大量的工人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初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迎接第一次罢工高潮和迅速发展中国工人运动奠定了良好的思想、组织基础。



长辛店铁路工会

长辛店是京汉铁路北段的工人集中地，有3 000多产业工人。五四运动后，那些从工人阶级身上看到了希望，找到了归宿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便下定决心到工人中去，向工人学习，了解工人疾苦，并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0年4月，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邓中夏领导下，开始到长辛店工厂开展讲演活动。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与长辛店工人建立起密切联系。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决定把长辛店作为从事工人运动的重点。1920秋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派邓中夏、张太雷、张国焘、罗章龙、杨人杞等人来到长辛店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筹划在长辛店开办工人夜校。他们首先在工人夜校的基础上，创办了一所劳动补习学校。1921年元旦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正式开学。邓中夏为学校的主持人，校经费是由募捐得来，教员都是以北大学生会名义派去的，配有三名专职教师，张太雷、邓中夏和李大钊等人也常去学校讲课或视察。学校以“增进劳动者高尚人格”为宗旨，学校分设日夜两个班免费授课，日班为工人子弟上课，夜班为工人上课，上课的工人多数是青年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开设国文、科学常识、社会常识、工场和铁路知识等课程，另外，还备有《劳动者》、《共产党》、《工人周刊》等刊物和书籍供工人们阅读。授课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讲授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社会发展史、工人运动等，宣传工人团结的意义，讲解工人为什么受苦，工人阶级为什么组织工会，为什么要建立自己的政党，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并组织起来谋求解放的道路。劳动补习学校是共产主义小组在北方建立最早的一所学校，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地，它为开展工人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不仅直接推动了长辛店工会的成立和京汉铁路北段工人运动的开展，而且为后来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只是早期北京党组织在此地人手开展工作的方

法，借此来接近工人群众，目的在于发动工人组织工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利用工人补习学校这块阵地，在铁路工人中经过半年的宣传、教育和引导，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觉悟，激发了他们的斗争热情。

1921 年五·一劳动节前夕，劳动补习学校的教员找史文彬、杨诗田等人研究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内容，并嘱咐几个进步工人多做些宣传工作。在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1921 年 5 月 1 日，召开了长辛店铁路工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还举行了游行示威。大会以“联络感情，实行互助，谋改良地位，增高生活，得到共同幸福”为宗旨。针对当时一些工人的模糊认识，史文彬在工人大会上讲庆祝五一节的意义，杨诗田在班组中宣传国际劳动节和中国工人的密切关系。经过充分的组织宣传工作，工人们的觉悟提高了，认识统一了，五一节纪念大会开得十分隆重、圆满。会上通过了成立工会的决议。拟定《京汉铁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简章草案》，草案总则规定，本会的目的是联络感情，实行互助，谋改良地位，增高生活，得到共同幸福；关于入会的条件，规定，凡长辛店铁路工人及车站工人，都可以做本工会的会员；关于组织及职员方面，规定，工会的领导机关为“干事会”，负责总理本会所规定及大会议决的一切事物。5 月 5 日，长辛店铁路工会正式成立，会址设在劳动补习学校，史文彬被选为委员长，骨干主要是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学员。史文彬、杨诗田等工人活动的积极分子第一批报名参加了自己的组织。从这一天起长辛店铁路工人运动得到蓬勃开展，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并逐渐成为我国工人运动的主要基地之一。

劳动补习学校开办不久，交通系的官僚也办了一所学校，叫“职工学校”。工人一报名，立刻发给学习课本、笔、墨、纸、砚，学习成绩好的可以得到物质奖励，每次考试的前两名各得钢表一块，这一块表就相当于普通工人 3 个月的工资。劳动补习学校的领导一看就知道职工学校在同劳动补习学校争夺学员，史文彬和杨诗田了解情况后，通过与工友拉家常，帮助工友们提高觉悟认识。工友们了解到官办学校是小恩小惠拉拢工人，以便巩固他们的统治，而劳动补习学校才是真心实意为工人说话、为工人谋福利。随着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杭宝华、张松年、王德福等一半以上的工人再也不到职工学校去了，纷纷转到劳动补习学校上学，这样，很快就把职工学校挤垮了。

眼看着劳动补习学校的声势越来越大，厂长、总管们害怕工人们懂得了革命道理，会团结起来跟他们做斗争，就想办法要搞垮劳动补习学校。他们



指使一些工头在工人中散布“厂方要开除劳动补习学校的工人”等言论来扰乱人心，并且当面威胁、恐吓一些胆小怕事的工人，企图阻挠他们到劳动补习学校去学习。学校的教员跟史文彬、杨诗田等人将情况报告给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决定惩治一下工头中的首恶分子，打击厂长、总管们的反动气焰。当时正好发生了恶霸工头邓长荣殴打工人陶善琮的事情，劳动补习学校就找了几个进步工人，准备当众严惩邓长荣。第二天下午，工头邓长荣刚刚走出工厂南门，王俊、吴祯、马朝隆、孙臻等几个工人一拥而上，将邓长荣痛打一顿。杨诗田和刚下班的工人也一拥而上，拳打脚踢。这次痛打工头邓长荣，不但打击了反动势力，还扩大了工会的影响。许多持观望态度的工人看到了工会的力量，纷纷申请加入工会。工头们看到工会的力量日益壮大，也只好收敛劣迹，见了工人说话也和气了，也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克扣工人了。

长辛店铁路工会成立后，领导工人们开展斗争，深得工人群众的拥护。组织虽然发展很快，但由于缺乏经验，出现了组织不纯的情况，不但会员中混有工头，就是委员中也有工头。因为工头与工人对组织工会所抱的目的不同，所以在委员会内不断产生矛盾，以致后来工会会务不能正常进行，使工会的活动出现停滞状态。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认为必须进行调整，于是派邓中夏来长辛店。在邓中夏的领导组织下，先后发展了工人积极分子史文彬、王俊、杨宝昆、康景星为党员，作为工会工作的骨干，并同他们商量整顿组织的办法。关于会员的条件，大家认为，工会是工人的组织，代表的是工人的利益，工头、员司和路警不能参加，只有拿锄头的、拿斧子的、拉大锯的工人才能参加；关于组织的名称，由于先前工头、员司和路警参加工会，大家决定不再用“工会”这个名称了，为了与以前的工会有所区别，决定改为“工人俱乐部”这个新名称。1921 年 10 月 20 日，长辛店铁路工会召开机器厂、修车厂、工务厂的 50 名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工头、员司、路警从工会清除出去，将工会改名为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制定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简章》，健全了工人俱乐部的内部机构，选出了史文彬、康景星等工人俱乐部委员，史文彬担任委员长。工人俱乐部下设交际、教育、会计等部，成立纠察队、讲演团、调查团。还在车间里，每 10 个会员选出一个干事，称其为“十人干事”。这样，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为一个组织严密、战斗力强的统一工会团体。不久，加入工人俱乐部的工人达 1 800 多人。当时，北方各铁路的工人都想组织工人团体，但不知道

该如何组织。受到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影响，极力地推广其经验，北方各铁路工会组织也相继成立。

1922 年 4 月 9 日，召开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当时到会的部员 1 500 多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派了邓中夏等 4 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京汉铁路沿线的郑州、江岸、彰德、信阳等 14 个站的代表及陇海、京绥、京丰等铁路工会代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成立，使工人从此有了自己的工会，长期受奴役的工人们开始扬眉吐气，同时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恐慌和仇视。首先出来进行破坏活动的是长辛店机厂翻砂场的工头邓长荣。工人俱乐部先与他进行针锋相对斗争，并要求暗地支持工头的路局上层惩处欺压、殴打工人的凶手，否则，全厂工人将请假去北京告状。致使该厂厂长迫于压力停止了邓长荣的工作，终于使这场斗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而胜利告终。这场反对工头的斗争考验了刚刚成立的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使它赢得了广大工人群众的信任，许多持观望游移态度的工人也参加了工人俱乐部。如工务修理厂原来参加工人俱乐部的人不多，看到俱乐部敢于惩处工头，300 多工务修理厂工人全部加入了工人俱乐部。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及其反工头取得的胜利，使长辛店的工人运动开始走向成熟，加之共产党组织把工人中的一些积极分子培养为共产党员，使它的组织力量大大增强，斗争目标也更加明确。1922 年 8 月 24 日，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的领导下，长辛店 3 000 多名工人举行了罢工。

1922 年 6 月，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向北京铁路总局局长递交呈文，要求革除火车房总管郭福祥、电务科科长黄锦绵、文书王龙山、机务处电气司事谈荫棠、科长徐家楣五霸，还提出改善生活待遇的 8 项要求：（1）日后厂中上下革人，均要通过俱乐部委员会，厂内司事，概不得私行荐人。（2）从今起工人应每人每日加薪 1 角，以后凡做工够两年的，都应加薪。（3）短牌工人，做工够 2 年的，均改为长牌。（4）司机工人的头等工资，应做工多少年才能得到，请当局明白布告。（5）此次直奉战争开车升火工人，应每人增薪一级。（5）在北京、琉璃河、高碑店、保定等地给行车工人盖公房。（7）长辛店工人甚多，应盖公房。[①]呈文提出 1 个多月后，赵继贤不予理睬。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经过反复协商，向北京党组织请示同意后，便于 8 月 20 日发出通告，要求在 3 日内给予答复。22 日，赵继贤派人应付表示



研究答复，但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限赵继贤在24小时内必须给予答复，否则举行罢工。8月23日，邓中夏从北京赶来领导罢工斗争。当天晚上在邓中夏的主持下，召集工人俱乐部工人代表开会。会议决定8月24日清晨7点正式罢工，会上还通过了罢工宣言。

8月24日上午7时，罢工开始了。长辛店3 000多工人手持白旗涌向娘娘宫，举行罢工誓师大会。同时，长辛店工人俱乐组织纠察队和调查团，负责维持罢工的秩序和市面秩序，还负责监督厂方和军队方面的行动，以防止敌人的破坏活动，并针对敌人的破坏活动及时研究相应的对策。工人俱乐部的纠察队还占领了车站，赶走了车站的警察，控制了电话，拦截住南来北往的火车，并组织宣传队，向旅客宣传罢工的理由，以求得旅客的理解和支持。

当日下午3时，从汉口方面开来的列车被工人阻截在长辛店。该列车在经过保定时，曹锟假称该车有要事必须去北京，派宪兵司令带兵随车护送到长辛店。司令下车一再说明来意，工人坚持原来的主张，誓死不放行。晚上6时20分，工人要求列车长将请愿工人随车带到北京，直接与京汉路局进行交涉。

罢工开始后，赵继贤与北京九门提督王怀庆密谋，派兵以武力镇压罢工。但北京工人与长辛店工人早有联系，兵到前门车站，工人不给开车，路局也没有办法。最后200士兵还是到了长辛店。工人与士兵对峙两三小时后，士兵奉命撤回北京，工人继续举起示威游行。赵继贤见武力镇压不奏效，8月25日，派总段长和警务处长前往长辛店与工人代表谈判。工人仍然坚持原来提出的8项要求，总段长和警务处长不愿承认第一个条件，工人仍然坚持。谈判没有结果。此时，郑州铁路的工人为了援助长辛店的工人罢工也发动了同情罢工，江岸铁路工人也正在酝酿同情罢工。南北的交通完全中断。京绥、京丰、正太各路工人代表也都到了长辛店表示援助，陇海、津浦铁路工人也来电表示声援，并表示，3日内当局如不解决问题，也要罢工。

赵继贤怕罢工风潮扩大到全路，造成更大的损失，不得不做出让步。8月26日上午，赵继贤召集工人代表来路局谈判，除第一项条件外，其余的条件都表示同意。鉴于赵继贤收买谈判代表谢德清，以及采取欺骗手段将条件中的加日薪1角改为加月薪1角，工人俱乐部在要求其改正的情况下，又追加了11项条件：（1）前所要求之8条概行允许，但短牌换长牌应6个月

一换；（2）在罢工期内不得克扣工资；（3）不得因罢工借端开除俱乐部人员；（4）凡出差饭费各大小工均为一工一饭，各站各厂均取一致；（5）前砖瓦窑所革除之工人 9 名应即复职；（6）工厂改良，夏天多开窗，冬天添暖炉；（7）行车处司旗、挂钩、看车等人饭钱均应与第 4 条同；（8）年终余利工人应即拨，按京汉规定章程照办实行；（9）监工处、北京工务处、存车厂，无论星期假日，概不休息，应照厂中工友一律休息；（10）以上所要求 8 条，从北京总局起至顺德府止，凡属工人都应同等待遇；（11）前门段长、车务段长带同随身警士，狐假虎威，唆使巡警持手枪射击工人，应严行查办。[2]赵继贤看到阴谋败露，只得承认是抄写上的错误，当即把批文改正，并同意追加的全部条件。至此，罢工取得胜利，长辛店工人于 8 月 26 日复工，郑州铁路的工人也在同日复工。8 月 27 日，在长辛店娘娘宫前召开了 3 000 多工人的庆祝罢工胜利的大会。邓中夏在大会上作了讲话，他称赞了京汉铁路工人在这次罢工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团结奋斗的精神。会后，工人们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长辛店工人罢工的胜利在整个北方各站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大大提高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威望。在其影响下，京奉铁路的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京绥铁路的全路车务工人、正太铁路的石家庄机器厂等都举行了罢工，罢工风暴席卷了北方各条铁路干线。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之后，在与工头的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特别是工人罢工取得胜利，使得广大工人群众更加信任它，加入俱乐部的工人不断增多，力量日益壮大。《共产党》月刊第 6 期曾发表文章，称赞它“办会很有条理”，“实可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共产党北京党部创办的《工人周刊》还出了特刊，尽量地把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一切活动，在该刊上进行详细、全面地宣传和报道。其影响力，从北向南，波及到各路站。各路站纷纷派代表来长辛店参观、学习。各地代表归去后，也模仿长辛店相继成立了工会组织，领导工人开展罢工斗争。邓中夏还运用在长辛店的工作经验，指导并帮助天津、唐山以及北方铁路工人建立工会组织和开展斗争。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及其开展的罢工斗争，为各地工人开展工人运动树立了榜样，对北方各地及京汉铁路南段工会运动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之后，出现了一批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方向明确的、组织坚强的产业工会和地区工会组织，这就为即将到来的全国第一次工

人运动高潮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可以说长辛店是北方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发源地。

文献标注：

①至愚：《交通界三大罢工之原委》，载长沙《商业杂志》，第1卷，第1号，(1922年11月)。

②《晨报》，1922年8月25日。

湖北湖南广东上海等南方各省掀起的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各地分部成立，湖北、湖南、广东、上海等南方各省掀起的工人运动。由于有了党的组织和领导，这些罢工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更为重要的是，工人在运动中增强了信心，也得到了取得罢工斗争胜利的经验，从而进一步推动了1922年全国罢工高潮的迅速到来。

1921年7月到8月，上海英美烟厂工人的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罢工。这次罢工开始是工人自发的。原因是上海英美烟厂老厂机车100多工人反对洋监工亨白尔克扣工资与殴打工人的劣行，工人们要求撤换洋监工，大班（经理）不同意，工人们便于7月20日罢工。工人感到力量单薄，第二天派张涛等书名工人去新厂求援，在新厂张贴布告，希望新厂和老厂的工人联合起来进行斗争。这一布告得到新厂机车间200多工人的首先响应。洋大班见状勾结了三区警署，抓捕了张涛。两厂各车间的工人听到张涛被抓，非常愤怒，全体8 000多人加入了罢工斗争。

带头罢工的机车间工人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也无法组织指挥罢工队伍。因此，许多人每天到厂门口转转，见无事可做便回家。还有人到吴家厅刘公庙求签，请菩萨做主，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当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上海召开，从报纸上得知英美烟厂工人罢工的消息，立即选派李启汉去领导罢工。李启汉受到工人的欢迎，他首先从宣传教育入手，启发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经过李启汉的启发，工人们开始相信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加强团结，进行斗争，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在此基础上，李启汉帮助工人组织了罢工的领导机构，工人推选刘凤臣、刘荣才等十多人为代表，组成了工人代表会议，还在吴家厅庙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做代表办事处。代表会议根据工人群众的意见，起草了罢工



宣言和传单，提出八项条件：（1）普遍的增加工资；（2）以后按期加薪；（3）撤换虐待工人的监工；（4）罢工期内的工资照发；（5）以后不准虐待工人；（6）星期六半天及星期日的工钱照发；（7）年节假期发工钱；（8）不准开除工人代表。①为了充分发动和组织工人群众参加斗争，7月27日，在吴家厅首次召开新老厂全体工人大会，会上通过了罢工宣言和8项条件。

烟厂资本家不但拒绝工人的合理要求，反而用重金收买老厂工头王凤山进行破坏罢工的活动。王凤山骗少数认识不清的工人于8月3日要进厂做工。工人代表会议立即组织工人队伍在厂门口阻挡。双方发生冲突，都有受伤，三区警署派警察赶到，将双方带到警署。但是在处理时，警署明显是袒护工头一方，将王凤山释放，把受伤的工人汪有才押送淞沪警察厅问罪。工人对此强烈不满。8月4日晚，便在在吴家厅召开全体工人紧急会议，决定8月5日举行游行示威，要求释放汪有才，并要求官方不得干涉工人的自由。

8月5日清晨，3 000多工人在吴家厅集合，代表演说完毕，队伍就出发游行。工人队伍行至淞沪警察厅时，工人代表刘凤臣送上请愿书，要求警察厅维持公理，释放汪有才。警察厅不同意，反而把刘凤臣也拘留起来。工人们立刻将警察厅团团围住。警察厅怕工人不散，被迫将刘凤臣释放，并答应将汪有才减轻1日拘留。工人见警察厅让步，就整队回到浦东，继续在吴家厅开会。最后决议：在罢工期内，工人生活上有困难的，由大家互相帮助救济，一定要坚持斗争到底，并议定了与厂主谈判上工的3项先决条件：（1）罢免买办汪薇舟；（2）驱逐工头王凤山；（3）不得纵容警察伤害工人。②否则，决不与厂主谈判。

罢工进入第16天，烟厂资本家无计可施，开始同工人谈判。英美烟厂公司总大班（总经理）毛利斯邀请工人代表于8月7日上午到他家里谈判。工人代表重申了8项条件。毛利斯表示：除了第四条（罢工期间的工资一律照发），其他各条都可圆满答复。双方争执不下，决定下次再谈。第二次谈判时，毛利斯把第4条改为“罢工期间内工厂助米100担，以资补工人罢工的损失”，工人不同意。毛利斯又改为“赔偿罢工损失1 800元大洋”，工人仍不答应。谈判陷入了僵局，李启汉就与工人代表反复磋商，认为罢工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工人的生活困难，经受了很大的痛苦，如果一定坚持不让，很有可能不利于罢工斗争的结局。于是工人代表作了必要的让步，同意了厂方的条件，适时结束了斗争。历时三个星期的罢工取得了胜利。8月10

日下午，全体工人复工。

英美烟厂工人的这次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领导的罢工斗争。工人在斗争中，认识到组织工人的必要。罢工胜利后，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帮助下，成立了上海烟厂工会。1922 年四五月间，上海浦东日华纱厂 3 800 余名工人连续举行了两次大罢工，前后经过了一个月的艰苦斗争，在经济要求方面均获得了重大胜利。

1921 年 10 月粤汉铁路武昌段工人罢工和同年 12 月汉口租界人力车夫罢工，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最早领导的罢工。

1921 年 9 月，粤汉铁路武昌段徐家棚机车小工在职工联合会的支持下，为了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举行罢工，并发表罢工宣言，控诉铁路当局压迫剥削工人的罪行。当时，在粤汉铁路任职的洋总管英国人墨克尔看到罢工宣言后，不但不批准工人加工资的要求，反而开除了 81 个罢工工人。机车处的工人得知这个消息后都很气愤。在武汉分部林育南、施洋等的领导下，一面由职工联合会发传单给铁路小工，号召他们要坚持到底；一面发出《觉书》给铁路当局。《觉书》发出后，北京政府交通部采取顽抗的态度。洋总管恃有北京政府的保护，对工人的要求仍旧置之不理，这更激怒了工人。10 月 11 日，职工联合会代表全体职工向洋总管致公函，强烈反对开除工人，提出恢复小工工作，增加小工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等 15 项要求，并限铁路当局在 24 小时内答复。洋总管对工人提出的要求仍是置之不理。

10 月 13 日，粤汉铁路机车处 837 名工人罢工。同时发出驱逐洋总管的通电。

机车处的工人罢工以后，车辆全部停驶，从武昌徐家棚到湖南株洲全线瘫痪。北京政府立即改变态度，要求立即解决。10 月 16 日，也就是罢工的第 3 天，北京总局的代表和湖北督军署的代表到职工联合会进行调停。当天下午，路局局长吴希曾表示除了 3 条有待于进一步磋商外，其余条件都认可。职工联合会恐总管以后会借机报复，于是又提出了 3 个条件：（1）以后新添工人，或开除工人，必得各该分会领袖同意，不得由总管一人擅专；（2）不得因罢工开除职工；（3）不得扣除罢工期内的工资。[③]这 3 条都得到调停人的担保承认。10 月 17 日，粤汉铁路职工联合会下令复工，历时五天的罢工取得胜利。

这次罢工的胜利，打击了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大长了工人阶级的志气，许多报刊对这次罢工斗争作了高度的评价。



汉口租界的人力车夫生活极为痛苦，挣扎在饥饿生死线上。汉口租界的18家车行共有1 500辆车，平均每四个车夫一台车，每日每人仅收入三四百文，依靠这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都很困难，可车行老板还要增加车子的租金，每台车由以前的800文增至1 000文。车夫们被逼得走投无路，便决定罢工进行反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林育南、施洋进行领导。1921年12月1日，罢工斗争正式开始。施洋亲自参与起草罢工宣言和各种传单，并与人力车夫商议筹建工人组织。12月6日，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成立，并向车行提出3项要求：（1）车夫会成立，不得干涉；（2）取消加租议案；（3）原租减价为600文。[④]为了扩大社会影响，争取各界的援助，12月6日晚上，林育南和施洋召开工人代表会议，指导工人们组织“车夫讨饭团”，“以乞丐团形式，结队向租界游行”。[⑤]12月7日上午，车夫便从汉口大智门出发，沿途行乞，举行示威游行，沿途散发《罢工宣言》和《告各界父老兄弟姐妹书》等传单。当游行队伍进入法租界时，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实行戒严，不准游行队伍从此通过。愤怒的车夫与军警搏斗长达两三个小时，有车夫工人被捕，工人也捕去2个军警，并包围巡捕房和领事馆要求放人。法国领事怕事情闹大不好收拾，只得释放被捕工人。罢工斗争坚持了7天以后，最后迫使法国领事出面道歉，车行老板也被迫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并允许车夫工会成立，车行暂不加租，并且免去3天的租金。人力车夫罢工取得胜利，车夫于12月8日开始复工。

粤汉铁路工人罢工和汉口租界人力车夫罢工的胜利，打击了中外的反动势力，有力地推动了武汉工人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工会组织的建立。

1922年1月13日，湖南第一纱厂工人要求援沪汉先例发年终双薪，遭到华实公司拒绝而罢工。2 000多工人在操坪集合准备去办公楼请愿，监察处长李汝贤命令卫兵向工人开枪，打伤2名工人。工人仍想通过和平手段向华实公司提出条件，而华实公司却用5万元贿赂赵恒惕，请求派军队镇压工人，并斩杀黄爱和庞人铨。1月14日，政府便派兵到第一纱厂，宣布戒严。李汝贤局部数十名工人，声称要拿3个人头平息工潮。1月15日，工人发出启事，呼吁社会各界的援救。毛泽东去劳工会找黄爱、庞人铨等商议对策，决定调解。1月16日，黄爱去华实公司交涉调停，华实总经理黄藻奇假意同意调停，并愿以红利5%作为劳工会教育费，工人红利照发，约定当天晚上在劳工会签字。黄爱、庞人铨等人信以为真，便在劳工会等到12时，黄藻奇没有来，然而来了一批士兵，他们破门而入，将黄爱、庞人铨押送到

湘军总司令部。1 月 17 日清晨，将黄爱、庞人铨推往浏阳门外斩首。事后，赵恒惕又派兵封闭了湖南劳工会，还以省政府的名义在市内张贴布告，宣布他们所谓的“罪状”，是“盛倡无政府主义，假劳工会名义煽惑人心，近复秘密收买枪支，勾结匪徒，乘冬防吃紧，希图扰乱治安。”⑥

工人得到消息后，募集资金为黄爱、庞人铨拍殉难照片，收敛他们的尸体。愤怒的工人们自发冲入省政府内务厅、财政厅，向赵恒惕提出严重抗议。赵恒惕怕工人暴动，严密封锁新闻，逮捕了 6 名工人作人质，并扬言：“若有暴动行为，先将六人杀了，再杀暴动者，工界罢工杀工界，商界罢工杀商界，学界罢工杀学界。”⑦

黄爱、庞人铨牺牲后，毛泽东于 1 月 17 日在船山学社召集有共产党员、劳工会会员和各界进步人士参加的会议，商讨对赵恒惕的斗争及稳定工人情绪的问题。商定以湖南工界 3.1 万余人的名义发出《通电》，驳斥赵恒惕强加给黄爱、庞人铨的诬蔑不实之词。会议还决定出版《血祭》，发动驱赵运动。鉴于湖南的险恶形势，毛泽东与劳工会的领导人李少陵等人商议，分赴上海、北京、武汉、天津、广州、桂林等地宣传惨案真相，揭露赵恒惕的罪行，争取社会各界一同声讨赵恒惕。在上海，59 个工团的代表 1 200 余人在商科大学举行追悼会，李启汉主持，陈独秀、蔡和森等人发表演说；在天津，数百工人、学生在高等工业学校开追悼会；在广州，社会青年团、广东总工会等 61 个团体的代表 5 000 余人召开追悼会，向孙中山请愿。一时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舆论遍布各大城市，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驱赵运动。

黄、庞血案的发生，激起了湖南各地工人罢工运动斗争的逐步高涨，同时也为即将到来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准备了阶级力量。

建筑业的工作是相当繁重的，工人整天辛苦工作，但还是填不饱肚皮，没有衣服穿，连妻儿都养活不了。在包工头的残酷压榨下，建筑工人已经认识到，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只有团结起来斗争。1921 年 2 月，在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帮助下，广州建筑工人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同包工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维护建筑工人的权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成立后，便着手组织广东全省土木建筑工人工会。工会会员很快便达万余人。

建筑工人的团结令包工头感到不安，他们害怕工人团结起来罢工。便想方设法地破坏工人建立的工会。1921 年 4 月，包工头纠集一些工人建立了建筑总商行，冒充为工人所组成的团体，同官府勾结，为建筑总商行立案，取得了合法地位，和工人工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8 月 12 日，几千建筑



工人迫于维持生活，在土木建筑工会举行会议。会议决定致书包工头，要求给工人增加工资，并推举出周国华、何逸云及工人代表同包工头交涉，结果包工头拒不增加工资。土木建筑工会决定举行罢工。

8月16日，广州建筑工人开始罢工，同时举行示威游行。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的领导下，罢工组织得很有条理。罢工前，广东分部就对这次罢工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准备了维持罢工时的日食，筹集资金，号召社会各界募捐，准备了够3个月吃的粮食。罢工开始后，广州土木建筑工会便联合其他地区的建筑工会采取一致行动，并组建了西友团，专门处理一些相关的事务。

包工头拒不答应工人的要求，还同警署勾结，以和包工头冲突的名义逮捕工人8名。广大建筑工人对此义愤填膺，集合1 000多人，在警务处静坐2日，要求警署放人。警署毫无办法，只好放人。

由于停工时间过长，包工头损失太大，便请广东省公署厅长出面调停。8月26日，省公署厅长召集包工头和工会代表在省公署召开会议，讨论罢工的解决方案。双方各派代表数十人。省公署厅长提议包工头给工人们增加工资，满足工人要求，起初包工头不肯答应，经厅长苦力相劝，才勉强答应。罢工就此结束了。

这次罢工最终以工人取得胜利而结束。这次罢工的胜利给广东各界工人以很大的鼓舞，各界工人都纷纷组织起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来临。

1922年5月9日，广州盐业工人1 000余人举行同盟罢工。罢工的起因是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却遭到拒绝。

罢工前，盐业工人在中国劳动组合书部广东分部的影响下，成立了全市性统一的盐业工会。盐业工会成立后，向盐东多次提出增加工人工资的要求，都遭到拒绝。5月8日，盐业工会向盐东发出最后警告，提出了三条要求，并限盐东于9日前答复，如不答复就举行同盟罢工。但盐东拒不理睬。盐业工会便于5月9日宣布罢工，成立盐业罢工办事处，并发表罢工宣言。盐工罢工后数天，省河盐业配兑工会为了声援盐业工人，迫使盐东迅速接受工人条件，采取不再营业的措施，以支援盐工罢工。盐工罢工的声势更为壮大。

盐东不得不请运转使出面调停，但盐东提出的退让条件和盐工要求条件相差太远，盐业罢工办事处对此表示不满，驳回了盐东所提出的条件，同时

发表了第二次宣言，警告盐东如在18小时内没有圆满答复，盐工将采取最正当最猛烈的手段予以解决。

盐东仍不答复，盐业罢工办事处即致函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要求广东分部暂时担当通讯义务，向全国各劳动团体发出通知，请求对广东盐业工人罢工援助。广东分部立即将盐业罢工办事处的要求转报总部，通告全国工界，并发动广东各工会共同设法援助盐业工人罢工。广东省、香港、澳门各工团纷纷筹集巨款，帮助盐业工人，并鼓励他们要罢工到底。同时，盐业工会也在报上发表《公启》，特定于5月17日召开全省工会援助罢工大会。

罢工的声势越来越大，盐东会便决定勾结广州政府中的反动势力镇压罢工。盐东会为当时的北伐军捐助了一大笔款，收买了一些警察，要求警察来镇压盐工罢工。5月17日，广州政府召开省务会议，讨论盐工罢工的事情。广州警察局长魏邦平提议工人“聚众闹事”，应由警察局追究其责任，如仍不服从，转送法庭依法处断。到会的代表表示同意。

就这样，广州盐业工人罢工遭到了广州警察局的残酷镇压。许多罢工领导人被捕，在警察局遭到毒打。工会接连被封闭。盐业工人罢工在反动势力的压迫之下，坚持了15天，最终以失败而结束，但它在当时广东工人运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广东工人第一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等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罢工，标志着广东工人运动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注释：

①②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7月27日，1921年8月7、8日。

③《劳动周刊》，第10号，1921年10月22日。

④汉口《大汉报》，1921年12月5日。

⑤上海《时报》，1921年12月12日。

⑥陈达著：《中国劳工问题》，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182页。

⑦《劳动周刊》，黄爱、庞人铨纪念特刊号。



党为组织发动工人运动而做的宣传

五四运动使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加紧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就创办了一些工人刊物，如，1920年8月15日在上海创刊的《劳动界》周刊，1920年10月3日在广州创刊的《劳动者》周刊，1920年11月7日在北京创刊的《劳动音》周刊。

共产主义小组通过这些刊物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对工人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极大地启发了工人的觉悟。

一些文章向工人阐明了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的秘密，进而论证旧社会制度的本质及其不合理性。李汉俊就在《金钱与劳动》一文中就指出，"无论什么东西，工人多加一点劳力，就要多贵一点。所以钱不是什么尊贵的东西，他不过是代表劳力的东西"。既然这样，"何以一天到黑一点事都不做的人，反有钱用，一天做到黑的工人和农夫反没钱用呢?""何以只有钱不做事的人，人人反要尊贵他，叫他什么老爷太太小姐，用劳力的工人农夫，人人反轻视他，叫他做下等人呢?"[①]有的文章还指出，资本家之所以能对工人肆行剥削，是由于"资本家生产制"造成的。"'资本家生产制'这一制度，就历史上说，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东西。旧的社会组织，靠他去打破。到后旧组织打破了，旧组织下面发生的旧思想也跟着崩坏了的时候，这'资本家生产制'本身的罪恶，也就完全被世人经验出来。于是它本身也免不了灭亡的浩劫"。[②]

一些文章向工人揭示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替代，帮助工人认识实现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有的文章指出，社会问题和劳动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法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到那个时候"大家都要做工，都能得饭吃得衣穿"，所以，"我们要知道，实行社会主义，是我们劳工的责任"。[③]一些文章宣称：中国工人阶级完全有能力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历

史使命担当起来。“现在世界已经有了真正纯粹由农工劳动，由穷人作主的地方了（便是北边的俄罗斯）。既然有了这样的好榜样，你们为什么还不努力?”要知道，“这一群能作的，别的群是没有不能做得的”。④

一些文章向工人宣传团结斗争的意义以及争取自身解放的途径。陈独秀在《劳动界》第2期上发表的《真的工人团体》一文中提出：“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觉悟的工人啊！赶快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啊！”⑤还有人在《劳动界》第7期发表文章指出：“劳动者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改善自己的境遇，唯一的靠着，就是‘联合’”。“热心联合的是好友！反背联合的是叛徒”。⑥

1921年3月初，上海法商电车工人举行罢工，李汉俊发表了社论《我对于罢工问题的感想》和评论《法租界电车罢工给我们的教训》，驳斥了诽谤工人“没有团结性”，“没有知识”等论调，高度赞扬了工人团结一致的斗争精神，他指出：“我们对于中国社会之运动，所以有莫大希望也是在这里。”称赞罢工的胜利，“是因为罢工同人齐心，稳静之所致”。

不仅有像李汉俊、陈独秀这样的共产主义者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一些工人也积极的投稿。上海《劳动界》第2期专门刊登了《本报欢迎工人投稿》的启事，反映工人呼声，刊登工人来信，上海与外地的许多工厂的工人纷纷来信。该刊前后刊登过30多篇工人的来稿。如，工人冀成的《一个工人的报告》，李中的《一个工人的宣言》、《一个人觉悟》、《现时劳动与劳动者》等。李中以海军造船所工人的名义，在《劳动界》发表的《一个工人的宣告》一文中，主张“我们少数同声同类的工人，再联络多数同声同类的工人，成一个大团体，由我们大团体，要联络他一个大团体，以成一中国之大团体……”。他强调，我们工人要认清本阶级担负的历史使命，做时代“潮流的主人翁”；我们工人“要贯彻我们的联络”，因为“不贯彻联络，就会没有力量”，只有“大大联络”，才能“去解决这个时间和工钱问题”，即改良自己的处境，才能“再去解决那一些‘自己住’‘自己吃’‘自己穿’‘自己管’‘自己驶’‘自己使’‘自己占’的问题，即获得自身的真正解放，使自己成为社会的真正的主人”；我们工人“要奋发我们的热情，”认定“做工是各人的天职，联络是成功的手段，终其身可以不变的。”⑦

这些刊物的文章语言朴素，事例生动，简短精悍，讲的都是工人关心的



事，文章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些对于帮助工人从旧思想的束缚解放出来，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深受工人的欢迎。

但是这些刊物的宣传还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当时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对于中国的国情还缺乏深入细致的了解认识，还不懂得中国革命应该分两步走的道理，许多文章都是不适当地把实行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当前面临的直接任务提出来的。此外，由于北京、广州的共产主义小组中开始时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加入，《劳动者》、《劳动音》上刊载的文章中，有的宣传了无政府主义的错误主张，《劳动界》上也宣传过若干不正确的观点。如，陈独秀就提出“真正从事劳动运动，务必要专心在工会组织和工人生活改良上下功夫，倘若夹杂着政治活动来出风头，那结束必然和国民元二年的工党劳动党一样”等。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我们党为了组织发动工人运动，又创办了许多刊物，加强宣传力度。如，1921 年 7 月北京地方党组织创办的《工人周刊》；1921 年 8 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的机关刊物《劳动周刊》；1922 年 1 月 15 日在北京创办的半月刊《先驱》；1922 年 9 月 13 日在上海创刊的党中央的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1922 年 10 月湖北的《真报》；1923 年 7 月 1 日创刊的《前锋》；192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工人》，等等。

1921 年 7 月，李启汉领导英美烟厂 8 000 工人举行三星期的大罢工取得胜利。在《劳动周刊》创立后，他曾结合斗争实践，发表了《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分邦》、《请看谁打胜》等文章。他在《劳动周刊》第 14 号上发表的《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分邦》一文中提到：“全上海数十万工友们，把什么宁波帮、湖北帮、广东帮、江北帮、苏帮、安徽帮及本地帮等等分成了七零八落，互相排挤、互相斗争，弄成各地工友有互不相容的恶感……总而言之，这种什么帮，都是工友们自己排斥自己，对于资本家是很有利益的，对于工友自己是万分有害的。”工人阶级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并谋求解放，必须要联合起来，结成团体，但“这种帮的结合是不可以保卫自己，反足以害自己同类的。”他指出，工人阶级要结合团体，“非要产业的结合到全体的结合不可……就是一个产业底下的工人，部分男女地域，都联合起来，结成一个大团体，再与别种产业的团体大大联合起来，成一个世界全体工人的大大结合。”文章最后号召：“工友们！快快觉悟起来呀！快快革命

起来！快快结合产业团体，达到全世界的大联合！谋人类真正的幸福！”[8]他在《劳动周刊》第16号上发表的《请看谁打胜》指出：工人阶级要解放，就要“结合产业的团体……才能够罢工；要联络全路的全体工友们在一个团体……才能够打胜仗，得胜利；更要联络相近的同业工友的团体……或更进而联络全国、全世界的同业工友的团体，以为自己的后援，免得遭他种的破坏。”总而言之，工人只有按产业组织团体，才能打胜仗，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和解放。[9]李震瀛也在《劳动周刊》第16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诸位呀！纺织工又轧死一个》的文章。文章就内外棉五厂一位女工被机器轧死的事件指出，世界上没有人能保护共同患难的工友们，只能靠工人自己保护自己，而自保的办法，就是建立团体或工会。

1921年11月至1922年5月，陈独秀在发表了10多篇论述工人运动的文章。其中尤以1922年5月1日他在《先驱》杂志第7期发表的《告做劳动运动的人》最为重要，这是一篇对工人运动具有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献。文章从7个方面提出了从事劳动运动所应遵循的原则。文章提出，现在的所谓劳动运动是以工厂、矿山、交通等产业工人为中坚，“无产阶级尚失了这个中坚，便没有和资产阶级战斗的能力”。文章指明了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自然是要造成劳动者的国家”。文章阐明了对各党派应该采取的不同态度。“劳动者在自己阶级（即无产劳动者阶级）没有完全力量建设革命的政府之前，对于别的阶级反抗封建式的政府之革命党派，应该予以援助”。但也提出应反对基督教会及反革命的顽固党、不亲近革命的社会党，不相信无政府，“劳动者所最应该亲近的，是革命的社会党——即共产党，因为他们是想用激进的革命手段，推翻掠夺劳动者的资产阶级，建设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的世界的。”文章还阐明了当前争取8小时工作制对工人切身利害的关系等问题。这些对于正在兴起的中国劳动运动，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具有的指导意义。

李大钊在1922年五·一劳动节发表了《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一文，文章明确指出，五·一劳动节“是资本家的厄日”，但它是“ 工人站起来的日子，是工人扩张团结精进奋战的日子”，中国工人阶级应该以斗争来纪念五一，而不应该让“这个日子毫无意义的粉饰过去”。[10]并特别提出了“反对国际的军阀财阀的压迫”、“改善工人境遇”、“八小时工作”等斗争口号，号召中国的工人阶级为此而奋斗。李大钊的这些论述，对于中国工人阶级了解五一劳动节的意义及世界工人运动的发展，推动中国



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宣传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但由于反动军阀的镇压，特别是“二七惨案”的发生，使工人运动转入低潮。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宣告成立。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得组织全路总工会的政治权力举行大罢工。2月7日，北洋军阀直系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血腥镇压罢工工人，共产党员、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等在斗争中壮烈牺牲，造成震惊中国外的“二七惨案”。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各地工会大多被军警捣毁或封闭，工人运动进入低潮。为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号召全国工人团结起来。

1923年2月7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了《告全国工人书》，文章在列举军阀残害工人的大量事实后，指出：“我们何以受这等的压迫，受人不能受的压迫？乃是因为国家的政权掌握在军阀手里，他们有的是军队、警察、兵工厂、监狱，所以能够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我们工人除了两只手两条腿能做苦工以外，什么也没有，所以才受他们这样的任意蹂躏，任意压迫，这就是国家的政权为军阀们独占了，我们没有一点政权的缘故。”号召工人“应该赶快化除地方意见，化除行业的意见，把工人阶级组成一个极大极强的团体，再联合农民商界学界，同心努力，打倒大家的共同敌人军阀，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和政治来代替军阀政治”。

1923年2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为吴佩孚惨杀京汉铁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的通电，这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关于工人运动的重要文献之一。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和残杀工人的军阀。通电坚决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指出“这场野蛮残酷的大惨案，就是前此倡言‘保护劳工’的军阀吴佩孚发纵指使的”，揭露了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及其残杀工人的血腥罪行，并向全国人民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早已告知全国劳工阶级，唯有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保护劳动，为劳工阶级利益而奋斗的党。此外一切标榜保护劳工的党派和势力，都不过是为他自身的利益或他们阶级的利益而实行的一种政策。文章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策略，主张把工人阶级的部分斗争同全部斗争结合起来，把工人阶级的局部利益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主张工人、农民、全国被军阀和外力压迫的同胞们，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建立劳工阶级的革命专政。最后，文章号召：“全国不自由的人民呀！你们

应一律准备和争取自由的先锋军——工人阶级一起来打倒残杀工人的军阀吴佩孚、曹锟呀！打倒一切压迫工人的军阀呀！”

1923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五一敬告工友》书，号召“患难相依之全国工人阶级和全世界工人阶级均应团结一致，不相分裂，方能合力向资本帝国主义及军阀反攻！”提出的口号为：“全国工人大团结！”“打倒军阀曹锟吴佩孚为京汉工友报仇！”“恢复全国总工会！”

二七惨案以后，陈独秀等人对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的形势表示悲观失望，对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偏低，对工人阶级的认识和态度，也开始明显地向右转。从过去片面夸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消极作用，转变为夸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积极作用，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1923年4月25日陈独秀在《向导》周刊第2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文章，文章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见解，如，肯定中国需要进行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强调了资产阶级要与无产阶级携手，打倒国民革命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等思想，这对于国共合作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篇文章也开始暴露出陈独秀的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观点。

邓中夏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主要负责人，曾经领导了多次工人罢工运动，通过罢工斗争实践，他对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深切的感受和正确的认识。针对陈独秀的错误认识，邓中夏最早旗帜鲜明地起来反对。《论工人运动》就是其中的代表作。1923年12月15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第9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工人运动》的文章，该文高度评价了中国工人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文章指出：由于工人所受的压迫，比任何阶级都要残酷，要深刻，所以工人决战的毫不逡巡踌躇的态度，也比任何群众所做的要勇敢，要坚决。文章列举从香港海员罢工到京汉铁路罢工的大量事实，明确地指出：“我是曾经做过工人运动的人，据经验告诉我，使我深深地相信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起来进行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都当推工人阶级居首位。”“工人数量虽少，工人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实在比任何群众尤为重要。”“工人群众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中，都站在主力的地位”。于是，他号召：“要革命，非特别重要工人运动不可”，革命青年“除做别种群众运动外，尤应特别注意工人运动”。邓中夏针对陈独秀在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明显地向右转的情况指出：“不幸京汉铁路失败以



后，许多社会运动家不免动摇减少了他们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观念与热心，这未免太没有信心与毅力了。总而言之，不论革命的政策为了应付时局的必要而如何变更，然而工人运动却是任何革命方式之下，应该特别重视而不可变更的。不然，如此革命的基本势力犹不注全力使之更强大、更发展，要漫然高唱什么样的革命，终归是建屋于沙土之上。”他对因罢工失败而垂头丧气的人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你们因稍稍受了一点波折，便认为此路不通，要另辟他路，我恐怕你们再革命一万年，也不能成功。”

文献标注：

①②③④⑤⑥⑦《劳动界》第 2 期、第 10 期、第 15 期、第 6 期、第 2 期、第 7 期、第 7 期。

⑧《劳动周刊》第 14 号（1921 年 11 月 19 日）。

⑨《劳动周刊》第 16 号（1921 年 12 月 30 日）。

⑩《李大钊选集》，第 386 ~ 387 页。

香港海员大罢工　工人运动进入第一次高潮

1922 年 1 月 12 日到 3 月 8 日的香港海员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直接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起点。这次斗争，坚持了 56 天，取得了完全胜利。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了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进一步认识了自身的力量，提高了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推动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出现。

香港海员大罢工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有深刻的经济、政治根源，是和当时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

在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和轮船资本家残酷压迫下，香港海员的生活十分痛苦：第一，是工资微薄。当时工人工资每月大概在 30 元左右，而物价又逐年飞涨。这样，海员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已经不易了，若有家属就更加困苦不堪了。第二，是包工制的剥削（粤语叫包工为“洗马沙”）。海员中有所谓的“洗马沙馆”、“君主馆”、“兄弟馆” 3 种包工馆。前两种斗鱼轮船公司相勾结，克扣海员的工钱，后一种虽比较公平，但“管理先生”管理先生积久则把持馆务，从中渔利剥削工人。上述 3 种“馆口”，香港有 130 多处，前 2 种最有势力，势力最大，剥削也最重，海员在包工制的剥削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第三，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中国海员与白种海员虽做同样的工作，并不能得到同等的工资，通常是十与二之比。待遇更是悬殊，如住房，白种海员一、二人一个房间，中国海员则是 10 余人一个房间；而且中国海员住房不是火舱附近，便是空气与光线不足之处。沿海和内河轮船上的海员没有房间住，货堆上、通路傍、煤炭里，便是他们的卧处。船上的伙食也分为几等，船上专门为外籍职员、海员设置餐厅用膳，伙食很好，又有华人侍仔服侍；而中国海员的伙食却十分粗劣，吃饭时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只好蹲在地板上，或缩在自己的床铺上吃饭。而且经常遭受凌辱打骂及



罚金等酷虐待遇。外国轮船资本家、外国旅客经常当面辱骂中国海员为“劣等民族”、“下贱人”。轮船经过外国一些港口时，船主往往不准中国海员随便上岸，有时还要对中国海员实行“通咽喉”、“验肛门”等侮辱人格的检查。有时中国海员侥幸被允上岸了，在路上行走时也经常受到各种侮辱，不准随便进入高级的酒店、理发馆以及戏院、公园等公共场所。第四，是失业的威胁。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农业与手工业纷纷破产，沿海一带因破产而失业农民及手工业，群趋大都市找寻工作，大都市里经常的有广大的劳动后备军。香港一处，海员失业的经常有一两万人。资本家与包工者恃有此经常的广大劳动后备军，便肆无忌惮的剥削在业海员，如有不满，便被无故开除。这些痛苦早在广大海员中埋下愤怒的火种，成为香港海员大罢工的直接原因。

香港海员大罢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国内外革命潮流的影响和推动。国外，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各国工人罢工风起云涌，香港海员来自世界各国港口，首先受到这种革命潮流的影响。国内，“五四”爱国运动的高潮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各地工人罢工斗争的发展也使香港海员受到很大的影响和鼓舞。

香港海员大罢工主观上的原因是香港海员此时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工会组织。当时中国共产党虽然还没有在香港海员中进行宣传和组织，但经过苏兆征、林伟民等积极分子的宣传和组织，1921 年 3 月，“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在香港成立。海员工会会址设在香港中环辅德道中 139 号 3 楼。海员工会刚成立时，仅仅允许在海外做工的香港海员参加，后来，国内的珠江、长江、黄河、黄浦江的中国海员也陆续加入工会。于是，海员工会相继在广州、上海、汕头、香山等地成立了工会分会，影响日益扩大。以工会名义同轮船公司进行过几次交涉，均取得胜利。因此，海员对工会的信任日益加深，加入工会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在组织方面为这次大罢工创造了条件。

1921 年 5 月 17 日，海员工会干事部会议通过了向轮船公司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并征求海员的意见以便采取共同行动。6 月 4 日，海员工会召集工会干事部及会员大会进一步讨论该问题。大会热烈拥护这一措施，并通过成立“海员加工维持团”作为“叙议加工进行事宜”的专门机构。会后发表了《海员加工维持团宣言》，《宣言》着重阐述了工人加强团结和有组织地进行斗争的重要性，还介绍了各地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况。另外组织了“征求队”、“劝进队”、“宣传队”、“防护破坏罢工队”、“交通队”以及各

种秘密机关，在广州设立罢工总办事处，接待罢工回广州的工人。派人到各埠个船报告工会情形及罢工准备情形，还联络国内其他运输工人和外国海员及各国工会，争取他们的援助，募集罢工经费。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后，海员工会于1921年9月正式向轮船资本家提出三条要求。然而，轮船资本家拒不答复。11月，海员工会再次向轮船资本家提出要求，就在此时，各轮船上的外国海员增加的15%的工资，而香港海员的要求却被拒绝。1922年1月12日上午，海员工会第三次向轮船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同时限令在24小时内给予答复，否则罢工。可轮船资本家仍不答复，于是，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了。

这次罢工首先发难的是“泽生”号轮船，领导人就是苏兆征。罢工开始后，海员工会发出《罢工宣言》和停工规则。从1月12日下午5时开始，所有从香港开往广州、江门、梧州等地的内河轮船及从外埠开往香港的英美法日荷等国的海洋轮船，船上的中国海员都相继罢工。最初参加罢工的轮船共90多艘，人数约1 500人。在一星期内，罢工轮船增至123艘，人数增至6 500人。罢工的影响迅速波及新加坡、上海等港口，从香港开往这些港口的轮船一经靠岸，中国海员立即实行罢工。汕头海员也加入罢工行列。从欧美开往的香港的轮船，船上的中国海员在途中听到消息后也纷纷作好罢工准备，船一到香港立即参加罢工。

广州各工会及其他群众团体积极准备协助香港海员的罢工斗争。广东政府对此次罢工也表示支持。陈炯明令广东政府每日借出数千元作为罢工经费，企图以此换取香港海员对他的好感，并利用海员来反对孙中山。工会巧妙的运用此援助，但并不为他所利用。

香港海员大罢工后，香港与外地的海上交通几乎陷于断绝，为了有效地对香港英国当局和轮船资本家施加压力，迫使其接受海员的要求，立即对香港采取封锁政策。这使得香港的生活物资供应紧张，物价飞涨。

香港海员大罢使轮船资本家恐慌万分，要求港英当局出面制止，但港英当局的阻止失败。之后，他们进一步采取的压制和威胁手段，1月16日戒严香港，1月17日，港英当局发出一个通告，提出轮船资本家的加薪条件，但与海员的要求相差太远，海员工会拒不接受。

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为了迫使海员就范，便前往上海等地招募事业海员来取代罢工海员。在港英当局的授意下，由买办把持的工人职业介绍所“香港宝泰公司”发出急电，要上海的流氓、包工头桂阿茂在上海招募新工



人以解除困境。海员罢工领导早已预料到他们会用这一故伎，设法阻止新工人到香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时发动上海工人成立的“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开展支援香港海员斗争的各种活动，对港英当局招募工人破坏罢工的阴谋及时采取措施。最终港英当局的阴谋破产了。

1月27日，香港运输工人举行了同情罢工，这就使罢工人数增至3万人以上。

罢工声势越来越大，港英当局十分恐慌，决定进行野蛮镇压。2月1日，港英当局以海员工会“运动他项工人罢工”、“危及香港之治安与秩序”为名，悍然宣布海员工会为“非法团体”，封锁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几天后又以同样的理由，把同情罢工的同德工会、海陆理货工会、集贤工会也解散了，并逮捕罢工领袖和工人，拆去工会招牌。

海员和运输工人坚持罢工使轮船资本家在经济上受到巨大损失，香港不少商业资本家经济也受到影响，因此纷纷要求港英当局同罢工海员谈判。此外，广州一些绅商和上海的广东商人也要求早日解决罢工。港英当局面对如此日益严重的局面，眼看高压政策无法将罢工镇压下去，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只好暂时收起高压政策，改用“调停”、“谈判”的方法来对付海员大罢工。港英当局本想在“调停”、“谈判”中玩弄欺骗、利诱、行贿等花招使海员代表落入他们破坏罢工的圈套，但海员代表苏兆征等人坚定立场，机智应付，使得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玩弄的“调停”、“谈判”骗局再次破产。

香港海员在罢工中不仅要与强大狡诈的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斗争，还要克服重重困难，首先是严重的生活困难。在罢工前虽已筹集罢工经费，但经费还是不够。在罢工中，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曾向罢工海员捐款150元，李启汉受中国共产党委托到香港慰问罢工海员。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大力发动各地工人支援香港海员罢工。香港海员罢工还得到海外华侨和各国工人的同情和支持，不少华侨纷纷汇来捐款，许多国家的工会组织也发来电报进行慰问。这些使得海员感到自己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工人作后盾，罢工情绪十分高涨。

港英当局的阴谋一次又一次被揭露后，引起香港各界工人、广大市民的公愤，决心以实际行动支持香港海员罢工。截止到2月10日，由各国港口开往香港或香港本埠的轮船，因罢工而停泊在香港海面上无法启航的猛增至168艘，货物26万余吨。其中，英国轮船76艘，货物12.7万余吨。罢工使

5 条太平洋航线和 9 条近海线陷于瘫痪。3 月 1 日，香港全市工人同情罢工，罢工人数激增至 10 万人以上。香港全市工人同情罢工实现后，罢工工人纷纷离开香港回广州。港英当局为防止工人出境，便封锁香港，禁止船只进出。罢工工人便步行回广州，3 月 4 日，罢工工人步行到沙田地区时遭到英国军警阻拦，当场打死四人，打伤几百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沙田惨案”。消息传到广州后，罢工海员更加愤怒，决心与英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罢工总办事处一面督促广东政府向港英当局提出严重抗议，一面发出通电向国内外人民揭露事件真相，呼吁支持。

从这次罢工开始到“沙田惨案”发生，港英当局对付罢工的政策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欺骗复工，其次是重招新工，实行破坏分裂活动，然后是武力镇压，实行封闭工会并逮捕工会领袖，再就是玩弄“调停”阴谋，最后开枪屠杀，造成“沙田惨案”。可是，这一套欺骗、分裂、镇压、调停、屠杀都失败了。港英当局走投无路只得答应海员工会早日提出的恢复工会原状、送还工会牌子等 9 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请海员罢工广州总办事处派代表来香港谈判。

3 月 2 日，广东政府表示愿意“调停”，指派交涉署特派员陆敬科为代表参加谈判。海员工会派 4 名代表参加谈判。海员代表到香港后，同港英当局达成协议，成立公断处。公断处由林伟民等四位海员代表、广东政府代表陆敬科、英国总领事代表詹美逊、香港华民政府司夏理德、外国船主代表、中国船主代表等人组成，负责商谈解决罢工的有关问题。3 月 4 日，谈判在香港大会堂举行。经过双方多次会议协商，到 3 月 5 日达成协议，订立条约，3 月 8 日在香港大会堂签字。船主同意各航线海员的工资分别增加 15% 到 30%，恢复海员工会，释放被捕的工会办事人员，抚恤“沙田惨案”每个死者家属 1 000 元。至此，谈判结束，以海员的胜利告终。3 月 8 日，广州各阶层群众 10 万人余人隆重举行欢送海员复工大会。这样，从 1 月 12 日起到 3 月 8 日止，历时 56 天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以取得重大胜利而宣告结束。

由于当时国内外革命潮流的激荡，全体罢工工人的团结一致与坚决斗争，罢工领导的坚定果敢和机智多谋，国内外人民的巨大援助使得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巨大的胜利。这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这次罢工按其性质虽是增加工资和改善生活待遇的经济斗争，但实际上却带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意义。罢工爆发后，代表外国资本利益的港英当局使用了一切手段进行破坏和镇压，使得罢工由原来的经济斗



争，进一步发展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

这次罢工，首先，在政治上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的气焰，迫使它第一次在中国工人阶级面前低头，接受海员的合理要求。事实证明，只要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斗争到底，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其次，在经济上也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

罢工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工人的斗争意志，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迅速高涨。以这次罢工为起点，全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很快形成了。从1922年初到1923年2月的整个罢工高潮中，全国大小罢工共达100次以上，参加罢工的人数达30多万。同时还推动了工会组织的发展。1922年，全国各地组织起来的工会达100多个，会员达八九十万人。

罢工的胜利促进了国共两党开始走上寻求联合的道路。在海员罢工前，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共一大《决议》中有关革命策略的规定，对当前各党派包括对国民党都持不合作态度。孙中山也没想到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任何联系。这次罢工的胜利启示国共两党联合反帝的重要性。罢工胜利后，共产党开始酝酿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为以后国共两党合作铺平了道路。

罢工的胜利及其经验教训，有助于日后广东人民革命斗争的进行。1925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就是直接吸收了香港海员大罢的斗争经验。香港海员大罢的胜利还促使广东政府取消了中国刑律关于罢工治罪的反动条文，使广东工人运动得到了罢工和合法权利，更有利于广东工人运动的发展。

香港海员大罢虽然胜利了，但在罢工结束不久，港英当局和轮船资本家就拒不履行他们与海员签订的条约。这场经过艰苦斗争取得的胜利之所以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和实现，是因为罢工结束后，海员真正的领袖苏兆征等人回船做工去了，林伟民去上海筹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总会上海支部，后成为会长，留在上海。剩下的人，如陈炳生、翟汉奇等人骄傲自满，以为大功告成，便盘踞工会，盗用公款，变成工贼。帝国主义、资本家、包工头从外部进攻，工贼从内部破坏，使胜利成果完全被敌人夺取。1923年冬，香港海员推选苏兆征从船上下来整顿工会，开展清除工贼、重新巩固组织的斗争。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1922年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并召集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这个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次全国性盛会，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团结和统一的道路，为中国工运和工会组织的统一奠定了基础，直接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卷土重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他们强迫中国与之缔结不平等条约，派遣军队来华，并获得租界和领事裁判等特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灾难。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开设工厂，奴役中国工人。中国工人如有反抗，他们就利用特权进行压迫。他们还输入大宗洋货，使小商人及手工业者以及农民陷入失业的困境。这就迫使一部分人沦为帝国主义的奴隶，更加重了对中国工人的压迫和剥削，使工人的生活更加困苦艰难，同时也客观上使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逐步壮大。

自香港海员大罢工后，中国工人运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并迅速进入高潮。为了更好的推动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需要工人组织的团结和统一。但是当时中国工人的组织程度还比较低、力量比较分散。此外，当时的工人运动内部，不仅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真正的工会组织，还有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资产阶级、投机客等为了利用工人阶级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及私利组织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并混在工人运动中，它们有的为了支持国民党的政治活动，有的为了鼓吹无政府主义，有的为了推行劳资合作，有的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野心，尽管这些团体形形色色、宗旨不同，但他们的活动在工人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反帝反封建的目标下，争取并团结它们及其影响下的工人群众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1922年1月21日，在共产国际发起和指导下，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国也派代表团参加了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最后大会通过了决议和宣言，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号召远东被压迫民族同国际无产



阶级联合起来，实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会议期间，列宁带病接见了部分中国代表，勉励中国工人阶级同革命人民团体一致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这次会议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共产党，使得建立民主革命联合战线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上了。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其在各地的分部成立之后，其成员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在各地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出版了工人刊物，积极宣传无产阶级思想，发动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并领导工人进行了一些斗争，赢得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拥护，在工人运动中树立了威信，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发起召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奠定了基础。

1922 年 4 月初，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着手发起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与上海、广州及北方的各大工会团体取得联系，说明了召开全国劳动大会的原委，以便取得它们的响应和支持。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通告各地党组织，“阐明这次大会的意义；要求中共各地区委员会协助工会选派代表出席”。[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 4 月 10 日依据“不分何党何派，只要是工会便邀请其参加”[②]的原则，向全国各个工会团体正式发出通告。宣布大会的宗旨是：“（一）纪念五一劳动节；（二）联络全国工界感情；（三）讨论改良生活问题；（四）各代表提议事件。”[③]

1922 年 4 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局的陈独秀、张国焘，各地党组织的负责人，以及少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共 20 多人。会议主要就建立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最后会议将建立反帝反军阀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思想定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指导方针。

为了更好的接洽各地工会代表，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设立了招待处，为北方代表南下提供方便。还在广州设立了大会筹备处，联络广州各大工会团体参加大会的具体筹备事务。

1922 年 5 月 1 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市海珠区滨江西路 230 号河南和珠社广州机器工人维持会礼堂如期召开。来自 12 个城市，共计 173 个代表出席了大会，他们代表了 110 多个工会、34 万[④]有组织的工人。大会代表从政治背景而言，有共产党派、国民党派、无政府主义派，有毫无主义和信仰的招牌工会，还有一些劳资混合组织的团体；从地区划分而言，广

州、香港两地的代表最多，占全体代表的80%，其他代表来自上海、北京、天津、唐山、太原、武汉、长沙、南京、山东、江西等地；就行业而言，铁路方面有京汉、京奉、正太、陇海、粤汉北段等录各工会的代表；矿山方面有安源各工会代表，还有各地工人企业工会的代表以及海员工会代表。总之，代表的范围很广泛，无论从党派关系来说，还是从地区划分来说，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召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不分何党何派，只要是工会便邀请其参加”[5]的原则。

劳动大会从5月1日到6日共进行了6天。5月1日上午10时，劳动大会的全体代表和广州的50 000多工人在第一公园进行了示威游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等亲临现场指导，在“五·一”纪念大会上向劳动大会的全体代表和广州工人群众发表演说。陈独秀的题目是《劳动节的由来与意义》，张国焘的讲题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必要》。[6]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支部的领导谭平山打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5月2日上午9时，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河南机器工会正式开幕，中国共产党人在会场中特别布置了醒目的标语：“世界劳动者及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呵！”“打倒军阀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主义！”[7]中共领导人张国焘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的身份宣布开会，然后报告召开大会的经过。张国焘首先总结了近年来中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况，特别指出香港海员罢工和上海纱厂罢工斗争取得胜利所起的模范作用，号召各地工会学习他们团结奋斗的精神。他提请全体代表要借鉴世界劳动运动的经验，结合本国斗争的实践，切实完成大会的任务，他向大会提出的任务突出了团结和组织的问题。接着，张国焘还提议推举大会主席团主持会议。在具体人选上，中国共产党事先拟定了包括谭平山、黄焕庭、林伟民、谢英伯等5人为主席，另设书记长2人的名单，交由一个建筑工会向大会提出。名单一提出就引起了争论。其中，国民党派工会代表与无政府主义派工会代表的冲突最为激烈，国民党派要求本党工会代表当选，无政府主义派则反对，特别是反对国民党政客谢英伯。面对这种情形，中国共产党人一面立即向争论的代表加以劝解，以肯定和赞扬的态度保持代表们对大会的积极性，做了大量工作；一面又毫不犹豫地派自己的党员出任大会主席，以结束纷争。由于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工人运动取得的成绩以及在大会中的出色表现，共产党的威信很高，共产党员出任主席，由于各派都表示同意，主席团问题得以解决。



下午2时，国民党在亚洲饭店举行欢迎会。

5月3日上午9时，大会继续在河南机器工会举行，选出了提案审查委员会。由于各地各派代表带来很多提案，大会主席谭平山提出组织提案审查委员会进行审议，以保证大会各项工作的落实和大会议程的顺利进展。经过民主选举和表决，大会设立了由邓汉兴、谭平山、潘兆玺、张理全、张国焘、区云轩、黄汝谦、彭大汉、张瑞成、许白昊、李占标11人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其中共产党员占了大多数。下午2时，互助总社在东园举办欢迎会。

5月4日上午9时，大会继续在河南机器工会举行，谭平山作为大会主席号召代表提案，代表们纷纷将自己的提案交由大会主席。下午，广东总工会于本部举办欢迎会。晚上，在亚洲饭店举行海员工会欢迎会。

5月5日上午9时，大会代表在河南机器工会出席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当日也是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周年纪念日，大会也发生争执。国民党工会代表提出全体到总统府庆贺，他们甚至暗怀手枪入场，不惜以武力对付与之争论的与会代表；共产党工会代表主张自愿者去；无政府党工会代表则根本反对，为此争执不下，最后还是按照共产党的主张，采取自愿的原则，解决了争论。当天，张国焘率领外省工会代表到总统府谒见孙中山。下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东园举行欢迎会。5月5日晚上，机器工会在河南机器工会举行欢迎会。

5月6日上午9时，大会在河南机器工会闭幕。大会通过了《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等决议案，谭平山宣布大会闭幕。下午，广州全省工会于西园、车衣女工会于本部分别举行欢迎会。

这次劳动大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性的各派联合参加的聚会，在会议中发生一些争论是在所难免的。中国共产党是有威信的，始终顾全大局，把握大会的主方向，在会内外做了大量工作，妥善解决了一系列的问题。最后在主要目标上达成了一致，保证了这次全国劳动大会预定议程的顺利进行，基本完成了大会的重大历史任务。

这次劳动大会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会议期间，代表们提出了很多议案，经提案审查委员会的审核，提交大会讨论并通过了10个决议案：1. 罢工援助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启汉提出）；2. 八小时工作制度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启汉提出）；3. 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会代表邓中夏提出）；4. 统一中国劳动歌及劳动旗帜案（唐山京奉

路机务工人同人联合会代表李树彝、徐家棚粤汉路工人俱乐部吴海堂共同提出)；5. 湖南黄、庞被杀及香港罢工沙田海员被杀案（湖南劳工代表张理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代表苏兆征共同提出)；6. 组织全国人力车夫联合会案（汉口人力车夫总会代表彭大汉提出)；7. 中国在相当时期内的劳动运动，只作经济运动，不与闻政治案；（徐家棚粤汉路工人俱乐部代表吴海堂提出）8. 尊重劳动节及惩戒工界虎伥案（中国劳动同盟会沪总部代表谭竹轩提出)；9. 明年五一节在汉口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案（广东中国机器总工会代表邓汉兴提出)；10. 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案（公共临时动议)。

大会为了把会议精神及各项要求布告全国工人阶级，号召全国工人为实现大会的要求而共同奋斗，经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启汉提议，由秘书处起草公开发表了《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言》。《宣言》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遭受苦难的根源以及摆脱苦难的道路。《宣言》向全国工人阶级指出，工人只有削平帮派，消除隔阂，团结起来，共同奋斗，才能摆脱资本家的压迫。《宣言》着重总结了香港大罢工的经验，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工人阶级的敌人，号召全国工人团结起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结合一切力量与资产阶级和压迫阶级进行不懈的斗争。

这次全国劳动大会存在一些缺点：它着重讨论了工会组织方面的问题，但没有提出一个发动、组织工人起来进行斗争的纲领；大会虽然接受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口号，但没有明确的提出工人阶级当前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具体要求。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这次大会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次大会实际上第一次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虽然出席大会的代表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政府主义者、流氓、市侩的招牌工会代表、工商组合的团体代表，成分非常复杂，在会议期间也发生了一些冲突，在意见上产生了一些分歧，但中国共产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代表在大会中还是受到代表们的尊重，并占了主导地位。

提高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威信和地位。大会同意“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⑧]事实上就是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确立为全国工人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此外，每个决议案差不多都有“大会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如何如何”的字样，根据这些决议案，“实际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已有指挥全国职工运动之权”，这



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此次大会上取得的重大胜利。

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明确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帝饭军阀斗争中必须联合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建立民主革命统一战线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各级工会组织的动员组织下，大会引导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走上全国团结的道路，各党各派影响下的工人组织，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无疑，这次大会的成功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会后中国工人罢工斗争的迅猛发展就证明了这点。

注释：

①张国涛，《我的回忆》，第217页。

②⑤⑧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97页、497页、485页。

③上海《国民日报》，1922年4月15日。

④该数据参见《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言》，载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6月8日），另据1926年5月《向导》周报第155期所载，为20万，邓中夏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为27万，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5月24日）载为30余万。

⑥⑦《广东群报》，1922年5月2日。

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5月5日至10日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性的青年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

1920年8月，上海有8个青年社会主义者，[①]为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组织了一个团体，即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不久，北京、广州、长沙、武昌等处就有同样的团体发生，与上海的团体相响应，于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宣告成立。那时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仅仅是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没确定是那一派社会主义。所以成分很复杂，有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工团主义者、毫无主义和信仰者，还有其他莫名其妙的分子。如此复杂的成分就使得意见很难一致，常常发生冲突。在这种状态下面，团体规则和团体训练，就不能实行，团体的精神也非常不振。到了1921年5月，由于内部成员在某些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分歧太大，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只得宣告暂时解散了。

团体虽已解散，但是其中一部分具有革命精神的分子，却总在试图恢复。正在此时，张椿年同志从苏联回来，受了国际少年共产党的命令，要在中国组织少年共产党。将这件事与一部分老团员商议，大都决定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内容上加以整顿。于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于1921年11月正式恢复。首先恢复的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统先后恢复了。

由于受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中国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传播，使得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日益增加起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恢复，是一部分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发起的。他们总结了第一次社会主义青年团失败的教训，所以在恢复的时候，就主张确定主义，使成分不至于复杂。于是他们就确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不过表面上却说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根据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社会主义青年团



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也是共产党的预备队。中共中央局的方针是不愿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与它分庭抗礼的第三党，要求它能完全遵照中共中央局的领导进行工作。

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过3年左右，可由于受了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竟能在最短期间发展起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日益增加。因此，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很快有了进一步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即采取过一些步调，调整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淘汰一些不稳定分子，形成了各地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机构，定名为干事会。上海、北京、广州等主要地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干事会还于1922年初创办了青年刊物。各地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干事会纷纷组织各种活动，其中1922年3月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干事会为了对抗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准备于4月4日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第十一届世界大会这件事，发动北京学生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并发表宣言。后来，这个同盟又扩大成为反宗教大同盟。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分支组织遍于全国各地。在这一反宗教运动中，各地基督教学校曾发生一些开除学生的事件。这就给予社会主义青年团学生鼓动宣传的机会，更使这一运动趋于激昂。

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地方团成立者就有17处（上海、北京、南京、天津、保定、唐山、塘沽、武昌、长沙、杭州、安庆、广州、潮州、梧州、佛山、新会、肇庆），全国团员达5 000余人（大多数为工人，次之为学生）。其他各处将成立而未正式成立者尚很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达到这个程度，就感到从前的组织和训练有不能应付的地方，需要建立更稳固的基础。于是，上海临时中央局就议决定于1922年5月5日召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本团根本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原定在上海召开，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谭平山在致团中央的信中，建议广州比较自由，召开大会会更好一些。结果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能选择在广州召开，充分体现了党对广东青年运动的肯定和重视。

广东独特的政治环境，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提供了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控制之下，中共党、团力量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然而，深受孙中山民主思想影响的广东，革命的形势却迅速发展。由于大会的

开幕式与马克思主义纪念大会和欢迎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大会同时举行，与会者不仅有中共中央的重要人物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邓中夏及各地团组织推选出的代表，还有各方面的来宾，共 1 500 多人。举行如此规模巨大、又有影响的会议，在直接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的北平、上海，是很难实现的。更何况孙中山还直接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提供支持，会见并设宴招待与会代表。所以，中央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都于 1922 年 5 月在广州召开，是与广东自由的政治环境分不开的。

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对广东青年运动的重视，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提供了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都十分重视青年运动，1920 年秋，陈独秀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过程中，就开始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 年 7 月，中共一大后，党决定在全国恢复和整顿社会主义青年团。随着广东革命形势的发展，共产党主要负责人和共产国际更加关注广东青年运动的发展。陈独秀则亲自指导和参与广东党、团组织的建设。他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期间，重视培养进步青年，他介绍谭平山任省教育委员会副委员长，由教育委员会拨出经费，举办宣讲员养成所，陈公博等中共党、团员任所长和教员。陈独秀创办这所学校的宗旨和目的，“就是为了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后来有不少人成为共产党、青年团组织的重要干部。为了开好“团一大”和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1922 年 4 月底，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邓中夏等党的主要负责人 20 多人，云集广州，首先召开了广州干部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两会”指导方针以及党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会议的精神在“团一大”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得到体现。《团纲》提出：无产阶级当前的任务是“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这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针，为党的“二大”正式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做了准备。

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广泛传播，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做了思想上的准备。由于广东独特的地理优势，使得广东更先接触西方各种思潮。广东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促进了广东青年的思想觉醒。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传播，为马克思

主义在广东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当时，广东是无政府主义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团内也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占着优势，这些情况严重地妨碍了广州青年团组织的自身发展。1922 年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组，改组后，团章明确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广泛传播，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的召开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展，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做了组织上的准备。1920 年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团员人数曾达 300 人之多，后来虽然解散了，但为广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建准备了干部力量。中共一大后，在党中央、代理团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广东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谭平山，又开始重组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的团员就发展到 400 余人。1922 年 1 月，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在组建，刚组织起来的团员马上投入了支援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斗争中去，表现了极大的政治热情。1922 年 3 月，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暨马克思纪念大会在广州东园召开，赴会者共有 3 000 多人。1923 年 11 月，党的三届一次会上予以肯定，团的“各地工作，以广东最佳，各项活动，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参加”。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所以在广州召开，是各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

1922 年 5 月 5 日下午 1 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在广州东园召开。会议日期共 6 日，5 月 10 日会议结束。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 25 人，代表 15 个地方团组织、5 000 多名团员，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也出席了会议。

马克思诞生纪念大会和欢迎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也在 5 月 5 日这天举行，与会者除本团各处代表外，达 1 500 余人。大会首先由主席张椿年同志致开会辞，然后由来宾、劳动大会代表及本团团员演说。陈独秀在会上做了《马克思主义两大精神》的演讲，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在会上做了《国际帝国主义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演讲。共有 16 人发表演说，大多鼓吹社会革命，真是慷慨激昂，使人奋发。直至 5 时，与会者三呼社会革命万岁而闭会。

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和通过团的纲领和章程，建立团的中央领导机构。从 5 月 6 日起，就连日开会讨论议案，到 5 月 10 日晚上议案讨论完了，

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决议案》、《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决议案》、《关于教育运动的决议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决议案》等决议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指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组织”，它的最终奋斗目标是为在中国建立“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第一次明确地提出“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大会选出团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高尚德（君宇）、方国昌（施存统）、张椿年（太雷）、蔡和森、俞秀松当选为执行委员，方国昌（施存统）被推选为青年团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

5月10日晚大会三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万岁而闭会。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性的青年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成为纲领明确的、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组织。从此，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担负起团结和教育广大青年的光荣任务，带领广大青年积极投入到革命洪流中。

注释：

①据1933年版《陈独秀评论》（第66页）载，可初步推断这8个人是：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俞秀松、叶天底。



劳动立法运动

1922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劳动书记部在全国开展劳动立法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罢工高潮中领导工人阶级利用合法形式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

1922年5月1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没有针对已经出现的罢工高潮制定一个目前斗争纲领，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中国劳动书记部发起劳动立法运动，以此弥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缺陷。

当时许多地方的工人罢工，都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酷镇压。1922年1月长沙华实纱厂工人要求发给奖金和一个月双薪的罢工斗争，遭到军阀赵恒惕的残酷镇压，打死工人3人，打伤数十人，工人运动领袖黄爱、庞人铨惨遭杀害，湖南工会也被查封；同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3月4日，当2 000多罢工工人步行回广州，路过九龙附近的沙田时，遭到英军的射击，死工人4人，伤几百人，造成了“沙田惨案”。工人运动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酷镇压，使得工人阶级更加迫切要求政治自由。

此外，国内的政治局势有利于开展劳动立法运动。1922年上半年，北京政府和广东政府先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南北方都发生了战争，北方是直奉战争，南方是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直系军阀吴佩孚打败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取得了北京政府的大权；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陈炯明宣布取消南方护法军政府，响应北京政府和平谈判的主张，国会不能在广东立足。直系军阀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趁机进行欺骗宣传，宣称恢复国会，制定宪法，并大谈制定法律保护劳工，企图以此笼络工人阶级对其军阀政权给予支持。这就为发起劳动立法运动提供了客观条件。

这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刚从上海迁到北京，在邓中夏的主持下，按照中共“二大”《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的精神，乘机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劳动立法运动。

1922年8月16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全国各个劳动工会团体发出

《关于开展劳动立法的通告》，指出了劳动立法运动的原因。要求各地立即对大纲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结果报告总部，同时，还要求各地向北京国会及全国各工商学界团体、各报馆发出通电，请他们要求将保护劳动者的规定载入宪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了更好地领导劳动立法运动，随即拟定了劳动立法原则四项和劳动法案大纲 19 条，作为这次运动的指导原则和奋斗纲领。

《劳动立法原则》的内容是：保障政治自由、改善经济生活、参加劳动管理、劳动补习教育。[①]

《劳动法案大纲》不仅规定了工人应该具有的权利和劳动时间、劳动待遇等问题，而且还对农民的一些问题作了规定。其具体内容包括：

1. 承认劳动者之集会结社权；

2. 承认劳动者之同盟罢工权；

3. 承认劳动者之团体的契约缔结权；

4. 承认劳动者之国际的联合；

5. 日工不得过 8 小时，夜工不得过 6 小时，每星期连续 42 小时休息；

6. 18 岁以下的青年男女工人及吃力的工作不得过 6 小时；

7. 禁止超过法定的工作时间，如有特别情形，须得工会同意才得增加工作时间；

8. 农人的工作时间，虽可超过 8 小时，但所超过之工作时间的工值，须按照 8 小时制的基础计算；

9. 须以法律担保一般不掠夺别人劳动之农人的农产品价格，此项价格由农人代表提出，以法律规定之；

10. 吃力的工作及有碍卫生的工作，对于 18 岁以下的男女工作绝对禁止，超过法定时间，绝对禁止女工及 18 岁以下之男女工作夜工；

11. 对体力的女工产前产后各 8 星期休工，其他工作之女工产前产后各 6 星期休工，均照常领取工资；

12. 禁止雇用 16 岁以下男女童工；

13. 为保障工人适当以至低线度之工钱，国家须制定这种保障法律，当立此项法律时，须准全国总工会代表主席。无论公私企业或机关的工资，均不得低于此项法律保障的至低限度；

14. 各种工人，由他们的产业组合或职业组合保障可选举代表参加政府经济机关，及选举代表参加政府企业机关及政府所管理的私人企业或机关



之权；

15. 国家对全国公私各企业，均须设立劳动检查局；

16. 国家保障工人有完成参加国家所设劳动检查局之权；

17. 一切保险事件须由工人参加规定之，以保障所在政府的公共的及私人的企业和机关内的工人之损失或危险，保险费完全由雇主和国家出之，受保险者决不分担；

18. 各种工人和雇用工人一年工作中有一月之休息，半年中有两星期之休息，并有领薪之权；

19. 国家须以法律保证男女工人有受补习教育的机会。②

上述两个劳动立法文献代表了当时受压迫受奴役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充分反映了他们要求立即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

1922 年 8 月 17 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京《晨报》发表《劳动法大纲》，号召全国劳动团体行动起来，开展劳动立法运动。

最早响应这个口号的是唐山铁路、煤矿、纱厂、洋灰厂各工会。他们组织了“唐山劳动立法大同盟”，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并通电全国各团体及国会，要求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的 19 条劳动法大纲。唐山工人已经认识到劳动立法运动的必要性，工人若没有法律保护，必是奴隶生活。

铁路工人也指出，《劳动法大纲》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最小”、“最低”限度，必须通过。郑州铁路工人俱乐部呼吁全国工会一致行动，通电国会进行请愿。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北段总部也于 8 月 28 日复电中国劳动组合书记，表示《劳动法案大纲》的每一条都是保护劳动者最紧急、最切需要、最低限度的要求。广大劳动者一定要团结一致，誓达目的。

由于毛泽东的领导，湖南工人不仅参加了全国的劳动立法运动，而且开展了针对赵恒惕的劳动立法斗争。9 月 6 日，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长沙土木工会、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工友协进会、立法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团体，举行了劳动立法运动大会。各团体还联名致电北京国会参众两院，明确指出，劳动者应获得政治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与产业管理、享受补习教育的权利，并表示完全赞成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提出的《劳动法案大纲》，要求参众两院立即通过《劳动法案大纲》，否则全体劳动者将为取得应有的权利而进行斗争。9 月 16 日，各工人团体代表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驻地集会，一致决议成立湖南劳动立法同盟，发表通电，推定起草员，起草同盟章程和针对赵恒惕的劳动法案，将全国的运动和本省

的斗争结合了起来。

武汉工团联合会集合所属工会，即江岸京汉路工人俱乐部、徐家棚粤汉路工人俱乐部、扬子机器厂工人俱乐部、汉阳钢铁厂工会、汉口水电工会、武昌造币厂工人俱乐部、丹水池煤油工人俱乐部、汉口租界人力车夫会、武汉纺织工会等响应书记部通告，一面致电国会请愿，一面组织工人讨论《劳动法大纲》的各项条款，使工人们更好的理解其内容，并愿自觉为之奋斗。

此外，广州、济南、天津各地劳动团体以及上海的进步工会“亦正着手组织‘劳动立法大同盟’，以期贯彻其目的”。[3]

当劳动立法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时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的邓中夏，武汉分部的林育南，上海分部的袁达时，湖南分部的毛泽东，广东分部的谭平山，山东分部的王尽美，联名向国会众议院递交《请愿书》，要求国会在宪法中规定保护劳工的条文。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除了发动工人团体开展劳动立法运动外，还举行了新闻记者招待会，就劳动立法向国会请愿一事，开展宣传攻势，给国会施加压力，促使国会通过劳动法案。8 月 31 日，新闻记者招待会在北京大学第三院进行，邓中夏主持招待会，他向记者介绍了《劳动法案大纲》的具体内容，向记者们作出了要求立法的解释。要求与会记者主持公道，对此事进行广泛的宣传报道。最后，邓中夏还宣布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关于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的下一步计划：即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所属各工会向国会递交《请愿书》；向全国通电，争取全国各界人士对劳动立法运动的支持；在国会讨论这个法案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召集全国工人代表赴京请愿；如国会不通过这个法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立即增加各地代表人数，先举行游行示威，再向国会提出质问。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劳动立法运动中，还十分重视做国会议员的工作。9 月 3 日，在北京举行国会议员招待会，铁路工人代表也参加了招待会，招待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据刘少奇回忆：“书记部为了这个事，请了国会 60 多议员的客，内中有 30 多议员是同情我们的”。[4]

当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致书国会请愿时，有 22 位议员以介绍人名义在请愿书上签名，表示支持。

劳动立法运动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社会各界人士也以各种形式呼吁北京政府制定劳动法规，废除《治安警察条例》，与工人群众遥相呼应，壮大



了劳动立法运动的声势。1922 年 8 月，李大钊、李石曾、胡鄂公等发起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提出民权运动的 4 大目标，其中，劳动立法也作为一个目标名列其中。9 月，杭县律师公会在全国司法会议上指出，《治安警察条例》“虐待劳动工人，献媚资本家，殊损法律之尊严”，要求废除这种法律。接着，北京 72 个社会团体还发起了废除《治安警察条例》运动，多次向北京政府请愿。

事实上，直系军阀吴佩孚所谓“重开国会，制定宪法”，本来就是沽名钓誉、欺骗人民和舆论的政治手腕，他根本不可能接受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提出的劳动法案大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次劳动立法运动虽然不能迫使封建军阀控制下的国会通过这个法案，但它也是在北洋军阀统治下进行合法斗争的一次伟大的尝试，这场空前大规模的劳动立法运动给历史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值得我们加以总结。

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的《劳动法大纲》，由于在工人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深得工人群众的拥护，这实际上弥补了第一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决议中缺乏工人目前斗争纲领的不足，并为下一阶段的劳工运动制定了斗争纲领。

劳动立法运动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及其各地分部在工人群众中的威望。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相对成熟的政治智慧和比较老练的运动方式组织开展劳动立法运动，多次组织各地工会赴京参加会议，商洽劳动立法方案及其应对措施，并在社会各界积极奔走，受到各地工会团体的热烈拥护，在各地工会团体和工人群众中树起了很高的威信。

这次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工人的思想觉悟，使工人群众进一步知道政治自由与经济利益的关系，知道没有政治自由，即使争取到了经济利益，也无法得到保障，因而促使工人更加迫切要求政治自由，极大地推动了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还揭露了北京军阀政府所谓“制宪”和“保护劳工”的假目的，使人民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

《劳动法大纲》虽然代表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缺乏劳动立法的实践经验，所拟定的《劳动法大纲》，不可避免地从外国的劳动法典中摘取某些条文，因此，有些规定显然要求过高，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注释：

①王清彬：《第一中国劳动年鉴》，第2编，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第436～437页。

②《先驱》，第11期，1922年9月3日。

③湖南《大公报》，1922年9月6日

④刘少奇：《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39年5月在延安工人学校的讲演）



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

1840年鸦片战争使西方列强打开了侵略中国的大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战事，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日本企图趁机独占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又卷土重来，争先恐后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社会进一步殖民化。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日本乘西方列强忙于战事，无暇东顾，以订立二十一条约为条件援助袁世凯称帝。二十一条约中承认山东和满蒙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断送了汉冶萍公司和南满、东满及山东的采矿权，延长了南满和安奉铁路和旅顺、大连租界的期限，又断送了吉长铁道经营权和胶济铁路烟台、龙口支线的建筑权。袁世凯死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利用段祺瑞来做工具，1918年供给段祺瑞2 000万元的参战借款，后来又供给以满蒙四路和山东两路借款4 000万元及军械借款4 000万元等。从1913年到1920年，日本对华的公开借款增加了274%，在东北的投资增加了360%～367%，在中国的纱锭增加了132%，在中国的企业数目增加了237%。[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列强的侵略目标又重新移向中国，于是各自操纵军阀，使得军阀间的战争延长扩大。日本以段祺瑞控制的安福系为傀儡企图垄断中国利益，英国也援助直系军阀冯国璋、王士珍以为抵抗，后来奉系军阀张作霖得势，安福系失败，日本又开始利用张作霖为工具，英国也换以曹锟、吴佩孚为抵抗，这只是几个大军阀的斗争，其他各地的小军阀也连年进行混战，同样也都逃不出帝国主义的控制。美国等其他国家决不允许日本和英国独占中国，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巴黎和会与太平洋会议对华问题协议和新银行团的成立。太平洋会议和新银行团成立之后，美国等帝国主义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口号下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又回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瓜分的局面。

这个时期，各帝国主义国家是对华商品输出迅速增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贸易，马上就激增起来。1913年各国输入中国

的货物净值为5亿7千多万海关两，以这年指数为100，一战结束的第二年（1919年）的指数是113.5，1920年的指数是133.7，1921年为158.9，到1922年增加到165.8。中国对外贸易入超的增加更为惊人，1919年入超曾由战前的2亿左右海关两下降为1 618多万海关两，1920年又激增到2亿2千多万海关两，增加了几十倍，1921年入超竟达3亿4百多万海关两。

各帝国主义国家凭借技术优势，产品成本低，国货同外国商品的竞争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在商品倾销的过程中，外国商品又往往以降价为利器，使得民族工业产品无法与之竞争。以火柴为例，中国一等火柴每箱售价32元5角至34元，瑞典一等火柴每箱仅售29元5角；二等火柴，国货售价28元至30元，瑞典售价26元5角；国产三等火柴售价27元至28元，比瑞典的二等火柴售价还高。这样，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商品市场，就被倾泻而来的外国商品夺取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国资本除了在中国的商品倾销继续扩大，投资也进一步增长。其投资的方式，一是直接投资，即在中国直接经验企业和房地产；一是间接投资，即向中国债务人提供贷款，主要是政治性的贷款。其中，直接投资是主要的，但借款等间接投资也占据着重要地位。

据估计，1914年，各国对华投资总额为16.724亿美元，其中，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6国共占97%，其他的小国占3%。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经济势力中，英国依然居于首位，德国由于战败，失去了资本输出的能力；法国由于战争消耗过大，一时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俄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再进行资本输出；日本跃居第二位；美国在战争中也发了横财，成了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这样，在华主要投资的国家只剩美国、英国、日本3国。1920年，这些国家对华投资总额仍达到20.177亿美元。其中，日本投资增长最快，从1914年的2.24亿美元增加到4.664亿美元；美国次之，从6 120亿美元增加到1.211亿美元；英国虽然增长比率不高，但绝对值仍居各国之首，从6.269亿美元增加到7.457亿美元。[②]1920年以后，各国对华投资总额增长更快，1930年，各国对华投资总额达到36.488亿美元。他们投资的重点主要是房地产、金融业、贸易、交通等行业，进一步控制了的中国经济命脉。

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直接经营企业和房地产的资本主要来自中国，并不是从国外汇入的。这种投资，“很大一部分是具有超经济的掠夺性质”，即它们“是利用战争、霸占、欺诈、巧取豪夺等办法掠自中国，是没有输出



的投资”。[3]

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企业，1895 年到 1920 年为 56 家，平均每年 2 家；1921 年到 1930 年为 54 家，平均每年 5 家，速度增加了 1 倍。更严重的是，帝国主义工业投资除了在中国单独开办企业，还大量利用“中外合资”的形式，渗入民族资本企业，进而吞并。从 1917 年到 1927 年，单独由日本帝国主义投资的企业资本增加了 214%，而“中日合资”企业中的日方资本，竟增加了 655%。这种所谓的“中外合资企业”，实际上完全控制在外国人手里，是帝国主义直接压迫中国民族资本的残暴力量。帝国主义在华纱锭数，1918 年为 486 858 枚，到 1922 年增到 879 694 枚，1924 年更进而增加到 1 183 244 枚。增加近 2 倍半。[4]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中国没有帝国主义分设的国际垄断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加强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机构还在中国设立了许多分支。如，1919 年设立的瑞士汽巴公司，1920 年设立的英国卜内门洋碱公司、美国的杜邦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法国的永兴洋行，1921 年设立的英国邓禄普橡皮公司，1924 年设立的德国德孚洋行等，1926 年设立的美国福特汽车公司。[5]在这些垄断组织的控制下，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商店、公司的数目也与日俱增，对中国市场的控制日益加强，威胁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存。

为了扩大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帝国主义还在中国设立了大量的银行。1914 年以前总行有 9 个，1914 年到 1926 年增设了 16 个总行，50 个分行，其中多数是在 1927 年以后设立的。[6]其中有英国的大英银行、通济隆公司；美国的大通银行、运通银行、友华银行；日本的三菱银行；荷兰的安达银行；意大利的华义银行，等等。这些银行是外国垄断资本在中国的指挥机构和执行机构，它们给封建军阀以政治借款，投资于铁路和矿山，发行纸币，吸收存款，独占外汇，控制着中国的金融财政，使中国的金融事业和工业资本完全变成了他们的附属品。从 1915 年到 1925 年，中国政府偿付的外债利息每年竟达 4 400 万银元，这些外债的偿付是以关税、盐税为担保的。而关税、盐税是中国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这样外国列强控制了这两项税收，就等于控制了中国的财政。这些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国吸收存款、发行纸币，然后用中国人的钱在中国投资，获取巨额的收益。这些银行还通过买卖外汇来操纵汇价，垄断中国的国际汇兑。“每当它在中国政府交付贷款时，就故意抬高外汇牌价，以便少付银两，而在收取借款本息时，又故意压低牌价，从

而多收银两”。这些银行还垄断了中国的商业信贷。它们“通过对中国银行的信用往来日益加强其控制，而中国银行同时又对钱庄供给短期信贷。这样，外资银行便与中国的银行和钱庄相联结，造成从都市到农村的金融剥削网，从而垄断了中国国内的金融市场”。[7]

因此，帝国主义国家不仅在商品竞争方面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还在金融财政上控制了中国。

中国现代的交通运输业大部分也被外国资本所控制。1927年，中国全国的铁路里程为13 040.48公里，其中外国资本直接经营的有4 330.25公里，占全部里程的33.2%，外国资本控制经营的有7 666.29公里，占58.8%，两种合计占92%。而中国自主的铁路仅为1 043.94公里，占8%。1926年，全国各通商口岸进出的轮船吨位总数中，外国轮船占80%，中国轮船占20%。1924年，恰和、太古、日清3个外国轮船公司和中国的招商局等在长江航线的总载货量为79 677吨，其中3个外国轮船公司占69%，招商局占24%，其他占7%。也就是说，中国的远洋航线不仅全部被外国轮船公司垄断，连中国内河上最大的航线——长江航线，外国轮船公司也占绝对优势。

外国资本在中国工矿业方面的投资虽然数额不大，但是仍然占有垄断地位。中国生铁的产量，1925年以前，全部被外国资本主要是日本的资本所控制，1926年和1927年，它们所控制的仍高达94.6%和98.4%。[8]在中国的煤矿业中，外国资本直接单独投资或者参与投资的煤矿的产量（包括机械及土法开采），1926年和1927年分别占全国煤矿总产量的53.1%和56%；如单独计算机械采煤的产量，则分别为78.3%和76.4%。[9]中国的轻工业主要是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就在这样的轻工业中，外国资本仍然占据着相当的优势。如，在全国的纱锭总数中，1913年，外厂占41.2%，华厂占58.8%；1927年，外厂占42.6%，华厂占57.4%. 在全国布机总数中，从1913年到1927年，外厂、华厂各占50%。[10]

此外，外国列强还强迫中国增开通商口岸和商埠。到1927年，此类通商口岸和商埠已经达到103处，有的甚至深入到了中国内地乃至边区。商埠的增加，大大地促进了外国洋货的进口，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被外商洋行所垄断，中国的进口贸易总值从1871年到1931年的60年间增加约19倍。中国各商埠的外侨和外商，1913年分别为16万多人和3 805家，到1920年则各增至35万多人和7 375家。



由于帝国主义势力对封建军阀的扶持，使得各帝国主义在华企业不仅资本雄厚，而且享有各种特权，受到封建军阀的保护。在捐税负担上，中国工厂的产品要缴纳重重厘金（过境税），而帝国主义在华工厂产品则比作洋货看待，只缴纳一道子口半税，即可通行全国。例如，1915年至1922年，民族资本的曲阳保管晋煤矿公司，每吨煤的运费捐税要一元七角三分一厘，占成本费的百分之八十六；外贸的唐山开滦煤矿公司，每吨煤的运费捐税却只要二角六分七厘，只占成本费的百分之十八。[11]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的厂商，还得到中国官僚买办资本的合作。中国官僚买办资本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其业务活动也主要为帝国主义推销商品，尽其买办的职能，并进行金融和公债的投机。又以重利盘剥民族工业，成为民族工业的大债主。

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遭受严重的挤压，中国工人、农民的生活也更加困苦不堪。

文献标注：

①⑤⑥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110页、第39～40页、第40页。

②许涤新、吴承明主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③⑦《中国近代经济史》，第235页、第240～246页。

④⑧⑨⑩⑪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34～135页、第222页、第190页、第123～127页、第167页。

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遭受挤压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战后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洋务运动的刺激，19 世纪 60 年代 ~ 70 年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开始产生。初步发展于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同帝国主义势力联系较少，代表着近代中国社会中比较进步的生产关系。但是，民族资本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压迫和束缚下艰难地成长，而且发展非常缓慢。20 世纪初，由于 1911 年的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对封建专制统治所进行的巨大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和壮大了民族资本的发展。一些限制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禁令被取消，维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团体纷纷建立起来，如上海总商会、华商纱厂联合会等，使其得到进一步发展。1914 年到 192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商品入口额明显减少，出口额逐年增加，国内外市场有所拓展，这就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机会，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一度迎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代”。此外，全国上下为反对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而掀起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也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工业更为迅速的发展。从 1914 年到 1919 年的 6 年间，民族资本主义共新设厂矿 379 家，新投入资本 8 580 万元，比 1914 年以前的 19 年间超过了一倍。其中发展特别快的就是棉纺织业和面粉业。从 1914 年至 1922 年，中国总共新建棉纺织厂 54 家，纱锭 150 万余枚，超出了 1913 年的 2 倍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全国只有面粉厂 57 家，1921 年达到了 137 家，中国面粉由战前每年人超而变为出超。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工业部门，如机器缫丝、丝织、针织、卷烟、火柴、机器造纸、制糖、水泥、榨油、电力、化学工业品、矿冶等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卷土重来，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遭受严重挤压，又陷入停滞和危机的状况。

首先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市场迅速缩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



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曾经活跃的国内外市场，被帝国主义重新夺去了。1919年中国的进口贸易额为6.4亿海关两，1926年竟激增到11.3亿海关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堪外国资本的压迫，加上其他一些原因，1923年和1924年又开始萧条。

中国的面粉工业，在1915年至1921年，有过暂时的繁荣，对外贸易年年出超。由于战后帝国主义经济的恢复，洋面生产增加，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产品，充斥着国内市场，从1922年起，中国面粉又变为入超，以后入超逐年增加。1922年面粉入超合银1 100多万两，1923年增至3 000多万两。1922年和1924年，面粉输入竟达五六百万担之巨。上海福新面粉厂的产品，曾经远销英国，1921年英国面粉业恢复，就以福新面粉厂的产品有杂质为由，禁止输入。

在国内市场，由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抵不过帝国主义商品的廉价倾销，加上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无止境的压榨，人民的购买力日益降低，很快造成了国内工业品的滞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较快的棉纱业，战后，由于外国大量在中国设厂，造成原料和市场十分紧张，出现“棉贵纱贱”的状况，加上苛捐杂税、运输困难等原因，华资纱厂屡屡亏本，许多纱厂开工不足，甚至停业倒闭，有的被外资乘机吞并。丝织业方面，上海丝织业于1922年和1923年出现“危险时期”，很多丝绸厂倒闭。上海数十年的三大油厂竟然在同年倒闭。重工业方面，由于铁价暴跌，铁厂纷纷停工。自从1920年起，本溪湖铁矿和铁厂、汉阳钢厂、扬子机器厂、汉阳铁厂等先后停工。此后，钢铁工业就一蹶不振了。其他工业也都日益消沉。因欧战致富的实业家又因营业失败而重新陷入漩涡的，时有所闻，中国工业者中因参战而得到的利益能保持存在的，恐怕是少之又少。

在外国商品的激烈竞争下，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利润也减少了，严重者甚至亏本。中国的纺织业在1915年的几年间，利润不断增加，1919年一包纱出售的价格为299.72元，利润达70.56元，到1921年，一包纱的利润降至10.21元，1922年不但没有利润，每包反而亏损20.60元。真是“欧战既终，祸相即生，九、十（1920年、1921年）两年实为中国工业恐慌时代”。[①]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兴起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建厂热潮，从1921年起，迅速下降了。1920年，向北京政府农商部注册的新厂还有70个，1921年降为61个，1922年则为46个，到1923年就猛降至14

个，1924年就只有11个了。与此同时，不少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遭到破产和兼并，勉强维持下来的，也经常停工减产。华商纱厂联合会曾于1922年议决自12月18日起停工1/4，1923年3月又议决停工1/2。华资纱厂停工，外资纱厂就乘机扩张势力和占领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有20多家华资厂倒闭或被外资吞并。以经验棉织业和面粉业著称的无锡荣家所辖的各厂为例，1923年，茂新三厂停工，福新二厂、八厂不全开工，四厂停工。《国闻周报》所载《华商纱厂联合宣言》中，讲到当时的情形说："就民十（1921年）以来，纱厂之破产换主者：若大中华破产犹不足以偿债，若宝成第一、第二之被并于日人，若裕大、若华丰为日商债券所管理；若宝成第三、若久兴为美商债权所管理；若德大、若大丰、若常州之易主；偌大轮、若裕泰、若苏轮、若厚生、若振华之改组加记；若太仓、若恒大云出租；若福成、若鼎新之不能继续租厂营业；若久安之垂成出卖；盖原有公司之消灭，或改换面目者，且二十余厂，其余已经成立中途解散之公司，均不与焉"。生动地记述了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遭受摧残的困境。

这样，许多的民族资本家在经营工业失败之后，都转向了经营商业和金融业这条路。并且，他们大部分都是从商业、金融业的投机中寻找出路的。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又增加了工业的危机。

这些充分表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挤压束缚下，即使有偶然振兴的机会，最终的结果还是不能充分的发展。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之所以陷入停滞和危机的状况，主要是由于外国资本的压迫、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和军阀政府的压榨和混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帝国主义各国忙于战争，不得不放松了对中国的剥削和压榨，使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了某些发展的机会。但是，这种从战时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真正繁荣时期是在战争末期和战后最初的几年里，不但时间短暂，而且是在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增长之中勉强生存下来的，所以民族资本主义工商力量业薄弱，基础不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卷土重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早已不是战前原有侵略力量的简单恢复，而是由力量强大的世界侵略转向重点集中的更大侵略。尤其是在帝国主义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压力下，它们为向外转嫁危机，日益增强其侵略的猛烈程度。外国经济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外国资本在中国大量倾向商品，并且直接在中国投资设厂，致使中国的市场大量被外国的廉价商品占领，民族工商业由于规模小、技术落后、资金短绌，其商品很难与洋货竞争。这个时

期，民族工商业所受进口洋货的压力虽然有所减轻，但所受的外商在华企业的垄断性竞争的压力却大大增加了。

封建生产关系也束缚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此时，封建剥削制度基本上原封不动地延续下来了，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被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下，致使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农民的购买力极其薄弱，国内市场也很狭窄，轻工业原料的供应也不足，再加上帝国主义的挤压，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充分发展起来。

此外，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还要遭受军阀官僚政府的压榨。各派军阀不断的混战纷争使交通经常遭到破坏，这严重影响了产品和原料的购买和销售。军阀们到处烧杀抢掠，社会秩序被严重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没有一点保障，社会购买力大大降低，市场缩小，严重地影响了民族工业产品市场的扩大，使本来就发展缓慢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更无力与帝国主义的商品竞争。最主要的是军阀还要征收各种苛捐杂税、搜刮军费、设立关卡，这些苛捐杂税、军费、关卡不仅妨碍了国货在市场上的推销，而且也妨碍了原料品的取给和出口货在国外市场上的销售，使得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难以获利或只能获得微利。此外，在军阀横行的时代，军阀统治者们铸造劣质硬币，滥发纸币和公债，造成币制混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这些挤压都造成了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迟滞。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挤压下，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艰难的成长着，这就使它具有了一些特点。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它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20 世纪 20 年代初的中国，现代工业很不发达，中国还是个农业国。工业总产值仅占工农总产值的 4.87%；而且这个少量的现代工业，相当部分还被控制在外国垄断资本很本国官僚资本的手里，中国民族资本所经营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1920 年，它在中国产业资本中所占的比重，仅为 18.2%。[②]

民族资本中，工业资本所占的比重小，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占的比重相对比较大。“在民族总额中，商业投资占 64%，工业投资仅占 26%。这种‘重商轻工’、‘以工惠商’的经营方向，严重影响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和发展。”[③]

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主要是以纺织、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缺乏重工业的基础，不能构建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技术、设备以

至原材料等方面，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在1919年，仅纺织、面粉两个部门的资本即占全部工业资本的53%，这两个部门拥有的工人也占全国工人总数的一半以上。重工业很少，而且基本上被外国资本所垄断。机械工业几乎等于零，商业资本由于没有强大的国内工业作为后盾，其经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批发外国货物，或者向外国卖原料。

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规模小，经营分散，技术设备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多数工厂没有现代化的设备，是手工业工厂。在民族工业相对比较发达的纺织业中，1915年少数工厂才开始使用电。山东的华丰机器厂是华北最大的机器制造厂之一，在1918年创办时只有一部旋床、一部手摇钻及一些小工具，到1920年，只有两部手摇旋床、两部小钻及一个小红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机器进口虽然有所增加，但直到1920年，机器进口只占全部进口总值的3.2%。④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品成本高，在市场上与洋货相比，严重缺乏竞争能力。这样，它发展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力求获得最大的剩余价值，以此来维持经营。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还与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当一部分民族资本家的前身是官僚、地主，他们的资本是地租转化而来的；不少民族资本家的亲友是地主，他们在农村中进行着封建剥削；由于经营工商业没有获利的确实保障，一些民族资本家还用经营工商业所得的利润，到农村去购买土地，而后出租给农民，兼事封建剥削，从而使自己具有资本家和地主的两重身份。

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遭受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挤压，再加上其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缺陷，使其在战后的发展严重陷入困境。

注释：

①杨铨：《最近之五十年》，申报编。

②吴承明等：《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41页。

③《中国近代经济史》，第342～343页。

④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72～73页。



封建势力统治下的中国农村

中国广大农民，一方面受外国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进攻，大批的破产事业，发生极度的贫穷化过程；另一方面还受着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夺。再加上军阀混战兵匪灾荒的连年侵扰，苛捐杂税的重压，使得中国农村中佃农猛增、自耕农减少的现象非常严重，荒地的面积也日益增加。在军阀盘踞的地方，军阀强迫农民用大量的耕地种鸦片，以增加他们搜刮军费的来源，使得粮食也要靠外国。1912 年到 1925 年 14 年间的粮食进出口，除了 1919 年和 1920 年有些出超外，其余 12 年完全是入超。封建势力统治下的中国农村的情形不堪形容。

中国所有可以耕种的土地，极大部分，尤其是肥沃的土地，都集中在占人口极少数的地主阶级和富农的手里，占人口大多数的雇农、贫民乃至部分中农则没有土地或缺少土地。据 1927 年 6 月国民党农民部的估算，占农村人口 14% 的地主拥有全国耕地的 62%（其中拥有 50 到 100 亩土地的中小地主占人口的 9%，占有土地的 19%；拥有 100 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占人口的 5%，占有土地的 43%），加上占人口 18% 的富农（他们占有土地的 19%），共占有 81% 的耕地；占农村人口 44% 的贫民，只占有耕地的 6%；占人口 24% 的中农，也只占耕地的 13%。在整个农村人口中，无地的佃农、雇农、游民占了 55%。“地主、富农站在所有的一端，中农、贫雇农站在使用的一端，所有集中，使用分散，这就是近代中国农村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关系的主要特征。”①

地主以及旧式富农将土地出租给农民以后，即向他们收取苛重的地租，主要是收取实物地租，在技术作物种植区及其他若干地区也逐步收取货币地租。在全国各省的实物地租一般占产量的 50%；有的省份，如湖南、四川、浙江、福建、河南等省大都超过 50%，有的州县高达 70% 到 80%，个别县份甚至高达 100% 以上。货币地租的地租率就其对地价的百分比而言，一般均在 10% 以上，有若干县靠近 20% 到 25%。这就是说，中国的地租购买年

一般不足 10 年，而“英、德两国在第一次欧战前后的地租购买年为 20-30 年”。[②]苛重的地租剥削，不仅侵占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量，而且侵占了他们相当一部分的必要劳动量。1925 年广东海丰佃农全年收入 165 元，交租 81 元，余下的 84 元中，购买种子、肥料、农具等市场资料耗费为 40 元，只有 44 元可用作生活费，而当时当地一个农民的生活费一般需 40-50 元。一个佃农终年劳碌，所得尚不足一人糊口，更不必说养家了。[③]1927 年江苏宜兴农民租田 2 亩，田场收入为 54 元，而支出则需 82 元，收支相抵，净亏 28 元。[④]旱涝保收的江南水乡农民的境遇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农民的困窘程度更可想而知了。

农民除了受地主私有土地租佃制度的残酷剥削外，还要受所谓公田的地租，如族田祠田以及各种寺院庙宇官田等。地主田地上的地租，是地主的收入，所谓公田的地租，表面上是所谓公共机关的收入，其实是豪绅的收入，豪绅把持着公田向佃农收租，在经济上也就等于地主。中国旧时地主阶级是绅士阶级，后来则凡是出租田地的人以及富豪在乡村之中都成为绅士，享有政治上的某种特权。旧时破落户的绅士，自己虽然没有田地，却因为有政治上的特权，那个把持着所谓公产，而成为实际上的地主。豪绅地主阶级是中国官僚式封建制度之下的统治阶级，是实行政治上压迫中国农民的阶级。还要一种现象就是地主为要镇压农民的反抗而办保卫团或团防，由团防而割据的地方，或者实行所谓的“武装收租”，或者直接变为军阀，更加残酷的剥削农民，掠夺农民的土地，变成大地主，使农民渐次变为农奴。

除地租外，农民还受到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剥削。由于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农民格外还需要钱，这就为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农民大多数每年都借债，所以地主富商便放债收息，利钱越抬越高。例如，东北有一些地方，要出 6 分年利，才可以借到钱；安徽滁县一带，农民借钱 10 元，在 3 个月内除本金外，更须还稻或麦一石（按市价约为 5 元左右）作为利息，照这样计算，年利竟为 200%。江浙产丝区域，在蚕忙时借钱，要用加 1 的利息，即借 1 元，限期 40 天还，还时除本金之外还要加利 1 元，这样，以一年计算，利息竟高达 900%。南通地方，农民借银 1 元，在 3 个月内，须还棉籽一担，其代价月四元，安年利计算，竟高达 1400%。昆山上海一带，有所谓的 10 元 5 斗者，就是借钱 10 元 1 年内还息米 5 斗，武进一带，借米一石，在一年内，须还谷三石。当农民不能按期偿付本息时，往往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房屋乃至子女典卖给地主。这样高利贷剥削也就成



了地主兼并农民土地的一种手段。这个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农民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和农民生活对市场的依赖程度都提高了。据对1921年到1925年中国北部和中东部17处或13处的典型调查，农产品出售部分占52.6%，自用部分占47.4%，农家生活资料中购买部分占34.1%，自给部分占65.9%。[⑤]这固然是一种进步，但也使农民进一步受到商业资本的剥削。例如，当新谷登场时，商人往往压价向农民收购粮食，待到青黄不接、农民需向市场购买粮食时，他们又把谷物的价格抬高了。湖南1927年每担稻米的价格收成前为13元，收成后仅为5元。四川成都1926年每担稻米的价格，春季为28元，秋季降到10元左右。农民在平常年景也只是维持生活，遇到天灾人祸，许多人的生活都难以维持，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贷。

这种高利贷资本与商业资本对于农民的压迫和土地使用关系上的剥削相互联合联系，这便是中国农村经济关系上的特点，尤其是地主阶级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的代表，差不多完全是混合的。一个人兼做地主和商业资本家及高利贷资本家，一个地主，他一方面压榨佃农的地租，另一方面便是债主，拼命的用高利贷盘剥农民，结果地主把自己的佃农和债户变为债务上的奴隶。中国农村很多自耕农往往因为欠债而将土地抵押或典质，结果变成了佃农，丧失了自己土地的农民，重新要向地主承租土地，往往所租得的土地就是自己原有的土地。

农民除了直接受到地主、商人、高利贷的盘剥外，还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反动政府的压榨。军阀政府除了征收田赋正税外，还征收名目繁多的附加税。这种税不仅直接落到自耕农头上，而且还间接地由地主转嫁到佃农身上。如，四川田赋附加税竟有26种，有的地方更多达30余种。1925年，全省田赋附加税较前清增加了148%。还有的实行田赋预征，福建兴化1926年即预征到1933年，湖南郴县1924年预征到1930年。这种情况，各省都有，农民的血汗都被吸光了。

在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给中国农村带来新的灾难。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农村经济起了极大的分解作用，进一步加深了农村经济殖民地化的程度，使农村进一步成为帝国主义推销商品、吸收原料的市场。

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商品大部分为日用消费品，1920年消费资料占进口货的71.5%，大量日用消费品倾入农村市场，进一步排斥了家庭手工业，使农民不得不把农产品送到市场上去换取货币，以便购买他们所需要的消费

品，这就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加深了对洋货的依赖程度，成为帝国主义的直接剥削对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全国农村家庭的全部生活资料，约有1/3是购买的。全部农产品约有一半是出卖的。华北地区则低于这个比例，交通不便的地区更低，华东地区则偏高。

帝国主义在倾销商品的同时，采取种种办法，迫使农民放弃原有生产，为帝国主义种植和出售它所需要的原料。以茶烟为例。19世纪80年代，中国每年出口茶叶200余万担以上，受印度、日本茶的排挤，从80年代起，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茶的生产大大下降。1919年后，每年都在100万担以下。致使许多茶农纷纷破产；20世纪以前，中国种植烟草不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烟草公司和日本在山东、河南、安徽三省大力推广美种烟草。进行收购，烟草种植得到力量发展。1916年上述3省烤烟生产量为240万磅，1920年为5 400万磅，1924年为7 000万磅，以后又超过1亿磅。有的县份，烟农占全体农户的60%以上。[⑥]为了引诱那么多种烟草帝国主义公司开始故意抬高收买价格，等农民多种了烟草，公司再以低价，压迫农民卖出，使烟农在残酷的压榨和剥削中无以为生。

大量原材料的种植，造成粮食生产的缩减。15个省的100个县中120个地区的调查，1914年到1919年棉花占全部耕地面积14%，水稻占全部耕地面积41%，1924年至1929年棉花耕地上升为18%，水稻耕地却下降为37%。[⑦]伴随着这一情况而来的，是粮食入超量的增加。粮食作物等农产品的大量入超，形成谷贱伤农。帝国主义者再通过商业资本乘机操纵，使广大贫苦农民过着卖贱米、吃贵米的日子。最大多数的贫苦农民，在秋收以前以买者出现于市场，在秋收以后则以卖者出现于市场，生活日益濒于绝境。

中国广大农民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残酷压榨下，既要交租付息，还要负担各种苛捐杂税，正税之外还有附加税，有的地方还有几年到几十年的田赋预征。经济榨取之外，农民还被抽丁、拉夫。在军阀连年混战的日子里，广大农民不断遭到封建军阀烧杀抢掠之害。这一时期，天灾也十分严重。以小麦为例，1918年产量为4．3亿多石，1923年则下降为2亿多石。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3 000多万农民，50多万人死亡。在天灾人祸交迫之下，全国荒地面积日增，农作物产量下降。广大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破产，饥民千百成群。以草根树皮为食，甚至发生人相食的惨剧。在广大农民惨遭剥削的情况下，军阀、官僚、大地主们，趁机掠取大量土地。李基厚在



苏北徐海有地200多顷；曹锟兄弟是天津静海一带最大的地主，并且垄断了那一带的水利；当时的黑龙江省省长吴俊升在1924年至1925年间几乎攫取了全省的土地。

封建势力统治下的中国农村经济凋敝，农民遭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榨和盘剥，就像一座又一座的大山一样压在农民的身上，使他们翻不过身、喘不过气来。对于这些在饥饿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来说，除了奋起反抗，再没有别的生路。

注释：

①②⑤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80页、第280页、第280页。

③澎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1926年1月，《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14页。

④《东方杂志》第24卷第26期，《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第311页。

⑥⑦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505页、第215页。

出卖中国山东的华盛顿会议

巴黎和会确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形成的列强力量对比，暂时调整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西方的矛盾，但是它们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矛盾和对抗并没有解决，也还没来得及根据新的力量对比建立起新的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前英德俄鼎立的局面已为美、英、日所代替。因此，在这一地区争夺的列强也就只剩下了美、英、日三国。

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特别是利用西方列强准备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的机会，急剧扩大了其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中国的侵略势力，并在巴黎和会上取得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到20世纪20年代初，几乎形成了对中国的独占局面。

经过一战，美国开始跃居帝国主义列强之首。战败不仅使德奥退出了强国的行列，还欠下了美国总巨额的债务，英法等战胜国的力量也被大大削弱了。但由于美国最后否决了《凡尔赛和约》，在国际外交上也一时陷入困境。日本在欧战中企图独霸中国的行径，阻碍了美国在华扩张的野心，使美日的矛盾也日趋激烈。美、英两国由于争夺销售市场、投资范围和原料产地，矛盾日益尖锐，美国竭力溶入英国控制的中国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在东南亚各国及拉美地区也与英国发生利害冲突。美国总统哈定为了打破外交僵局，破坏英日之间的同盟关系，夺取英国的海上霸权，遏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利用1920年5月国会通过的参议员波拉关于限制军备的议案，提出召开一个国际会议来全面讨论太平洋、远东问题。

英国1902年与日本缔结的《英日同盟条约》，最初以反俄为目标，后来以反德和部分反美为目标，有效期为10年。之后，英日两国又于1911年延长10年，到1921年满期。英国于1921年6日召开的帝国会议上，在讨论应否续约的问题时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不续，英国势将在与美国的抗衡中失去日本的助力；可是续约，由于此时美日矛盾不断加剧，两国一旦开战，



英国有依约帮助日本攻打美国的义务，这既不符合英国的传统政策，又为力所不及。日本几年来不断向英国在中国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势力范围进行扩张，越来越露骨地独占中国，既反华盛顿又反伦敦的政策，英国很难与日再续盟约。此外，战后各国为了在未来的争霸中占据上风，竞相扩充军备，军备竞赛不仅给各国的财政造成了难以承受的负担，而且导致各国民众要求缩减军备的反战呼声日趋高涨。在这种形势下，美、日、英等国都希望通过公开的、共同限制的方式，缓和彼此间的敌对情绪。

这样，美英两国为了解决巴黎和会不曾顾及的亚太问题，“平衡”各国军事力量，重新布置战后的远东格局，于是决定召开华盛顿会议。

1921年11月11日，由美、英、日、法、意、比、荷、葡、中9国参加的华盛顿会议在美国国会大厦正式开幕。北京政府正式任命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大理院院长王宠惠、广州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为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的全权代表，施肇基任首席代表，出席会议，此外还有各部委派的人员，代表团的人数共达130名。

会议设立了两个委员会：一是由美、英、日、意、法五国参加的缩减军备委员会，讨论限制海军军备竞赛问题；一是九国全体参加的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讨论太平洋、远东问题，中国问题是这个委员会的中心议题。中国提出交涉的内容主要有：有关各国对华一般原则的交涉；有关各国在华特权的交涉；山东问题的交涉。

11月16日，在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中国代表施肇基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十项原则”，“十项原则”涉及中国的主权、外国在华特别权利、中国政治、法权、行政自主及和平解决太平洋及远东纠纷等10大问题，被美国代表路特后来提出的“四项原则”所采纳，写入《九国公约》的第一条，为“山东问题”的解决定下了基调。

关于山东问题的交涉是中国代表在会议中最主要的活动。山东问题指日本在1914年对德宣战后强占青岛及胶济铁路的归还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4年8月15日，日本借口“日英同盟”，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将全部胶州租借地无偿无条件交付于帝国宪兵，以备将来交还中国”。因德国政府并无答复，日本遂于8月23日对德宣战。9月2日，日本军队突然从山东半岛北岸的龙口登陆，先后占领掖县、平度、即墨及胶县车站。然后，又沿胶济铁路西犯，接连占领潍县、张店、周村、济南等地车站。与此同时，日军与英军组成的“日英联军”，也从崂山湾登陆，对青岛

德军发起了进攻。德军力被迫于11月7日投降。11月16日，日军开进青岛市区。于是，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被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战后召开由列强控制的巴黎和会所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了日本。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爆发了五四运动。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最后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致使日本的侵略扩张没有得到承认，山东问题由此成为“悬案”。

华盛顿会议之前，日本政府几次要求就山东问题与中国进行单独交涉，企图以交换胶州湾为饵换取更多的利益，均遭中国政府的拒绝。中国迫切希望得到英美的支持，在华盛顿会议上解决山东问题。美国的态度是希望山东问题得到解决，但又不希望这一问题在会议上提出而影响其主要战略的实施。美国国务卿早在会前7月就表明如果日本能在华盛顿会议举行前解决山东问题并使关系国满意，华盛顿会议可以不讨论这一问题。[①]日本政府获知美国的态度以后，便于8月30日提出“特定国间问题”，其范围是：“一、青岛依当初之宣言还付中国；二、关于辽东租界问题；三、关于南满洲铁道之营业。”[②]其目的就是为了阻止会内讨论此问题。9月6日，日本政府又向中国驻日公使表示，山东问题要在会前解决。中国政府经过反复研究后，直到9月份仍拿不出肯定的意见，距华盛顿会议召开的日期越来越近，在短时间内来解决山东问题已不现实。美国又向中国表明在会内讨论问题该的种种困难：“中国并未参加凡尔赛条约，而列强对于日本则受秘密条约所束缚；在美国亦不欲阻止其双方自行解决，而将此种问题牵入会议。然日本即可借他国为后盾，以极充分之理由反对此案之提出于会议也。”[③]美国一方面为了迁就日本把会谈与会议分开的意见，另一方面又为了使中国满意，最后由英美提议在会外讨论，中日交涉的决议案须提交华盛顿会议，倘议而不决，山东问题仍提交大会。[④]中国代表自知无力对抗美、英、日三国，只好勉强接受了美国会外讨论山东问题的主张。1921年11月30日，华盛顿会议主席休斯在大会宣布，“请中、日代表觌面商议，以期解决鲁案”，美英首席代表自愿担任调停。美国将派远东司司长马慕瑞和代表团秘书贝乐列席每次会议，英国派代表朱尔典和远东司司长莱朴生列席，会谈结果须报大会。这一宣布，就使会谈与会议的关系更加紧密，等于宣布会谈本身就是会议安排的，也可看作会议的组成部分。就这样，山东问题的交涉既不是日本所要求的直接交涉，也不是中国所希望的提交大会公决，而是采取了在华盛顿会议外中、日交涉的方式，会谈期间由英美各派观察员列席旁听，观察以及必要



时出面调解纠纷以弥合分歧。实质上这是各方相互斗争与妥协的结果。

中国代表面临的首等问题就是究竟从比较简单的档案核对、行政移交和港口接管等次要问题开始，还是从胶济铁路这个主要问题开始。以黄郛为首的一部分人认为整个山东问题中铁路最为重要，如果先次后主，则日本有可能故意拖延谈判，到最后迫使中国或者接受日本的主张，或者使整个山东问题得不到解决。而顾维钧等人却认为，“还是先处理比较简单的问题较为明智，这样有利于为讨论最困难的问题创造一种畅所欲言、开诚布公的气氛”。[5]经过研究讨论，最终决定先从小项开始。

1921 年 12 月 1 日，中日第一场边缘谈判在毗近国会山的泛美协会大厦启帷。美国的马克谟和培尔，英国的朱尔典与外交官莱朴生列席，休斯和贝尔福出席了第一次会议。中日双方先就简单的问题进行了讨论。12 月 2 日开始，先后讨论了海关、官产、公产问题。12 月 5 日，日本宣布：放弃中德 1889 年条约中规定的用人、投资、供给物料等优先权；对中国一直坚持的立场予以承认。在较为复杂的海关问题上，经过坚决的抗争，中国收回了青岛海关。在讨论官产、公产问题时，在英美的调停下，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12 月 13 日，中国突然提出胶济铁路问题，给了日本代表一个措手不及。在此后的一个多月的谈判中，双方就铁路问题在赎路方式、偿还年限以及聘用日人等方面展开了拉锯式的谈判。

日本人经营胶济铁路 8 年取得巨大的利润，不愿全部交出，起初日本要求胶济铁路由中日合办，但中国则提出要收回自办，并表示可以偿还一半的路价。日本在合办无望的情况下，表示该铁路已经由巴黎和会赔偿委员会估价 5340 余万马克，并从德国应付日本的赔款中扣除，中国如果要收回全部铁路财产，就得照价全付。最后中方做出让步，同意全付。对于日本占领期间对铁路进行的永久修理所需费用，双方代表商定由双方各派人员组成铁路委员会估价铁路财产，同时中国代表提出委员会中应聘请第三国专家以便在中、日双方意见出现分歧时给予调解，但日本表示反对。12 月 15 日，关于委员会中加请外国专家一事，中国主张应当详细规定委员会的职权，并先指定第三国籍的专家以便处理将来的冲突。对于委员会的职权，日本表示只限于有专门性质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可由两国政府来商讨解决。后双方商定一切政治及行政问题由两国代表或者两国政府来解决，而不由委员会解决。

在付款方式上，中国代表提出现款赎路。日本却提出为了避免日本在中

国铁路方面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要求中国借款赎路，以便日本能够对该铁路保持“相当利益”。中国再次表明中国国民都赞成用现款赎路，如果代表团答应借债赎路则肯定会受到国内的抗议和批评。日本代表认为已做出了很大让步，中国代表如继续坚持现款赎路，日人肯定误会是中国不希望日人与胶济铁路保持“相当利益”。顾维钧当即表示正是因为中国尚有众多债务，所以不能再借外债了。

12 月 16 日召开第 14 次会议。中国代表主张中国在 3 年内将胶济铁路赎回，分六期付款，每期六个月。第一期付现款，以后每期付国库券，以胶济铁路收入作为担保。并表示中国政府承诺不论对于任何国的商人，均给予公平平等的待遇。日本代表表示三年期限太短，并要求中国代表承诺聘请日人为胶济铁路的工程师、车务长和会计长，并主张付款期限最好仿照其他中国铁路与外国资本家所定的期限。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商定先征求各自财政专家的意见然后再继续讨论。此后经过几次会议的争论，在付款问题和聘请日人的问题上，仍未达成一致，会议只能暂告中断。

1922 年 1 月 4 日双方重开会议。日本代表重新回到借款方式上来，又反对现款赎路，而且态度强硬地声称是日本的最后让步。原因是日本公使小幡酉吉曾于 1921 年 12 月份就胶济铁路问题拜会中国外交总长颜惠庆，并威胁说如果中国坚持现款赎回，只有停止交涉。随后，又以恭贺新上任总理的名义拜访了梁士诒，竟得到了梁士诒“借款自办”的答复。中国外交部也曾于 12 月把梁士诒的意见传达给中国代表，但是中国代表没有遵循，而是另提出了两种方案：现款赎路，将全部款项存于第三国银行，不聘用日籍职员；用国库券分期付款，期限 12 年，3 年后可一次付清，可聘用一名日人任总工程师。并且指责日本驻华公使小幡曾亲自到我国外交部质问借款赎路问题的行为，是对中国代表的不信任，也没有把这种行动通知英美两国列席代表。中、日互不让步，为避免谈判再次陷入停顿，中国代表提出由英、美两国代表出面调停。

此时，英、美两国代表也对日本的顽固立场和背着他们搞幕后外交的行径非常不满。美国国内也有舆论指责政府在山东问题上不主持公道，参议院甚至警告：“鲁案若不解决，便不批准四国协定，而下届选举，共和党必遭失败。”[6]在这种情形下，美、英代表同意调停。美、英两国分析折衷后，于 1922 年 1 月 9 日，由美国代表马克谟、英国代表兰普森联合向中日双方提出了 4 种调停方案：（1）协定成立三个月内日本政府将胶济铁路移交中国



政府，中国以债权形式偿付路价。期限为12年，3年后可一次付清；（2）借款赎路，期限为12年，3年后可一次付清，付清前聘用日人为总工程师；（3）现款赎路，聘用日人为车务长、会计长；（4）以国库券形式赎路，期限为12年，3年后可一次付清，付清前，聘用日人为车务长、会计长。中、日两国代表对上述4种方案进行了研究，都倾向于第四种方案，但双方仍有分歧，均表示请示本国政府，然后再作决定。此时会议已接近尾声，美国为了华盛顿会议取得成功，也是为了压制日本，希望山东问题在会议期间解决。又鉴于中、日双方都倾向于第四种方案，只是意见稍有分歧，所以在1月19日，美国休斯和英国贝尔福分别找中、日双方会谈，劝双方接受第四种方案。针对中、日双方之间在聘用日员还存在分歧，1月25日美国总统哈定亲自接见中国代表施肇基进行劝说。综合考虑种种原因后，1月27日中国政府正式电令中国代表同意调停方案并签字。

2月1日，休斯在华盛顿会议全体大会上宣布山东问题及青岛主权回归中国终于已经解决。这样，历时一个多月，经过36次的艰难谈判，在美、英的斡旋调停下，山东问题最终得到解决。1922年2月4日，中、日双方代表正式签署了《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附约》，《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共28条，《附约》共6条。

按《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规定，日本将胶州湾原德国租借地交还中国，日本军队撤出山东；日本将胶济铁路交还中国，中国向日本偿还铁路实价5 340万金马克，以国库券交付，以铁路作抵押，15年内偿清；在未偿清之前，由日本人担任车务长和与中国会计长权限相等的会计长；青岛海关交还中国，但日商与海关行文时可用日语，海关职员亦要聘用少量日本人；日本1922年12月10日向中国移交胶济铁路权；日本放弃1898年中德条约中的优先权；海底电缆交还中国；青岛盐场由中国备价赎回；中国将胶州湾全部开为商埠，等等。

这样，遗留几十年的山东问题终于在中国人民高涨的民族热情支持下，中国代表据理力争，外加国际上美、英等国的干预，得到了解决。尽管中国恢复了对山东的主权，收回了青岛行政管理权和部分利益，结束了日本对山东的控制，但是中国不得不偿付巨额的铁路赎金和其他产业的偿价，日本在一定时期内仍旧保留着对山东的经济优势，仍有许多权益没有彻底收回。在山东问题上，中国借助于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来反抗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这同样带有很深的半殖民地的烙印。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没有

得到根本改变。

文献标注：

①④《伍德罗·威尔逊和远东政策》R·W·寇里，纽约，1957年版，第254页、第253页。

②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01~202页。

③⑥近代史资料专刊：《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3页、第481页。

⑤顾维钧著：《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5月版，第226页。



西方列强的九国公约

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意、日、荷、比、葡、中9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通称《九国公约》。其核心是肯定美国提出的在华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并赋予它以国际协定的性质，使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遭到挫折。实质上是在美国占优势的基础上，帝国主义国家建立的对中国的联合统治，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特别是乘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的机会，急剧地扩大了其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中国的侵略势力，到20世纪20年代初，几乎形成了对中国的独占局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战前英德俄鼎立的局面已为美英日所代替。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开始跃居帝国主义列强之首。一战不仅使德奥退出了强国的行列，失去了优势，欠下了美国总巨额的战争债务，还使英法等战胜国的力量被大大削弱。但由于美国最后否决了《凡尔赛和约》，在国际外交上也一时陷入困境，此外，美日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也日趋激烈。美国总统哈定为了打破外交僵局，破坏英日之间的同盟关系，夺取英国的海上霸权，遏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美国准备召开一个国际会议来全面讨论太平洋、远东问题。

英国由于1902年与日本缔结的《英日同盟条约》已届满期，在1921年6召开的帝国会议上，在讨论应否续约的问题时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续约，由于此时美日矛盾不断加剧，两国一旦开战，英国有依约帮助日本攻打美国的义务，这既不符合英国的传统政策，又为力所不及；可是如果不续，英国将在与美国的抗衡中失去日本的帮助。但是，日本近几年来不断向英国在中国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势力范围进行扩张，越来越露骨地企图独占中国，这使得英国实在很难与日本再续盟约。此外，战后各国为争夺霸权，竞相扩充军

备，英国也颇感力不从心。

美英两国为了解决巴黎和会不曾顾及的亚太问题，“平衡”各国军事力量，重新布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远东格局，于是决定于1921年11月11日召开由美、英、日、法、意、比、荷、葡、中九国参加的华盛顿会议。

1921年11月11日，由美、英、日、法、意、比、荷、葡、中9国参加的华盛顿会议在美国国会大厦正式开幕。北京政府正式任命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大理院院长王宠惠、广州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为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的全权代表，施肇基任首席代表。

11月11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美国首席代表休斯为大会主席，休斯宣布了限制具备的讨论太平洋及远东问题两项议程，建议各与会国代表组成两个相应的总委员会，并在其下设立各种分委员会对具体问题进行磋商。会议设立了两个委员会：一是由美、英、日、意、法五国参加的缩减军备委员会，讨论限制海军军备竞赛问题；一是九国全体参加的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讨论太平洋及远东问题，中国问题是这个委员会的中心议题。

11月16日，太平洋及远东问题总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原则议案。中国代表施肇基在该次会上提出了中国希望会议认可的“十项原则”：各国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中国承认门户开放政策及各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并愿意在中国全境实行；非中国知晓并参与，各国不得订立与中国有关的条约；各国有关在华特权的条约应立即公开，否则均视为无效；对中国政治、法权、行政的自由的限制，应立即取消；中国现时之成约，其无限期者应立即确定限期；根据通行的重新审核有关各国在华特权的文件，使其对中国有利；尊重中国在将来战争中的中立权；订立和平解决太平洋及远东地区国际争端的条文；制订将来随时召开国际会议讨论解决可能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出现的争端的规定。[①]中国的目的是要阻止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稍微挽回一些利权。经过11月17日分委员会的讨论，中国的提案被移交11月19日总委员会会议。由于这些只设计一般原则，美、英、法、意、比、荷、葡的代表都基本上表示同意，日本的代表虽然口头上赞成“门户开放”的政策，但是极力的强调中国国内的困境和不安，以及日本是一个岛国，其国内的工业原材料、粮食等都离不开中国，要求大会仅就主要的原则进行讨论，避免涉及具体的问题，还以破坏大会进行威胁。后来由美国代表路特根据中国的议案提出一个新的四项原则，新四项原则经过11月21日



总委员会的讨论、修改后，决议通过。这也就是后来《九国公约》中的第一条的四款。这些条文有利于美国，压制了日本。

从11月23日开始，中国代表又陆续向会议提出具体议案11项：（1）关税自主；（2）撤销领事裁判权；（3）撤去客邮；（4）裁撤无线电台；（5）撤退外国驻华军警；（6）退还租借地；（7）尊重中国战时中立；（8）各国不得互订涉华条约；（9）取消势力范围；（10）废弃二十一条；（11）成约之法律地位。但是其他列强代表以其中的第七项、第八项、第九项、第十一项不包括在路特四原则之中为借口，提出质疑，于是，中国代表便将这4项提案分别提交总委员会审议。

12月7日，中国代表王宠惠在太平洋及远东问题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要求各国尊重中国战时中立的提案，12月8日，顾维钧随即又提出各国不得互订涉华条约的提案，并指出，各国既然表示尊重中国主权与独立，就不应该背着中国订立涉华条约。但是，英国代表贝尔福以该提案限制了各国的缔约权为借口表示反对，会议最后通过了英国代表盖德士提出的修正案。12月12日，中国代表王宠惠将取消外国在华势力范围的提案交与太平洋及远东问题总委员会讨论，12月13日，又开出与该提案有关的各种条约。中国代表一开始犹豫是否提出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正在此时，美国暗示中国提出该要求，美国主要是想迫使日本放弃海军主要水面舰只吨位，英美日三国保持10∶10∶7比例的要求，使日本接受5∶5∶3的比例方案。于是，中国代表于12月14日向会议提出“二十一条”问题与取消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案有关。当天，日本表示接受5∶5∶3的比例方案，但是，以“二十一条”问题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为借口，拒绝讨论。因此，取消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案就暂时被搁置。1922年1月16日，美国代表休斯以“门户开放”为核心的“三原则”，经过会议讨论修改后，于1月18日在太平洋及远东问题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它除了重申“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外，还拟定在中国设立一个审查部，用以监督各国在华的实行情况。而对于废除“二十一条”的问题，日本一直采取拖延的态度，日本代表币原还一再警告其他列强，取消“二十一条”将是取消其他条约的先例。直到会议结束前四天，日本代表才正式表示，“二十一条”是中国和日本订立的正式的条约，不能取消，表示可以放弃其中的一些权力，如，中国在南满聘用日本政治、财政、军事、警察各项顾问或教练官的优先权，撤回对原案第五号的保留。但是，中国代表对日本代表的态度表示严重不满，并声称保留重议

权。这样，华盛顿会议最终也没有解决“二十一条”问题。1 月 19 日，英国代表盖德士提出一个关于中国铁路平等待遇案，经太平洋及远东问题总委员讨论后通过。

以上的各项议案由太平洋及远东问题总委员移交到全体会议，均被议决，并将这些议案归并为一个条约，即各与会国于 1922 年 2 月 6 日签署的《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简称《九国公约》。该条约全文共有 9 条：第一条是路特四原则；第二条规定各国不得订立违反路特四原则的条约与协定；第三条是休斯重申的“门户开放”的三原则；第四条禁止各国在华设立设立范围；第五条规定中国铁路对列强平等待遇；第六条是各国尊重中国战时中立。其他条款均为技术性条款。条约具体内容：

“第一条　除中国外缔约各国协定：

（一）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二）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

（三）施用各国之权势，以期切实设立并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

（四）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并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安全之举动。

第二条　缔约各国协定不得彼此间及单独或联合与任何一国或多国订立条约或协定或协议或谅解，足以侵犯或妨害第一条所称之各项原则者。

第三条　为适用在中国之门户开放，或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更为有效起见，缔约各国除中国外，协定不得谋取或赞助其本国人民谋取：

（一）任何办法为自己利益起见，欲在中国任何指定区域内，获取有关于商务或经济发展之一般优越权利；

（二）任何专利或优越权可剥夺他国人民在中国从事正当商务实业之权利；或他国人民与中国政府或任何地方官共同从事于任何公共企业之权利；抑或因其范围之扩张，期限之久长，地域之广阔，致有破坏机会均等原则之实行者。

本条上列之规定，并不解释为禁止获取为办理某种工商、或财政企业、或为奖励技术上之发明与研究所必要之财产及权利。

中国政府担任对于外国政府及人民之请求经济上权利及特权，无论其是否属于缔结本约各国，悉秉本条上列规定之原则办理。

第四条　缔约各国协定对于各该国彼此人民间之任何协定，意在中国指



定区域内设立势力范围，或设有互相独享之机会者均不予以赞助。

第五条　中国政府约定中国全国铁路不施行或许可何种待遇不公之区别。例如运费及各种便利，概无直接间接之区别。不论搭客隶何国籍，自何国来，向何国去；不论货物出自何国，属诸何人，自何国来，向何国去；不论船舶或他种载运搭客及货物之方法，在未上中国铁路之先，或已上中国铁路之后隶何国籍属诸何人。

缔约各国除中国外，对于上称之中国铁路基于任何让与、或特别协约、或他项手续，各该国或各该国人民得行其任何管理权者，负有同样之义务。

第六条　缔约各国除中国外，协定于发生战事时，中国如不加入战团，应完全尊重中国中立之权利。中国声明，中国于中立时愿遵守各项中立之义务。

第七条　缔约各国协定无论何时遇有某种情形发生，缔约国中之任何一国，认为牵涉本条约规定之适用问题，而该项适用宜付诸讨论者，有关系之缔约各国，应完全坦白互相通知。

第八条　本条约未签字之各国，如其政府经缔约签字各国承认，且与中国有条约关系者，应请其加入本约。

因此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对于未签字各国应为必要之通告，并将所接答复知照缔约各国。任何国家之加入自美政府接到该国通知时起发生效力。

第九条　本条约经各缔约国依各该国宪法上之手续批准后，从速将批准文件交存华盛顿，并自全部交到华盛顿之日起发生效力。该项批准文件笔录由美国政府将正式证明之誊本，送交其他缔约各国。”②

《九国公约》是对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九国公约》提出的所谓“机会均等”，是指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都应得到同样的好处。所谓“门户开放”，是指每个帝国主义国家都不能关闭它在中国控制地区的大门，而不让其他国家进来。《九国公约》实际上是主要帝国主义列强协同侵略中国的一个强盗协定。该条约扼制了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对中国的垄断权，取而代之的是以美国为首，与英、日帝国主义共同控制中国的侵略局势。此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中国的斗争愈演愈烈。正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提到的，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了一个公约，实质上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事实证明，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是由帝国主义的侵略所造成的，寄希望

于帝国主义国家归还中国的主权是不可能实现的。

文献标注：

①《美京施顾王代表电》，《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0～401页。

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71～74页。



东方民族会议

1922 年 1 月 21 日，在共产国际的发起和指导下，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是远东被压迫民族的第一次盛大集会。这次大会的召开，对远东人民的觉醒及其反帝斗争，对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早在 1920 年 9 月，东方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不久，就曾提出在伊尔库茨克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动议。1921 年上半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中国、朝鲜、蒙古、爪哇等国的共产党或革命团体，发出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邀请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权益的斗争，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表现得十分激烈，其中以美、日之间的矛盾最为尖锐，达到随时可能爆发战争的程度。为了协调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按实力对比重新调整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太平洋地区和中国的利益；同时也为了暂时联合起来，共谋镇压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掀起的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风暴，美国积极倡议召开华盛顿会议。

同年 8 月，共产国际得知帝国主义正在筹备以侵略瓜分远东为主要内容的华盛顿会议，为了对抗帝国主义企图瓜分远东的罪恶阴谋，揭露华盛顿会议的侵略实质，促进远东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向前发展，共产国际决定针锋相对地召开一次有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参加的代表大会，这样就更加增强了召开东方民族会议的迫切性。

当时，中国和朝鲜等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对华盛顿会议寄予很大的希望，把美国当作亚洲的“解放者”，幻想着由美国主持“正义人道”，帮助他们把日本人从满洲、朝鲜、蒙古赶出去，使他们从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和侵略下解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听取日本、朝鲜、中国和蒙古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意见，统一思想认识，加强远东被压迫民族之间的联系和团结。

为了揭露华盛顿会议掠夺和瓜分远东各国的阴谋，澄清各国对国际国内形势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认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华盛顿会议召开的同一天，即 1921 年 11 月 12 日，在伊尔库茨克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对抗华盛顿会议。

1921 年 8 月，马林接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准备在伊尔库茨克召开远东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的通知，要求他在远东各国找代表去参加这次会议。马林接到通知后，立即派张太雷秘密前往日本与日本共产党进行联系。随后，马林便在中国着手选派代表前去伊尔库茨克参加会议。

出席东方民族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参加的大型的国际会议，中共中央对这次大会极其重视。1921 年秋，中共中央接到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局关于选派代表参加会议的通知后，立即分派包惠僧到广东、周佛海到长江一带、刘仁静到北方各主要城市选派代表赴会。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还直接与设在上海的国民党总部联系，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参加大会。

当时，中国和苏俄还没有外交关系，为避开军阀的阻挠和破坏，出席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在接到通知后不久，便组织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党派和阶层，张国焘被指定为中国代表团团长。

1921 年 10 月中下旬，各地代表选定后，分批出发赴俄。临行前，中共中央局给张国焘的任务是，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听取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并研究苏俄及其他各地的革命经验。

参加大会筹备工作的张太雷分析了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局势，考虑了代表们经由边境进入苏俄的接头地点，安排了代表们越过封锁线的方向和路线，最后决定北方的代表在北京集中，经奉天（今沈阳）、哈尔滨，从满洲里中苏边境进入苏俄；南方的代表在上海集中，经海路在海参崴登陆，坐火车到伊尔库茨克。1921 年 11 月、12 月，南北两路代表越过边界封锁线，先后辗转到达伊尔库茨克。

各国代表到达伊尔库茨克后，分组举行会议，商讨大会的有关问题。代表们还应邀参加了当地举行的苏维埃大会、联欢会，主动参加了苏俄正在开展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由于多数代表未能及时按期赶到，大会延期举行。1921 年 12 月，当大部分代表陆续抵达伊尔库茨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考虑到伊尔库茨克离莫斯科太远、当时到会的人数又太少、便于列宁和共产国际就近指导等诸多原因，大会改在莫斯科举行，这就赋予了大会以



更加重大的政治意义。这一会议地点的改动也使久居伊尔库茨克的代表们欣喜万分。1922 年初，伊尔库茨克的专车将中国、蒙古、朝鲜、日本的代表载到莫斯科。

1922 年 1 月 21 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的代表有 178 人，包括：朝鲜代表团 52 人，其中共产党有 42 人；日本代表团 73 人，其中共产党有 9 人；蒙古代表团 14 人；中国代表团 44 人，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 39 人，只有发言权的列席代表 5 人，其中共产党 14 人。

中国代表团由相当广泛的社会成员组成。从代表的派别来看，有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也有国民党的代表；从代表的成分来看，有工人的代表，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学生、文化团体的代表，也有妇女团体的代表；从代表的地区来看，有国内上海、天津、唐山、太原、山东、汉口、湖南、安徽、广东、浙江等省、市的代表，也有正在苏俄的中国新闻记者、中国留学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是张国焘，国民党的代表是张秋白，工人代表有唐山铁路工会的邓培、湖南劳工会的王光辉等人，妇女团体代表是广东女界联合会的黄碧魂。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瞿秋白、林育南、任弼时、罗亦农、俞秀松、张太雷、柯庆施、萧劲光、贺衷寒、卜士奇、于树德、王乐平、王象午等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也分别以各地区、各团体代表的资格出席大会。中国社会党领袖江亢虎和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也应邀出席了大会。

大会会场的布置显示了远东各国人民团结战斗的气氛。主席台的正中上方是马克思的半身雕像，台额及廊柱间悬挂着用中、日、朝、蒙等文字书写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解放东方劳动者”字样的巨幅横联。大会由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宣布开幕，推举列宁、托洛茨基、片山潜、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为名誉主席。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萨发洛夫，美、印度、匈牙利等国的共产党代表和远东各国的主要代表共 16 人被推为大会主席，组成大会主席团。张国焘也名列其中。

大会从 1922 年 1 月 21 日开幕至 2 月 2 日闭幕，共举行了 12 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有四项：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作《关于国际形势和华盛顿会议结果》的报告；2. 各国代表团介绍本国情况；3. 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发洛夫作关于《共产党人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及其与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的报告；4. 通过大会宣言。

大会首先由季诺维也夫代表共产国际致开幕词。季诺维也夫在开幕词中指出，这次大会的目的是同远东的劳动群众，同从远东来到共产国际所在地的各个国家的代表们达成一项协议，共同对付华盛顿会议的强盗行径，并号召各国共产党和全世界劳动者，特别是远东的劳动者，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争取最后战胜世界资本主义。

根据大会的议事日程，首先由季诺维也夫作题为《国际形势与华盛顿会议的结果》的报告。报告揭露了出席华盛顿会议的帝国主义列强在“民主”、“进步”幌子下，对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实行争夺和瓜分的阴谋。季诺维也夫指出，共产党人和民族革命运动的领袖们的联盟是十分必要的，并号召远东被压迫民族在俄国和西方无产阶级援助下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随后据此通过了《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及远东形势》的《决议》。《决议》批评了中国、朝鲜资产阶级，把美国当作亚洲“解放者”的错误观点，强调“远东各被压迫民族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有效途径，是远东各国劳动群众与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并只有和他们结成联盟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决议》还展示了被压迫民族摆脱外国帝国主义桎梏后的前途和发展道路。指出：“只有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一道战胜帝国主义之后，远东各国的劳动群众才能为自身的利益在国与国之间以及与先进的无产阶级共和国建立经济合作，并保证充分利用科学与技术成就而自由发展。”

大会的第二项议程是远东各国代表作关于本国形势的报告。这些报告介绍了远东各国的阶级关系、工运、农运、学运，以及妇女状况等，内容丰富生动，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

中国代表也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和发言。关于中国形势的主要报告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作的。他在报告中讲了中国无产阶级的状况、土地关系、农民状况、学生运动和罢工运动等情况。邓培在大会发言中讲了中国的工会组织，铁路和冶金工人罢工的情况及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酷剥削的状况。于树德介绍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外国资本控制中国工业，外国货充斥市场，致使手工业者破产的惨况。根据大会安排，中国代表再次获得作报告的机会。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介绍了国民党的现状和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的情况；女代表黄碧魂介绍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状况。

张秋白阐述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情况后，季诺维也夫在会上对中国的问题作了指示。季诺维也夫希望华盛顿会议能使中国南方有远见的领导人

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伪善。他还嘲笑了美国“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政策，指出美英日法四国联盟就是四个“吸血鬼”联盟。

各国代表的报告和对各国革命情况的介绍表明，共产党人必须回答远东各国革命运动中一系列迫切的问题，即远东各被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当前革命的首要任务问题、共产党与各民族革命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等。为此，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萨发洛夫作了《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的报告。报告结合远东各国的实际情况，系统地阐述了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回答了被压迫民族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策略和前途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关于被压迫国家当前革命的首要问题，《报告》依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分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朝鲜等国后，这些国家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明确指出：摆在“远东劳动阶级面前的职务，第一件就是谋各被压迫国家的解放。”对中国劳动群众和中国共产党来说，“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土地收归国有，创立一个简单联邦式的民主主义共和国。”关于共产党与各民族革命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报告指出：对于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只要它是向帝国主义压迫作战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支持和帮助，而对于求助于帝国主义者或国际帝国主义外交的一切倾向和团体，则必须毫不怜恤地迎头痛击。共产党人何以要援助包括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在内的一切民族运动呢？其原因在于它是攻击帝国主义的，是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相协调的。与此同时，中国的劳动运动，中国的劳动者必须踏稳他们自己的脚步，不可和任何民主党或资产阶级分子混合。共产党人帮助无论哪种民族运动，也只看它不致向损害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走去，才帮助它。所以说：“谁不帮助民族革命运动的，是一个共产主义事业无产阶级革命的蟊贼。但是同时也要说，谁和无产阶级运动的觉醒为难的，也是一个民族革命运动的蟊贼，谁阻止全国无产阶级站在他自己的脚点上说他自己的语言的，也是一个中华民国的蟊贼。”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作用问题，《报告》强调无产阶级在运动中的特殊作用，及无产阶级要“独立前进”，要“在民族革命的运动中做领袖，党栋梁”；强调把中国人口最基本的群众——农民吸引到这场斗争中来的必要性，认为若不唤醒中国的柱子——农民，民族的解放是无望的。[①]总之，《报告》结合远东各国的实际状况，系统地阐述了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思想，并指明了中国民主主义的革命方向。

大会进行最后一项议程是通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宣言》。《宣言》揭露了帝国主义华盛顿会议的罪恶图谋，号召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在俄国和西方无产阶级的援助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首先，《宣言》痛斥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朝鲜等国家的残暴和无耻："日、美、英、法的强盗们正抢夺着四百兆人民的中国，以中国人民的血和泪造成他们生活的恬适。这些强盗们并不将被压迫的民族当人类看待。他们所图谋的只是利益，只是黄澄澄的金子，为了诛求这些，几百万人民的生命，在他们眼里，真不值什么。在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汉城等地外人居留地的公园和公共场所，中国人与朝鲜人和狗一例的被禁不得入内。"《宣言》揭穿了华盛顿会议侵略中国的阴谋："对中国他们所采用的，便是他们一切抢夺利益的分配要有个协调，而且承认在这个恶毒的侵略里要让美国资本来做领袖。……现在他们要组织一个新银行团，一个国际托拉斯来做中国军事财政实业的侵略了。"《宣言》明确提出，中国和远东被压迫民族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即要争取民族的"自由、平等和独立"，争取"建立一个公平劳动的制度"，"将土地从不劳而食的人们手中收归，将权力握在我们——工人和农人自己手里"。要向当前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和军阀宣战。"我们要对英、美、日、法和其他的世界强盗们宣布一个'死生以之'的战争，我们要向诡诈式的美国帝国主义和贪婪的英国投机家宣战，我们不得胜利，誓不休止！"为了实现上述革命任务，《宣言》号召建立国际的和国内的统一战线，"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向受虐待而却不愿再继续下去做奴隶的人们高呼"，勇敢地承担起向世界帝国主义开战的重任。《宣言》确信："我们定要得着解放"，胜利一定属于团结反抗压迫的远东各国人民。[②]

列宁因病未能出席大会，但始终关心着大会的进行。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中国铁路工人代表邓培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列宁办公处的会客室，在亲切和愉快的气氛中，张秋白请列宁对中国革命予以指教。列宁表示，他对中国的情形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的革命领袖，但不了解孙中山在这些年来做了些什么，因此不能随便表示意见。但列宁在谈话一开始就注意到中国革命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国共两党的合作问题。他转而询问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列宁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一定可以很好



的合作后，又以同样的问题问张国焘，并希望张国焘告诉他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形。列宁对他们的回答很满意。在告辞的时候，列宁紧握邓培的手，勉励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列宁的亲切接见和他对中国革命的宝贵指示，对于中国共产党制订自己的革命纲领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推动国民党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1922 年 2 月 2 日，大会在彼得格勒的大剧院举行了隆重的闭幕式。会场中挤满了大约 2 000 群众，季诺维也夫致闭幕词。彼得格勒工农代表和远东各国代表也相继发言，热烈祝贺大会圆满成功。大会在通过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宣言》后，宣告闭幕。

大会开幕前和闭幕后，中国代表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城市进行了参观访问。在莫斯科，代表们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历史博物馆和革命时代的地下工作纪念场所；在列宁格勒，代表们参观了帝俄时代俄皇的冬宫，以及富有历史意义上网十月革命起义总指挥部所在地——斯摩尔尼宫。这些活动使代表们倍受鼓舞。

这次大会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帝国主义性质，分析了华盛顿会议召开后的国际形势，宣传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总结了远东各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经验，指明了被压迫民族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对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原则，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922 年上半年，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回到了中国，及时将大会的精神向中共中央及各地区的共产党组织作了汇报和传达。这次会议对中国革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给中国共产党以很大的启示。特别是大会所阐述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以及被压迫民族革命的方针，对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和政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文献标注：

①萨发洛夫：《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连载于《向导》周报第 9 至 11 期，1922 年 11 月。

②《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宣言》，《先驱》第 10 号，1922 年 8 月 10 日。

军阀为争夺政府的控制权进行战争：直皖战争直奉战争

军阀为争夺政府的控制权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直皖战争，是1920年7月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为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在京津地区进行的战争；直奉战争，是1922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在中国北方进行的争夺战争。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达到了最高峰，美国由于受到欧战的牵制，把日本和段祺瑞政府看做镇压中国人民的唯一力量，勾结日本，共同支持段祺瑞对南方作战。因此有了1917年9月到11月签订的“兰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日本保证美国在华维持“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政策，这是美日暂时妥协的产物。但是这种暂时的妥协，并不能阻止两国之间矛盾的日益尖锐化，他们在妥协的同时，各自都在加紧培植在华的势力。日本扶植皖系的段祺瑞，美国则扶植直系冯国璋以及冯死后的曹锟、吴佩孚。这种情况反映在中国的政局上，就是直皖、直奉矛盾的激化以及最后直皖战争的爆发。

在由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代理北京政府大总统期间，实际上，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控制着实权。1918年9月，段祺瑞御用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10月，冯国璋被逐出了北京政府。皖系首领段祺瑞虽然辞去了国务总理，任参战督办，实际上一直插手政务；安福国会完全听命于段祺瑞，是皖系安插亲信、控制北京政府的得力工具；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在前台活动，负责编练参战军，作为皖系的政治资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改参战军为国防军，后又改为边防军。北京政权实际上仍由皖系控制。1919年6月，徐树铮被任命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总司令，11月，又以西北筹边使领督办外蒙善后事宜，使皖系势力伸入西北地区和外蒙。皖系势力的扩张和对北京政府的控制以及对直系势力的排斥和威胁，引起直系军阀



的严重不满。

1919年12月，冯国璋死后，曹锟、吴佩孚成为直系的首领。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直系军阀决定与皖系军阀争夺北京政府大权，他们利用人民群众反对皖系卖国的革命情绪，勾结南方军阀，联合奉系军阀，进行倒段活动，于是在1919年秋冬之间出现了直系四督（直督曹锟、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鄂督王占元）与奉系三督（奉督张作霖、吉督鲍贵卿、黑督孙烈臣）结成的反皖七省联盟。在反皖活动中，吴佩孚是急先锋。从1918年8月起，吴佩孚就连续发出"罢战主和"的通电。1919年10月，吴佩孚又联络西南军阀在衡州举行会议，签订了相互援助的军事密约，秘密组织军事同盟，建立救过同盟军，矛头直指皖系。1920年初，吴佩孚不断致电北京政府提出撤防北归的要求，段祺瑞认为吴军北撤必将威胁北京政府，而南军又会乘虚而入，于是授意北京政府不准吴佩孚的请求，阻止吴军北撤，可吴佩孚不顾阻拦，于5月领兵北上，他的部队驻扎在直、豫的各个地方。2月中旬，段祺瑞为部署阻吴佩孚北归的力量，逼迫国务院撤换与直系有关的河南督军职务，引起了河南督军的不满，于是以"保境自存"为借口，对段祺瑞采取对抗行动，参加了反皖阵线，使七省联盟扩大为八省联盟。1920年4月9日，直系军阀又以追悼在湘阵亡将士为名，在保定召集各省代表会议，暗中组织直、苏、赣、鄂、豫、奉、吉、黑八省的督军进行联盟，进行反对皖系的活动。7月1日，曹锟、吴佩孚公开发布反皖通电；7月4日，在直、奉两系活动下，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免去徐树铮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总司令等职，将边防军改归陆军部接收。

面临这种局势，皖系也在积极的部署，指使安福系密谋破坏八省联盟，召回徐树铮，将全部边防军调回北京附近。7月8日，段祺瑞由团河进入北京，在北京召集国务院成员和军政首脑联席特别会议，发出声讨曹锟、吴佩孚等人的通电，逼迫总统徐世昌下令对曹锟、曹瑛、吴佩孚褫夺官职。会上，段祺瑞将"边防军"改为"定国军"，以便讨伐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徐世昌被迫于当日将曹锟四省经略使兼直隶督军革职留任，免去吴佩孚第三师师长职务及所有勋位。段祺瑞在团河成立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军司令兼京师戒严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军司令兼前敌司令，魏宗瀚为第三路军司令，傅良佐为总参议。7月10日，皖系下达了总攻击令，战幕正式拉开。直系军阀为对付皖系的进攻，则组织"讨逆军"，将大本营设于保定，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

指挥西、中两路；东路由曹瑛、李景林为正副指挥。7 月 12 日，曹锟、张作霖、王占元、李纯、陈光远等联名通电讨段，吴佩孚等通电宣布段祺瑞、徐树铮的罪状。7 月 13 日，张作霖发布派兵入关通电。同日，段祺瑞发布讨伐曹锟、吴佩孚的通告。

7 月 14 日，直、皖两军正式开火，直皖战争爆发。直皖双方在河北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作战。

直皖战争分东西两路。西路在京汉路沿线，是主力战场；东路在京奉路沿线。7 月 14 日，双方胜负未决。直到 7 月 16 日，东西两路共打了两仗，都是皖军取胜、直军败退。7 月 17 日，战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张作霖正式表示支持直系，奉系数千人加入战斗，形势急转其下。当日，直军与奉军连取杨村、廊坊等地，徐树铮逃得知西路皖军战败，便逃往北京，皖军溃败，东路战事也以皖系的失败而告终。直系获得了直皖战争的胜利。面对败局，段祺瑞无计可施，只好请求徐世昌下停战令，7 月 18 日，徐世昌下令各方停战退兵。7 月 19 日，段祺瑞引咎辞职，7 月 23 日，直奉军进入北京北苑、南苑办理军事善后，控制北京局势。7 月 26 日，徐世昌下令撤销对曹锟和吴佩孚的处分。7 月 28 日，批准段祺瑞的辞职，撤销督办边防事务处和西北边防军的名义，边防军由陆军部遣散。7 月 29 日，北京政府下令通缉徐树铮等 10 名祸首。8 月 4 日，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皖系的壁垒完全倾覆。

这次战争，双方投入兵力近 10 万，主要是段祺瑞、徐树铮直接指挥的边防军和曹锟、吴佩孚指挥的直系军，而其他各省两派军阀的部队基本上未动，战争中被消灭的只是边防军，各省皖军军阀的地盘则很少变动。在这次战争中，除了有奉系直接出兵支援，还有南方桂系及其影响下的军阀对直系表示支持。

在战争结束以后，刚联手打败皖系的直、奉两系也产生了矛盾。8 月 4 日，曹锟、张作霖进京，与徐世昌就权力分配问题进行商讨。几经周旋，各方达成了权力分配方案：任命曹锟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吴佩孚为副使；北京政府处理国家大事必须先与曹锟、张作霖商量；曹锟、张作霖分别拥有直鲁豫三省和东三省的用人权，北京政府不得干涉；曹张全力维护徐世昌的总统地位和靳云鹏内阁。这样就出现了直系和奉系共同控制北京政府的局面。

直皖战争后，北京政府大权落到了以直系为主，直、奉两系军阀的手中。这种结局表明，英美在与日本争夺中国的斗争中虽然占了上风，但是日



本也并非完全失败，因为它所扶植、支持的另一个工具奉系军阀，与直系共同控制北京政权。其实，早在皖系势力遭到中国人民唾弃的时候，日本已经物色到奉系军阀张作霖，将其作为它下一步较量的工具。直系、奉系共同把持北京政府的事实表明美国、日本成了北京政府的共同主人。但是，随着英美与日本争夺中国斗争的日益激烈，以英美为后台的直系和以日本为后盾的奉系，不可能长期相安共处，直系和奉系军阀在直皖战争后的联合只是暂时的。为了扩展各自的势力，争夺北京政权，很快就由暂时的联合转为激烈的斗争。

直皖战争一结束，直奉之间的矛盾就逐步明朗化，并日益尖锐起来。在直皖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又继续扶植奉系与英美帝国主义控制的直系一起争夺中国的控制权。直、奉两系在战胜皖系的段祺瑞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分赃活动。直、奉两派军阀之间，就因分赃不均而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与此同时，他们又争先恐后地收编皖系残军，激烈地争夺内阁席位和各省地盘，各自扩充自己的势力。

直皖战后，直、奉两系军阀都在极力的扩展自己的势力。直系吴佩孚认为奉系张作霖在直皖战争中出兵甚少，而皖军所遗的大批军械都被奉系抢去，对奉系非常不满，几次想用兵夺回战利品。吴佩孚为了抬高自己，排斥奉系，1920 年 8 月 1 日，在没有通知张作霖的情况下，吴佩孚向全国发出了主张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以解决时局的通电，并宣布了国民大会的大纲。这也引起了张作霖的不满。

直、奉两系的矛盾，突出的表现在对地盘的争夺上。直皖战争后，领有东三省巡阅使头衔的张作霖，并不甘心只做东北王，要把奉系势力伸向蒙疆和长江流域；而领有直鲁豫三省巡阅使正副头衔的曹锟、吴佩孚，则想把奉系排斥在关外，由直系独霸关内的地盘，至于长江流域更是不愿奉系染指。直系在夺得陕西地盘的同时，江苏督军的职位被直系军阀齐燮元获得，并利用两湘发生战争的大好机会，于 1921 年 8 月夺得了湖北地盘，控制了湖南和京汉路，吴佩孚被任命为两湖巡阅使。直系军阀萧耀南做了湖北督军，孙传芳任长江上游总司令。直系势力的不断扩张，引起奉系的嫉恨。张作霖为了与直系势力的扩张相对抗，便同日本支持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结成联盟，把他的势力伸向浙江。此外，还与广东的孙中山联络，酝酿结成反直三角同盟。

直、奉两系争夺最激烈的是北京政权。直皖战后，北京政府的大总统仍

为徐世昌。双方为了控制北京政权，在内阁人选问题上更是大动干戈。靳云鹏原本是借助张作霖的力量上台的，开始时他亲奉，在财政上给奉军不少资助，但后来又改为亲直，支持直系扩张势力，特别是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使得他与张作霖的关系恶化，张作霖于是图谋倒靳。交通系和安福系的政客们群集于奉系门下，密谋依仗张作霖推翻靳云鹏内阁，拥护亲日派官僚梁士诒组阁。

1921 年 12 月 14 日，张作霖前往北京面见徐世昌，对靳内阁非议颇多。12 月 17 日，靳云鹏被迫辞职，由颜惠庆暂代。12 月 24 日，北京政府依张作霖的举荐，任命梁士诒为内阁总理。梁士诒上台后，立即赦免曾经遭到直系通缉的皖系军阀政客，抑制吴佩孚的军饷。再加上北京政府又控制在亲日派手中，所以，直系和奉系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梁内阁是一个亲日内阁。他上台时正值中日两国代表在华盛顿就山东问题进行交涉，梁士诒任命亲日派曹汝霖等以要职，竟然准备接受日本驻华公使提出的中日两国在北京举行秘密直接交涉，中国向日本借款赎回胶济铁路的建议，并签订了中日共管《条约》。他还下令赦免遭通缉的皖系人物。梁士诒的卖国行径立即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直系各省督军借这个机会接连不断地向全国发表通电，揭露梁士诒的各种丑行，逼迫梁士诒下台。1922 年 1 月 5 日，吴佩孚通电大骂梁士诒，还将矛头对准了幕后的张作霖。1 月 19 日，由吴佩孚带头，有苏、赣、豫、鲁、鄂、陕六省的督军和省长参加，联合通电要求罢免梁士诒内阁。1 月 20 日，北京召开了所谓的“外交联合会”。各省区自治联合会等 40 余团体联合通电，宣布梁士诒的 10 大罪状。梁士诒被逼无奈，于 1 月 25 日，以有病为借口出了北京城，内阁由颜惠庆暂代。梁内阁的倒台成了直奉战争的导火线。

1922 年 1 月 30 日，张作霖致电徐世昌，要求公布鲁案交涉经过，电文暗示吴佩孚以爱国为名，行打击异己为实，必要时他本人将“为民请命”。大战一触即发，双方都在积极部署兵力。

在直奉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吴佩孚是急先锋，曹锟由于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原本采取的是调和、退让的态度。此时，曹锟看到退让无济于事，为了保全直系的势力，曹锟才下了抵抗奉军的决心，并致电吴佩孚，表示听从吴佩孚的指挥，声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直系吴佩孚暗中勾结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让其牵制孙中山的北伐，同时又压服了与奉系暗通的豫督，把湘鄂等省的兵力集中在河南各主要地带。



1922年4月3日，以给吴佩孚祝寿为名，直系军阀云集河南洛阳商讨对奉系的作战计划。4月17日，直军在保定设大本营，吴佩孚任总司令，兵分三路：西路由吴佩孚自任总司令，吴佩孚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与奉军争保定以北的京汉路；东路以彭寿莘为司令，跟奉军争津浦路；中路以王承斌为司令，取守势。4月19日，吴佩孚通电要求奉军一律撤到关外，4月22日，曹锟致电张作霖，要求入关奉军仍回关外原防。4月25日，吴佩孚率领直系将领宣布了张作霖10大罪状。

面对直系的步步紧逼，奉系也在积极备战。奉军改名为“镇威军”，从4月10日开始，陆续进关。他们以军粮城为大本营，从军粮城、马厂、静海一直开到德州附近。奉军分两路进攻：东路由张作霖兼总司令，侧重于津浦及冀东，取守势；西路以张作相为总司令，侧重于京汉路，取攻势。4月19日，张作霖发出通电，建议召开和平统一会议。4月29日，下总攻击令，直奉战争爆发。

战争在东西两路展开。东路直奉两军在京汉线长辛店至琉璃河沿线以及固安进行激战，西路战事主要集中在马场。5月3日晚，西路直军在吴佩孚的指挥下，猛扑卢沟桥，奉军不支。5月5日，奉军第十六师倒戈，长辛店失守。西路溃败使奉军全线失去斗志，纷纷退却。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下令撤退。吴佩孚担心日本军队的干涉，未敢动兵追赶。

5月5日，徐世昌见战争已经分出胜负，下令奉军撤到关外，通缉叶恭绰、梁士诒、张弧三名战争祸首。5月7日，梁士诒、叶恭绰一同逃往日本。5月10日，北京政府下达命令，裁撤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北京政府下令免去张作霖的原职及兼任的各种职位。张作霖宣布对北京政府保持独立，改称奉军总司令，并对外发表宣言，表明了与北京政府的分裂、对抗态度。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张作霖自称“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闭关自治”，指使奉军在秦皇岛附近与直军交火。西方列强怕战争影响他们的在华利益，向张作霖提出警告，要求停火。在英美的调停下，双方签署停战条约，以榆关为界限，奉军撤回关外，直军留一部分驻守榆关，大部撤回原防。至此，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北京政权全部被直系军阀所掌控。

吴佩孚所谓“为民请命”的恢复法统

所谓法统，是指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是辛亥革命的产物，它从根本上废除了在中国延续了2 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确立了共和合法和帝制非法的政治观念。因此，“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它带有革命性和民主性。”[①]

但是，对于这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包括曹锟在内的所有北洋军阀统治者，无不深恶痛绝。他们或者肆意诋毁，或者公开拒绝恢复。张勋复辟时解散了根据约法而产生的第一届国会即旧国会。段祺瑞上台后仍拒绝恢复旧国会，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发起了以恢复旧国会为条件，以捍卫约法为目的第二次保卫民主的斗争，即护法运动。1919年2月，孙中山在护法宣言中就提出“国内纷争，皆由大法不立。在法律，国会本不能解散，若不使国会复得完全行使其职权，则法律已失其力，根本失摇，枝叶何由救正内乱何红永绝……故亦惟恢复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始能解除之”。[②]

事实上，曹锟蓄谋总统这个职位由来已久。早在段祺瑞利用安福国会举徐世昌为大总统的时候，曹锟“蓄意谋副座一席，为徐世昌暗中牵制，不能得志”。[③]

1922年4月底到5月初，直奉两系军阀之间爆发了争夺北京政权的直奉战争。战争的结果是直系取得胜利，奉系势力被驱逐到山海关外，北京政权完全由直系军阀所掌握。这样，直系统治着12省3特别区，又拥有被美国称之为“全国最好的军队。”但是，此时的曹锟只是一个直鲁豫巡阅使，北京政府大总统位置仍然被没有兵权的徐世昌所占据。曹锟为了登上其蓄谋已久的总统宝座，准备用武力赶走徐世昌，夺取大总统位置。但直系军阀内部对用什么方式拥曹锟上台，存在着分歧。此时直系内部分为保、津、洛三



派。其实，他们的政见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都支持曹锟，只是在拥曹锟为总统问题上有迟缓之分。

保定派，主要代表有王毓芝（直鲁豫巡阅使署秘书长）、高凌霨（内务总长）、吴毓麟（津浦铁路局局长）及巡阅使署各要人等，其中以王毓芝为首。他们主张趁战胜奉系的机会召集一个临时立法机关，不恢复国会，迅速将曹锟拥上总统宝座，并拟定以高凌霨为内阁总理。

天津派，主要代表有曹锐（曹锟的四弟）、王承斌（直隶省长）、边守靖（直隶省议会议长）、吴景濂（众议院议长）、张绍曾等，其中以曹锐为首。他们主张恢复法统，召开旧国会，但由于1917年6月，黎元洪曾违法下令解散国会，不应重为国家元首，他们反对黎元洪复职，主张由国会重新制宪，选举曹锟为总统，然后再改组内阁，并拟定以张绍曾为内阁总理。

洛阳派，主要代表有吴佩孚、萧耀南（湖北督军）、张福来（河南督军）、孙传芳（长江上游总司令）、高恩洪（吴佩孚的电务处处长）等，其中以吴佩孚为首。吴佩孚虽然是曹锟的部下，却掌握着直系的军队。吴佩孚一心想要“武力统一”全国，但鉴于民国以来的《临时约法》和国会毕竟还是共和的象征，孙中山据此在南方护法，是直系军阀独裁专制的一大障碍。吴佩孚便施展其反革命的伎俩，阴谋利用孙中山的护法旗号打倒孙中山。吴佩孚看到南方护法政府曾坚持“唯恢复旧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④]为南北议和统一的唯一条件，他也看到旧国会的大多数议员已经和孙中山的南方护法政府分道扬镳，如果恢复旧国会，同意护法政府的条件，护法政府就会失去根据而不能存在，可以不战而胜。恢复了旧国会，实际上就否定了违背民元约法而产生的安福国会，这样由安福国会所选举的大总统徐世昌也可以不胫而走，因此，吴佩孚主张恢复法统，召集旧国会，同时迎下台总统黎元洪复职，补足总统任期，然后再利用旧国会选举曹锟为总统更为名正言顺。

其实，吴佩孚的主张也是根据美国的意旨设定的。美国为了建立表里如一的强有力的直系中央政府，早在1922年1月就提出让直系“赶走徐世昌，而让黎元洪补足总统任期”，这样不仅加强了直系的独裁统治而且也可以使南方的统一谈判困难消除。[⑤]这里美国已明确告诉直系要恢复旧国会，迎黎复职，完成所谓统一，而后拥直系做总统。

早在直奉战争之前，南北方已经酝酿恢复旧国会，当时已经脱离南方护法国会的吴景濂与各方接洽，商讨具体事宜。4月19日，张作霖发表通电，

建议召开和平统一会议，恢复旧国会。吴景濂想通过梁士诒联络奉系，结成奉、皖、孙（中山）联盟，共同反对直系，驱逐徐世昌，拥戴孙中山为总统，张作霖或段祺瑞为副总统。但是，直奉战事发生后，奉系战败，直系掌控北京中央政府，吴景濂等便开始改变策略，而此时直系愿意恢复旧国会，于是，吴景濂转而依靠直系恢复国会。在吴景濂的鼓吹下，吴佩孚决定全力支持恢复法统，同意拥黎元洪复位。

为了统一直系内部纷争，1922 年 5 月 10 日，曹锟、吴佩孚召集直系高级将领在保定召开了恢复法统决策会议，商讨如何进行政治善后的问题，旧国会两院议长吴景濂、王家襄也参加了会议。一致同意采取恢复法统的办法，先统一全国，然后用国会选举曹锟为名正言顺的总统。[6]这样，曹锟也主张恢复法统。

直系确定恢复法统后，又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便开始实施恢复法统。1922 年 5 月 15 日，在吴佩孚的指使下，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通电全国，不仅公开提出恢复法统，还提出请黎元洪复职，立即引起全国舆论的关注，电文指出："巩固民国，宜先统一。南北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历届统一之归束，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共选副座。非常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既复，异帜可销。"[7]曹锟、吴佩孚首先让孙传芳通电全国，一方面为了试探各方对此事的反应；另一方面是为了企图掩人耳目以防阴谋泄露。5 月 19 日，以曹锟、吴佩孚率直系督军联名发出征求恢复旧国会的通电，得到了一大批军阀和政客的响应，给他们的主张抹上了民意色彩。吴景濂、王家襄等如约到天津筹备第一届国会复会工作。5 月 24 日，旧国会部分议员在天津召开第一届国会筹备会，讨论复会工作，决定选派委员到上海、广州等地，招揽议员回京，并对外通电，声明第一届国会将于 6 月 10 日依法自行集会。

5 月 27 日，吴佩孚致电徐世昌，告以解决时局的办法可分"常局"和"创局"，实际是暗示徐世昌准备下台 5 月 28 日，孙传芳第二次通电，说孙中山和徐世昌是恢复法统的"事实障碍"，要排除障碍就必须请"两先生体天之德，视民如伤、敝屣尊荣，及时引退。"[8]明白提出请徐世昌下台。

徐世昌刚开始态度非常坚决，决不退让。他曾亲口说："现在大权操之吴氏（吴佩孚）之手，要如何便如何耳，吾之地位不保，尚暇论其他，然而无新任总统选出，吾不能去也。"[9]徐世昌想请直系元老王士珍组阁，由于曹锟是王士珍的部下，而且吴佩孚对王士珍也比较恭敬，"使王氏出而组



阁，直系虽不同意，而为面子计，绝难加以反对”，北洋两大元老共同支撑局面，直系应该不会过分刁难。但王士珍当时已经知道直系要从根本上解决总统的问题，“助徐则无以对直系，且不能奏功，助直又无以对老友”，[10]不愿卷入其中，所以拒绝了徐世昌的提议。加之吴佩孚派人不断劝说，最后，徐世昌在直系摊牌之后不能不有所表示。5月31日，徐世昌发出通电：“一有合宜办法，便即束身而退，决无希恋。”[11]实际上，他想拖延，不想爽快下台。于是，曹锟、吴佩孚又抬出旧国会。6月1日，以王家襄、吴景濂为首的150多名旧国会议员在天津正式集会，宣布国会恢复，并指出1917年6月张勋入京时的国会解散令无效，1918年的安福国会为非法国会，还历数了徐世昌“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种种罪行”，并指出“徐世昌之伪大总统，既系选自非法大总统选举会，显属篡窃行为，应即宣告无效”；[12]宣称即日起，应由旧国会完全行使职权，再由合法总统依法组织政府；西南各省因护法而成立之一切特别组织自应于此终结。同时，吴佩孚还在当日致电在北京的直系干将、交通总长高恩洪，实际上是对徐世昌进行威胁。6月2日，吴佩孚的驻京代表钱少卿数次致电徐世昌，语气强硬地质问他何时离开北京。中午，徐世昌设宴迎接刚回国的驻英公使顾维钧，席间接到吴佩孚迎黎元洪复职电。在直系军阀和旧国会的逼迫下，6月2日，徐世昌称病辞职。

国会正式行使职权，护法宣告结束。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军阀借恢复法统之名，迎请黎元洪依法复任大总统之位。其实严格来说，黎元洪和民国五年的那个国会早已期满，并不存在所谓恢复的问题。但吴景濂给出的理由是，黎元洪在张勋复辟的非常时期离任大总统，不能视为自动离职，所以应该将他迎回并补满任期，等任期结束后再重新选举大总统。

面对直系的邀请，黎元洪自然有所动心，但黎元洪心里也清楚，直系并非真心拥戴他上台，只不过是利用他出来过渡一下。因此，黎元洪开始并不想去趟这趟浑水，便拒绝了。在黎元洪拒绝之后，曹锟、吴佩孚加强了邀请的力度，他们先后派出自己的代表熊炳琪、李济臣，还有国务院代表、交通总长高恩洪等人亲自去黎府，盛情相邀。与此同时，各督军也纷纷通电，请求黎元洪以国事为重，出面挽救危局。但是，黎元洪本人知道他的总统任期早已经届满，任期必成法律问题，对此还有所顾虑。于是，在徐世昌辞职当天（6月2日），曹锟、吴佩孚领衔通电要求黎元洪，各军政要员，如，萧耀南、田中玉、齐燮元、王怀庆、许世英、刘承恩等人纷纷致电黎元洪，盛

情相邀。接着，曹锟、吴佩孚的代表亲自上门劝说。最后，几十名旧国会议员在旧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旧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的带领下上门劝说，国务院也派出代表前往游说。在重重包围中，黎元洪和幕僚们商量，不能随便被他们摆弄，要提出条件。6月6日，黎元洪发表了通电，这封电报是跟随黎元洪多年的幕僚饶汉祥所写。在电文中，黎元洪深刻批判了军阀时期的恶政：军阀统治，无人不兵，无兵不匪；各省督军，拥兵为雄，搜刮民财；武夫争霸，连年征战，兵连祸结；督军擅权，破坏民治，滥用威权；武夫权重，干涉政治，政潮迭起。最后，黎元洪以“废督裁兵”为条件，要各省督军立即解除兵权，还政于国家，才愿意出任大总统。曹锟、吴佩孚虽然很愤怒，但还是答应了，姑且敷衍一下黎元洪。于是，在曹锟、吴佩孚的建议下，冯玉祥首先通电表示支持，陕西督军刘镇华、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等人也假惺惺的随声附和，表示愿意听命。黎元洪还派出代表要求曹锟、吴佩孚给予切实保证，并要求等到全体督军都通电支持后才肯复任总统。6月11日，黎元洪在旧国会两议长王家襄、吴景濂及其国务院代表周自齐等人的陪同下，一起登上了返京的列车，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大总统复职典礼。黎元洪入京代行大总统职权。6月14日下令撤销1917年6月12日“解散国会令”。8月1日，旧国会议员召开会议，正式恢复国会，实现了直系的所谓“法统重光”。

孙中山虽然以前主张恢复国会，但是后来旧国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旧国会大多数议员投靠了军阀，成了声名狼藉、唯利是图、毫无节操的政客，旧国会众议院长吴景镰，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也投靠直系。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已经不主张恢复旧国会。在徐世昌退辞后，直系军阀迎黎元洪复职时，孙中山发表了对外宣言公开声明“予今以中国事实上，法律上唯一政府行政首领之资格”，[13]警告列强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对于黎元洪复职，孙中山表示“假使列强承认北京之伪新总统，则其行动为干涉中国内政，其结果更劣于承认徐世昌也。”[14]吴佩孚用护法倒孙中山的阴谋不能实现，于是又暗中勾结陈炯明。陈炯明“国会恢复，伪府取消，护法目的已达。黄陂复职、法律之争应候法律解决”，[15]6月16日，叛将叶举联同各将领以“国会恢复，护法告终”为词，发出请孙中山下野的通电。叛军还在广州市区张贴粤军总指挥叶举署名的四言布告也有同样的内容，“国会恢复，护法告终，我军将士，一致赞同，促孙下野，以示大公。商民人等，幸勿惊恐”。[16]护法的旗帜为军阀所利用，护法运动终被南北军阀所扼杀。陈炯明炮轰总统



府，迫使孙中山离开广州，搞垮了南方护法政府。

注释：

①《毛泽东选》第5卷，第127页。

②⑬⑭《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0页、第440页、第440页。

③刘楚湘：《癸亥政变记略》，第3页。

④《孙中山全集》第4册，新民书局，中华民国16年6月6版，第7页。

⑤刘大年：《美国侵华史》，第131页。

⑥⑮陶菊隐：《北洋军阀史话》第6册，第122页、133页。

⑦⑧⑪张梓生：《黎元洪复职记》，《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号。

⑨陶季良：《壬戌传信录》，1922年6月1日，《近代史资料》总77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58页。

⑩《徐世昌全传》，1922年刊印，《北洋军阀（1912-1928）》第4卷，第198页。

⑫《中华民国史料》。

⑯《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211页。

粤桂战争

第一次粤桂战争，是桂系军阀陆荣廷，与效忠孙中山、由陈炯明所指挥的粤军，在1920年至1921年之间爆发的一场战争。主要作战地为广东、广西两省，又称两广战争。第一次粤桂战争以桂系的失败告终，桂系的势力受到严重打击。第二次粤桂战争实际上是第一次粤桂战争的延续，爆发于1921年6月，广西军阀陆荣廷，与掌握广东“中华民国政府”实权的陈炯明所爆发的战争。主要作战地为广西。

1920年北方直皖战争爆发不久，南方也发生了粤桂战争。

在反袁护国的战争中，南方滇、黔、桂、粤、湘、川六省先后宣布独立。袁世凯死后，1916年7月6日，北京政府下令将各省将军、巡按使改名为督军、省长，并任命陈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陈宧未到任前由陆荣廷暂署督军；任命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庆澜为省长，陆荣廷未到任前由龙济光暂署督军。这样安排就是为了阻止陆荣廷接任广东督军，使龙济光继续控制广东。北京政府的这一任命，引起粤人的公愤，纷纷通电反对。而陆荣廷对北京政府对其的命令也毫不理睬，将桂军主力调往广东，迅速到达肇庆，10月就职广东督军，龙济光退往琼州。1917年3月，北京政府又任命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陆荣廷的亲信陈炳焜为粤督，谭浩明为桂督。从此，两广成为陆荣廷的势力范围，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军阀已经形成。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重掌北京政府大权的段祺瑞不肯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由上海到达广州，8月召开非常会议，9月孙中山被选为大元帅，成立护法军政府，掀起了护法运动。桂系军阀为了巩固两广地盘，防止北洋军入侵，并谋求大发展，便企图利用孙中山的影响和护法军的力量来壮大声势，抬高自己的地位，所以对护法军政府并不公开发表反对，但是也不予支持。当时，支持孙中山比较坚决的力量，是海军和驻粤滇军的一部分和少数国会议员。孙中山想在海军和驻粤滇军之外，建立一直真正属于军政府的护法部队。广东省长朱庆澜原有警卫军40营，督军陈炳焜



借口军权统一，要求接收这批部队，朱庆澜被迫交出20营，仍留20营编为省长亲军，以陈炯明为司令。陈炳焜坚持全部接收，但朱庆澜坚决不肯，双方争执不下。1917年7月孙中山到达广州发动护法，朱庆澜对此表示欢迎。桂系军阀对朱庆澜非常不满。朱庆澜在桂系军阀的排斥下，于8月下旬辞去省长职务，陈炳焜推举李耀汉为省长，并以督军命令接受了20营省长亲军。护法军政府成立后，桂系军阀为了自身的生存和扩张，也以“护法”的名义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除自己出兵湖南外，还要求国民党出兵福建以牵制北洋兵力，于是不得不向国民党做出让步。11月间决定将陈炳焜调走，莫荣新继任粤督，并将省长亲军20营交由陈炯明指挥。这样，孙中山才算有了一支由军政府指挥的部队。但是，这支部队在桂系的牵制和监视下很难发展。于是，1918年1月陈炯明便以粤军总司令的名义将部队带到汕头，准备开往福建。1918年5月，西南军阀唆使非常国会改组军政府，孙中山的护法主张无法实现，便辞去大元帅职务，离开广州到汕头与陈炯明会见，随即转往上海。

1918年9月，陈炯明以援闽粤军总司令的名义率20营的兵力进占闽南的漳州、南靖、漳浦、长泰、云霄、同安等地。皖系的闽督李基厚允许陈炯明在闽南立足，并给以军饷、武器的援助。

孙中山为了继续“护法”，决定打倒桂系军阀，夺取广东，将广东作为进行民主斗争的根据地。孙中山把实现自己计划的希望，寄托在他所培植起来的陈炯明的粤军身上。这时，粤军的势力已经壮大，已由原来的20营发展到108营。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后，8月12日，陈炯明在漳州公园举行誓师大会，决定兵分3路回粤，由许崇智、叶举、邓铿指挥，向潮汕梅县一带进发，粤桂战争爆发。

1920年8月16日，粤桂战争开始。粤军士气旺盛，桂军望风而溃。粤军接连攻取蕉岭，大埔等地，桂军前锋被击败。浙军观望形势而按兵不动，滇军主动后撤避战，形势对粤军十分有利。粤军随后攻占潮汕地区。莫荣新调集兵力到东江抗击粤军，双方在揭阳、陆风、海丰、紫金、兴宁一带展开拉锯站，激战到9月上旬，粤军攻占东江地区所属河源，海陆丰各县，一直推至惠州城下，桂军败退不支。桂军在集中兵力阻挡粤军进攻的同时，为了防止广东地方派军人有变，又调集亲信部队加强广州的防守。但是由于广东人民痛恨桂军的搜刮，各地军民纷纷揭竿而起，与此同时，桂军统治下的广州也接连发生异动：9月17日，虎门要塞司令宣布独立，广九铁路也被军

民拆毁不能通车；粤籍将领魏邦平、李福林秘密将所属部队调到广州对岸的河南，联合致电莫荣新，要求他解除兵力，将粤省治权还给粤人，率师回桂。莫荣新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表示同意撤军，但在桂军军饷和开拔费问题上，同广东省议会、各团体及地方派军人反复讨价还价，迟迟不肯撤军，这其实是莫荣新的缓兵之计，以待前线战事的变化。但是，前线的战局对桂系越发不利。

10 月 21 日，粤军攻占东江地区重镇惠州。10 月下旬，粤中要地全被粤军占领。10 月 22 日，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见大势已去，只得通电辞职。10 月 24 日，当时的广州警察厅厅长魏邦平和驻粤福军总司令李福林，在广州河南岸宣布独立。当日陆荣廷以四总裁名义宣布护法军政府解散，并宣布取消护法，与北京政府南北议和。10 月 26 日，桂系督军莫荣新率残部逃出广州，接着，在粤的桂军向广西撤退，粤军追击、拦截，战争仍在继续。11 月中旬，粤军占领肇庆、廉州，直到 11 月下旬，桂军全部退出广东，返回广西，粤桂战争结束。

1920 年 11 月下旬，孙中山偕同唐绍仪、伍廷芳从上海返回广州，受到广东军民的热烈欢迎。第一次粤桂战争以桂系的失败而告终，桂系的势力受到严重打击。

陈炯明迎接孙中山返回广州重组护法军政府。1921 年 5 月，广东召开非常国会，宣布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政府”，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同时通电劝告北京政府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辞职，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延续。5 月 5 日，孙中山就职，再度举起护法旗帜。旧桂系退兵回广西后，因广西贫瘠落后，难以解决各部军饷。各实力派首领的政治地位、权力分配难以平衡，陆荣廷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开始减弱。为了平定桂系，以除内忧，1921 年 6 月，孙中山以大总统兼陆军大元帅的名义，率领粤、滇、黔、赣 4 省军队入桂，讨伐桂系，并且约定湘军会攻。与此同时，陆荣廷为解决其内部的矛盾，也集重兵于梧州准备重新夺取广东。自从第一次粤桂战争结束后，桂军虽然退回广西，但在粤桂边境，桂粤两军还是时有冲突，粤桂首领都未公开宣布停火，所以，第二次粤桂战争被视为第一次粤桂战争的延续。

1921 年 6 月 13 日，桂军沈鸿英部出兵进攻广东，北江防军赖世璜、李明扬等部败退韶关。陈炯明派第一师师长邓铿为北江总指挥，抵抗沈军，第二次粤桂战争爆发。



桂军陈炳焜部将刘震寰部在开战后不久就宣布独立，并帮助粤军于6月21日骗出守军，袭取广西门户梧州，打开了广西的大门。6月26日，孙中山以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7月初，粤军收复被桂军占领之粤西地区的连县，连山等地，并攻入广西。李烈钧在桂西北成立“滇黔赣讨陆联军总司令部”，准备向桂林、柳州进攻。6月底，滇军攻克了柳州。7月9日，因形势不利于桂系，桂系内部分裂。沈鸿英自称“救桂军总司令”，宣布广西自治，与陆荣廷脱离关系，并与粤军接洽合作，柳州、桂林、贵县等地的桂军也纷纷脱离陆荣廷的指挥，以谋求自保。旧桂系彻底破裂。7月中旬，粤军南下攻击在钦廉地区的陆荣廷嫡系部队，重创陆荣廷的嫡系部队，陆荣廷的部队已经基本丧失作战能力。8月，粤军、滇军、新编湘军、赣军会攻并占领了桂林。陆荣廷见大势已去，便于7月16日通电下野，由南宁逃往龙州。8月5日，粤军没有遭遇任何抵抗而进占南宁，9月3日，攻占龙州，陆荣廷取道越南，转往上海流亡。至此，广西全部被攻克。第二次粤桂战争结束。

第二次粤桂战争仅仅持续了一个多月，桂系政权便被彻底摧毁。除桂系首领陆荣廷被迫流亡外，不少桂系的实力派由于暂时与粤军合作，所以并未受到很大的损失，这也为日后广西陷入割据势力混战而埋下了伏笔。此外，虽然主要来自桂系陆荣廷的威胁被解除了，但杨希闵的滇军、刘震寰的桂军以及湘、赣、黔等军队，又都趁机进入了广东。这就造成了以后更大的祸患。

两次粤桂战争均以桂系的失败而告终。1922年粤军退出广西，广西各割据势力蜂拥而起，进行混战，陆荣廷趁机返回广西，广西政局更加混乱。1925年，出身旧桂系下级军官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击败了陆荣廷、沈鸿英，控制了广西。此后，旧桂系彻底退出民国政坛。两次粤桂战争也使得陈炯明的势力迅速扩大，因与孙中山政见不合，陈炯明于1922年5月发动政变，在南方政府内部驱逐了孙中山。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

20 世纪 20 年代初，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严重，就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于 1921 年 7 月成立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列强无暇东顾，给日本以可乘之机，日本大肆从中国攫取各种利益，使中国几乎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而到 1921 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三年多了，各主要参战国基本上恢复了国民经济，又有力量侵略、掠夺中国，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不愿意日本独占中国，要把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于是在美国提议下，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得到落实，又使中国落入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华盛顿会议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一、增加商品输入。1921 年底，中国人口贸易总值是 668.7 万美元，比 1913 年增加了 60%。由于外国大量倾销商品，大大地限制了中国民族资本工商业和农业的发展。二、加紧对中国金融的控制。1914 年，外资银行在中国只有九家，而到 1922 年初，达 10 余家。通过银行，帝国主义主义有条件地向军阀贷款，紧紧地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命脉。三、增加工业投资。从 1918—922 年，日本在华纱锭增加了 158%。[①]在外资企业的排挤打击之下，华资企业破产、倒闭的很多。

国内军阀之间混战不休。由于美、英与日本在中国的争夺，直接导致了他们各自支持的中国各派军阀之间的混战与争斗。美国为保护其“门户开放”政策的实现，大力支持直系；日本为了维护其在华特殊利益，以达到其独占中国的企图，乃积极扶持皖系和奉系。于是北洋军阀内部直系、皖



系、奉系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扩大，导致了一系列的军阀混战。与此同时，各地方军阀之间也混战不休。军阀混战，造成了社会的混乱，破坏了生产力，损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了中国人民痛苦的生活。

面对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和封建军阀混战而造成的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当时中国国内的各政治派别纷纷提出了自己解决时局的政治主张。1922 年 4 月底到 5 月初，直奉两系军阀之间爆发了争夺北京政权的直奉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奉系势力被驱逐到山海关外，北京政权完全由直系军阀所掌握。直系军阀“武力统一”全国的野心增长了。6 月 1 日，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下野，新任总统黎元洪以“废督裁兵”作为“复职”的条件。在南方，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高唱“联省自治”，反对孙中山北伐。6 月 16 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军事叛乱，炮轰孙中山总统府。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转赴上海。其他军阀也都依据实力的大小，或推行武力统一，或主张联省自治。这时，资产阶级学者胡适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由“国内的优秀分子”出来组织一个“好人政府”，以便早日召开南北和会、实行裁兵裁官，改良选举制度、公开财政等。

局势的发展使得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发表一个对时局的主张，以阐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中共中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一致认为国际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的压迫，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根源，不从根本上推倒旧制度，不论是“废督裁兵”，还是“联省自治”都是一句空话；“好人政府”的主张散布改良妥协的幻想，只会阻碍革命的发展。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消灭列强在华各种特权，肃清军阀，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应当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共同反对列强和军阀的双重压迫。上海的党员建议党中央尽快发表一个声明，而不必等待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于是，推举陈独秀起草文件并经中央局讨论修改后一致通过。最后，党中央又派人携文件到北京征求李大钊和北京党组织的意见，得到了一致的赞同。

1922 年 6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以下称为《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也是党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政治声明。《主张》全文分为 10 个部分，在这一重要文献中，党的民主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挥，民主革命纲领的主要原则已经提出。

《主张》第一次比较详尽地分析了近代中国的政治状况，正确地阐述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它指出，自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相继发生了几次反抗斗争和改良运动。辛亥革命“推倒了几千年因袭的帝政”，“在中国政治

史上算是开了一个新纪元”。但是，辛亥革命因与北洋军阀的妥协而失败，中国“名为共和国家，实际上仍旧由军阀掌握政权，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明确地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独立的封建国家”，[②]处于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之下。

接着，《主张》逐一批驳了“恢复国会”、“联省自治”、“好人政府”、“废督裁兵”等政治主张，指出这些主张都不能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决不能依靠这些空想和谬论去改革政治、挽救时局，并且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时局的政治主张。

驳斥了“恢复法统”的主张。有人提出恢复民国的法统，以此来统一中国，结束战乱。但是在封建式的北洋军阀之下，总统和国会议员的“命运都在军阀卵翼之下，绝对不能有有力的民主主义的党派与群众为后援，何能裁制军阀实行民主宪法建设民主政治?”[③]明确指出在军阀统治之下，绝对没有民主政治可言。

驳斥了“吴佩孚不是反对民主主义的人”的看法。指出：吴佩孚的对皖作战，对奉作战，“乃是为个人或直系受政治上的压迫而战，未尝有丝毫表示为民主政治而战”。[④]揭穿了吴佩孚高喊“劳工神圣”的假面具。

驳斥了“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主张。当时有人认为中央权力太大，所以引起各军阀为控制中央而争斗不休，主张分权，削弱中央权力。《主张》指出“在第三阶级民主政治的理论上，联省自治是没有可以非难的地方”，“但是我们所认为不违背民主主义的联省自治，是由民主派执政的自治省联合起来，组织联省政府，来讨平非民主的军阀政府，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而现在这些人所说的联省自治，实际上是：“依照现状的各省联合为一联省自治的政府和北京政府脱离就算完事，因为这乃是联督自治不是联省自治……这种联省自治不但不能建设民主政治的国家，并且是明目张胆的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⑤]揭穿了“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实质上是搞封建割据。

驳斥了“好人政府”的主张。当时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之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好人自命清高”不肯出来执政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社会上的优秀分子站出来和恶势力斗争，组织好人政府，这是政治改革的唯一方向。《主张》指出，这种主张实际上仍是在封建军阀的统治之下，幻想通过政治上的改良，谋求中国出路，肯定是要失败



的。不出中国共产党所料，1922年9月成立的“好人政府”，只存在2个多月就被迫解散了。

驳斥了“废督裁兵”的主张。指出，在军阀统治下，废督裁兵无异与虎谋皮。只有打倒军阀，才能真正实现废督裁兵。

《主张》在驳斥了各种错误的政治主张以后，指出了中国当时的乱源是军阀和帝国主义。《主张》指出：“要解决纠纷的时局，必须由历年许多纠纷的事件里面分析出纠纷的共通病根所在，然后才能够找出真能解决纠纷的道路”。按照此方法，《主张》分析了从民国元年到民国11年的7次战争，指出：“无论是民主派和北洋军阀之理想及势力冲突”，还是“军阀内讧”，“这两种纠纷的共通病根就是军阀存在”。“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6]只有打倒军阀政治，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那么，如何才能打倒军阀政治呢？《主张》鲜明的提出：“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具体步骤是：“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因为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双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的不可免的战争。”[7]

《主张》明确了现阶段的革命对象是军阀和帝国主义，革命的性质民主革命，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民主政治，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农民、资产阶级民主派等，这些为党制定民主革命纲领作好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它是中共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政治声明。党的“一大”，是在秘密情况下召开的，“一大”所制定的党的主张都是秘密的，而现在，向全国人民公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党，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第二，它第一次比较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状况、社会性质，指出了革命战争的对象、革命的性质、革命的目标和革命的动力，它所提出的基本原则为中共二大召开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第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地分析了其他各种政治主张的错误所在，指出了社会革命的实质是革命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政治统治，社会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指出以往革命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没有能够夺取国家政权。也指出，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不能成功的。第四，第一次指出国民党比较是革

命的民主派，提出我党在当时应与革命的民主派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民主革命，这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打下了一定基础，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思想的最早探索。

但《主张》还存在一些不足。它虽然比较正确地分析了辛亥革命的意义及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但却没有认识到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所在；它未能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是农民；未能提出在联合战线中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领导权问题。

注释：

①张模超，郑志庭：《中国现代史》，重庆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第69页、第70页。

②③④⑤⑥⑦《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先驱》第9号，1922年6月20日。

中国共产党认为国民党是革命的民主派

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6月1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到国民党是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但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开始就对国民党有这样的认识，这个认识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有其突出的优点，那就是从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指出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奋斗目标。但是，这个《纲领》并没有对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作出全盘的、具体的分析，对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基本任务也没有明确的规定，说明刚诞生的党对中国当时的国情还缺乏深刻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确定了党的工作重点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工人运动，在这两个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措施，并且立即付诸行动。但是，在《对现有政党的态度》中却写道："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我们应该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①]据参加中共一大会议讨论的陈潭秋回忆："在讨论对孙中山的态度与关系时，曾发生过小的争论，包惠僧认为我们对孙中山，应当与对北洋军阀一样，甚至还要更严厉些，因为他在群众中有欺骗作用。他的意见，被大家打击以后，当时通过下列原则：对孙中山主义，采取批评态度，而对某些进步的运动，则采取党外合作的形式来援助他"。[②]可见，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在对待国民党的态度问题上是存在分歧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会在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采取怎样态度的问题上存在争论和分歧，尽管有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原因，如，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刻的认识，缺乏实际的工作经验，还不懂得应该怎样

妥善处理一些复杂的问题。但是，当时国民党自身确实存在严重的弱点：它虽然推翻清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国，但由于其自身的软弱性，使得革命的果实最终落到袁世凯的手中；国民党提不出一个能够引导全国人民继续前进的政治纲领；国民党内部的成分越来越复杂，组织涣散，严重脱离群众。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虽然存在着缺点，但它终究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无法忽视的重大因素，它与其他政党不同，有着明显的优点。

孙中山自19世纪末开始就投身于争取民族解放和反对清朝政府的革命活动中，发动过许多次革命武装起义，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使中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在这以后，虽然其处境日益艰难，遭受过几次严重的挫折，但是仍然没有放弃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军阀势力的奋斗。

1920年，孙中山扶植起来的陈炯明粤军从闽南回师，击败桂系军阀陆荣廷，光复了广州。当年11月底孙中山到达广州，再次打起“护法”的旗号，通电宣布恢复军政府。1921年4月7日，孙中山在广州出任非常大总统，在广东建立起了一块革命根据地。

孙中山对社会主义一直抱着同情的态度。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孙中山曾致电苏俄政府表示祝贺。他曾在上海会见过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派来的代表维经斯基。孙中山还关心中国劳动人民的命运，积极支持工人运动，特别是给予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的代表张继。1921年12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党员张太雷的陪同下到广西桂林会见了孙中山，他们先后进行了3次长谈。孙中山在会谈中表示，他虽然并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他的思想是同马克思主义一致的。马林在1922年写也文章谈到他会见孙中山的印象：“孙逸仙及其战友非常清楚，特别是在推翻清王朝以后，民族主义方面的矛头应该针对日益增长的外国帝国主义的影响。”他还讲到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经济斗争发展成为反对香港英国当局的民族主义斗争，国民党的领袖每天都与罢工者取得联系，为他们提供活动场所并以各种方式支持海员的斗争。”他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如果他们想要在工作中取得成就，就应注意与华南民族主义运动保持友好的关系。”“我们的任务试图将这些革命民族



主义分子联合在一起，并将整个运动向左推动。”③

随着实践斗争经验的不断积累和理论水平的不断提高，进入1922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客观分析和研究。

1922年4月底，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局成员、各地负责人和广州部分党员，共20多人，还有少年国际代表达林。达林在会上提到：“南方人是能够解说孙中山的反帝立场的”，“毫无疑问，孙中山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在其政权所及的地区，力图建立民主制度，实现民族自治，允许自由出版，自由开展工人运动和组织工会等等。”“孙中山掌权的南方，和军阀、外国帝国主义掌权的北方之间，有天壤之别。南方的气氛完全不同。工会、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都是完全合法的。”④这次会议虽然在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具体问题未能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但达林提到关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情况是事实，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确与其他政党不同，对此中国共产党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22年5月初，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些问题，作了初步的阐述。劳动大会宣言指出：“我们前面的敌人是很多的，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也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认为这些敌人一日不除掉，我们一日不能得到些微的自由。我们现在是需要这种自由的，而且我们不能忍受那种压迫和杀戮，所以我们要结合全国的农人，至于小资产阶级，暂时联络，共同向着那些敌人奋斗，争得我们的自由。”⑤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在这个时期所发表的言论，与以往相比，也发生了变化。陈独秀在《告做劳动运动的人》一文中，提出“劳动者在自己阶级（即无产劳动者阶级）没有完全力量建设革命的政府以前，对于别的阶级反抗封建式的政府之革命党派，应该予以援助；因为援助这种革命的党派成功了，劳动者即少可以得着集会结社出版罢工底自由，这几种自由是劳动运动重要的基础。”⑥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国民党的认识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正在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从主义的探讨逐渐转到对中国社会现状和当前革命任务的研究上。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对象，已经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中国现阶段的革命目标已经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民主主义；改变了过去排斥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提出无产阶级应该联合其他阶级，积极参与和赞助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

1922 年 6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是党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政治声明。《主张》突出强调："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若没有较新的政治组织——即民主政治，来代替现在的不良政治组织——即军阀政治，这样状况必然要继续下去的。"[⑦]《主张》批驳了"恢复国会"、"武力统一"、"联省自治"、"好人政府"、"废督裁兵"等政治主张，依据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党。但是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队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主张》对民主派进行了定义，指出："真的民主派，必须有两种证据表现于人民面前：（一）他的党纲和政策必须不违背民主主义的原则；（二）他的行动必须始终拥护民主主义与军阀斗争。"特别强调："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而表示于公众的三民主义和发展实业计划，都是民主主义的色彩；他们的行为，除了革命运动以外，该党议员民国元、二年及六年在国会和敌党抗争的内容，以及广州政府不禁阻劳动运动和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废止压迫罢工的刑律等事，都算是维护民主政治的表示。"同时，《主张》也指出了国民党存在的缺点：他们的纲领不完全，"他们的党内往往有不一致的行动及反对外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对内两次与北洋军阀携手；国民党为保存他在民主革命上的地位计，这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中国共产党还主张"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因为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双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的不可免的战争。"[⑧]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指出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的进展，是对国民党作出的明确的肯定的评价。显然，这个态度的转变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认识到应该把党的最高纲领和现阶段奋斗目标分作两步来做，越来越多地把考虑的重点放在当前斗争的实际需要上来。这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打下了一定基础，这也是我党关于统一战线思想的最早探索。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8页。

②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9页。

③马林:《中国南方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207页、第211页、第212页。

④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81~84页。

⑤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6月8日。

⑥《先驱》第7号,1922年5月1日。

⑦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5页、第44~45页。

国是会议与国宪大纲

在军阀混战，直系军阀高举“恢复法统”的大旗，准备用“武力统一”全国，各省军阀纷纷宣布制定省宪推行“联省自治”的时候，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大力宣传制宪，企图利用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取得政治上的控制权，以“法治”、“自治”的名义削弱军阀的专制。

1920年7月，直系和皖系爆发了直皖战争，最后以直系的胜利和皖系失败而告终。早在皖系军阀执掌北京政权时期，就出卖国权、乞借外债、解散国会、军事独裁、搜刮民财，广大人民群众对皖系的统治深恶痛绝，于是，不少人就把在直皖战争中取胜的直系看作是民主对专制的胜利，认为实现民主政治的良机到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推行“武力统一”的同时，于1920年7月27发出“感电”，提出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国民自决”，企图利用民意来扫除皖系残余势力，压制奉系张作霖，取缔南方孙中山的护法。吴佩孚的这一主张，正好迎合了一部分资产阶级的需要。他们认为，在南北对峙、和谈不成、旧国会废止的情况下，只有国民大会是国民“万死一生之机”,[①]是应付时局、监督政府、建立根本大法的好办法。胡适、梁启超等资产阶级人士纷纷发表文章，表示赞助召开国民大会。此外，北京、上海、山东、安徽等地的资产阶级团体也纷纷发起国民大会促成会、国民大会策会进、国民大会促进会、国民大会协进会等组织，召开各种会议来协助、促进国民大会的进行。

关于国民大会的进行方法、职权等问题，各地资产阶级人士和团体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方案。北京的蔡元培、彭一湖、王文彬等提出召集国民大会急需解决的8个问题：解散新旧国会、废督裁军、撤销南北议和、惩办祸国罪魁、禁止起用复辟帝制犯、废止治安警察条例、追缴安福系党证并剥夺该党党员公权以及制定宪法等。此外，湖北各界联合会和武汉学界联合提出国民大会组织法10章33条；上海、北京、苏浙等地纷纷召开国民大会筹备会；河南组织各界联合会，设立筹备处，以为全国国民大会的先声，掀起了



准备国民大会的热潮。

但是，资产阶级希望召开的国民大会与直系吴佩孚主张的国民大会并不是一回事。吴佩孚只不过是想借着民意来扩张自己的政治势力，而不是由国民完全行使国家权力。因此，当资产阶级的主张明显超过了军阀的要求时，直系军阀首先强行解散了上海的国民大会促进会，之后，吴佩孚又连续发表讲话，表示他所主张的国民促进会的目的是“统一南北”，是“一时政治问题”，而各团体主张由国民大会制宪理财等，均为“偏激之论”，[②]是企图“擅更民国大法”，“实属革命行为”。[③]这就沉重的打击了正在热烈准备国民大会的资产阶级团体，所谓的国民大会运动也就此终止了。

国民大会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国民自决思想还是继续发展，部分资产阶级人士提出由国民直接动议制定宪法，并且由国民直接实施，国是会议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1920 年 10 月，蔡元培在结束国际教育会议后回国，正值全国商界、教育界会议，蔡元培便建议商界、教育界开联席会议，共同谋求解决国家和平统一大计，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的赞同。于是，在聂云台、黄炎培的主持下，两会合一，开联席会议，商讨取消不平等条约、废督裁军、清理财政等问题，并“建议”政府实行。但是，他们的建议并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和影响，于是，他们便抛弃“建议者”的身份，以“主人”的身份直接决定治国方针，号召公民实行。

1921 年 10 月 5 日，上海商会联合会成立，随后，商会联合会与教育联合会合并成为商教联合会，主张在上海召开国是会议，以谋求从根本上解决国家问题。10 月 5 日，向各省的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农会、律师工会、银行公会、报界联合会发出通电，发起七团体国是会议。通电指出：“我国民苦水火久矣。政治纠纷，法律失效，兵戈满地，灾祲频仍，国命民生不绝如缕。共和国家，主权在民，载在约法，乃竟听其摧残，不加督责，吾民其何以自解?”号召各团体“策群力以拯颠危，集众思以谋国是”，“本互助之精神，筹救亡之大计”。教育界代表高语罕等提出应该有工界代表参加国是会议，可是受到部分商界代表的反对，经过反复磋商和讨论，最后决定工界加入，于是形成了八团体国是会议。

其实，国是会议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很软弱。在会议筹备的过程中就有人指责国是会议不能代表全体国民，还有人反对国是会议，认为它受官僚政客的操纵。当时直奉战争在即，南方第二次护法已经出兵北伐，能否通过人民

团体会议解决纷争局面，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因此，各省应邀团体多在观望。

1922年3月15日，八团体国是会议在上海举行开会式，定名为“中华民国八团体国是会议”。虽然复电表示参加会议的有20个省区71个团体，但是实际出席会议的只有8个省区27个代表，致使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开茶话会，无法开正式会议。这是一个无党无派，人民自由集合讨论国是的团体。这一会议主要是由上海总商会和江苏省教育会倡导，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港澳教育会会长黄炎培、沈恩孚等为领导者。这次会议主要反映了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的政治主张。在“讨论国是”、“制成宪法”的口号下，“中华民国八团体国是会议”提出了明确的参政要求，主张各省自制省宪，并且依据联邦分权的原则，各省联合制定国宪，希望借助宪法来完成统一法治，实现全国的和平。把北洋军阀的政权分给地方的自治团体。

在1922年5月6日的会议里，14个省区的代表决议由各省自制省宪，再由各省联合制定中华民国的国宪，并组织了一个“八团体国是会议国宪草拟委员会”，延请宪法学者张君劢主持其事。宪法起草工作从1922年6月下旬开始，1922年7月中旬，发布了他们所拟定的“国宪大纲”，其内容完全采纳“地方分权”的联邦制。

1922年7月下旬，褚辅成（慧僧）邀请旅居上海的“各省名流”集会讨论联省自治，参加集会的有章炳麟、柏文蔚、徐谦、曹亚伯等，以及川、湘、滇3省的代表和国会议员多人。褚辅成在会上解释了此次集会的主要目的：联络各省同志，组织一个联省自治的运动机关，从社会方面分道进行，以赞助国会议员与西南当局，希望实现联省自治。集会最后决定在上海组织“联省自治促进会”，并推举曹亚伯，褚辅成等7人为筹备员。当天下午，八团体国是会议的国宪草议委员会召开第五次常委会，章炳麟、张君劢、张东荪等人参加了该次会议。

宪法草案共11章106条，经过讨论修改，1922年8月15日，国是会议发出通电，表示了对国家制宪的看法，并决定草拟宪法草案以供全国人民采纳，其主要内容有：（1）定中华民国为联省共和国；（2）列举联省政府与省政府之权限；（3）定国防军不过20万人，分驻国防要地，岁费不得过联省政府岁出20%；（4）定各省军队改为民团；（5）限定何种为联省政府收入，其余通为各省收入；（6）定军人解职未满3年者，于联省政府及省政



府，皆不得当选为省长；（7）定现役军人不得以文字向公众发表政治意见；（8）国民教育生计及自由。从这8条主要内容可以看到，宪法草案迎合了当时联省自治的要求，促进联省自治者主要是针对当年军阀割据各省的局面，视联省自治为和平统一中国、建立永久性联邦（省）政制的工具，反映了资产阶级裁军、反对武人干涉、和平统一发展实业的愿望。

国是会议起草了两种宪法草案，一种是由章太炎起草的，一种是由张君劢起草的，两种宪法草案同时于1922年8月18日公布。两种宪法草案虽然都以联邦主义为出发点，但还是存在一些差异，其差异主要体现在：章太炎起草的宪法草案主张政府应该采用委员制，张君劢起草的宪法草案主张政府应该采用总统制。相比较而言，张君劢拟定的宪法草案对《中华民国宪法》影响很大，成为《中华民国宪法》的蓝本。

宪法草案公布后，资产阶级对之进行了大力宣传，在上海连续组织专场会议，请张君劢、章太炎演讲宪法起草经过和内容，援引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法说明该宪法草案是可行的。但实际上，该宪法草案知识资产阶级自己的欣赏品而已，对军阀没有任何约束作用。在直系高唱恢复法统，准备恢复旧国会，钦定宪法时，国是会议把宪法草案送交旧国会，希望作为制宪参考，所谓的人民制宪也屈服于军阀制宪，于是，资产阶级又回到商教联席会初期的“建议者”的立场。

1922年9月中旬，张君劢在上海《太平洋》杂志发表了《国是会议国宪草议》，对联省组织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关于联省政府的立法与行政事权，提出外交、陆海军、币制银行、邮政、劳动法、产业公有法等27项；关于省的立法与行政事权，提出省之官制官规、省之税法、省以内之实业、省之民团、省之警察、卫生及慈善、省监狱等15项。还规定了各省应该自行制宪，但是，联省法律的效力在各省法律效力之上。并对保证联省的民主政制作出了一些重要的规定：“联省政府应保证各省之民主政治。如一省内政体变动，有违反本宪法或该省宪法者，联省政府应干涉之；各省有不能履行本宪法上之义务者，联省政府应督促之；甲省有以武力侵犯乙省者，联省政府应阻止之。”很显然，要实施这一条文，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联省（中央）政府，也就是说，联省（中央）政府要拥有正规的军队力量，并且军队力量是用于国防，但是，间接的起到稳定国内政局的作用。为了避免局部的政变，以至于影响大局，又注明：“中华民国之团体发生变动，各省得互相联合，维持宪法上规定之组织，至原状恢复时，各省之行动应即停

止”。[4]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完全采纳了“地方分权”的联邦制，其内容大部分是抄袭德国、法国、意大利等联邦国家的宪法，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军阀的妥协性，虽然《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罗列了不少人民的自由权利，但是，关于这种自由权利的保障，则只用“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和“非依法律不得侵犯之”等一类的空头文字加以规定说明，这无疑为军阀随时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大开方便之门。而对于封建军阀统治的现状，则只字不提，避而不谈。所以，这个《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实际上与袁世凯的约法没有太大区别。

这部闭门臆造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对时局并没有起到任何实际性的作用。因此，有一些人又把制宪的希望寄托于旧国会，表示“对旧国会回复，制定宪法一层，自应也表相当的赞同”。[5]后来，曹棍贿选上台后宣布了旧国会所制定的宪法，但是这个宪法完全是直系军阀的护身符，这也使得依靠国会制宪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

文献标注：

①②③《晨报》，1920 年 8 月 7 日，1920 年 9 月 25 日，1920 年 9 月 19 日。

④《太平洋》，1922 年 9 月 15 日。

⑤《东方杂志》第 19 卷第 21 号。



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

“武力统一”是北洋军阀势力较大的一派镇压人民、吞并异己，实现专政独裁的一贯伎俩。早在袁世凯当权时代，就用兵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和白朗起义，后来，又发动了对护国军的战争。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各个派系，皖系军阀段祺瑞接替袁世凯控制了北京政权，继续“武力统一”的政策。

吴佩孚在贪黩腐朽的北洋军阀中，是具有反革命的机智者。1918 年，段祺瑞讨伐西南时，吴佩孚首先与西南停战，通电反对段祺瑞“武力统一”的政策，主张和平；1919 年五四运动时，吴佩孚反对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主张废除中日密约，支持学生运动；后来，还公开揭露梁士诒的亲日卖国行为；吴佩孚还一度伪装支持工人运动，发表过“保护劳工”的主张。在全国人民极端痛恨皖系军阀反动统治的时候，吴佩孚的这些姿态，曾经骗取了一些同情。有人甚至误认为他是“革命将军”，对他抱有很大的幻想。

1922 年 4 月底到 5 月初，直奉两系军阀之间爆发了争夺北京政权的直奉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奉系势力被驱逐到山海关外，北京政权完全由直系军阀所掌握。战败奉系后，直系吴佩孚的声势大振。英美帝国主义吹捧他为“中国模范之统将”。美国为他运来价值 300 多万美元的军火，卖给他大量的武器，为他训练飞行人员，修建飞行机械厂。英国向他提供到级铁路借款 150 万英镑，英国人莫立斯和格林，成为他的政治顾问，支持他进一步“武力统一”中国。一时间，吴佩孚的巡阅使所在地，成为北方政治军事的中心。北京政府国务院总理、总长以下军政要人，纷纷奔走于吴佩孚门下。1923 年吴佩孚 50 岁生日，各方显要到洛阳祝寿的就有六七百人。这使得吴佩孚的野心极度膨胀，一心要实行“武力统一”全国的政策，取得袁世凯那样的地位，建立以他为中心的直系独裁政府。吴佩孚计划把全国划分为九个军区，将全国军队编成 40 个师，军政大权权归中央。

鉴于民国以来的临时约法在人民心中毕竟还有共和的象征，孙中山在南

方的护法运动，是直系军阀独裁统治的一大障碍，吴佩孚在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同时，继续作了一些装点门面的工作。1922 年 5 月，直奉战争一结束，吴佩孚就制造了一个“恢复法统”的骗局，给旧的独裁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5 月 15 日，在吴佩孚的指使下，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和陕督刘镇华等通电主张恢复国民初年的旧国会，请黎元洪复任大总统，要求徐世昌与孙中山同时去职。接着，吴佩孚又发电威逼徐世昌下野。吴佩孚用此来取消孙中山护法的根据，并借此来抵制正在形成中的联省自治运动，同时赶走徐世昌。按照吴佩孚的意旨，6 月 1 日，旧国会议员 150 人在天津开会，即日行使职权。6 月 2 日，徐世昌退位，曹锟、吴佩孚电请黎元洪复职。6 月 11 日，黎元洪入京当大总统。6 月 14 日，下令撤销 1917 年 6 月 12 日“解散国会令”，于是，“法统恢复”了。重新上台的黎元洪和就国会只是直系军阀掩饰其武力统一的工具。吴佩孚打算在征服川湘之后，赶黎元洪下台，捧直系首领曹锟登上大总统之位。为了揭穿直系军阀的阴谋，孙中山于 6 月 6 日发出废督裁兵的宣言，提出他的“兵工计划”。吴佩孚伪善地赞成孙中山的兵工计划，假惺惺地表示，他的第三师，可作为孙中山兵工计划的“实验品”，用以掩饰他的武力政策。“法统重光”后，吴佩孚自信已经是“无敌将军”。1923 年 3 月，吴佩孚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公开提出“武力统一”，的主张，联合直、鲁、豫、晋、陕、甘、苏、皖、赣、鄂 10 省，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妄图以武力统一全国。他一面大规模的秣马厉兵，积极准备打到关外去，对付要向他报复的张作霖；一面把势力伸向南方，勾结粤军军阀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北上北伐，指挥孙传芳、沈鸿英、杨森等军阀进攻福建、广东、四川、湖南等地，制造有利于直系的军阀混战。

在势力强大的中央军阀高唱“武力统一”的时候，各地军阀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掀起“省自治”或“联省自治”的运动，与“武力统一”的政策相对抗。所谓“联省自治”，并不是指民主国家的联邦制，其内容只限于省宪运动，就是省宪，也并没有真正民主意义，只不过是地方军阀玩弄政治，谋取自保的手段。

最早鼓吹“省自治”和“联省自治”运动的是湖南军阀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湖南是军事要地，民国以来多次成为战场，受害最深，湖南督军兼省长的皖系军阀张敬尧残暴贪婪，更加激起湖南人民的自治要求。1920 年 5 月 20 日吴佩孚撤兵，湖南人民赶走张敬尧后，谭延闿、赵恒惕乘机控制了湖南，利用各阶级人民要求退出南北政争，排除战争纷扰，实现“湘事湘



人自决”的愿望，首先树起“自治”的旗帜。1920 年 7 月，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发表“祃电”，宣布湖南自治的宗旨。旅居京沪的湖南名流也都群起相应。熊希龄等在北京还请梁启超代拟《湖南省自治法》和《自治法大纲说明书等》寄回湖南，推动省治。谭延闿于 9 月中旬邀集在省官绅开自治会议，提出由省政府和省议会各派 10 人起草湖南自治法。9 月下旬，谭延闿决定由省议会先拟定“宪法会议组织法”，再根据这个“组织法”召集制宪会议。湖南一些进步人士和激进的青年对此做法很不满，反对议会包办制宪。10 月 10 日，长沙各界万余人冒雨举行市民自治运动游行大会，要求政府立即召集人民宪法会议，实现真正的自治。谭延闿一面假意应付，一面却以“以应急需”为借口，急图制宪。正在此时，湖南军阀发生内混，1920 年 11 月 23 日，湘军总指挥赵恒惕取代谭延闿，继任湘军总司令兼代理湖南督军职务。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赵恒惕继续推行“自治”和“制宪”运动。11 月 25 日，召集省议会选举林支宇为省长，正式宣布自治，同时发表“联省自治”的通电。并派人到四川等地联络，以期相互呼应，推进“联省自治”。同时，由赵恒惕一手包办，清省内外知名学者起草“省宪草案”，1921 年 4 月 21 日公布。“省宪草案”经过所谓“审查委员会”的“审查”，1922 年 1 月 1 日公布了“湖南省宪法”。

湖南军阀首先倡导的“省自治”和“联省自治”，先后得到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浙江、江西、奉天等 14 省军阀的相应。

1921 年 2 月 21 日，四川军阀刘湘通电宣称“完全自治”，最先相应“联省自治”的主张。7 月，湖北发生兵变，一部分在湘赣将军乘机驱逐鄂督王占元，赵恒惕以“援助鄂省自治”为名，与四川刘湘联合，组织援鄂军攻入湖北，并相约攻鄂胜利后，在长沙组湘鄂川联合政府。8 月 11 日，赵恒惕通电各省，主张在汉口召开“国民大会”，草定各省省宪，采取联邦制制定国宪。后因吴佩孚乘王占元兵败进入湖北，使联合政府计划落空。西南的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也高唱“自治”，以图割据自保。贵州军阀卢焘于 1921 年 4 月 2 日通电主张“联省自治”，组织“省宪会议”，表示与湖南一致行动。广东的陈炯明也秘密与赵恒惕勾结，抬出“联省自治”，阴谋取代孙中山，独占广东。

浙江督军卢永祥是皖系的残余势力，皖系失败以后，他受到直系的压迫，想假借自治老抵抗直系，并保护自己的地盘。于 1921 年 6 月 4 日通电主张实行省宪。组织了省宪起草委员会，9 月 9 日公布《九九宪法》。卢永

祥不是要真正实行省宪。1922 年，卢永祥操纵下的省议会以《九九宪法》未经全民投票复决为名，决定再由省人民自行提出宪法草案，《九九宪法》作为草案之一，由审查委员会审查。这样，1922 年 11 月在杭州召开的审查会上，将草案归为三类，以红黄白识别，名为“三色宪法草案”，这些文件都是空文。

江西的直系军阀陈光远，处在湖南赵恒惕、广东陈炯明和浙江卢永祥的威胁下，唯恐“联省自治”各省派兵入境，直系主力远在北方，求援不及，通电响应“联省自治”为缓冲，授意省议会召开“省宪会议”。当吴佩孚率兵入鄂挫败湘川援军后，陈光远就摘下了“自治”的招牌。

张作霖在直奉战争失败后，回到东北，1922 年 5 月 11 日宣布“自治”，并通过奉、吉、黑省议会及商教农联合会推举自己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假借“自治”维持统治，伺机再起。

一些地方还组织了自治运动的团体，如江苏、安徽、江西等 12 省和北京代表就组成了“各省区自治联合会”，直隶、山东、河南等 14 省代表组成了“自治运动同志会”，还有“自治运动联合办事处”、“旅沪各省去自治联合会”等组织，其中有的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民主要求，而有的则是一些官绅、政客、军阀借“自治”为军阀摇旗呐喊。除此之外，全国上下的许多群众组织也都纷纷要求自治，以改良腐败的政治，使中国能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

对于“联省自治”，胡适则认为，只有“省自治”可执行“分权与民”和“发展县自治”的政策。只有“联邦式的统一”可以打破割据局面。只有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可以解决当时的时局，只有公开的会议可以代替终究必将失败的“武力统一”。由于胡适主办的《努力周报》的大力鼓吹，“联省自治”论一时沸沸扬扬，几乎成了医治中国社会病症的“灵丹妙药”，好像是中国一旦实行了“联省自治”，就可以从此独立自主，人民也可以当家作主了。

就在“省自治”和“联省自治”掀起高潮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对于时局的主张》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针对当时舆论界流行的几种错误的政治观点和政治言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批评了“联省自治”论。

当“联省自治”的呼声高涨的时候，吴佩孚又发电报给赵恒惕，反对“联省自治”。8 月份，直系的各个将领田中玉、孙传芳、萧耀南、陆洪涛在



吴佩孚的授意之下纷纷发表通电，咒骂“联省自治”论是“邪说奸谋，天人共愤”。他们主要针对赵恒惕和卢永祥，但也间接地向一些热衷于“联省自治”的知识分子当头泼了一瓢冷水。

在军阀势力的统治下，各省的自治运动虽然规模大，呼声高，但都没有发生民主的实效，只是地方军阀面对大军阀侵吞威胁，为了割据一方，以图自保而打出的旗号，也是地方军阀在民主政治深入人心的形势下，为缓解和人民反军阀争民主的斗争，维持封建统治所玩弄的一种政治手段。三、两年后便销声匿迹了。

不论是“武力统一”，还是“联省自治”，都是军阀之间用来争权夺利的一种手段，其实质是一样的。正如蔡和森指出的：“力能进取的军阀，便倡武力统一，或主张有力的中央政府（如曹、吴）；仅能自保或希图自保的军阀，便倡自治或筹备制省宪、举省长（如川、滇）；同一军阀，进攻时宣布武力统一，退守时宣布省自治（如奉张）……，凡此种种，无非是封建的残局之下，军阀专政、军阀割据的必要现象”。[①]

文献标注：

①蔡和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向导》周报第2期，1922年9月22日。

“好人政府”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各帝国主义国家扶植的军阀势力为了争权夺利，不断进行混战，经济衰退，民不聊生，使得中国的民族危机和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日益严重。面对这些情况，国内各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或政党，先后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张。其中，一部分不满于现状而又不愿意走革命道路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及地主阶级中的开明绅士，幻想着在对现有的政治制度不做根本变更的情况下，通过政治上的改良，来谋求中国的出路，改良思潮一时广为传播。“好人政府”主义就是这个时期诸多改良思潮中的一种。

1920年9月，美国公使芮恩施发表了《对于中国时局的建议》，极为露骨地暴露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该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在政治方面，认为中国政治腐败的原因在于缺少像美国那样的代表人民利益的国会，建议中国要“确定大法，守之勿渝，步美前尘”，[①]“苟有政治家挺身而出，顺国民之需要，立代议之机关，则救国之业垂之无穷”。[②]在经济方面，以实现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借款为目的，建议中国当首先利用外债，在“十年以内建设二万英里之铁路，与二万英里之马路”，此外，还要“多辟商港，便利国际贸易”。[③]而为了实现这些建议，中国政府必须要“政治修明”、“国基稳固”、“财政公开”。这个所谓的“建议”，正为胡适等人的“好人政府”主张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1921年10月5日，上海商会联合会成立，随后与教育联合会合并为商教联合会，主张在上海召开国是会议。1922年，又有工界、农界、银行界、律师界、新闻界、省议会等六个团体加入。1922年3月15日，在上海召开“中华民国八团体国是会议”，该会议主要反映了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的组织主张。在讨论国是、制成宪法的口号下，提出了明确的参政要求，并且依据联邦分权的原则拟定了国宪大纲，希望借助宪法完成统一法治，实现全国的和平。胡适等人对此表示赞同，也主张采用联邦制，召集



各省的联合会议，公开讨论国家问题，解决政治上的纠纷，实现地方自治。胡适等人既希望冲破军阀的“武力统一”，但是又害怕人民的革命运动，他们企图利用现有的政治机构，成立所谓的“好人政府”，即在维持地主买办阶级统治的前提下，吸收一批“好政治家”、一流的政治人才进入政府，以此来完成政治上的“革新”。而此时吴佩孚“恢复法统”的行动，使得胡适等人认为实现其“好人政府”的时机成熟了。

在1922年4月到5月的直奉战争中，为曹锟和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打败了奉系的张作霖，直系军阀对了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趁机进行欺骗宣传，宣称恢复所谓的“法统”，制定宪法，以此给直系军阀的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5月14日，吴佩孚密电北方军阀，征求关于“恢复法统”的意见。吴佩孚所谓的“恢复法统”，就是恢复洪宪帝制失败后所建立的“法律秩序”，恢复1917年被黎元洪解散的旧国会，继续遵行《临时约法》。吴佩孚企图通过恢复旧国会来取消南方孙中山护法的根据，并借此来抵制正在形成中的联省自治运动，同时还可以借此赶走徐世昌，以黎元洪为过渡的工具，在他征服川湘以后，赶黎元洪下台，捧直系首领曹锟登上大总统之位。胡适等自命清高的“好人”，想利用此机会依靠吴佩孚的力量，实现其政治上的改良主张。于是，吴佩孚在保定召开会议的第4天，也就是1922年5月14日，《努力周报》第2期刊登了蔡元培、王宠惠、胡适、梁漱溟等15名北京大学的教授、教员于5月13日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恢复旧国会，阐发了“好人政府”主义的主张。

胡适等人《我们的政治主张》中，首先提出了政治改革的目标是组织一个“好政府”，并指出组织“好政府”是“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会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发官吏”；积极的方面是“充分运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及“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他们还提出了三项政治改革的基本原则，即“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提出了六项政治改革的具体主张：早日召开南北和平的会议；以恢复旧国会、制定宪法等项为南北议和的条件；裁兵；裁官；改良选举制度；公开财政。这三项政治改革的基本原则和六项的具体主张与1920年9月美国公使芮恩施在《对于中国时局的建议》中的论调如出一辙。

除了这三项政治改革的基本原则和六项的具体主张，胡适等人还提出如何实现这些基本原则和具体主张。他们指出：“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

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要有奋斗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认为，正是因为“国中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民国初年才有了新气象，而民国五、六年以来的“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是由于“好人袖手旁观”造成的，“好人”是“罪魁祸首”，号召“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他们断言，只要有几个“好人”出来组织“好政府”，中国就能得救，不必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此外，他们还诬蔑孙中山的革命行动是倒行逆施，吹捧陈炯明反对孙中山“是一种革命”。

胡适等人的改良主张是在不触动封建军阀政权的前提下的一种改良主张，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软弱的政治要求，这正好被吴佩孚所利用。直系军阀“恢复法统”的步伐加快了。

胡适等人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后，5 月 15 日，在吴佩孚的指使下，直系将领孙传芳、刘镇华等发出通电，主张恢复法统，请黎元洪复任大总统，召集旧国会，速定宪法，要求徐世昌与孙中山同时去职。6 月 1 日，旧国会议员 150 人在天津开会，即日行使职权。6 月 2 日，徐世昌退位，曹锟、吴佩孚电请黎元洪复职。6 月 11 日，黎元洪入京当大总统。6 月 14 日，下令撤销 1917 年 6 月 12 日“解散国会令”，于是，“法统恢复”了。

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以后，由于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只是直系军阀掩饰其武力统一的工具，实际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曹锟和吴佩孚的手里，在内阁的组织问题上一直都有争执。黎元洪开始时拟定伍廷芳为国务总理，由于遭到反对，又改由颜惠庆为国务总理，但所定的阁员大都不肯就职。8 月 5 日，黎元洪又任命唐绍仪国务总理，由他来组阁，但是吴佩孚容不下国务总理唐绍仪、司法总长张耀曾和农商总长卢信等人，唐绍仪组织的内阁遭到吴佩孚的坚决反对。吴佩孚之所以反对，主要是因为他想组成一个受他自己所操纵的内阁。此时，他正好利用了几个胡适等人口中所谓的“好人”入阁，吴佩孚想利用这些颇有声望的人来装饰门面，欺骗人民，捞取政治资本，同时又可以利用亲信使内阁受他操控。于是，他向黎元洪提出由王宠惠组阁。黎元洪没有兵权，只得向吴佩孚屈服，经过反复周折，解除了唐绍仪的内阁，9 月 19 日，王宠惠出任国务总理，组成内阁。其内阁成员有外交总长顾维钧，财政总长罗文干，陆军总长张绍曾，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徐谦，教育总长汤尔和，内务总长孙丹琳，交通总长高恩洪，农商总长高凌蔚。新



内阁中的国务总理王宠惠、教育总长汤尔和、财政总长罗文干都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中署名，都是“好人政府”的鼓吹者，他们和外交总长顾维钧都是亦学亦仕的英美派人物，不属于国内党派，因此该届内阁也被称为“好人内阁”或者“好人政府”或者“英美派政府”。内务总长孙丹林和交通总长高恩洪都是吴佩孚的亲信，内阁实际上由孙丹林和高恩洪主持，“好人内阁”成了吴佩孚的工具。

“好人政府”成立后，在重重矛盾中，处境实为艰难。此时，不仅有总统、国会、军阀间的矛盾，还有直系军阀内部曹锟和吴佩孚之间的矛盾。吴佩孚虽然是曹锟的部下，但是吴佩孚对直皖战争和直奉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使得他的声望迅速提高，不免引起曹锟的猜疑。曹锟和吴佩孚之间的裂痕也更加明显了。曹锟驻军在保定，他这一派被称为“保派”，吴佩孚驻军在洛阳，他这一派被称为“洛派”，保派和洛派都属于直系，他们共同的政治利益使他们之间的争执不可能诉诸于武力，而是通过北京政权内部的政治风潮表现出来。此时，曹锟急于想当总统，竭力主张先选总统再制定宪法，但吴佩孚认为先制定宪法再选总统更有利于统治，对选举总统的事表示淡漠，而是忙于练兵，为其“武力统一”做准备。这使得保派和洛派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由于“好人政府”被吴佩孚的洛派所控制，处理事务时明显偏向洛派，它向洛派提供的军费大大超过保派，保派对之非常不满，保派和洛派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于是，曹锟便联络倾向保派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副议长张伯烈准备推翻“好人政府”，驱逐黎元洪，使自己早日登上大总统的宝位。同时，“好人内阁”也遭到了河南议员的强烈反对。广大人民群众更是纷纷斥责“好人内阁”的奴仆行为。在这种形势下，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以及外交总长顾维钧被逼得无可奈何，只好一一辞职。

11 月 18 日，吴景濂和张伯烈控告财政总长罗文干擅自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从中接受贿赂，逼迫大总统黎元洪下令步兵统领逮捕罗文干，送交地方检察厅。这是保派对洛派的一次攻势，也是对幻想依靠军阀实现其改良主张的“好人”的一次打击。事情发生之后，吴佩孚立即作出反应。11 月 20 日，吴佩孚致电黎元洪指出黎元洪未经内阁同意便下令逮捕内阁成员有违法之嫌，黎元洪迫于压力只好释放罗文干，并当面向罗文干道歉。11 月 23 日，曹锟致电北京政府要求组织特别法庭审讯罗文干，曹锟和吴佩孚的矛盾公开化。接着，直系要员王承斌、卢永祥等人也纷纷发电指责吴佩孚干

涉政府事务，要求严惩罗文干。连吴佩孚的嫡系亲信张福来、萧耀南也发电响应曹锟。吴佩孚看到自己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四面楚歌，为了摆脱困境，11 月 25 日，吴佩孚发电表示对罗文干的案件毫无成见，对曹锟始终服从，对元首也始终拥护。吴佩孚的屈服，使得“好人政府”失去了靠山，11 月 25 日，王宠惠的内阁垮台，保派、洛派之争暂时平息了。这样，仅仅存在了 72 天的“好人政府”就夭折了。

“好人政府”的垮台宣告了“好人政府”主义的完全破产，证明在封建军阀的统治之下任何改良主义都是不现实的，都是无法实现的。《向导》杂志揭穿了胡适等人“好人政府”的骗人实质。指出，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下，“想以好人努力的方法将政治整理向宰割势力利益的反面，这不是呆小子的梦想。便是骗子手的许诺”[④]“若忘记现状。以为改变一种政体就可以止乱定国。那不将乱源嫁于政体。便将政体认为是止乱的方法，胡适之先生完全犯了这种错误”。[⑤]

文献标注：

①②③《东方杂志》第 17 卷，第 18 页、第 113 页、第 115 页。

④君宇：《王博士台上生活应给“好人努力”的教训》，《向导》第 5 期，1922 年 10 月 11 日。

⑤蔡和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一军阀专制与军阀割据》，《向导》第 2 期，1922 年 9 月 22 日。



制宪救国与废督裁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扶植的军阀势力为了争权夺利，不断进行混战，经济衰退，民不聊生，使得中国的民族危机和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日益严重。面对这些情况，国内各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或政党，先后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张。其中，一部分不满于现状而又不愿意走革命道路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及地主阶级中的开明绅士，幻想着在对现有的政治制度不作根本变更的情况下，通过政治上的改良，来谋求中国的出路，改良思潮一时广为传播。制宪救国与废督裁军也是这个时期的改良主张。

制定一部民主宪法，通过这一途径达到救国治国的目的，这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时的报刊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东方杂志》在1922年11月出版了两期《宪法研究号》。制宪和省自治两种政治主张，在很多地方是重叠的。主张自治的人大多数要求制定一部省宪法，进而制定国家宪法，而主张制宪的人中很多人主张在宪法中规定省自治或联邦制的条文。

中国是一个买办封建军阀专政的国家，大小军阀分别掌握着中央和地方的政权，政治混乱，人民毫无民主自由可言。有人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中国没有制定一部根本大法——宪法。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制定宪法。有人说：中华民国已经建立11年了，在此期间，“兵连祸结，扰攘至今，根本大法，迄未公布”。“吾国今后唯一要图，无过于急速制宪以立国本”。①有人说：“吾以为今后国民之重任，惟促进宪法之制定，俾政治入轨，绝乱源，定国基，然后徐图兴国之道而已”。②

关于宪法应当包括怎样的内容，人们也提出了许多意见。有的人主张中国的宪法应明文规定：（一）各地方今后绝对不许有所谓督军巡阅使及其他类似制度之存在。（二）全国兵士总额，各地分配之最高额，及全国每年度军费之最高额。（三）保障全国教育独立及教育经费独立。（四）赋予各省

以广大之自治权，使含有联邦制之性质。（五）男女两性在社会上及法律上地位与待遇平等。（六）扶助国民之经济生活，确立救贫事业。[③]有的人提出所谓“撒半个最大的问题”，要求宪法作出明文规定，即采用普通选举、规定劳动法典，承认妇女参政。[④]有的人主张“我国宪法应明定国民之生存权”，条文是：“中华民国之国民，得依生存权，请求国家或地方团体，保障其生存上所需之最低生活资料之权利”。[⑤]

有人提出所谓的“三个最大的问题”，即要求宪法作出正确规定，也就是采用普通选举、规定劳动法典、承认妇女参政。有人主张中国宪法应明确规定国民的生存权，其条文是：“中华民国之国民，得依生存权，请求国家或地方团体，保障其生存上所需之最低生活资料之权利。”

在制宪活动高潮中，一些省和人民团体还制定了几种宪法。《浙江省宪法》在1921年9月公布，《湖南省宪法》在1922年1月公布，广东省也公布了一部宪法，国是会议在1922年8月公布了一个宪法草案。虽然有一些省确实制定并公布了宪法，但是在军阀割据的情况下，军阀并不想实行宪法，是不可能制定出真正的宪法来的，那些宪法也只是一纸空文，不过是被地方军阀拿来作为与中央军阀抗衡的工具罢了，根本不可能实行。

制宪救国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活动，它本来就具有抵制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主张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性质。有的文章更明确地说出了抵制劳动人民起来革命的思想。例如，有的人提出所以要保障人民的生存权，是因为这样作可以“缓和阶级之斗争”，“图社会之健全发达”，“渐减贫富悬绝之害”。这种主张明显地是出于对“社会主义之思潮，磅礴大地”[⑥]的恐惧。

1922年9月7日，《向导》发表文章指出，革命要想彻底成功，要有彻底的民主的宪法。中国人民在各地军阀的统治之下，连一个国民会都不敢开，制定一部宪法则更是不可能。就算是中国人民制定了一部宪法，也等于一纸空文，根本起不到什么明显的作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企图靠制成一部成文宪法来做金刚符咒，降服军阀这些鬼怪妖魔。这根本就是隔靴搔痒、文不对题。资产阶级所企图的这些更是有意助长军阀的专横。

自清末以来，制宪救国就是中国政治上经常被提出来的问题。在1922年前后的两三年，制宪救国的活动是一个高潮。但是由于反动派的阻挠破坏，这个活动没有也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

辛亥革命后，军阀拥有重兵，长期进行混战，成为国家的极大祸害。由



于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影响，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军队增加异常迅速，出现了一个扩军高潮，军队人数曾一度达到百万以上。军队扩充不仅使军费开支大增，而且威胁到当权者的统治和社会安定。裁军的要求也应运而生。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裁军的同时，还尽量扩充自己的军队；而一些在民元兴起的政党，面对迫切的军事形势，也提出了各自的建军的主张。此外，社会上的一些尚武思潮和军国主义、和平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也对扩军和裁军的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引发了护国战争，导致北洋军阀的分裂，形成直、皖、奉等派系，北京政府的权力削弱，军阀割据形成。各封建军阀分别控制中央和地方军政权力，各自为政，竭力扩大自己的军队，使扩军陷入无序状态，引发了新一轮扩军热潮，使全国陷入分裂和混战之中。西南军阀的形成，使南方各省军队大量增加，造成了南北对峙的格局，战争频发，政局更加混乱不堪。段祺瑞为了推行“武力统一”政策，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编练参战军和边防军，培养自己的嫡系。南北军阀都在自己的地盘内进行多方搜刮，扩充实力。

从辛亥革命到 1922 年共发生兵变 179 次，其中 1917 年 1922 年计 90 次。[⑦]“五四”运动前后，全国军队数量迅速增加，军费消耗急剧攀升，国家负担越来越沉重。全国共有军队 150 万左右，每年军费支出占整个北洋军阀政府支出的 2/3，长期频繁的军阀混战和大量军费开支，极大地影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加重了广大人民的负担，引起了全国各界一致的不满，使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苦于兵戈也久矣，疲于供应也甚矣”[⑧]的哀叹。资产阶级把督军制和无休止的扩军看成是战争和人民负担过重的根源，因此，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废督裁军之说，高唱入云，形成席卷全国的“废督裁军”运动。

报刊上连篇累牍的发表了许多主张废督裁军的文章，提出了许多裁军的方法。上海、北京、湖南等地的一些团体也发表宣言、通电，召开裁军大会，举行示威请愿，组织裁军促进会，要求裁军，形成了有一定声势的裁军运动。如，《改造》杂志曾发表长篇的《裁兵计划书》，提出了详尽的裁兵方案。先主张“省宪运动”的梁启超，随后也主张“裁兵或废兵”。1921 年 12 月梁启超在北京高师作讲演，认为“目前最痛切最普遍最简单的，莫如裁兵或废兵这个大问题。我们应该齐集在这面大旗底下，大大的起一次国民运动。”但是千万不能有“法律外的行动”[⑨]1922 年 7 月，上海的中华全

国工商协会、中华国货维持会等 20 多个团体联合发表《废督裁军宣言》，并组织裁兵促进会。全国商会联合会发表《筑路养兵意见书》。在北京有国民裁兵促进会的成立，安徽召开了废督裁军大会，湖北成立了去兵运动团，苏皖召开了全国裁兵大会，湖南各公团发出裁兵通电，学生们散发裁兵传单。

主张废督裁军的人认为国家最大的祸害是“兵祸”，因此，全国应该一致要求废督裁军。上海各团体的《废督裁军宣言》呼吁军阀应该“顺从民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呼吁全国官吏和国会议员“彻底觉悟，各凭良心，首先办到代表一件大事”。《孤军》第 1 卷第 4 期和第 5 期合刊上发表的《推倒军阀的具体办法》一文，提出了促进和实行裁兵的具体办法。“促进”的办法是：由各省市有志裁兵的人组成中华裁兵救国期成会，作为裁兵的常设机关。裁兵的常设机关要进行裁兵宣传，并筹办民团以养成真正国民军的基础，如果军阀拒绝筹办，就采取拒税、罢课、罢市、罢工等行动。“实行”的办法是：以人民和政府为主体组织裁兵救国实行委员会，还可以请外国人帮助，筹集裁兵基金，分期裁撤现有军队。退伍官兵一部分安置在警察民团中，其余安排到筑路、浚河、农、林、渔、牧等事业中，这样，不仅除去了永远的祸根，国家和人民还可以从中得到极大地好处。裁兵以后的兵制采取征兵制。

1922 年 7 月 1 日，上海工商研究会、国货维持会、花边联合会、全国工商协会、粤侨商业联合会、华侨联合会、浙江丝绸机织联合会、旅沪商帮协等 8 个团体发起了裁兵联席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就是，要求政府限制军队人员，减少军费开支，解除、废止督军制度。全国上下各个团体都纷纷组织裁兵会议，讨论裁兵问题。

当时，外交团也在玩弄手腕，流行时髦，劝告中国裁兵。1922 年 9 月 28 日，外交团决议，由葡萄牙公使提出两项劝告，即希望中国立即实行华盛顿的《决议案》，即行裁兵，如果中国再不实行裁兵，以后发生兵变之类的事，各列强国家的损失必须由中国担负完全责任；中国的财政亟待整理，特别是即将到期的外债尤其要还清，以表示中国重信义。

在一段时间里，孙中山是裁兵的积极主张者。孙中山主张用裁兵的办法实现和平统一，在 1922 年 6 月 6 日发出废督裁军的宣言，提出他的“兵工计划”。从 1922 年 6 月到 1923 年 2 月这段时间里，孙中山先后发表了《工兵计划宣言》、《和平统一宣言》、《化兵为工和平统一》、《裁兵宣言》等文



告和讲演。孙中山在1923年1月发表的《和平统一宣言》中，表示愿意“调节”直、奉、皖、西南4派军阀的“利害”，使他们归于“一致”，以实现“和平统一”。关于怎样实行和平统一，孙中山认为“和平之要，首在裁兵”，“兵不裁则无和平，无和平则难统一”。裁兵办法的纲要有三：“（一）本化兵为工之旨，先裁全国现有兵数之半；（二）各派首领赞成后，全体签名，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筹划裁兵方法及经费；（三）裁兵借款，其用途除定监督机关外，另由债权人并全国农商学报各团体，各举一人监督之。”[10]当时的《东方杂志》称赞这篇宣言提出了“调和实力派的计划和实行裁兵的方法”。

各军阀也曾假装赞成废督裁军。直奉战争后，曹锟、吴佩孚赶走徐世昌，请黎元洪复职。此时，孙中山提出“兵工计划”，要求直系裁一半军队，以显示直系“恢复法统”的诚意。黎元洪为了讨好舆论，1922年6月6日，发出“废督裁兵”的所谓“鱼电”，以废督裁兵为条件复位，迎合了人民的心理，树立自己的声望。接着，曹锟、吴佩孚发表通电表示“支持”，各省军阀也纷纷“响应”黎元洪废督裁兵的号召，其中浙江军阀卢永群和新疆军阀杨增新喊得最响。他们声称要立即“自废自裁”，卢永祥在通电中表示“谨于中华民国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延请各法团召集所部将校，即日宣布废去浙江督军之职。”[11]他装模作样的将督军改称军事善后督办。这时，一向鼓吹“武力统一”的吴佩孚，也伪善地表示赞成孙中山的“兵工计划”，假惺惺地表示，他的第三师，可作为孙中山兵工计划的“实验品”，用以掩饰他的武力政策。但事实上各军阀都没有是裁兵，军阀的混战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军阀们所玩弄的废督裁军的花招，完全是一个骗局。但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却对他们的欺骗口号产生幻想，如，1922年中华全国工商协会、中华国货维持会等20多个团体发表的《废督裁军宣言》，大加赞扬卢永祥、杨增新的“自废自裁”精神，称他们的举动是“为天下先”的义举，要求各省军阀也效法他们起来自废自裁，他们认为这样既可挽救国家的危亡，也对军阀本身有好处。宣称军阀们在自废自裁以后，“可逍盌自在，安作富翁，子孙世守，永无亡身破家之危险，不亦善乎”。还说军阀们只要下“决心放下屠刀，立地自能成佛。岂但流芳民国史乘，而欧美列强，亦无不倾心崇拜，我国最仁德之军阀，其能爱国爱民善始善终者也”。[12]他们企图以良言苦口威动军阀，希望军阀自动退职，交出军队，但事实上，军阀们非但没有自废自裁，相反的在加紧扩军备战。

废督裁军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主张，否认和忽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是中国动乱的根本原因。在武人称雄，封建军阀们拥兵自重，依靠武力争权夺利的情况下，这种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些有关裁兵的宣言、计划、办法，都不过是一纸空文，它们同各种改良思潮一样，都没有取得实际效果。这也说明：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文献标注：

①③李三元：《宪法问题与中国》，《东方杂志》第19卷第21号，1922年11月10日出版。

②⑤⑥史维焕：《我国宪法应明定国民之生存权》，《东方杂志》第19卷第21号，1922年11月10日出版。

④邓飞黄：《我对于国宪的三个建议》，《东方杂志》第19卷第21号，1922年11月10日出版。

⑦《民国以来一百七十九次之兵变》，《东方杂志》，第20卷，第1号，1923年1月10日出版。

⑧徐沧水：《岁出预算上之军费限制论》，《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1月10日出版。

⑨梁启超：《外交欤？内政欤?》，《平民教育》第46号，1922年2月25日。

⑩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月26日)。

⑪《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1辑第1册。

⑫上海《各团体发表废督裁兵宣言》，1922年7月，《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1辑，第60页。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自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根据中共一大《决议》和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签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党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了准备。

党的组织得到了进一步的健全和发展，培养和吸收了一批先进分子入党，党的队伍不断壮大。到1922年6月底为止，党员的人数已经由中共一大时的53人增加到195人。其中，上海有50人，北京有20人，广东有32人，湖北有20人，长沙有13人，山东有9人，郑州有8人，四川有3人，留苏联8人，留日本4人，留法国2人，留德国8人，留美国1人。党组织还注意在工人和妇女中发展党员，此时有工人党员21人，女党员4人。

在工人运动方面。中共一大后立即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指导职工运动的总机关，并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设立了分部，加强了全国各大城市工人运动的联系、协调和统一行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许多共产党员深入铁路、工厂和矿山，开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组织，并先后领导了上海、汉口、长沙、广州等地的纺织、烟草、土木建筑、人力车等各行业工人，以及陇海、京绥、粤汉等铁路工人的多次罢工斗争。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继续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工人周刊》等也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这些刊物大力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苏俄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报道中国工人遭受剥削压迫的苦难情景及其罢工斗争，并开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探讨中国的革命道路。为了系统地翻译、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共中央局于1921年秋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李达负责编辑工作。原计划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共产主义者丛书11种，其他书籍9种。直到1922年6月出版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工钱劳动与资本》、《讨论进行计划书》、《共产党礼拜六》、

《列宁传》、《劳农会之建设》、《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共产党的计划》、《俄国共产党纲领》、《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等15种书。此外，为了揭露华盛顿会议的帝国主义侵略实质，以及声援香港海员罢工和上海英美烟草公司、浦东纺织工人罢工，人民出版社也印发了大量的文章、传单。这些宣传的战斗性很强，对动员和组织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剥削和压迫起了积极作用。

在青年运动方面。早自1920年8月起，上海、北京、广州、长沙、武汉等地相继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但是，后来由于缺少领导骨干，青年团成员成分复杂，导致观点意见产生分歧，组织解散，许多地方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处于停滞状态。1921年11月，张太雷受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委托，重新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明确规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随之恢复了。半年内成立了上海、北京、南京、天津、保定、唐山、塘沽、武昌、长沙、杭州、安庆、广州、潮州、梧州、佛山、新会、肇庆等17个地方团组织，团员总数达5 000余人。为了从思想方面、组织方面加强、巩固团组织，使青年团成为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思想一致、行动统一的具有战斗力的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选出了张太雷、施存统、蔡和森、俞秀松和高君宇等人组成团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当选为团中央书记。此后，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思想上、组织上统一的团体，成为中国青年运动的中坚力量。

在妇女运动方面。1921年底，中国共产党帮助中华女界联合会实行改组。党还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出版了《妇女声》半月刊，创办了平民女校，这对于培养大批妇女干部，提高妇女觉悟，为妇女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创造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工作的开展，迫切需要制定一个符合中国实际情况，为中国现阶段革命指明方向的纲领。与此同时，党的各项工作的全面开展，也丰富了党的实践经验，使党逐渐认识到要想领导中国的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进行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而1922年1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恰好在思想上和理论上为解决这个问题创造了条件。这次大会阐明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明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当前中国及远东被压迫民族的

最大敌人，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实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经过此次会议的启发，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解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实行共产主义，一定要经过民主革命阶段。

1922 年 4 月，党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对建立民主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讨论。此时，党对中国社会状况和各阶级力量的对比情况有了比较切合实际的分析，开始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党现阶段的革命对象已经不是本国的资产阶级，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目标已经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民主主义；开始提出应该联合民主力量反对共同敌人的政策。

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充分准备使得召开中共二大的条件成熟了。正在此时，局势发生了变化，为争夺北京政权，直系和奉系的军阀爆发了直奉战争。这就使中国共产党认为有必要发表一个对时局的主张，以阐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海党员建议党中央尽快发表一个声明，不必等待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于是，陈独秀起草文件并经中央局讨论修改后一致通过，也取得了李大钊和北京党组织的一致同意。1922 年 6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也为“二大”的召开、民主革命革命纲领的确立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1922 年 7 月 16 日到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第一天是在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 625 号（今成都北路 7 弄 30 号）李达的寓所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由广州返回上海后，李达和王会悟便迁居到这里，同时也把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带到了这里。中共中央局 1921 年 9 月 1 日在上海创办人民出版社时，社址也设在这里。为了保障安全，防止敌人破坏，李达等故意将社址写为“广州昌兴新街二十六号”。这里一排排的石库门房子统一格式，不易分辨出哪家哪户，比较安全。李达家楼上是书房和寝室，楼下是小客堂，大会就在楼下的小客堂举行。

出席大会的代表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中共中央提名或协商确定的。除了上届中央局成员外，被指派参加大会的还有各省区党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民族会议回国的党员代表。预定到会的李大钊因事未能按时参加，毛泽东为黄爱、庞人铨被害一事，赴上海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由于陈炯明叛变革命造成的战争状态，联络发生了困难，广东代表谭平山也未能参加大会。在中共二大召开时，毛泽东就在上海，但没能参加会议。出席大会的

有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向警予、高君宇、项英、邓中夏、张太雷、王尽美、邓恩铭、施存统。大会首先听取了党的中央局的报告。

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简要地作了报告，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一年来党的工作情况，以及北京、武汉、长沙、上海、广州各地工人运动的情况，指出京汉铁路和长沙、安源等地的工人运动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他在报告中阐述了对于时局主张，着重阐述了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和策略，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其目的是在于组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实行共产主义。但是，依据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实际情况，中国当前只能进行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只有先帮助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等到民主革命胜利后，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还强调：共产国际是这样指示的。

接着，出席远东民族代表大会的中国团团长张国焘报告远东民族会议的经过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他在报告中首先介绍了远东民族会议的经过，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他说：中国革命属于殖民地革命的范畴，这个革命的对象是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以及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封建势力。这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的主体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人民，应当援助民主主义革命，使它早日得到胜利。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可以很快地发展起来，同时无产阶级也可以得到自由与权利，同样可以很快地发展起来。这时，无产阶级就能够进一步团结大多数贫苦农民对抗资产阶级，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张国焘还简要地报告了工人运动壮大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他指出，这次大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次全国性盛会，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威信也得到了提高，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张国焘报告后，陈独秀再次就工人运动、民主革命等问题发言。他说：目前中国的产业工人，包括工厂、矿山和铁路工人在内，人数极少，力量薄弱，只有联合资产阶级，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从此以后，资本主义将有相当的发展，无产阶级也必然成长壮大起来。工人和农民将争得言论、出版、机会、结合以及选举、罢工等权利和自由。中国工人阶级利用这些自由和权利，就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



密地团结起来，准备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了。

最后一个报告人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施存统。他报告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和大会的决议等情况。

大会听取并讨论了以上3人的报告以及与会代表汇报各地工作情况的发言，批准了中共中央局的报告，追认了中共中央局发表的《对时局的主张》，赞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宣言》和《决议案》等。

大会鉴于党的“一大”开会期间，曾经发法国巡捕房搜查大会会场的事件，提高了对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军阀破坏的警觉性，决定多开小组会，少开大会，每次大会都要转换会址。

第二次全体会议和第三次全体会议主要是讨论国内外的形势、建立联合战线、加入共产国际、工会运动、青年运动等问题。其余时间作为起草文件和分组讨论。小组会分别安排在党员家里召开，部分上海的党员也可以参加小组讨论。李达和张国焘各负责1个小组，李达负责关于教育和妇女运动问题的小组，有蔡和森等人参加；张国焘负责主持关于职工运动问题的小组，劳动组合书记部参加的人最多。

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英租界另一个地方举行，主要讨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工作，肯定了党在发展组织、工人运动、青年运动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并且批准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会议接着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革命方针政策问题。会议还就国内外形势、加入第三国际、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工会运动、少年运动等重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和张国焘组成宣言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大会宣言。蔡和森和张国焘又推选陈独秀为执笔人，陈独秀用2天的时间起草了《宣言》，提交起草小组讨论，开了几次会，蔡和森和张国焘对宣言草案提出了补充和修改意见，完成了供大会讨论通过的宣言草案。陈独秀起草的《宣言》实际上是对《对于时局的主张》的重要补充和修正。

7月23日，大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会址又改为英租界另一个地方举行。根据列宁民族殖民革命理论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以及远东民族代表大会的精神，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通过了《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会议行动的决议案》、《关

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

大会决定出版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以宣传党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纲领，宣传党的政策。

最后，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和高君宇五人为中央委员，组成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担任委员长，邓中夏和向警予为候补中央委员。陈独秀担任党中央书记，蔡和森和张国焘分别负责宣传和组织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已经胜利完成。它在中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给中国人民指明了争取解放的正确方向，在这之前，中国人民进行了80多年的革命斗争，但没有一个阶级、一个政党能提出完整的革命纲领，因而也不能完成革命的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成立仅仅一年就能制定这样一个纲领，这充分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党。这个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也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进一步结合的重要标志。当然，这次大会也存在缺点，它没有明确的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决议案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反映了中共二大的基本思想和主要成果，根据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分析了国际形势的特点和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宣言》分三个部分。

《宣言》的第一部分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国际环境，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指出了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特点。《宣言》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的本性和战争的实质，指出“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多半是靠掠夺非洲和亚洲做大市场和大掠夺场”，正是这些亿万殖民地人民的血汗，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巨大财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为了销售过剩的产品，吸取所需要的原料，极力地争夺最大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竞争的结果，便须诉诸战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掠夺——竞争——战争的循环趋势，形成了近代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这种国际形势，对于处于半殖民地状态的中国，有着重大的影响。《宣言》指出：“帝国主义的列强历来侵略中国的进程，最足表现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本相。中国因为有广大的肥美土地，无限量的物产和数万万贱价劳力的劳动群众，使各个资本主义的列强垂涎不置，你争我夺，都想多的最优越的权利，因而形成中国现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①]

《宣言》回顾了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中国近代的历史，指出国际帝国主义采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对中国进行侵略，不仅使中国丧失了领土的完整、政治的独立和经济的发展，使国家处于极度的落后贫困之中，而且还使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帝国主义的列强在这八十年侵华中国期间之内，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中国人

民是倒悬于他们欲壑无底的巨吻中间”。[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美各国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便利用各种手段，趁机侵入中国，极大地扩展了势力范围，妄图独霸中国。这种新动向引起了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嫉妒和垂涎。一战后，形成了日、美、英争夺中国的新局面。

《宣言》进一步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实质，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伪善面目和欺骗宣传，指明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华盛顿会议的真正目的在于帝国主义重新瓜分远东市场，从战争到谈判的转变，表明个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互竞侵略”，已经发展到“协同侵略”的新阶段。《宣言》指出，帝国主义为了掩盖其侵略行为，往往高唱人类平等、民族自决之类的动听口号，甚至华盛顿会议也打起了缩减军备的幌子，“但是中国人民受了这九十年被压迫的经验，却最易了解帝国主义者所宣称的平等和自决是什么意义。而且也容易了解只有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以后，才能实现平等和自决。”但是，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发展趋势，即在苏俄十月革命之后，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形成了反对国家帝国主义的新兴力量。强调指出：“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③]

《宣言》的第二部分分析了国内现阶段的经济政治状况，明确指出构成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因素：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列强既然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操纵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另一方面，“又因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所以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④]这又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的军阀统治，在国外代表帝国主义的利益，在国内主要代表着封建地主的利益。不论是“联省自治”，还是“武力统一”，都不会改变军阀统治的根本性质。这种军阀间的争夺战争，反而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因此，中国民主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推翻封建军阀统治。

《宣言》接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进行了分析。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排斥下，不可能“自由发展和自由竞争达到独立的地位，只不过做世界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中间物罢了”。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着改变自身这种受压抑受控制的地位，而图兴旺发展的前景，必然要起来与国际帝国主义做斗争。并且“已经集合全国的力量，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北京卖国政府”，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和五四时期的排日运动就是这种反抗的表现。中国的农民是最广大的社会阶层，其中以独立耕种的小农和佃农、雇农为绝大多数，因为缺乏土地，生产落后，加上天灾和战争的危害，地主剥削和军阀暴征等因素，生活与穷困和痛苦之中。这种经济地位使得中国农民有极大的革命性，成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手工业者、小佃主、小雇主等小资产阶级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在外国商品充斥中国市场，国内民族资本又有所发展的环境里，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很不稳定，时刻受着破产和失业的威胁，“也势必痛恨那拿痛苦给他们受的世界资本主义，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面来”。中国工人阶级正在不断地成长壮大，工人组织的建立和罢工运动的发展，充分显示了他们的力量。中国工人阶级受着外国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剥削，又受着军阀和封建势力的盘剥和镇压，具有极大的革命积极性和坚定性，在革命斗争中，“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5]

《宣言》在正确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政治状况，正确的估量了社会各阶级的动向、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之后，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宣言》指出，“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的。这就明确了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这样，制订反帝反封建纲领就成为必然结果。最高纲领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六）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七）制定关于工人和农人以及妇女的法律”。[6]

《宣言》不仅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还认识到二者的关系，即只有完成党在现阶段的基本任务，然后再创造条件实现最高纲领，指出，“我们无产阶级有我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⑦《宣言》最后发出了响亮的号召。

中共二大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通过了《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

《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形势，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帝联合战线的号召。《议决案》首先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资产阶级的势力已经衰萎，但无产阶级却受到资本家残酷的剥削。《议决案》接着提到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苏俄，进而阐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苏俄的关系。指出：苏俄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也是全世界工人和农民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国家对抗的壁垒。势力还很强盛的世界资本主义正不断地向苏俄进攻，因此全世界的劳动阶级和劳苦群众应该尽力保护苏俄。《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要求中国的无产阶级来保护苏俄。中国共产党要召集中国工人们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维埃俄罗斯，抵御资本主义的进攻；并要邀集中国的被压迫群众，也来保护苏维埃俄罗斯，因为苏维埃俄罗斯也是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先锋。”⑧

《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世界的经济秩序已为帝国主义的战争破坏了；世界资产阶级正向着无产阶级进攻，他们更加残酷地掠夺劳动者，以图恢复他们在大战中损毁了的经济秩序，无产阶级只有联合在统一战线上来反抗这个进攻；在经济秩序毁坏以后的世界资产阶级，又企图劫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原料劳力，来补偿他们在大战中的损失；因为争夺市场，他们中间发生了新的冲



突，这些冲突是制造下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原因。在分析了国际形势之后，《决议案》阐述了中国在世界帝国主义掠夺下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指出中国的物产和4亿人民的劳动力，“早已是世界帝国主义者们争夺之场了；现在他们的心和眼更都着重在这个市场。”帝国主义在中国为了造成各国更大的特殊势力，“他们又争相扶助中国封建的军阀”，“致使资产阶级工商业受了阻损，不能发达；农民经历了多少不堪忍受的摧残；工人阶级的痛苦日增不已。”所以，《决议案》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的7条要求，为了实现这些要求，中国共产党呼吁“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建立一条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由于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力量，《决议案》还提出：“我们加入民主革命的阵线，完全是以他为达到工人阶级夺得中国政权的一步过程；所以我们组织“民主主义联合战线”是我们一种政策。”[9]

《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了建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联合战线的依据和意义，对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策略、原则、方针、步骤作了详细说明。《议决案》阐明了民主联合战线的任务。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无产阶级和民主派的共同敌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无产阶级和民主派就得到了共同的利益。因而，只有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才能扫清封建军阀和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并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议决案》初步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联合战线中的策略原则，指出，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运动，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联合，并不是投降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附属与合并他们，也不是妄想民主派胜利可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是因为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打倒共同的敌人本国封建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指出，无产阶级在联合战线中，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决不能放弃自己的目标。《议决案》提出了实行党的民主联合战线主张的具体实施步骤。《决议案》还“认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发表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是能够应付时势之急迫的要求的，今后更应扩大此主张，并规定进行计划”。[10]

《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11]《决议案》从组织上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的关系，它对中国共产党以后的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文件后面附有1920年7月共产国际二大决定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十九条》，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社会主

义青年团和妇女组织，也分别加入第三国际领导下的赤色工会国际、共产主义少年国际和共产主义妇女国际。

《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声明中国共产党为实施革命的议会行动，是按照共产国际二大所通过的原则规定的，对党参加议会活动的目的、原则和斗争方式作了规定，强调参加议会的党员必须严格执行党的决策，提出中国共产党内部应该加强党的领导。《决议案》规定："国会候选人名单，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本党国会议员，绝对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挥"，"每次示威运动发生，本党议员必为示威行列的领袖，跑在群众的前面。""本党议员必须常常保持与群众的直接接触，每年必须到选举他的区域往返几次，召集选民开种种会议，"[12]等等。

《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根据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发展全国工人运动的各项原则和方针政策。它首先分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现状，指出；中国的劳动运动，实在第一个阶段中发展，还脱不了旧行会和手艺组合的束缚。同时，劳动阶级的奋斗还不过是为某种手艺或某个工厂的特别状况的单独运动，并没有普遍性质的运动。工人的组织也不强固，组合的人数也不多。切实研究这种现状，集中、扩大和正当指挥这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决议案》还对工会工作的对象问题、工会的任务问题、工会的性质问题、工会的组织机构问题、工会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工会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策略和领导权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决议案》使工人阶级成为在党领导下的实现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纲领而奋斗的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在这一决议的推动下，全国的工人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并形成了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

《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少年运动是指青年运动）首先提到了少年的悲惨状况。接着指出，在资产阶级的残酷掠夺和剥削下，欧洲劳动少年逐渐觉醒并奋起反抗。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革命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决议案》呼吁少年劳动者应与成年劳动者组成联合战线，共同反抗资产阶级。《决议案》在指出中国受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所统治的情况以及分析了中国的状况以后，对中国少年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要求他们不但要为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斗争，而且还要联络某地被压迫的少年一起进行斗争。在详细的介绍国际和国内以及青年运动后，指出："共产主义少年在中国的运动是要成个大群众的性质"，少年运动是中国共产运动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决议案》还规定了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指



出："在青年劳动者一切经济和教育利益奋斗的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是个独立的团体；关于普通政治运动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则应当约束他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之下。"⑬

《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决议》首先指出，妇女在资本主义所标榜的平等自由的原则下是得不到真正的平等和自由的。《决议》在分析了世界妇女的情况之后，提出世界妇女真正获得解放的只有苏俄，介绍了苏俄妇女得到解放后的具体情况。接着分析了当时中国妇女的基本状况，指出：目前全国所有的妇女"都还拘囚在封建的礼教束缚之中，过娼妓似的生活，至于得不着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的权利，乃是全国各阶级妇女的普遍境遇。"所以党在当前除努力保护妇女及童工的利益并为之奋斗外，还应该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的政治利益而努力奋斗。《决议》指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根据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决议，《决议》指出为妇女奋斗的当前任务是"（一）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二）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三）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⑭为贯彻该决议，中共二大决定设立中央妇女部。

《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建设经验，对今后党的组织建设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决议案》首先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接着，《决议案》提出了在党的建设中必须注意的两个根本问题：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群众里面去；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和训练。《决议案》还指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对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有重要意义。《决议案》规定了党的组织和每个党员必须遵守的原则：从中央机到基层要有严密系统，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个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军队式的训练；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决议案》对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对贯彻

执行中共二大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夺取新民主民主革命的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献标注：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4～78页。



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提议

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这一形式，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先提出，经国民党方面孙中山的认可，又经共产国际追认，并以共产国际指示的方式，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而实现的。

为了在中国贯彻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马林就积极同国民党方面接触。1921 年 10 月，马林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的代表张继。12 月，马林由张太雷陪同，从上海到达桂林访问孙中山。双方进行了 3 次长时间的会谈，着重讨论了刚刚成立的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结盟的可能性。马林建议孙中山组织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队的基础；促进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孙中山向马林介绍了国民党的一些情况。他对苏俄的新经济政策特别感到兴趣。当他听说苏俄所采取的政策与他的民生主义原则相符合时，他感到高兴。①孙中山表示，他虽然并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他的思想是同马克思主义一致的。孙中山主张："待北伐胜利结束，立即提议与苏联公开建立联盟"。②孙中山当时虽然迫切希望得到苏俄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又担心引起西方列强的不满和军事干涉，所以暂时不能公开同苏俄结盟。孙中山愿意派一个代表团先去莫斯科进行实地考察，对于马林的其他建议，如改组国民党，建立军官学校等，决定在完成反对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后，立即进行实行。这就为后来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政策奠定了基础。

1922 年 1 月初，马林一行到达广州，亲眼目睹了香港海员罢工。国民党与工人的紧密联系，给马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林对这次罢工给予了很高评价。此外，通过与国民党领袖们的频繁接触，使他对国民党的好感日益增强。这些都使马林思想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在上海时期对工人运动的持悲观态度转为到南方终于"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的积极向上精神。③

1922年1月到2月，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其他进步团体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共产党的代表有张国焘、瞿秋白、任弼时等，国民党的代表有张秋白、王乐平等。病中的列宁会见了张国焘、张秋白等人，并向他们提出了国共两党有没有可能实现合作的问题。

此后不久，马林在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参加的一次议会上提出一个新的主张，就是共产党应该参加国民党，同时又保持共产党自己的独立性，也就是"党内合作"的主张。马林说："国民党松懈的组织形式使得党内很容易促进群众运动的思想，因此必须与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的人应该利用左翼（廖仲恺）去改变国民党的策略；他们应加入国民党，但保持自己的组织和报纸，并应继续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活动和组织"。[④]马林这个主张的提出，并没有从共产国际得到什么具体指示，而是以他自己原来在爪哇工作时的成功经验为依据的。

这个提议遭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的反对。他清楚马林的提议不是出自共产国际的主张，因此，1922年4月6日，他写信给正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的维经斯基，说明他反对的理由，并要求倘若共产国际问起此事，请维经斯基代为陈述。陈独秀在信中提到六个反对马林提议的理由："（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四）广东实力派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加以权柄；（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决议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⑤]

他指出的国民党的弱点有不少是事实，强调不能把共产党同国民党混同起来也是对的。早期的共产党人中，很多人以前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前身的中国同盟会或同它有密切的关系，受到其很大的影响，后来看清那条道路走不通才信仰共产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钊、董必武、林伯渠都是如此。现在提出要他们参加国民党，思想上自然很难接受。而在统一战线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实现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更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所不容易理解的。



所以，陈独秀在信中表达的观点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观点，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相当多党员的看法。

1922年4月底，中共中央领导人到广州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达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登上群众性政治行动的舞台，而不能仅靠单纯的宣传和小圈子工作的方法，应该真正参与到中国的民主革命中去。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和国民党结成民主联合战线，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达林的提议下，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一次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局成员、各地负责人和广州部分党员，共20多人。陈独秀和少年国际代表达林在会上讲了话。达林认为："南方人是能够解说孙中山的反帝立场的"，"毫无疑问，孙中山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在其政权所及的地区，力图建立民主制度，实现民族自治，允许自由出版，自由开展工人运动和组织工会等等。""孙中山掌权的南方，和军阀、外国帝国主义掌权的北方之间，有天壤之别。南方的气氛完全不同。工会、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都是完全合法的。"⑥只有张太雷、瞿秋白等人赞成达林的意见。他们认为，在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组成民主革命联合战线是必要的，应该和国民党进行合作。经过与会代表的激烈争论，最后，大多数与会者同意了统一战线的策略，但没有通过一定的决议。

广州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此时虽然仍坚决反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但已从建党初的排斥一切其他党派开始转变为同意在一定条件下与国民党进行两党之间的平等合作。

1922年5月23日，陈独秀在《广东日报》上发表《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一文。文章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劳动运动中应该如何与其他党派保持正确关系，改变了对其他党派简单的排斥态度，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基本主张。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策略思想的基本概述，成为发起民主联合战线的开端。随后，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等共产党人，在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一项提案中，再次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

这时一个更有决定意义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人正在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从主义的探讨逐渐转到对中国社会现状和当前革命任务的研究上。那时，中国社会生活中突出的问题是军阀割据和军阀间的混战。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主张》突出强

调:“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若没有较新的政治组织——即民主政治,来代替现在的不良政治组织——即军阀政治,这样状况必然要继续下去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主张》提到:“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党。但是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队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主张》还明确地提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是比较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正的民主派。”⑦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进展,转向采取更加现实的态度。这个态度的转变,不难看到是对国民党作出了明确的肯定的评价。

1922 年 7 月 16 日到 23 日,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决议强调:“在事实上必须联合民主派才能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不如此,无产阶级便无法得着为自己阶级开始团结所必需的初步自由。”⑧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正式决议,这还是第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在认识上正在发生变化。

就在这段时间,马林从上海经过新加坡、马赛等地回到莫斯科。1922 年 7 月 11 日,马林给共产国际写了一份报告。报告对国民党作了这样的叙述:“党的纲领为各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其性质是民族主义的,奉行的是以反对外来统治、主张民主、让国民的人格受到尊重,过上幸福生活为内容的三民主义。孙中山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把这最后一个要求解释为民生主义。”报告中还谈了他在上海同中共中央商议的情况:“我建议我们的同志,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因为通过国民党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联系要容易得多。同时,共产主义小组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同志们必须共同商定在国民党内应该遵循的策略。国民党的领导人告诉我,他们愿意在国民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⑨共产国际主席团同意他关于中国情况的观点。由于党的“二大”已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成为国际共产党的中国支部,因而在组织上也应该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7 月 18 日,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指示信,要求他们“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 7 月 18 日决定,必须立即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与菲利普(即马林)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⑩这封信用打字机打印在马林的衬衫上,由他亲自带回中国。8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又发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指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共产党人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工会中组成从属于他们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之外，建议成立一个宣传机构”，这一机构“应保持完全的独立性”。[11]

1922年8月，马林回到上海，首先会见了因陈炯明的叛变而陷于窘境的孙中山，同他交谈了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决定了联俄的政策，接受了改组国民党建议，表示欢迎国共合作，但他不同意党外联合，希望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

马林返回上海时，中共二大刚闭幕不久。马林看到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后，将其斥为不切实际的思想，并且要求中共中央立即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示和国共合作问题。1922年8月28日到30日，中共中央在执行委员会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张太雷、马林出席了会议。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坚决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马林强调，只有实行党内合作，才能谋革命势力的团结，促使国民党革命化，把广大工人群众争取过来。党内合作是实现国共合作唯一可行的具体步骤，也是共产国际已经确定的政策。中国共产党既然已经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就必须遵守国际的组织纪律，必须尊重国际作出的决定。起初，大多数中央委员表示反对。张国焘等人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加入会与资产阶级混合，丧失独立性。马林则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加入并改进这个党，以推动革命的发展。李大钊等人支持马林的主张，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松懈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加入不会受到约束。经过争论，多数中央委员为尊重共产国际的指示，有条件的接受了马林的提议，会议在国民党必须按民主主义原则进行改组，使国民党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必须取消入党打手摸和向孙中山宣誓等条件下，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李大钊在上海拜会了孙中山，向孙中山说明中国共产党实行两党合作的主张，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不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张太雷等少数人加入国民党，并帮助孙中山进行改组国民党的筹备工作。党中央虽然在西湖会议上作出决策，但还有相当多的共产党员没有想通这个问题。

1922年11月5日到12月5日，陈独秀、刘仁静、王荷波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布了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决定。刘仁静指出："要在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根据这一原则，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通过这样的形式，我们想要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国民党内许多有组织的工人中进行宣传，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第二，我们打算在组织群众和通过宣传说服群众方面和国民党竞争。如果我们不加入国民党，我们就会孤立，我们所宣传的共产主义就会是一种虽然伟大崇高、却不能为群众接受的理想。"[12]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的决议》，这是共产国际第一次专门就中国问题作出决议，第一次正式肯定了国共党内合作的政策。决议写道："一、中国唯一重大的国民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一方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一方面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二、由于国内的工人运动尚且软弱，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国民革命，以及由于这个国民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和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互相配合行动是必要的。三、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四、但是，这不应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本身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结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在进行这一工作时，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自己的旗帜下不依赖任何政治集团而独立行动，但同时要避免同国民革命运动发生冲突。"[13]虽然这个决议对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与作用估计不足，但它对国共两党党内合作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决议，最终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指示。会议不仅在组织上认可了早在西湖会议时就已经解决的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从理论上对国共两党党内合作进行了充分论证。



注释：

①道夫·宾：《斯内夫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36页。

②马林：《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8页。

③⑪《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5页、第65页。

④马林：《中国南方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207页、第211页、第212页。

⑤《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中共中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5月，第1页。

⑥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81~84页。

⑦⑧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5页、第44页、第45页、第65页、第577页。

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71页、第75页。

⑩《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77~78页。

⑫《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62页、第72页。

中国共产党章程

1922 年 7 月 16 日至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听取了陈独秀的工作报告，张国焘传达远东民族会议精神、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进一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大会着重讨论了关于民主革命纲领的问题，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一系列决议案的基础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的第一个完备的章程。《章程》按照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建设的基本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工作的初步体会，规定了党内生活和党内关系的一系列原则。《章程》共分 6 章 29 条，6 章的内容分别是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和附件。其中心是建立严密的各级组织，加强党的纪律性。《章程》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工作的圆满完成。

《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制定，是党的组织建设和其他方面工作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为了实现党的任务，中央局于 1921 年 11 月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尽快发展壮大自己的组织和队伍，各地党组织积极地响应中央局的号召；到 1922 年 6 月，党员已经由中共一大时的 53 人发展到了 195 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也增加到 5 000 人。党的地方组织也有所增加。党在宣传、青年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等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进展，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这些情况就迫切需要党制定一个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明确纲领和适应党的组织发展需要的正式党章。

此外，随着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经验的积累，党对国际形势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进一步提高，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对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党的组织系统及其



结构、党的会议和活动方式、党的组织纪律、党的经费来源及使用等方面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关于党员，《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了极为严格的入党条件和入党手续：凡申请入党者，不仅要经人介绍，还要由地方执行委员会许可并报告给区执行委员会，由区执行委员会审查通过并报告给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才能成为正式党员。在入党审批方面的规定得更加具体、更加具有针对性：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权直接承认和接收党员；发展对象是工人的，只须地方执行委员会承认和接收，无须区执行委员会批准。同时还更具有国际性："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已经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均得成为本党党员。"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也体现了我们党对世界革命的支持态度。

关于党的组织，《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党的组织系统为5级，即小组、支部、地方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对各级组织方法和职权范围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1）要在农村、工人、铁路、矿山、兵营、学校广泛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凡有党员三至五人者，均得成立党小组，隶属于地方支部；党小组作为"训练党员及党员活动之基本单位"，凡是党员都要加入。（2）凡一个地方有两个支部以上者，可组织地方执行委员会；凡一个区有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上者，可组织区执行委员会。但无论地方执行委员会，还是区执行委员会，其成立，都要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许可。（3）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休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4）实行任期制度，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地、区执行委员会均为半年。（5）对各级委员会的职责、职务分工作了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大会的各种决议，审议及决定本党政策及一切进行方法；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并在其范围及权限以内审议及决定一切进行方法；各委员会均互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及会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政治，劳动，青年，妇女等运动。"此外，《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把党的机关的负责人和领导骨干称为"干部"，并规定了干部的产生办法。《章程》规定，党的干部要由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必要时可指定或任命，地方执行委员会可以随时任免干部人员。

关于党的会议，《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党的会议制度。《章程》把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要求从基层党小组到中央执行委员会都要定期召开会议，定期会议制度还可分为党员会议、干部会议或者代表大会，“各组，每星期由组长召集会议一次；各干部，每月召集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地方由执行委员会每月召集各干部会议一次；每半年召集本地方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区，每半年由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本区代表大会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同时，《章程》还指出，党组织可以根据《党章》的规定，在必要时召集临时会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认为必要时，要召集全国代表临时会议；如果有过半数的区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必须召集临时会议；全国代表大会或临时会议的人数，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决定；一旦有问题发生，上级执行委员会就要临时命令下级执行委员会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就要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这种会议应当由中央特派员任主席；中央及区、地方执行委员会均由委员长随时召集会议。

关于党的纪律，党的“二大”给予了特别的重视，提出了要有“铁似的纪律”的要求，并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专设“纪律”一章，坚持了列宁的思想，对党的各项纪律作了明确的规定，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有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队伍。

《章程》规定了党员个人和组织以及组织和组织之间的关系，不仅强调了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还明确了少数服从多数这条最具有民主精神的组织原则。《章程》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须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凡有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这些规定是党内最重要的纪律，虽然没有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个概念，但却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精神，这表明党一开始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建设的。这些规定，对保证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和全党的行动一致，有着重大作用，并为以后的党章中有关纪律的规定提供了重



要的思想和原则。

《章程》还重申了中共一大《党纲》的有关精神，更加明确地规定“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加入一切政治的党派。其前已隶属一切政治的党派者，加入本党时，若不经特许，应正式宣告脱离。”“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为任何资本阶级的国家之政务官。”

《章程》第二十五条规定了对党员的纪律处分，但只有开除一项。规定：“凡党员有犯左列各项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一）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二）无故联续二次不到会；（三）欠缴党费三个月；（四）无故联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五）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六）泄漏本党秘密”。《章程》对犯纪律错误的党员的处罚，过于简单化了，只有开除一项，没有其他处分，对党员所犯错误也没有区分性质和程度，对于一些错误给以开除处分，是过重了。这样处分不利于教育一般党员和帮助犯错误的同志，也不利于全党的团结，而且容易造成对开除处分的滥用。这也表明我们党当时对于如何执行纪律，还缺少必要的经验。但是这也为我们党能够在当时非常严酷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并日益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力的纪律保障。

关于党的经费，《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经费的来源及开支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经费来源为党费、党内派捐和党外协助三种，其中党内派捐是党在创建时期建立的、由地方党的委员会酌情根据地方经费及党员经济状况而确定的一项经费收入；规定了由中央执委会负责党的经费支配权限问题，这对于保证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有重要的作用；另外，还规定了党费交纳的办法。“经费”这一章的规定表明我们党从一开始就用党章来规范党的经费问题。

关于附则，在《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最后规定了“附则”，包括两条内容，主要规定了《党章》的修改权和解释权的归属问题和《党章》的生效问题。

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还处在幼年时期，理论水平虽有提高，但理论准备还不足，实践经验也比较少，党的“二大”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实行选举制的同时，地方执行委员

会却实行“推举制度”，没有将选举制在地方执行委员会一级推广；只规定了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没有对其他各级党的委员会做出相应的或类似的规定；对违反党纪的党员只规定开除党籍一种处分，对于发展党内民主，缺乏具体的规定。

但是，与中共一大的纲领相比，党的“二大”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从内容到结构、从实体规定到程序规定，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从根本原则到具体制度上，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体系。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党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党章，反映了党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实际工作经验的增多，对于指导党员的活动，规范党组织的行为，健全党内生活，特别是对于加强党的纪律、促进党的组织发展与巩固，提高党的战斗力，尤其是对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党的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共中央第一个机关报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第一个《决议》中，对于出版党的报刊就作了原则规定，如“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等。当时，中共中央尚未创办机关报刊，只是将原有的《新青年》作为党的理论刊物继续出版。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停办《共产党》月刊，另办一个全国性的政治机关报，以指导国民革命，于是开始筹办《向导》。1922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个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16开本，半公开发行。它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出版的时政评论性的周报。从第6期起迁到北京出版，以后又先后到广州、上海、武汉等地出版。1927年5月迁往武汉，1927年7月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向导》于7月18日停刊，共出201期。

《向导》的主要撰稿人有蔡和森、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高君宇、张国焘等，徐梅坤负责出版发行工作。赵世炎、王若飞、张太雷、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等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笔名孙铎）也撰写了一些重要文章。《向导》的首任主编是蔡和森，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和杰出的宣传家。他十分关心国内外新思想的宣传，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后，必须有自己的出版物，并认为党报应具有鲜明的党性原则。蔡和森有很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他的文章能抓住重要的实际问题，提到理论高度来分析，具体生动地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在《向导》前期3年左右的时间里，蔡和森发表了16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有对现实问题作系统分析的每篇五六千字的政论，也有每篇仅两三百字的精干有力的短论；内容涉及面广，有国际的，有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非常富有战斗力。蔡和森于1925年冬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彭述之、瞿秋白曾继任主编，瞿秋白接编最后8期。

《向导》最初的发行量月 3 000 份，以后逐渐增加，1923 年为 5 000 多份，1924 年 9 月为 2 万多份，1926 年 4 月达 2.9 万份，最多时达 10 万份。《向导》除了在国内发行外，还远销国外，供在外国学习、工作的同志和广大华侨阅读。《向导》不仅有广大的读者，而且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在《向导》出版近五年的时间里，被帝国主义和军阀当局封闭了数十次。为了应付突发事件和扩大影响，曾在上海、北京、广州、湖南和河南五个地方分别出版。

《向导》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方针、政策和领导群众斗争为主要内容，同时强调是“中国民众的喉舌”，辟有《中国一周》、《世界一周》、《寸铁》、《肉麻世界》、《什么话》、《读者之声》、《外患日志》、《各地通信》等栏目。大力宣传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宣传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用大量事实报道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分析，揭露贫穷落后、战乱不安的根源；揭露各国帝国主义控制中国政治经济、操纵军阀内战、压榨中国人民的真相；努力进行打倒封建军阀的宣传；注意和帝国主义在华报纸和通讯社进行斗争；与反对中共革命纲领的各种错误思想和反动宣传进行斗争；大力宣传了各个革命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

《向导》如同它的名字一样，自创刊起就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道路上，起了引导者的作用。该刊第 1 期的《本报宣言》就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蔡和森在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及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相勾结在中国实行残暴统治的罪行。中国共产党在《向导》82 期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对时局的宣言》，号召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特别要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权力。《向导》通过对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宣传，给中国人民指出了当前的奋斗目标和革命的基本任务。《向导》还同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服务的宣传工具进行了激烈的舆论斗争。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和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等，攻击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甚至鼓吹对中国进行“惩罚战



争”。《向导》痛斥了这类言论，从多方面剖析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向导》还指出，帝国主义的报刊和通讯社是在对中国进行“新闻的侵略”。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有的高喊“武力统一”中国，有的打出“联省自治”的旗号，有的进攻时宣布“武力统一”，退守时主张“联省自治”。《向导》联系军阀的实际行动分析这些口号的实质，指出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统治是中国局势黑暗混乱的根源。《向导》经过两年多持之以恒的宣传，终于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深入人心，成为全国人的政治常识，很快成为广大群众的行动口号。

《向导》还批驳了各种错误思想和主张。曾经参加新文化运动、作为《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的胡适，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1922 年 5 月，胡适在北京创办《努力周报》，10 月在这个刊物上发表《国际的中国》一文，反对发表在《向导》上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他说，宣言中有关帝国主义的论断，“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完全无事实上的根据”。他认为，“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他又说：“政治混乱的时候，中国陷入无政府的时候，或者政权在武人奸人手里的时候，人民只觉得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是神人，海关邮政掌握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所以，他“奉劝”人们“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显然胡适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割裂开来，从而否定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向导》从来就是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它的许多文章都分析了两者相互依存的关系，指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一致性。《向导》还发专文批驳胡适的观点，指出胡适“完全为美帝国主义辩护”。文章明确的回答胡适“租界和东交民巷只有官僚、政客、安福系、交通系、帝制派觉得是福地，外币也只有少数富人觉得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只有少数银行家觉得是神人，胡先生或者也是这样觉得，我们小老百姓倒不觉得这样”。《向导》还批评了《努力周刊》关于“好人政府”的主张。

《向导》极大地宣传和支持了工农革命运动，促进了工农革命运动和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在《向导》发行期间，刊载了关于工农革命运动的文章共达 205 篇，其中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有 171 篇，关于农民运动的文章有

34 篇。在这些文章中，著名的有赵世炎的《上海的罢工潮》（第 159 期到 172 期）、《上海总同盟罢工的记录》（第 189 期）、《上海工人三月暴动纪实》（第 193 期），澎湃的《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一封信》（第 70 期），蔡和森的《今年五一之广东农民运动》（第 112 期），瞿秋白的《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第 195 期），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 191 期）等。

《向导》还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政策。《向导》发表了许多文章评述国民党的现状及面临的抉择问题，积极宣传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与良好前景。《向导》的文章，诚恳地帮助孙中山总结经验教训，抛弃对帝国主义和某些军阀的幻想，转向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1923 年 5 月 12 日，蔡和森在《向导》第 23 期发表了《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一文，阐述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并希望孙中山能够迅速接受这一策略。国共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向导》除了继续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外，还对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进行了重点宣传。《向导》还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长期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向导》发表了许多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新老右派的反革命阴谋和罪行，并要求全党认真执行“扩大左派、孤立中派、打击右派”的政策，以巩固革命的统一战线。著名的文章有蔡和森的《商团事件的教训》（第 82 期）、《冯自由派反革命运动的解剖》（第 111 期）、《何谓国民党右派》（第 113 期）、周恩来的《最近二月广州现象之大观》（第 92 期）、《孙中山北上后之广州》（第 98 期），陈独秀的《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第 148 期）、《国民党右派大会》（第 150 期）等。

《向导》首次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国民革命，最早向群众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口号。在《向导》存在近五年的时间里，它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动员广东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以及指导大革命时期的各项斗争方面，都真正的发挥了革命的向导作用。1925 年，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向导》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它已经在全国取得了“舆论的指导地位”，在政治上起了领导作用。读者赞扬《向导》的创办是中国“两千年来历史上破开荒的荣誉作业”，称赞《向



导》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真敢替受压迫的工农阶级呼冤而确能指示民众以革命大路的”唯一报纸，把《向导》看做是“黑暗的中国社会 的一盏明灯”。但是，《向导》对蒋介石、汪精卫右派面目始终没有深刻的认识，直到他们公开背叛革命后，才看清晨其反动本质。在大革命后期，由于受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向导》在对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上，宣传了一些错误的观点，影响了《向导》的战斗作用。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1922 年 9 月 14 日，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和李立三、刘少奇的领导下，安源路矿的工人举行了大罢工，这是湖南工人运动取得胜利的第一次战斗。这次罢工所取得的巨大胜利，不仅极大地鼓舞当时湖南工人运动，而且对后来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安源路矿地处江西省与湖南省接界的萍乡县，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因需要燃料，1989 年聘请德国矿师马克斯和赖伦开采。1907 年，汉阳铁矿、大冶铁矿和安源路矿合并，成立汉冶萍煤铁矿有限公司。为了便于运煤，专门修筑了从安源到湖南株洲的铁路线，与粤汉铁路相接，全程 180 华里，称株萍铁路。由于公司后来向日本人借款，公司实权归日本人所有，工程大权归德国工头掌握，整个企业管理则采取封建把头制。

1922 年前后，安源路矿约有 12 000 工人，株萍铁路有 4 500 工人。安源煤矿工资制度，除一部分工人和杂工属计日工资外，全部窿内（即井下）工人都是封建的包工制。窿内采煤工每人每日应得银元 2 角 7 分左右，而工人每日实得 26 到 27 枚铜元（按当时安源洋价为每 1 元可换铜元 210 余枚）。工头除直接剥削外，还有歇工扣伙食、误事罚工资等，工头每月收入有银洋七八百甚至上千元。窿外各种包头也高出工人三四倍以上。矿局和工头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还要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工人每日的工时为 12 小时，有的还要打连班，甚至几天不能出井。工人还要遭受殴打、虐待。矿上的设备差，经常发生冒顶、倒塌、穿水、起火等严重事故。工人的生命健康没有丝毫保证。

1922 年 5 月 1 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1922 年 7 月，汉阳铁厂的工人罢工经过数日斗争取得胜利。在汉阳铁厂工人罢工的鼓舞下，安源路矿工人对路矿当局拖欠工资，不顾工人死活的态度十分不满。李立三等人关于“安源工人俱乐部之宗旨，为保护工人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和痛苦”[①]的宣传使工人斗争情绪高涨，一时加入俱乐部的近一万人。9 月 7 日，



路矿当局勾结军阀对俱乐部进行威胁，激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9月9日，李立三由长沙回到安源，安源工人纷纷要求俱乐部采取强硬手段，举行罢工。此时，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兼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的毛泽东从长沙来到安源，召开了安源党支部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罢工的时机已成熟，他还号召共产党人站在罢工的前面，领导工人进行罢工。为了加强党对罢工斗争的领导，毛泽东回长沙后，立即派刘少奇到安源，和李立三一起领导即将爆发的大罢工。

9月10日，粤汉铁路武长段爆发了罢工。安源路矿两局怕受到波及，路局主动联系李立三，表示愿意往官厅疏通保护俱乐部，俱乐部趁此机会于9月11日提出三个条件。（1）路矿两局须呈请官厅出示保护俱乐部；（2）路矿两局按月津贴俱乐部常月费200元；（3）从前积欠工人存饷7日内发清。[②]并限于9月12日中午12时前给予答复。与此同时，俱乐部还向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各地工会发出通电，揭露路矿当局的种种罪行，以争取社会同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通电表示支持和声援。同时，毛泽东来信指出，工人要有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斗争，还要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运用“哀兵必败”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罢工口号。9月11日，刘少奇到达安源。9月12日晚，在李立三的主持下召开党支部会议，讨论罢工问题。会议分析了形势，认为罢工的条件已经具备，决定罢工，成立了罢工指挥部，由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任俱乐部全权代表，还成立了侦察队，扩大了监察队，主要负责维持罢工期间的秩序。根据毛泽东指示的策略思想，提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斗争口号。同时还成功地做了洪帮的工作，希望他们讲义气，对罢工给予支持。

9月13日，路矿当局回复了俱乐部的条件。工人认为当局缺乏诚意，怒不可遏。于9月13日午夜12时，断然发出罢工令。凌晨2时，即将开赴株洲的元次车停驶，拆除火车重要机件，并令机务处工友次早不放进班号。3时，断绝矿局电线，运炭电车停驶，除关系到全矿安全和工人生活的锅炉房、发电厂按照布置未停工，其他各处停工，工友大呼“罢工”不止。安源路矿大罢工爆发了。

9月14日清晨，安源矿区到处贴满了俱乐部布告，监察队分为九个小组各处巡逻，维持秩序，担负保卫罢工的任务，没有俱乐部的通行证，任何人不得通行。侦察队负责刺探消息，防止敌人的破坏活动。这样，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不仅成了罢工的司令部，而且成了矿区真正的权力机关。

罢工后，俱乐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随即发表了《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提出17条复工条件。这些条件的主要内容是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权利，保障工人的礼拜休息，病、丧、婚假和因公伤亡等的福利待遇，工头、职员等不得殴打工人，要求改善生活、增加工资等。一面呈文萍乡县署及赣西镇守使署，说明罢工原因，一面将17项罢工要求供给路矿当局。

安源路矿工人发出宣言后，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工会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首先发表声援电。全国各地许多工人团体组织纷纷来电声援。湖南、上海、北京等地的《大公报》、《通俗日报》、《申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晨报》等报道了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的消息或评论，极大地增强了安源路矿工人斗争的决心。

罢工后，路矿当局极为恐慌，勾结总监工王鸿卿召集工头会议，由工头出面收买少数工人复工，结果未能得逞。接着，王鸿卿又向路矿当局献计，悬赏600元刺杀李立三，工人得知情报，一面进行宣言，一面加强戒备，保护李立三，路矿当局又未能得逞。最后，未路矿当局勾结赣西镇守使，派军队数百人占领俱乐部和各工作处，党在士兵中进行工作，工人向士兵宣传，结果士兵也很同情工人。这样，路矿当局的阴谋屡屡失败，不得不请商会出面与工人代表谈判。9月14日，罢工实现后，商会代表谢岚航、地方绅士陈盛芳来俱乐部任调停人，工人请他们将17条复工条件拿给当局。晚上，他们两人回信说，路矿两局对于工人所要求各条，皆可承认；但不能立即办到，请先邀工人开工，再慢慢磋商条件。安源路矿两局的这一要求遭到刘少奇拒绝。9月15日，路矿当局请李立三到商会谈判，路矿代表仍旧重谈先开工、后商谈条件的老调。李立三给予严词拒绝，坚持先谈判，后复工，谈判毫无结果。为了向这会各界进一步说明工人的痛苦情状，工人又发表了第二次罢工宣言，揭露路矿当局拒不接受复工条件，强迫工人走死路。9月16日午刻，安源商会代表谢岚舫和地方绅士贾旸谷，领了矿务局的旨意，以调解人身份来到工人俱乐部。他们一见到刘少奇便说，矿长有请刘少奇到矿务局的玻璃房商谈条件。路矿当局企图贿赂刘少奇，谈判无果。矿务局见谈判无效，便向赣西镇守使肖安国求援，肖安国遂派旅长李鸿程带领军队从萍乡开到安源。工人看到矿务局企图用武力镇压罢工，情绪更加愤激。这时，锅炉房停炉，矿井有被淹没的危险，路矿当局黔驴技穷，矿长李镜澄只得同意磋商。17日晚，俱乐部代表李立三、矿局代表舒修泰、路局代表李毅环和



绅商代表谢岚航等进行谈判，草订协议 13 条。其内容是：

“一、路矿两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

二、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有正当理由宣布，并不得借此罢工开除工人。

三、以后例假属日给长工，路矿两局须照发工资；假日照常工作者须发假薪；病假须发工资一半，以四个月为限，但须路矿两局医生证明书。

四、每年 12 月须加发工资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

五、工人因公殉命，年薪在百五十元以上者，须发工资一年，在百五十元以下者，给一百五十元，一次发给。

六、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路矿两局须予以相当之职业，否则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半饷，但工资在二十元以上者，每月以 10 月为限。

七、路矿两局存饷分五个月发清，自 10 月起每月发 2/10；但路局 8 月份饷，须于本月 20 日发给。

八、罢工期间工资，须由路矿两局照发。

九、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洋 200 元，从本月起实行。

十、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

十一、窿工包头发给窿工工价，小工每月（日）一角五分递增至一角八分，大工二角四分递加至二角八分，分别工程难易递加。

十二、添补窿工工头，须由窿内管班工人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取。

十三、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加大洋六分，四角以上至一元者照愿薪加百分之五。”③

9 月 18 日早晨，萍矿总局全权代表舒修泰、株萍路局全权代表李毅环、俱乐部全权代表李立三在路局机务处正式签订条约，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条约签订后，9 月 18 日，工人俱乐部即刻召开罢工胜利庆祝大会。李立三宣读了 13 项条件，并发表了演说。演说结束后，工人高呼“劳工万岁！”同时，鞭炮声四起。最后，在李立三、刘少奇率领下，工人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当天，俱乐部发表了《萍乡安源路矿工人上工宣言》，与此同时，俱乐部还收到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来的贺电。

这次大罢工，前后共计五天，“秩序极好，组织极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取得了完全的胜利。④9 月 19 日清晨，遵照俱乐部的通告，路矿两局

工人复工。至此，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结束。

大罢工胜利后，安源路矿工人对自己的俱乐部更加信任，部员猛增到12 000多人。俱乐部乘机进行了改组，实行代表会议制和民主集中制，它的基层组织是10人团，每团选“十代表”一人，每十人团选“百代表”一人，每工作处选总代表一人。路矿两局共选出总代表45人，百代表140余人，十代表1 382人。10月21日成立总代表会议，10月22日选举主席团，10月23日举行全体代表会议，选出俱乐部总主任李立三、路局主任朱少连、窿外主任刘少奇、窿内主任余江涛，并委任了文书、会计、庶务、教育、宣传、互济、游艺、交际等股的股长和委员。主席团为俱乐部最高机关，总理一切部务工作。又组成了经济委员会、裁判委员会，以及工人消费合作社，为最高代表会议的直辖机关。在原来工人监察队的基础上，扩大成立了经常性的纠察团。这些组织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可以说是苏维埃的雏形，使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为全国工会组织最坚强的工会之一。

为了巩固和发展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胜利，1922年10月，刘少奇、朱少连等依靠工人群众，击败工头组织的“游乐部”，并且乘胜打破了20余年的封建包工制，将各处包工制一律改为合作制，限制了包工头对工人进行的中间剥削，使安源路矿工人第一次从包工制的桎梏下解脱出来。1922年底，刘少奇又胜利地领导工人进行年关斗争，迫使路矿当局履行13条协议，从而保卫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胜利果实。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的胜利有深远的意义，这次罢工的胜利不仅使安源工人的劳动、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有所改善，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罢工使工人觉悟大大提高，在罢工结束后的一年里，安源矿工中党的组织由原来1个支部发展到13个支部。工人们还抽出部分罢工胜利果实修建了俱乐部大楼。建立了汉冶萍公司总工会。这次大罢工的胜利也鼓舞了京汉铁路工人、粤汉铁路工人和水口山铅矿工人的斗争，极大地推动了湘赣农民运动的发展，并为以后支援北伐战争、参加秋收起义与建立红军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文献标注：

①少奇、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周年纪念册》，第24页。

②③④《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5页、第158～159页、第101～102页。



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

1922年10月23日，开滦煤矿工人举行了大罢工，这次大罢工是北方区罢工潮中最大的一次罢工，也是全国罢工潮中一次震惊中外的大罢工。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以至于在全国各地罢工运动，特别是北方铁路罢工运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没有取得胜利，大部分目标斗争未能实现。尽管如此，这次大罢工还是具有很大的的历史意义的，它是继香港海员大罢工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反帝斗争，不仅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而且对中国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也有很大的影响。

开滦煤矿创办于1878年（光绪四年），是中国最早使用机器开采的规模最大的煤矿之一。该矿起初由中国政府独立经营，但是由于后来资本不足，向英国贷款，变为了中英合办的煤矿，但实际上也就变成隶属英国帝国主义的一个企业了。开滦煤矿包括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唐家庄五矿，矿工共约五万人。1921年，全年约产煤400余万吨，占全国煤的产额20%，是我国最大的煤矿。

开滦煤矿自从被英国资本家控制后，煤矿工人受尽了中外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英国资本家为了赚取大量财富，采煤昼夜不停，工人实行三班作业。工人的工作时间名义上是8小时，但实际上是16小时，因为工人只有连作两班，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甚至有矿工在井下连续工作一星期不出来的。中国的矿山大都采用包工制，开滦煤矿也不能例外。工人都在包工头之下作工，不能与资本家直接交易，中间还要经过包工头的剥削，如井下工人，矿局所给工资每人每日可合银洋两角，而包工头给工人的，则每人每日只可合铜元20枚（中国兑换市价，银洋一角可换20枚至30枚）。包工头从工人工资中剥削一半以上。当给工人发工资时，又要剥削其尾数，如果工资一元以上只给一元，其尾数被扣去；如果工资不足1元，仅付给不足数的铜元。此外，歇工扣伙食，误事罚工资，重利盘剥等事，更是经常发生。包工头还公开放赌，工人必须赌钱，不赌就会被包工头借故开除。工人往往在井

下连续工作一星期所得的工资，不到半日便输光在赌博场上。包工头还经常借钱给工人赌博，利息特别重，因此每个工人都负债累累，无法脱离包工头的残酷剥削。工人还经常受到其他凌辱打骂。煤矿缺少起码的安全设施，塌顶、起火、中毒、瓦斯爆炸时有发生。因此，开滦煤矿工人有强烈的反抗斗争精神。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十分重视开滦煤矿的工人运动。早在 1921 年冬，中共北方区委曾经制定了“唐山地区同盟罢工”计划，准备在 1922 年秋天，组织唐山、丰润、滦县、秦皇岛五个县市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政治经济罢工。接着，中共北方区委成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部的罗章龙、王尽美、王仲一、彭礼和、吴先瑞、李昂、袁达时等先后深入唐山和开滦煤矿调查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组织工会，开展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帮助下，建立了“唐山京奉路制造厂职工会”，邓培为会长。1922 年 8 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邓中夏来开滦煤矿视察；9 月，唐山京奉路制造厂职工会给开滦林西机器厂工人发出一封信，介绍了组织斗争的经验，表示愿尽一切力量帮助工人与资本家斗争；9 月 21 日，林西机器厂发表了《致开滦工友书》，这为后来成立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2 年 10 月 4 日，京奉路山海关铁工厂的罢工取得了胜利。10 月 10 日，召开京奉路山海关铁工厂罢工胜利大会，大会号召唐山工人积极起来斗争。此后唐山工人运动形势发展很快。10 月 13 日，唐山京奉铁路制造厂 3 000 多工人宣布罢工。10 月 15 日，邓培召集工人大会，这次大会有利地推动了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的实现。

1922 年 10 月 16 日，开滦矿工选派 8 名代表向开滦总矿师杜克茹（比利时人）面交提出改善生活待遇的请愿书，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 6 项要求：“（一）请求加薪分为三等：15 元以下者应加三成；15 元以上者应加二成；50 元以下者应加一成。（二）我工人年尾应照庚子前给回一月偿金。（三）我工人每月四星期日（天）及年节停止工作。应援庚子前给回工资。（四）工匠煤条及慰劳金，应与员司一律偿给，凡工人每月有 12 元薪金者，应得享此条件。（五）工人在局有过 25 年者，应给养老费，并须照原薪支给；倘无打过，不得借端革除。（六）工人因工受伤，应给回工资。倘遇因公致命者，应酌给抚金。该恤金须照月薪计，最少补至五年，应作一次补足。”[①]与此同时，开滦矿工加快组织五个矿工友俱乐部的工作。10 月



19 日，在中共唐山地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在车站附近的华宾楼召开各矿、处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只奎元任主任。决定立即准备罢工，成立了罢工领导机构——开滦五矿同盟罢工委员会，由中共北京区代表罗章龙、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代表王尽美、中共唐山地委邓培和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代表共 20 多人组成。这次代表会议进一步为开滦同盟罢工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杜克茹接到工人要求条件后，表面上不予理睬，但心里恐慌，第二天便到天津与开滦矿务局总经理、帝国主义分子杨嘉立磋商镇压工人运动。10 月 20 日，开滦矿务局发出《告工人书》，指出：工人如提出“无理要求”，矿务局是不会答应的；对于工人的困难，矿务局则“极愿帮助”，无论矿局直接雇用或包工雇用之工人，每月工资在 30 元以下的增 10%，还对工人进行威胁。但工人并不为所动。

10 月 21 日，京奉路唐山制造厂罢工取得完全胜利，开滦工人深受鼓舞。10 月 22 日晚，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在林西召开各矿代表联席会议，商讨罢工的具体问题。会议期间，林西矿六名工人代表在请愿时被矿方无理扣留，代表们决定在 10 月 23 日 6 时举行同盟大罢工。当晚，在罢工委员会领导下，组成了强大的执行机构罢工指挥部。由罗章龙任指挥主任，王尽美、彭礼和、吴先瑞、李梅羹、王德周、梁鹏万以及王麟书、阮章等人也先后参加了指挥部，罢工指挥部下设纠察队和调查部。罢工指挥部为了在罢工期间统一行动和严明纪律，还制定了罢工规则、会员规约。

10 月 23 日清晨，由唐山、赵各庄、林西、唐家庄四矿工人和秦皇岛码头工人，按照罢工指挥部的罢工命令同时罢工。除锅炉房、绞车房、水泵房和电厂等要害部门工人外，其余工人都罢工。当天，罢工委员会以五矿个俱乐部的名义向全国各界发表了开滦五矿总罢工宣言及条件，呼吁全国工人和社会各界的声援和支持。

在矿工举行罢工的同时，矿局指挥华洋头目和少数工贼守护要害部门，企图利用反动武装镇压罢工。工人俱乐部趁机逼迫他们承认五矿工人俱乐部，把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结合起来。10 月 24 日，以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的名义，给矿务局发出公函，指出罢工是矿局逼迫的，除了 16 日请愿书所提的六条要求外又加了四条。

杜克茹在 10 月 23 日到 25 日接连向天津开滦总理发电，要求派外国军队到开滦，同时加紧勾结直系军阀政府和重金贿买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派军

到矿区武力镇压工人。10 月 25 日，英国分遣队 100 名英印兵从天津开来，林西矿工得知消息组织敢死队拦阻。与此同时，10 月 25 和 10 月 26 日，唐山矿工人 3 000 余人连日集会，在矿局门前示威，唐山警察武装镇压，造成伤亡达 65 人的血案。开滦工人阶级没有被吓倒，斗争仍在继续。血案发生后，罢工指挥部立即召集矿工代表开会，决定向矿方当局提出三项要求。同时还以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的名义发表了第二次宣言，呼吁全国各界同胞给予援助。宣言发表后迅速得到全国各界的同情和支持，以及国内舆论的报道。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唐山制造厂职工会、山海关铁工厂工人俱乐部，京汉路、粤汉路、津浦路等工会组织纷纷表示支持，还呼吁全国的援助，谴责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杨以德的罪行。当时的许多报刊也登载报道和评论，一些议员还向国会和政府提出弹劾，要求惩办杨以德。此外，还有许多单位和个人进行经济上的援助。10 月 28 日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的工人举行了同情罢工，以实际行动支援开滦 5 矿的罢工，唐山的其他工厂有的也在酝酿同情罢工。各界不同形式的援助和支持极大地鼓舞了开滦工人的斗志。

“十・二六”血案后，迅速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声援开滦矿工的浪潮，特别是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和华新纺织厂工人举行的同情罢工，使开滦罢工的声势更加壮大。为了镇压罢工，开滦资本家进行了各种阴谋。罢工进入长期坚持的阶段。

开滦矿务局代总经理杨嘉立和督办袁克定向军阀曹锟、直隶省长王承斌和直隶全省警务处发出函电，要求派重兵进驻矿区，来迫使工人复工。反动武力超过 3 000 人，形势极为紧张。与此同时，杨以德在杜克茹的授意下于 1922 年 11 月 4 日强行占领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逮捕了中国劳动书记部特派员彭礼和等 8 人。11 月 5 日，又将京奉铁路职工总会、启新洋灰公司俱乐部查封，在俱乐部内肆意抢掠焚烧，抢走工会银洋 600 余元。面对敌人的野蛮进攻，11 月 5 日，中共唐山地委将罢工指挥部转移到郊区，继续指挥斗争。

杨以德的罪恶行径引起唐山工人的极大愤慨。11 月 4 日，开滦五矿、秦皇岛、启新洋灰公司的五万工人，控诉军警当局和矿方的罪行，呼吁全国工友的支持；又以开滦五矿、秦皇岛三万多工人的名义致电参众两院弹劾杨以德。唐山党组织进行“驱杨运动”，选派开滦煤矿和启新洋灰公司的 11 名工人组成请愿团到北京向政府和议会请愿，弹劾杨以德。北京军阀政府唯

帝国主义之命是从，请愿无果。请愿虽没有结果，但请愿团的行动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全国各界发电声讨杨以德，连国会中的一些议员联名向国会提出弹劾。杨以德被迫离开唐山回到天津。

外国资本家为了破坏罢工，还实行“饥饿政策”，迫使工人自行复工。与此同时，他们还唆使反动神父、收买叛徒工贼和封建包工头在工人中进行恩赐宣传煽动私自复工。

开滦工人在罢工委员会和工人俱乐部的指挥下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阴谋破坏活动，把这场震惊全国的同盟大罢工坚持了近一个月。

由于罢工时间长，给矿区资本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各矿维持要害部门工作的外籍人员由于昼夜连班而筋疲力尽，从天津强迫调来的技术工人在了解罢工真相后也纷纷要求回天津，使得各矿连发重大事故，照这样下去整个矿山有被毁灭的危险。此外，社会舆论对开滦资本家及其走狗的谴责，全国的工人、学生对开滦工人的大力支持，有引起更大罢工潮的趋势。加之开滦的资本家获悉全国铁路工人将可能以总罢工的形式支援开滦工人的罢工。在这种情况下，开滦资本家只得于11月14日宣布两项退让条件。这与工人提出的要求相差甚远，大部分斗争要求没有实现。但是工人迫于生活困难，马家沟的矿工早于10月10日复工，赵各庄一部分工人代表于11月16日宣布复工。罢工委员会不得已，下令11月17日全部复工。唐山、林西、唐家庄于11月17日复工，共坚持25天。启新、华新工人随之复工。秦皇岛经理处码头工人坚持到11月19日才复工。

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虽然遭受挫折，但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仍占有重要地位，意义重大。

这次罢工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由于罢工持续的时间长，给资本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复工后，由于工人增薪要求的支出，还要使他们失掉巨额利润。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嚣张气焰。

罢工斗争进一步推动了开滦煤矿工人的觉醒，标志着开滦煤矿工人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次罢工之前，除了“五四”运动中举行过爱国性质的政治罢工外，历次的罢工也只局限于经济目的，而这次罢工是在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和唐山地委领导下进行的，不仅提出了改良工人生活的经济方面的要求，还明确的提出了争取自由的政治方面的要求，使开滦的工人阶级在斗争中锻炼成长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政治力量。

这次罢工掀起了北方工人罢工高潮，进一步推动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发展。1922 年的北方工人罢工运动，至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达到了高潮。邓中夏曾指出，开滦罢工“是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中最重要的罢工之一个”，使第一次全国罢工高潮“达到最高峰”，[②]从而成为 1923 年 2 月 4 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先导。这次罢工还引起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重视，他们不但在罢工期间给予经济援助，而且在罢工后还派代表来视察，肯定了这次罢工的重大政治意义。

这次罢工的大部分斗争目标未能实现，客观上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相互勾结对罢工进行残酷镇压。但工人自身也有不足。首先是干部不足。唐山地委成立不久，开滦煤矿的党员较少，没有来得及培养和选拔大批的党员和骨干分子，开滦五矿范围大，没有足够多的干部力量是很难领导斗争的。其次是没有与农民结成统一战线。罢工只注意联合学生、争取各界人士的支持，未广泛的发动农民，特别是粮食方面的支援。此外，罢工经费不足，组织不太充分也对罢工的胜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注释：

①《开滦矿局林西、唐山、赵各庄、秦皇岛、马家沟五矿工人联合请愿书》，《北国春秋》，1960 年，第 1 期，第 15 页。

②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 年），《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 年。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高举“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旗帜，为争取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这次大罢工使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达到了顶点。领导这次罢工斗争的主要成员有张国焘、罗章龙、包惠僧、项德隆、李震瀛、杨德甫、史文彬、凌楚藩、吴汝明等。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残酷统治的背景下，在中国工人运动从要求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向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虽然迅速的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但是由于没有起码的民主权利，在组织工会和罢工斗争中，几乎没有一处没有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强权的镇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工人运动要继续发展，就必须作争取自由权利的斗争，使工人运动得到合法的保障。

1922年秋天以后，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嚣张气焰。8月，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的胜利，仅增加工资一项就使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受到了巨大的经济损失。1922年，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地区的罢工运动主要在官办企业或与官办企业密切相关的汉冶萍公司进行，到1923年初则主要在外国企业特别是英国在湖北的工厂中进行。如汉口英国烟花厂、英国花厂举行的罢工，罢工者与英国巡捕发生了暴力冲突，使之受到沉重打击。1922年下半年，工人组织迅速的发展起来。武汉有20个工团组织的工团联合会，会员约三万人，湖南有14个工团组织的工团联合会，会员约四万人，汉冶萍有五个工团组织的总工会，铁路工人虽还没有组织成全国铁路总工会，但有组织的工会会员达4万余人。工人组织如此大发展使军阀吴佩孚恐慌。

此外，1923 年中国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英美帝国主义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对抗中加强了地位，从而使直系军阀在北京的地位更为巩固。吴佩孚正准备在 1922 年底到 1923 年初借助英、美帝国主义的力量进攻华南的革命力量。而正在迅速发展的工人运动严重的威胁着英美帝国主义及吴佩孚计划的实现。这也是吴佩孚决意血腥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一个原因。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虽然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发生，但其爆发的直接原因是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

1922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认为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之前，需要成立铁路、海员、矿工三个产业的联合组织，作为工会运动的中坚。而在铁路工会组织中，京汉铁路的工作基础较好。所以，中国共产党计划在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前，先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其实，早在 1922 年春天就已经着手进行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1922 年 4 月 9 日，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领导下，在长辛店召开了第一次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议，选举杨德甫为主任，史文彬和凌楚藩为副主任，负责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8 月 10 日到 8 月 12 日，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和武汉分部的领导下，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议。会议选举高斌为主席，并决定在郑州正式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在总工会成立大会未开之前，由筹备委员会行使总工会的一切职权，还决定要将各部的工人俱乐部改组为京汉铁路总工会分工会。会议起草并讨论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经过三天的讨论，决定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杨德甫为委员长，史文彬和凌楚藩为副委员长，李震瀛为秘书长，项德隆为总干事，吴汝铭为副总干事。1923 年 1 月 5 日，在郑州召开了第三次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负责人。在召开这次会议之前，长辛店、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顺德、彰德、新乡、黄河、郑州、徐州、郾城、驻马店、信阳、广水、江岸 16 个站的俱乐部已经改组为京汉铁路总工会分工会。实现全路工人大团结的条件已经成熟。会议讨论并修改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决定于 1923 年 2 月 1 日在郑州举行全路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会址设在郑州花地岗玉庆里 4 号。

当时，中国共产党不是没想到吴佩孚会进行破坏活动，但是并没有预料



到他会在全国人民面前采取公开屠杀的手段。所以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工作完全是公开进行，大会的宗旨、日期等都在各地报刊上公布了。还向路局局长赵继贤作了报告，当时赵继贤，一面假装允许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对会议给予一定的帮助；一面与吴佩孚商讨镇压措施。1923 年 1 月 28 日，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来总工会筹备会宣布禁止开会。可是广大工人、代表不为所动，依然要如期举行大会。1 月 30 日吴佩孚发电，招工人代表到洛阳谈判，其目的是假借谈判拖延时间，使大会不能如期举行，谈判失败。1 月 31 日晚，工人代表返回洛阳。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代表汇报了同吴佩孚谈判的情况，大家经过讨论，最后决定大会如期举行。

截止 1 月 31 日晚，大会代表和来宾共 300 多人，齐集郑州。他们是：京汉铁路 16 个分会的代表 65 人，各条铁路的代表 60 多人，30 多个工会团体的代表 130 多人，北京、武汉等地的学生代表和记者 30 多人，中共中央派张国焘、陈潭秋、罗章龙、包惠僧、林育南、项德隆、李震瀛、许白昊参加了会议。

1923 年 2 月 1 日拂晓，郑州全城已被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关店闭户，行人断绝。上午 10 时代表在五州大旅店集合，整队前往大会会址普乐园剧场，郑州 2 000 多铁路工人，从普乐剧园出发迎接。队伍行到距会场不远的钱塘里，被军警包围阻止前进。全体大愤，先推代表再三理论，终不允许，相持约两小时，最后不顾生死，冲开阵线，拥入会场。

大会主席、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长李震瀛宣布开会，说明总工会宗旨，及此次被强权压迫的可恨，并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群众大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这时会场已被军队包围，黄殿辰率武装警察冲入会场百般威吓，迫令解散大会，但是群众更加激昂，奏乐欢呼，声如雷鸣，坚持开会。直到下午 4 时，宣布散会，冲出重围。

当日下午，代表及来宾回到旅馆，被重兵包围，不许偶语，总工会在酒馆所定的酒席也不准吃，代表及来宾完全失去了自由。随后黄殿辰捣毁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和郑州分会会所，摘去匾额，室内东西被抢劫一空，还强令代表离开郑州。

当晚，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召集秘密会议。决定本月 4 日发动全路总罢工反抗吴佩孚的武力压迫。会议还就罢工领导、方针政策和罢工要求条件等进

行讨论并作出决定。向铁路当局提出五项条件。全路各分会代表回去后，立即向工人传达了总工会关于举行全路总同盟罢工的决定，分别进行罢工准备。

1923年2月4日上午9时，铁路当局拒不答复5项要求，于是总工会下令2月4日中午12时全路工人总同盟罢工。与此同时，总工会发表《全体工人罢工宣言》和《敬告本路员司》、《敬告旅客》等传单。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得到群众的理解，极大地鼓舞了工人的斗志。

2月4日，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在全线展开。京汉铁路中段郑州于9时宣布罢工，南段江岸于10时宣布罢工，北段长辛店于11时宣布罢工。其余13个分工会也都同时举行罢工。

江岸方面：

罢工的第二天（2月5日），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参谋长张厚生到江岸，先使该地警官以强硬态度，要挟工会交出工会负责人杨德甫、朱兰田、张濂光、罗海臣、林祥谦5人，工会拒绝。与此同时，张厚生代领军队占领车站机厂，迫令大智门车站开始买票，并捕去2名司机强迫开车。江岸分会派纠察团抢回工人。军警又逮捕纠察团工友3人，并恐吓工人，工人毫不畏惧，军警无奈将其释放。

罢工的第三天（2月6日），武汉各工会各派代表数百人到江岸慰问，即在江岸举行慰问大会，参加大会的工人有万余人。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致辞，感谢慰问代表的盛意，继由各工会代表数十人演说，无不慷慨激昂，最后秘书长李震瀛致答词。随后，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历时两小时左右，沿途加入者3 000多人。此时，萧耀南的代表正和外国资本家在汉口英国领事馆开会，策划对罢工工人进行大屠杀。

长辛店方面

罢工第一天（2月4日）早，长辛店分会在娘娘宫召集全体大会，到会者有3 000余人。主席报告总工会罢工命令，群众热烈赞成，随即开始罢工。同时发表宣言，申明罢工的原因。工人待遇旅客极有礼貌，男子为代雇车马，女子则延至工人家里住宿，次日护送至京。所以当时社会人士对罢工工人均表好感。

罢工第二天（2月5日），北京铁路管理局茶役举行同情罢工。赵继贤



此时已得到吴佩孚的命令，令其严厉处置，发出威胁布告，限工人于12小时内复工，但工人置之不理，赵继贤又派人到长辛店威迫工会单独交涉，工会的回答是“只知总工会命令，不知其他。”午后，曹锟派六个营的军队将长辛店包围，宣布戒严。并派密探出没工会附近，调查工会主要人物的住址，以便实现其阴谋。全体工人举行示威，并向士兵宣传互助联合。

罢工第三天（2月6日），工会调查队报告，军队行动极为可疑，听说从涿州调来大批军队。一时气氛突然紧张，但工人态度仍很坚定。当日，长辛店分会发表第二次宣言，重申罢工的原因。正午，赵继贤从塘沽运来新工人126名，另挑选500名兵士，学习开车，并宣言罢工工人如不复工，当一律解散，押解出境。工人仍置之不理。下午，涿州调来2营士兵。

郑州方面

罢工第一天（2月4日），总罢工后，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鹗召集工会代表高彬、姜海士、刘文松3人到司令部谈话，靳云鹗见面便大骂，勒令开车。工会代表严词拒绝。

罢工第二天（2月5日），靳云鹗再次要求高彬、姜海士复工，遭到拒绝，拘捕2人，另一工会委员见高彬、姜海士被捕，自动愿同他们一起受苦。

罢工第三天（2月6日），军警又逮捕两名委员，上午靳云鹗将被捕的五人推至车站威吓工人，工人不惟不惧，反而更加愤激。下午，军警雇人鸣锣招呼工人上工，工人置之不理。

从2月4日开始京汉铁路工人总同盟罢工后，经过三天的较量，吴佩孚破坏罢工的目的不但没达到，反而使工人罢工斗争的情绪更加高涨。这时，京汉路南段长冯沄过江到武汉向萧耀南报告，罢工3天已造成100多万的损失。至此，吴佩孚恼羞成怒，于2月7日对京汉铁路工人进行屠杀，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2月6日夜，赵继贤指挥军警分途逮捕工会主要负责人。当时工会领袖分别匿居在工人家属中，未被捕。后来由工贼带领搜捕，史文彬、吴汝铭、张宝和等11人被捕，被毒打后，准备天明送到保定。2月7日拂晓，3 000多工人集合起来，在纠察队长的带领下，在旅部示威，要求释放工人。军警从旅部涌出向工人们开枪。当场牺牲的有五人，受重伤的28人，被逮捕的

有30人。军警乘机大抢，居民纷纷闭门，全市秩序大乱。2月8日，北京《晨报》刊登了长辛店分工会发出的《宣言》，控诉军阀罪行，还刊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残杀长辛店工人的事所发的通电。

2月6日，张厚生由于在汉口英国领事馆策划对工人的屠杀，没有按预约与总工会谈判。又约定于下午5时30分谈判，并要求代表在工会等候，张厚生会亲自来。5时20分士兵包围了江岸工会，开枪环击进行围捕。工人赤手空拳誓死抵抗，相持几十分钟，直到总工会下令撤退，工人才渐次疏散。牺牲的有曾玉良等32人，200多人受伤，60多人被逮捕。同时，又进行了抢劫，工人聚居一带连遭抢三次，工人被枪击，殴打、强奸工人的妻女。林祥谦、施洋等优秀的共产党人被杀。江岸铁路工人遭到史无前例的涂炭。

与此同时，京汉铁路沿线其他工人也遭到武力压迫。

江岸惨案发生以后，武汉工人无不悲愤填胸，湖北省工团联合会为了援助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发出总罢工命令。第二天实现罢工的有徐家棚铁路、汉阳钢铁厂、汉冶萍轮驳、丹水池、扬子机器厂，但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

形势十分严峻，领导京汉铁路罢工的八位负责人在汉口法租界召开紧急会议，为保存革命元气，决定劝告工人忍痛复工。2月9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联名下令复工。最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了。

这次大罢工失败，主要是由于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联合力量大大超过了当时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的革命力量。此外，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和强大而又阴险狡猾的敌人作斗争时，缺乏足够的经验，使得这场斗争在具体问题上也存在缺点。但它也给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宝贵财富。

这次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它用鲜血和生命向全国人民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指出的真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人民当前的主要敌人，被压迫人民要解除自身的痛苦，只有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此外没有任何别的



出路。

在这次罢工中，中国工人阶级显示了革命的坚定性、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他们在敌人的血腥屠杀面前，毫不畏惧，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威信，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这次罢工的失败表明，要战胜全副武装的敌人，中国人民必须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必须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工人阶级要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才能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农村经济农民状况

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农村经济、农民的基本情况是：军阀官僚大量抢占土地，加大对农民的压榨和剥削；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农垦企业不能充分发展；帝国主义大量侵占农田，控制和榨取小生产者；土地占有日益集中，而农民的土地日益减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重压下，农民极为贫困，难以生存。

辛亥革命失败后，北洋政府取代了清王朝，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制仍然存在。帝国主义为了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其统治中国的支柱，扩大侵略的需要，也就必然要保持封建土地所有制。这样，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封建地主有增无减，特别是军阀官僚仗势掠夺大量的土地。

中国大地主，主要来源于前清官僚贵族后裔及现在的官僚军阀，还要一小部分是城市富商置买土地。无田起家成为大地主的极少。这些地主的利益建立在对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的严重剥削的基础上。小地主主要来源于力田起家，也就是从自耕农升上来的，有一部分是城市商人购置土地，还有一部分是官僚后裔的衰败者及现在的小官僚。小地主的数目比大地主多，全国至少有200多万小地主。其剥削方式主要有重租、高利贷和剥削剩余劳动三种。

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土地买卖相对比较自由，封建土地的束缚逐渐松弛。一是本族土地先买权被废除，使土地买卖扩大了范围；二是赎回制度式微，1915年北洋军阀政府公布了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规定出卖的土地如果购买者不愿卖，原主不得赎回，消除了由此引起的频繁的土地买卖及纠纷；三是永佃制的废除，地主逐渐打破了以前不能任意收回佃农所租土地的



惯例。这些都有利地推动了土地的自由买卖，也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在军阀地主和官僚地主手中。这也是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农村土地占有关系变化的一大特点。大大小小的军阀与官吏，利用职权强占土地，成为新兴的地主阶层。如，袁世凯在河南彰德、汲县、辉县等地占有田地400顷，其田产占彰德所有耕地的1/3以上。段祺瑞在东北边境圈占荒地20万顷。徐世昌在河北辉县有田产50多倾。阎锡山在山西五台县占有的土地价值在600万元以上。张作霖先后占有300多万亩。督军倪嗣冲、张敬尧在家乡安徽阜阳、霍邱等地占地7万余亩。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军阀混战，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当时全国南北方都不同程度地遭受炮火的蹂躏。广大农村和中小城镇是军阀的主要战场，受害尤其严重。农民畏兵如虎，潜逃他乡，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1927年春，有人在河南一带进行考察，从驻马店到遂平，沿京汉铁路两侧五里之内，“所有的乡村，都是十室九空，有几个乡村简直是十室九空！”[①]以江苏宜兴为例：1924年秋齐（燮元）卢（永祥）之战，死伤农民150人；1925年春奉军南下，死伤200人；1925年秋孙传芳军队通过，死伤100人；一年三战，共死伤450人，经济损失254万元。[②]万亩良田成为军阀的厮杀之地。齐卢战场，为松江、青浦、嘉定、太仓、宝山、昆山、金山、奉贤、上海九县，本来都是江南富庶之地，战后城镇一片瓦砾，乡间“五十里不见菜绿”。即便是偏僻的西南地区也不能幸免。1924年5月，大定县因无人耕种，四野一片黄土；8月，滇军由贵阳过大定退回云南，因官道两旁无男子，便硬将田里耕耘的妇女拉走。[③]

各军阀滥用权力，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榨，田赋高得惊人。据统计，从1912年到1927年，全国田赋平均增加额为39.3%，各地差别很大，田赋较轻的浙江省嘉善为20.2%，较高的直隶昌黎为53.3%。除了正税外，还有各种附加税，而这些附加税的数额远远超过了正税。1915年，农民不堪过高的赋税，再加上社会舆论的反对，政府财政部曾规定附加税不得超过田赋正额的30%。但是，由于后来中央政府的权力减弱，各省自行其是，以各种名目增加田赋，充作行政经费。山东莱阳1927年每亩正税为1.8元，而各种附加税合计5.57元，相当于正税的3倍多。浙江嘉善1928年每亩正税额为0.297元，附加税为0.983元，也相当于正税的3倍。[④]军阀之间的混

战，使得一个军阀被打跑了，新来的军阀不承认前面军阀的税收，又重新开始正税，这在四川表现的尤为突出。1927 年，郫县已将田赋预征至 1939 年，多征了 12 年，还有地方预征至 1957 年，多征 31 年。[5]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军阀忙于争权夺利，民众忙于逃难，江河堤防等水利工程的建设没有人管，以至于灾难频繁，规模甚大。1920 年，华北五省大旱，317 县受灾，灾民达 2 000 万，死 50 万。1921 年，南方北方同时发生大水，其中粤、豫、冀 3 省受灾 48 县，灾民达 9 814 332 人。1922 年苏、浙、皖三省大水，灾民达 1 200 万。[6]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由官吏、乡绅、买办商人、华侨、资本家等开办的新式农垦企业也发展了起来，这也是该时期农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征之一。最早的农垦企业是官僚张謇于 1901 年在江苏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1919 年前的 10 余年间有 300 多个农垦企业，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山西、吉林、内蒙、察哈尔等省，尤其以苏北盐垦区、内蒙和东北三省较多。据统计，1912 年，全国各地农村成立的垦殖公司有 71 家，资金达 635 万元。1922 年，仅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山西、察哈尔八省统计垦殖公司由 59 家扩增到 100 家，资金达到 1 245 万元。从农垦企业的创办人来看，多半是军阀、官僚。如，官僚宋盈年在江苏金坛投资 10 万元创办茅麓公司；军阀张督（张誉之弟）在江苏先后年年（1914 年～1920 年）年投资 632 万元，创办大有晋、大豫、大赍、大丰、大纲和中孚等盐垦公司；张謇和军阀冯国璋 1917 年在江苏阜宁合资 120 万元，创办华成盐垦公司；官僚岑春煊 1919 年在江苏盐城投资 80 万元创办太和盐垦公司，官僚陈仪于 1922 年在江苏东台投资创办新华垦殖公司等。军阀张勋、王廷祯、吴佩孚，孙传芳等都有投资新式农垦企业的，他们的土地许多是掠夺兼并而来的。也有一些新式农垦企业是商人、地主、侨商和工业资本家投资创办的。[7]

这些农垦公司基本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事蔬菜、养蜂、牛奶、果园、粮食等农副产品生产，并且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第二类是采用自垦和租佃双重形式的公司；第三类是特权阶级利用特权低价领垦土地，然后转手出租的农垦公司。

辛亥革命后，农垦公司的大量创办，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农业资本主义有



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但是，就整个中国农村经济来看，农垦公司所占的比重很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这些农垦公司发展十分艰难，有的夭折，有的负债累累，有的向封建地主经济逆转，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进一步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同时也扼杀了中国农业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农垦公司纷纷歇业、倒闭。当时众《东方杂志》有这样的报道：考（江苏）沿海公司，东南自通海垦牧起，西北至新通公司止，计有四十余处之多。此等公司，泰半发起于民国六、七年之际。……近数年来，各公司因风虫雨水之灾、连年失败，公司与佃户交困，负债累累，清偿无术，周转不灵，因此停顿者，比比皆是。[8]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凭借武装侵略、不平等条约等特权，肆意侵占中国的农田。帝国主义还通过传教等方式麻醉中国人民，并在农村建造教堂侵占房地产。法国天主教河北献县张家庄总堂，它的宅院占地亩，就是侵吞了163份农民的地产而造成的。该总堂在献县、河间、交河、深州等县教区共占有土地5 975亩，房屋3 330间。如，1913年以“买”、“当”、“献”、“换”等手段，在河间县占地61.9亩、房屋275间，1919年在献县占地134.9亩，房屋26间。[9]帝国主义还以贷款、预购、包销等方式侵人农村，直接控制小生产者。如，英美烟公司的总机构设在上海，下分天津、汉口、满洲、香港等“部”，“部”下又分“区域”，“区域”以下又分“段”，“段”之下又有“分段”。[10]其他公司，如，亚细亚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等，也都有这样的推销网，它们把魔爪伸向中国农村，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

帝国主义的侵略加深了中国农村经济殖民化的程度，造成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凋敝。帝国主义向中国农村大量倾销日用消费品，掠取其生产所需要的原料，对中国农村经济起了分解的作用。大量日用消费品倾入农村市场，进一步排斥了家庭手工业，使农村手工业进一步受到打击，农民不得不用农产品换取日用消费品，这样，就加深了中国农民对洋货的依赖程度，使农民成为帝国主义直接的剥削对象。

帝国主义在倾销商品的同时，还采取各种办法，迫使农民放弃原有的生产，为帝国主义种植和出售它所需要的原料，造成中国粮食生产的缩减。这

样，农业中经济作物耕地上升，粮食作物耕地下降，粮食大量入超。如，1914 年到 1919 年，种植棉花的耕地占全部耕地面积的 14%，水稻耕地占全部耕地面积的 41%；到了 1924 年，种植棉花的耕地上升到 18%，水稻耕地则下降到 37%。个别地区的棉田竟然达到 70%，而水稻田只占 30%。海洛因的种植面积，由 1914 年的 3% 上升到 1924 年 11%。[11]伴随着这一情况而来的，是粮食入超量的增加，1922 年入超的小麦就达 3 007 712 担。粮食作物等农产品的大量入超，形成谷贱伤农。帝国主义者再通过商业资本乘机操纵，使广大贫苦农民过着卖贱米、吃贵米的日子。大多数的贫苦农民，在秋收以前以买者的身份出现在市场，在秋收以后则以卖者的身份出现在市场，生活日益濒于绝境。从而加深了农村经济的殖民地化程度，使农村进一步成为帝国主义推销商品、吸取原料的市场。

在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豪绅富商的掠夺和压榨下，土地日益集中在他们的手中，而占人口大多数的雇农、贫民乃至部分中农则没有土地或缺少土地，农民的生活更加困苦不堪。以南通为例，1905 年自耕农占 20.2%，到 1914 年为 15.8%，1924 年只占 13% 了；佃农则由 1905 年的 56.9%，到 1914 年的 61.5%，1924 年再升为 64.4%。自耕农的比重下降，佃农则急剧上升，反映了土地占有的日益集中。地租也在不断的上涨，1905 年上等田每亩为 39.3 元，1914 年为 59.8 元，1924 年为 98.1 元；而下等田涨得更快，与其相应，下等田的地租增长率也高过上等田的地租增长率，如，以 1905 年的租率指数为 100，到 1924 年上等田 229，下等田则是 225。与此同时，农户的田场面积普遍缩小，尤其是自耕农的田场缩减尤为严重。南通的自耕农 1905 年每户平均田场 16.6 亩，到 1914 年为 12.8 亩，1924 年只 10 亩了。昆山的自耕农 1905 年每户平均田场 23.1 亩，1914 年为 14.5 亩，1924 年只 9.4 亩了。土地使用日渐分散。[12]

1922 年，浙江、江苏、安徽、直隶四省九县的调查统计结果为：农户年收入在 50 元以下的占 44.9%，51～100 元的占 21.6%，101～150 元的占 8.3%，151～200 元的占 6.3%，201～300 元的占 6.9%，301～500 元的占 6%，501～1 000 元的占 4%，1 002～5 000 元的占 1.8%，5001 元以上的占 0.2%。根据每户生活必需的开支，收入 150 元以下的不够支出而作为“贫人”的界线，“贫人”则占农户总数的 74.8%，其中直隶农户中的“贫人”

在82%以上。[13]农民的收入不够支出，还要被迫借高利贷。这样，地租、高利贷、田赋，加上军阀混战的影响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农民简直苦不堪言。

政治动荡与军阀战争使各地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各地县有关“盗匪蜂起”的报道充斥着报纸版面。这时期出现了许多民众起事，但这些民众起事，从形式上看，仍然无法摆脱旧式农民起义的模式。如，奉贤县农民起事时首领则自称“洪天王复活”；归德农民起义打出的是“刘汉王代天行道”的口号；浙江泰顺县林一新起义时“以反对新政（指民元政府）为宗旨”；云南绍通、陕西宝鸡、江苏培县的农民起事则均以“毁教堂”、杀传教士为号召；河南等地不少民众起事时还以山东出了真龙天子为旗帜。从组织上看，农民起事时多采取传统的秘密结社，像洪江会、三点会、哥老会、江湖会、红灯会、红枪会、忠义堂、黄会等会分布极广。但另一方面，农民起事中也加入了不少新的内容，如，“革命”、“光复”、“共和”、“民军”、“政党”之类新词，说明了民国政治在农村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金华会党层组织“共进会分部事务所”，刻有会章，印有入会志愿书，仿佛新式政党一样；在四川省，许多义军都以“同志军”的名称为旗号。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中国农民社会意识依然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传统的内容。从广大农村的信仰来看，除了一些少数的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等宗教之外，人们普遍信仰祖先，同时还信仰各种神灵，如玉帝、土地神、财神、龙王、灶神等。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在各地农村中也有不少信徒。传统的因素依旧在农民的思想观念中占领着主导地位，宗法思想还牢牢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农村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农民的意识也处于闭塞状态。1926年，李景汉对北京西郊两个村庄64户农民进行了调查，有53户农民不知道中国大总统是谁，9户农民回答中国没有大总统，1户农民回答是段祺瑞，1户农民的答案为袁世凯，有55户农民不知道本县知事是什么人。北京近郊尚且如此，全国其他各地可想而知。

注释：

①③⑥⑦⑪⑬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1912－1927年），1957年版，第614页、第617页、第618～619页、第342页、第215

页、第471～473页。

②徐万千、汪茂道：《宜兴之农民状况》，《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

④《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第64～68页。

⑤曹鸿儒：《中国农业经济之发展》，1931年版，第189～190页。

⑧李积新：《江苏盐垦事业概况》，《东方杂志》第21卷第11号，1924年6月，第66页。

⑨《天主堂在献县等处的田产》，《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

⑩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221～226页。

⑫乔启明《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之比较及改良农佃问题之建议》，1926年。



党对农村和农民的认识

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寄希望于新兴的无产阶级，把主要的精力首先集中在工人运动方面。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没有无视中国的基本国情，没有忘记中国广大的农民群众。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注意到农村和农民问题。早在建党之前和着手建党的同时，党的创始者们就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并对之进行了探索。

1919年2月，李大钊曾在北京《晨报》发表过一篇题为《青年与农村》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黑暗，据是我们国民全体的黑暗；他们生活的利病，据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为此，他提出了"知识阶级"和广大农民结合才能把"现代的新文明"逐渐灌输到社会中的观点，号召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应到农村去，去"开发农村"，和农民并肩战斗，使"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

1920年12月23日在上海出版的《共产党》月刊上，就发表过题为《告中国的农民》的长篇文章。文章认为："中国农民占全人口底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这样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行阶级斗争，我们的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十分的可能性了。"文章对农村的阶级关系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指出田主和佃农之间的尖锐对立，指出："一般农民的生活困苦，简直是形容不出来的"。文章并且强调，"一地方的土地，都集中于少数人之手，而大多数农民的日常生活、运命、生命都是这少数人之手了。这就是社会上贫富的悬隔越甚，阶级底区分越明，一般农民生活越苦的原因了"。文章针对萍乡的农民掀起过一场自发的反抗斗争，据此指明，农民是具有巨大的革命潜力的，他们的斗争是有着远大的前途的。"他们这样举动，范围虽小，然而正如昏天暗地之中，东方现出一线曙光是一样的"。认为只要去宣传，农民就

会来听，就会提高自己的觉悟。基于对中国农民问题的上述认识，文章号召革命的同志“要设法向田间去，促进他们的这种自觉”。文章也要求农民应对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要相信农民自己的力量，号召农民“集合起来”，“抢回你们被抢的东西”，“抢回你们被抢的田地”。文章还告诉农民：“你们起来，自然有共产主义来帮你们的忙的”，“共产主义能使农民脱出一切痛苦”，走向解放之路。《告中国的农民》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它第一次论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极大重要性，分析了农村中的基本阶级关系，揭示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是农民遭受苦难的根源，说明了共产主义者应当到农村去，而农民则应当遵循共产主义者为自己指引的方向。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在共产主义小组中的成员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也有人开始注意农村工作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型农民运动和减息运动也在部分地区逐步兴起。尽管当时农村做工作的人还是个别的，工作也还不是很深入，农民运动的规模有限，但是，这毕竟是党领导农民运动的最初尝试，是新型农民运动的先声，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开端。比如，上海小组的成员沈定一，他从1919年6月到1920年6月，在自己主编的《星期评论》上先后发表了许多文章，鲜明地提出，中国的工人不多，农民在最大多数，认为中国的社会革命应该特别注意农民运动。沈定一在1921年4月回到家乡浙江萧山县衙前村后，在农民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领导农民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农民协会，宣称“世界上的土地是应该归农民使用”，“土地该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公开声明与地主的对抗，议决减租减租抗租，规定会员每年完纳租息的成数，在衙前农民运动的影响下，萧山、绍兴、曹娥等县附近三四百里内的农民纷纷响应，很快建立了80多个农民协会。这场农民运动虽然最后被反动派镇压下去了，但是萧山农民运动掀开了中国新型农民运动的第一页，它是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先声。

当时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主要是利用暑期学生返乡的机会开展工作，在农村办农民识字班，让学生做调查，帮助贫苦的农民，让学生在返校后总结调查、工作情况。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也在胶济铁路沿线开展过农民运动。

1922年2月创刊的广东团省委机关报《青年周刊》，在《宣言》中明确的提出：“我们尤其注意的是农民运动”，第一步要“使他们解决自身的利害；联结团体，和压在头上的地主反抗”。3月，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以后，中国农民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彭湃返回家乡开始发动农民。在彭



湃的领导下，一开始成立“六人农会”。1922年10月25日，成立了广东省第一个农会——海丰县赤山约农会，农会还发表了宣言，制定了章程。1923年1月1日，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县级农会——海丰总农会。农会的成立迅速的影响到附近的紫金、五华、惠阳、陆丰以及潮州、普宁、惠来等县。于是，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惠州农民联合会又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当时海丰总农会斗争的具体要求是：“防止田主升租”，“凶年呈请减租”。8月，因风灾旱稻歉收，总农会即提出“至多三成交租”，收获不及三成者照数减之，全无收获者则免交，并发表《为减租告农民书》。但是，减租斗争也被反动派所镇压。农民运动后来也遭到镇压，发生了“七五农潮”，但很快就转为秘密活动，斗争仍在继续。

与此同时，还有湖南衡山县岳北地区农民的减租斗争。那里的赵家湾，是军阀赵恒惕的家乡。1923年4月到5月间，中共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家乡，成立了岳北农工会，并且领导发动了阻禁米谷出境和减租斗争。直至当年11月，入会的会员就达到4万多户，总人口有10万之多，邻近的衡阳、湘潭、湘乡等县的农民也纷纷响应。但是，这里的农民斗争也很快被地主阶级和反动军队联合镇压。

关于农村、农民问题，当时党虽然提出了一些正确的主张，萧山、海丰、衡山等地农民运动的开展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中国共产党这时还没有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没有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区分开来，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也没有提上重要议程。共产国际在这方面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在会议期间会见了中国代表，指出中国必须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除了提到国共两党合作的可能性问题，还提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认清“组织农民之重要”，没收大地主大军阀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同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到目前的奋斗目标是“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同时要“定限制租课率的法律”。7月16日至23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宣言》中明确强调“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并且第一次分析了农村的阶级，指出它包括“富足的农民和地主”、“独立耕种的小农”、“佃户和农业雇工”，其中小农、佃户和雇工占农民总数的95%，他们要解除穷困和痛苦，

“必须与工人握手进行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

1922 年 11 月 5 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等决议案，重申了列宁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这些文件强调了农民土地斗争的重大意义，指出应当无条件地、无例外地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一定要把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并进，把革命建立在工农特别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力量的基础上。1923 年 5 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三大发出了指示，指示明确指出：“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庙土地并将其无偿分给农民”“建立农民自治机构，并由此机构负责分配没收的土地”。指示还强调：“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在孙中山军队的占领地区，必须实行有利于贫苦农民的没收土地政策”，以“保证得到农民的支持”，“力求实现工农联盟”。但是，中国共产党 7 月 18 日才收到指示，而此时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结束，因此，中共三大通过的《党纲草案》和《决议案》中只是提出“划一并减轻田赋，革新陋规”，“规定限制田租的法律”，“承认佃农协会有议租权”等要求，并没有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

中共三大《党纲》中只有减租，没有提土地革命，与当时党的领导人的认识也是有关系的。毛泽东虽然在会上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在他起草的《农民运动决议案》中，没有提出农民的土地问题。陈独秀虽然强调农民的重要性，认为中国革命没有农民的支持是不行的，但又认为中国的土地“此时不但无集中的倾向，而且有分小的倾向”，中国农村“自耕农居多数”，中国农民所受地主的压迫，不像旧俄罗斯、印度那样厉害，“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认为土地问题的解决并不是那么急迫。陈独秀的这种认识对会议发生一定的影响。此外，会议决定实行国共合作，要与国民党的土地政策相一致，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没有提出土地革命。

1923 年 12 月 1 日，陈独秀在《前锋》月刊第 2 期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文章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农民的力量。陈独秀尽管无法否认农民是“国民革命是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为一个大的民族革命”。但是，同时他还认为，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东，易于迁徙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并认为只有在国民革命完全成功，国内产业勃兴，普遍实行农业资本化，农业

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以后，农村间才会有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革命的可能。

邓中夏在1923年12月29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11期发表了《论农民运动》一文。邓中夏在这篇文章中对中国的农民运动较早地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针对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认为农民“散漫”、“保守”、“苟安”，“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错误认识，不指明地给予了批评。文章鲜明地指出，农民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伟大力量，指出：固然农民的思想保守，不如工人激进，农民的住处散漫，不如工人的集中，在理论上讲，农民革命的希望很少，但是从实际上看，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中国农民有革命的可能”。而且农民“心地纯洁，性质诚挚，耐劳不偷懒，勇敢不怕死”。既然农民潜藏着巨大的革命性，我们就应该唤醒农民为国民自身利益而奋斗，“我们要做农民运动是刻不容缓的事了。”在这里，邓中夏还把农民问题和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问题联系起来。文章还呼吁革命青年到农村去，教育农民，组织农民，使农民运动更加“有声有色”的开展起来。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论及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把农民问题和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与分析，并得出正确的结论，这对中国共产党后来在大革命时期发动和领导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沈定一领导的萧山农民运动

1921 年下半年，以衙前为中心的萧绍平原上先后建立了几十个农民协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减租抗租斗争。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和影响下的全国第一次新型农民运动，是贫苦农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组织起来开展斗争的大胆尝试。

萧山位于钱塘江南岸，是浙北平原上一个人口稠密、交通发达的地区。衙前地处萧（山）绍（兴）平原，是浙东运河沿岸的一个农村小镇，距省城杭州 30 余公里。这里河港纵横、交通发达、土地肥沃、人口稠密、堪称鱼米之乡。然而，在 1910 年之后的 10 多年里，水、旱、虫灾连绵不断，20 世纪初以来，钱塘江由于无人治理，洪水肆虐，大片良田被江水吞噬。在军阀政府的统治下，这里的农民深受地主豪绅的剥削和苛捐杂税的勒索，终年不得温饱。各派军阀连年混战，许多农民被拉去当兵，也有许多人被军阀屠杀了。在天灾人祸的胁迫下，农民背井离乡，卖儿鬻女。当年衙前北部坎山一带，因歉收断粮，饿死者达百余人。使萧山农村的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萧山农民运动最早始于衙前，发起人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员沈定一。沈定一出生在衙前一个大地主家庭，沈家父祖辈都是萧山有名的地主，他的父亲沈江梅于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曾在闽、台等地做官，在衙前拥有大量的土地和房屋，是萧绍平原有名望的官僚地主。沈定一在青年时期就具有革命思想。他在云南任知县、知州时，就曾暗中资助过反清的斗争，由于被人告发，流亡日本，在东京参加同盟会，回国后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辛亥革命时期，他因组织“公民激进党”，进行倒袁斗争，遭到军阀政府的通缉。1920 年 6 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沈定一与陈独秀、李汉俊、邵力子、施存统、陈望道、李达、沈雁冰等人一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共产党员。沈定一对农民的疾苦深表同情。从 1919 年 6 月 ~ 1920 年 6 月，他在自己主编的《星期评论》上先后发表了 100 多篇诗文，这些文章主要是揭露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宣传农工神圣，并号召广大劳农阶级团结起来，



共同奋斗，从而解除自己身上的枷锁。他在文章中也曾鲜明地提出，中国的工人不多，农民在最大多数，认为中国的社会革命应该特别注意农民运动。

1921年4月，沈定一（当地人称三先生）从上海回到家乡衙前，专门从事农民运动。衙前农民运动是从筹办农村小学开始的。沈定一回家乡后，仿效在城市中从办夜校入手开展工人运动的做法，出资、腾屋、在自己家中筹办衙前农村小学，他邀集原浙江第一师范的进步教师刘大白和“一师风潮”中的著名学生领袖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以及原杭州女子职业学校学生杨之华（1921年下半年杨之华回到衙前村）等来衙前一面筹办衙前农村小学，一面开展农民运动。他们通过访贫问苦和社会调查，动员穷苦农民将子女送到小学读书，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他们还经常深入群众，帮助农民分析贫困的原因并非“命中注定八字苦”而是地主掠夺和剥削的结果，是私有制社会所造成的恶果。在筹办农村小学的过程中，他们还办起了“龙泉阁书报社”，出借进步书刊。农村小学的教员们在进行思想发动时，还抓住农民身边所发生的有影响的事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

沈定一和农村小学的教员深入农民之中，热心为农民排难解忧，同农民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得到了农民的信赖和拥戴。1921年5月，衙前村的李成虎等农民因上年赊出油菜籽的钱无法要回，生活窘迫，沈定一就从自己家中拿出一笔钱分给这些农民，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并借机进一步启发他们要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捍卫自身的权益，改变自身的地位，农民才有活路。这样，李成虎和李成蛟兄弟成了沈定一的密友。李成虎家境贫寒，还讨过饭，他虽然年纪已大，但秉性刚直，深村民的尊敬，大家都称他为“成虎公公”。

通过宣传教育，农民们开始起来捍卫自身的权益。1921年春夏之交，正当青黄不接之际，一些粮商乘机哄抬米价。在衙前农村小学教员们的支持下，沈定一发动农民与不发米商斗争，他选择的第一个斗争对象是他的妻舅开的“周和记米店”。李成虎把围身布绑在竹竿上当大旗，带领农民向砍山进发。他们捣毁了“周和记米店”后，又翻过莫家岭，经长巷，到瓜沥，继续与不法米商斗争。沿途的农民也纷纷加入他们的行列，人数越来越多，势力也越来越大。农民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一些哄抬粮价的奸商，迫使粮商恢复了原价。接着，又与绍兴县知事评理，争得了原被绍兴县官绅把持的萧绍公河西小江的养鱼权和捕鱼权。这些斗争的胜利，使农民看到了自身团结的力量。

为了唤醒更多的农民投身革命斗争，推动农民运动的开展，沈定一还和衙前农村小学的教员们先后到衙前、龛山、航坞山北、塘头等地进行演讲。他们在演讲时头戴毡帽，身穿普通农民衣服，操着当地方言，讲的道理又明白易懂，因此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8 月 19 日，沈定一作了题为《谁是你的朋友》的演讲，从“金钱的发生”来揭露剥削的秘密，指出“世界不是金钱的世界，是劳动者的世界，劳动者是我亲爱的朋友。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应该归劳动者所有”。[①]9 月 23 日，沈定一在航坞山北又作了题为《农民自决》的演讲，进一步揭露了地主剥削的残酷，明确提出了“废止私有财产，土地公有”的主张，并强调这个主张的实现，取决于农民团结的力量和组织上的努力。经过不懈的努力，这些团结、组织起来反抗地主剥削的思想，很快在萧绍平原的农村中传播开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衙前农村小学于 9 月 26 日正式开学。在开幕式上，颁布了《衙前农村小学宣言》，《宣言》明确的提出了该校将为穷人的儿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学校将坚持无产阶级的教育性质，摆脱和摒弃为有产阶级训练爪牙的教育。学校只吸收农民子弟入学，学生的书籍、纸张全由校方免费供给。学校刚成立，就有学生 100 余人，以后逐年都有增加。全校分五个班。学校不仅开设了国语、算术等文化课程，还置办了农船、铁钯等农具，让学生学习劳动技能，学校还注重和学生家庭的联系，以此打开了学校和社会的隔膜，促进学校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学校化。学校还开设了成人班，利用农闲时间开课，一面教文化，一面宣传革命道理。衙前开办的新型农村小学，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曾发表了多篇文章，为此作了评述。

在沈定一和衙前农村小学教员们的共同努力下，一批农民积极分子，如李成虎、陈晋生、汪瑞张、单夏兰、沈阿秀、缪文德等涌现出来，这就为农民协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21 年 9 月 27 日，在衙前东岳庙召开全村大会，正式宣告浙江省第一个农民协会——衙前农民协会成立。经过农民的议决，会上通过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斗争纲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宣言》首先指出：“农民在中国历史上足最被尊敬的人民”，但是农民却没有在精神上获得真正意义的尊敬，完全被“第三阶级”资本主义的“毒水淹死了”。《宣言》接着指出了广大农民受到剥削和压迫而遭受痛苦的具体情况。在道出了农民

受地主盘剥、资产阶级不能做主权者之后，《宣言》指出："我们的觉悟，才是我们的命运。获们有组织的团结，才足我们离开恶运交好运的途径。""我们不要忘记世界上的土地是应该归农民使用。我们不要忘记土地该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②]《章程》宣称"本会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还阐明了衙前农民协会的组织形式和减租政策。农民协会根据章程的规定，选举了李成虎、陈晋生、单夏兰、金如涛、朱梅云、汪瑞张为农协委员，李成虎为议事员。

衙前农民协会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萧（山）绍（兴）各地农民运动的发展，标志着衙前农民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衙前农民协会成立的消息，迅速的传遍了萧绍平原。广大农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在短短的一两个月，西起钱塘江畔、东到曹娥江边，三四百里的范围内的农民都开始酝酿成立农民协会。许多农民派代表到衙前入会，有的要见沈定一，有的前来索取"红绿告示"（即《宣言》和《章程》）。当时沈定一在杭州出席省议会，李成虎劝农民要团结起来，与地主对抗。

在短短的两个月中，以衙前为中心，萧绍地区的萧山、绍兴、上虞三个县共有82个村建立了农民协会。浙东运河岸三四百里，数十万农民，为保卫自身利益，掀起了对抗减租风暴。1921年11月24日，衙前农民协会联合会正式成立，并作出了"三折还租"（按原租额三折交租）、改大斗为公斗（用每斗15市斤折为一公斗量租）、取消"东脚费"（地主下乡收租时由佃农负担的路费）、反对交预租等规定。这些减租的规定，可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

减租决议公布后，为了扩大影响，沈定一首先带头，他号召家里佣人罢工，出钱让他们到茶店喝茶，还叫家里的人自己动手操持家务，带头从自己家开始减租。地主主动上门收租时，佃农们因有农民协会的支持，要求"三折还租"。这时地主由于收不到租，也联合起来，有一次集中了80余只收租船来衙前，准备分头向农民逼租。农民协会组织了1 000名左右的农民，向收租船投掷泥块石块，高呼抗阻口号，吓得地主不敢上岸，空船而逃。

前梅村大地主周仁寿，往年下乡收租任意提高租额，稍不遂意就将农民捆绑送官，农民对他恨之入骨。1921年12月8日，他又耀武扬威带了一帮人马到九曲多清坞村收租，对农民协会的减租决议置若罔问，坚持按一石四斗的高额收租，农民与之说理，他非但不听，还蛮横辱骂、捆绑抗租农民，

农民们怒不可遏，打得他头破血流，昏迷过去。清坞村地主高云卿见状，连忙叫人把周背进高家桃园内躲藏，才算脱身。

周仁寿回到城里，立即到县公署控告农民协会，要官府查办肇事者，并查封农民协会。此事震惊了萧绍一带的地主豪绅。一时间，反对农民协会的舆论纷纷涌起。

针对地主的反扑，萧山南沙二三十个村还联合发表《萧山南沙组织农民团体宣言》。《宣言》控诉了几千年来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地租残酷压榨农民的罪行，宣称："我们从今天以后，具牺牲的态度，斗争的手段．打破有产阶级在社会上势力，叫他们有产阶级的人，在我们面前屈服！"《宣言》呼吁："无产阶级的人，大家起来呀！"[③]

1921 年 12 月 17 日，绍兴县的钱清、前梅、清坞村一带。以单夏兰为首组织了一支千余农民参加的游行队伍，到绍兴县城请愿、示威。在此期间，沈定一正在杭州参加省议会，在这次会议上，他联合了 12 位省议员，就今岁萧绍地区农民减租等问题向省长提出了质问案。沈定一在军阀政府的议会上为维护贫苦农民利益仗义执言的消息在报上披露后，极大地鼓舞了正在斗争的萧绍地区广大农民的斗志。

浙东运河两岸风起云涌的农民抗租减租斗争，使反动当局和地主豪绅大为恐慌。绍兴县的地主豪绅陶仲安、陈庆钧等 12 人，联名写信给绍兴县公署和绍属戒严司令盛开第，要求当局乘现在减租刚起来尽速派兵予以镇压。

12 月 18 日，整顿各村农民代表在衙前东岳庙召开减租大会时，当局派兵到衙前包围了会场，开枪打伤 3 人，捕去了单夏兰、陈晋生和衙前农村小学龙泉阁书报社管理员孙继良 3 人，押赴绍兴，钉镣投入监狱。随后，反动当局进一步策划乘机从根本上推翻各地的农民协会。浙江省长沈金鉴，立即以军政两长的名义，命令省警察厅派 60 余名保安队员到处张贴布告，解散农民协会，强令入会者烧毁农民协会的会员证，又派军警去萧绍地区弹压，对各村农民协会的领导人按名追究，悉数拘拿。反动军警先后搜到了各村农民协会会员名册与衙前农民协会的《宣言》、《章程》和《农民自决》等印刷品，被列入拘捕名单的人员达 500 余人，部分农民协会的领导人相继被捕入狱，没有被捕的远走他乡躲避，其家则被当局查封。但由于人数太多，反动当局改变手法，重点搜捕最主要的农民协会领导人。

1921 年 12 月 27 日，李成虎在田间耜泥时被捕。李成虎被捕后，在狱中遭受严刑审讯，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与敌人斗争了一个多月，1922 年 1

月24日，李成虎在萧山县监狱被凌虐致死。在这前后，大批农民协会的领导人相继被捕入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军阀政府和地主豪绅的疯狂镇压下，暂时转入低潮。

李成虎的遗体送回家乡后，大家隆重的举行了李成虎遗体安葬活动，由沈定一出资，于2月1日葬在衙酊村的凤凰山麓。衙前小学的教师刘大白等人还写了《提起我的锄》、《每饭不忘》等歌曲，教给农民和学生唱，寄托对烈士的哀悼。农民们还在农会经常集会的东岳庙内设立了“成虎堂”。

萧山农民运动掀开了中国新型农民运动的第一页，它是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先声。萧山农民运动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受到广大劳动群众和进步人士热烈支持的农民斗争。当农民运动掀起时，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在9卷4号上全文刊载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上海的《民国日报》及其副刊《觉悟》，发表了许多有关衙前农民运动的报道和文章。东岳庙流血事件发生之后，1921年12月20日，《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在副刊《觉悟》上发表了《论萧山农民协会被军队摧残事》的长篇专文。随后又接连发表了《萧绍阶级斗争之一幕》、《萧山劳资斗争再志》和《对于萧山事件的感想》等声援文章，支持农民减租抗租的斗争。1922年2月7日，又刊登《李成虎小传》，抨击反动当局摧残农民协会的罪恶行径，歌颂革命斗士李成虎大义凛然、知死必勇的崇高精神。

注释：

①《谁是你的朋友》，《民国日报》，1921年8月26日。
②《衙前农民协会宣言》，《新青年》，1921年9月第4版，附录1-2。
③《萧山南沙组织农民团体宣言》，《民国日报》，1921年12月20日。

澎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大力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还开始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的领导下，在广东省海陆丰地区掀起了海陆丰农民运动。

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早期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员澎湃。他是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先导者，是海陆丰农民运动和海陆丰苏维埃的创始人，被后人誉为“农运大王”。澎湃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城桥东社工商业地主家庭，1917 年在海丰中学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彭湃先到东京神田神保町十番地一所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并在该地的成城学校学习。1918 年 9 月，彭湃考进了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学——东京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留日期间，彭湃积极地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活动和多种进步社团，经过求索，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学习《共产党宣言》、著名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的《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等书刊。1921 年 5 月，彭湃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后回国。他从日本回国后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参加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些活动。

1921 年 7 月，彭湃在海丰县城成立社会主义研究社和劳动者同情会，吸引知识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向工农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组织知识青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向工人、农民讲演。他在海丰学生联合会主编的《新海丰》创刊号上发表了《告同胞》，系统地阐述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破坏私有财产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研究社的成员纷纷撰写文章，探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抨击封建制度。1921 年 9 月底，彭湃返回海丰县接任劝学所所长，并于 10 月 1 日正式就职。他就职以后，就对海丰教育行政进行改革，并选林文、陈魁亚为局员。1922 年 1 月初，彭湃对教育的用人也进行了改革，劝学所改称教育局，彭湃任教育局局长，权力也有一些提高。经过彭湃的这些改革以后，全县学生都有一种蓬勃向上的

朝气，社会主义思想和新文化运动在全县各校中也开展起来。后来，彭湃因组织学生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的集会和游行，遭到海丰豪绅地主的反对和诬告“借教育宣传社会主义之谬妄”而被撤职。县里所有思想进步的校长、教员们也纷纷被解职，“从教育入手”实现社会革命的尝试遭失败。从此，彭湃把注意力转到了工农方面来。

1922年5月中旬，彭湃、杨嗣震等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海丰组织，以学术研究会的名义创办《赤心周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公开向封建制度宣战。5月14日发行第1期，宣传社会主义，批评反社会主义言论。彭湃在《赤心周刊》先后发表了《谁应当出来提倡社会主义》、《告农民的话》等文章，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把民众和农民发动起来，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但是彭湃不久后便发现，虽然他们以“工农群众的喉舌”自居，可是“背后绝无半个工农”，影响极为有限。彭湃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从此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

1922年6月下旬，彭湃在家乡广东海丰县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发动赤山约农民参加农会。他组织农会的理念是：将经济的斗争与政治的斗争相结合，使农民既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又有夺取政权的准备。彭湃从关心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入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海丰农村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把农民传统的会门形式同当代社团规程、公开工作和秘密活动相结合，向农民宣传组织农会的革命道理，以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由于理念适合实际，逐渐被农民所接受，工作取得了成效，1922年7月29日，彭湃就得到张妈安、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思贤五位农民的支持，成立“六人农会”，它标志着农民由分散到组织起来，迈出了海丰农民运动的第一步。有这些积极分子的带动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支持加入，农会逐步发展起来。农会成立后，他们在贫苦农民中进行宣传发动工作，教育农民加入农会。不但帮助会员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反对封建恶习，而且带领农民打击土豪恶霸的剥削，取消苛捐杂税，农会逐渐获得了农民的信任。

1922年10月25日，在彭湃的领导下，成立了广东省第一个农会——海丰县赤山约农会。农会发表了《宣言》，制定了《章程》。农会为赤山农民排忧解难，成立济丧会，开办农民医药房，调解民事纠纷，反对船捐，发动农民同盟非耕等，全心全意为农民办好事。农会的威望日益提高，影响不

断扩大，成为团结农民的领导核心。海丰各乡约的农民，纷纷要求加入农会。到1922年底，全县已经有12个约农会，总共包括92个乡农会，2 765户，会员达到16 590人。

1923年1月，在海城龙山妈宫举行了首次农民代表会议，正式成立海丰总农会。加入农会的会员已达2万多户，10万多人，占全县人口的1/4。海丰总农会召开的当天，各乡代表共60多人前去参加。经过会员的一致推举，彭湃被选为总农会会长，杨其珊为副会长。会议规定海丰总农会下设文牍部、农业部、宣传部、仲裁部、财政部、交际部、庶务部、教育部、卫生部等各部。各约的农会也直接隶属于海丰总农会。彭湃起草和颁布了《海丰总农会临时章程》和《赤山约农会章程》，会议通过了总农会章程、会旗。海丰总农会的政策是“经济的斗争与政治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全国第一个县级农会——海丰总农会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的诞生，使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与旧式农民起义完全不同的新时期，这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进入有纲领有领导的新阶段。海丰总农会团结全县农民实行减租，向封建剥削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斗争。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农会规定将农产品集市的权力归农会掌管；反对地主肆意加租、易佃剥削农民；创办农校，农民子弟免费入学；动员农民造林，山林收益按劳分配；成立仲裁部，为农民主持公道。这些措施深得农民群众的拥护。

1923年3月，海城恶霸地主朱墨对公平余坤等佃户无理“加租吊佃”，总农会组织10万农会会员与地主阶级组织的粮业维持会进行了第一次较量，最终取得了胜利，影响很大。当地的土豪劣绅十分惧怕农会，一时间，欺压农民的事几乎看不到了。海丰农民运动的声威，很快远播到东江地区和全省农村。随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农运风暴席卷了广东。陆丰、惠阳等县相继成立农会。到1923年5月1日，海丰、陆丰和惠阳三个县的农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加入农会的已有20余万农民，共包括70多个约，500多个乡。按照农会章程的规定，在每年的5月1日，农会将举行劳动节纪念大会。5月1日这一天，到会的农会会员有8 000多人，汕尾造船工人100多名，海丰城1 000多名学生也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次庆祝大会首先由农会代表发表演



说，然后，三县近万名的农民和海丰的工人、学生在海丰县城莱圩埔集会游行，纪念五一劳动节，人们高呼“反对升租吊田！”“反对国际资本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声震全城。随后，农会发展至紫金、五华等地，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不到两个月，潮安、揭阳、潮阳、普宁、惠来一带成立农会。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1923 年 7 月，惠州农民联合会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彭湃被推选为执行委员长，还制定《广东农会章程》。《章程》构建了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基本框架，确定了农民运动的主要组织形式，为农民运动提供了蓝本。这样就形成了以海陆丰为中心的广东农民运动。

1923 年 7 月 26 日和 8 月 5 日，海陆丰两次遭强台风袭击，房屋、牲畜、农作物损失惨重。彭湃本来应陈独秀之约准备去广州议事，由于要领导救灾，所以没有去成广州。总农会召开乡约农民代表大会，会议讨论了早造交租问题，通过“至多三成交租”的决议，遭到县长和豪绅反对。8 月 15 日，在海城举行全县农民大会，有 2 万多农民赴会。彭湃在大会上动员全县农民为实现“至多三成交租”的决议而斗争。会议还决定依据法律控告县长王作新逮捕农民，同时筹集资金救济入狱会员的家属。8 月 16 日（农历七月初五）海丰地主豪绅勾结军阀钟景棠，派军警镇压。武装袭击海丰总农会，逮捕农会干部，封禁会所，张贴布告取缔农会。这次事件被称为“七五农潮”。“七五”农潮发生后，彭湃直接去找陈炯明，要其电令海丰县县长立即释放被捕的农会干部并恢复农会组织。当时，陈炯明想利用农会并拉拢彭湃，便答应了彭湃的要求。等事情取得初步成果后，彭湃不想被陈炯明利用，便托辞前往香港。从此，广东农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缓慢发展的时期。

“七五农潮”发生后，农民非常迫切的要求武装自卫，彭湃也深感农民要夺取政权，只有政治、经济斗争和自卫远远不够，最重要的是要进行武装斗争。他到广州，先后当选为中共党、团的广州地委、广东区委委员，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长，当选广东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提议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任第一届和第五届主任。1924 年 7 月 3 日，开学的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时间为 40 多天，彭湃安排学员到黄埔军校接受军事训练 10 天，以后军事训练成为历届定制。8 月，广东组建农民自卫军，彭湃任团长。1925 年 9 月 14 日，开学的第五届农民

运动讲习所，学员114人，其中广东以外的湖南等七省71人，占总数60%以上，毕业后基本分配回原籍工作。

彭湃在广州，多次强调要武装农民，1924年12月，他赴广宁支持农民反抗地主斗争，给区委农委的报告指出，必须建立农民的武装队伍，否则工作就得不到必要的结果。1925年2月27日，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周恩来参与领导的东征粤军克复海丰县城，彭湃等随军反回海丰，受到海丰各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周恩来、谭平山的协助下，彭湃建立了中共海丰党支部和农民自卫军，恢复了团组织和农会活动。此后，建立了妇女解放协会、新学生社、教职员联合会和总工会筹备处等群众组织。第一次东征的胜利，促进了东江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海丰支部成立后，发展新党员、扩大党的队伍，并于1925年4月间成立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举办了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及时培养农民运动骨干，以适应工农运动发展的需要。

正当海丰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广州滇桂军阀叛乱，海丰农民自卫军随东征军赴广州参加平叛。1925年10月22日，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克复海丰，彭湃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于10月29日在海城成立了中共海陆丰地方委员会，并担任地方委员会书记。同时，成立团海丰地方委员会，次年3月，扩大为团海陆丰地方委员会。在中央地委领导下，海丰农民运动更加蓬勃发展。1926年1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在全省设6个办事处，彭湃兼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主任。2月，彭湃代表省农民协会慰问反抗地主取得胜利的普宁农民，要求他们努力加强团结，加紧武装的自卫。3月，蒋介石炮制“中山舰事件”，彭湃尖锐指出：“国民党对于农民、工人，已经成为腐烂的死尸了，农民是要求自己的政权的”。1926年7月，全县有9个区农会，2个分区农会，779个乡农会，农会员达21万余众；农民自卫军常务队300多人枪，农军训练所模范队150多人枪，不脱产的农民自卫军数以万计。同年8月，彭湃代表省农民协会和第六届农讲所300名来海丰实习的师生同行，参加海丰县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彭湃指导下，海丰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作出了扩充200名农民自卫军义勇队的决议。8月17日晚，彭湃代表省农民协会慰问海丰农民自卫军。他在《慰劳农军词》中强调：要想打倒敌人，获得真正的解放，农民必须武装起来进行斗争。

1926年，彭湃所著《海丰农民运动》在《中国农民》连载，后多次印



单行本发行，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经验传播到全国。引起外地各界人士的关注，惠潮梅地区和福建诏安等十多个县先后派出农民参观团赴海丰参观学习。1926 年 8 月，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员 300 多人去海丰实习、考察。团广东区委机关刊物《少年先锋》记者到海丰采访，撰写了一篇《小莫斯科纪游》的文章，高度评价海丰农民运动，称海丰为"小莫斯科"。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也对海丰农民运动作了很高的评价。

自从广东省农民协会海陆丰办事处成立后，所属各县农会发展很快，到 1926 年 5 月农会共有会员 36 万余人，占全省会员的总数的 56%。至 1927 年 2 月，农民参加农会的已有 27 万多户，有 100 多万人。与此同时，党的组织也在不断发展，到 1927 年 3 月，全县共有 340 个支部或党小组，有党员 3 000 多人，党员遍布乡村。为了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的战斗力，地委还举办了几期党员训练班。此外，共青团也有很大的发展。党和群团组织先后主办出版了《陆安日刊》、《海丰日报》、《农工日刊》、《海陆丰日报》等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国民革命的意义等等。1927 年 3 月 30 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彭湃和毛泽东、方志敏等 13 人被选为执行委员，彭湃还兼秘书长，担负起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重任。

1927 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共海陆丰地委获悉后，采取了果断措施，决定举行武装起义予以回击。在同广东区委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为了取得邻近县的呼应，海陆丰地委成立了中共东江特委，联络和统一指挥紫金、惠阳、普宁、五华等县的武装起义。

1927 年 5 月 1 日凌晨，在海陆丰地委领导下，海丰人民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成立了海丰县临时人民政府。同年 9 月，海丰地委贯彻中央、省委关于举行暴动指示，策应南昌起义军入粤，领导海丰人民举行了第二次武装起义；9 月 17 日占领县城，成立了海丰县临时革命政府。中共海陆丰地委改称为中共海陆丰县委，成立了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和东江革命委员会。9 月 25 日，南昌起义军部份武装 1 200 多人抵达海丰朝面山，后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团，海丰农军改称为工农革命军。根据省委的指示，中共海陆丰县委改为海丰县委和陆丰县委。10 月下旬，县工农革命军在红二师配合下，打败了入侵黄羌圩的陈学顺团，并乘胜于 11 月 1 日第三次夺取了政权。随后，彭湃受派从香港回到海陆丰，负责筹建工农兵苏维埃。1927 年 11 月，陆丰和海丰先后召开工农代表大会，宣告海陆丰工农兵

苏维埃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在敌人的疯狂反扑下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虽然只坚持了 4 个月，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彭湃创建的中国第一个海陆丰苏维埃政权，首次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了正规军、地方部队、赤卫队三级军事体制和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为我党以后红色政权的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1929 年 8 月 24 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的彭湃，到上海新闸路经远里参加江苏省军委的会议。由于叛徒白鑫告密，彭湃等被捕。在狱中，他连遭毒刑，腿部骨折，几次昏厥，仍坚贞不屈。1929 年 8 月 30 日，蒋介石亲自下令，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内枪杀了彭湃等同志。